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日、臺人之思考與行動

Pan-Asianism and Taiwan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Thoughts and Actions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張濤

Chang, Tao

指導教授：吳文星 博士

Advisor: Wu, Wen-Hsing,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July 2024

摘要

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主張亞洲內部應團結以與外界對抗、競爭的思想。本文旨在考察亞細亞主義影響下，臺灣總督府、在臺軍部、在臺日人、臺灣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等群體的思想與行動，解明亞細亞主義在日治時期臺灣的發展，以及與殖民統治的複雜關係。

由於臺灣身處中國、日本間的特殊地位，日本統治伊始，殖民者、被殖民者已對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的關係提出意見。1920 年代，亞細亞主義議論在日本國內流行，臺灣亦受此潮流影響。在臺日人、臺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紛紛基於各自的政治理想，提出不同樣貌的亞細亞主義，甚至付諸於行動。

1930 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以松井石根（1878-1948）的思想為代表、具強烈日本中心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興起，對外主張以「皇道宣布」達成亞洲民族的團結、復興，對內亦主張以「皇道」達成「內臺融和」，兩者一體兩面。面對大亞細亞主義潮流，臺灣輿論界呈現日、臺分裂的情形，雙方分裂亦反映在行動上。

為促成對外的「皇道宣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於 1934 年成立，然而因總督府、軍部、臺灣人各自抱有不同態度，具體南進工作只能仰賴軍部等積極派推動；為促成對內的「內臺融和」，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攻擊臺人知識分子，臺人知識分子則在總督府支持下組成東亞共榮協會對抗，直到 1936 年「祖國事件」後總督府接納軍部意見，開始打擊臺灣人的社會運動。在此背景下，謝龍闊（c.a.1895-1940）主導的大同促進會，主張依循大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勢力下追尋個人成就，提供了臺灣人一條另類的出路。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立場與軍部一致，對內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協助皇民化及戰爭動員，對外使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開始具體南進工作，兩者皆隨著戰爭持續而逐漸加強。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總督府眼中，臺灣將成為「大東亞的中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對外意義。不過，儘管臺灣人表面呼應日本的戰爭理念，實際上仍能在大亞細亞主義中維持自身理想。最後，本文認為臺灣人透過對亞細亞主義的思考與行動，解決其夾在中日之間的尷尬處境，更引導其發展出某種獨特的「臺灣人意識」。

關鍵字：亞細亞主義、「內臺融和」、中日親善、南進、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戰時宣傳及動員、臺灣人意識

Abstract

Pan-Asianism is an idea that aims to unite Asian nations in order to repel or compete with “Oth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thoughts and actions of various acto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Japanese immigrants,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and pro-colonial government ge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an-Asianism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Through this examination, this study hopes to elucidate the development of Pan-Asianism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an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n-Asianism and colonial rule.

Due to Taiwan’s unique posi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rule, colonizers and colonized alike ha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Asianism and Japan’s rule. With the widespread of Pan-Asianist discourse in 1920s, Japanese immigrants,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and pro-colonial government gentry all commented on the idea based on their own political visions, and even put it into actions.

After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of 1931, Japan-centered “Greater Asianism (*Dai Ajiashugi*)” soon began to dominate the discussion of Pan-Asianism. As seen in the thoughts of Matsui Iwane (1878-1948), Greater Asianism aimed to achieve Asian Unity externally with the spread of the “Imperial Way (*Kōdō*)”, and to achieve “Japanese-Taiwanese Harmony (*Naitai Yūwa*)” internally under the “Imperial Way”. Facing the rise of Greater Asianism, discussions in Taiwanese newspapers showed a clear divisi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which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ir actions.

In 1934,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of Taiwan (*Taiwan Dai Ajia Kyōkai*)” was founded to promote the “Imperial Way” externall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from Government-General,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and Taiwanese, more concrete “southern expansion” maneuvers could only be carried out by military officers and their supporters. Meanwhile,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combined with right-wing Japanese began to attack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to achieve “Japanese-Taiwanese Harmony” internally.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ith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General formed the “East Asia Co-Prosperity Association (*Tōa Kyōē Kyōkai*)” to mitigate attacks, until Government-General sided with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and suppressed existing Taiwanese social movements in 1936.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Hsieh Lung Kuo’s (c.a.1895-1940) “Datong Promotion Association (*Daidō Sokushin Kai*)” claimed that Taiwanese should follow Greater Asianism and Japan’s expansion to seek their personal success, thus giving Taiwanese an alternative way out.

With the outbreak of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overnment-General and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had mostly settled. Government-

General launched Greater Asianist propaganda programs to assist the Japanization (*Kōminka*) movement and wartime mobilization internally, and utilized the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of Taiwan to help Japan's "southern expansion." As the war went on, wartim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intensified, and the Government-General believed that Taiwan would achieve Greater Asianism's external and internal goals and become "the center of Greater East Asia" after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Needless to say, the reality was more complicated, and Taiwanese still maintained their own visions under Japan's Greater Asianism. In the en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aiwanese of various backgrounds each found their own ways to embrace/reconcile with Pan-Asianism, which not only resolved their dilemmatic posi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ut also helped them to develop their own identities.

Keywords: Pan-Asianism, "Japanese-Taiwanese Harmony,"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Southern Expansion, Greater Asia Association of Taiwan, Wartime Mobilization and Propaganda,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國內之浮現與發展	19
第一節 亞細亞主義之起源.....	19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亞細亞主義.....	22
第三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亞細亞主義.....	25
第四節 全亞細亞協會與全亞細亞民族會議.....	28
第五節 小結.....	34
第三章 亞細亞主義與 1920 年代之臺灣社會	36
第一節 日治初期臺、日人之亞細亞主義.....	36
第二節 1920 年代在臺日人之亞細亞主義觀.....	44
第三節 1920 年代臺灣人之亞細亞主義觀.....	60
第四節 小結.....	88
第四章 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與日、臺人之思考	90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國內之大亞細亞主義潮流.....	90
第二節 1930 年代臺灣報刊界之構成.....	101
第三節 大亞細亞主義與在臺日人輿論.....	110
第四節 大亞細亞主義與臺灣人之反應.....	119
第五節 小結.....	130
第五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南進：以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	133
第一節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之背景.....	133
第二節 閩變前後臺灣軍、臺灣總督府、臺灣人之活動.....	143
第三節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與其成員之活動.....	156
第四節 小結.....	180
第六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內臺融和」：右翼團體與臺灣人之行動	182
第一節 民族問題與在臺日人右翼團體之興起.....	182
第二節 東亞共榮協會與臺灣人之日臺融和理想.....	191
第三節 謝龍閣與大同促進會「灰色」之道.....	219
第四節 小結.....	228
第七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戰爭時期之臺灣	230
第一節 中日戰爭爆發與總督府之因應.....	230
第二節 戰爭時期大亞細亞主義宣傳與動員.....	237
第三節 戰爭下之眾生相.....	255
第四節 小結.....	269
第八章 結論	270
附錄一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身分簡表	275
附錄二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之活動（1934-1936）	279
參考書目	283

表次

表 3 - 1	1913-1918 年臺灣對日本國內、中國貿易概況	45
表 3 - 2	《昭和新報》創立時的經營陣容	84
表 4 - 1	1930 年代臺灣主要綜合性週、月刊概況	108
表 4 - 2	1930 年代臺灣主要週、月報刊發行情	109
表 4 - 3	《昭和》上的相關徵文作品及其作者	125
表 5 - 1	對岸領事會議協議及依賴事項（1933 年 12 月）	144
表 5 - 2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役員（1934 年 1 月）	158
表 5 - 3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背景統計（1934 年 1 月）	159
表 6 - 1	臺灣改進黨部分成員	195
表 6 - 2	東亞共榮協會幹部（1934 年 8 月）	197
表 6 - 3	東亞共榮協會支部列表	200
表 6 - 4	《臺中新報》創立時的經營陣容	205
表 6 - 5	國防強化大演說會講題一覽	209
表 6 - 6	皇政會幹部（1936 年 10 月）	215
表 7 - 1	對時局島民大會演說會講題一覽	231
表 7 - 2	南支調查委員會成員	234
表 7 - 3	臨時情報部事務概況（1937 年）	237
表 7 - 4	總督府在華南之協力狀況（1939 年 7 月為止）	242
表 7 - 5	臺灣排英同志會幹部	244
表 7 - 6	臺灣出身之印尼獨立戰爭參與者	267

圖次

圖 6 - 1	東亞共榮協會主要成員合影	199
圖 6 - 2	謝龍闊	220
圖 7 - 1	「臺灣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250
圖 7 - 2	「向南支南方伸展的臺灣」	251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亞細亞主義」是什麼？如竹內好所稱，亞細亞主義「不是具備某種實質的內容，而能被客觀限定的思想，而應說是一種傾向性」。¹此傾向，詳言之即是認為自己屬於「亞洲」，而由於「亞洲」各國或民族之間擁有某種共通性，²因此應在政治上團結、合作，以與非亞洲人競爭、對抗的想法。³若將之具體地放在戰前日本的情境來說明，即是「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對於歐美列強的亞洲侵略，試著以亞洲諸國的連帶來與之對抗的思想和運動。之後則與向亞洲的膨脹政策及大東亞共榮圈論相連結。」⁴

僅管日本自明治時期即出現如曾根俊虎（1847-1910）主導的興亞會（1880 年成立）、⁵平岡浩太郎（1851-1906）與頭山滿（1855-1944）等人所創立的玄洋社（1881 年成立）等亞細亞主義結社，亞細亞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才得以進入主流言論界。隨著列強一一捲入歐洲大戰，無暇關注亞洲事務，日本國內對列強的顧忌逐漸減少，而強調日本是「東洋和平的擔當者」，或提倡「亞洲門羅主義」等；認為日本在亞洲具有優越地位的說法也在日本國內盛行。⁶如 1926、1927 年兩次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等嘗試實現亞細亞主義的集會隨之出現。⁷ 當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隨後日本承認滿洲國並退出國際聯盟後，亞細亞主義更成為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外交官員亦不時發言表示西方不應干涉日本和亞洲的事務。⁸

¹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收於竹內好編集・解説《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頁 12。

² Saaler 認為，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論述通常提倡以下四種共通性：文化共通性（同文）、種族共通性（同種）、地理接近性，以及亞洲各國是抵抗西方的命運共同體。Sven Saaler,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in Sven Saaler and J. Victor Koschmann eds.,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10.

³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辞典》稱，「以自身的歸屬地域為起點，使用名為『亞洲』（アジア）的概念，將『他者』作為競爭、抗爭、排除的對象，在稱為『亞洲』（アジア）的範圍內追求連帶的政治工程（プロジェクト）。」吉田裕等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辞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15），頁 14，該詞條是由松浦正孝所寫。

⁴ 新村出編，《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2008 年第六版），頁 308。

⁵ 其前身為振亞社（1877 年成立），後身為亞細亞協會（1883 年改名）。

⁶ 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收於同氏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緑蔭書房，1996），頁 62-71。

⁷ 有關這兩次大會，可以參考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229-241；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頁 172-180。

⁸ 如 1934 年的天羽聲明：「若中國利用他國排斥日本、採取違背東亞和平的措施，或採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則日本將不得不反對之」，原文見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

當亞細亞主義不只在民間盛行，甚至也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時，作為日本帝國一部分之臺灣呈現了何種情況？根據總督府警務局於 1935 年左右編纂的《臺灣社會運動史》，對於臺灣的亞細亞主義運動，有如下的敘述：

〔臺灣右派運動的〕第四個特徵，在於亞細亞主義運動的抬頭及其影響。這個運動是一部分臺灣人知識階級，對滿洲事變後我國大陸政策的發展，以及在國際外交上所表現之國力的強化，有了重新的認識。部分曾有左傾思想的臺灣人知識階級甚至也有參加的趨勢。在追求內臺融和、亞細亞民族大同團結的主張下，遂醞釀成立自發性團體的氣運。⁹

此段文字，以及之後對「大同促進會」（1930 年成立）、「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1934 年成立）等組織成立過程和宣言的紀錄，都是在描述當時亞細亞主義運動甫出現在臺灣的情形。然而，該書編者並未深究其所謂的「亞細亞主義」擁有什麼樣具體的內涵；同樣地，「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的關係，例如文中所稱的「內臺融和、亞細亞民族大同團結的主張」的具體樣貌為何、與日本國內的情形有何不同、有何影響等，也無法從此段文字或之後對各組織的紀錄中獲得充分的解答；而「亞細亞主義」的相關運動或主張在此後的發展，包括中日戰爭或太平洋戰爭¹⁰爆發後的情形，自然也非只編纂至 1935 年前後經緯的該書所可能敘述。本論文希望對「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的關係，尤其是 1931 年到 1945 年間的情形做一整體性的探討。

二、文獻回顧

（一）竹內好與亞細亞主義研究的思想史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學界並未立即展開對戰前亞細亞主義的研究。其原因，可從 1958 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史辭典》對「大亞細亞主義」一詞的說明中看出。其明確指稱「大亞細亞主義」是「主張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各民族的聯合或者是團結以對抗歐美的思想」，雖然萌芽於初期民權論中，之後卻遭黑龍會等利用，強調日本的指導地位，試圖合理化日本侵略，至於太平洋戰爭時的各種說法，皆不承認各民族的自主性，露骨地呈現出日本的獨善支配。¹¹

以上說明堪稱為戰後初期對亞細亞主義的主要看法。¹²與前述竹內好等人的

第 3 卷（昭和九年對中國關係）》（東京：外務省，2000），頁 560-562；井上寿一，《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06），頁 89-129。

⁹ 翻譯主要依據翁佳音編譯，《臺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94），頁 222-223。原文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 1337-1338。

¹⁰ 僅管日本學界目前逐漸以「亞洲太平洋戰爭」（アジア・太平洋戦争）為主流稱呼，為行文簡便，本文仍以太平洋戰爭稱呼。

¹¹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日本近代史辞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58），頁 341，此詞條是由岩井忠熊所寫。

¹² 其他辭典例如小葉田淳等編，《日本史辞典》（東京：数研出版，1959），頁 135；下中邦彦編集，《政治学事典》（東京：平凡社，1954），頁 1136，「泛亞細亞主義（汎アジア主義）」詞條下

說明相較，《日本近代史辭典》對亞細亞主義就更明確地抱持負面的態度，也指出亞細亞主義的發展最後就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結合，成為合理化對外侵略的理論。¹³因此當日本 1945 年日本戰敗後，亞細亞主義遂為戰後初期主要的研究者敬而遠之。例如戰後初期丸山真男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中，雖然將「大亞細亞主義」視為「日本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特質之一，但未對其進行詳細說明。¹⁴在戰後學界普遍將戰前的亞細亞主義視為法西斯主義或侵略思想之一的氛圍下，勇於打破研究禁忌而開啟對亞細亞主義的研究者即是竹內好。¹⁵無怪乎，晚近《アジア・太平洋戦争辞典》或是《日本思想史辞典》，提及亞細亞主義時，都不得不引用竹內好的著作，可見其對亞細亞主義研究之影響力。¹⁶如學者指出，「在過去五十年間，研究亞細亞主義幾乎成了研究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之同義詞」¹⁷。筆者擬以竹內好為起點來進行相關研究回顧。

竹內好（1910-1977）是昭和年間日本言論界的中國文學研究者、評論家，尤以對魯迅的研究及對日本近代化的反思聞名。竹內對亞細亞主義研究最大的影響，來自於其於 1963 年編輯的《アジア主義》。該書為筑摩書房所出版《現代日本思想大系》叢書第九卷，書中收錄自明治以來到戰後有關亞細亞主義的文章十餘篇，分成「原型」、「心情」、「邏輯（論理）」、「轉生」四類。在這些文章之前，附有竹內好對亞細亞主義所撰導言〈亞細亞主義的展望〉，¹⁸其重要的特徵大概有以下三點：

首先，竹內好指出，與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不同，亞細亞主義乃是多義的。認為亞細亞主義「不是具備某種實質的內容，而能被客觀限定的思想，而應說是一種傾向性」、「只能用亞細亞主義來稱呼的心情（心的ムード），以及基於此、構築於此的思想」，而只有「亞洲各國的連帶（不問其是否以侵略為手段）取向」是其不得不承認的共通性。因此，基於亞細亞主義建構的思想遂在日本近代史中

有關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的部分。也可以參考姜克實，〈『越境』のアジア主義觀—方法論の再検討—〉，收於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国際日本学研究所叢書》19 号（東京：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2014 年 3 月），頁 210 的相關說明。

¹³ 姜克實，〈『越境』のアジア主義觀—方法論の再検討—〉，頁 210。

¹⁴ サーラ・スヴェン（Saaler Sven）、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Christopher W.A. Szpilman），〈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主義とアジア主義に関する歴史研究の現在〉，《日本思想史学》45（2013），頁 199-202。丸山真男，〈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思想と運動〉（1948），收於《丸山真男集 第三卷（1946-1948）》（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 289-290。有趣的是，丸山於 1956 年將此文章收入《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来社，1956）時，所新增的注解中提到，近代日本的興起與亞洲民族主義的關聯，是個重大且有趣的題目。他當時之所以未進行深論，是因為問題過於龐大，且又礙於戰後占領政策所致。見《丸山真男集 第六卷（1953-1957）》（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 254。

¹⁵ 松本健一，〈竹內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讀〉（東京：岩波，2000），頁 90-91。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竹內好並非亞細亞主義研究的第一人，卻是早期研究者中最具影響力者。見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p.14-15.

¹⁶ 子安宣邦監修，《日本思想史辞典》（東京都：ペリカン社，2001），頁 7-8，該詞條是由中村春作所寫；吉田裕等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辞典》，頁 14。

¹⁷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31.

¹⁸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頁 7-63。

隨處出現。¹⁹從竹內好選入該書的文章，遍及美術家岡倉天心（1863-1913）、大陸浪人宮崎滔天（1871-1922）、右翼的內田良平（1874-1937）、大川周明（1886-1957）、左翼的尾崎秀實（1901-1944），以及戰後的石母田正（1912-1986）等人，即可理解他的想法。

其次，學者指出，該文重心在於說明亞細亞主義這一從民權主義發源的思想，為何會於明治末期被右翼所壟斷。²⁰竹內好對 1880 年代與 1900 年代的情形有相當的說明。他提到 1880 年代後在日本開始確立其大國地位，並與清朝爭取朝鮮的支配權的背景下，玄洋社如何從民權論轉向為國權論，而在協助朝鮮對清獨立的同時也積極支持日本對外擴張，也提到樽井藤吉（1850-1922）等強調日韓應對等合邦的論述。在亞細亞主義的反面，則提到福澤諭吉（1835-1901）基於西方文明觀對亞細亞主義的批評。關於 1900 年代，竹內為了與黑龍會的想法對照，而說明岡倉天心基於美學的亞細亞主義與宮崎滔天對中國革命的情感。竹內好並認為，亞細亞主義中，如宮崎滔天般對亞洲同情、反侵略的「心情」未能在之後留下，反而是黑龍會侵略式的思想得以留存，直到 1910、20 年代亞細亞主義遂被右翼所獨占。

最後，對於昭和年間的亞細亞主義，儘管竹內好在書中也選了大川周明、尾崎秀實等人的文章，但對於前者，竹內所選的是其於 1922、1951 年所寫的兩篇文章；對於後者，竹內則指出其「出現得太晚，思想也在孤獨的情況下結束」，²¹可見竹內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探討此時亞細亞主義的整體情況。²²到了戰時「大東亞共榮圈」等說法，更被他批評為壓制包括亞細亞主義的所有思想的「疑似思想」，隨之而生的許多著作，則都是「不值得稱之為思想」的「自稱亞細亞主義」，至於戰時發表的「大東亞宣言」也欠缺內涵。²³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亞細亞主義的研究並未在該書出版後即立刻興起，反而是 1990 年代以後，因冷戰的結束及東亞共同體論的興起，加上 1995 年正逢終戰五十年紀念，當時日本社會展開對近代日本的再檢討，才連帶地出現不少關於亞細亞主義的研究。²⁴而作為戰後首位開啟亞細亞主義研究的竹內好，自然受到關注。這也使得之後甚至是晚近許多亞細亞主義研究中，仍可看到竹內好的影響。竹內好選擇編入書中的亞細亞主義者及其文章，之後遂成了亞細亞主義研究的正

¹⁹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頁 12-14。

²⁰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p.48.

²¹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頁 52。

²² 儘管竹內好在文末附註表示其未來將對石原莞爾、橘樸等人進行專論，惟就筆者所見，最終似未有相關成果。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頁 63。

²³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頁 13-19。從思想史觀點對竹內好影響的說明，可以見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p.31-61。可以認為竹內好不滿亞細亞主義與日本 1930、40 年代軍事擴張的連結，而將當時許多思想稱為「自稱亞細亞主義」予以排除，以追尋亞細亞主義的正面意義。

²⁴ サーラ・スヴェン（Saaler Sven）、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Christopher W.A. Szpilman），〈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主義とアジア主義に関する歴史研究の現在〉，頁 199-200。佐藤美奈子，〈「アジア」を語ること—1980 年代以降の竹内好論—〉，《社会科学研究》58：1（2006），頁 58。

典 (canon)，而成為相關研究的核心。²⁵在方法上，許多著作也採取類似竹內好的方法，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研究這些重要亞細亞主義者的生平、思想及行動。

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是對亞細亞主義的演變進行整體性考察的專書。作者將亞細亞主義細分為「古典亞細亞主義」、「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三者，並分別對各自的時代背景和重要思想家進行說明，指出亞細亞主義從強調日中提携、連帶的古典亞細亞主義，走向甲午戰爭後擴張式的大亞細亞主義，最終與大陸政策結合，用來正當化對亞洲的侵略，淪為合理化「大東亞共榮圈」的說詞。雖然作者並未明確指出，但該書對亞細亞主義分期及發展的敘述，無論是從連帶到擴張主義的演變，或者是書中對「大東亞共榮圈」的批評，實與竹內好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該書在方法上也類似於竹內好，偏重描述各個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行動。²⁶

針對亞細亞主義早期的發展，另有狹間直樹在《東亞》月刊上連載之一連串以〈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為標題的文章。儘管作者在該文之初對竹內好有不少批評，但從其將亞細亞主義分期為前期 (1880-1900) 較強調日中兩國的對等關係；中期 (1900-1928) 強調日本對中國的優越地位；後期 (1928-1945) 以日本為頂點，只追求日本利益，亦能看出竹內好的影響。²⁷

其他同樣採取思想史方法的著作中，較早期的例子如野村浩一的〈橘樸：アジア主義の彷徨〉，該文主要是說明橘樸 (1881-1945) 長期對當時中國的研究，如何形塑他對中國的看法，最終使他在九一八事變後參與滿洲國的建設，並號召以「王道」這一具「東洋式的價值」的思想作為滿洲國的建國理念。²⁸近期著作如史匹曼 (Christopher W. A. Szpilman) 的《近代日本の革新論とアジア主義》，則是以戰間期的革新右翼社團——猶存社成員為中心的研究。其中主要描述包括北一輝 (1883-1937)、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 (1888-1936)、鹿子木員信 (1884-1949)，以及雖非猶存社成員，但與革新派人士有所來往的平沼麒一郎 (1867-1952) 等人的生平、思想概觀及各自的亞細亞主義思想。²⁹

對日本國外亞細亞主義的研究，尤以對中國的研究最多。或許因竹內好將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演講視為他對亞細亞主義的絕望，也或許因其書原先即屬日本思想史叢書之一部，其未深論亞細亞主義與中國的關係。此一空缺，前述野村浩一的〈橘樸：アジア主義の彷徨〉或狹間直樹的〈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皆可資補充。較完整的著作，如趙軍的《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及嵯峨

²⁵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pp. 45-49.

²⁶ 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²⁷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亞》，分別刊載於 410 (2001 年 8 月)，頁 68-77；411 (2001 年 9 月)，頁 88-98；412 (2001 年 10 月)，頁 70-79；413 (2001 年 11 月)，頁 78-87；414 (2001 年 12 月)，頁 56-75；415 (2002 年 1 月)，頁 67-73；416 (2002 年 2 月)，頁 64-70；417 (2002 年 3 月)，頁 51-66。

²⁸ 野村浩一，〈橘樸：アジア主義の彷徨〉，《立教法学》19 (1980)，頁 36-116。

²⁹ 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近代日本の革新論とアジア主義》（東京：芦書房，2015）

隆的《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就前者觀之，趙軍在該書序章指出亞細亞主義的多樣性，之後則對中日兩國人士的想法進行考察。在日本方面，主要是以大陸浪人面對中國革命時的想法及行動，探討其各自的亞細亞主義，其中包括：宮崎兄弟³⁰、頭山滿（1855-1944）、川島浪速（1866-1949）、久原房之助（1869-1965）。至於中國方面的想法，作者主要以孫中山（1866-1925）、戴季陶（1891-1949）兩人為研究對象。接著，探討中日戰時和戰後的亞細亞主義，認為當時日本、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各方都根據自己的政治需求而提出不同的亞細亞主義主張。最後，從中國人的角度，對日本亞細亞主義的發展進行批評，並提出未來亞洲共生的展望。³¹

嵯峨隆的《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雖然是相當晚近的作品，但與前述趙軍的著作相較，反而更顯示出竹內好的影響。作者在序章明確贊同竹內認為亞細亞主義具多義性的看法，進一步依循此看法指出，若依連帶、侵略與否為標準評價各種思想，將失去亞細亞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多樣性，因而不擬評價書中所述的各種思想。因此該書在研究對象上，相對於前述趙軍的著作，對於戰時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例如東亞新秩序論、東亞聯盟論，以及中國方面如汪精衛戰時的想法著墨更多。儘管如此，仍可看出作者類似竹內，隱約將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區分成自玄洋社以來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型亞細亞主義，以及宮崎滔天基於人道的、不將日本視為盟主的亞細亞主義。³²至於太平洋戰爭時的亞細亞主義，作者也與竹內相同，將其視為是「無思想」的自稱亞細亞主義。不過，儘管竹內好的說法對該書的影響深遠，但仍有不盡相同之處，該書除重要思想家外，亦論及輿論界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呈現出 1990 年後興起的研究趨勢。³³

（二）新方法、新視野

儘管 1990 年代後出現的亞細亞主義研究中，有不少依循竹內好的方法，但同時也有許多學者採取不同的研究取向，使亞細亞主義研究的視野更為擴大。其中，在思想史上最具啟發性者為古屋哲夫的〈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收於同氏所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其認為若要研究亞細亞主義，必須先釐清日本人以「亞細亞」一詞說明什麼，其中又表述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是故該文並未聚焦於竹內好提出的重要亞細亞主義思想家，反而運用眾多的雜誌、社論，考察日本國內主流的亞洲觀。作者並指出，真正讓日本國內有關亞細亞主義的議論興起，提高對中國、印度局勢的關心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亞洲地位的上升。作者除了與竹內好對戰時亞細亞主義的看法類似，仍認為九一八事變後的亞細亞主義，為了因應戰爭、追隨現實政治而失去新的可能性之外，其方法及論

³⁰ 即宮崎八郎（1851-1877）、宮崎民藏（1865-1928）、宮崎彌藏（1867-1896）、宮崎滔天（1871-1922）。

³¹ 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東京：亞紀，1997）

³² 有關前者，例如該書頁 212-218、頁 329 等處，後者見頁 43-76 有關宮崎滔天的部分，兩者的對比，見結論頁 338-339。

³³ 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6）

點都與竹內好不同。³⁴因此，有學者認為古屋對亞細亞主義研究的影響並不亞於竹內好。³⁵

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趙軍近年之《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對照其早年之《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該書顯然反映近年的研究取徑，其重心已不再偏重 20 世紀初之典型亞細亞主義者，反而將時間延續至 1930 年代後，對象擴張中國內部各界人士：包括清末政治家、報紙（《申報》）、戰時留日學生、到滿洲的臺灣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中西功（1910-1973），等各種不同的階層、群體，以側面的方式探討這些人士如何思考與日本的關係，又如何進一步反對、回應，或者接受亞細亞主義，也就是「作為被動態之亞細亞主義」（受け身としてのアジア主義）。³⁶

除了思想史有所創新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亞細亞主義與外交史研究的結合。波多野澄雄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可說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他以太平洋開戰以來日本外務省的行動為主軸，特別以重光葵為焦點，考察外務省如何透過推進亞洲各國的獨立，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去殖民地化的戰爭目標。外務省此舉對內可排除軍部、軍政當局對外交的影響，以達成外交的一元化；對外則試圖提出一個具普世性，且以民族獨立為思想原理的戰後國際秩序構想，以與聯合國的大西洋憲章對抗。³⁷

觀察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外交中的意義者，還有日本政治学会編《年報政治学》1998 年的特集「日本外交中の亞細亞主義」。該特集收錄的文章可分成四類：第一類為山室信一、松田宏一郎有關亞洲認識和亞細亞主義的文章；第二類為坂本多加雄、大澤博明關於西鄉隆盛的「征韓論」的政治哲學、明治前期朝鮮政策的亞細亞主義傾向的文章；第三類為櫻井良樹、酒井哲哉對長島隆二（1878-1940）、蠟山政道（1895-1980）兩人思想、行動的考察；最後是井上寿一有關戰後日本對亞洲外交的文章。儘管各自的研究內容不盡相同，仍可統整出幾個趨勢：首先，山室、松田的研究表示，亞細亞主義思想的起源必須從明治以前日本的亞洲認識著手；接著，山室進一步指出，儘管日本政府未正式將亞細亞主義當作正式政策，卻始終與日本外交政策有關係，外務省也私下資助在野的亞細亞主義者。³⁸大澤的論文也認為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對朝鮮政策帶有日清協調、抵抗俄國侵略等亞細亞主義的意義；最後，櫻井、酒井、井上的論文則顯示出，亞細亞主義研究不再只著重明治時期的重要亞細亞主義思想家，更及於大正、昭和時期的政治家、學

³⁴ 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收於同氏所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綠蔭書房，1996），頁 47-102。

³⁵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p.16-17.

³⁶ 趙軍，《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

³⁷ 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另外，比較晚近的著作則有井上寿一，《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06）。

³⁸ 山室信一的此篇文章，後經修改收入同氏著，《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1）書中第三部。該書與其說是亞細亞主義研究，不如說是日本自 17 世紀以來的亞細亞認識史，及亞洲思想交流史的著作，其關注範圍遠廣於本論文所能處理，故不在此說明。

者，甚至及於戰後日本外交政策隱含的亞洲區域主義概念。³⁹

除了中、日文的研究之外，茲略述相關的英文研究。英文的亞細亞主義研究，同樣於 1990 年代開始增加，最初原屬日本帝國研究之一環。Peter Duus 指出，戰時日本的指導者意識到凡爾賽條約後的國際情勢已無法容許帝國主義存在，於是運用 1860 年代出現的亞細亞主義（Pan-Asianism），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使日本能夠調和自身對區域霸權的渴望，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對獨立的期待。⁴⁰其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與 Duus 類似，將研究重點放在亞細亞主義與日本國策的關聯性。Eri Hotta 的 *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Hotta 指出，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國內的知識分子、政治家轉向擴張主義的「盟主論」亞細亞主義以接受滿洲國的既成事實。之後，亞細亞主義不只成為滿洲國建國理念的主幹，也影響了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的國家政策。為了解決軍事上的困局，日本的知識分子、政治家採用「東亞新秩序」作為對外政策，結果卻越陷越深，引導日本邁向與西方的戰爭，更企圖將亞細亞主義落實在對東南亞的統治上。⁴¹

第二類則以思想史研究為主軸。Sven Saaler 與 J. Victor Koschmann 於 2007 年編輯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一書，將亞細亞主義視為亞洲區域主義的先驅，收入當時英文、日本學界主要的亞細亞主義研究，惟其中多數文章仍聚焦在重要的亞細亞主義團體與思想家，包括興亞會、滿川龜太郎、安岡正篤（1898-1983）、蠟山政道（1895-1980）等，時間上則橫跨明治時期至戰後。⁴² Sven Saaler 之後與 Christopher W. A. Szpilman 共同編輯了 *Pan 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一書，將 1850 年至當代重要的亞細亞主義文獻按時序譯成英文，並對每份文獻附加時代背景或作者的生平、思想介紹，對未來英文學界之亞細亞主義研究提供一大助力。⁴³近幾年來，有感於傳統思想史過於侷限少數個人，亦出現將研究對象「民主化」的趨勢。Torsten Weber 的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深受古屋哲夫的影響，將主軸聚焦在中、日兩國各種對「亞洲」的政治論述上，儘管重要亞細亞主義者的言論仍占不少討論篇幅，另也納入其他的政治家、輿論，甚至反對亞細亞主義者的說法，在時間上則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亞細亞主義逐漸進入輿論界

³⁹ 日本政治学会，《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年報政治學 1998 年度）（東京：岩波書店，1999）。其中文中所提及的論文為：山室信一，〈日本外交とアジア主義の交錯〉；松田宏一郎，〈「亜細亞」の「他称」性 - アジア主義以前のアジア論 -〉；坂本多加雄，〈征韓論の政治哲学〉；大澤博明，〈明治前期の朝鮮政策と統合力-そのアジア主義的傾向を中心に-〉；櫻井良樹，〈日中提携と「国民的新党」の創設-長島隆二の場合-〉；酒井哲哉，〈「東亞協同体論」から「近代化論」へ--蠟山政道における地域・開発・ナショナリズム論の位相〉。

⁴⁰ Peter Duus,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iplomacy & Statecraft*, 7:1 (March 1996), pp.54-72.

⁴¹ Eri Hotta, *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⁴² Sven Saaler and J. Victor Koschmann eds.,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⁴³ Sven Saaler and Christopher W. A. Szpilman eds., *Pan-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為始，以 1933 年論述遭日本政府、大亞細亞協會壟斷為止。⁴⁴ 不過，儘管英文的亞細亞主義研究自 1990 年代開始成長，與中、日相較仍屬小眾，亦不常討論後述之亞細亞主義與既存殖民地的關係。

（三）殖民地與亞細亞主義的交集：以臺灣為主的討論

亞細亞主義研究最初始於竹內好，後於 1990 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其中有不少著作採用竹內好的方法，也依循其論點，以明治時期重要思想家為關注重點。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方法及視野的擴大，包括採用報章雜誌的言論作為素材、關注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對大正、昭和時期給予更多著墨。

當亞細亞主義的相關討論於 1930 年代高漲時，⁴⁵對於日本既有的殖民地而言，亞細亞主義有何影響？誠如 Peter Duus 所指出，包括亞細亞主義（Pan-Asianism）等的各種泛民族主義呼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⁴⁶又如前述波多野的研究指出，戰時「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不只是口號，外務省更在事實上推進東南亞原殖民地的「獨立」。政治史研究外，如前述趙軍對在滿臺灣人的研究所示，近年思想史研究亦開始重視殖民地人民的存在。以下茲討論臺灣、日本學界過去有關臺灣與亞細亞主義的研究及近年來的研究趨勢。

過去有關大正、昭和時代臺灣與亞洲各地，例如滿洲國或南支南洋關聯者甚多，⁴⁷對臺灣與亞細亞主義關係的相關研究則較少。主要可分成聚焦於 1920 年代者及 1937 年以後者，例如趙勳達的〈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主要關照 1920 年代的情形。該文聚焦在臺灣知識分子對孫文「大亞洲主義」思想的接受，說明臺灣人之社會運動與「大亞洲主義」的關係。⁴⁸不過，筆者認為該文主軸過度聚焦在臺灣人對孫文思想的回應，不免有顧此失彼，忽視臺灣知識分子所處之時代脈絡之虞。⁴⁹至於對 1930 年代的情形也僅止於警務局的資料，並未深入探討當時各界人士的討論。

關於對 1937 年後的研究，多以文學史對「皇民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戰時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所進行的文學動員、對文藝的控制，以及臺灣文

⁴⁴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⁴⁵ Sven Saaler and J. Victor Koschmann eds.,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12.

⁴⁶ Peter Duus,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pp.54-72.

⁴⁷ 茲舉幾例：有關滿洲國者，以許雪姬的研究成果最多，例如許雪姬，〈滿洲國政府中的臺籍公務人員（1932-1945）〉，收入許雪姬編，〈來去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 161-210；有關南支南洋，尤以鍾淑敏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例如有關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者，如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2004 年 12 月），頁 149-194；關於國策會社者，如鍾淑敏，〈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事業之研究〉，《臺灣史研究》12：1（2005 年 6 月），頁 73-114；有關臺灣人在南支南洋者，如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⁴⁸ 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國家發展研究》10：2（2011 年 6 月），頁 77-116。

⁴⁹ 如本文第三章第三節所示，1920 年代初期知識分子對亞細亞主義已有不少討論，至 1922 年底時陳逢源亦已撰文將亞細亞主義與「友聯主義」的概念結合。

人的因應。例如王昭文的〈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及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⁵⁰柳書琴的〈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⁵¹兩篇論文都提到亞細亞主義於日治末期的風行與戰時總督府的相關宣傳，並敘述文學界的順從，不過都是概括性的說明，而未具體深論總督府宣傳或臺人呼應亞細亞主義的實況。李文卿的《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探討戰時「大東亞共榮圈」內臺灣、朝鮮、滿洲及華北的文學統制、動員、文壇特徵，不過有關臺灣的部分，較無著墨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的關係。作者對於 1930 年代的說明也不盡正確，例如將林獻堂等人籌辦的「東亞共榮協會」視為是總督府推行共榮思想的工具，即是一例。⁵²

張修慎的《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1945 年的思想》也呈現相似的情形，該書首先分析 1920 年代知識分子對亞細亞主義、大正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討論，其中有關亞細亞主義的部分，具體地指出臺灣知識分子在孫文提出「大亞洲主義」之前，便對亞細亞主義有了相當的討論。對於之後的情形，主要以王敏川及蔣渭水的想法說明孫文的「大亞洲主義」對臺灣知識分子的影響，進而使其確立促進「日華親善」的使命。關於 1930 年代，主要則聚焦於 1937 年後臺灣文人的鄉土文學及民俗研究，以探討其對皇民化運動的反應。⁵³

整體而言，臺灣學界的討論，除後述何義麟的文章外，似乎對 1930 年代早期到 1937 年間亞細亞主義在臺灣的具體發展著墨不深；而對 1937 年到 1945 年的情形，幾乎僅說明皇民化政策、戰時體制下的同化及動員，而較未觸及亞細亞主義對殖民統治的影響。即使提及亞細亞主義，也多限於臺、日文學界的人士及其作品，並未檢討其他臺灣人、在臺日人或相關團體的想法及活動。

日本學界過去亦沒有專門討論臺灣與亞細亞主義關係的研究，僅提示研究視角，例如小熊英二對日本帝國同化政策的研究中，曾提及中野正剛（1886-1943）、板垣退助（1837-1919）、神田正雄（1879-1961）等亞細亞主義者對殖民統治的關注，中野正剛提倡保存朝鮮的文化，而板垣退助、神田正雄雖然支持改善臺灣統治，但同時也支持更積極的同化。⁵⁴近藤正己說明在臺軍部抬頭時，曾述及松井石根（1878-1948）任臺灣軍司令官後創辦的「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該團體不但有「南支南洋情報」中心的作用，也形成以軍部為中心的人際網絡。⁵⁵

近年研究則更為深入，其中值得注意者係以松浦正孝為首進行的一系列與亞細亞主義相關的研究，松浦自 2004 年開始相關研究，主要成果見於 2010 年著

⁵⁰ 王昭文，〈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⁵¹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

⁵²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新北：稻鄉，2010）

⁵³ 張修慎，《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1945 年的思想》（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⁵⁴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相關討論分別在頁 225-230、323-325、341-345。

⁵⁵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上冊，頁 19-21。

《「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⁵⁶以及 2007、2013 年分別編著的《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⁵⁷《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⁵⁸

《「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以明治以前日本對外貿易、交流，說明亞細亞主義的源流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亞細亞主義的各種類型。第二部分以 1931 年後高橋是清實行的財政轉換為起點，說明日本對內開始積極向殖民地輸出重工業並強化日本與殖民地間的經濟聯繫，對外則輸出輕工業製品。此舉產生三個影響亞細亞主義內涵的因素，分別是日、英發生貿易摩擦後，日本國內的印度僑民開始鼓吹反英政策，此即印度因素。同時，松井石根與大亞細亞協會的成員嘗試透過臺灣和華僑網絡向南支南洋經濟進出，此即臺灣因素。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透過朝鮮強化與滿洲的經濟關係，朝鮮、滿洲遂成了日本向蒙疆、中國，甚至是進出南洋的後勤、產業基地，此即朝鮮、滿洲因素。第三部分說明松井石根與其創辦的大亞細亞協會在各地的活動及其「意識形態網絡」的建立，透過該網絡，大亞細亞協會組織反英運動，鼓吹將中日戰爭擴大成「大東亞戰爭」。該書創見有三：首先，從政治經濟史而非思想史出發，具體說明亞細亞主義的源流及其於 1930 年代產生改變的因素，其中也包括臺灣因素對亞細亞主義的影響。接著，在研究對象上，該書是亞細亞主義研究中第一部深入以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的研究。⁵⁹最後，該書在方法上採用網絡（network）的概念考察該協會如何運動廣大的人脈關係影響政治。

《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收錄了十四篇論文，分別從西南政權、汪政權及殖民地臺灣三個角度出發，考察昭和時期亞細亞主義所展現的各種樣貌，其中，與松浦的研究⁶⁰較直接關係者，分別為駒込武及何義麟的文章。駒込武的〈在台軍部と「反英運動」——ジュノー号事件を中心に〉，主要究明 1935 年 4 月珠諾號事件發生後，主張反英、南進的在台軍部如何與在台日人一同發動反對荷蘭、英國的群眾運動，該群眾運動更與對英國系教會學校的攻擊結合，轉而要求排除臺灣「內部的敵人」。⁶¹該文特色在於利

⁵⁶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⁵⁷ 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⁵⁸ 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

⁵⁹ 松浦之後更協助復刻大亞細亞協會的會刊《大亞細亞主義》，並對其有相當詳盡的解說。後藤乾一、松浦正孝編集、解說，《大亞細亞主義》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2008）

⁶⁰ 即松浦對在台軍部及大亞細亞協會的研究，〈汎アジア主義における『台湾要因』——兩岸關係をめぐる日・英中間抗争の政治経済史的背景〉，《北大法学論集》55：3（2004 年 9 月），頁 21-72。而後經修改成為《「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第六章。

⁶¹ 駒込武，〈在台軍部と「反英運動」——ジュノー号事件を中心に〉，收於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頁 259-285。

用不少具右翼色彩的書籍、報刊，闡明各右翼團體對時事的立場及影響。駒込武之後在《臺灣人的學校之夢》中第 8、9 章也採用類似的作法，雖然其敘述中沒有提及亞細亞主義或大亞細亞協會，但所運用的史料和方法亦值得參考。⁶²

最直接與亞細亞主義有關者，是何義麟的〈台灣知識人の苦悩——東亜共栄協会から大亜細亜協会台中支部へ〉，之後修訂譯成中文〈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⁶³該文主要利用《臺灣日日新報》及林獻堂日記，指出林獻堂等人在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的抬頭下，採取創立「東亞共榮協會」的方法，以「內臺融和」、「日中親善」等說法繼續爭取臺灣人的平等待遇。然而，該組織不久就遇上內部鬥爭，最後 1936 年因「祖國事件」及「皇紀問題」⁶⁴而被迫解散，部分日人成員轉入同時期成立的大亞細亞主義協會臺中支部。該研究指出 1931-1937 年間臺灣知識分子對大亞細亞主義的反應，可說是突破了向來對此期間的忽視。

《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共收錄 28 篇文章，內容遍及亞細亞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及研究史、戰前亞洲各地的亞洲觀及亞細亞主義思想，以及戰後亞洲地域秩序等。其中與臺灣有關者，僅何義麟的〈大亜細亜協会の活動と植民地知識人の対応——台湾における日華親善論の変容〉。⁶⁵該文延續前述文章，進一步探討大亞細亞協會在臺灣的活動、其對臺灣人在南進下應扮演何種角色的看法，以及臺灣人的反應，指出 1938 年日本占領廈門前該會主張「殖民地近代化恩義論」，鼓吹臺灣人回報殖民統治，協助南進國策；1938 年後則主張「殖民地經營人才活用論」以實施對占領地的政治支配。臺灣人中辜顯榮等人採取配合態度，蔡培火、林獻堂等人直到迫於戰爭時局為止都試圖抵抗。該文除利用《臺灣日日新報》外，也利用大亞細亞協會的會刊《大亞細亞主義》及其臺灣支部的會刊《臺灣大アジア》，說明大亞細亞協會在臺灣的活動及其成員的想法。該文乃是筆者本論文的重要基礎，然而無論是這些史料的内容，或是關於大亞細亞協會乃至昭和時期臺灣亞細亞主義的整體情形，或是戰時臺灣人的反應，都值得更進一步探討。

三、研究目的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乃在究明亞細亞主義與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之關係。然而具體應如何達成？上述研究回顧顯示，傳統思想史研究聚焦於重要思想家、政

⁶² 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2019），頁 541-689。

⁶³ 何義麟，〈台灣知識人の苦悩——東亜共栄協会から大亜細亜協会台中支部へ〉收於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頁 286-310；何義麟，〈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文史臺灣學報》1（2009 年 11 月），頁 222-241。

⁶⁴ 指宮原武熊在 1936 年 10 月，於臺中州所召開民風作興協議會中，因主張反對使用皇紀紀年，而引發的一連串攻擊事件。

⁶⁵ 何義麟，〈大亜細亜協会の活動と植民地知識人の対応——台湾における日華親善論の変容〉，收於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頁 447-475。

治家之個別意見，政治史研究則聚焦於國際關係、對外政策。就此二者觀之，日治時期之臺灣受限於殖民地地位，無論是知識分子、在臺日人，或是臺灣總督府、在臺軍部，其重要性、影響力皆難以與日本國內之知識分子、政治家、軍部相比擬。不可否認的是，從日本全國或者是國家對國家的角度來看，區區殖民地人士之言行究竟具有何種程度之影響力，頗值懷疑。無怪乎過去亞細亞主義研究往往忽視臺灣之存在，而近年將重要亞細亞主義文獻編譯成英文之 *Pan 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一書中亦無任何一名臺灣人的存在。進一步而言，例如吳叡人精湛地指出，源自竹內好的當代亞細亞主義，並未挑戰主權民族國家體系，也無法超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原則，是以非屬主權國家之臺灣往往無法出現在戰後亞細亞主義的主張。⁶⁶不難推測源自竹內好之戰後亞細亞主義研究，也隱然沾染了同樣的前提，那就是：論述涉及民族國家（nation-state），或者至少是前階段的民族（nation），才有可能成為研究對象。⁶⁷

另一方面，儘管過去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研究中提及亞細亞主義者不在少數，對於殖民統治者、統治政策的研究，卻僅約略述及同化政策、南進、皇民化政策與亞細亞主義的關係，始終未以亞細亞主義為主軸深入討論；對於被統治者的研究，則有偏重知識分子、藝文人士的傾向，時間上亦有侷限。

相對於過去研究的侷限，晚近研究則提供了不少啟發。無論是 Torsten Weber 將亞細亞主義研究「民主化」的嘗試，或是趙軍所謂「作為被動態之亞細亞主義」，顯示出亞細亞主義自始即非重要思想家的專利，更是被廣泛群體討論、接受、回應的對象，其中趙軍的研究更提及日本建構的「大東亞共榮圈」，使受殖民壓迫的臺灣人能夠前往滿洲活動，獲得疑似性的支配者特權；何義麟的研究顯示出即使在 1930 年代的壓力下臺灣知識分子仍能自主地回應亞細亞主義；至於松浦正孝、駒込武的研究，則顯示出 1930 年代在臺軍部、在臺日人亦依循亞細亞主義在臺灣活動。事實上，若回歸竹內好對亞細亞主義的說明，則亞細亞主義原先即是出現在日本近代史各處之「心情」，其展現形態並不必然要與國際關係、地域秩序相關，而可能出現在各階層人士，以各種形式表現。

不可否認的是，從臺灣的角度觀察，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的現實狀態，係時人必須不斷面對的問題。有鑑於此，本研究之重心將圍繞在日治時期的各群體如何從臺灣的角度出發認識亞細亞主義，又如何將臺灣統治與亞細亞主義結合。以統治者而言，即是總督府、在臺軍部為了達成亞細亞主義，如何實行對臺統治及對外政策；以被統治者而言，即是知識分子、傳統士紳、親日派、在臺日人，在各自所處的背景，如何思考或回應亞細亞主義，並將亞細亞主義與其環境、需求結合。

具體而言，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有四：其一，描繪亞細亞主義在殖民地臺灣由

⁶⁶ 吳叡人，〈賤民宣言—或者 臺灣悲劇的道德意義〉，收入氏著，《受困的思想 臺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出版社，2016），頁 60-73。

⁶⁷ 如趙軍在晚近的著作中提及，中國的各種「大亞洲主義」主張，必然要面對亞洲統合、協力的問題，從國際關係論來看就是「國際關係之主體」民族國家間的統合。趙軍，《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頁 25。

多個團體、人士及其相關言行呈現的多元樣貌；其二，探討當時在臺日人，特別是受亞細亞主義影響者如何討論西方的殖民，如何理解日本的臺灣統治；其三，究明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等立場各異的臺灣人，如何討論亞細亞主義，又如何行動，以及與在臺日人有何差異；最後，檢討亞細亞主義在總督府的戰時動員宣傳中如何被運用，臺灣人在皇民化政策和「解放亞洲」的號召下如何思考亞細亞主義的意義。

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本文將特別注意到殖民地臺灣具有的特別性質，亦即臺灣作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不只在政治、經濟上，甚至在社會氛圍上都受日本國內情勢之影響。另一方面，臺灣作為日本的南方殖民地，相較於日本國內，因政治環境、地理位置及民族組成的不同，使得臺灣受到亞細亞主義——一個號召亞洲各國團結以反抗西方勢力的時代潮流所影響時，也呈現出與日本國內不盡相同的樣貌。尤其當時臺灣人難以逃避身處日本與中國、南洋間的狀態，其如何思考此一尷尬處境，賦予其意義，其結果對「臺灣人」的概念產生何種影響，更是本研究必須關照的問題。本論文以亞細亞主義的發展為背景，從殖民地臺灣的角度，觀察亞細亞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和影響，進一步思考亞細亞主義與殖民統治的關係。

因此，本文討論重點將限縮於臺灣內部的情形，有關亞細亞主義在日本思想史中之流變，以及對近、當代日本知識分子、政治家的影響，的確是值得深入檢討的課題，然礙於本文之視角，除了為了後續討論進行背景說明外，多數內容將省略。

另一方面，本文之討論對象亦將以在臺灣活動的人士為主。換句話說，本文擬不深入檢討臺灣人在滿洲、中國、南洋等海外地區長期活動之態樣。其原因，除了基於本文主軸、篇幅考量外，相關討論將涉及滿洲國、汪精衛政權、臺灣籍民問題等，遠非本文所能處理。⁶⁸另外，有關臺灣原住民與亞細亞主義的關聯，涉及總督府的「蕃地」統治，同樣基於篇幅、主軸而未深入探討。儘管相關討論實難完全避免，原則上依亞細亞主義在臺灣島內之漢人（即當時所謂「本島人」）與日本人（即當時所謂「內地人」）間的發展為主軸進行論述。

另外，儘管亞細亞主義能夠呈現在各種言行中，從篇幅考量上，尚有再進一步限縮討論對象之必要。本文研究目的既然著重臺灣統治與亞細亞主義之關係，討論對象亦將偏重在關於政治、經濟、社會運動之相關議論及行動，至於以文藝為主或較不涉及臺灣統治者，將非本文的討論主軸。

最後就本文使用之名詞而言，日文之「亞細亞主義」一詞雖然能譯為（泛）亞洲主義（Pan-Asianism），惟考量本文之討論重心為日治時期臺灣，當時不只日本人，臺灣人亦受日文詞彙影響而使用「亞細亞主義」，因此本文將保留原漢字「亞細亞主義」，除了強調之外皆不另加引號。至於「大亞細亞主義」，在當時僅

⁶⁸ 就直接涉及亞細亞主義的研究而言，趙軍的《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已利用中研院的口述資料，探討前往滿洲國的臺灣人所想像、經驗的「大亞細亞主義」。其他相關研究，則如許雪姬，《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社，2023）；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臺北：樂學，2006）等。

是亞細亞主義的稱呼之一，本文則以之稱呼 1930 年代後流行、以日本為中心之亞細亞主義。其餘如「內臺融和」、「大東亞共榮圈」等名詞，皆屬歷史用語，亦將保留。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法。相較於傳統研究主要以重要思想家的作品為分析素材，本論文延續近年來的新方法，除了個人文獻之外，也利用民間的報章雜誌及政府的宣傳刊物。以下首先說明本論文使用之文獻的主要來源，接著，依本論文的内容說明各文獻的內涵和主要利用重點。

臺灣史學界近年來最顯著的成果之一，乃是眾多數位化資料庫之建置。就日治時期而言，公家機關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圖書館也建立「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及「館藏南方資料影像系統」等三個資料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亦建有「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臺灣日記知識庫」等資料庫。私人企業則如漢珍數位圖書建置《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及《臺灣時報》等報刊的資料庫。

然而，單憑數位化資料仍有不足之處，例如數位化的各刊物中常有卷期不全者，這些欠缺的部分，有些可以各圖書館中所藏的原本彌補，或採用復刻版、著作集如《大亞細亞主義》、《臺南新報》、蔡培火日記（收於《蔡培火全集》）等。本論文所使用的資料，除了從前述各資料庫中獲得外，亦使用各種已出版的紙本史料，至於《昭和新報》、《新高新報》等週刊報刊則是使用微縮檔案為主。

本論文主要運用的史料如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國內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開始浮上臺面，此情形同樣在臺灣出現。然此一時期臺灣尚未出現較具組織性的活動，於是相關迴響須從各種報章雜誌中尋求，其中，代表官方立場的日刊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可說是島內人士獲得海內外新消息的來源，該報報導時事的立場也具影響力。原先由東洋協會臺灣支部發行的《臺灣時報》月刊，自 1919 年開始併入臺灣總督府發行的同名月刊，該刊物亦代表臺灣總督府的立場。至於代表在臺日人民間立場者，如 1909 年發刊之《實業之臺灣》月刊，內容不只是鼓吹日本人向海外、殖民地發展，更有許多的政經評論，1925 年後改名為《南日本新報》，並先後改為旬刊、週刊。至於臺灣人的想法，首先可從《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最初由留日學生所創辦、之後回臺發行的刊物中尋求，其中有許多臺灣人對當時亞細亞主義情勢發展的看法。1928 年創刊的《昭和新報》週刊，則代表親政府之臺灣人的想法。除此之外，辜顯榮所寫的《臺灣の思想問題》，雖然收於 1939 年出版的《辜顯榮翁傳》中，其實是他於 1924 年所寫，其中也有不少呼應亞細亞主義的言論。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亞細亞主義（大亞細亞主義）成為日本官民間廣泛討論的重點，除了有相關言論外，亦有各種團體的成立。總督府等官方機關對島內政治運動的調查是得知這些組織活動的重要基本資料，這些資料包括《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裡的《臺灣社會運動史》中有關右翼運動的部分，記載各亞細

亞主義團體成立的宗旨、宣言、成員、組織及部分活動，但是只記載至 1935 年左右為止。1935 年後的情形，有些可以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中，如〈臺灣島内情報〉等臺灣軍對島内政治思想運動的調查報告中得知。⁶⁹就個別團體而言，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乃是當時較著名的亞細亞主義倡導團體之一，可透過其會誌《臺灣大アジア》及該協會其他出版品考察其言行。然該會誌現僅存 1937 年至 1940 年部分，較早期的活動只能用其他資料補充，例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藏《臺灣總督府檔案》中有該協會高雄支會自 1936 年以來申請補助時的資料，內容為其章程、經費及參與的活動。另外，其活動和成員亦可見於《臺灣日日新報》及《臺南新報》或其他週刊紙，以及該協會的日本本部「大亞細亞協會」出版的《大亞細亞協會年報》、《大亞細亞主義》中。至於大同促進會、大亞洲黎明協會等其他團體，資料較少，主要活動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等報刊中。東亞共榮協會則是林獻堂等人籌組的團體，除了利用報紙外，可利用林獻堂日記、清華大學所藏葉榮鐘典藏究明該團體的活動。

除了上述報刊外，民間日人主導的各種週、月刊中也有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南日本新報》為《實業之臺灣》的後身，立場偏右，傾向總督府；《臺灣經世新報》由蓑和藤治郎擔任社長，立場右翼，代表民間日人；田中一二主導的臺灣通信社發行的刊物《新臺灣》（之後先後改稱為《臺灣》、《全臺新報》），期刊明顯具右翼色彩，經常攻擊臺灣人。透過這些刊物，可理解當時在臺日人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之內涵，包括他們對西方殖民亞洲及日本的臺灣統治之看法。至於臺灣人的觀點，除了《臺灣新民報》、《昭和新報》外，亦可從《新高新報》、《南瀛新報》的漢文版得知。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了確保臺灣人的民心並實施動員，總督府開始積極參與亞細亞主義的宣傳，其發行刊物例如：總督府臨時情報部自 1937 年發行的《部報》，作為宣傳之中心刊物；由總督府文教局、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編纂的《教化印刷物》。一些地方政府或教化團體也參與亞細亞主義的宣揚，例如臺南州出版的《時局ニ關スル講演資料》等。此時期臺灣人如何反應？《臺灣日日新報》（1944 年 4 月後為《臺灣新報》）、《臺灣時報》、《臺灣公論》、《新建設》、《旬刊臺新》等報章雜誌中都有臺灣人的投稿，這些投稿基本上皆順應總督府的政策，雖不見得是其真實的想法，但有時也出現與在臺日人不盡相同的看法。如果再透過蔡培火的《基督者の友に檄す》（1941 年）、吳新榮日記、葉盛吉日記等資料，更可清楚地了解臺灣人對這些戰時宣傳接受的程度。除在臺灣或日本國內的臺灣人外，當時前往戰區的臺灣人亦值得注目，其中有少數甚至在戰後協助東南亞的原住民贏得獨立戰爭，他們的經歷和想法可從一些戰後刊行的刊物或訪問記錄中得知，雖屬事後回憶，但有助於理解亞細亞主義對臺灣人的影響。

⁶⁹ 臺灣軍參謀部，《臺灣島内情報》，昭和十二年第二號，頁 1、5-6，〈台灣島内情報一括〉，《密大日記》，第 16 冊，昭和 13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4555900。

五、章節架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國內之浮現與發展

第一節 亞細亞主義之起源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亞細亞主義

第三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亞細亞主義

第四節 全亞細亞協會與全亞細亞民族會議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亞細亞主義與 1920 年代之臺灣社會

第一節 日治初期臺、日人之亞細亞主義

第二節 1920 年代在臺日人之亞細亞主義觀

第三節 1920 年代臺灣人之亞細亞主義觀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與日、臺人之思考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國內之大亞細亞主義潮流

第二節 1930 年代臺灣報刊界之構成

第三節 大亞細亞主義與在臺日人輿論

第四節 大亞細亞主義與臺灣人之反應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南進：以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

第一節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之背景

第二節 閩變前後臺灣軍、臺灣總督府、臺灣人之活動

第三節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與其成員之活動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內臺融和」：右翼團體與臺灣人之行動

第一節 民族問題與在臺日人右翼團體之興起

第二節 東亞共榮協會與臺灣人之日臺融和理想

第三節 謝龍闊與大同促進會「灰色」之道

第四節 小結

第七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戰爭時期之臺灣

第一節 中日戰爭爆發與總督府之因應

第二節 戰爭時期大亞細亞主義宣傳與動員

第三節 戰爭下之眾生相

第四節 小結

第八章 結論

六、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八章，除結論外，各章大綱如下。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相關研究回顧，以及主要運用的史料、章節架構、安排等。

第二章「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國內之浮現與發展」為背景說明，主要探討早期亞細亞主義的發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亞細亞主義興起後，日本國內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1924 年，全亞細亞協會在東京成立，並於 1926、1927 年邀集亞洲各地人士召開全亞細亞民族會議，試圖以行動實現亞細亞主義。儘管亞細亞主義的影響已不限於日本國內，亞洲各地的反響、認識卻不一致，全亞細亞民族會議也無疾而終。

第三章「亞細亞主義與 1920 年代之臺灣社會」，先以殖民統治開始時，臺、日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說明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有著深遠的關係。接著探討 1920 年代亞細亞主義議論興起時，在臺日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三群體因背景、看法、理想各異，反應也不盡相同。

第四章「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與日、臺人之思考」，主要討論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強調以日本為盟主、率領亞洲與西方進行對抗的大亞細亞主義成為日本國內的主流思潮，甚至是官方政策所採取的意識形態時，日本國內的大亞細亞主義者如何回顧日本自身的殖民統治，以及在臺日、臺人的看法。有關臺灣的情形，本文將先究明 1930 年代臺灣報刊界的構成，再透過這些報刊，觀察在臺日人、臺灣人的反應。

第五章「大亞細亞主義與南進：以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聚焦在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外層面，亦即「南進」的行動。松井石根於 1933 年來臺擔任臺灣軍司令官後，臺灣軍部希望以臺灣為基地展開南進，因而於 1934 年成立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1935 年後改稱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然而，軍部、總督府、臺灣人對「南進」卻有不同想法，本章即以閭閻變前後三者的行動說明其想法差異，再討論這些差異如何影響協會的運作及「南進」的實現。

第六章「大亞細亞主義與『內臺融和』：右翼團體與臺灣人之行動」，聚焦在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層面，亦即「內臺融和」的行動。1930 年代，日人右翼團體逐漸形成，倡導實踐「皇道政治」，背後支持者為臺灣軍部；另一方面，臺灣人則組織東亞共榮協會應付右翼日人，直到 1936 年「祖國事件」後，面對右翼日人的攻擊而消滅。除了右翼團體與東亞共榮協會外，本章最後將討論大同促進會如何透過贊同右翼日人、大亞細亞主義，協助臺灣人至海外發展，而提供臺灣人另類的道路。

第七章「大亞細亞主義與戰爭時期之臺灣」，討論中日戰爭爆發後，官方如何化用 1930 年代盛行的大亞細亞主義說法以實行宣傳、動員，並利用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展開南進準備。接著，討論戰爭演變下，宣傳、動員的內容及南進組織之變化，以及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意義為何。最後討論在該時局下在臺右翼日人如何被總督府納入控制，以及臺灣人如何反應，除透過各報刊中臺灣人的發言外，亦利用其他活動、著作、日記等，考察其想法和行動。

第二章

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國內之浮現與發展

近代日本亞細亞主義的起源可追溯自江戶時期的世界觀，當時，日本國內已認識到東、西洋文化上的差異。其後，明治時期始出現具政治意義、鼓吹實現國際合作的亞細亞主義，更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躋身日本及臺灣的主流言論界。本章將先梳理亞細亞主義於九一八事變前在日本國內的發展，以作為後續各章之背景。

第一節 亞細亞主義之起源

一、亞細亞主義之背景

自 17 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地理知識傳入日本，日本人開始了解日本屬於「亞洲」之地域概念中。以此知識為基礎，產生日本與亞洲，尤其是中國、朝鮮等東亞各國具共通性，而與其他國家有別的認識。例如西川如見（1648-1724）的《增補華夷通商考》（1708）將世界各國分為「中華、外國、外夷」三種，其中，外國是「雖在唐土之外，但從中華之命、用中華之文字、三教通達」，外夷是「與唐土之差異，為其皆是橫文字」；¹又如新井白石（1657-1725）的《西洋紀聞》（1715），則認為「若彼方（即西洋）所學，僅精於形與器。所謂只知道形而下之事物，形而上之事物至今未聞」。²

然而，文化上的類似並不必然使時人呼籲政治上的團結。18 世紀後半以降，面對西方列強的到來，日本國內出現各種重視國防的議論，其中不乏與俄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結盟以共同壓制亞洲的構想。就算提倡與中國（清朝）結盟，仍僅基於現實因素，例如地理相鄰或軍事考量，而非彼此的文化共通性。³須至明治維新後，日本與朝鮮、中國等亞洲各國開始產生對立，為化解彼此對立並超越各自利害以共同抵抗西方侵略，「亞細亞主義」——此一倡導因亞洲諸國相對西方

¹ 西川如見，《增補華夷通商考》卷三（洛陽：甘節堂，1708），頁 1；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 580-581。其中三教應指儒、佛、道三教。

²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頁 36。

³ 例如佐藤信淵（1769-1850）的《存華挫狄論》，雖然鼓吹日中提携對抗英國，但其亞洲認識係基於日本中心的傳統華夷秩序觀，因而仍將滿清視為夷狄。該書多數篇幅其實也不在倡導日中提携，而在說明新兵器、戰法，以及鴉片戰爭在軍事上的教訓。見佐藤堅司，〈《存華挫狄論》解題〉及佐藤信淵，《存華挫狄論》，收入日本武學研究所，《佐藤信淵武學集》上（東京：岩波書店，1942），頁 427-516。

「他者」具某種共通性，而應互相合作的思想、運動，才真正出現。⁴

二、亞細亞主義之出現

曾根俊虎（1847-1910）主導的興亞會⁵是一般公認最早的亞細亞主義團體。曾根為藩士出身，1872 年被任命為海軍少尉，曾多次被派遣至清朝收集情報，此一經歷使他有感於「方今亞洲之中得以獨立者，僅有日清兩國而已。更何況（兩國）同文同種、唇齒之誼，不正應視為一家嗎？而我兩國，因向來不重主權，而受歐美凌辱，故尤當協力恢復。為何不忍一家庭內的小嫌隙而亂大謀呢？」遂有志於亞細亞主義活動。⁶當時另一個重要的亞細亞主義團體，是受西鄉隆盛的尊皇思想及對西化的批評感召，而由福岡藩士平岡浩太郎（1851-1906）、頭山滿（1855-1944）等人創立的玄洋社。⁷相較於興亞會主要從事情報收集和交流，玄洋社則採取援助金玉均（1851-1894），甚至計畫組織義勇軍等方式，直接介入朝鮮獨立運動；⁸然而，此一思想實際上卻與文明開化的潮流相左，福澤諭吉（1835-1901）於 1885 年所寫的〈脫亞論〉除強調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外，也批評當時的亞細亞主義活動，認為「我國沒有時間等待鄰國開明以共興亞洲，毋寧應脫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同進退」。⁹

1890 年代後政治局勢的演變，依舊未給予亞細亞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中國內部於甲午戰爭後興起各種政治改革運動，部分日本亞細亞主義者亦予以支持：宮崎滔天（1871-1922）從自由民權的角度出發，希望透過中國革命帶動全亞洲的革命，進而驅逐歐美勢力，達成世界各國的平等；¹⁰近衛篤磨（1863-1904）則基於黃白人種競爭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分割代表黃色人種的敗亡，而日本亦無法置身事外。因此日本人不應因戰勝而欺侮中國，反而應與中國親善，推動中國改革並保全中國。¹¹然而，在日本仍須與英國維持良好關係，以對抗俄國南進的政治現實下，這些說法未被普遍接受。近衛的看法不但受國內外批評，其友人亦來信希望身為五攝家之首、第一流貴族的他能更注意言行，以免使日本受歐美各國猜疑。¹²1898 年眾議院議員久保田與四郎（1863-1919）的演講更可體現此一現

⁴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頁 581-587；黑木彬文，〈興亜会のアジア主義〉，《法政研究》71：4（2005 年 3 月），頁 618-619。

⁵ 1880 年成立。其前身為振亞社（1877 年成立），其後身為亞細亞協會（1883 年改名）。

⁶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第一章 曾根俊虎と振亜社〉，《東亜》，411（2001 年 9 月），頁 88-98。

⁷ 與其相關的組織，有內田良平於 1901 年創立的黑龍會。

⁸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頁 99-102；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頁 84-85。

⁹ 竹内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頁 37-41。

¹⁰ 關於宮崎滔天的思想，可以參見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頁 43-76；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東京：亞紀，1997），頁 47-84。

¹¹ 近衛篤磨，〈同人種同盟 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4：1（1898 年 1 月 1 日），頁 1-3。

¹²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会，〈近衛篤磨日記〉第二卷（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1898 年 4 月 12 日，頁 47-51。關於近衛篤磨當時的亞細亞主義思想及活動，見山本茂樹，〈近衛篤磨—

實壓力。他雖然一方面提倡「東亞門羅主義」、「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期待亞洲獲得獨立、不受歐洲干涉；一方面卻強調英日兩國國情、利害一致，也都真心希望弱國發展，因此英國必定會協助日本對抗俄國侵略，維護東亞和平。¹³

此一情形至日俄戰爭（1904-1905）後亦無改變。戰爭期間，印度報紙已有社論認為日本係為了一掃歐洲勢力，使亞洲脫離歐洲羈絆，而向俄國宣戰。¹⁴戰後反響同樣遍及亞洲各國。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在得知澳洲將因此改善對日本人的待遇時，表示「這可能對印度人也有利。日本勝利的根，已經散佈到我們無法想像其將結出何種果實的程度。東方之民（the people of the East）似乎正從昏睡中清醒。」¹⁵ 根據孫文（1866-1925）回憶，蘇伊士運河的當地人曾告訴他：「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¹⁶可見日本勝利對亞洲各國的影響遠至印度、埃及。西方輿論則紛紛推測日本將實行亞洲門羅主義，動搖歐美各國在亞洲的地位，¹⁷甚至結合亞洲各國形成威脅歐洲文明的「黃禍」。

為維持與歐洲各國的感情，日本政府只得派遣特使並動員在外日本人進行反駁，否定日本與西方各國對抗的可能性。¹⁸國內報紙同樣予以駁斥，《朝日新聞》社論認為，雖然日本的宗教、道德、風俗、人種不免與列國不同，但彼此文明的「混化融合，只要其中一方不拒斥之，就必然不是不可能，毋寧說具有可自然混化融合的性質」。¹⁹甚至因美國加州的排日運動，而於1913年鼓吹打破「白閥」的德富蘇峰，仍然得表示「雖然很可惜，但吾人並無以亞洲的代表者之姿，與白哲人種作抗衡的野心」。²⁰

その明治国家観とアジア観》（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1），頁91-123。

¹³ 久保田與四郎，《東洋之危機 附對外國是》（東京：富山房，1898），頁29-32、146-169、185-198。Weber認為久保田異於時局贊成亞細亞主義，但筆者以為久保田的想法不但反映時局，也與日本主流意見有相似處，見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p.75-78.

¹⁴ 〈印度新聞の白露戦争観〉，《朝日新聞》（東京），1904年6月5日，第7版。

¹⁵ Gandhi, "Australia and Japan (*Indian Opinion*, 28-10-1905)",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Electronic Book)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vol.4, pp.470-471. 關於日俄戰爭前後甘地對日本的想法，詳見長崎暢子，〈「アジア主義」とインド——ガンディーは日本をどう見たか〉，收入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頁384-408。

¹⁶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收於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三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535-542。

¹⁷ 〈亞細亞的モンロー主義（一佛國文豪の説）〉，《讀賣新聞》，1905年1月14日，第2版。

¹⁸ 廣部泉，《人種戦争という寓話：黄禍論とアジア主義》（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頁31-45。

¹⁹ 〈日本の文明〉（社説），《朝日新聞》（東京），1904年7月8日，第2版。

²⁰ 德富猪一郎，《時務一家言》（東京：民友社，1913），頁473；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收入氏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緑蔭書房，1996），頁55-56，不過該文章引用出處頁數似有誤。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亞細亞主義

一、小寺謙吉（1877-1949）之《大亞細亞主義論》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亞細亞主義始得進入主流言論界。隨著列強相繼捲入歐洲戰事，無暇關注亞洲事務，日本的顧忌減少，政界、民間人士普遍認為日本是「東洋和平的擔當者」，鼓吹採取更積極的對中政策。1914 年 11 月日軍攻下青島，隔月《讀賣新聞》社論引用《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的評論，接著稱其說法「正是吾人所欲言者」：

無論如何，青島陷落即是向天下宣布日本的門羅主義將在亞洲實施，今後若有國家欲分隔中國、獲得領土，日本將出聲疾呼「不可出手」。¹

透過小寺謙吉（1877-1949）的兩本著作，便能大致理解亞細亞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過程。小寺為神戶人，曾留學美國、歐洲研究法學、政治學近 10 年，1907 年回國，隔年當選眾議院議員，時人評價為具優越學識才能的政治家。²其學識背景使他對歐洲事務有著犀利見解，而他在 1915 年出版的《歐洲大亂之真因與交戰列國》也因此深獲好評，自發行後短短五天內便獲三刷。³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攸關民族發展利益與發展的人種戰爭，一方為條頓、土耳其人，另一方則為斯拉夫、拉丁、盎格魯撒克遜及日本人。在此，他雖未將日本人與中國人視為同一人種，甚至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的，但其提出的對中國政策已具亞細亞主義色彩：「萬一歐美列強欲破壞中國現狀以獲得領土，其結果將令我國在領土保全上感到極大的利害，是以我國無論如何都須維持中國秩序，以期中國民族政治上的健全發展。」為達成此一目的，日本須擴張海軍以對抗德國的捲土重來及美國在亞洲勢力的增加，同時也要有強大的陸軍以確實保全中國領土。⁴

隨著戰爭持續進行，小寺逐漸對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以及國際法、國際道德的存在感到懷疑，進而相信劇烈的國際競爭必然會發生，於是他在隔年出版的《大亞細亞主義論》中更發展了前書的看法。⁵相較前書的對中政策主要著眼於日本本國利益，該書則將其與東西人種間的衝突連結，明確指出「同色同種」之日中兩國擁有共同的文字、生活方式、綱紀倫常觀等，可「稱作是一民族的雙胞胎」。因此，日本有維護遠東和平及中國獨立的特殊義務，以及優先其他強國指導、建

¹ 〈日本は誰何すべし〉，《讀賣新聞》，1914 年 12 月 5 日，第 1 版。

² 田住豐四郎編，《兵庫縣代議士候補者人物評》（神戸：県友社，1912），頁 35-46；白面人，《働き盛りの男》（東京：やまと新聞出版部，1925），頁 277-280。

³ 〈広告〉，《朝日新聞》（東京），1915 年 3 月 4 日，第 1 版；小寺謙吉，《歐洲大亂の真因と交戰列國》（東京：大正書院，1915），版權頁。

⁴ 小寺謙吉，《歐洲大亂の真因と交戰列國》，頁 320、312-317。

⁵ 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東京：東京宝文館，1916），頁 14-75。

設中國的地位。⁶他更認為，除黃色人種外，其他有色人種皆已被白色人種征服，因此未來人種競爭必定是黃白人種的競爭，而只有透過黃色人種中惟二獨立之日本、中國互相提攜、截長補短，由日本指導改造中國，才能為全亞洲及有色人種抗衡白色人種的壓迫。⁷最終，「大亞細亞主義」不但能防止同一人種內部的鬥爭，更能達成人種間的均勢、防止異人種間的戰爭，實現世界和平。⁸

《大亞細亞主義論》不但是第一部詳細說明亞細亞主義的源流、內涵，以及具體政策的專書，其說法更呼應當時輿論倡導的對中積極政策，遂得於發行一個月後即獲再版。⁹自該書出版後，「亞細亞主義」一詞也廣泛地被輿論和學界使用。根據 Sven Saaler 的研究，「亞細亞主義」的概念雖然於明治時期即已存在，論者卻幾乎未以「亞細亞主義」稱呼，就連亞細亞主義者也曾未曾使用。該書出版後不久，亞細亞主義團體黑龍會，開始以「大亞細亞主義」解釋其理想；政論雜誌《東方時論》，自 1917 年 7 月後刊登了中野正剛（1886-1943）、滿川龜太郎（1888-1936）等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同年年底，綜合雜誌《太陽》中，由評論家內田魯庵（1868-1929）所寫的文章中，也出現了「亞細亞主義」一詞。其他如永井柳太郎（1881-1944）、長島隆二（1878-1940）等人的文章中，則呈現出了與小寺類似的人種對抗觀。¹⁰除了日本國內以外，《大亞細亞主義論》於 1918 年被譯成中文，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負責寄售。¹¹李大釗（1889-1927）撰〈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1919 年），攻擊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時，亦將小寺謙吉與德富蘇峰、大谷光瑞等人並列為提倡者。¹²另外，在臺灣，《臺灣時報》於 1917 年 2 月刊登〈評大亞細亞主義〉一文，其中雖未提及小寺，內容卻幾乎改寫自《大亞細亞主義論》書序。¹³該書的影響，可見一斑。

二、石井・藍辛協定（1917）與「東洋門羅主義」的流行

政府官員的發言也在無意間刺激著輿論。1917 年 4 月美國參戰後，日本政府於 5 月決定任命前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1866-1945）為特命全權大使前往美國，除了協調軍事合作外，也希望討論中國問題。面對戰時日本在中國勢力的增強，美國有意重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對之，1916 年新成立的寺內正毅（1852-1919）內閣，相較於前任大隈重信（1838-1922）內閣曾提出 21 條要求等

⁶ 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頁 226-246。

⁷ 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頁 255-258、457-475。

⁸ 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頁 258。

⁹ 〈廣告〉，《朝日新聞》（東京），1916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

¹⁰ Sven Saaler,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overcoming the nation, creating a region, forging an empire", in Sven Saaler and J. Victor Koschmann eds.,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7, 9-10.; Sven Saale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Koderu Kenkichi and His 'Treatise on Greater Asianism' (1916)," *Modern Asian Studies*, 41:6 (Nov., 2007), pp. 1261-1294. 另外，有關「亞細亞主義」一詞流行前的其他稱呼，如中島氣崢的「大帝國主義」便是一例，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一小節。

¹¹ 小寺謙吉，《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東京：百城書舍，1918）

¹² 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收入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269-271。

¹³ 〈大亞細亞主義を評す〉，《臺灣時報》，1917 年 2 月，頁 1。

無視列強的強硬政策，轉而希望緩和美國態度，並在對美協調的前提上，維護中國東北（滿洲）、福建、山東等地的特殊權益。

石井於 9 月與美國國務卿藍辛（Robert Lansing，1864-1928）正式展開第一次會談，席上石井表示門羅主義能適用在亞洲，但遭藍辛否定。會談結束後，石井受邀前往紐約發表演說，再次表示門羅主義存在於東亞，強調為了自衛，日本必須確保中國獨立，防止他國侵犯中國主權。根據石井往後的回顧，此番發言之用意，乃是趁歡迎氛圍尚熱絡時，使美國承認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不料未得美國政府、輿論界的贊同。¹⁴另一方面，日本輿論界則予以歡迎。石井抵美不久，還對「東洋門羅主義」的流行感到未置可否的《朝日新聞》社論，¹⁵隨著美國的報導，將其渲染成「遠東門羅主義的宣言」。當石井為避免負面輿論發酵，請求訂正報導後，《朝日新聞》依舊表示「石井特使有關中國的宣言，正是純粹的門羅主義」。甚至認為日本除保全中國外，也必須干涉中國內政以實現中國的善政，因此能進一步稱之為「積極的門羅主義」。¹⁶

儘管藍辛對石井的發言感到不滿，面對現實上的戰爭需求及日美在東亞勢力的差距，最終決定對日本的要求部分讓步。¹⁷11 月，日美兩國正式締結協定，其內容一方面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及日本政府承認領土相近國家之間將產生特殊關係。因此，美國政府承認日本於中國擁有特殊利益。與日本領土接壤之地尤然。

另一方面，也重申了中國主權的完整性，以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反對任何一國獲得與上述原則相左的「特殊權利或特權」。整體上，協定的實質意義曖昧不明，接近於各說各話，儘管承認了日本的「特殊利益」，但並未予以定義，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關係亦不清楚。1919 年，藍辛接受美國參議院質詢時，也表示「特殊利益」完全不具有政治的意義。儘管如此，此協定仍被輿論界視為是美國已承認日本的東洋門羅主義。¹⁸要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國內流行起亞細亞主義的說法，認為日本基於地理或人種，對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擁有特殊關係，因此有必要保全中國領土，避免外國入侵。

¹⁴ 有關談判過程與石井、藍辛的想法，詳見渡邊公太，〈石井菊次郎と日本の戦中外交 1914 年-1919 年〉（神戸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4），頁 150-179。

¹⁵ 〈華盛頓の石井子（矛盾せる我政策）〉，《朝日新聞》（東京），1917 年 8 月 23 日，第 1 版。

¹⁶ 〈石井特使の演説（積極的モンロー主義）〉，《朝日新聞》（東京），1917 年 10 月 9 日，第 3 版。

¹⁷ 渡邊公太，〈石井菊次郎と日本の戦中外交 1914 年-1919 年〉，頁 170-171。

¹⁸ 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頁 71-77。

第三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亞細亞主義

一、排日問題與亞細亞主義議論之延續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由日本實現亞細亞主義，帶領亞洲各國對抗西方，在大多數人眼中仍是無稽之談，就算是敵視白人的德富蘇峰對之也不抱希望，如近衛等提倡人種同盟的說法更受到各方批評。然而，大戰的爆發卻讓強調同文化、同人種同盟的亞細亞主義得以成為輿論討論的主題，之後亦未隨戰爭結束而消聲匿跡，反而屢次因不同事件而引起討論，首先即是 1919 年巴黎和會中種族歧視廢止案的提出。為一次解決數十年間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的排日問題，也為避免日本未來在國際聯盟中，因種族問題遭到歐美孤立，日本政府於 1918 年 12 月即決定應致力於去除種族歧視問題。¹⁹

與政府舉動相呼應，1919 年 2 月 5 日民間舉辦種族歧視廢止期成同盟大會，共有 37 個團體和各界人士參與，其中包括頭山滿、滿川龜太郎、大川周明（1886-1957）等亞細亞主義者。演講中也不乏亞細亞團結的說法，如田鍋安之助（1863-?）便指出此舉必然會得到四億中國人、三億印度人的迴響。²⁰更具體號召實現亞細亞主義的是在第二、第三回大會演說的法國人保羅·理查（Paul Richard，1874-1967），理查為法國文學博士，1916 年為推廣貿易而至日本，後受大川周明影響而鼓吹日本應自西方殖民地帝國手中解放亞洲各國。²¹他在演講中認為精神文明未來必然會從亞洲誕生，因而冀望亞細亞聯盟的成立，強調「亞洲是上天給予日本的舞台」，日本人應為了全人類的聯盟而先實現亞細亞聯盟。²²種族歧視廢止案遭到否決時，又更加強了日本政治家的亞細亞主義傾向，認為該案失敗之因，在於日本政府只致力於取得與英美兩國的默契、討兩國的歡心，「若能先圖與中國、暹羅等國精神上的提攜，便能真正代表亞洲的輿論」，而日本也可堂堂正正地在會議中發言，英美也未必能任意拒絕該提案。²³

之後，1920 年代對日本社會造成重大衝擊，使亞細亞主義議論再次活躍的是美國 1924 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24）的制定。由於該法案實際上主要針對日本移民，而在日本國內普遍被稱為「排日移民法」，但因其在法律上明文上禁止所有亞洲出身的「不可歸化外國人」移民美國，於是當法案於 1924 年 4 月 15 日獲美國參議院通過後，遂被《朝日新聞》社論批評為「敵視十億黃色

¹⁹ 池井優，〈パリ平和會議と人種差別撤廃問題〉，《國際政治》23（1963 年 10 月），頁 44-58；鳥海靖，〈パリ講和會議における日本の立場：人種差別撤廃問題を中心に〉，《法政史學》46（1994 年 3 月），頁 1-18。

²⁰ 〈人種差別撤廃大会 宣言決議を講和會議議長に電致〉，《朝日新聞》（東京），1919 年 2 月 6 日，第 4 版。

²¹ 吉永進一，〈大川周明、ポール・リシャール、ミラ・リシャール--ある邂逅〉，《舞鶴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43（2008 年 3 月），頁 93-102。

²² 〈人種差別撤廃大会 昨日の上野精養軒〉，《朝日新聞》（東京），1919 年 3 月 24 日，第 2 版。〈人種差別撤廃大会 リシャール博士演説 大隈侯演説の代読〉，《朝日新聞》（東京），1919 年 4 月 25 日，第 3 版。

²³ 大津淳一郎，〈世界変局と帝国の外交〉（東京：大津淳一郎，1919），頁 77-78。

人」助長人種鬥爭的愚策。²⁴《朝日新聞》社論進一步指出，美國對移民的排斥，並不僅是日本人的問題，更是全亞洲人的問題。美國此舉不只會打擊中國人對美國的信用，還會使中國人的「人種意識」覺醒，因此中國人將逐漸放棄排日行為，中日關係也將更加密切，該社論最後期待「日中人民能一掃過去誤解，走上新的提攜之道」，同時也希望日本當局能致力於去除過去使兩國相爭的原因。²⁵ 有關亞細亞主義的討論也出現在雜誌上，包括《太陽》、《改造》等雜誌都刊登了相關文章，《日本及日本人》更在 10 月發行亞細亞主義特輯號，收錄 50 篇相關論文。這些文章的看法，除要求提訴於國際聯盟、形成國際輿論外，也有主張日本應與中國、印度相提攜，「形成亞細亞聯盟，以東洋文化對抗西洋」，甚至是要求「白色人種應退出亞洲」。²⁶

二、亞細亞主義之傳播：以中國之孫文為例

如《朝日新聞》所預測，移民法通過的衝擊不只限於日本，也擴散到了亞洲其他國家，這裡以中國的孫文為例說明。近代中國對日本亞細亞主義的回應並不積極，一方面因日本對華政策未創造相應條件，使兩國間始終存在著對立，另一方面則可能因長年的「華夷秩序」觀，使中國人自認為世界中心，對東洋（亞洲）、西洋皆以夷視之。在中國，論及亞細亞主義的重要人物有二，分別是李大釗及孫中山。其中，李大釗明確地否定了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攻擊小寺等人欲以亞細亞主義之名，行侵略中國之實，於是呼籲亞洲弱小民族聯合實行「新亞細亞主義」，破壞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之後再加入世界性的組織。²⁷

相較於李大釗對亞細亞主義抱持否定態度，孫文則試圖運用亞細亞主義與日本人對話。在移民法通過後不久，孫文便認為「此在日本毋寧視為最良之教訓，須為黃種人而覺醒之絕好機會」，他也希望日本此刻能「忍受此辱，退而靜謀亞細亞民族之大結合，俟黃色人種之團結完成，然後講求對於此次屈辱之方策」。²⁸ 1924 年下半年孫氏數次發表相關言論，包括於 8 月以國民黨全黨名義通過的〈中國國民黨忠告日本國民宣言〉（下稱〈宣言〉），²⁹以及於 11 月在日本演講的〈大亞洲主義〉等等。³⁰ 孫氏的亞細亞主義，大致可從兩種層面考察。首先，不可否認的是，孫氏主張中仍有不少是從人種、文化的角度出發，就此一層面而言，並未與日本人的看法相左。在〈宣言〉中，孫氏強調中日兩國的「同種同文」；在〈大亞洲主義〉裡，孫氏除說明西方「霸道」文化與亞洲「王道」文化的不同外，也舉了有色人種聯絡對抗白人的說法作為例子。孫氏於 10 月致李烈鈞（1882-

²⁴ 〈人種軋轢助長の愚策〉，《朝日新聞》（東京），1924 年 4 月 18 日，第 3 版。

²⁵ 〈日米問題と支那〉，《朝日新聞》（東京），1924 年 4 月 25 日，第 3 版。

²⁶ 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頁 91-97。

²⁷ 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17-19。

²⁸ 〈日本應忍受恥辱先謀亞細亞民族之大結合〉（1924 年 4 月 30 日），收於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 608-609。

²⁹ 〈中國國民黨忠告日本國民宣言〉，收於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二冊，頁 155-156。

³⁰ 〈大亞洲主義〉，頁 535-542。

1946) 的電報中，也不諱言他係「為發起亞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種之侵略」而將李烈鈞派駐日本。³¹

然而，若進一步考察，〈宣言〉的用意是在要求日本開放同種同文的華工入境，不要「恃一日之長，以凌轢同種，豆箕相煎」；〈大亞洲主義〉則是希望日本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鷹犬」，用武力壓迫其他國家。他對俄國的描述，強調其主張王道、仁義道德，「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更顯示出孫文之人種、文化對立的觀點不是只基於本質上不可改變的差異，反而亦與個別民族的實際行動有關。

該說法的出現背景，乃是辛亥革命後日本政府並未積極支持孫氏的南方政權，反而支持袁世凱（1859-1916）、段祺瑞（1865-1936）等的北方政權，1919 年巴黎和會上又要求山東權益，引起中國民眾不滿。為此，孫文開始批評日本的對中國政策，指責其扶植中國守舊勢力，對東亞行侵略政策。1923 年，孫文與越飛在上海發布宣言，正式展開「聯俄容共」政策。於是，在孫文眼中，現實上願意支持中國革命，協助中國捍衛主權者，並非日本，而是蘇聯。儘管他「比起與俄羅斯同盟，更希望以日本為盟主，圖東洋民族之復興」，但他亦認識到「中國應依賴的國家不是日本，而是俄羅斯」。³²

基於此一觀點，孫氏的亞細亞主義便不再限於號召同人種同盟，而是要為「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的「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正因如此，儘管孫氏在亞細亞主義的出發點上與日本看法類似，到了實踐層面時便有所不同，當《朝日新聞》期待中國人放棄排日運動時，孫氏反而要求日本改變對中國的政策，還認為日本應「以承認俄國」為實現亞細亞主義的第一步。³³此一例子，正顯示出不同地區的人們，為了達成自身目的，對亞細亞主義有時也會有不同的看法，雖然這些差異並未在孫氏演講當場引起騷動，³⁴但當各國代表共同出席「全亞細亞協會」在 1926、1927 年主辦的全亞細亞民族會議時，就發生了正面衝突。³⁵

³¹ 〈致李烈鈞囑仍留日本為發起亞洲大同盟宣傳電〉，收於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五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 544。

³² 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頁 16-22。

³³ 〈亞細亞民族之結合與不平等條約之排除〉，《國父全集》第二冊，641-642。

³⁴ 據當時兵庫縣當局的觀察，孫文的演講使聽眾相當感動，以至於對演講每句話都給予拍手。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頁 201。

³⁵ 歷來關於孫文的亞細亞主義思想或〈大亞洲主義〉演講的研究甚多，茲舉兩筆近期研究：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頁 108-117、145-177，除對說明孫文的亞細亞主義人種觀外，也敘述了日本當時因移民法所造成的熱潮；劉維開，〈孫中山北上與講演「大亞洲主義」的考察〉，收入《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 歲誕辰》（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頁 87-111，對孫文自廣州北上上海的背景、過程及相關發言，以及此與隨後赴日演講的關聯，有詳細的考察。

第四節 全亞細亞協會與全亞細亞民族會議

一、全亞細亞協會之建立與民族會議

1921 年成立的「大亞細亞協會」，可能是第一個因戰後亞細亞主義潮流而出現的組織。「大亞細亞協會」的主要成員，包括眾議院議員小林勝民(1862-1943)、哲學博士鹿子木員信(1884-1949)、鮑斯(Rash Behari Bose, 1886-1945)，另外還有從事圖蘭民族運動(Turanism)的匈牙利民族學者 Barathosi(Barathosi Balogh Benedek, 1870-1945)及匈牙利語學者今岡十一郎(1888-1973)。不過，此一組織的詳細成員、活動並不清楚。根據報導，1922 年 Barathosi 等人另組了一個不具政治性，純文化性質的「亞細亞文化協會」，推測「大亞細亞協會」可能因政治性較強而未能順利發展。¹ 真正公開展開政治運動，試圖凝聚全體亞洲人的團體，是成立於 1924 年的「全亞細亞協會」。

1924 年 7 月，正處於排日移民法激起的熱潮未退時，全亞細亞協會在東京成立，協會幹部包括評議員、相談役、理事等共有 84 人，橫跨政、商、報業、學術、軍事各界，其中貴族院、眾議院議員就分別有 17、23 人，其他重要人士還有曾任大臣的田中義一(1864-1929)、後藤新平(1857-1929)等人。² 全亞細亞協會的成立，代表著亞細亞主義不再只是少數人倡導的理念，而是已廣泛地被各界人士議論，亦獲部分重要政治人物支持。全亞細亞協會的設立宗旨，以「凡在地上生存之所有人種一律立於平等之位置」為始，並指出人種歧視將造成人種間的動亂，其宗旨有二：

一為曾於數千年前業已具有崇高文明而成為近代文化之淵源之亞細亞人種之子孫、現代亞細亞人之覺醒；

二為一致團結，養成實力，將將來之人種的禍亂防遏於未然，更圖謀東西兩洋文明之融洽，努力世界的新文明之建設，以期貢獻全球人類之安寧福祉。³

儘管此宗旨並不否認世界和平及東西文明、人種融合的可能性，但已明確指出亞洲民族必須團結一致，才能養成亞洲的實力，使亞洲覺醒。為了進一步實現此宗旨，全亞細亞協會分別在長崎(1926 年 8 月)、上海(1927 年 11 月)召開兩次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長崎會議舉辦前，協會專務理事、也是會議主要的籌備者今里準太郎(1886-1976)在會誌《アジア》上表示，此次會議主旨是「以推進全人類共存共榮的大理想為前提，先達成全亞細亞民族的共榮共存」，而：

¹ シナン・レヴェント，〈トゥーラン主義運動家としての今岡十一郎〉，《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49(2014)，頁 98-93。

² 〈全亞細亞協會設立之宗旨〉，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I-4-6-0-1_1_001，JACAR Ref.B04013200400。

³ 〈全亞細亞協會設立之宗旨〉，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1，JACAR Ref.B04013200400。

探討欲完成全亞細亞民族的共榮共存，需講求何種手段，即是民族會議的目的。其第一在全亞細亞民族的融合聯盟；其第二在開發包藏於全亞細亞的資源，以期全亞細亞民族經濟上的融合向上；第三則在於復興擁有四千年古老歷史的亞細亞文明。⁴

觀察民族會議的宗旨與目的，可以看出會議明顯受戰後國際聯盟的成立刺激，而提及將成立一個實現全亞洲共榮的機關。對今里而言，國際聯盟的目的不過是「不得訴諸戰爭的國際和平」，其功能僅是從結果上防止戰爭而已。相較之下，協會欲建立的「亞細亞聯盟」，則是要透過促進各民族的融合、經濟的提升，從根本上防止國際紛爭。⁵為實現此項目的，協會也預計邀請日本、中國、印度、安南、菲律賓等各國代表出席討論各項事務。⁶有了國際聯盟作為基準，遂使此時亞細亞主義活動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情形更為具體。

至於會議的第三個目的：「復興亞細亞文明」，雖然看似與避免國際紛爭沒有直接關聯，但對參與者而言同樣是世界和平的關鍵。之後擔任會議的土耳其民族代表 Kurbangaliev (Muhammed-Gabdulkhay Kurbangaliev, 1889-1972)⁷在會誌中寫道「回教徒並非在諸文明的同一化中，而是在諸文明的調和裡，見到了人類的幸福。回教徒們認為，世界文明之樹若只靠單一樹幹支持將會十分脆弱，反之，須靠各種分枝、樹葉才會強大。」⁸

然而，在 Kurbangaliev 眼中，此一回教文明卻在一戰後受到了歐洲各國橫暴的打壓。亞洲各地普遍被歐美殖民的現況，使得不少參加者早在會議舉辦前就表現出敵對歐美各國之態度，從明治時期直到全亞細亞協會成立時始終存在的人種意識也再次浮現。儘管今里明確反對過度的敵對態度，以免會議在開始前即遭打壓：「我等為全亞洲繁榮計，也從希望全人類和平的角度來看，正面揭揚著對歐美的憎惡心、反抗心前進，無庸置疑是最愚蠢的策略」。⁹也不能阻止即將與會的人士發表相關言論。其中，以印度代表鮑斯 (Bose) 的看法最為激進，他在文中表示，黃禍論並非荒唐無稽的恐怖論，隨著近代文明的侵蝕，使得有色人種的民族意識、人種意識越來越明確，而為爭取其獨立的個性及意志，將不得不抗爭。接著，在呼籲日本有識之士應尊重中國，並讚揚中國、印度的民族運動之後，他

⁴ 今里準太郎，〈全亞細亞民族會議の使命〉，《アジア》第二號（1926年4月20日），頁4-6，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亜細亜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1，JACAR Ref.B04013200400。

⁵ 今里準太郎，〈全亞細亞民族會議の使命〉，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亜細亜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1，JACAR Ref.B04013200400。

⁶ 〈關機高收第1271號ノ1〉（1926年1月19日）、〈外高秘第9744號〉（1926年7月16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亜細亜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1，JACAR Ref.B04013200400。

⁷ 巴什基爾人，曾於俄國革命時從事巴什基爾民族運動，1920年後旅居日本，與右翼人士多有接觸，1938年後離日前往滿洲。

⁸ クルバンガリイ，〈復興亞細亞に於ける回教徒の意義と日回親善の道〉，《アジア》第二號（1926年4月20日），頁7-11，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亜細亜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1，JACAR Ref.B04013200400。

⁹ 今里準太郎，〈全亞細亞民族會議の使命〉，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亜細亜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1，JACAR Ref.B04013200400。

向白人警告「黃禍」將比其想像更可怕，有色人種將在日常不斷鬥爭的過程中漸漸邁向勝利。¹⁰

鮑斯的敵對態度並非唯一引起西方各國注意的因素，安南的出席者中亦有不少是法國政府眼中的激進分子。在會議舉辦前，駐東京法國大使特別請求駐長崎領事嚴密注意會議動向，也預定派員旁聽，駐神戶總領事也要求應詳細報告相關的新聞記事。¹¹

除了西方各國外，日本政府為避免與西方感情惡化，也緊密監控會議的舉行，甚至加以妨礙。會議召開前夕，阿富汗代表 Pratap (Raja Mahendra Pratap, 1886-1979)¹² 遭日本政府以缺乏簽證為由禁止入境，之後，在要求宣誓不離開入境地的大阪、不參與演講會後才例外放寬。¹³ 日本政府在表面上雖係依法行事，然如法國駐神戶領事觀察，此舉實際上係為「解除列強（對日本）的懷疑」。¹⁴ 基於同樣理由，身為協會成員的田中義一、後藤新平等政治家也在英文報紙上公開表示與會議無關。¹⁵ 會議在地方上也受到阻礙，長崎市不但以會議基礎貧弱為由不願援助，也拒絕出借市議事堂作為會場。今里等人遂改向長崎商業會議所洽借場地，最終亦未得允許。會議所會頭也因懷疑「會議是否真對我國有利」而向協會表示不支持。¹⁶ 最終才敲定於 8 月 1 日至 3 日在基督教青年會館舉辦。¹⁷

二、民族會議上日朝、日中代表之對立

亞洲民族間的齟齬，同樣阻礙著會議的舉辦。其一與朝鮮代表的選任有關。在會議準備期間，今里就強調自己認為「本會不含政治意義」，而「若有屬領或殖民地等弱小民族代表提議脫離強國的羈絆」，他已決定「不要決議並摧毀之」。

¹⁰ ラス・ビハリ・ボース，〈檯頭する亞細亞〉，《アジア》第二號（1926 年 4 月 20 日），頁 12-13，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1，JACAR Ref.B04013200400。

¹¹ 〈外高秘第 9672 號〉（1926 年 7 月 14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1，JACAR Ref.B04013200400。

¹² 印度人，長期於阿富汗從事印度獨立運動。關於其生平，另見中島岳志，〈R・M・プラタープ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反植民地ネットワーク・世界連邦・日本帝國主義-〉，《國際政治》146（2006），頁 54-69。

¹³ 由於 Pratap 拒絕簽署，最終由其保證人南條德男（全亞細亞協會理事）代為宣誓。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顛末》（1926），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分割 3、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I-4-6-0-1_1_002，JACAR Ref.B04013201100、B04013201200；〈プラタプ氏 上陸許可〉，《朝日新聞》（東京），1926 年 8 月 2 日，第 2 版。

¹⁴ 〈兵外發秘第 2249 號〉（1926 年 8 月 13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分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I-4-6-0-1_1_002，JACAR Ref.B04013201000。

¹⁵ 松浦正孝，《「大東亞戰爭」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經濟史》，頁 176。

¹⁶ 〈外高秘第 9744 號〉（1926 年 7 月 29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I-4-6-0-1_1_001，JACAR Ref.B04013200500。

¹⁷ 〈外高秘第 9744 號〉（1926 年 7 月 19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1，JACAR Ref.B04013200400。

至於臺灣、朝鮮代表的處置，則是他最苦惱的問題。¹⁸ 有關臺灣代表，雖然臺人知識分子曾在同年春天與今里接觸並受邀出席，最終仍未派出代表。¹⁹ 至於朝鮮，其輿論在表面上雖然表示反對，實際上朝鮮人記者團體「無名會」的安在鴻（1891-1965，無名會委員長、《朝鮮日報》記者）、宋鎮禹（1890-1945，《東亞日報》顧問）等人卻希望能利用此機會表達「朝鮮民族的不平」，而積極爭取出席。然而，在得知在日朝鮮人已推薦朴春琴（1891-1973）、李東雨（1879-1934）、李起東（1885-1952）等親日派人士為代表後，遂大感憤慨。²⁰ 7月28日，以無名會為首的23組團體，便向協會通電表示會議「不過是為攏絡亞洲被壓迫民族的日本帝國主義野心的產物」，並否定朝鮮代表的正當性。²¹ 7月31日，在日本的朝鮮人勞動團體亦聯名發表一則主旨相似的聲明，指責會議標榜的「正義」、「平等」、「和平」、「共存」都是用來維持統治階級利益的口號。²²

其二源自中國、日本間的衝突。在1915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後，中國輿論便開始懷疑亞洲門羅主義的內涵，²³ 1919年五四運動時也向外國呼籲日本欲藉此「壟斷中國之軍事交通，諸友邦之商務將被其排斥殆盡，不獨喪失我國之獨立資格已也」。²⁴ 當全亞細亞民族會議宣布後，中國國內也一直有反對聲浪，懷疑其真正目的是要協助日本擴張。²⁵ 兩國代表在會議中亦發生爭執。7月31日，會議召開籌備會，席上，中國代表要求承認「廢除日中二十一條條約」的提案，日本代表則以不平等條約問題重大，「不可能論議只有日中兩方的條約」，而建議改成「廢除廣大亞洲民族間的不平等條約」，然中國代表不願讓步。雙方爭執至8月1日，中國代表以集體退出會議作為要脅，要求承認提案；日方更有四名代表實際採取行動，在批評該會議已近乎「賣國」後憤而退出。最終，在印度、菲律賓代表的調停下，日方始讓步，承認「取消中日間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以謀全亞民族真正平等案」，內容並強調只有亞洲民族間先有平等，才能向白色人種爭取平等解放。²⁶

日中兩國代表的衝突解決後，會議於同日下午召開。出席者包含日本、中國（包含安南代表）、朝鮮、印度、菲律賓等國人士逾30名。²⁷ 首先即由各民族代

¹⁸ 〈外高秘第6244號〉（1926年5月12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1，JACAR Ref.B04013200400。

¹⁹ 〈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臺灣民報》，1926年9月5日，頁2。

²⁰ 〈朝保第742號〉（1926年7月27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2，JACAR Ref.B04013200500。

²¹ 〈外秘第1952號〉（1926年7月28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2，JACAR Ref.B04013200500。

²² 〈特秘鮮第9397號〉（1926年8月2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3，JACAR Ref.B04013201100。

²³ 〈日本式之門羅主義〉，《申報》，1915年4月8日，第3版。

²⁴ 〈全國學生聯合會消息〉，《申報》，1919年7月3日，第10版。

²⁵ 周斌，〈亞細亞民族會議與中國的反對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3期，頁128-150。

²⁶ 〈外高秘第9744號〉（1926年8月2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3，JACAR Ref.B04013201100；黃攻素，《亞細亞民族第一次大會始末記》（上海：亞細亞民族大同盟本部，1926），頁48。

²⁷ 各國出席名單如下，日本：今里準太郎（眾議院議員）、西澤四郎（全亞細亞協會囑託）、藤

表致詞，內容大致都圍繞在過去亞洲文明的輝煌，以及當前受到西方壓迫的情況，而只有透過亞洲民族的團結，才能獲得自由、平等，並促進亞洲的繁榮。與會前情形類似，亞洲各代表的發言亦較日本代表為激進。今里的致詞中，只有提到「在壓迫下呻吟著的各民族，其難忍的悲痛叫聲充斥著亞洲全土」；至於兩名致詞的中方代表，一名表示會議的意義在「發揮亞洲文化、啟發亞洲的無盡藏，以對抗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侵入主義」；²⁸另一名則更直接地批評了英國的侵略，甚至號召中日兩國團結以武力對抗西方人，解放弱小民族、復興亞洲。²⁹

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事件，之後，反英情緒瀰漫著中國國內，除呼籲抵制英國貨、要求英國懲兇、賠償或廢除不平等條約外，亦有主張軍事對抗者，³⁰因此中國代表的激進態度並不令人訝異。不過，此類敵視西方的言論雖然在開會之初未受中止，到了實際議事階段時就一一被今里擋下。

會議於第二日開始審議提案，其中獲通過者包括設置通信機關、研究機關等促進亞洲各民族間認識交流的提案，至於設置金融機關、建設亞洲橫斷鐵路等議案，則因中國代表認為易遭國內誤會為侵略，而暫先保留。³¹審議過程中，中國代表雖提出「承認印度獨立」的動議，主張印度獨立是「將白人自東洋驅逐出的最捷徑」，不過在今里指出「若討論此問題大會必將被命令解散」，並建議會後再私下討論後，中國代表也撤回了該提案。³²

會議的另一個插曲，是朝鮮人姜世馨的出現。會議決定的朝鮮代表，最初只有較親日的李東雨一人，然而透過中國代表的介紹，另外加入了姜世馨參與審議提案。相較於李東雨對會議的協調態度，姜世馨的看法更類似先前欲參與會議的安、宋等人。姜氏認為會議是「亞洲公共團體，應請亞洲人為吾爭之」，而希望在會上提出朝鮮獨立案。姜氏最終雖得以與會，卻也因提案過於激烈而被今里禁

原米藏（海運業者）、中戸要輔（全亞細亞協會理事）、田中守平（神戶大靈道主幹）、牧野豐三郎、齊藤朝爾（著述業）、山本巖（名古屋市大同會長）、宮村江東（著述業）、大谷猛（自稱段祺瑞顧問）、田中直治（前長崎縣會議員）、倉成庄八郎（長崎民友新聞）；中國：林可彝（北京平民大學教授）、黃攻素（銀行員）、王世鼎（議員）、劉華瑞（北京東南大學教授）、蔡曉白（亞洲民族協會代表）、蔡障川（北京中華新民通信社長）、石磊（北京法政大學教授）、鄭天錫（安南代表）、林耕餘（上海南方大學附屬中學校監）、方孝寬（上海南方大學事務長）、方懋林（上海遠東大學教授）、沈德（長崎醫科大學生）；朝鮮：李東雨（國民協會總裁）、姜世馨（東京新朝鮮社社長）；印度：鮑斯（歸化印度人）、S.M.ラテナ（會社員）、バンヤン.シン、チャナン.シン、シャムス.シン、V.D.バクシー（歸化印度人）、K.R.サバルワル（歸化印度人）；菲律賓：P.R.ヴェルゾサ（新聞社通信員）。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顛末》，頁13-14。另外，據黃攻素及今里準太郎的說法，朝鮮人姜世馨並非以代表身分與會。

²⁸ 〈外高秘第 9744 號〉（1926 年 8 月 2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3，JACAR Ref.B04013201100。

²⁹ 黃攻素，《亞細亞民族第一次大會始末記》，頁 38-39。

³⁰ 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 63-65。

³¹ 〈外高秘第 9744 號〉（1926 年 8 月 3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3，JACAR Ref.B04013201100；黃攻素，《亞細亞民族第一次大會始末記》，頁 40-41。

³² 〈外高秘第 9744 號〉（1926 年 8 月 3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一卷，分割 3，JACAR Ref.B04013201100。

止上台。³³ 整體而言，會議中雖一度出現刺激性的發言、提案，但在今里的主導下，仍得以在「沒有發生任何不穩事件的狀態下結束」。³⁴

1927 年 11 月，第二次全亞細亞民族會議在上海召開。在兩次會議之間，隨著中國國民黨北伐的進行，1927 年在南京、漢口等地接連爆發了攻擊日本領事館、各國僑民的事件。日本政府在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1872-1951）主導的內政不干涉政策下，始終不願與英美兩國一同採行強硬措施，也因此飽受國內批評。1927 年 4 月，由田中義一主導的新內閣成立，決定改變先前的對中政策，以積極出兵方式保護僑民及日本在滿蒙的權益。³⁵在此背景下，與會代表遂再次發生齟齬。在 11 月 4 日的預備會時，中國代表除提案要求日本放棄不平等條約外，也要求「停止侵略滿蒙」並撤兵，卻受日本代表反對。7 日，會議正式開會，會上雙方同意將「停止侵略滿蒙」改為要求日本改革對滿蒙政策，另外亦通過促進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決議後便於同日閉會。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的活動也就此中止，直到 1934 年才在大連再次舉辦。³⁶

³³ 〈特高第 17002 號〉（1926 年 8 月 9 日），收於《民族問題關係雜件／亞細亞民族問題》第二卷，分割 1。黃攻素，《亞細亞民族第一次大會始末記》，頁 42-44。

³⁴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顛末》，頁 143。

³⁵ 外務省監修、山田実編集，《日本外交百年小史》（東京都：山田書院，1963），89-101。

³⁶ 此次會議過程較不明瞭，本文主要參考周斌，〈亞細亞民族會議與中國的反對運動〉，頁 150-157；松浦正孝，〈「大東亞戰爭」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178；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p.239-241.

第五節 小結

全亞細亞協會的建立，以及隨後舉行的兩次民族會議，呈現了幾項 1920 年代亞細亞主義的特徵。首先，美國移民法的通過與全亞細亞協會的建立，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浮現的亞洲（黃種）、西方（白種）對立觀得到延續。在此觀念下，一反明治維新後對西方文明的重視，日本人開始強調日本、亞洲的同人種關係。而如全亞細亞協會的宗旨所示，亞洲文明已不再被視為落後的象徵，反而是一擁有輝煌過去、能與西方文明相提並論的存在，而唯有透過亞洲人的團結、建設亞洲，才能夠將之復興。此一想法不只存在日本國內而已，更散播到了亞洲各國。兩次民族會議參與者雖然來自不同國家，彼此亦有所對立，但大致都同意亞洲人應團結，以建設亞洲、復興亞洲文化。

其次，若只觀察日本國內的亞細亞主義，可以發現在政府、國際壓力下，其論述仍不完全否定西方文明，亦未具有強烈的軍事對抗色彩。全亞細亞協會的宗旨並不否認東西文明、人種融合的可能性，第一次民族會議上也未通過較刺激性的決議。儘管如此，會議仍未受普遍歡迎，最初參與全亞細亞協會的不少重要政治家，到了準備舉行民族會議時，也都紛紛表態不支持。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亞細亞主義的批評也始終存在於日本國內，就算是《日本及日本人》的亞細亞主義特輯號裡也有刊載反對論。¹ 這些批判意見，大多是從日本所處的政治現實出發，討論亞細亞主義的利弊。曾長期擔任外交官的國際法學者信夫淳平（1871-1962）認為，國際政治係基於現實利益而非人種差異，提倡亞細亞主義只會限縮日本的外交，使日本被世界孤立；² 另一名國際法學者，曾與今里發生論戰的蜷川新（1873-1959），雖然表示支持亞洲人共同復興亞洲文化，但亦否定國際政治中存在人種對立的觀念，至於將白人自亞洲排除的說法，對蜷川而言更是一無法實現的空論，只會使日本被白人敵視、孤立而已。蜷川也指出會議上廢除不平等條約、人種平等的主張，將會直接損害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以及對臺、朝等殖民地的統治；³ 《日本及日本人》的前身《日本人》的創刊者志賀重昂（1863-1927），雖然認識到美國的排日問題是因為人種原因而發生，卻認為亞細亞主義、亞細亞聯盟論是要日本和弱小的「乞丐國」聯盟，而與英美兩大盎格魯·薩克遜國敵對，這種情形簡直可以說是「自殺」。⁴ 上述意見，顯示出 1920 年代日本亞細亞主義的侷限。正如紐約時報的報導所述，「日本的利益，乃是在與英美共同維護太平洋的和平，而非誘發弱小、不滿的民族掀起反白人霸權

¹ 古屋哲夫，〈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頁 94。

² 信夫淳平，《反古草紙》（東京：有斐閣，1929），頁 45-47。

³ 蜷川新，《亜細亜に生きるの途》（東京：日本書院出版部，1929），頁 174-209；關於兩人的論戰，參見 Torsten Weber,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pp.241-247.

⁴ 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志賀重昂全集》第 1 卷（東京：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1928），頁 275-278。

的革命」。⁵也因此當亞細亞主義愈發接近實現時（例如民族會議的舉行），反而越與日本利益牴觸，也越難獲得支持。

政治現實不只讓亞細亞主義在日本的發展受限，更讓亞細亞主義在亞洲各民族眼中具有不同的意義，此即是 1920 年代亞細亞主義的第三項特徵。以會議上的日、中、朝三國為例，三國代表雖然都贊成亞洲民族的團結，若單看日、中兩國代表，雖多少顯示出亞洲為同人種、同文化的認識，不過在實踐上就各自因所處的政治環境而有不同的看法。在日本，排日移民法通過後的熱潮，雖然使全亞細亞獲得不少政界名士的贊同，但在實際舉辦會議時，仍因顧及國際局勢而淡化會議的政治色彩，基於日本利益，日本代表也試圖擱置或忽視中、朝的要求；對中國代表而言，解決當下中日間的不平等條約，反而是亞細亞主義實現的前提，受到國內革命外交的影響，他們也不畏懼採取更直接的方式對抗西方；對於朝鮮代表而言，凝聚亞洲公論、實現亞細亞主義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向西方提出要求，而是要向日本爭取公平待遇。⁶後文將進一步敘述這種多元的亞細亞主義議論，不只出現在會議上而已，也出現在 1920 年代的臺灣。

⁵ “Again the “Pan-Asia” Bog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1926, p.12.

⁶ 這裡只單就亞細亞會議參與者的想法作討論，然這些差異不只顯示在會場上，也顯示在日、中、朝輿論對會議的反應。見水野直樹，〈1920 年代日本・朝鮮・中國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アジア民族会議をめぐる三国の論調—〉，收入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頁 509-548。

第三章

亞細亞主義與 1920 年代之臺灣社會

1920 年代是亞細亞主義展露頭角之時，也是受過新式教育的臺灣人知識分子，開始進入社會、投身改革之時。新知識分子的活動刺激了臺灣社會，使其呈現出多樣繽紛的色彩。首先，本章擬略述日治初期臺灣人、日本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認識，接著，討論 1920 年代，臺灣社會中在臺日人、臺灣人新知識分子、臺灣人「御用紳士」三種出身背景、看法、理想各異的群體，如何建構自身之亞細亞主義？又如何反映到行動上？

第一節 日治初期臺、日人之亞細亞主義

一、傳統士紳粘舜音（1857-1904）之亞細亞主義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 年 4 月，兩國議和簽訂馬關條約，約定中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的傳統士紳雖在第一時間表明他們對清朝的忠誠，成立臺灣民主國，繼續「恭奉正朔，遙作屏藩」，但隨著日軍於同年 5 月底登陸，臺灣民主國迅速瓦解；同年 11 月，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向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¹隨後，在總督府或授予紳章，或任命為縣（廳）、辨務署參事等方式安撫下，傳統士紳逐漸接受日本統治。²不過，政治上接受新政權的同時，並不代表感情上已與故國形同陌路，一種對傳統中國的文化認同仍留存在士紳心中，如李春生（1838-1924）遊日時，感到自己雖身為「棄地遺民，自願改妝入籍」，但「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因而拒絕觀賞甲午戰爭之戲劇。³如何平衡兩者，就是這些士紳必須回答的課題。

粘舜音的看法，便是其中一例，他原是清朝庠生，臺灣割讓時曾短暫內渡，不久又回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記者，期間發表三百餘篇議論，就數量而言無人能出其右。⁴對總督府治理下的臺灣，他認為 1896 年至

¹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246。

²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 43-71。

³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收入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編，《李春生著作集》第 4 冊（臺北：南天，2004），頁 204。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 1895-1945》（臺北：巨流，2001），頁 53-58。

⁴ 粘舜音（1857-1904），名冠文，筆名梯雲樓主。二十歲時隨父渡臺，光緒年間府庠生。曾於艋舺從事教學，並曾任淡水縣幕賓。臺灣割讓時曾短暫內渡，後又再次來臺，並受邀擔任《臺日》記者。1897 年 4 月授佩紳章，1904 年 2 月病逝。「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

1898 年間，隨著辨務署的設置，各地逐漸恢復秩序，「有似乎天將明亮，人之睡者乎醒」，自 1898 年以後，「官海澄其波瀾，法權立其基礎，官制改而紀綱整肅，賊氛掃而區域盪平」，加以各種公共事業的推行，「有似乎旭日初升」之感。⁵在他眼裡，臺灣島內「人心頗慰」，「百姓咸殷引領，願從今後長蒙郅治之休」，至於少數流亡海外、號召抗日的人士，只不過是「殘喘苟延」、「造語欺人為餬口」之徒而已。⁶

不過，粘舜音雖然一方面支持新政權，一方面仍持續關注清朝事務。他認為清朝當前遭歐洲各國藉口租借疆土，如果同意一國所求，則其他列國也將隨之提出要求，最後使清朝「輿圖雖廣，曾何堪如斯割裂，供四鄰之分肥」。⁷因此，他建議若清朝「稍可以戰，則發憤以拒要求，若真不可與爭，則一面曲從，一面激厲眾心圖自強於他日」。⁸同時，還要與日本、韓國等亞洲各國平等合作。他認為堂堂清朝之所以會落到此種地步，乃是「由侈然自崇，輕藐鄰邦所致」，因此當得知清朝即將與韓國簽訂平等互惠的通商條約時，便表示此為清朝「轉弱為強之機」，不只如此，更是「亞洲時局的一大樞紐」，絕非尋常邦交。蓋東亞獨立國僅存日、中、韓「輔車相依」，若彼此應和睦往來，「全無隱判低昂之意，國之大者不敢有所驕縱，而因傲釀爭，國之小者不至有所含忍，而積念生怨」。⁹

上述說法，已有幾分亞細亞主義的味道。當然，或可假設「輔車相依」等比喻，只不過是運用修辭罷了，但他於 1900 年初發表〈東亞轉機論〉，其中就明顯地具有亞細亞主義的色彩。其開頭與前文類似：「東亞全局陵遲，閱時已久，目下輿圖並峙，帝國而外惟清與韓」，而過去清、韓兩國不願革新，又「深交異族之人，信為可」¹⁰恃而不悟」，以至逐漸衰敗。幸好兩國近年來逐漸圖強，又開始改善與日本的關係，「不可謂非機之默轉矣」。更重要的是，日本朝野皆以「興亞」為念，清朝、韓國、日本「類則同種，居則同洲，情誼儼然兄弟」，不會被異族離間，必能彼此學習創造文明，為東亞帶來轉機。¹¹

較前文而言，文中直接提及日本「興亞」的說法，而同種之清、韓、日應團結對抗異族，與同時期日本近衛篤磨等亞細亞主義提倡者已相當類似。像粘氏一般的士紳會產生此說法，並不令人意外，他雖然接受了新政權，但清朝在五年前仍是其祖國，過去也是「境據神州，澤成列聖」，¹²對他而言，呼籲亞細亞主義，

<https://db.nmtl.gov.tw/site5/index>，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他確切回臺時間不確定，但 1896 年 9 月的《臺灣新報》已有其與日本官員的唱和之作，1899 年 1 月時已擔任《臺日》記者，直到 1904 年病逝為止。〈官紳同宴〉，《臺灣新報》，1896 年 9 月 13 日，第 1 版；〈生徒先生を饗せんとす〉，《臺日》，1899 年 1 月 10 日，第 2 版；〈粘舜音氏亡故〉，《臺日》，1904 年 2 月 23 日，第 3 版。

⁵ 梯雲樓主，〈臺俗趨勢論〉，《臺日》，1901 年 1 月 1 日，第 10 版。

⁶ 梯雲樓主，〈闢謠〉，《臺日》，1899 年 4 月 22 日，第 3 版。

⁷ 梯雲樓主，〈論清法之爭未易解〉，《臺日》，1899 年 11 月 21 日，第 3 版。

⁸ 梯雲樓主，〈論清意交涉之事務〉，《臺日》，1899 年 3 月 17 日，第 3 版。

⁹ 梯雲樓主，〈論清韓通商之立約〉，《臺日》，1899 年 3 月 15 日，第 3 版。

¹⁰ 按：原字模糊，「可」字為筆者所推敲。

¹¹ 梯雲樓主，〈東亞轉機論〉，《臺日》，1900 年 1 月 1 日，第 9 版。

¹² 梯雲樓主，〈論清韓通商之立約〉。

不僅是希望清朝與現在的「我帝國」日本交好，也是希望日本能協助過去的祖國清朝復興。因此，其眼中的亞細亞主義，多少帶著平等的色彩：「國之大者不敢有所驕縱，而因傲釀爭，國之小者不至有所含忍，而積念生怨」，其中大國、小國雖然是指清、韓關係，但運用在清、日、日、韓，亦非不可。事實上，當 1902 年日英同盟簽訂時，他亦相信此同盟將能保全東亞，使清、韓得以富強：「國勢之等諸罹病者，¹³既有可資調養以漸至於康強；國勢之等諸幼稚者，¹⁴亦有可賴提攜以漸臻於成立。自此輔車唇齒，相得益彰。」¹⁵

既然粘氏認為亞洲的轉機繫於東亞三國的團結，那麼日本的臺灣統治應也具有一定的任務。除了可經由臺灣，推心置腹地經營對岸，使清朝人民消除對日本的猜忌外，¹⁶最重要的是將日本治臺所帶來的進步文明，推展到對岸之清朝，進而為亞洲帶來轉機：「(臺灣)得先清國諸省造新風氣，是天意直以臺灣一隅為亞洲轉機之樞紐，而即為清國人指示開化之標準也」。¹⁷當割讓一事被加上了亞細亞主義的意義後，原本是「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割讓悲劇，竟成了拯救清朝的關鍵，傳統士紳對「新恩舊義」的兩難，也因此化解。

這種認為日本統治為臺灣帶來文明開化，並希望「亞洲黃種」皆能學習日本一同維新進步，不再受西方壓迫，其實也是李春生對「新恩舊義」的回答。¹⁸粘氏在接受新政權的同時，的確也接受不少西方文明的成就，其中對新式衛生尤加讚賞：他不只指責找乩童抓藥方等傳統習俗是「邪術誤人」，¹⁹還鼓吹種痘、建醫院、維護環境整潔等。²⁰不過，對基督徒李春生而言，信仰基督教文明與否乃是強盛的關鍵，對一般士紳如粘氏而言，其追求的「開化」卻是奠基在「兼漢學、洋學」的「東學」上，認為「斯孔教之所由維持，黃種之所由保護，亦足以東學為賴矣」，若東學興盛，引導清朝人士融合漢學、洋學，將為亞洲帶來轉機。²¹

此一性質不只使得粘氏的亞細亞主義始終有著重視東方傳統的特色，更可看出粘氏其實正嘗試融合早年學習的漢學及日本帶來的新文明，試圖以此「東學」，兼顧清、日兩國思想上的差異、歧見，促進交流、合作。正與他希望大國不驕縱、小國不積怨的亞細亞主義觀相通，亦可追溯至傳統士紳在接受新政權統治的同時，又對舊政權抱有感情的兩難心態。

李春生、粘舜音的亞細亞主義觀點並非特例。1900 年 3 月，總督府召開「揚文會」，邀請全臺具科舉功名之士紳集會臺北，請其就修保廟宇、旌表節孝、救

¹³ 按：指清朝

¹⁴ 按：指韓國

¹⁵ 梯雲樓主，〈論極東和平有關世界全局〉，《臺日》，1902 年 2 月 23 日，第 5 版。

¹⁶ 梯雲樓主，〈論本國人經營對岸之務（上）〉，《臺日》，1899 年 12 月 6 日，第 3 版；〈論本國人經營對岸之務（下）〉，《臺日》，1899 年 12 月 7 日，第 3 版。

¹⁷ 梯雲樓主，〈論臺灣對岸之風氣〉，《臺日》，1900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¹⁸ 李黃膺，《臺灣第一思想家—李春生》（桃園：聖環圖書，1996），頁 243-247。

¹⁹ 梯雲樓主，〈論信邪之有誤衛生〉，《臺日》，1899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²⁰ 梯雲樓主，〈勸種痘說〉，《臺日》，1899 年 3 月 2 日，第 3 版；〈民立傳染病院論〉，《臺日》，1901 年 6 月 9 日，第 5 版；〈傳染病豫防論〉，《臺日》，1901 年 7 月 21 日，第 5 版。

²¹ 梯雲樓主，〈論東學將盛於對岸〉，《臺日》，1899 年 12 月 20 日，第 3 版。

濟賑恤等三議題提出管見。²²會上嘉義廩生陳傑昌²³建議總督府修建孔廟、舉行祭祀，理由為列強爭雄於中國，須依循孔教方能得中國民心，「我帝國與支那同文同化，果能修保廟宇，好惡同民，近之可以收拾臺人之心，遠之可以維係支那之望」。²⁴除了留在臺灣的士紳，割讓後內渡的林軺存（1879-1918），²⁵則強調英國只重視商業利益，難與日本患難相扶，日本必須與中國重修舊好，指出日本政府「如果有心於中國，何為臺民有一百二十餘萬人，²⁶政府不善為視之」，建議改善對臺灣人、旅臺華商的待遇。²⁷這些言論，固然未如李、粘兩人般對新政權表示好感，但依舊顯示出臺灣處在中、日間的狀態，使得一般士紳亦意識到日本的臺灣統治，與未來東亞的團結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學友會之「臺灣經營策」

不只傳統士紳提議實現亞細亞主義，部分殖民者也建議亞細亞主義之殖民統治策，尤以學友會之「臺灣經營策」為代表。學友會係總督府參事官仁禮敬之（ca.1860-1896）倡設，仁禮為曾根俊虎之興亞會的成員，早年留學清朝，來臺後為「與遊清國、奔走國事的人會面，彼此開胸襟談往事」而倡設學友會。²⁸ 1897年6月學友會正式設立，成員主要是各地辨務署署長、通譯等基層官僚，²⁹實際上不少成員同時是興亞會支那語學校、荒尾精（1859-1896）的日清貿易研究所等亞細亞主義團體出身之「清國通」。³⁰

1898年12月，松本龜太郎（前臺北縣稅務課長，1864-1918）、瀧野種孝（前判官，1862-1925）兩人代表學友會，向兒玉源太郎（1852-1906）總督提出「臺灣經營策」。其以日本國體論為始，強調日本乃基於「正天下人道，育世界蒼生」的「皇道」立國，「皇帝行皇道，國民守皇道，國家擴張皇道」即是日本的國體，並以此為主軸依序討論國際情勢及臺灣統治。其主張隨著世界人種競爭加劇，日本有義務扶持中國，日本之所以取得臺灣，亦是為了避免外國奪走臺灣，直衝中國心腹。因此，日本必須永久確實地領有臺灣，對臺灣人應「開發其智德，脫支那式的陋習，使之進文明之域，同時同化於我國體，與我進取的大義一致，作為我大和民屬一同屹立在世界」。具體的施政建議，則包括強化辨務署的權限，司

²²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64-66。

²³ 嘉義人，生平不詳。

²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揚文會策議》（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頁 48。

²⁵ 福建安溪人，少隨父祖寓居臺灣，寄籍淡水，乙未後內渡廈門。由於在臺經營茶葉、樟腦及金礦業，經常往來臺、廈間，與臺灣人士多有互動，和連雅堂交情尤篤。「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5/index>，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²⁶ 按：原文如此，惟 1895 年時臺灣人口估計約有 300 萬人。

²⁷ 林軺存，〈治臺得失論〉，《臺灣新報》，1898 年 1 月 16 日，第 4 版。

²⁸ 〈學友會〉，《臺灣新報》，1897 年 5 月 2 日，第 2 版。

²⁹ 〈學友會〉，《臺灣新報》，1897 年 6 月 10 日，第 3 版。

³⁰ 富田哲，〈「通譯」作為統治的障礙—日治初期對臺灣總督府「通譯」的批判〉，《淡江日本論叢》23 輯（2011 年 6 月），頁 216-22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荒尾精曾於 1896 年來臺考察，與日臺有力人士會面，並演說表示希望日清合作及臺、日人彼此提攜。山中樵，〈興亞的先覺者・荒尾精（2）〉，《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11 日，第 4 版。

法、行政上盡量尊重舊慣，並實施完全之保甲制度，充分使地方社會自治自衛，除此之外也要有效地漸進滅絕鴉片。³¹

「臺灣經營策」標榜的同化主義，與尊重舊慣、實行完全之保甲制度等建議看似相左，學友會卻不如此認為。作為長期處在中國社會的「清國通」，其相信日本皇道與中國古代帝王之道、儒學具有相同精神，日本政治文物直到幕末也與中國相同。同樣的，幕末日本社會的習慣、町村制，與臺灣漢人社會的舊慣、保甲制度大同小異，因此若日本能自幕末發展成當前的文明國，臺灣必然也能依循同樣的方法發展，於是學友會主張不需參考國體與日本不同之西方經驗，只須參考日本歷史即可治理臺灣。³² 換句話說，學友會的意見乃是中日文化相通，日本必須依照中日既有的統治方法治理臺灣，才能使臺灣完全成為日本的一部分，進而協助日本實現拯救亞洲的理想。

然而，上述建議並不能被務實、科學性的殖民官僚全盤接受。兒玉總督當場質疑，若日本過去只是墨守舊慣故習而未思改進，當下應如中國般衰敗。³³ 實際主導殖民政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同樣重視西方殖民經驗。後藤並不否定舊慣的重要，其以「生物學的原則」為政策核心，主張以科學的方式研究調查舊慣，並以符合臺灣社會舊慣的方式推動政策。³⁴ 不過，後藤並非因相信同化主義而尊重舊慣，³⁵ 而是因科學殖民的必要性而不得不如此，如鶴見祐輔（1885-1973）所言，後藤是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也就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史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的理論，而提出此統治原則。³⁶

另一方面，後藤也未一味重視舊慣，而是欲在舊慣之上推動近代化。松本龜太郎向總督提出「臺灣經營策」後前往東京，對後藤新政展開攻擊。1899 年 2 月，松本在臺灣協會發表演說，反對總督府欲發行公債收購大租權的計畫，主張大租權難以調查、價格較公債額高，就算收購成功，實際收租也相當困難。³⁷ 眾所皆知的是，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之後順利進行，結果不只讓土地稅收大幅增加，更導入了近代化的土地所有權制，方便未來之產業開發。³⁸

至於學友會的後續發展，由於學友會多數成員身兼總督府官員，松本不久遂因非難總督府政策，於被學友會決議為違反會員意志及會則而除名。³⁹ 1899 年 5 月，《臺日》刊登社論，攻擊通譯為了自身利益，妨害施政、阻礙官民來往，間

³¹ 〈台灣經營策〉，《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G-95-1。

³² 〈台灣經營策〉，《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G-95-1。

³³ 〈松本龜太郎等施政に反対して上京 云々の書狀〉，《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G-84-8。

³⁴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頁 21-42。

³⁵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 116-134。

³⁶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38。

³⁷ 〈大租戶權買收問題〉，《臺日》，1899 年 2 月 25 日，第 2 版。

³⁸ 有關土地調查事業的背景與過程，詳見吳密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5-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10（2017 年 12 月），頁 5-35。

³⁹ 〈水野遵氏と事業公債案〉，《臺日》，1899 年 2 月 24 日，第 2 版。

接批評學友會。⁴⁰學友會對此召開大會，會上議論紛紛，有主張辭職、與《臺日》談判、質問總督、長官、前往國內展開運動等，然最終亦未得出一致的看法。⁴¹當後藤的政策漸漸步上軌道後，也未見學友會再對殖民政策發表意見。

三、日俄戰爭前後臺、日人亞細亞主義認識之隔閡

學友會的「臺灣經營策」，已經被後藤的統治政策取代，傳統士紳的中日提攜理想，也不得不因國際局勢而受阻礙。在粘舜音寫下〈東亞轉機論〉後半年，義和團事變爆發，粘氏也隨之撰文，強調若清朝因列強派兵而滅亡，甚至被列強瓜分，那麼列強間未來必將因此發生爭端，不過他也相信「而有人焉，出為彌縫，事機猶有可收拾」。⁴²然而，《臺日》日文版卻在政府正式派兵前便表示，若日本在此好機，「拘拘於勢力均衡這個常套文字，而不能施展出色的運動，將導致千秋的遺恨」，⁴³事變結束後也主張向華南擴大勢力。⁴⁴蓋日人眼裡，與清朝提攜共抗西方已不可能，當下最好的做法，只有與列強合作，一同擴大勢力圈、獲取利權，增長自國實力，未來才能考慮是否保全中國。

日俄戰爭時臺、日人看法的差距更顯著。1905 年 7 月，《臺日》漢文版獨立，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名發刊，⁴⁵由於此時日俄戰爭正逢終局，該報也因應局勢以〈日俄戰後之日清關係〉為題公開募稿，最終共有 11 篇文章獲得刊登。各自立論雖有所不同，但都強調日本與清朝為同洲同種之兄弟之邦，關係緊密，日俄戰爭既然係為保全清朝，抵抗俄國南侵而發生，最後帝國也應歸還占領地給清朝，如此一來，日清便能誠心提攜，共同改變亞洲局勢。藍廷藩（ca.1880-1907）⁴⁶的立論應是其中最詳盡者，他在參考國際案例後，認為滿洲未來可能有三種處置方式：一為「代理統治主義」，由日本盡行中國主權；二為「聯合行政主義」，日本與中國按事務種類分別施行主權；三為「監督行政主義」，讓中國自己施行主權，日本僅負責監督。這三種處置中，他認為第一種可能導致清朝不滿，甚至與俄國共同反對日本，第三種又無視日本犧牲，因此最佳辦法便是第二種，詳言之，就是軍政、機關、外交等重要者由日本處理，民行政由清朝處理，如此兩國將彼此包容，俄國亦不會再南侵。若不然，將「同室操戈，閭閻內亂，唇其亡者，齒其塞矣，枝其然者，豆其泣矣。黃種之禍，伊胡底也」。⁴⁷

⁴⁰ 〈通譯の罪惡〉，《臺日》，1899 年 5 月 18 日，第 1 版。

⁴¹ 〈「通譯の罪惡」對學友會〉，《臺日》，1899 年 5 月 23 日，第 2 版。

⁴² 梯雲樓主，〈論瓜分清國非列邦之利〉，《臺日》，1900 年 7 月 8 日，第 5 版；〈論清國安危有關列邦之休戚〉，《臺日》，1900 年 7 月 18 日，第 3 版。

⁴³ 〈北清事變と帝國の政論〉，《臺日》，1900 年 7 月 8 日，第 1 版。

⁴⁴ 〈南清經營の前途〉，《臺日》，1900 年 9 月 16 日，第 1 版。

⁴⁵ 〈始刊之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惟 1911 年再度併入《臺日》。

⁴⁶ 羅東人，字幼荊，號鑄腦子。為清弟子員藍青之長子，羅東辨務署參事藍新之從侄。臺灣割讓後，以詩酒自娛，另外也熱心時學，端楷亦冠絕當時。曾在城南築一小廬，名曰小隱軒，邀連碧榕、蔡振芳、莊贊勳、李璧選、游時中等人共同吟詩作賦、談論時事等，自號六逸散人。1907 年因病逝世。〈宜蘭雜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13 日，第 5 版；〈斯文逝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7 日，第 5 版。

⁴⁷ 鑄腦，〈日俄戰後之日清關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12 日，第 4 版。

與粘舜音相同，作為日本帝國的被統治者，又對清朝有感情的藍氏所提出者，乃是一折衷雙方利益，促進雙方合作的建議。他也將此建議與亞細亞主義連結，強調若不採行，則未來「黃種」、「東亞」將面臨禍端。

值得注意的，還有王石鵬（1877-1942）⁴⁸的投稿，其建議日本應立即與清朝同盟，迫使其頒行憲法，以保障光緒皇帝權力並融合滿漢，並引導協助清朝重建帝國，才能「共享亞洲之幸福，永絕列國瓜分之謀」。同時，設立「東亞大協會」，聚集東亞人才、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並請亞洲各國君主、陸海大將定時集會，如此「則情意聯絡，畛域不生。安內之方既定，而外人自不敢窺伺矣」。⁴⁹

文中除了顯示出對清朝廷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他還提出具體的亞洲聯盟構想，希望透過一個「東亞大協會」提攜亞洲各國。顯示隨著日本勢力的擴大，上述提倡者並不是越來越重視日本獨有的利益，反而更加強調亞洲聯盟的重要。透過新政權獲得新知識及國際觀後，⁵⁰更能提出更具體的亞洲提攜策。王石鵬的「東亞大協會」，不只要聚集學者討論，還要邀請各國君主、陸海大將每年與會，幾與現代國際組織無異，也早於全亞細亞協會受國際聯盟刺激而提的「亞細亞聯盟」約 20 年。就其提倡的理由而言，仍與粘氏相同，乃是本於對故國清朝的感情，而亞細亞主義正是一個能兼顧中、日雙方利益的構想。到了戰後，隨著黃禍論的興起，相關討論就更多了。李漢如（1877-1936）⁵¹認為列強實際上是假黃禍之名，圖對中國行「鯨吞蠶食之故策」，⁵²此時若「一旦失之，則下白人種咽喉底矣」，如印度、安南、緬甸、波斯一樣「終古無復有國」、「竟為人奴隸而牛馬」。幸運的是，現在：

我日本又當戰勝之後，其餘威猶是懾服萬里。我亞洲人乘此機而齊奮發之，如順舟而助以片帆，一往千里。如御車之執六轡，一塵不驚。千將出匣，誰敢試芒，橫括四海，奄有八荒。夫何黃禍之說，觸於耳鼓。瓜分之事，

⁴⁸ 王石鵬，字箴盤，號了庵，新竹人。乙未時內渡，1897 年回臺，入國語傳習所、師範學校就讀，在舊學之外，也雅好新學，且熟諳日語。「臺灣文學辭典資料庫」，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2/index>，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⁴⁹ 王石鵬，〈日俄戰後之日清關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7 月 7 日，第 4 版。

⁵⁰ 如藍廷藩便常與其他文人談論時事，〈宜蘭雜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13 日，第 5 版；至於王石鵬則更明確的肯定現代文明，詳見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2003 年 7 月），頁 222-246。

⁵¹ 李漢如，澎湖湖西人，又名黃海，字少潮、夢清、耐儂、瀚儒，號瀛西者、夢清散人、西瀛最不羈生、最不羈生、東海呼船客、泛槎生、東海客。1905 自國語學校畢業，1905 年任《臺日》記者，其後任職廈門《全閩新日報》、爪哇報館，在東京時亦參與《臺灣青年》雜誌社，1920 年代前後前往中國，1936 年逝於天津。關於「少潮」真實身分的考證，見許俊雅，〈少潮、觀潮、儀、耐儂、拾遺是誰？--《臺日》作者考證〉，《臺灣文學學報》19（2011 年 12 月），頁 1-33。另外，其生平亦可參考胡巨川在《碯碯石》刊載的一連串文章，胡巨川，〈壯志雄才李漢如（一）～（九）〉，《碯碯石》75-83（2014 年 6 月、2014 年 9 月、2014 年 12 月、2015 年 3 月、2015 年 6 月、2015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2016 年 3 月、2016 年 6 月），頁 100-116、93-113、105-119、114-132、97-113、85-104、111-127、119-141、123-141。

⁵² 少潮，〈雞狐偶語雉為解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1 月 30 日，第 4 版。

映於眼簾者乎。⁵³

不像日本輿論紛紛否定日中聯盟的可能，政府甚至專門遣人否定黃禍論。此篇文章卻是在號召亞洲人奮起，文末的「夫何黃禍之說，觸於耳鼓。瓜分之事，映於眼簾者乎」，並不是在否定黃禍論，反而是認為若亞洲能強盛，則也不須擔憂列強以黃禍為藉口侵略亞洲。李漢如另撰〈論黃禍說之由來〉，雖然貶斥黃禍是「俄人之窮策」，末段又強調中國應發憤圖強，使「國民具獨立之國體，雖外侮紛乘，亦不能奪我主權，握我政柄，壓制我，阻撓我，而使不自治者也」，文末的「黃人種族，各宜加意焉」，推測應也是在鼓吹亞洲人奮起。⁵⁴

同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登，著者不詳的〈臺灣夢話〉，引用「臺灣未來記」的內容：「爾時白人擊刺于黃禍之膨脹，亞歐人必生一大衝突，然歐人終受亞洲人之大打擊」。之後，「迨平和克復，議以臺灣為萬國修羅場」，並「于新高山，闢一絕大公園，認作公共俱樂部」，臺灣、澎湖與金門、廈門間也將因鐵路而直接相通，而臺灣之「主人翁則亞東之領袖也」。雖然「臺灣未來記」一書的詳情不明，但從著者強調臺灣的重要，以及臺灣與中國的相連來看，大概也是傳統士紳，而他也不反對黃白對抗的說法。⁵⁵

然而，在臺日人對黃禍論的看法就有所不同。由筆名「高領」⁵⁶連載的〈亞細亞是亞細亞的亞細亞論〉，開宗明義表示黃禍論雖有政治、社會、經濟上的意義，不過大多「根據薄弱」，大部分主張來自「沒有實務經驗的理論家」或是「杞憂論者」。他認為，黃禍論直接起因是日本的突然崛起，使列強產生「相當極端的杞憂說」，擔憂自國利權被侵犯。雖然他承認日俄戰爭的結果多少鼓舞了亞洲各地的民族運動，卻不表贊同，不只認為中國青年透過排外運動爭取利權的方式是犯了大錯，也諷刺印度報紙強兵的呼籲，連載最後，他主張在國際關注遠東問題的當下，日本政府應設置國際通信社，反駁對日本不利的、錯誤的報導。⁵⁷此一建議其實恰與日本政府對黃禍論的反應相同。自日本領臺開始，傳統士紳已不斷呼籲與清朝聯盟、共興亞洲，但在國際情勢下，這種主張卻始終不被日本政府接受，多數在臺日人也與政府沆瀣一氣，對黃禍論或亞洲的民族運動都不表贊同。

⁵³ 少潮，〈論亞洲人奮興之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1 日，第 9 版。

⁵⁴ 少潮，〈論黃禍說之由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2 月 13 日，第 2 版。

⁵⁵ 〈臺灣夢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1 日，第 10 版。

⁵⁶ ハイカラ (high collar)，直譯為高領，指穿上高領西裝襯衫的人，也泛指受西洋風氣影響的人。

⁵⁷ ハイカラ，〈亞細亞は亞細亞の亞細亞論（一）～（九）〉，《臺日》，1906 年 6 月 19 日；6 月 20 日；6 月 21 日；6 月 22 日；6 月 24 日；6 月 26 日；6 月 27 日；6 月 29 日；6 月 30 日，版次皆為第 1 版。

第二節 1920 年代在臺日人之亞細亞主義觀

一、亞細亞主義之傳入與臺灣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亞細亞主義不只出現在日本國內的主流言論界，也出現在屬於日本殖民地的臺灣。1915 年 11 月，英法俄三國要求中國加入戰局，《臺日》轉載國內時論，強調日本是「東洋的盟主」，擁有對東洋事務的最終決定權，因此三國在實行任何計畫前都應先與日本誠心謀議。¹漢文欄連載中島氣崢（1863-1936）²的〈大和民族之天職〉，其言「顧立國於坤輿者，豈獨白人種而已」，但亞洲的黃種各國，卻逐一被白人種蹂躪，日本對此「決不能冷眼視之」，因此國民應自覺「帝國在東亞之重大責任」，也應向亞洲各國宣言：「日本帝國，享有指導東亞之天命，望東亞隆福者，必來與我帝國相一致，否則，我將自至」。雖然他將此方針稱為「大帝國主義」，不過其內涵實與亞細亞主義無異。³

在此背景下，小寺謙吉（1877-1949）的《大亞細亞主義論》自然也在出版不久後就受到在臺日人關注，《臺日》介紹該書為「憂國的大議論」。⁴三個月後，《臺灣時報》刊登〈評大亞細亞主義〉，該文近九成係改寫自小寺書序，強調「大亞細亞主義」的目的，乃是由新文明的先覺者日本，協助舊文明的淵源地中國復興，而「以東西文明的調和，黃白思想的溶化，增進亞細亞的幸福，與列國同享其慶福」。接著，作者才評論「大亞細亞主義善也。然欲徹底實現此大主義，必待巨人出現指導之，至少也須是學習巨人的心胸，赤誠任事之人。嗚呼巨人何處來？」雖然作者是否看完整本「滔滔幾十萬言」的書，頗值懷疑，仍不可否認作者對其想法的贊同。⁵

除了透過日本國內傳入，在臺日人也可能因自身經驗而接受亞細亞主義。總督府事務官松本卓爾（1882-1917），於 1915 年奉命前往英美留學研究水利行政、經濟，以及電器事業。他在美國親身體驗到對亞洲移民的排斥，並得出以下看法：「彼等排斥日本人、支那人的理由，完全是因為人種偏見」，而對抗手段，就是亞細亞主義。⁶

儘管不清楚松本是否讀過小寺的著書，但他對亞細亞主義的理解卻與小寺大同小異，認為日、中基於人種因素應彼此團結，調和西洋物質文明及亞洲精神文

¹ 〈時論一斑〉，《臺日》，1915 年 12 月 4 日，第 1 版。

² 中島氣崢，號氣山，高知縣出身。曾在高知新聞、日本新聞、萬朝報、東京日日新聞等報社任職，長年鼓吹國家主義，後至德富蘇峰主辦的國民新聞任參事。片岡仁泉，《近代土佐人》（高知：土陽週報社，1914），頁 68-69；「德富蘇峰記念館」，網址：<http://soho-tokutomi.or.jp/>，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³ 中島氣崢，〈大和民族之天職 大帝國主義（其三）、（其四承前）〉，《臺日》，1916 年 1 月 25 日，第 6 版；1916 年 1 月 28 日，第 6 版。

⁴ 〈新刊紹介〉，《臺日》，1917 年 1 月 9 日，第 3 版。

⁵ 〈大亞細亞主義を評す〉，《臺灣時報》，1917 年 2 月，頁 1；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序頁 1-5。

⁶ 松本卓爾，〈亞細亞主義〉，《臺灣時報》，1917 年 5 月，頁 6。

明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才能使歐洲不再歧視亞洲人，進而促使世界和平。⁷顯示出在臺日人與國內日人同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接受了亞細亞主義。

不過，人種相同雖然是亞細亞主義中相當重要的要素，與日本國內的情形類似，並非每個人都贊成基於「同文同種」的日中親善說。民政部土木局長角源泉認為，即使日中兩國屬於同種，卻沒有同樣的民族精神，而以歐洲大戰為例，同種間也經常互相敵對。至於同文的說法，不只日本人使用的漢文已完全日本化，漢字未來也將因難用於實際溝通而消失。在質疑同文同種說後，角提出了另一個日中親善的理由，那就是兩國「唇齒輔車」的地理關係：「南依臺灣，與福建如一衣之帶水般迫近；北依朝鮮，與其大陸接壤」。純粹根據地理關係的親善說，雖然難以認作是亞細亞主義，角在文中其實亦以國土相連為由呼籲與俄國親善。但其說法也點出了臺灣所擁有，較日本國內更接近中國的特色。⁸進一步言，臺灣與中國的接近性質，不單只有角強調的地理關係而已，更在民族組成上呈現在占島內多數的漢人人口；在經濟交流上呈現在戰爭爆發後快速增長的貿易額。⁹戰爭期間臺灣對中國輸出入額的增長率，甚至高於臺灣對日本國內移出入額的增長率。

表 3 - 1 1913-1918 年臺灣對日本國內、中國貿易概況

單位：円、%

年度	對日本國內進出口價額 總和	成長率	對中國進出口價額 總和	成長率
1913	83,265,912		10,169,487	
1914	85,617,264	102.82	10,787,233	106.07
1915	107,880,388	126.00	12,657,114	117.33
1916	130,144,432	120.64	17,718,055	139.98
1917	173,214,395	133.09	23,797,118	134.31
1918	176,191,860	101.72	30,598,194	128.58
1914-1918 年平均成長率		116.86		125.26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自明治二十九年至昭和十年》（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36）

臺灣與日本國內不同的性質，使松本認為「因為（臺灣）包容著三百萬的支那人種，我等乃是在解決支那問題上最好的地位」。強調日中親善之基礎，在於經濟提攜、合辦事業，臺灣島上日臺人資本合作的情形，正證明了日中合辦將會成功，在臺日人「無須為住在臺灣感到失望」，反而應認為自己是「支那問題研

⁷ 松本卓爾，〈亞細亞主義〉，頁 8-9。

⁸ 〈日支親善〉，《臺日》，1918 年 9 月 29 日，第 4 版。

⁹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15-16。

究先鋒的中心」。¹⁰雖然松本不久便因病過世，但當《臺日》於 1920 年以「東洋保全必須透過日支親善」為由向官民徵求日中親善策時，多數意見也再次提到日中合辦事業的重要。除了合辦事業之外，高等法院判官谷野格也倡導在臺灣設立大學，廣邀中國留學生就讀，認為至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易受一般社會輕蔑，回國後轉而鼓吹排日，相較之下，「臺灣在地理上還有在民族關係上，都是支那民族留學最方便的地方」，因此大學的設立，「必定會在日支親善上帶來一大效果，也能貢獻臺灣南支南洋的文化」。¹¹

提倡亞細亞主義者，不只是在《臺灣時報》或《臺日》等親總督府媒體上發表文章的人士，¹²不滿總督府的民間日人亦同，甚至更早開始呼籲。伊藤政重（1878-ca. 1923）¹³原為總督府判官，1905 年退職轉任律師。1909 年，林本源合名製糖會社在總督府的協助下欲低價收購農民土地，伊藤等律師受農民委託，搶先登記買收土地以阻擾收購，更親自赴京請願，最後成功阻止收購，但因違反「律師不得買受系爭之權利」的規定而被除名。¹⁴除了擔任律師之外，他也任 1906 年創刊的《全臺日報》社長，但不久因毀損官員名譽而被起訴，加上經營不善及內部鬥爭，1909 年 7 月停刊。兩個月後，伊藤另創刊《實業之臺灣》並任主筆，號稱內容「避談政論」，其實仍關注日中關係、殖民政策。¹⁵1914 年 2 月刊登律師高橋忠義（?-1934）所寫的〈帝國與支那〉一文中，已強調「黃色人種的日本與支那須一致團結抵抗白人，努力精勵以圖國運的隆盛，乘著轉運的時氣擔起提攜東洋之責」。¹⁶

至於伊藤本人，則於 1909 年已受中國同盟會的黃興（1874-1916）影響而接受了亞細亞主義。據伊藤描述，黃興曾在某日深夜訪問其東京寓居，表示「日英同盟的時代已去，日俄須結盟，其後不久則是亞細亞同盟。中國必須先振興教育，確立戶籍制度、定兵制，須為以後將出現的亞細亞同盟打下基礎」。¹⁷之後，伊藤於 1912 年所寫的〈時局管見〉中便認為：

吾人大和民族於前世紀的覺醒乃是對黃色種族而響的曉鐘，是要我們促進

¹⁰ 松本卓爾，〈日本の世界的地位（六）〉，《臺日》，1917 年 5 月 12 日，第 1 版。

¹¹ 谷野格，〈日支親善論（二）〉，《臺日》，1920 年 6 月 2 日，第 3 版。

¹² 《臺灣時報》是由總督府所發行；《臺日》雖然不是總督府直接發行，但因其創立背景與人事組成，而一般都被認為是「御用紙」。

¹³ 山梨縣人，1903 年渡臺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1905 年退職轉任辯護士，1910 年年底遭除名。後轉入實業界，擔任南日本製糖會社常務取締役、臺灣蓄財建築株式會社社長。他曾數度代表政友會參選眾議院選舉，但都未能當選。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306；田中一二，《臺灣の新人舊人》（臺北：臺灣通訊社，1928），頁 8-11；大野伴睦，《伴睦放談》（東京：金融界社，1952），頁 48。

¹⁴ 何鳳嬌，〈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臺灣史學報》10（2017 年 12 月），頁 106-107。

¹⁵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頁 80-82。不過，雖然李承機認為 1916 年後才有較多政論類的文章，本文則認為發刊時已有政論類的文章。

¹⁶ 高橋忠義，〈帝國と支那〉，《實業之臺灣》52（1914 年 2 月 20 日），頁 11-12。

¹⁷ 伊藤政重，〈噫中華民國勲一位克強黃興先生〉，《實業之臺灣》83（1916 年 11 月 10 日），頁 51-52。

亞細亞人文的復興之警告；日清日俄的兩大國難則是使黃種奮起的注射性療法。¹⁸

當時辛亥革命的爆發，更讓伊藤相信未來局勢將引導日本成為黃種人的盟主，因此他主張日本應陽助清朝，暗助革命，使日本對兩政權都有恩情。¹⁹不過，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被伊藤稱為「世界人文轉換之期」、「民族結合之良機」的時刻，他才將此篇文章刊出。此時，他仍相信隨著人類鬥爭的激化，最終將會發生種族鬥爭，「苟欲黃色人種之生存，今乃吾青年拋擲私情盡瘁擁護種族之秋也」。既然如此，日本的使命便是在「種族保全也，民族擁護也」，亦即以日中親善面對種族鬥爭，排除中國受到的壓迫，進而向南北開發聯合全亞洲。²⁰

單看伊藤的呼籲，或許看不出與臺灣的關係，實則他在被除名後轉戰實業界，曾任南日本製糖常務取締役等職，並於 1917、1918 年前往廈門考察，與林祖密（1878-1925）往來密切。²¹林祖密為霧峰林家林朝棟（1851-1904）子，1913 年入籍中國，在廈門從事實業，同時也協助孫文發動反袁運動、護法運動。²² 1920 年 2 月，伊藤又擔任「東洋信託保證取引所」常務理事，²³該公司同年改組為「五國信託公司」，伊藤繼續擔任常務理事。²⁴五國信託公司營業所設在天津義大利租界，雖在美國登記、號稱五國（日、中、英、美、法）合辦，其實重役多為日、中兩國人，也有不少臺灣人，包括李黃海（即前述李漢如，澎湖人）、蔡鐵生（即蔡惠如，臺中人，1881-1929）、林瑞騰（林朝棟子，1880-1952）、鄭肇基（新竹人，1885-1937）等。²⁵除重役外，在公司任職的臺灣人，還有藉蔡惠如的提攜擔任天津營業所書記（記室）的傅春鐘（傅錫祺子，1893-?）。²⁶ 1921 年 4 月，五國信託公司改組為五國銀公司國際交易所，同年 10 月再因加入義大利資本而改稱為六國銀公司，²⁷營業重心轉至上海，但伊藤、李、蔡、林、鄭等人續任重役。²⁸儘管伊藤長期與總督府不合，但他和臺灣人共同推動日中合辦的行動，恰與松

¹⁸ 伊藤政重，〈時局管見〉，《實業之臺灣》94（1917 年 11 月 3 日），頁 40。

¹⁹ 伊藤政重，〈時局管見〉，頁 40-41。

²⁰ 伊藤政重，〈擬與在廈門某兄書〉，《實業之臺灣》87（1917 年 3 月 15 日），頁 55-56。

²¹ 〈伊藤政重氏渡廈〉，《國民日報》，1917 年 3 月 2 日，第 9 版；〈廈門通信〉，《臺日》，1918 年 4 月 27 日，第 4 版。

²² 〈民國歷史人物小傳（140）〉，《傳記文學》49：3（1986 年 9 月），頁 145-147。

²³ 長崎武，〈選良片影〉，《亞細亞時論》4：4（1920 年 4 月），頁 73-75。「東洋信託保證取引所」於 1916 年由日本商人成立，在美國登記，營業所設於上海，也曾在臺灣募股。〈取引所株募集〉，《臺日》，1917 年 11 月 28 日，第 2 版。

²⁴ 在此改組過程中，曾一度發生內部糾紛，其社長指控重役私自舉辦股東總會，並提告偽造文書、盜用公款等等。〈東洋信託の疑獄〉，《朝日新聞》（東京），1920 年 4 月 21 日，第 5 版。

²⁵ 〈五國信託公司之內幕〉，《大公報》，1920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該公司重役計有：總裁楊度，副總裁楠瀬幸彦，副總裁署理費先悌（美人），專務理事李黃海、菊島生宜，常務理事蔡鐵生、野並慶定、伊藤政重、文芳，理事林秉祥、林瑞騰、宋偉臣、鄭肇基、山本久顯、栗原善太郎、野口清三郎、高橋彦次郎、里衣鐸（美人）、羅阿茹（美人）、紀里（英人）、嗎特路（法人）、穆黎讓托（法人）、坎林谷（英人），監事李景□、王大貞、松尾鶴男、佐佐木文一。

²⁶ 〈傅錫祺日記〉1920 年 9 月 12 日（摘要），引自廖振富編著，《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40。

²⁷ 〈五國銀公司國際交易所改名通告〉，《申報》，1921 年 10 月 27 日，第 6 版。

²⁸ 〈機密第 115 號〉（1921 年 9 月 29 日），〈取引所關係雜件／國際交易所股公司（一名五國合

本卓爾的想法不謀而合，從他和林朝棟二子的來往來看，背後說不定也有政治合作的目的。

松本、伊藤等人的例子，顯示出在臺日人最初或許是透過日本國內的說法認識亞細亞主義，但他們很快地將其臺灣化，他們鼓吹的亞細亞主義遂與國內不盡相同。無論是以日臺合資為基礎進行日中企業合辦，還是提倡在臺設立大學廣召留學生，他們的亞細亞主義都具有臺灣視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早期在臺日人對中國的看法較為友善，指出日中親善的前提必然是雙方利益並重，因此日本應提供「捨石」以改善日中關係，²⁹甚至強調必須無條件歸還青島作為該「捨石」：「若吾政府及國民連捨棄青島的勇氣都沒有的話，無論如何倡導口頭的親善論，只不過會被視為是日本人的空想，作為彼等嘲笑的材料，連半文的價值都沒有」。³⁰伊藤也同樣強調，亞細亞聯合應是「黃色人種自主獨立之聯合」，各國保持各國的主權、自由，盟主應由各民族公選。蓋「我祖國之使命，決非土地侵略，商權擴張，亦非權力者之虛榮飽滿，富貴者之驕奢得意」。³¹

其中的平等色彩，類似於領臺初期傳統士紳的看法。可惜的是，在國家利益下，這些看法並不能化為現實。日本政府最終沒有無條件歸還青島，另一方面，五國信託公司則被中國人認為非真正合辦，因幹部多為日、臺人，「是為完全日本人之營業」，且「破綻甚多」，「他日吾國人受其害者必不在少數」，³²六國銀公司甚至被批評為「純為攫取我國權利」而設。³³日中兩國現實利益上的差異，到了 1920 年代後也將為在臺日人的亞細亞主義觀帶來轉變。

二、1920 年代在臺日人亞細亞主義議論之盛行與衰退

與日本國內的情形相同，在臺日人對亞細亞主義的關注延伸至 1920 年代前期。1924 年美國排日移民法通過不久，《臺日》社論³⁴已將移民法視為人種偏見的產物，雖然認為人種間仍應以外交、和平手段保持圓滿關係，但亞洲民族間同時也須改變原本冷淡的交涉關係，「特別是日支兩國民間兄弟鬩牆的戲碼今後應儘速停止，只應持有一致協力面對東亞大局的覺悟。因為今後亞細亞民族的命運，

弁信託取引所)》，分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3-3-7-39_5，JACAR Ref.B11090113400。

²⁹ 相賀照鄉，〈日支親善論（一）〉，《臺日》，1920 年 6 月 1 日，第 3 版。

³⁰ 北投一旅客，〈日支親善論を讀みて〉，《臺日》，1920 年 6 月 8 日，第 3 版。

³¹ 伊藤政重，〈擬與在廈門某兄書〉。另外，伊藤曾在〈支那の現勢と我徒の抱負〉中評述日本的各種對中政策，雖言日本全面取得中國統治權是最佳策，但也用侵略政策來稱呼內田良平試圖直接取得中國的作法，又表示扶植溥儀也不得民心等等。由於該文欠缺後半部，難以認定伊藤真正的想法。〈支那の現勢と我徒の抱負〉，《實業之臺灣》93（1917 年 10 月），頁 7-12。

³² 〈五國信託公司之內幕〉，《大公報》，1920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

³³ 〈所謂六國銀公司國際交易所之大黑幕再披露〉，《京報》，1924 年 7 月 17 日，轉載自波多野乾一編，《現代支那之紀錄》1924 年 7 月（燕塵社，1924），頁 235-239。

³⁴ 1922 年以前的《臺日》在其第 3 版原有〈日日小筆〉欄，而後該欄位改為社論欄，1924 年 6 月後移至第 2 版。此社論欄雖未標明為「社說」，但其內容非屬報導，而是對當時政經情勢或社會事件等的評論，或是對當局的建議，且應是由社內人士所寫，實際性質與社論無異，本文即以社論稱之。

多取決於日支兩國民的協調與決心如何。」³⁵眼見亞洲各地人士對排日法案的迴響，連代表唐繼堯（1883-1927）來臺的雲南教科長王九齡（1879-1951）都公開主張「東洋人種的大同團結」，³⁶社論也強調日本的舉動將在東洋引起巨大的波紋，而日本國民若欲有所行動，則國民必須養成「背負著亞細亞」的決心和覺悟，以及「無論何時都能拯救亞細亞十億的民生之自信及準備」。³⁷

不過，在臺日人對亞細亞主義的看法並非始終如一，最顯著的轉變發生於 1927 年 4 月田中義一（1864-1929）內閣決定積極確保在中國的利益後。前後的差別，正好能從《臺日》對 1926、1927 年兩次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的報導中看出端倪。有關第一次會議，《臺日》從 1926 年 1 月即開始關注會議的準備，³⁸之後雖然也報導中國對會議的反對，以及美國對會議的冷淡態度，³⁹但在會議前不久仍發表社論表示支持，猜測其影響將散播至亞洲各地，更可能會以此為機緣，形成全亞洲民族的大同團結。⁴⁰會議開始後，《臺日》除詳細報導每日經過外，整體語氣也較正面，各國提案被稱為「強調對亞細亞民族的團結與飛躍之期待」，⁴¹會議最後日安南代表的演講也是「述說官憲的壓迫，給予滿場深深的感動」。⁴²

相較之下，《臺日》對第二次會議的關注較少，不但社論沒有對會議發表評論，對於會議經過的報導也偏負面。在準備會期間的報導多集中在日、中兩國間的衝突，認為「日本側似將被猛烈欺負」、「會議的前途呈現出不愉快的趨勢」，⁴³甚至推測最終將流會。⁴⁴會議結束後，也僅依照參加者的說法，簡述會議過程及決議而已，沒有附加評論。⁴⁵

進一步觀察 1927 年後社論的內容，能更清楚了解造成此轉變的原因。1927 年 1 月，社論尚對國民政府奉行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表示敬意，還認為民族主義「同時也有考慮到黃色人種或有色民族協同」。⁴⁶不過同年 5 月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後，該報雖然仍表示國民對中國有著深刻的同情，但是日本為了維持條約權利、保護居留民而不得不出兵。⁴⁷一戰戰後早期，在臺日人尚呼籲放棄利益以改善日中關係，但當中國的民族運動真正威脅到日本利益時，其態度也明顯惡化，不只要中國仿效日本條約改正的過程，先完善內政，再來與「文明國家締結對等條約」，⁴⁸並要求日本政府應對鼓吹排斥日貨運動的官廳「訴諸嚴厲的報

³⁵ 〈人種的偏見の昂進を怖る〉，《臺日》，1924 年 4 月 26 日，第 3 版。

³⁶ 〈王氏歡迎會〉，《臺日》，1924 年 6 月 25 日，第 2 版。

³⁷ 〈亞細亞大聯盟の運動〉，《臺日》，1924 年 6 月 28 日，第 2 版。

³⁸ 〈全亞細亞民族會議〉，《臺日》，1926 年 1 月 14 日第 5 版。

³⁹ 〈各方面に不評判な 亞細亞人大會〉，《臺日》，1926 年 7 月 28 日，夕刊第 2 版。

⁴⁰ 〈全アジア民族の大會〉，《臺日》，1926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⁴¹ 〈亞細亞民族大會委員會〉，《臺日》，1926 年 8 月 3 日，第 2 版。

⁴² 〈亞細亞民族大會最終日〉，《臺日》，1926 年 8 月 4 日，第 2 版。

⁴³ 〈日本側 小ッびどく いぢめられさう〉，《臺日》，1927 年 11 月 2 日，第 2 版。

⁴⁴ 〈亞細亞民族會議 結局流會か〉，《臺日》，1927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

⁴⁵ 〈汎亞細亞民族 會議の内容〉，《臺日》，1927 年 11 月 13 日，夕刊第 2 版。

⁴⁶ 〈三民主義と支那の將來 特に其の民族主義について〉，《臺日》，1927 年 1 月 28 日，第 2 版。

⁴⁷ 〈日本の不本意な出兵 國民政府も諒とするだらう〉，《臺日》，1927 年 6 月 1

⁴⁸ 〈國民政府の對外宣言 條約の改正には日本を學べ〉，《臺日》，1928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復手段」。⁴⁹就他們對排斥日貨問題的重視來看，也反映了臺灣與中國貿易的密切：「同（指華南）方面對日感情如何，在對岸貿易上會直接造成消長」。⁵⁰既然如此，他們要求政府除了防止排日，甚至須積極簽訂商約保障商權，也不令人意外。

其實，在臺日人並不反對日中提攜，甚至從人種、文化關係上對中國表達同情，但當中國始終無法恢復國內秩序時，在臺日人的看法也越來越負面。對於當時流傳的日英結盟協調對中政策之說，雖然認為是時代錯誤的建議，卻認為此乃中國自己所造成，其政府及國民應深刻反省。⁵¹對在臺日人而言，要讓日本政府改變對中政策，轉而提供支援的「前提條件是國民政府的對日親善政策。萬一今後支那側的態度再變的話，當然帝國政府的方針及我言論界等輿論也將再轉為硬化」。⁵²一方面，中國不惜片面以強硬手段取回權益；另一方面，日本則從「天下的公論」等國際社會的角度批評中國之作為，不願輕易放棄條約權益。⁵³在此情況下，日中間當然會不斷發生糾紛，日中親善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空想」，在臺日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也逐漸消退。

三、1920 年代在臺日人之東洋文化觀

然而，儘管在臺日人對日中親善的觀點越來越趨於現實利益，但他們對東洋文化的重視則始終存在，甚至比他們對亞細亞主義關注還早出現。1915 年，美國傳教士 Sturge (Earnest A. Sturge, 1856-1934) 在大正天皇即位典禮上獻上聖經，⁵⁴當時已有日人認為基督思想源自東方，因此此舉代表著「東洋思想的勝利」。⁵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衰退論盛行，日人更主張「歐美文明僅剩物質性的一側面」，只有仰賴日本復興亞洲的「精神文明」，實現亞細亞主義，才能拯救亞洲民族。⁵⁶就連 1924 年前往歐美留學的臺北高商教授佐藤佐 (1891-?)，⁵⁷回國後都認為西方文明已然沒落，東洋人應回頭研究自身文化。⁵⁸在亞細亞主義影響下，西方文明更被認為是過度重視物質而忽略精神生活，不只是東方文明的相對，還正壓迫著東方民族。為了導正西方文明的缺陷，改善兩者不平衡的狀態，在臺日人

⁴⁹ 〈怪しから南京政府 排日の強制に斷然報復せよ〉，《臺日》，1927 年 6 月 30 日，第 2 版。

⁵⁰ 〈濟南事件と排日の對策 斷乎通商の權益を確保せよ〉，《臺日》，1928 年 5 月 9 日，第 2 版。

⁵¹ 〈意外なる日英協調説 之も結局は支那の自業自得〉，《臺日》，1928 年 12 月 2 日，第 2 版。

⁵² 〈好轉して來た日支關係 對日政策が行き詰つたため〉，《臺日》，1928 年 10 月 9 日，第 2 版。

⁵³ 〈排日の不法は天下の公論 政商一味の策動に英人怒る〉，《臺日》，1931 年 7 月 29 日，第 2 版。

⁵⁴ 有關 Sturge (1856-1934) 的生平與他和日本的關係，見 Ryô Yoshida, "Earnest A. Sturge,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Culture in California, 1885—1922", *American Presbyterians*, Vol. 74, No. 1 (SPRING 1996), pp. 17-29.

⁵⁵ 三村三平，〈東洋思想の勝利〉，《臺日》，1915 年 11 月 10 日，第 35 版。

⁵⁶ 純滂生，〈對支政策の確立と大亞細亞主義〉，《實業之臺灣》116 (1919 年 9 月 20 日)，頁 16-19。

⁵⁷ 佐藤於 1924 年前往德、英、美留學一年半。新高新報社，《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 257。

⁵⁸ 佐藤佐，〈行詰れる西洋文明（上）〉，《臺日》，1926 年 3 月 14 日，夕刊第 3 版；〈行詰れる西洋文明（下）〉，《臺日》，1926 年 3 月 15 日，夕刊第 3 版。

因此倡導日本具有調和融合東西文明，⁵⁹甚至廣布「精神的光明」之使命。⁶⁰

那麼，這個「東洋文明」究竟是什麼呢？在臺日人最先想到的或許是「大和魂」或「惟神之道」等日本傳統概念，這不只因為他們是日本人，還因為他們「當想到我帝國為東洋的盟主時也不禁產生了文化的自豪感」。⁶¹但是在臺日人所重視的東洋文明，不只是日本固有的傳統而已，其實還包括漢學、儒教。在戰後懷疑西方文明的風氣下，日本眾議院已於 1921、1922 年兩次通過「有關漢學振興之建議案」（漢学振興ニ関スル建議案），但都未具體付諸實踐。1923 年，眾議院第三次通過該議案，同時也編列相關預算，補助設立「大東文化協會」。隔年，協會所辦的「大東文化學院」正式開校。⁶²對此，《臺日》社論認為協會創立的真正意義，不只單純研究漢學而已，更是體會理解東洋文明的精神。⁶³當中國學者辜鴻銘（1857-1928）於 1924 年來到日、臺鼓吹中國文化的復興時，《臺日》社論也頗為讚賞，希望國民能因此反省對西洋文化的沉迷，發憤達成日本復興中國文明、東洋文明的使命。⁶⁴

除了辜氏的來臺外，住在臺灣島上的三百萬名漢人，肯定也對在臺日人有所影響。《臺日》社論不只強調中國、臺灣及日本人皆崇敬孔子，呼籲在臺日人對孔子廟的建設應「舉起雙手歡迎，極力援助其完成」，⁶⁵更希望總督府除了舉行隆重的孔子祭外，還應具體宣傳孔子道德、蒐集儒教圖書、募集選賞論文等，掀起以儒教為中心的社會運動，才能符合儒教的旨趣。⁶⁶一直到日中關係惡化後的 1928 年，在臺日人仍重視儒教，認為中國禁止孔子祭典的法令是「使東洋思想屈從於泰西思想之前」的「自殺行為」，將「在長期受儒教感化的東洋民族之間，引起精神生活上的一大騷動（センセーション）」。⁶⁷顯示即使亞細亞主義的呼籲於 1927 年後一時消退，他們仍舊重視臺、日、中的傳統漢學、儒教文化。

四、亞細亞主義與臺灣殖民觀之轉變

（一）在臺日人的情形

如前所述，無論是在臺日人的亞細亞主義觀，還是他們對東洋文化的看法，都不斷受身處的臺灣影響，他們也進一步思考亞細亞主義與殖民統治的關係。以

⁵⁹ 〈支那來遊中のタゴール氏 東方文明高潮と日本の使命〉，《臺日》，1924 年 5 月 22 日，第 2 版。

⁶⁰ 鈴木讓三郎，〈光明は東方より〉，收入臺北市教育社會課，《市民講演集》第十四輯（臺北：新高堂書店，1928），頁 42-44。

⁶¹ 有關大和魂及引用的文字，見村井无生，〈大和魂についての偶感〉，《第一教育》8:8（1929 年 9 月 2 日），頁 2-3；有關惟神之道，見鈴木讓三郎，〈光明は東方より〉，頁 29-44。

⁶² 大東文化大学創立七十周年記念事業記念出版推進委員会，《大東文化大学七十年史》（東京：大東文化学園，1993），頁 29-38。

⁶³ 〈東洋文化の研究熱と漢學 大東文化協會設立の真意義〉，《臺日》，1924 年 12 月 3 日，第 2 版。

⁶⁴ 〈隣邦の思想家辜氏の來臺 この人から聞く日本の使命〉，《臺日》，1924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⁶⁵ 〈臺北の文武廟建立計畫 内臺協力して完成させたい〉，《臺日》，1925 年 2 月 28 日，第 2 版。

⁶⁶ 〈孔子祭と督府の補助 社會教化に骨折らねば駄目〉，《臺日》，1927 年 9 月 22 日，第 2 版。

⁶⁷ 〈支那の孔子祭禁止令 儒教撲滅に等しい反動政治〉，《臺日》，1928 年 9 月 25 日，第 2 版。

伊藤政重為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他而言，除了是先前提到的「世界人文轉換之期」，還是「霸道」不行的「殖民政策一變」之時。⁶⁸他於 1916 年 1 月撰〈律令私論〉，開頭首先指出臺灣統治的成敗對日中關係的重要性：

深惟臺灣乃帝國南門之鎖鑰，亦西南發展之基地，住民三百餘萬的漢族，正是使大陸四億的民眾，感孚於陛下仁政之傳道使。必須據此地而制西南，倚此民而繫大陸之民心，確立亞細亞政策，定下東洋永遠之和平。為此臺灣統治不可付諸忽視。若夫一度統治失誤，將直接影響大陸之民心，阻害日支的親善，誤於帝國百年之大計。⁶⁹

既然臺灣與日本未來關係重大，且必須「未來永遠領有」，那就不能仿效西方「經濟式殖民地」的治理方式。因此伊藤認為，臺灣統治的兩翼就是在「漢族統御及母國臣民的安住」，要達成此兩個目的，唯有廢除允許總督發布律令的六三法⁷⁰不可。伊藤指出，六三法的支持者常有六種論點：一、臺日兩地風俗民情不同，只有總督才能理解，制定適合的法律；二、臺灣孤懸海外，總督須有立法權才能應付緊急狀態；三、臺灣島民未服王化，時常叛亂；四、總督須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才能使臺灣人信賴；五、臺灣沒有議員代表；六、在適合臺灣的法典制定前，必須由總督立法。

伊藤一一反駁上述論點：一、沖繩、樺太、北海道也與日本風情不同，但也毋須委任立法，且總督也不見得比議會理解臺灣事情；二、臺灣每月有十二回的定期船，交通不會不便，且總督立法亦須經內務大臣呈請勅裁，正與交通不便的理由相矛盾；三、現有律令幾乎能防範所有可能的叛亂了，不須再有立法權；四、總督的專制統治根本不能讓漢人悅服，更不能被母國人接受；五、在議會沒有代表與議會能否對之制定法律是兩回事，議會也能對國內沒有選舉權的人制定法律；六、如果要讓臺灣成為帝國永遠的領土，讓臺灣人同化的話，根本不須制定臺灣專屬法典，反而要施行母國法典。

總而言之，伊藤認為日中親善的關鍵，在於使臺灣人完全接收日本的統治、與日本人同化，同時也要使日本人願意在臺灣永居。為達成前者，不能只靠威壓，最終還是要給予臺灣人政治權利；對於後者，則必須保障在臺日人享受憲法的權利。一石二鳥的方法，就是廢止六三法，既有律令也要讓議會審核決定存廢，

以之示王道無私，仁政無親疏之事實。賦予憧憬故國、欲求自由權利之漢民族一道光明，勉勵使其不陷於自暴自棄，同時使母國人決意永久安住。⁷¹

儘管與學友會的建議在具體層面上不同，然在核心原則上，伊藤理想中的亞細亞主義統治同樣本於同化主義。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亞細亞主義的臺

⁶⁸ 伊藤政重，〈散臣危言〉，《實業之臺灣》（1917 年 11 月），頁 28-29。

⁶⁹ 伊藤政重，〈律令私論〉，《實業之臺灣》（1917 年 11 月），頁 29。

⁷⁰ 嚴格來說，六三法已在 1906 年被三一法取代，不過兩者皆允許總督委任立法，且時人大多繼續以六三法稱之，本文也按當時情形繼續沿用。

⁷¹ 伊藤政重，〈律令私論〉，《實業之臺灣》（1917 年 11 月），頁 39。

灣統治策再次浮上檯面，但這一次並未如前次石沉大海，反而因亞細亞主義者的活動而逐漸產生迴響。板垣退助（1837-1919）與林獻堂（1881-1956）會面後，於 1914 年 2 月來臺演講，強調「日本應作為亞細亞人，與支那提攜對抗白人」，而臺灣便是日中親善的關鍵。板垣回國後便鼓吹改善臺灣人的待遇，以臺灣人的同化作為日中親善的階梯。同年 12 月，臺灣同化會正式在臺北設立，然而隔年 1 月就被總督府命令解散。⁷²雖然板垣等人尚希望創辦報社、激起輿論關注，但受到 1915 年 8 月西來庵事件的刺激，臺灣人也停止了相關運動。⁷³

不過，自 1916 年開始，伊藤開始在日本國內宣揚廢除六三法。他被除名律師後，除實業外亦積極從政，曾數次回山梨縣代表政友會參選眾議員選舉，⁷⁴並始終關注臺灣統治問題。1916 年 1 月，其在政友會本部舉辦的茶話會上，批評六三法，內容與〈律令私論〉大同小異，可以認為〈律令私論〉正是為了他在日本的政治活動而寫。一直到 1920 年，他最後一次參選議員時，仍相信：

臺灣的領有具有特別的意義，臺灣是對帝國十分重要的土地。我相信〔日本〕必須以彼處為立足點向南向西發展。這就是我到今天為止，都不省微力，努力教化薰陶在臺三百萬人的支那人，使其成為帝國忠良臣民之原因。因此，就算沒有直接為鄉里之事盡力，我相信我在臺灣所澆的心血，對國家也有幾分貢獻。⁷⁵

除了在日本國內鼓吹廢除六三法，伊藤也長期與臺灣人來往。1906 年其轉任律師後，致力於啟迪民智，曾擔任臺北學院理事，⁷⁶又與羅秀惠（1866-1942）、洪以南（1871-1927）、王慶忠（1856-1925）、謝汝銓（1871-1953）、李漢如等人設「新學研究會」，其後雖因李漢如離臺而停頓，1910 年李漢如返臺後重新組織「新學會」，並辦《新學叢誌》，⁷⁷然不久即遭總督府勒令停刊。⁷⁸他也曾與林獻堂來往，根據蔡培火（1889-1983）的說法，大正初年時，在臺日人律師伊藤政重，以及來往日臺間之在野人久我懋正（新聞界人士），時常向臺灣人有識之士鼓勵廢除六三法，與林獻堂有所來往；⁷⁹據葉榮鐘（1900-1978）回憶，久我於 1916、1917 年左右與林獻堂接觸，⁸⁰至於伊藤的情形雖未言及，但從他倡導廢除六三法

⁷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 12-23。

⁷³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上）》（臺中：晨星，2000），頁 51-56。

⁷⁴ 可以確認的有：1908 年、1912 年、1915 年、1920 年四次。

⁷⁵ 長崎武，〈選良片影〉，頁 73-75。

⁷⁶ 〈學事彙報 臺北學院開院式〉，《臺日》，1909 年 7 月 28 日，第 2 版。臺北學院係以養成普通文官應試者的私立補習學校，學生有日本人，亦有臺灣人。〈學校卒業〉，《臺日》，1907 年 6 月 4 日，第 2 版；〈本島的教育狀況（四）〉，《臺日》，1907 年 10 月 1 日，第 2 版。

⁷⁷ 伊藤政重，〈發刊之辭〉，《新學叢誌》第一號（1910 年 8 月），頁 1-3。

⁷⁸ 李漢如，〈發刊之辭〉，《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頁 6-9。被停辦的確切時間不明，現存只到第三號（1910 年 12 月發行）。

⁷⁹ 蔡培火，〈日據時期臺灣民族運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十六次學術座談會〉，《臺灣文獻》16：2（1965 年 6 月），頁 176。

⁸⁰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上）》，頁 86-87。另外，久我於 1930 年代右傾加入右翼團體皇政宣揚會。皇政宣揚會，《真の叫》（臺北：皇政宣揚會，1936 年），頁 87。

的時點來看，應於同一時期。李承機也推測伊藤在 1910 年代中期後可能仍與臺灣人有來往。⁸¹從伊藤和林祖密的交誼，以及五國信託公司重役的組成來看，或許延續到 1920 年前後。這些和伊藤有來往的臺灣人中，林獻堂於 1918 年與東京臺灣留學生成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其後演變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⁸²蔡惠如同樣是留學生政治運動的重要推手；⁸³李漢如則受蔡惠如引薦參加《臺灣青年》雜誌社。⁸⁴ 在日治時期臺灣人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伊藤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比過去研究所認為的，甚至伊藤本人生前所能想像的還要重要。

1918 年，政友會黨魁原敬（1856-1921）受任內閣總理大臣，並於 1919 年任命田健治郎（1855-1930）為總督，正式採用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為總督府的施政方針。⁸⁵亞細亞主義者的理想看似已被總督府容納，實際觀察田健治郎的言行，卻不盡然如此。田雖然一方面對東洋文明極度推崇，不只向林獻堂等人說明「東洋文化之精神與西洋近世思想所分，論及漢學修養之不可忽諸」，⁸⁶還向來臺考察的中國人士「痛斥支那古今之弊習，論東洋文明之不可廢絕」。⁸⁷另一方面，他可能從未考慮與中國或其他亞洲諸國團結，對抗西方侵略。田於 1919 年 10 月擔任總督前曾與山縣有朋（1838-1922）談話，山縣向田說明：「我邦將陷孤立之境遇，米國之東洋政策將大壓迫日、支兩國，勉保調和，固不俟論，然斷不可傷國家之體面利權」，對此，田以「主說英、米及本邦相互經濟的競爭之實況，論我邦進取政策之急要」，回覆山縣。⁸⁸表面上來看，田所說的「進取政策」似乎是指對中國、南洋積極的政治進出，實際上只限於經濟層面。1922 年，田就未來的中日關係，向記者表示中國革命只限於政爭，社會仍然殘存，因此「日支關係便是只和其殘存的支那社會交涉，絕不可入政爭的渦中。換言之日支關係至少在現狀應從政治轉向經濟路線，即是貿易的振興」。⁸⁹

不像松本等亞細亞主義者把日中經濟交流當作是政治的一環，田明確地將經濟、政治兩者切割，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始終保持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予曾評唐亡於藩鎮跋扈，明亡於處士橫議，民國既備此二者，不亡而何俟。唯看舉國向亡國之墳墓而疾驅耳，可憐哉」。⁹⁰當郭春秧（1860-1935）向田提議「日支共同建設大要塞於臺灣海峽」時，田也明確認為「到底不可行之於今日，則諭示尚可遂

⁸¹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111-112。

⁸²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上）〉，頁 86-87。

⁸³ 詳見廖振富，〈從「富家公子」民族運動「啟蒙先驅」——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7（2013 年 10 月），頁 143-183。

⁸⁴ 李漢如，〈發刊之辭〉，《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頁 6-9。

⁸⁵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東京都：藤原書店，2008），頁 236-237。

⁸⁶ 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2009），1921 年 4 月 2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以下出版項略），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⁸⁷ 《田健治郎日記》，1921 年 6 月 18 日。

⁸⁸ 《田健治郎日記》，1919 年 10 月 15 日。

⁸⁹ 〈田總督の觀た支那は 所謂合從連衡〉，《臺日》，1922 年 5 月 24 日，第 2 版。

⁹⁰ 《田健治郎日記》，1923 年 7 月 1 日。

講究」。⁹¹其他像是以人種團結對抗美國的排日政策等說法，似乎也不在田的考慮中。1920 年，山縣向田表示，英美正協議介入太平洋事務，可能會影響日英同盟，使日本遭受孤立。田則認為最好的方法乃是日、英、美三國協約，以日本自行禁止移民，換取俄國東部及薩哈林島的處分權，如此將「保障日本民眾之生存，同時根絕英、米人種鬥爭之禍根唯一之良法」。⁹²

至於田的同化觀，終究也未如板垣、伊藤一樣積極。田雖然對外表示日本的統治方針「不在利源的、策源的殖民視，在為內地延長視」，但仍須「漸次舉同化之功」，才能「全然廢撤內臺人之差別」。因此，1921 年制定的法三號雖然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根本精神，規定日本國內法律原則施行於臺灣，但總督的委任立法權未被廢除，僅被削弱而已，臺灣異法域的地位不變。⁹³法三號甚至不像其前身附帶實行時限，田向林獻堂等人說明原因：「以達臺灣同化之大目的，不可豫限定歲月之故也」，⁹⁴實際上卻到了 1945 年日本統治結束時仍未廢除。

不只總督府官員少有亞細亞主義的理念，對於積極推動同化興趣缺缺，日本國內的殖民學界也傾向批評同化主義，⁹⁵臺灣人的社會運動更已不以廢除六三法為重點，而是為了保有臺灣特殊性，轉為鼓吹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⁹⁶

從亞細亞主義的角度來看，臺灣既然是日中、亞洲提攜共同對抗西方的關鍵，現實上臺灣人未被同化，甚至不滿日本統治，應該會使受亞細亞影響的在臺日人感到不滿。不過，在整個 1920 年代，卻難見到在臺日人的相關批評，其原因可能與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有關。根據總督府警務局編的《臺灣社會運動史》，臺灣社會運動在 1926 年末到 1927 年初發生飛躍性的成長，其契機乃是臺灣文化協會內部的分裂。在左派方面，形成文協、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等主導的無產階級運動；在右派方面，文協的舊幹部另組成臺灣民眾黨繼續爭取權利；此外，無政府主義團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也於 1926 年末組成。⁹⁷在此之前，在臺日人可能都接受了總督府的對外說詞，以《臺日》記者安達常助寫的〈大臺灣的建設〉為例，文中首先提及臺灣統治「一視同仁」的善政及種種治績，接著才強調臺灣統治的目的，尚有透過臺灣實現日中共存、維持東亞和平等之意義。⁹⁸可見在安達眼中，與板垣、伊藤不同，臺灣統治的成功，不是一尚須達成的目標，而是一既成的事實，無須深入檢討。

到了 1927 年以後，臺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甚至矢內原忠雄（1893-1961）

⁹¹ 《田健治郎日記》，1920 年 4 月 14 日。

⁹² 《田健治郎日記》，1920 年 8 月 2 日。

⁹³ 王泰升，《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16-17。

⁹⁴ 《田健治郎日記》，1921 年 1 月 31 日。田對同化的消極看法，可能是受明確反對同化的下村宏影響，見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頁 253-257。

⁹⁵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頁 175-194。

⁹⁶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上）》，頁 89-93。

⁹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6-8。

⁹⁸ 〈グレート臺灣の建設〉，《臺日》，1921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等日本國內學者都著書批評臺灣殖民的不當，在臺日人才需要認真反思臺灣的殖民統治。《臺日》社論或以日本、臺灣「同文同種」關係正當化同化的可能性，或以日本資本對臺灣的貢獻說明臺灣統治非屬歐美「帝國主義」式，⁹⁹雖顯現出戰後對西方文明的質疑，究其內容卻沒有探討與亞細亞主義的關係。如前所述，1927 年後，亞細亞主義的討論減少，遂未能成為其論述主軸。就算他們已運用了人種的二分法，認為「白人與有色人種間最終仍難以越過的『皮膚上的不同』正是民族間的區別標識」，最終仍未將此說法連結到人種團結對抗外敵，反而強調：

因為今日與白人文明國為伍，能夠展現其國威的有色人種國唯有日本。諸君〔臺灣人〕既然是有色人種，能成為日本帝國臣民，必定是作為個人也作為國民，最多幸多福的一件事。¹⁰⁰

1920 年代在臺日人不只易受總督府說法影響，對亞細亞主義的接受也終究不夠徹底。為了找到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問題的接點，可能要暫時離開臺灣，前往日中親善的前線：當時尚在中國主權範圍，但也是日本勢力範圍的東北（滿洲）。在滿洲的日本人中，對此問題討論最多的，正好是當年重視科學化的殖民政策，對臺灣統治影響最大的後藤新平。

（二）前往中國東北（滿洲）的後藤新平

為了處理日俄戰爭後獲得的南滿洲利權，西園寺公望（1849-1940）內閣於 1906 年 1 月設立「滿洲經營委員會」，委員長由參謀次長、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兼任。¹⁰¹ 4 月，兒玉轉任參謀總長，在兒玉、西園寺、原敬等政府高層力邀下，後藤也於 11 月正式辭去民政長官，就任新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¹⁰²

然而，後藤要面對的，絕非單純的企業經營而已，滿鐵的運作其實更與日俄戰後日本的外交息息相關。第一是日美關係，1905 年 10 月，美國鐵道大亨哈利曼（Edward Henry Harriman, 1848-1909）和日本首相桂太郎（1848-1913）達成預備協議，約定共同經營日本新獲得的南滿洲權利，雖然協議在小村壽太郎（1855-1911）的反對下被廢棄，但美國資本仍希望能進入滿洲；¹⁰³第二是日清關係，南滿洲利權雖然已由日本掌握，但主權仍在清朝手中，自 1907 年開始，清朝開始改革東北，除了因應移民的大幅增加外，也為了與當地的日、俄勢力抗衡，新任奉天巡撫、曾留美的唐紹儀（1862-1938）更積極與美國人接觸以遏止日本；最後是日俄關係，戰後日本僅獲得南滿利權，北滿仍在俄國勢力範圍中，為了實

⁹⁹ 〈臺灣の統治は帝國主義的か 外國の植民地策とは大相違〉，《臺日》，1927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臺灣は榨取されてるか 帝國主義的だとの論を評す〉，《臺日》，1930 年 9 月 14 日，第 2 版。

¹⁰⁰ 〈同化政策は不變改の鐵則 始政記念日を前に敢て言ふ〉，《臺日》，1929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

¹⁰¹ 宿利重一，《兒玉源太郎》（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2），頁 745-747。

¹⁰² 關於後藤決定就任滿鐵總裁的過程，參見王麒銘，〈後藤新平與臺灣總督府顧問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4（2020 年 12 月），頁 83-100。

¹⁰³ 外務省編纂，《小村外交史（上）》（外務省藏版）（東京：米田圓，1953），頁 204-215。

際的鐵路經營，也為防止俄國南下復仇，必須與俄國來往。面對複雜的外交局勢，後藤的策略首先是「文裝的武備」，亦即透過文化、社會層面的建設，加上大量移民，厚植日本勢力於滿洲，¹⁰⁴接著則是後藤寫在〈嚴島夜話〉中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舊大陸對峙論」。¹⁰⁵

〈嚴島夜話〉一文確切的寫作時間不明，但應該是在 1924 年前後開始構想，¹⁰⁶1926 年 12 月以後定稿。¹⁰⁷內容主要關於後藤於 1907 年參拜嚴島神社時，與朝鮮統監伊藤博文（1841-1909）的一場對話，談話的重點則在日本的東洋政策。如後藤所述，「明治四十年初春以來，東亞之形勢呈現更加混沌之狀」，慈禧仍垂簾聽政，美清同盟說四起，傳聞唐紹儀將渡美有所為，後藤遂與伊藤約定在嚴島見面，討論東亞將來及對中政策。談話一開始，後藤便開門見山地建議伊藤辭去統監，前往大陸漫遊，首先訪問慈禧（1835-1908），告以若美國不能廢除一切差別待遇，給予中國人人種、法律上的平等，則美清同盟必然不能持久，還會對東洋將來造成危害。慈禧聽聞此語，必會召集袁世凱（1859-1916）、慶親王（1838-1917）等人商議，清廷重臣也將因此獲得啟發、自覺。伊藤漫遊的目的，也就是：

啓導支那之有力者，使其會得國際上之真知見，然後讓其悟入東洋人之東洋，亦即大亞細亞（Pan-Asia）主義之本旨，此正所以大定東洋和平之根本策云云。¹⁰⁸

聽聞此語，伊藤突然打斷發言，認為「大亞細亞主義」之說會引起國際反彈，使黃禍論流傳，據後藤的說法，兩人對此議題激辯兩天，最後伊藤雖然同意其主張，但仍認為不宜輕易發表，也認為中國政治家不可能理解其本旨。於是，後藤接著提出第二策「新舊大陸對峙論」，亦即透過歐亞聯合，形成「舊大陸同盟」，對抗新大陸的美國。後藤自言，經營滿鐵的目的，同樣是為了「東西文化的融合，即聯絡結合歐亞兩文明」。伊藤最初雖不以為然，但經過後藤的說明後，總算在談話的第三天回覆：「可也，在熟慮後將奮力以期實行之」。¹⁰⁹

〈嚴島夜話〉，確如鶴見祐輔所稱，是後藤留下的手記中相當首尾一貫，且富含戲劇性的逸品。雖然對談日期、時間與事實不合，¹¹⁰部分戲劇性內容或許是

¹⁰⁴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1986），頁 371-402。

¹⁰⁵ 有關後藤對中國、俄國、美國的外交構想，另可見北岡伸一，〈後藤新平 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8），頁 103-115。

¹⁰⁶ 後藤曾在 1924 年請廣島縣警察調查他和伊藤參拜嚴島的確切日期，鶴見推測是為了寫作〈嚴島夜話〉。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956-957。

¹⁰⁷ 據《後藤新平文書》所藏的〈嚴島夜話〉打字稿，最後為「勉強拈秃筆畢之，時昭和 年 月 日也」，〈嚴島夜話 故伊藤公ノ遺囑、對支及對米問題解決ノ秘鑰〉，《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H-61-1。

¹⁰⁸ 〈嚴島夜話 故伊藤公ノ遺囑、對支及對米問題解決ノ秘鑰〉，頁 9；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960。

¹⁰⁹ 〈嚴島夜話 故伊藤公ノ遺囑、對支及對米問題解決ノ秘鑰〉；原文另可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955-977。另外，伊藤而後果真辭去統監，準備前往大陸漫遊，但在旅行開始不久就遭暗殺身亡。

¹¹⁰ 〈嚴島夜話〉記載對談日期在 5 月，時間一共三天，實際上應在 9 月，時間僅一天。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956-957。

事後穿鑿附會，但仍可認為「大亞細亞主義」、「新舊大陸對峙論」兩論確實都是後藤當時的想法。1907 年 5 月，後藤曾向袁世凱建議日中籌組「筷子同盟」，以圖亞洲復興。¹¹¹1908 年，得知清朝預定建設與滿鐵平行的法庫門鐵路後，後藤也在致袁世凱的備忘錄中強調日清兩國在歷史、人種上是最好的友邦，若法庫門問題未得妥善解決，日清兩國因此對立，將影響東洋全局之和平，更會使黃色人種無法充分預備未來的人種競爭。¹¹²

雖然後藤基於「新舊大陸對峙論」，同時也推動日俄親善，但是滿洲的錯綜局勢，確實讓他早於一般人接受亞細亞主義，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再次強調「亞細亞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不可使亞細亞以外之人干涉其治亂」，建議日本應依循「亞細亞『門羅』主義（亜細亜『モンロー』主義）」即「泛亞細亞主義（パンアジアチスムス，即德文 *Panasiatismus* 音譯）」行動，致力使紛爭停息。¹¹³

不只試圖用亞細亞主義解決中日問題，身為殖民專家的後藤進而開始思考亞細亞主義與殖民的關係。1914 年 5、6 月間，後藤發表一連串題為〈日本殖民一斑〉的演講，內容主要關於臺灣、滿洲殖民政策實行的過程、特色。演講最後，他提到一則從中國四川省獲得，標題是〈大亞細亞主義〉的文書，並指出滿蒙政策必須立足於亞細亞主義、人種統一策，使當地人歸依日本。¹¹⁴ 1915 年的《日本植民論》，同樣在說明臺灣殖民過程後，重覆了上述說法，並稱「我國殖民事業的成敗不只與我國有關，實際上更是與全亞細亞死活有關的問題」。¹¹⁵ 那麼，究竟何種殖民政策才能實現亞細亞主義的理想呢？後藤的答案，就是《日本膨脹論》中提及的「文化政策」。

《日本膨脹論》寫於 1916 年，正處於戰時懷疑西方文明的氛圍中。後藤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終結 19 世紀以來的近代文明，並帶來 20 世紀新文明的誕生，此新文明將以民族主義為主軸，更重視國家內部精神上的結合、民族自然具有的本能，以及民族具體擁有的歷史背景。全書主旨強調日本既然具有他國無法相比的獨特歷史、國體，日本人就必須有所自覺，努力向外發揚固有國粹。後藤將此過程稱為「日本民族膨脹」，其過程並不依循「舊殖民政策」，而是依「新殖民政策」，或者更應稱為「文化政策」（*Kulturpolitik*）。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傾向器械的、武斷的膨脹」，後者「以有機的、文化的膨脹為主」。¹¹⁶ 具體來說，就是要用「科學式的調查研究」為原料，「一視同仁地以同胞兄弟主義」對待新殖民地的人民。¹¹⁷

1928 年，後藤為伊能嘉矩（1867-1925）的《臺灣文化志》起草序文，雖然該序文最終未得公刊，仍可藉此一瞥他對臺灣殖民的看法：

¹¹¹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924-925。

¹¹²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 1001-1002。

¹¹³ 〈亜細亜は亜細亜人の亜細亜にして 云々〉（1912 年 1 月 15 日），《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W3-51-1。

¹¹⁴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21），頁 114-116。

¹¹⁵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頁 96-101。

¹¹⁶ 後藤新平，《日本膨脹論》（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4），頁 196-197。

¹¹⁷ 後藤新平，〈新轉機に立つ植民政策〉，《東洋》25：1（1922 年 1 月），頁 2-6。

予以前即相信臺灣統治的妙趣必須從人類學乃至生物學中尋得，雖可參考歐美諸國的殖民政策，苟步上侵略政策之後塵，成效亦不能□□。¹¹⁸遂排斥一切，決定獨自展開研究調查，首先尊重存在臺灣的舊慣古例，以掌握其基礎為目的，獨立設置舊慣制度調查的一機關。¹¹⁹

當後藤成為民政長官，籌畫治臺政策之初，他仍積極參照西方殖民前例，但自 1910 年代以後，後藤對殖民政策的看法，卻越來越像他曾反對的學友會，不只以「文化政策」的觀點否定西方殖民政策，批評其為「侵略政策」，還強調「一視同仁」及宣揚日本精神的重要。關於此一轉變，春山明哲在述及後藤離臺後寫作的《日本植民政策一斑》、《日本植民論》、《日本膨脹論》等著作時曾問道：究竟「文化政策」是否代表著後藤思想的轉變，還是實為後藤一貫理想的表現？春山也認為，當檢討後藤思想時，也需留意他的亞細亞主義。¹²⁰ 依春山的看法，或許可以認為，儘管後藤未否定近代科學的重要性，也未否定舊慣調查等實際在臺灣、滿洲實行過的政策，在亞細亞主義的影響下，後藤也賦予近代科學遠比協助殖民統治更進一層的意義。亦即，這些對殖民地的調查研究，乃是讓當地人民接受日本文明、國粹的重要關鍵，而當臺灣、滿洲的漢人都真心服從日本統治時，日中親善乃至亞細亞主義的理想才能夠真正實現。既然都基於亞細亞主義，後藤對殖民的看法越來越與學友會類似，也不令人意外。

從《臺灣文化志》序來看，與歐美各國在東南亞、南亞的統治相比，日本在臺灣的統治在後藤眼中應屬成功，他也才能侃侃地談論「文化政策」與「日本膨脹」或日中親善的關係。多數在臺日人雖未深入檢討亞細亞主義與殖民臺灣的關係，但同樣帶著類似的看法。不過，究竟 1920 年代的臺灣人，對於亞細亞主義是否具有和日本人相同的看法，乃是下一節將探討的問題。

¹¹⁸ 此處似為「成效を問はず」，但語意不通順。

¹¹⁹ 〈台湾文化史に就す〉（1928 年 9 月），《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W2-14-4。

¹²⁰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頁 332-337。

第三節 1920 年代臺灣人之亞細亞主義觀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人之亞細亞主義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亞細亞主義議論的延續

第一次世界大戰激起了日本國內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更透過《臺日》漢文欄的翻譯傳入臺灣，除了前述中島氣崢的〈大和民族之天職〉外，自 1916 年 2 月以降也連載濤樓¹摘譯中島端（1859-1930）²的《支那分割之命運》。該書原著於 1912 年，共分上下兩篇，上篇闡述中國現狀，下篇則是講述中國必遭分割的命運及對日本國民的建議，出版後受到中國留學生、知識分子的極力抨擊，北洋法政學會更出版《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指責該書鼓吹日本侵略中國。然而中島之本意並非鼓吹侵略中國，書中雖然舉出各種例證強調中國的共和制度必定會失敗，但仍寄望於「東亞之們羅主義」，亦即：

亞細亞人之事，皆亞細亞人自理之，不須歐美人之干涉也。更小而言之，支那廿一省之事，亦惟支那人自理之，不煩他國人之掣肘也。³

中島接著表示，無論中國欲採君主或共和制，日本都不應替中國決定。日本的任務，在於使中國自立自強，進而協力開拓亞洲未來，抵抗白人東漸而已。⁴

按中島自幼學習漢學，對中國文化懷有一定的感情，清末曾在中國從事翻譯數年、親眼見到中國現狀的經歷，使其對中國民族的未來失去信心。受該兩種互相矛盾的感情影響，書中雖然不斷批評中國的落後，指出中國難逃分割之命運，「們羅主義之實現，亦不知何日」，⁵仍呼籲日本絕不可參與分割，反而應加強國力、扶持中國，以達成黃種統一、世界和平的理想。⁶從此一角度觀之，不難理解濤樓摘譯該書的原因，其自述當時正值袁世凱稱帝，各地紛紛出師反對，中國陷入「是不我割，而我將自割」的狀況，不只內部紛爭可能永無終止之日，更可

¹ 本名不詳，曾在《臺日》漢文欄刊載小說〈雙浦珠〉、〈馬利亞〉、〈色魔劫〉等數篇，另外也曾翻譯關矢充郎所著的《怪傑袁世凱》。

² 中島端，東京人，又名端藏，字儼之，號斗南，別號有復堂、勿堂、勿、忽堂野人等等。其父中島慶太郎（撫山）為漢學私塾教師，中島端也自幼修習漢學。1902 年至 1911 年時在中國從事翻譯，也曾應羅振玉（1866-1940）之請從事教育，1911 年回國後從事著述。其侄中島敦（1909-1942）曾寫作〈斗南先生〉一文描述其生平及兩人的關係。後藤延子，〈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とその周辺（二）：一アジア主義者の選択〉，《人文科学論集 人間情報学科編》40（2006 年 3 月），頁 132-142。

³ 〈支那之運命（八十）〉，《臺日》，1916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⁴ 〈支那之運命（八十）〉。

⁵ 〈支那之運命（九四）〉，《臺日》，1916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⁶ 關於中島端的生平，以及《支那分割之運命》的內容與北洋法政學會的批評，詳見後藤延子，〈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とその周辺（一）：一アジア主義者の選択〉，《人文科学論集 人間情報学科編》39（2005 年 3 月），頁 177-197；〈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とその周辺（二）：一アジア主義者の選択〉，頁 123-145。

能再次引起列強干涉瓜分，進而傷及日本。⁷

此時已在日本統治下的濤樓，不像北洋法政學會之知識分子，對共和懷抱著切身的熱情，反而對中國未來帶有悲觀態度。同時，卻不希望中國遭分割，擔憂中國「再演義和團之慘劇」，其立場實與中島相仿。這也是濤樓決定翻譯該書，並「願讀是書者，直視為當頭之喝棒」的原因。⁸

戰爭期間自日本國內傳入的亞細亞主義思想與日中親善觀，不斷刺激著相關討論，尤其是 1915 年，中日關係因二十一條要求而急速惡化，中國各地紛紛排斥日貨時，不少文人就運用了亞細亞主義的說法鼓吹兩國親善。周維金（1882-?）撰〈支那受外國割據之由及當日支親善之論說〉，文中數次強調中國受各國割據的根本原因是「不能自強」，只有與同文同種的日本合作，共同經營鐵路、貿易等事業，並推動教育、軍事改革，才能保障中國民眾的幸福，甚至還要進一步團結全亞洲，在安南、印度沿海築起要塞，防止入侵，向歐洲「展其東洋之雄霸」。當然，其團結的前提，仍是各國「須協和各不可輕侮，須以正理人道為友誼之交際」。⁹

海山文人黃純青（1875-1956）寄贈時任閩報主筆魏清德（1887-1964）的詩中，同樣提及亞洲人應共同抵禦「白禍」：

同文同種視同仁，唇齒相依形影親，願囑先生寫白禍，喚醒黃色亞洲人。¹⁰

當戰後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反日潮流再次興起時，臺灣人同樣以亞細亞主義號召日中親善。由「一島人」匿名投書的〈日支親善管見〉一文，即是其例，其開頭即謂「日支同文同種，唇齒輔車」等說法，乃是「就黃白種將來大勢立論」而確切不移，卻經常被視為老生常談或外交辭令。¹¹然而，當下卻是「日支不親善」。該文認為，箇中原因有三，其一是日中兩國相近而利害衝突多；其二是外人往往煽動中國排日；但最重要的，還是兩國國民欠缺自覺，即是：

兩國民無論何等階級，皆深信日支親善為愛國第一真理，互相尊重權利，盡應盡義務，不受政黨利用為政爭之具，或受外人煽動使嗾；不以個人債事，不眩惑於眼前小利小益，貽誤兩國百年大計。¹²

在具體實踐上，該文則有：一，兩國言論界共同鼓吹親善，中國取消排日宣傳，日本報紙也停止輕視中國；二，日本率先除去外國對中國的壓迫；三，日本可利用漢學增進兩國交流；四，邀請中國人士來臺觀光，「使彼具體的了悟日本為正義之國，不同於歐美虐待異人種殖民地之土人」，等各項建議。

⁷ 〈支那分割之運命（譯者識）〉，《臺日》，1916 年 2 月 28 日，第 3 版。

⁸ 可惜的是，濤樓在翻譯完《支那分割之運命》下篇第一章「東亞之們羅主義」後，就專注於翻譯《怪傑袁世凱》一書，之後似未接續翻譯完全書。

⁹ 周維金，〈支那受外國割據之由及應當日支親善之論說〉，《臺日》，1915 年 7 月 14 日，第 6 版。

¹⁰ 黃純青，〈寄贈閩報館魏潤菴社兄〉，《臺日》，1915 年 10 月 22 日，第 6 版。

¹¹ 〈日支親善管見（上）〉，《臺日》，1919 年 11 月 22 日，第 5 版。

¹² 〈日支親善管見（下）〉，《臺日》，1919 年 11 月 26 日，第 5 版。

〈支那受外國割據之由及當日支親善之論說〉及〈日支親善管見〉兩文，可說是延續了日治初期士紳的看法，一方面，雖然已接受了日本統治，而以日本利益為本位思考日中關係，另一方面，仍呼籲兩國都應平等、合理地對待對方。面對現實日中關係的惡化，臺灣人對如何實踐日中親善，也積極提出包括增進交流等具體建議，並不遜於同時代的在臺日人。

（二）戰後初期臺灣人的中日親善行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活化了臺灣人的議論，大戰期間日本與中國愈加密切的政經交流，也讓部分臺灣人進一步採取行動實踐亞細亞主義。其中一例，是事業跨足日本、中國、南洋等地的富商郭春秧。

郭春秧出身福建同安，早年曾至爪哇依附其伯父郭河東，而後來臺，在大稻埕設立錦茂茶行（郭河東貿易公司），從事包種茶的產銷，遂因此致富。日本領臺後，以臺灣籍民的身分，繼續在各地經商。¹³1919 年 4 月，他回臺演講〈日支親善真義〉，表示：「東洋真文明國，性〔按：應為惟之誤〕日本一國而已」，其他國家則受歐美國家迫害已久，至於中國雖然未受侵害，但在政府惡政及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下，也陷入混亂。郭氏接著認為，只有仰賴孔教，才能拯救中國，而欲恢復孔教，中國必須取法實行孔教最成功的日本。郭並指出，日中親善必須透過實踐，日本人應改變歧視中國的態度，取消對中國不平等的護照、領事裁判。最後，強調「臺灣為製造日支親善最利便之地，島民之理解新政府文明亦大」，指出臺灣人在推廣日中親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¹⁴

郭氏之後確實致力於孔教的提倡。5 月，郭氏與日本首相原敬會見，再次建議以提倡孔教實現日中親善、排除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希望政府出資補助。原敬雖然支持，卻表示不能承諾資助。¹⁵6 月，郭氏在離開日本前，再次拜訪原敬，說明自己將出資在廈門設立提倡孔教之組織，希望日本政府後援，並獲原敬贊同。¹⁶7 月，郭春秧在福建成立「孔聖大道會」，其自述設立動機是以經濟救濟改善中國民眾生活，以避免西方思想流入中國，影響中日關係甚至是臺灣社會的和平。¹⁷

具體措施，除了到各地演講宣傳孔教思想外，還要建設學校、醫院，對抗歐美在中國經營的社會事業，實現日中親善。¹⁸郭春秧對孔教的鼓吹可說是不遺餘力，1921 年，郭氏也協助在香港成立中華聖教總會，擔任該會永遠名譽會長，又利用了孔聖大道會的多餘經費，資助興建孔道宣講堂。在宣講堂開幕致詞中，郭氏雖然沒有提及日中親善，依舊相信宣揚孔教是解救中國之道：「竊思我國孔教，

¹³ 關於郭春秧的生平活動，可見釋明瑛，〈被遺忘的豪紳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臺灣學研究》20（2016 年 12 月），頁 31-68。

¹⁴ 郭春秧，〈日支親善真義〉，《臺日》，分別刊載在 1919 年 5 月 16 日，第 6 版；1919 年 5 月 18 日，第 6 版；1919 年 5 月 20 日，第 5 版。

¹⁵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冊（東京：福村，1981），1919 年 5 月 15 日，頁 93-94。

¹⁶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冊，1919 年 6 月 6 日，頁 103。

¹⁷ 〈郭氏談孔聖大道會〉（上），《臺日》，1920 年 5 月 1 日，第 6 版

¹⁸ 〈郭氏談孔聖大道會〉（中），《臺日》，1920 年 5 月 2 日，第 6 版

吾敢斷言其有則中國可興，若廢則中國必亡。」¹⁹

然而，孔聖大道會進一步的計畫，卻未得到日本政府的完全支持。1920 年 4 月，郭氏訪問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陳述關孔聖大道會設立意見」，田卻認為「其意雖甚美，如會員有其所得十分一提供之義務，又如日支共同建設大要塞於臺灣海峽，到底不可行之於今日，則諭示尚可遂講究」。²⁰ 廈門總領事也指出郭春秋曾在慶祝 60 歲生日的宴席上，有不利於日本的發言，其性格也有虎頭蛇尾、善變的毛病。因此，郭氏雖然捐給臺灣銀行三十萬圓作為孔聖大道會基金，日本政府並沒有後續響應。1923 年，關東大地震爆發後，郭氏遂將此筆資金轉用於賑災，孔聖大道會也無疾而終。²¹

前曾述及的李漢如，則是另一個例子。在新學叢誌被停辦後，李漢如於 1911 年前往中國從事實業。與郭春秋不同，李漢如並不是主導者，而是在日中經濟交流日益增加，日人紛紛呼籲日中合辦之時，穿梭於其中的中介者。一戰爆發後，李漢如從事出口糧食銅鐵事業，並透過日本浪人宮崎²²取得日人資金，與直隸省訂立炮鐵買賣契約。²³1918 年，李漢如又與許冀公(ca.1869-?)²⁴、澤來太郎(1866-1922)²⁵、佐佐木高等人，擬援中華匯業銀行例，向北平政府申請組織華僑實業銀行，資本總額一千萬圓，其中中方七成、日方三成，²⁶不過之後似未成功設立。

1920 年，伊藤政重、山本久顯(1870-?)²⁷等人透過李漢如的介紹，與楊度設立五國信託公司，²⁸李漢如擔任專務理事。如前所述，該公司不少重役是臺灣人，當 1921 年五國信託公司改組為五國銀公司(不久改名六國銀公司)時，多數仍續任重役。六國銀公司主要從事放貸業務，然其經營並不順利。1922 年，北平國立八校因政府積欠經費，希望先自行向六國銀公司借款，雙方已同意借款內容，卻因當局阻撓而未果。²⁹除了當局阻撓外，中國輿論也將六國銀公司視為日本攫取利權的工具，1924 年，傳聞武昌自來水公司將向六國銀公司借款，即被批評為斷送利權，遭到在京湖北人的反對。³⁰六國銀公司或許不像中國輿論之指控，是為了實行經濟侵略而成立的企業，但在民族主義氛圍高漲的情況下，必然飽受類似批評，加上六國銀公司始終經營不善，伊藤、山本遂被視為「騙棍」，至於李漢如，不只被稱作「臺灣賣族的走狗」，還被提告侵占股份、詐欺取財。

¹⁹ 〈本會孔道宣講堂開幕紀畧〉，《中華聖教總會樂天報》19(1922 年 1 月 1 日)，頁 12-17。

²⁰ 《田健治郎日記》，1920 年 4 月 14 日。

²¹ 釋明瑛，〈被遺忘的豪紳郭春秋：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頁 60-61。

²² 此人可能是宮崎滔天之兄宮崎民藏(1865-1928)。按宮崎民藏曾與許又銘、李漢如等人於 1920 年參與暹羅株式會社的創立，詳見後述。

²³ 〈所謂六國銀公司國際交易所之大黑幕再披露〉，《京報》，1924 年 7 月 17 日，轉引自波多野乾一編，《現代支那之紀錄》1927 年 7 月(燕塵社，1924)，頁 235-239。

²⁴ 許冀公，新店人，原名許又銘(ca.1869-?)，詳見後述。

²⁵ 澤來太郎，宮城人，曾任眾議院議員，

²⁶ 〈又有一中日合辦銀行〉，《民國日報》(上海)，1918 年 6 月 24 日，第 7 版。

²⁷ 山本久顯，高知人，實業家，曾任南日本製糖專務取締役等職。

²⁸ 〈國際交易所之大黑幕(續)〉，《民國日報》(上海)，1921 年 6 月 30 日，第 3 版。

²⁹ 〈京教育界催索積欠〉，《申報》，1922 年 8 月 8 日，第 6 版；〈京學界日在奔走經費中〉，《申報》，1922 年 8 月 10 日，第 7 版。

³⁰ 〈六國銀公司與武昌自來水〉，《申報》，1924 年 7 月 31 日。

六國銀公司的失敗，並沒有讓李漢如放棄呼籲日中親善。1928 年，李氏受託前往東京「接洽國事」，與時任首相田中義一會面，席上便贈詩云：「睡獅醒可待，逐鹿事猶狂，順道揮同軌，櫻冠救闌牆，東風如有便，一為借周郎」，希望日本協助中國穩定局勢。³² 北平東亞協會³³於 1929 年發行的會誌《東亞協會會刊》中，也收錄李氏所撰〈日本親善之研究〉。文中首先認為日中兩國在地理、歷史、文化、人種上關係密切，接著批評日本外交向來依循歐美帝國主義的方針欺凌中國，兩國關係也因此惡化；相對地，「居心最狡、慮事尤深」的美國，雖然是為自身利益而提出「保全領土」、「開放門戶」等政策，最終卻對中國有利，「我認之為仁可也，是我之親美情也，亦誼也」。李氏遂建議日本對中外交不應追隨歐美，應因應中國重情的民族精神，「不拘外交形式，開誠相見，用指導保護方針，抱唇齒輔車關係，加以互相尊敬，互相利益」，方可增進兩國關係。除了外交政策外，李氏指出兩國外交官同樣是造成關係惡化的原因，日本外交官往往輕視中國，因細故而發動交涉，中國外交官又缺乏見識，遂使中國飽受損失，國民也因此排日。最後，李氏認為日本在日俄戰爭戰勝俄國，阻止俄國繼續南下，是中國得以保全門戶的主因。³⁴

與「賣族」的指控相反，李氏的看法並沒有一面倒地傾向日本，反而客觀地指出兩國外交的弊病，並希望兩國未來能彼此尊重，如兄弟般友好往來。李氏之所以舉出美國為例，同樣是對日本呼籲，唯有在現實上實行對彼此有利的政策，才可真正實現兩國親善。

臺灣人既屬漢民族，又屬日本國民的身分，不只使領臺初期的士紳提出亞細亞主義主張，隨著一戰之後中日兩國交流的增加，臺灣人也進一步利用此身分實踐亞細亞主義。郭、李兩人的行動雖有不同，但都採用了一種模糊的身分——面對中國人時是華僑、面對日本人時是臺灣籍民，遊走在中日兩國間，試圖為兩國當下的惡化關係，尋求雙方都能同意的解決之策。以郭氏而言，振興儒教，以東洋傳統驅散西洋思想，是促進中日親善的關鍵；以李氏而言，除了參與中日合辦事業及往來兩國促進親善外，臺灣人的身分也使他能公平地評價兩國的外交政策，並藉此提出建議。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李氏的行動似乎也不像中國輿論般負面，連橫（1878-1936）曾評價李氏在實業界中「決策運籌，飛揚騰達」，³⁵《臺日》漢文欄則稱李氏「奔走國事，頗收成效」。³⁶

³¹ 〈國際交易所之大黑幕〉，《民國日報》（上海），1921 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所謂六國銀公司國際交易所之大黑幕再披露〉，《京報》，1924 年 7 月 17 日。

³² 〈田中首相邀飲腰越別墅即席賦贈（同席惟山本氏）〉，《臺日》，1928 年 7 月 12 日，第 4 版；〈無腔笛〉，《臺日》，1928 年 7 月 14 日，夕刊第 4 版。

³³ 1927 年，中、日兩國人士為促進兩國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在北平成立東亞協會，其成員包括清浦奎吾、芳澤謙吉、若槻禮次郎、坂西利八郎、趙爾巽、王士珍、汪大燮、張學良、張宗昌、楊宇霆、顏惠慶等人。〈東亞協會竟成立〉，《臺日》，1927 年 1 月 30 日，第 4 版；〈東亞協會章程到滬〉，《申報》，1927 年 3 月 7 日，第 10 版。

³⁴ 〈日本親善之研究〉，《東亞協會月刊》（1929 年 4 月），頁 4-12。

³⁵ 〈餘墨〉，《臺灣詩薈》9（1924 年 10 月），頁 31。

³⁶ 〈無腔笛〉，《臺日》，1928 年 7 月 14 日，夕刊第 4 版。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述及的許冀公（又名許又銘）同樣出身臺灣。據《臺灣列紳傳》，許氏在乙未時曾協助搜索匪徒，「受賞十數回」，1898 年任新店街庄長，1900 年獲紳章，1911 年後前往中國參加革命，成為黃興幕賓。³⁷ 不像郭、李兩人，許又銘此後並沒有使用臺灣人的身分，而是入中國籍、以中國人的身分活動，³⁸ 曾前往暹羅視察，並擔任華僑聯合會會長等職。許氏對外也自稱曾任臺灣民主國財政部長兼陸軍次長，並在臺灣民主國瓦解後繼續抵抗日本統治，乃至「日人不得不割地以容其徒眾」，直到參與孫、黃兩人的革命為止。³⁹ 儘管許氏的認同始終在中國，但 1920 年前後仍與臺、日人從事中日合辦事業。除了華僑實業銀行外，許氏也計畫創立暹羅貿易株式會社。據許氏陳述，暹羅地處英法之間，官民、法院常迫於兩國的誘惑或脅迫而做出對中國人不利的決定。在此狀態下，暹羅人厭法恐英，有親日美的傾向；而中國商人雖恐懼英國，且有排日之風氣，但許氏相信只是一時的現象，該會社的設立目的，就是為與日本提攜以保障在暹羅的貿易，同時推動中日親善。⁴⁰ 其創立發起人及贊成人以臺灣望族為主，包括林熊徵（1888-1946）、林熊光（1897-1971）、林烈堂（1876-1947）、辜顯榮（1866-1937）、顏雲年（1874-1923）、廖行生（1890-1943）、蔡惠如、李漢如等人；日本人則有中川小十郎（臺灣銀行副頭取，1866-1944）、石丸祐正（東亞印刷會社社長）、宮崎民藏（1865-1928）、吉田作彌（前日本駐暹羅大使，1859-1929）等人；中國人則有許又銘、莊璟珂（中國日駐代辦，1886 年-1934 年）、王敬祥（神戶華僑，1872-1922）等。⁴¹ 1921 年 3 月，為推動公司成立，許氏與暹羅商會代表蔡俊卿⁴² 前往東京與中川、吉田等人協議，為避免中國留學生的反對，相關活動都秘密進行。⁴³ 許氏此行也與石丸一同造訪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述暹羅華僑被壓抑之事情及為其救援創立日華合同貿易會社之必要，乞其指導援助」。⁴⁴

筆者未能找到資料說明暹羅貿易株式會社之後的發展，很可能未成功設立，但其聯合臺灣資本的特色，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同一時期成立的五國信託公司。儘管許氏有著與郭、李兩人不同的認同，但其臺灣出身的背景或許使其採取與李氏相仿的行動，在中國排日熱潮下推動中日合辦。

回到郭、李兩人的例子，除了呼籲中日親善外，兩人對臺灣也各自抱有理想。

³⁷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52。

³⁸ 唯一一次例外是 1931 年，他被迫控債務時，曾延請律師在法庭上宣稱仍屬日本籍，而不受中國法院管轄。不久，便有人質疑華僑聯合會創辦人的他國籍不明，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控告，他遂登報改稱仍屬中國籍。〈許冀公未嘗自請出籍〉，《申報》，1931 年 3 月 17 日，第 15 版。

³⁹ 〈許冀公先生事略〉，《時代日報》（上海），1934 年 11 月 21 日，第 1 版；〈許冀公先生事略（下）〉，《時代日報》（上海），1934 年 11 月 22 日，第 1 版。

⁴⁰ 〈日支合弁組織會社創設計畫運動〉，收於《日支合弁事業關係雜件》第一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1-7-2-1_001，JACAR Ref.B04010850300。

⁴¹ 〈暹羅貿易株式會社 自大正九年三月〉，收於《本邦外國間合弁會社關係雜件》第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号：3-3-2-48_002，JACAR Ref.B10074125800。

⁴² 檔案原文記為蔡俊卿，應是蔡俊卿之誤，參見〈暨南學校商科歡宴華僑紀〉，《申報》，1921 年 4 月 17 日，第 11 版。

⁴³ 〈日支合弁組織會社創設計畫運動〉，收於《日支合弁事業關係雜件》第一卷。

⁴⁴ 《田健治郎日記》，1921 年 3 月 15 日。

如果說郭春秧希望利用孔教，聯絡日中兩國，並維持臺灣社會的穩定，那麼李漢如就是將未來寄託在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學子上。1920 年春，《臺灣青年》雜誌社在日本成立，李漢如由蔡惠如介紹入社，並被推舉為名譽社員。7 月，《臺灣青年》發刊，李漢如撰〈發刊之辭〉鼓勵學生，文中首先敘述其與伊藤政重創辦《新學叢刊》，「欲以高等國民教育，灌輸於我臺民，而使之自覺」，卻誤犯當時世界讚揚軍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實施愚民政策的潮流，而被當局停刊。一戰戰後，各國紛紛反省其政策，轉而充實國民經濟，平等賦予受教權。至於臺灣，總督府卻一再以臺灣人程度不及日本人而延長六三法制，李氏指出，若臺灣人程度果真不足，則應發憤自強；若臺灣人擁有足夠智識享受自由平等，則應展現其能力，絕不可一一忍受。

因此，在李漢如眼中《臺灣青年》有兩點目的：其一為灌輸新知識給臺灣人，補充總督府教育之不足；其二便是展現臺灣人自覺的程度，使總督府轉而實現一視同仁，改善臺人待遇。⁴⁵李漢如的看法，基本上與伊藤政重相似，但兩人的最終目的卻不盡相同，李氏是為了臺人「享自由平等之幸福」，伊藤的目標卻是日本的向外發展。眾所皆知，臺灣人社會運動的目標不久就從撤廢六三法制轉變為爭取自治，表面上來看，青年學子似乎未依循李漢如的意見，實則其根本理想也是為了臺人「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基於同樣的理想，這些受新教育、有著新觀念的學生，也在 1920 年代提出了不同的亞細亞主義觀點。

二、1920 年代的臺灣人知識分子與亞細亞主義

（一）知識分子的反同化型亞細亞主義

日本治臺初期，為避免臺灣人因受教育而產生反殖民思想，作為初等教育設施的公學校擴充緩慢，至於中等以上教育設施及不完備，僅有國語學校與醫學校兩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面對民主主義、民族自決的世界潮流，不得不改革臺灣統治方針。1919 年，總督府發布臺灣教育令，宣布增設中高等教育機關；1922 年，又發布新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開放臺、日人共學。表面上，臺灣人已與日人平等享有中等以上教育機關的受教權，實際上臺灣人入學率始終低於日人，兩者受教機會並不平等。臺灣島內教育設施長期不足，使得留學教育盛行，尤以留日為主流，留學教育所產生的知識分子，其人數是島內受教者的六倍以上。⁴⁶這些知識分子，透過與中、朝留學生及日本開明政治家來往，直接接觸到民族自決及民主主義的風氣，逐漸產生了反殖民的思想，而後在得到林獻堂、蔡惠如等人支持後，遂在 1920 年代展開了各種政治社會運動。⁴⁷

同一時期活躍的日中親善論，自然也為知識分子熟知。1920 年 7 月，《臺灣青年》月刊創刊，其簡章即明確指出「本誌以介紹內外之文明併評論我臺應改善

⁴⁵ 李漢如，〈發刊之辭〉，《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頁 6-9。

⁴⁶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83-115。

⁴⁷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上）》，頁 97-103。

之事項兼謀日華之親善」，⁴⁸而無論知識分子自身或外界人士，也都期許其能成為日中親善的媒介，不過兩者意見卻未完全一致。對照創刊號中，林熊徵的〈吾所望於留學生〉及靜翬的〈讓我等成為日華親善的使節〉，可發現兩人都用了血緣上的比喻，指出臺灣是兩國親善的媒介：林熊徵認為「夫臺灣者，中華之舊土，而日本之新民也。臺灣之人，皆來自中華，改隸以後，又受日本之教育，則臺灣人者當以中華為姻戚，而日本為兄弟矣。」；靜翬則認為「蓋臺灣人，曩時為中華人。今則是所謂日本的養子。」不過，兩人對中日親善的看法卻不同。林熊徵認為，中日兩國之所以需親善，是因其「同文同種，邦交敦睦，重以輔車之勢，利害相關」，更重要的是，「夫日本強國也，中華大國也」，日本之人才及中國之物力必須提攜，黃種人才能夠抵抗歐洲、美國的經濟入侵。⁴⁹

按板橋林家長期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如林本源製糖等事業數次受政府扶持。在日本推動的日中親善活動上，林熊徵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1919 年，林熊徵在總督府支持下創辦華南銀行，作為聯絡日本、臺灣中國、南洋金融的機關，其資本則採中日合資以體現中日親善。⁵⁰無怪乎，他採用日本當時流行的亞細亞主義之說，強調只有靠中日兩國合作，黃種人才能在經濟戰爭對抗歐美。

另一方面，靜翬則認為英、法、美等各國都積極將自國文明傳播至世界，日本亦倡導東洋和平、亞洲門羅主義，然而

然從來因一部分野心家之異圖，其誠意受懷疑之事爾來不絕。彼民國人一般都懷著疑心暗軌看著日本人，從此事看來思過半矣。故吾人呼籲日本人大大地利用吾等，即讓我等成為日華親善的使節之所以也。⁵¹

首先，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對亞洲門羅主義的看法，同時受到了日本與中國的影響，一方面雖然不否定日本倡導亞洲門羅主義的「誠意」，一方面也承認其因「一部分野心家的異圖」而受中國人懷疑。接著，文中將亞洲門羅主義與歐美各國的主張並列，顯示出知識分子似乎無意將歐美視為他者，其對如何實踐日中親善的看法，足以證明：

換言之，吾人應努力與日本人、民國人三者相連結、相融合。我相信依此、以此圖日華親善之實，是最重要之急務。但勿誤解，當然我等並非呼籲只與民國人及日本人交際，與其他朝鮮人、印度人、英國人、美國人亦非不可。宜須對世界人類，以所謂四海皆兄弟般視之。⁵²

兩篇文章的差異，肇因於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如靜翬所言，臺灣人是日中親善的「驗壓器」(Barometer)，若對臺灣人施行善政，中國人將對亞洲門羅主義的

⁴⁸ 〈本誌簡章〉，《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封面後頁。

⁴⁹ 林熊徵，〈吾所望於留學生〉，《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頁 3-4。

⁵⁰ 許雪姬，〈臺灣總督府的「協力者」林熊徵——日據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二〉，《近代史研究集刊》23（1994 年 6 月），頁 53-88。

⁵¹ 靜翬，〈我等を日華親善の使節たらしめよ〉，《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頁 54-55。

⁵² 靜翬，〈我等を日華親善の使節たらしめよ〉，頁 55。

說法感到安心，日中親善也必定成功，反之則必定失敗。不過實際情形卻是，當日本人紛紛以亞細亞主義呼籲日中親善時，臺灣人卻因日本政府的阻撓而難以與中國人來往。⁵³ 進一步來說，當日本試圖以亞細亞主義向歐美國家爭取廢除差別待遇時，臺灣人知識分子卻受到了美國民主主義、民族自決說法的影響，向日本爭取廢除差別待遇。此種矛盾狀態，遂讓知識分子難以通盤接受亞細亞主義。

誠然，日本亞細亞主義者對此也有認識，這也是為何板垣退助、伊藤政重等人致力於廢除六三法，使臺灣人誠心接受日本統治，而臺灣人知識分子亦曾與這些亞細亞主義者合作。不過在 1920 年年底，林獻堂、蔡惠如與留學生在東京集會，決定未來將以設置臺灣議會為運動目標。⁵⁴ 之後，如留學生林呈祿(1886-1968)便利用當時日本殖民政策學批評同化政策，並建構符合自治主義的理論。⁵⁵ 在此背景下，他們也有必要重新思考與亞細亞主義的合作關係。《臺灣青年》及《臺灣》的三篇文章，正好呈現其發展過程。

第一篇文章，是羅萬俔(1898-1963)的〈於加州見排日運動〉，寫於 1920 年 11 月。⁵⁶ 羅萬俔於 1919 年自明治大學畢業，1920 年渡美留學，並在加州目睹了排日運動及日本人組織的反對運動，他對反對運動的描述是：

每次聽眾都僅有約二三百名左右，雖然聊感不足，各辯士卻都施展懸河之熱辯，悲憤慷慨至極，言言句句以正義人道為看板，絕叫著美國人不正不當的法律、苛酷慘忍的待遇，以及人種戰之第一線或者是亞細亞門羅主義確立的必要。而余當時醉心於其大看板之正義人道，不得不流下了些許暗淚。要問為什麼，蓋今日所謂正義人道如果不是出自弱者之聲，不就會是偽善者的呼聲嗎？儘管如此，所謂世界強者之一日本人的一部分，於此加州高唱獨特的正義人道，與吾等同為弱者同病相憐，實不得不感到同情。⁵⁷

美國排日運動是刺激亞細亞主義議論產生的重要因素，日本國內通常將其視為對全亞洲人的種族歧視，並據此鼓吹亞洲團結。就連臺灣出身，作為日本帝國被殖民者的羅萬俔，都不得不同情在美日人的處境，不過文章並沒有因此鼓吹亞細亞主義，反而走向了相反的道路。文章接著指出，世人常言排日運動是因美國對日本的嫉妒或人種偏見等，但其實際因素卻是日本言行不一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主張東洋和平，一方面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向西伯利亞出兵，侵犯他國主權，才使得日本遭受批判。羅萬俔更批評：

要之常號稱是世界一等國、東洋和平維持者之日本帝國的外交經常招致世人的誤解，對柔弱的鄰邦毫不客氣地隨意行事，但卻云云著東洋和平之維持、喋喋著日支親善，嗚呼前途聊遠哉。為了因應人種戰爭黃色人應聯盟

⁵³ 靜翬，〈我等を日華親善の使節たらしめよ〉，《臺灣青年》1：1（1920 年 7 月），頁 51-55。

⁵⁴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上）〉，頁 89-93。

⁵⁵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頁 336-341。

⁵⁶ 羅萬俔，〈加州に於ける排日運動を見て〉，《臺灣青年》2：1（1921 年 1 月），頁 33-39。

⁵⁷ 羅萬俔，〈加州に於ける排日運動を見て〉，頁 36-37。

對抗白哲人，或者是為了對抗美國的門羅主義要確立亞細亞門羅主義，甚至云云著大亞細亞主義或大日本主義之類的謬語，如果這不是一種誇大妄想狂是什麼？⁵⁸

文章最後，羅萬俤除呼籲日本人反省外，也表示：

最後吾人更加一言。日本須先自顧養育其本，其他暫且不管，第一就是要刷新既往偏狹的殖民地統治政策。⁵⁹

相較於靜翬原則上仍贊成「亞洲門羅主義」的主旨，只攻擊日本「一部分野心家」使得中國人不信任日本，羅萬俤則直接點名日本的外交政策才是造成各國排日的元凶。他對亞細亞主義的否定態度，也較靜翬一文更直接地反映出臺灣人知識分子難以在日本對臺灣實行差別待遇的情形下，接受日本向西方提出的主張。

羅萬俤的文章，似乎顯示知識分子將與亞細亞主義分道揚鑣，短期間確實呈現此趨勢。1921 年，在臺日人記者橋本白水撰文，說明日本民族有著融合異民族的歷史，且標榜亞細亞主義絕不會歧視臺灣人，希望臺灣人留學生放棄議會設置運動，接受日本同化。留學生於是基於反同化的理想極力反駁，強調自由平等為人類普遍的希望，至於排外的亞細亞主義更不適合國際交流頻繁的當下，而應鼓吹愛世界的世界大同主義。⁶⁰

不過，一年後的 1922 年 8 月，由劉明朝（1895-1985）發表在《臺灣》上的〈有色民族終將勝利〉，卻呈現出不同的趨勢。⁶¹文章一開始，先強調「四海同胞主義」的理想，甚至批評「從政治、社會上討論人種抗爭問題之類，不如稱之為人類的恥辱，是吾人所不屑」，接著話鋒一轉：

然而，使吾人不得不討論人種問題者，乃是因過去白色人種使有色人種為奴隸，無視其人格，以世界中最優秀的民族自許，而其他有色民族亦未深究，又自侮、贊同之，因此在不知不覺之間，有失去奮鬥努力向上精神之虞。⁶²

整篇文章的內容，除了描述白人在政治上壓制有色人種，又禁止有色人種入國等種種「對有色人的權力與暴虐」，更重要的就是在說明「有色民族的優越點」鼓勵其奮勵努力，其中包括：（一）數量上的優越性；（二）散布地域廣大；（三）擁有更多自然資源；（四）從古代文明來看，文化、科學、政治等各方面能力不輸白人，至於現代則在受教育後也能不輸白人；（五）生育率較高，繁殖力上優越；（六）能夠適應各種氣候風土。結論則寫道：

勢極必變，物不平必鳴，雖然有色民族是如何地溫順、愛好和平，過去為

⁵⁸ 羅萬俤，〈加州に於ける排日運動を見て〉，頁 38。

⁵⁹ 羅萬俤，〈加州に於ける排日運動を見て〉，頁 39。

⁶⁰ 樂山生，〈白水真人に答ふ〉，《臺灣青年》2：5（1921 年 6 月），頁 63-66。

⁶¹ 劉明朝，〈有色民族は終に勝つべし〉，《臺灣》3：2（1922 年 5 月），頁 23-34。

⁶² 劉明朝，〈有色民族は終に勝つべし〉，頁 24。

了人類而貢獻的偉業卻不被認可。儘管其能力與人格無何等可讓之處，卻被當作劣等人種輕視，常常需忍受虐待與苦惱，直到現在幾乎沒有生存的餘地。於茲起身覺醒，做出自衛的活動，不得不說是當然的。有色民族除了有以上的長處，白人又因這次的大戰受了致命傷，此後有色民族的地位將益益向上，白人將無法高枕安寢。有色人與白人的關係平等之時，真正的世界和平始成可能。⁶³

羅萬俔在文中否定人種對立觀，只表露了弱者彼此間的同情，但過了近兩年，在亞細亞主義論述始終未退的情形下，這種同情心也轉化為劉明朝文中對白人的敵視和對有色人種的讚賞。劉文中雖然沒有明確擁護與白人對抗，但其中表明有色人種會對白人行使「自衛的活動」乃屬當然，或認為白人已受「致命傷」而將無法阻止有色人種地位向上之說法，幾乎可以認為劉氏已接受了人種對立觀。若對照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中認為亞細亞主義能夠防止有色人種受壓迫、實現世界和平的說法，就更能明顯看出亞細亞主義對劉明朝的影響。無論劉明朝是否欲以有色人種受到的壓迫暗喻臺灣人，不能否認的是亞細亞主義為弱者爭取平等的呼聲，依然迴盪在知識分子的心中。

然而，此時臺灣文化協會已經創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實施了兩回，反殖民運動既已沸沸揚揚地展開，⁶⁴應如何在自認為與日本人同為弱者的同時，又向日本人爭取改善待遇，而且還不能走向日本亞細亞主義者倡導的「同化」之路，對此，劉文中並沒有給出答案，劉明朝本人也於 1923 年進入總督府任職，⁶⁵而無法直接參與社會運動。真正為此問題提出解答者，是陳逢源（1893-1982）於 1922 年 11 月撰的〈亞細亞的復興運動與日本的殖民政策〉。⁶⁶

該文首先延續劉氏的觀點，描述亞洲受歐洲國家壓迫的現狀、亞洲有色民族對白人的反抗，也以亞洲過去的偉業說明亞洲人並不劣於歐洲人，接著說明日俄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亞洲各國的各種復興運動，包括中國、土耳其、波斯革命及印度、暹羅、埃及等地的民族運動，以及 1920 年後由蘇聯與回教國家提攜對抗共同敵人歐洲的活動。對於日本應如何面對這些復興運動，陳氏指出，日本的外交、人口、產業政策逐漸走入死路，儘管日本已是世界強國，卻因膚色是黃色，而遭西方國家堅閉門戶，阻止日本人移民。面對此一局面，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

提倡與啟發進展中的亞細亞諸國間之**友聯主義**。換言之，應作為基於正義人道之泛亞細亞主義的領袖突進。亞細亞諸國的先導者、亞細亞諸國的強者日本，背負著作為天授的泛亞細亞主義指導者之重要使命。而亞細亞的指導及其統一，實為佈大義於四海之唯一路。這乃是為了走入死路的日本，

⁶³ 劉明朝，〈有色民族は終に勝つべし〉，頁 34。

⁶⁴ 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實施狀況，見周婉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臺灣史料研究》37（2010 年 9 月），頁 2-31。

⁶⁵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 改訂》（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425。

⁶⁶ 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臺灣》4：1（1923 年 1 月），頁 18-33。

為了被凌虐的亞細亞，也為了全人類。亦即，從小乘日本之境地，前進至大乘日本之彼岸，在世界歷史上有著重大的任務。特別是歐洲戰後的形勢，也給了日本扮演如斯大使命之絕好機會。⁶⁷

從羅萬俔文中對亞細亞主義的否定，經過了劉明朝文中呈現的人種對立觀，到陳逢源文中不斷強調日本有著領導亞洲，作為「泛亞細亞主義的領袖」之使命，代表著知識分子最終對亞細亞主義的接受。不過，雖然陳逢源一方面已經像日本人一樣，主張只有亞細亞主義才能改變日本及亞洲被歧視的現狀，另一方面卻用了「友聯主義」說明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所謂「友聯主義」(フデラリズム, Federalism)的意義，他沒有在文中給予解釋，但在往後文章中，他曾指出「友聯主義」是「以尊重人格與個性為基礎」，⁶⁸此種認識便表現出了臺灣人具平等特色的亞細亞主義觀。而也正是透過「友聯主義」的提倡，他接著才能針對同化政策進行反駁。

說明完日本擁有的大使命後，陳逢源轉而指出當下的日本「不堪拯救亞細亞的重任」，也不受亞細亞諸國的信賴，改變此現狀的關鍵，在於日本對臺灣、朝鮮的殖民政策。臺灣原先是「不管何種場合都必須互相提攜之善鄰支那的領土」，因此，「臺灣統治的成否（從人道上來看）將對日支親善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朝鮮是「我國歷史上來看擁有最密接關係之韓國」，因此，「朝鮮統治的成否將對亞細亞諸國中日本的信用造成絕大的影響」。那麼，現今日本採取的同化政策是否適當，陳逢源首先認為臺（支那民族）、朝（朝鮮民族）兩民族數千年來都有著不同的文化，因此同化不只難以達成，更是不尊重其人格之舉。他也運用知識分子抵抗總督府統治的常見作法，援引日本殖民學說，作為反對同化政策的根據。

69

不過陳逢源的論述並沒有就此打住，他進一步提出一個「更有力的反對意見」，此正是「亞細亞復興運動的基調與同化主義間的矛盾衝突」：

正如我等於前記數項中曾縷縷說明，現在的亞細亞與歐洲的文藝復興一樣，是基於對古代文明的重新發現，而進入民族自覺之時代。民族自覺必先要求人格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基於民族自覺的國民運動，要求完全獨立等，必定是復興亞細亞之基調。⁷⁰

如全亞細亞民族會議出席者 Kurbangaliev 曾言，回教徒相信世界文明須靠各種分枝才會強大，陳逢源利用「友聯主義」，將自主的人格視作是亞洲復興的核心價值，正是一語中的，他也藉此斥責同化政策「無視被同化者人格」的謬誤：

日本的將來必須協助復興亞細亞諸國，作為其等的領袖，雄立於第一線，

⁶⁷ 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頁 23-24。

⁶⁸ 陳逢源，〈植民政策としての友聯主義〉，《臺灣》4：5（1923 年 5 月），頁 58。

⁶⁹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頁 336-341。

⁷⁰ 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頁 28。

另一方面，卻又對其所有的殖民地強制要求同化，正是矛盾之甚。若日本欲參加將來之人道戰，勇猛地實行其所信的話，必然要有未受同化而自覺的殖民地人民，樂意地在其傘下集結，得意地作為其屬領。反之，若日本不負擔此重大任務，且欲徹底地在殖民地施行同化政策的話，相信必定會與亞細亞諸國絕緣孤立。因此從復興亞細亞的基調來看，除了評同化政策為大勢逆行的政策之外無他。⁷¹

為了呼應內心對亞洲的弱者所擁有的情感，同時也為了達成爭取自治、保全自身文化的理想，臺灣人知識分子最終創造出了其獨特的、以人格自主為中心的亞細亞主義。有此亞細亞主義為後盾，陳逢源也在文章最後呼籲「樹立自治制度」及「建設臺灣獨特的文化」，並強調「此二理想必須完全地由吾等的人格所統一」。

「樹立自治制度」可說是陳逢源之後用力最勤的目標，除了呼籲日本應以「友聯主義」及地方分權為殖民政策的主軸外，⁷²在 1924 年「治警事件」的審判中，也看到陳逢源重申其思想。在各被告的供述中，除了林呈祿、蔣渭水(1888-1931)都提及臺灣為中日親善的「楔子」外，陳逢源再次指出「復興亞細亞精神」就是指東洋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而唯有「換同化主義改作真基礎於共榮共存的友聯主義」，才能解決臺灣問題，也能贏得亞洲其他民族的信任，「對於東亞民族的聯盟或是對於日本國家的繁榮大大有所關連」。⁷³

至於在「建設臺灣獨特的文化」上，趁著 1923 年「有關漢學振興之建議案」通過後日本輿論對「東洋文明」的重視，《臺灣民報》也表達贊同，認為「這種保存本洋固有文化的運動，欲再振興東亞的精神，實在很可祝福的事」。⁷⁴然而，進一步觀察知識分子的行動，可發現其重視的並非是傳統漢學，而是能夠快速普及知識、「啓發臺灣的文化」的白話文。《臺灣民報》中鼓吹創設白話文研究會的廣告寫道：「欲保持東洋的文化，實行日華的親善，日本本國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同胞倒返不知自覺」。其中前半部的「日本本國尚且如此」雖然是指振興「漢學」一事，後半部的「同胞倒返不知自覺」卻是在呼籲同胞應學習「白話文」。其目的正是要讓「缺讀漢學的人，快發表他的意思，漢學深奧的人，快將他的文言改作白話，上下相就，普及三百六十萬同胞的智識，使他們平平享⁷⁵受人生百來的生活」。⁷⁶由上都能顯示，知識分子具體地利用亞細亞主義論述，作為推動社會運動的後盾。⁷⁷

⁷¹ 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頁 29。

⁷²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收入，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70。

⁷³ 〈陳逢源氏的供述〉，《臺灣民報》，1924 年 9 月 1 日，頁 16；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頁 95-96。不過趙認為陳逢源的說法受影響於孫中山，筆者則認為其主要應延續自〈亞細亞的復興運動與日本的殖民政策〉中的看法。

⁷⁴ 〈漢學振興案通過衆議院了〉，《臺灣民報》，1923 年 4 月 15，頁 13。

⁷⁵ 原文如此，應為「享」之誤。

⁷⁶ 〈唱設白話文研究會〉，《臺灣民報》，1923 年 4 月 15，頁 29。

⁷⁷ 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頁 90-92。

(二) 知識分子眼中的亞細亞主義活動

1924 年排日移民法通過後，日本國內亞細亞主義議論湧現，《臺灣民報》除了轉載相關討論外，知識分子也發表了不少意見。整體來看，他們對法案的理解，與日本輿論相去不遠，例如蔡錫耀（一舟）指出法案「確由人種差別的偏見，要排斥我們亞細亞民族的全體」，⁷⁸林獻堂認為「米之壓迫日本者，是白人對黃人之輕視侮辱也。換言之則是無⁷⁹犯我東洋民族之舉動也」。⁸⁰有些發言甚至超出了總督府的容許範圍：溫成龍（1900-1976）在參加留學生回臺演講團，於演講〈移民問題之史的變遷〉時，提及「米人素唱正義人道，而今排日，然正義仁⁸¹道何在」，反而被警察警告注意。⁸²

不過，雖然幾乎人人都相信「亞細亞人若得團結，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成立聯盟的時候，我想歐洲的人，一定不敢再輕視亞細亞人了」，⁸³實際上知識分子的目的依舊是在告誡日本，只有優先改善對亞洲各國及臺、朝的待遇，才有可能實現日中親善、亞洲團結，以對抗美國的人種差別政策。如蔡錫耀所言，日本必須有「厚待亞細亞弱小的民族」，以及「對朝鮮臺灣的人，應該解放與母國人受同等的待遇」之覺悟，才能達成團結亞洲的使命。在此背景下，也無怪乎同時期孫文呼籲日本實行「王道」而非「霸道」的看法，會贏得知識分子的支持。⁸⁴

林幼春（字南強，1880-1939）的〈同牀異夢之內臺人〉，清楚地點出了臺灣社會的現況。文中表示，島內的臺、日人都贊成日本在巴黎和會提出「人種差別撤廢案」，都反對美國的排日法案，將「日華親善東亞聯盟」視為急務。然而，雖然「意見都還一致，為什麼說到行為，便似含有矛盾性似的」。文中認為，其原因正是臺、日人間「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經濟上的機會不平等」，不只使得彼此交際帶有隔閡，更讓臺灣人欠缺平等、自由的人格、人權，而無力共同鼓吹亞細亞主義。⁸⁵

觀察知識分子對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的反應，更可顯示出他們與日人的差異。同樣自 1926 年 1 月，《臺灣民報》便開始關注民族會議的舉行，但相較《臺日》給予正面期待，《臺灣民報》自始即對會議抱有一定懷疑，評論稱「亞細亞民族的團結是或可緩的，所以這個會議是很有意義的。然而對於這個會議我們也有一個提議，是：全亞細亞民族的地位待遇平等。日本民族應有相當的覺悟才是！」

⁷⁸ 一舟，〈亞細亞民族團結的機會〉（社說），《臺灣民報》，1924 年 6 月 1 日，頁 1。

⁷⁹ 原文如此，可能是「侮」之誤。

⁸⁰ 〈臺中歡迎代議士記述〉，《臺灣民報》，1924 年 10 月 21 日，頁 10。

⁸¹ 原文如此。

⁸² 〈東京留學生夏季回臺 講演日記〉，《臺灣民報》，1924 年 9 月 11 日，頁 14。

⁸³ 〈時事短評 亞細亞聯盟說〉，《臺灣民報》，1924 年 7 月 1 日，頁 3。除此之外，王敏川、蔣渭水等人也都曾發表擁護亞洲團結的文章，參見張修慎，《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1945 年的思想》，頁 57-59。

⁸⁴ 張修慎，《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1945 年的思想》（新竹：交大出版社，2015），頁 53-60；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頁 92-93。

⁸⁵ 南強，〈同牀異夢之內臺人〉（社說），《臺灣民報》，1924 年 7 月 1 日，頁 1。

⁸⁶另外也轉載了中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及旅滬印度僑民對會議的反對。⁸⁷雖然知識分子並未派代表出席，《臺灣民報》在會後也刊登〈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批評會議主辦者是「奉日本主義的右傾派」，真實夢想是建立「日本人握霸權的亞細亞」，並指出：

他們假使是奉左傾派的社會主義的呢，便可以提倡亞細亞民族的解放，樹立打破帝國主義的旗幟，如此，一定會引起亞細亞民族大多數的同情。他們若是奉自由主義的呢，便可以提倡亞細亞各民族的自由，國際間的平等，當然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撤廢，有抱些同情的態度，又對朝鮮、臺灣的問題，要表示自治主義，如此，依然會得引起不少的共鳴了。⁸⁸

然而，主辦者既然是日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右傾派，當然無法提出一個能吸引亞洲各國的主張，中、朝代表與日本代表發生衝突也無足為奇。評論指出，若臺灣曾派代表出席，自然必須提出臺灣議會設置的要求，萬一連此種溫和、自由主義的提議都被否決，便更突顯民族會議的矛盾。文末則明顯援引孫文看法，呼籲日本右翼若能透過此次會議理解亞洲其他民族的主張，「由霸道而歸王道」，才能實現真正的亞洲團結。⁸⁹ 政經地位上的差異，使知識分子無法與日人一同對會議表達支持，反而選擇站在與中、朝相同的立場，對會議提出批評。

1927 年 11 月，第二次民族會議在上海召開。與《臺日》相同，《臺灣民報》對會議的關注也較少，不過仍然堅持臺灣人的立場，認為「臺灣人確是東洋的一弱小民族，故當有代表參加，這算是當然的事吧」。⁹⁰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原先的確有臺灣人以個人身分出席，據《臺灣民報》載，此人曾在東京留學多年，經常與印度、中國、菲律賓志士來往，此次恰好於上海受各國代表邀請出席，然而一方面受上海臺灣學生會之一部反對，又受上海日本領事館警戒，在兩面夾攻下不得不放棄參加。對此情形，其發言云：

雖是以個人資格出席，所行的事並沒有害於臺灣，在這世界的會議席上，得使世界人認識有臺灣的存在，這也可有益於臺灣哩！然而不幸遇一部在滬同胞的反對實堪嘆惜云云。⁹¹

此人是誰？若其「所行的事並沒有害於臺灣」，甚至還能「在這世界的會議席上，得使世界人認識有臺灣的存在」，為何會受到在留的臺灣學生會反對，不得不中止出席？此人實為明治大學畢業之郭國基（1900-1970），⁹²其遭反對的原因，似與 1926、1927 年臺灣社會運動的左右分裂有關。

⁸⁶ 〈全亞細亞民族會議的提議〉，《臺灣民報》，1926 年 1 月 31 日，頁 9。

⁸⁷ 〈中國國民黨黨部反對亞細亞民族會議〉，《臺灣民報》，1926 年 8 月 15 日，頁 6；〈旅滬印僑反對全亞民族會議〉，《臺灣民報》，1926 年 8 月 22 日，頁 5。

⁸⁸ 〈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臺灣民報》，1926 年 9 月 5 日，頁 2。

⁸⁹ 〈亞細亞民族大會的矛盾〉，頁 2-3。

⁹⁰ 〈民族大會與臺灣〉，《臺灣民報》，1927 年 11 月 6 日，第 2 版。

⁹¹ 〈亞洲民族會議 臺灣代表的苦心〉，《臺灣民報》，1927 年 11 月 20 日，第 7 版。

⁹² 〈亞洲民族大同盟將在上海開會〉，《申報》，1927 年 10 月 31 日，第 10 版。

（三）分道揚鑣的社會運動與亞細亞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瀰漫於全世界的新思潮，除了民主主義、民族自決外，還包括了因蘇聯革命成功而流行的社會主義。在日本，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學生紛紛成立各種結社，包括東京大學的「新人會」（1918）、早稻田大學的「曉民會」（1920 年），以及由各團體聯合組成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1920 年），臺灣留學生也不免受到影響。因而，1920 年代，部分希望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以階級運動方式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知識分子，便與蘇聯、日本、中國的共產黨往來，並在臺、中、日等地組成研究推廣共產主義的團體。反對臺灣代表與會的「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便是於 1925 年年底，由彭華英（1893-1968）、蔡孝乾（1906-1982）等人，為了進行臺灣人的組織活動而成立。1927 年年底，在林木順（1906-?）、謝氏阿女（謝雪紅，1901-1970）、翁澤生（1903-1939）等人的協助下，學生聯合會更組織讀書會，為臺灣共產黨的結黨作準備。⁹³

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滋長，知識分子內部也發生了衝突，1926 年發生了「中國改造論爭」，即左傾的許乃昌（1907-1975）與較保守的文協理事陳逢源，對於中國是否能直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抑或是應先發展資本主義之論爭。1927 年 1 月，文協召開臨時大會中，左派（連溫卿（1894-1957）領導）取得指導權，此後便以階級鬥爭方式對抗總督府。希望聯合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的中間派（蔣渭水），以及以民族運動為主的右派（蔡培火）則退出文協，同年建立臺灣民眾黨，繼續採用合法的抗爭手段。⁹⁴

當第一次民族會議舉行時，社會運動陣營尚未分裂，《臺灣民報》對會議的評論中，認為「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都能爭取到亞洲各民族的支持，即同時包容了左、右兩派的意見，文末也多少期待著日本未來能轉向「王道」。不過，第二次民族會議召開時，左、右派已分道揚鑣，對會議的認識亦因此不同。從發表過的文章來看，郭國基對近代中國及臺灣的遭遇感到憤恨不平，也不滿英美攻擊日本為「軍國主義」，呈現出臺灣人處於中、日間的立場。⁹⁵ 郭國基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對帝國主義的譴責，並不是基於階級理論，而是基於基督教的公理正義。⁹⁶ 由此觀之，其立場應較接近文協右派，希望能透過參加會議，表達臺灣人的心聲。

然而，如連溫卿指稱，「民族主義者一方面承認掩護日本帝國主義進出的中日親善與有色人種團結論；一方面則強調應當撤廢民族差別之政治，方能實現其理想。其主張之矛盾無非是時代思想之影響」。可見在左派眼中，亞細亞主義乃是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為了向華南擴張的產物，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臺灣

⁹³ 盧修一，《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 38-39

⁹⁴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頁 242-247。

⁹⁵ 郭國基，〈戰爭より得たる教訓〉，《臺灣青年》2：5（1921 年 6 月），頁 54-59；3：1（1921 年 7 月），頁 65-70。

⁹⁶ 謝欣純，〈郭國基與戰後臺灣地方自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5-16。

人，不可能透過其「得到完全的解放，開民族的獨立與自由」。⁹⁷也因此，當得知郭國基即將與會時，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特別登報宣稱會議「悉遭各團體所反對，此次開會我臺並無派出代表」。⁹⁸郭國基最終也因受此攻擊，而不得不中止出席。

左傾之風並未就此止息，受孫文晚年聯蘇容共政策影響，蔣渭水逐漸推展「以農工階級為中心，以農工商學為共同戰線」的路線。1928 年，民眾黨第二次黨大會宣言草案開頭，即強調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與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必須形成共同戰線，打倒帝國主義。⁹⁹不滿蔣渭水以階級為重的運動方式，民眾黨主幹彭華英在大會後辭職，此後實權逐漸掌握在蔣渭水手中。¹⁰⁰ 1930 年後，蔣渭水更接受了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即將勝利，相信孫文思想能夠發展到無產階級專政。¹⁰¹ 面對此情形，蔡培火等人決定另起爐灶，於 1930 年 8 月設立以地方自治為單一目標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其成員不限曾參與社會運動者，亦包括中立派、「御用紳士」，以及在臺日人。¹⁰² 同年年底，民眾黨將蔡培火派除名，社會運動陣營也再次迎來了分裂。

蔡、蔣兩派對亞細亞主義的看法有何差異？蔡培火於 1928 年著《與日本本國民書》一書，其中討論到中日關係。儘管中日關係於 1927 年後惡化，蔡培火仍延續 1920 年代初期以來知識分子的看法，強調日本人應尊重中國，改變對中國的武斷政策，專心以德行贏得中國的人心，才能達成中日親善。至於日本對朝鮮、臺灣的統治，也顯示出日本「應接他民族之道」，是對日本品格之考驗，只有此考驗通過，才能實現中日親善。文中雖然沒有直接論及亞洲團結，卻有一段話值得注意，當蔡培火說明中日關係時，其指出相較於歐美，中國可更方便地自日本獲得近代化所需的知識、資本，因此「日本是比諸歐美各國較為與中國具有親密的優先權。唯有此優先的地位，豈不將是將來日本的活路嗎？」誠然，蔡培火可能只是在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而已，不過提及日本可「優先」與中國親善，而中日親善將成為日本「活路」等說法，不得不使人聯想到亞細亞主義。¹⁰³

至於後者，則可以一窺自民眾黨解散後，何景寮（1903-1978）、陳逢源對民眾黨理論的質疑所引發的論戰。¹⁰⁴ 論戰中心在於孫文主義是否能走向馬列主義，其中陳逢源提出的論點，正好基於孫文〈大亞洲主義〉演講，更精確來說，是戴季陶（1891-1949）對孫文演講中，有關東方「仁義道德」之「王道」文化部分的解說。陳逢源引用戴季陶（不過陳逢源本人誤以為是孫文所講）的說法，認為孫文思想奠基於孔、孟提倡的「仁愛」，指出孫文主義與馬列主義正好相反，藉此

⁹⁷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59，352-354，355-356。

⁹⁸ 〈臺灣學聯會否認亞洲民族大同盟有臺灣代表啟事〉，《申報》，1927 年 11 月 3 日，第 3 版。

⁹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449。

¹⁰⁰ 若林正文，《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新北：遠足文化，2020），頁 247-250。

¹⁰¹ 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臺灣文學研究》4（2013 年 6 月），頁 129-165。

¹⁰²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下）》（臺中：晨星，2000），頁 472-474、504。

¹⁰³ 蔡培火，〈與日本本國民書〉，收入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三）》（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156-160。

¹⁰⁴ 有關此論戰，亦可參見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頁 129-165。不過趙文重心在兩方有關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爭論，沒有觸及論戰中有關孫文「大亞洲主義」演講的部分。

批評蔣渭水理論的矛盾。¹⁰⁵ 如前所述，孫文的演講中的確存在著東西人種、文化的對立觀，戴季陶的解說雖然過度強調演講中稱讚東洋道德的「思想面」，仍未完全背離孫文的看法。¹⁰⁶

對此，蔣渭水則明快地回擊，孫文不只不是孔子信徒，反而很崇拜馬克思，「孫先生極力勸告農民組織農民軍來做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鼓吹工人大團結來做國民革命的基礎部隊，就可以知道孫先生有發展到無產專政的可能」。不只如此，蔣渭水還引用了中共黨員瞿秋白（1899-1935）、蕭楚女（1891-1927）的說法，反對孫文受孔子影響，甚至「所謂古代文明東方文化必沒有什麼可貴的地方」。於是，蔣渭水自然已看不到〈大亞洲主義〉中呼籲亞洲團結的內容，而只能看到其中對「唯物主義蘇俄的王道文化」的推崇而已。¹⁰⁷ 從同情西方壓迫下的亞洲為始，左傾知識分子思路的終點，早已不只是亞細亞主義，而是基於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三、辜顯榮與《昭和新報》之亞細亞主義

（一）反對新思潮的辜顯榮

當知識分子的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時，他們不只要面對來自總督府的壓力，還有來自所謂「御用紳士」的抵制。如果說前者是因社會運動隱含的「民族意識」而反對，那同是臺灣人的後者又是基於何種理由呢？又是如何面對當時流行的亞細亞主義呢？觀察辜顯榮的思想與行動，將有助於解答上述問題。

辜顯榮出身寒微，早年曾習漢學，後在臺北經商，於乙未鼎革時，因自告奮勇代表臺北紳商請日軍進城，積極參與總督府施政，遂建立了緊密的政商關係，更因此得以躋身巨富。¹⁰⁸ 雖然辜顯榮曾出資贊助知識分子創立《臺灣青年》，不過當文協成立，社會運動逐漸進展後，辜顯榮也成立公益會對抗。1923 年 6 月 22、23 日，文協在臺中公會堂舉行演講，辜顯榮隨即於 24 日在同地發表演講，強調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得以安居樂業，遠較中國現況幸福，因此絕不可破壞此德政，「寧作太平犬，莫作亂世民」。至於青年亦不可躁進爭取權利，待臺灣人才普及，且與日本人同受兵役義務時，自然可享有相同權利。其實，在期待臺灣人智識提升、權利改善的面向上，辜顯榮的看法並沒有和文協不同，只是「萬事須宜穩健使內地官民得以諒解」。¹⁰⁹ 然而，此一說法卻等同要知識分子放棄已然開展的社會運動，難怪在演講時，文協成員數次要求「中止御用演說」，¹¹⁰辜氏本

¹⁰⁵ 南都生，〈討究渭水君の理論の重大矛盾〉，《臺灣新民報》，1931 年 4 月 4 日，第 5 版。

¹⁰⁶ 有關戴季陶如何繼承、發展孫文〈大亞洲主義〉演講，參見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頁 179-201。

¹⁰⁷ 蔣渭水，〈「御都合主義」是資本主義代辯者の專賣品〉，《臺灣新民報》，1931 年 4 月 11 日，第 9 版；4 月 18 日，第 11 版；4 月 25 日，第 11 版。

¹⁰⁸ 吳文星，〈辜顯榮與鹿港辜家之崛起〉，《國史研究通訊》2（2012 年 6 月），頁 29-35。

¹⁰⁹ 〈辜顯榮君の時事談〉、〈辜君演說の大要〉，《臺灣民報》，1923 年 8 月 1 日，頁 10-12。

¹¹⁰ 〈講演會ごたごた〉，《臺日》，1923 年 6 月 26 日，第 9 版。

人隨後也被指責為「臺灣民眾第一個的公敵」。¹¹¹

知識分子的批評，顯然沒有阻止辜顯榮繼續活動。1923 年 11 月，為抑制文化協會的活動，謀求臺灣人的思想善導，辜氏與林熊徵等人成立公益會。1924 年 6 月，公益會幹部舉行「全島有力者大會」，反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對之，林獻堂則與知識分子組織「全島無力者大會」對抗，公益會受此打擊也一蹶不振，再無其他活動，加上辜、林兩人不和，最終便自然消滅。¹¹²在知識分子眼中，公益會是總督府動員下的產物，連總督府都不得不承認「一千六百名之會員無任何定見與熱意，或因情勢為迎合官憲而入會者居大多數」。¹¹³不過，公益會雖然曇花一現，其內涵卻不像總督府所指稱的空洞，如黃呈聰指出，「凡在舊文化的社會、欲樹立新文化的時候，必要新舊文化的爭鬭，與新舊思想的衝突是同時出現了」，公益會與文協的對立，其背後雖然有總督府的推波助瀾，但其實也代表著新舊文化的衝突。¹¹⁴

從這個角度，能更清楚地理解辜顯榮與公益會的活動。公益會的創立趣意書中，強調：

吾人所生存之社會制度習慣，及道德之標準，良非一朝一夕所架空而造就者。其間經數千年來，大聖人賢哲之研究，及文化之推移，若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有所損益，以構成吾人生活上之基礎者。故墨守舊套者非，而徒驚新奇者亦非也。¹¹⁵

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努力引進的西方現代思想，努力推動的白話文，是能夠普及智識、完成人格、表現個性的「民眾的文化」，而舊文化則是妨害社會進步的「特權階級的文化」，必須予以驅逐。¹¹⁶早年曾習漢學的辜顯榮，顯然相當不滿此風氣，自 1921 年開始，辜氏屢次拜訪田健治郎，痛斥文協、知識分子「宣傳危險思想」、「輕舉妄動」，希望總督府嚴禁。¹¹⁷辜氏之所以組織公益會，正是為捍衛舊文化作為「吾人生活上之基礎」的價值。當然，此一舊文化，毫不意外地就是以孔教為核心的傳統禮教。如臺灣公益會會則上記載的事業項目，¹¹⁸原為「宣傳道德並善導思想」，在創立儀式上通過提議，改為「崇奉孔教並宣傳道德

¹¹¹ 〈時事短評〉，《臺灣民報》，1923 年 7 月 15 日，頁 9。

¹¹²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下）》，頁 352-360。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78-181。

¹¹³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下）》，頁 355；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124。

¹¹⁴ 黃呈聰（劍如），〈文化運動（新舊思想的衝突）〉，《臺灣民報》，1923 年 8 月 1 日，頁 2-4。

¹¹⁵ 〈公益會創立會議〉，《臺日》，1923 年 7 月 19 日，第 6 版。

¹¹⁶ 黃呈聰（劍如），〈文化運動（新舊思想的衝突）〉。

¹¹⁷ 《田健治郎日記》，1921 年 6 月 18 日；1921 年 10 月 09 日；1922 年 1 月 18 日；1923 年 6 月 21 日；1923 年 7 月 02 日。

¹¹⁸ 據《臺灣社會運動史》中刊載之部分會則如下：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稱為臺灣公益會；第二條 本會為圖文化之向上及增進島民共同之福利為目的；第三條 本會以贊同本會之主旨者組織之；第四條 本會為達成第二條之目的順應時勢作如下事項：一、宣傳道德並善導思想。二、社會的事業施設。三、開講演會及發行雜誌。四、前各項以外認為必要事項；第五條 本會設置本部於臺北，置支部於各地。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80。

善導思想」。¹¹⁹辜氏也認為近來各種新學說，「並沒有能勝過延續四千年以上之孔教者，我臺灣有臺灣固有之美風，我等絕不能忘記此事而憧憬其他事物」。¹²⁰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公益會雖然以孔教為重，並不代表其完全排斥新知識，正如會則指出「墨守舊套者非」，公益會舉辦的演講中，不少便與法律常識、自然科學有關。¹²¹

既然知識分子不得不受戰後亞細亞主義風潮影響，發展出其自身的觀點，辜顯榮同樣也是如此。1919、1920 年左右，辜顯榮前往南部視察農場時，曾發表演說，當中稱：

東亞黃種自數千年來，賴為天柱地維，以維持倫理者，實在於孔教。即恃以對抗歐美者，亦在孔教。若變孔教，則東亞文明，失其精神，而不得與歐美相拮抗。孔教所重者，在忠信孝悌、禮義廉恥。¹²²

1923 年籌辦公益會時，辜氏亦演講表示，一戰後西方思想自日本國內逐漸來到臺灣，「其中有不合吾東洋之文明，而為大眾共認為不純者，吾儕可否盲從，不怠余言」。¹²³

如果說知識分子轉化了亞細亞主義中對弱者及弱勢文化的同情，並以此作為反同化之社會運動的後盾，那麼辜顯榮乃是直接接受了亞細亞主義的東、西對立觀來保存舊文化，強調唯有維持「東亞黃種」共有的孔教，才能夠對抗歐美、保障東亞文明的未來。透過辜顯榮於 1924 年撰的《臺灣思想問題》一書，更可清楚地理解其看法。¹²⁴全書之始即批評知識分子一方面自稱漢民族，一方面又拋棄禮教傳統、採行羅馬字，「甘願做白種人的精神奴隸」的矛盾，同時指出西方文明已走入窮途末路，「我們東亞民族才重揭真理之光明，負有再造和平天地的使命」。也因此，全書內容除了批評社會主義、民族自決，以及提出自己對殖民的看法外，貫穿主軸的便是對東洋文化的重視。

最能展現其特色的是書中對東、西文化、歷史的理解。對於雙方文化的差異，書中認為「西方文化的優點就是科學與法政。至於人類文化的精神與倫理綱常，則我東方反而成為西方的模範」。對於雙方歷史的差異，書中則進一步指出西方文明的發展終將陷入生存競爭與弱肉強食，至於東方文明，書中則從周朝的起源及孔子思想，闡述東方文明自古代以來都是以仁愛、節孝為本。換句話說，西方

¹¹⁹ 〈臺灣公益會詳報〉，《臺日》，1923 年 11 月 10 日，第 6 版。

¹²⁰ 〈公益會の講演會〉，《臺日》，1923 年 12 月 6 日，第 2 版。

¹²¹ 例如 1923 年 12 月 5 日的演講有高木友枝的「電氣之オスモーゼ（滲透）」、小泉丹的「自然力與人力」；1924 年 1 月 10 日演講有林庚甲的「就治安警察法而言」、陳增福的「新刑法訴訟法特色」。〈公益會講演會〉，《臺日》，1923 年 12 月 7 日，第 6 版；〈公益會講演會〉，《臺日》，1924 年 1 月 12 日，第 6 版。

¹²²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7），頁 375-379。

¹²³ 〈公益會基隆磋商〉，《臺日》，1923 年 9 月 4 日，第 5 版。

¹²⁴ 此書似未刊行，後收入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辜顯榮傳》（臺北：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1939），頁 313-366。本文採用楊永良之譯本。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379-439。

重「力」而進步，卻有鬥爭；東方重「德」而和平，卻進步緩慢，「然以人道精神觀之，東亞方是正道」。¹²⁵

上述說法雖然承認東西各有利弊，實則受戰後流行的西方衰退論影響，其真正的想法，乃是「東亞方是正道」，除了少數具體的科學、制度外，不須向西方借鏡。就連民主精神，都可從古聖賢尊重民意、民欲的政治理念求得，只是在具體運作上，須參考代議制度而已。全書最後，除呼籲當局提倡忠孝仁義，設置漢文科宣揚東亞文化精神外，也向臺灣人呼籲仿效臺灣之創立者、中日混血之鄭成功，促進中日親善，共同復興東亞文化：

鄭成功向德川幕府請求援兵一事，顯示出中日兩國乃同為黃種人，文化亦屬同一系統，可謂是兄弟之邦。

今日西方之墮落文化及危險思想入侵我東亞之勢，比之當時滿洲愛親覺羅氏席捲中國四百餘州，或許更加猛烈。然而如果今日我們心懷鄭成功之理想，應該能夠力挽狂瀾。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面臨攸關文化興衰、人類存亡之大問題？寄語我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大家奮發起來！奮發起來擁護中國聖賢之王道，擁護忠孝仁義之聖教，擁護東亞文化之精神，以及擁護日本帝國之國體。大家來促進中日親善，更進一步為正義人道，為世界和平而努力。顯榮雖然不肖，但願與諸君共同來繼承鄭成功之遺志，完成一世之盛舉，此乃男兒頂天立地之大志。¹²⁶

同屬黃種人的中日兩國必須團結，而臺灣人乃是中日親善的關鍵，此種說法並不罕見，知識分子的言論也經常出現類似觀點。不過，辜氏對傳統文化的重視——或許也與他對日本統治的接受有關——最終使他在接受亞細亞主義的人種團結、東洋文化復興等說法之後，並未繼續仿效知識分子，深論殖民統治與亞細亞主義的關係。畢竟，既然當時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在臺日人，都贊同漢學、儒教的振興，辜氏何必刻意批評日人，使彼此的結盟關係破裂呢？¹²⁷何況當時辜氏事業經營正面臨困窘，急需臺灣銀行救援，不管理念或實際都沒有與日人敵對的理由。¹²⁸

然而，儘管辜氏選擇了有利於日本統治的做法，文中幾乎將東洋等同於中國的論述方式，以及結尾呼籲臺灣人奮發擁護「中國聖賢之王道」、「忠孝仁義之聖教」、「東亞文化之精神」、「日本帝國之國體」的排序方式，正顯示出其亞細亞主義，終究是基於其臺灣人身分，亦即雖在日本統治下，卻擁有漢文化認同而產生。就此點來看，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辜顯榮，其亞細亞主義的脈絡，仍然延續自領

¹²⁵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406。

¹²⁶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438-439。

¹²⁷ 這種結盟關係的實例，如 1923 年 12 月 5 日公益會主辦的演講會上，室田有（臺北高商教授）演講的「現代文明之缺憾」，最後便以中國六藝以禮樂為先當作例子，強調不可忘卻精神文化的開拓。〈現代文明之缺憾（五）〉，《臺日》，1923 年 12 月 25 日，第 6 版。

¹²⁸ 此事見於辜氏去世後相關人士的回憶。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467、569-570。

臺以來臺灣人對中、日同時具有的折衷情感。只不過到了 1920 年代，當知識分子延續了李漢如提倡新知、爭取權利的理想時，辜顯榮則是與郭春秧相同，將重心放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孔教罷了。

辜顯榮上述言論，當然不是為了自我辯護或博取支持。公益會失敗後，辜氏仍繼續推動傳統文化的宣揚。1924 年，在辜顯榮的邀請下，中國學者辜鴻銘來臺演講，鼓吹復興中國文化。¹²⁹1925 年，辜顯榮參與籌設臺北孔子廟，率先捐出五萬圓經費，並印刷崇敬孔子的宣傳大綱發給兒童。¹³⁰1926 年，接下臺北崇聖會會長一職，主導臺北的孔教祭祀、宣講活動，¹³¹同年當崇聖會發行聖教報時，辜氏也自任聖教報社社長。¹³²辜氏對推廣孔教的態度顯然相當積極，除了前述各種活動外，也曾請求警察臨監孔教宣傳會，以確保其不被反對民眾干擾。¹³³

辜氏希望臺灣人仿效鄭成功推動中日親善的呼籲，也不是單純的口號而已。1925 年，辜氏親自前往中國，歷訪奉天、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會見臨時執政段祺瑞（1865-1936）、西北軍總司令馮玉祥（1882-1948）等人，也透過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本庄繁（1876-1945）認識當時在北京設有大元帥府的張作霖（1875-1928）。¹³⁴一方面，辜氏此行具有改善個人財務狀態的實質目的，其不只擔任段政府的實業顧問，獲授二等大授嘉禾勳章，也與北京企業家開展山西煤礦事業，並計畫與馮玉祥經營黃河流域的甜菜製糖事業。¹³⁵另一方面，其則藉機向中國要人建言中日親善，具體的內容，可從其致後藤新平的一連串信函中得知。

首先是 6 月 10 日的信件，信中記述了 6 月 9 日辜氏與段祺瑞的談話內容，提及雙方眼見美國增設太平洋艦隊及英國建設新加坡基地，都痛切感到日中提攜的重要。對於振興產業，辜氏則建議應統一貨幣及設立中堅銀行，段祺瑞同感有其必要，並提及當下正向美洲、南洋募集華僑股東，計畫設立有力銀行。過程中，段祺瑞對辜氏展現了相當的好意，辜氏數次推辭，都被段祺瑞挽留。信中也談及因五卅事件影響，北京政局混亂、學校紛紛罷課，將再觀察情況，在後信報告詳細看法。不過其認為當下中日民間的聯絡相當重要，希望貢獻微力，至於五卅事件造成的排日排英活動，辜氏指出最初雖是日本資本家的活動所致，同時也諭知當地學生，英國其實乘機離間日中兩國。其已將上述情形及其想法報告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並獲得芳澤謙吉（1874-1965）公使及本庄繁少將的贊同。¹³⁶

在 6 月 14 日的信件中，辜氏對中國政局有更深的認識，指出其已與段祺瑞及新舊各重要人物會見，眾人都曉得日華親善極為重要，尤其段祺瑞更深切感到

¹²⁹ 〈支那の碩儒辜鴻銘氏 近く來臺〉，《臺日》，1924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¹³⁰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110-111。

¹³¹ 〈崇聖會餞筵誌盛〉，《臺日》，1926 年 3 月 7 日，第 4 版。

¹³² 〈聖教報社新成立〉，《臺日》，1926 年 3 月 29 日，第 4 版。

¹³³ 〈孔教會被民眾解散 辜會長請警官臨監〉，《臺灣民報》，1927 年 11 月 20 日，第 4 版。

¹³⁴ 此處楊永良譯本似與原文不合，故改引用原書。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辜顯榮翁傳》（臺北：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1939），頁 430-431。

¹³⁵ 〈日支の合辦で山西炭礦と甜菜糖栽培を計畫せる辜顯榮〉，《臺日》，1925 年 8 月 23 日，第 2 版。

¹³⁶ 〈辜顯榮より後藤新平宛書簡〉（1925 年 6 月 10 日），《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201-016。

如此。只不過段祺瑞雖廉潔，卻無能力克制周邊人士貪瀆，致張作霖能藉「清君側之奸」名義領軍干政。至於排外運動，辜氏認為中國受革命慣性影響，民權昂揚官權下沉，各督軍省長只能媚於輿論，如張作霖、馮玉祥等人在五卅事件時曾請派援軍，其實並無任何定見，只是為了收買人心、拓展權力罷了。排外運動越演越烈，漢口也爆發衝突，面對此情形，辜氏強調日本在華商人必須改變方針，如果繼續與英商同為中國人憤恨的標的，必將永無寧日，「觀我國民之在華境者，全都急於利慾，未遑顧善鄰之大義。動輒傷害華民感情，旦夕結怨紛擾，何親善之有，正是乖離至極」。接著，便希望後藤新平能有所作為，不要讓日本成為中國的敵視對象。信中表示，其已接受實業顧問之職，中國各要人都熱烈接待，議會亦呈現親日態度，辜氏也有心協助外交，但仍躊躇於時局，希望後藤能給予建議。¹³⁷ 由此來看，辜氏雖被指責為「御用紳士」，但其對中日親善，仍維持較客觀的態度，認為若欲改善兩國關係，日本商人必須先改正其欺凌中國人民的舉止。

不過，辜氏不久就決定離開中國，其具體原因不詳。6 月 21 日的信中透露可能的原因。其一，他對中國政局及段政權的實力感到不安。當時在上海的辜氏，雖受親日商團推薦為顧問，據許世英（1873-1964）告知農商部亦推薦其為礦務調查會顧問，但辜氏認為大局未定，政府命令一出北京也無法行使，實際上難以進行實業。¹³⁸ 6 月 26 日的信中，再次提及排外運動的情形與中國政局的混亂，尤其是馮玉祥與廣東政府的態度更令人擔憂，不只段祺瑞只能觀望情勢，北京有識者亦緘口旁觀。¹³⁹

其二，他接到了「不稱心的電報」，而決定歸臺。電報內容雖不清楚，但推測應是信件所提及，華南銀行及商工銀行向他催繳債務一事。辜氏因此倍感憂慮，除了請求後藤協助外，也告知若不須上東京報告或接受指示，他將直接歸臺。¹⁴⁰ 最終，他先上東京報告後，於 8 月上旬歸臺。

整體來看，辜氏此次訪中之行，背後明顯有日本中央政界的推力，辜氏自稱其任職實業顧問一事已得加藤高明（1860-1926）首相的諒解及後藤新平的大力贊同，¹⁴¹ 尤其已是亞細亞主義者的後藤，可能希望透過辜氏推動經濟之提攜，進而達成中日親善，以抵抗歐美勢力。辜氏的身分的確有利於中介日中關係，據他事後自述，中國政府各要人都將他視為臺灣華僑，且能以北京話溝通，容貌態度又都與中國人相似，因此都能一見如故地誠心交換日中共榮的根本策。他勸中國學生不應排日而應團結日本以對抗英國，也因中國人將之視為華僑，而博得不少

¹³⁷ 〈辜顯榮より後藤新平宛書簡〉（1925 年 6 月 14 日），《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201-013。

¹³⁸ 〈辜顯榮より後藤新平宛書簡〉（1925 年 6 月 21 日），《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201-026。

¹³⁹ 〈辜顯榮より後藤新平宛書簡〉（1925 年 6 月 26 日），《後藤新平文書》，J-DAC 資料番號：201-027。

¹⁴⁰ 〈辜顯榮より後藤新平宛書簡〉（1925 年 6 月 21 日）。

¹⁴¹ 〈日支の合辦で山西炭礦と甜菜糖栽培を計畫せる辜顯榮〉，《臺日》，1925 年 8 月 23 日，第 2 版。

贊同，對於緩和排日相當有效。¹⁴²然而，殖民地人民繞過總督府直接從事民間外交，甚至涉入中國政治，恐非總督府所樂見，當時總督伊澤多喜男（1869-1949）不只不積極協助辜氏重整債務，也不贊同辜氏任實業顧問，如伊澤所言「站在我的立場，因怕會影響到國際關係，所以不敢發表意見，我叫他自己斟酌」。¹⁴³辜氏之所以離開中國，可能是總督府間接逼迫所致。辜氏離開後，中國政局愈加混亂，1925 年 10 月爆發反奉戰爭，孫傳芳（1885-1935）、馮玉祥起兵反對張作霖，1926 年 4 月，段祺瑞被逐下野。辜氏的中日經濟提攜計畫與其實業顧問一職，遂因之落得有名無實。

（二）《昭和新報》的亞細亞主義議論

公益會失敗後，辜氏除了繼續參與孔教活動，以及前往中國倡導中日親善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昭和新報》的創立。《昭和新報》是由新竹鄭肇基等人主導的純漢文週刊報，1928 年 10 月獲得總督府許可創立，¹⁴⁴11 月 10 日昭和天皇即位典禮當天發行創刊號。其宗旨乃是「循帝國統治之根本義，就政治經濟產業其他各項問題，公是公非，不偏不黨，正直言論，確實報導，因以維持東洋道德，融合內臺感情」。¹⁴⁵據《臺灣民報》報導，其股東、職位及經營陣容如表 3-2：

¹⁴² 〈日支の合辦で山西炭礦と甜菜糖栽培を計畫せろ辜顯榮〉。

¹⁴³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467。

¹⁴⁴ 〈純粹漢文報紙昭和新報經當局諒解許可〉，《臺日》，1928 年 10 月 23 日，第 4 版。

¹⁴⁵ 〈宗旨表明〉，《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10 日，第 2 版。

表 3-2 《昭和新報》創立時的經營陣容

昭和新報股東及重役		
股東	股數	職位
新竹 鄭肇基	350	社長
臺北 辜顯榮	100	取締役
臺北 許 丙	100	取締役
基隆 顏雲年	100	取締役
臺北 林熊徵	100	取締役
臺北 謝汝銓	50	監察役
桃園 簡朗山	50	監察役
臺南 許廷光	50	監察役
高雄 藍高川	50	監察役
高雄 陳啓貞	50	監察役
編輯部成員		
姓名	職務	備註
謝汝銓	主筆	前《臺日》社記者
吳鴻燼	記者	
陳江浦	記者	前《臺日》社記者
其他譯文託《臺日》社的漢文記者翻譯，另有某君不定期出勤，為主筆監督。		
營業部成員		
宮崎健三	部長	前やまと新聞臺灣支局長
事務員（男三名，一名為謝汝銓子）、女事務員二名、專用車夫一名、小使一名。		
備註	各股東的職位，除社長之外，係《臺灣民報》推測股份 100 股以上為取締役，50 股以上為監察役。另外，發行人為李良弼。	

資料來源：〈請看昭和新報的陣容〉，《臺灣民報》，1928 年 12 月 9 日，第 2 版。

從股份觀之，《昭和新報》的主導者為鄭肇基，據《臺灣民報》報導，其創刊動機，乃是他曾因舉辦醮事及土地放領問題遭受報刊攻擊，親身感受到言論機關的力量，而希望創立報刊作為後盾。¹⁴⁶當局知悉後答應發給許可，條件是辜顯榮、林熊徵、許丙（1891-1963）也必須參加，外傳辜氏原欲爭社長之位，最後仍由鄭氏任社長。¹⁴⁷1929 年 3 月，《昭和新報》正式設立株式會社，取締役為鄭肇基、徐杰夫（1871-1959）、陳啓貞（1883-?），其中取締役互選鄭氏為社長，監察

¹⁴⁶ 〈昭和新報的正體？〉，《臺灣民報》，1928 年 11 月 4 日，第 4 版。

¹⁴⁷ 〈昭和新報出現〉，《臺灣民報》，1928 年 10 月 28 日，第 2 版。

役則由許丙擔任，¹⁴⁸至於辜顯榮則任顧問。¹⁴⁹顯示辜氏等人對該報內容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股東網羅全島各地大資產家，編輯部員亦多出自《臺日》的《昭和新報》，並沒有獲得《臺灣民報》的青睞。早在《昭和新報》創刊前，《臺灣民報》就認為其「正體既然如此，其將來所發出的言論的價值自然可以豫料的」，呼籲民眾予以監視。¹⁵⁰創刊後，攻擊益加猛烈，從其「思想善導」的宗旨到其個別的記事，都是《臺灣民報》的批評對象。¹⁵¹在知識分子眼中，《昭和新報》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御用報紙，如王受祿（1893-1977）等人向日本議員表示，「《昭和新報》雖是漢文報紙，其實是比於三日刊新聞御用色彩更濃厚的，所以不能看作代表臺灣民意的機關，不過是要設來作魚目混珠的」。¹⁵²

知識分子的批評並不是無所根據，鄭肇基在創刊號中，雖指出「或有疑本報設立之動機者，是直弓影杯蛇，不怪而怪。本報岸然獨立，不依附人」。¹⁵³但到了第七號，《昭和新報》的評論欄「新春秋」就轉而強調政府為社會全體共用，因此報紙並非不可被政府御用，反倒是絕不可被少數私有的黨派運用，甚至表示「被政府御用，更勝於政府御不用者萬萬矣」，暗諷《臺灣民報》。¹⁵⁴《昭和新報》的創立背後，總督府也的確有介入，其後身《南邦新聞》停刊時就將時任警務局保安課囑託、負責參劃高等警察事務的金田耕作，¹⁵⁵稱為《昭和新報》的「生父」（産みの親）。¹⁵⁶總督府協助創立《昭和新報》的用意，不外乎是要對抗已移臺發行的《臺灣民報》，可能也打算同時許可《臺灣新民報》及《昭和新報》發行日刊。¹⁵⁷

或許因其「御用」背景過於鮮明，《昭和新報》早期經營並不順利，遂於 1929 年 4 月 29 日天長節後決定並刊日文，轉而拓展日人市場。¹⁵⁸不過，《昭和新報》雖然不能代表多數知識分子反殖民的輿論，但觀察其內容，仍有助於認識創報勢力的真實想法，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說，就是葉榮鐘（1900-1978）所言「明白臺

¹⁴⁸ 〈本報組織會社 經開創立總會〉，《昭和新報》，1929 年 3 月 23 日，第 2 版。

¹⁴⁹ 〈辜、鄭兩氏的確執〉，《臺日》，1929 年 12 月 29 日，第 7 版。

¹⁵⁰ 〈昭和新報出現〉。

¹⁵¹ 略舉幾例，如連雅堂，〈質昭和新報 何謂統治根本 何謂思想善導〉，《臺灣民報》，1928 年 11 月 18 日，第 5 版；陳秋逢〈讀昭和新報「思想善導在導不善者」之疑義〉，《臺灣民報》，1928 年 12 月 9 日，第 7 版。薛玉龍，〈請教昭和新報記者的幾點〉，《臺灣民報》，1928 年 12 月 23 日，第 8 版。

¹⁵² 〈臺灣議會請願 委員王氏的感想談〉，《臺灣民報》，1929 年 3 月 10 日，第 4 版。

¹⁵³ 〈敬告諸君〉，《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10 日，第 15 版。

¹⁵⁴ 〈新春秋〉，《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¹⁵⁵ 伊藤滿雄，〈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頁 16。

¹⁵⁶ 〈感慨無量〉，《南邦新聞》，1942 年 6 月 28 日，第 1 版。

¹⁵⁷ 例如陳逢源就曾向林獻堂報告相關傳聞：「逢源謂聞臺灣新聞社內之人言《新民報》及《昭和新報》皆許可為日刊新聞，接此消息即欲登之新聞，州當局命其暫祕勿發表云云」。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13），1929 年 12 月 6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灌園先生日記>（以下出版項省略），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不過，或許是經營欠佳之故，《昭和新報》最終沒有發行日刊。

¹⁵⁸ 〈昭和新報紙面刷新〉，《臺日》，1929 年 4 月 30 日，第 4 版。

灣這些所謂有力者們，到底唱的是甚麼調，講的是甚麼白」。¹⁵⁹

如該社是「循帝國統治之根本義」所言，《昭和新報》確實有著親政府的立場。在《昭和新報》創刊號、第二號的報導中，不少是與慶祝昭和天皇即位有關，包括典禮內容、詔書、祝詞等，¹⁶⁰往後幾號也可看到讚揚總督的報導。¹⁶¹即使有對總督府的施政建議，或者希望總督府積極登用臺灣人，其語氣也不像《臺灣民報》般針鋒相對。¹⁶²就此點而言，《昭和新報》確如知識分子的批評，有著一定的「御用」特色。

不過，除了此「御用」特色外，值得注意的，還有該社致力於「維持東洋道德」，《昭和新報》進一步敘述其內涵：

經明治大正兩聖世，秉國鈞者，專趨歐美文化，偏重物質的文明，閑却精神的文明。且自歐戰收局，人心激變，歐美奔放之思潮，氾濫及於我東亞，鄰邦早受其累，本邦亦殆哉岌岌。入此昭和新聖世，久閑却之精神的文明，不可不有以振作之。¹⁶³

屢次出現在辜顯榮、公益會言論中的東西文化觀，又再次出現。如果認為辜顯榮、公益會，如前述般不只是一味依循總督府的命令，也是士紳為了捍衛傳統文化而產生的組織。同樣的認識，也適用在《昭和新報》。《昭和新報》所維持的東洋道德為儒教，除了第三號就以全版轉載北平學界建議中國政府祀孔的意見書外，¹⁶⁴也不時出現論述傳統禮教的文章。¹⁶⁵其「思想善導」亦非以日本國體、精神為重，而是指忠、孝、悌、義、信等傳統倫理。¹⁶⁶不只報社本身，連讀者寄稿都云「仁義忠信」為事物之本，或云文章不可離「孔孟之道德」，呈現出其捍衛傳統道德的態度。¹⁶⁷

《昭和新報》對中國事務的關注，顯示其與日人所營「御用報」的不同之處。

《昭和新報》對日本國內的報導較少，除了在昭和天皇即位、新年等節慶時轉載相關報導或慶祝祝詞外，主要僅及於與臺灣有關的事務。相較之下，對於中國，舉凡中央及地方政局、財政、文教等無所不報，對中國現狀感到憂慮的同時，也表達對中國未來能夠逐漸取回國權、建設國家的期盼。¹⁶⁸有時也轉載日人所寫的

¹⁵⁹ 葉榮鐘，〈談談昭和新報〉，《臺灣民報》，1928 年 12 月 9 日，第 8 版。

¹⁶⁰ 相關報導主要散見在《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17 日，第 2-3 版；《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17 日，第 2-4 版。其後偶爾也有報導，如第三號中有辜顯榮參加典禮的感激談，〈參列即位大典榮歸 辜顯榮翁感激談〉，《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24 日，第 10 版。

¹⁶¹ 如〈川村總督胸中策〉，《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便是在稱讚總督府的預算案中對工業化及南支南洋的重視，同時也有相關建議。

¹⁶² 如〈論臺灣統治之現狀 內政外政刷新期迫〉，《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8 日，第 4 版。當中即希望「賢明之川村總督」能夠改進自治制度、財政及南支南洋等事務。又如〈宜為學生籌出路 待遇與內地人略同〉，《昭和新報》，1928 年 2 月 23 日，第 8 版。

¹⁶³ 〈宗旨表明〉，《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10 日，第 2 版。

¹⁶⁴ 〈請改定祀孔典禮〉，《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24 日，第 5 版。

¹⁶⁵ 例如〈國之四維〉，《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15 日，第 9 版。

¹⁶⁶ 〈思想善導 在導不善者〉，《昭和新報》，1928 年 11 月 24 日，第 2 版。

¹⁶⁷ 陳春林，〈天爵人爵比較〉；愛道生，〈文不離道〉，《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15 日，第 8 版。

¹⁶⁸ 〈民國十八年 將見多幸歟〉，《昭和新報》，1929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

相關文章，例如〈國際資本主義與中國抗拒運動〉一文，結論指出列強對中國的榨取，不得不激起中國的反抗，以求其自由幸福。¹⁶⁹尤其是中日關係因北伐而惡化，日人已不太談論亞細亞主義時，《昭和新報》仍堅定地呼籲中日兩國親善。對於一時流行的日英協調之說，《昭和新報》不只指稱其是時代錯誤之謀，更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身為亞洲國家，面對西方勢力安危與共，不可委屈求日英同盟，應圖中日親善，才是東方大局長治久安之策。接著，文中也指出日本應以同種之友愛，同情此時尚開始建設新民國之中國，不應選擇日英協調，而再次惹起中國人之民怨。對照《臺日》強調日英協調之說乃是中國之咎由自取，《昭和新報》並未將過錯怪罪在中國，而是試圖以亞細亞主義喚起日本的同情。¹⁷⁰

此一看法在《昭和新報》中不時出現，例如曾參與「全島有力者大會」、¹⁷¹任職該社的新竹士紳林震東（1877-1944），¹⁷²亦在報上發表〈日華親善之難易〉，鼓吹亞細亞主義。全文首先追溯近代歷史，「自與白人通商，我亞細亞民族之膏血，被白人緬載以去者，真余取余求，不汝瑕疵，雖未至將亞洲地皮，盡綰之西去，然相去之間，實不能以寸」。一戰之後，又將化兵戰為商戰，向亞洲傾銷商品，盡載亞洲財富回歐美，亞洲人也不得不「聽白人之呼馬呼牛，指揮而東西之，以服奴隸任務」。林氏認為，此並非因亞洲資源不如歐洲，若能結合中國豐富原料、人力及日本之資本，必能與白人角逐商戰，而是中國在二十一條、濟南事件後對日本懷有積憤，使得兩國不能合作。於是建議日本必須恢復中國的信任，改變好弄策術的外交，以「誠」為根本，派出得信望的國民與中國交涉，約定一方面中國延長日本在滿蒙的權益，一方面日本則放棄片面條約，果能如此，日本能保持一定權益，中國也能由衷信任日本，兩國自然便能團結對抗歐美。¹⁷³

雖然《昭和新報》背後的「御用紳士」們，並不像知識分子一樣，對內以亞細亞主義反思臺灣殖民問題，但並不代表當其對外思考中日關係時沒有身為臺灣人應作為兩國間的橋樑、東亞大局的關鍵之覺悟。他們不只與知識分子同樣深切地希望中日兩國能實現真正的團結，共同抵禦西方國家的不義，也都同意只有日本先改善其態度，才能根本地解決兩國間的齟齬。像林震東或辜顯榮等人，甚至能更現實地考慮兩國利益，為改善兩國關係提出建議或奔波從事「國民外交」。可惜的是，在中國政局愈趨混亂，日本國內亞細亞主義也退潮的情況下，林、辜兩人的呼籲終究石沉大海。

¹⁶⁹ 〈國際資本主義與中國抗拒運動〉，《昭和新報》，1929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原始文章為岡野一朗，〈國際資本主義と支那の抗拒運動〉，《外交時報》，1927 年 9 月 1 日、1927 年 9 月 15 日。

¹⁷⁰ 〈日英協調未可 同盟更不可〉，《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8 日，第 2 版。

¹⁷¹ 〈全島有力者大會〉，《臺日》，1924 年 6 月 28 日，第 4 版。

¹⁷² 〈御用紳士が大喧嘩〉，《臺灣民報》，1929 年 12 月 29 日，第 11 版。林震東（1877-1944），本名林榮初，譜名傳外，號震東，又號震公、又號潛園小主人等，為新竹林占梅孫，早年與謝介石相交頗深，後又與黃郛有往來，而能從容遊歷於滿洲、中國等地。《新竹市志》（新竹市：新竹市政府，1997），卷二住民志下，頁 632-643；卷七人物志，頁 138-139。

¹⁷³ 林震東，〈日華親善之難易 關於東亞大局奚若〉，《昭和新報》，1928 年 12 月 1 日，第 8 版；〈日華親善之難易 關於東亞大局奚若〉（續），《昭和新報》，1929 年 2 月 2 日，第 3 版。

第四節 小結

儘管亞細亞主義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流行，1895 年臺灣劃歸日本統治後不久，就已在臺灣出現。對於接受了新政權的臺灣傳統士紳來說，要求日本擔起「興亞」重責，協助其手下敗將中國振興之亞細亞主義，正是一個能滿足士紳之新恩舊義的理念，為了實現此一理念，臺灣被賦予中介開化中國的使命。雖然一些殖民者同樣認識到了臺灣擁有的特殊地位，進而要求日本不應循西方先例統治臺灣，但在後藤新平的主導下，終究採取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方式。臺灣傳統士紳雖然直至日俄戰爭前後仍寄望於亞細亞主義，卻顯然未得到在臺日人的呼應。

在臺日人雖然在領臺初期拒斥了亞細亞主義，但當亞細亞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流行並被引介至臺灣後，也不免俗地隨之呼應。很快地，在臺日人將其臺灣化，指出臺灣可作為中日合辦的基座，以推展中日親善。雖然在臺日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之後因中日關係惡化而消退，其對東洋文化的重視卻沒有，給予「御用紳士」與之合作的空間。

亞細亞主義的傳入，也使得在臺日人思考其與殖民地臺灣的關係，1910 年代，伊藤政重等亞細亞主義者相信，為了要實現中日親善，必須積極使臺灣人誠心同化為日本人，並曾致力追求此目標。不過，當總督府於 1920 年代正式以同化作為統治基調後，在臺日人也未再深入思考兩者關係。值得一提的是，主導早期治臺政策的後藤新平，在前往滿洲後，搖身一變成為了亞細亞主義者，並開始主張臺灣統治是中日親善的關鍵，並一反其早期想法，轉而重視「一視同仁」及宣揚日本精神。直到 1920 年代，當其回憶早年施政時，仍是從亞細亞主義的角度出發，指出其始終與西方帶有侵略性質的殖民政策不同。

至於臺灣人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細亞主義的流行，活化了臺灣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由郭春秧、李漢如的行動顯示，臺灣人更能親身從事中日親善活動。進入 1920 年代，對於亞細亞主義，臺灣社會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對抗關係。一方面，受了新教育的知識分子選擇與日人相左的立場，發展出以反同化為核心主張的亞細亞主義，認為唯有改善臺灣的統治，使臺灣人獲得自主人格，才能贏得同樣正爭取自主人格之其餘亞洲人的支持。隨後，進而藉此爭取臺灣人的權益，推動社會運動。

另一方面，辜顯榮等「御用紳士」雖配合總督府阻礙社會運動，但其思想與行動反而呈現出其不單是受迫於總督府的壓力，且因他們對傳統倫理的重視而合作。也就是說，為了維護作為東洋傳統的儒教，其選擇與同樣高唱復興東洋傳統的日人合作，共同對抗積極引進西方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當其提倡或投身中日親善活動時始終保有一定的自主性，並不諱言日本負有改變其錯誤的對中政策之責任。由此觀之，事實上，知識分子和「御用紳士」同樣都自覺身為臺灣人乃是中日親善的橋梁，只不過前者將重心放在臺灣內部，試圖改善臺日人間不對等的

關係，後者則將重心放在臺灣外部之中日兩國間，採取溫和的態度面對兩國，除了維護兩國共同的傳統文化外，也試圖調和兩國的利害關係。

綜觀上述言行，從領臺初期的粘舜音、學友會，到 1920 年代形形色色的在臺日人、臺灣人群體，可說都是基於自身所處的環境，發展自身的亞細亞主義議論並參與相關活動，或聚焦於對內之臺灣統治問題，或參與對外之中日親善事務。不過，儘管各自言行不一，整體觀察臺灣內部並未因亞細亞主義發生明顯的族群對立。畢竟當時亞細亞主義尚未成為主流思想，就總督府、在臺日人而言，尚未有積極依照亞細亞主義實行統治或向外發展的必要；就知識分子而言其主力運動仍在依西方民主理論改善統治、促進文化，亞細亞主義僅時而出現在其議論內；¹至於辜顯榮的公益會則如曇花一現，其海外行動也未獲總督府支持，對整體中日關係影響甚微。

最後，此一時期日、臺人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重點仍以經濟、文化為主，蓋此時日本仍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在華盛頓體制下，日本的東亞政策不得不立足於國際協調主義，任何涉及改變列強現勢的政策在現實上不可能實現。無怪乎，當中國國民黨發動北伐，直接威脅到日本在中國的特殊權益時，日本國內曾一度出現日英協調之說，亞細亞主義的議論遂因此消退。當九一八事變爆發，國內外政治情勢改變，亞細亞主義思想成為主流後，日、臺人將如何反應，前述關係又會有何種變化，乃是下一章擬探討的課題。

¹ 據當時日人觀察，主張黃色人種團結之亞細亞主義被當時臺灣青年視為脫離現實的空想，因此專注於該主義的青年不多。安藤盛編，《臺灣文化運動の現況》（東京：拓殖通信社，1926 年），頁 5。

第四章

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與日、臺人之思考

如小寺謙吉的《大亞細亞主義論》或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演講〉（日譯「大亞細亞主義」）——所示，「大亞細亞主義」長期以來與「亞細亞主義」、「泛亞細亞主義」、「亞細亞門羅主義」等用詞在語意上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不過自九一八事變（日文為「滿洲事變」）後，當亞細亞主義勢不可擋地瀰漫於日本民間、政府、軍等各界時，多數人採用「大亞細亞主義」一詞，例如由松井石根（1878-1948）等人成立的「大亞細亞協會」便是一例。此「大亞細亞主義」受到時代背景影響，也擁有與過去不同的特色。曾批評該思潮的蠟山政道（1895-1980）表示，九一八事變後流行的「以日本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或亞細亞門羅主義」，一見雖與「泛亞細亞主義」類似，但後者並不只是呼籲亞洲團結而已，更擁有一個具體目標，即是「以已是先進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國家的日本為槓桿，為遂行其大陸政策，要抑制其他同列之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國家」。¹ 又文部省思想局指出，「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張者認為「亞洲的再建與秩序化完全是皇國日本的重責」，並引用了大亞細亞協會成員鹿子木員信（1884-1949）的說法，「如滿洲事變，即是『皇國秩序之精神，記下為遂行其世界史上的使命，而堂堂地邁出的一步』」。² 簡單來說，即是有著以日本為中心積極向外擴張，排除其他國家的性質，此「大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有何關係，在臺日人官、軍、民，以及在此一時期臺灣人又有何種思考，乃是本章擬探討的課題。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國內之大亞細亞主義潮流

一、九一八事變與其遺產

1931年9月18日，在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1885-1948）與石原莞爾（1889-1949）的策畫下，奉天郊外柳條湖附近的滿鐵線路遭到爆破，負責守備鐵路的關東軍宣稱爆破係中國軍所為，以自衛名義占領奉天，九一八事變於焉爆發。³ 這也是部分日本學者所謂的「十五年戰爭」之開始，如江口圭一指出，九一八事變、

¹ 蠟山政道，《日滿關係の研究》（東京：斯文書院，1933），頁310-311。

²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下（東京：文部省學生部，1934），頁72。雙引號內的原出處為鹿子木員信，《皇國と亜細亞》（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3），頁11。

³ 戶部良一，〈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收入《第1期「日中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翻譯版）》（東京：日中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2010年），網路版出自日本外務省網站，網址：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rekishi_kk.html，閱覽日期：2024年4月6日。

中日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爭（アジア・太平洋戦争）並不是各自獨立，而是相互具有內在關聯的戰爭，「在滿洲事變的延長線上以華北分離工作為中介爆發日中戰爭，在日中戰爭的延長線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連動爆發亞洲太平洋戰爭。而是否應解消滿洲事變的產物滿洲國則是日美交涉最大的爭點之一，在此意義上滿洲事變與亞洲太平洋戰爭間也有直接關聯。加上日本對中國的武力侵略，橫跨這十五年間未曾間斷一直持續走在擴大的道路上」。⁴雖然有學者對此提出反論，指出不只其實際上只有十四年（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更容易因此忽視1933年塘沽協定簽訂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的四年間中日兩國仍可能迴避戰爭，而落入戰爭必然發生的單線史觀。⁵不過，不管贊成或反對「十五年戰爭」論，不可否認的是，在1931年後的日本國內，無論布衣、卿相，都必須思考該如何承擔九一八事變最大的遺產——滿洲國。

滿洲國從誕生開始可以說就與亞細亞主義脫離不了關係。九一八事變的主導者石原莞爾相信，代表東方文明的日本，未來終將與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國決戰，唯有占領滿蒙，才能確保最終的勝利。並相信日本具有拯救中國的天職，滿蒙在日本占領下不但各民族都能共榮共存，更能使中國人由衷歡迎日本對中國本土的統治，中國也將獲得統一和安定。⁶雖然在中央堅持下，關東軍的計畫從直接占領改為建立獨立國，但滿洲國的建國過程中，同樣充斥著亞細亞主義。滿洲國建國的推手、自治指導部的日本人，分別有著希望實現民族協和的滿洲青年聯盟、抱持興亞理念的笠木良明（1892-1955）及大雄峯會，以及認為透過農民自治將能改善農民生活、復興傳統東洋「王道政治」的橘樸（1881-1945）。這些思想，與滿洲地主的保境安民主義，以及地方社會原先存在之重視傳統宗教道德的元素揉合，最終確立以「王道」為核心的建國理念。⁷如建國宣言所述，此「王道主義，必使境內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臺，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型」。⁸滿洲國從此成為東洋傳統能否復興、東亞各民族能否真正團結，以及日本能否領導這些民族的實驗場。

在日本國內，由高橋是清（1853-1936）推動的財政改革，也提供了使滿洲國的理念逆流回日本帝國內的基礎。一方面，以殖民地的工業化，增加帝國內部對重工業製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透過貶值日圓，將日本國內及殖民地的輕工業製品大量輸出。結果除了使日本能領先脫離大蕭條外，對內促使殖民地經濟成長，並強化了日圓集團，亦即是日、臺、鮮、滿間的經濟結合，對外則以殖民地作為中介，與歐美各國競爭其亞洲殖民地及中國的市場。在此背景下，不只日本國內對日本殖民地體制的信心大增，經濟學者更主張，由於日本產品價格、運費

⁴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東京：青木書局，1986），頁4。

⁵ 黒沢文貴，〈戦後日本の近代史認識〉，《法學研究》73：1（2000年1月），頁515-517；戸部良一，〈日中戦争をめぐる研究動向〉，《軍事史学》46：1（2010年6月），頁6-9。

⁶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2006），頁47-57。

⁷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頁82-119。有關中國地方社會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以及與日本的結盟，見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89-129。

⁸ 國務院統計處，《滿洲國年報》（大連：滿洲文化協會，1932），頁27-29。

皆較歐美各國低廉，若以日本為中心重新構築亞洲經濟，將能夠減少亞洲受到的剝削，從而增進亞洲各國的繁榮。⁹

於是，輿論指出代表各民族共榮共存、異於歐美侵略政策的「王道政治」，不只是滿洲國的建國理念，更應作為東亞經濟圈（ブロック）的指導原理。¹⁰並強調日本的外交，「應讓迷途的聯盟歸於正道，對於遠東和平守護者日本的責任與決意，世界的認識為之一新」。¹¹不過這次和一戰時不同，亞細亞主義確實得到了政府的肯定，1932年6月，眾議院一致通過承認滿洲國之決議，政友會的議員森恪（1883-1932）表示其意義係「與西洋的物質文明袂別，回歸傳統日本精神，基於東洋原來的文明及理想，守護我等之亞洲」。同年8月，外務大臣內田康哉（1865-1936）發表「焦土演說」，表示就算全國化為焦土也要捍衛滿洲國。同年9月，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並於1933年3月退出國際聯盟。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聲明，反對列強介入中日關係。種種情勢，呈現出日本已改採以亞洲為中心的外交政策，例如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Grew，1880-1965）就指稱，「日本已決心實行『回歸亞洲』的運動」。¹²

1934年，第三次全亞細亞民族大會在大連舉行。參加的日本代表共14名，包括全亞細亞協會專務理事今里準太郎及大日本生產黨等右翼團體的成員，亞洲各地代表則有13名，其中4名居住在東京。因滿洲國也派出代表，中國方面遂無人出席。¹³會議於2月11日（正逢日本的紀元節）展開，會上決議促成日滿中三國的融和、建立亞洲聯盟、亞洲經濟圈，以及支持各地獨立運動等，並決議要求中國反省其外交政策，以及支持滿洲國參加遠東運動會。¹⁴這次會議的意義有二：其一，由於中國代表的缺席，會議遂在日本代表的主導下進行，甚至會議的事務局長也由滿鐵職員出任，因而確立日本作為亞洲盟主，推動實現亞細亞主義的立場。其二，會議場所刻意選在大連英國領事館對面的旅館進行，呈現公然敵視歐美的態度。¹⁵日本中心及公然敵視歐美，正是大亞細亞主義的特徵。易言之，異於一戰後的情形，日本已不惜明確地與歐美敵對，以求本於日本精神，主導亞細亞主義的實現。

⁹ 松浦正孝，《「大東亞戰爭」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頁198-233。

¹⁰ 〈アジア的文化の西欧支配への叛逆〉，《讀賣新聞》，1934年9月3日，第3版。

¹¹ 〈臨時議會と外交政策〉，《朝日新聞》（東京），1932年8月20日，第3版。

¹²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626-629。井上寿一，《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頁89-129。不過，井上指出，1930年代的日本外交並不是一味的反對歐美，而是從試圖取得一定的協調，漸漸地走向對抗。

¹³ 僅有一名已在日居住28年、支持滿洲國成立的中國學生，在會議前不久被主辦方選出。後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1930年代「南進」の論理・「日本觀」の系譜》（東京：勁草書房，1986），頁162。

¹⁴ 〈アジア連盟結成案可決〉，《朝日新聞》（東京），1934年2月13日，第3版；〈アジア民族準備會議ひらく〉，《神戸又新日報》，1934年2月13日，版次不明，出自「神戸大学新聞記事文庫」，網址：<https://da.lib.kobe-u.ac.jp/da/np/>，閱覽日期：2024年4月6日。

¹⁵ 後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1930年代「南進」の論理・「日本觀」の系譜》，頁161-164。松浦正孝，《「大東亞戰爭」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181-185。

二、日本國內之大亞細亞主義運動

1933 年 3 月，在松井石根主導下，大亞細亞協會在東京成立。松井石根為日本陸軍內部著名的「支那通」，曾致力促成中國南北政權的融和，對於九一八事變最初採批判態度。使其大亞細亞主義覺醒的契機，乃是他於 1931、1932 年間擔任日內瓦裁軍會議全權委員。他認為席上的歐美列強都在確保自國利益，並無裁軍的誠意，而九一八事變爆發，不只日本受列強抨擊，同為亞洲國家的中國，更在席上猛烈攻擊日本，於是歸國後開始鼓吹亞細亞聯盟論，相信擁有共同文明、文化、人種、感情、歷史、傳統，以及共同利害的亞洲國家，才有能力處理亞洲問題。除了日、滿、中的提攜外，在所述日本經濟體制轉換的背景下，松井也主張向南方發展，不只要聯絡南中國政權，打擊親英的國民黨政權，還要聯合南洋、南亞的各民族，如此才能為亞細亞聯盟創造有力的基礎。為了達成這些理想，乃於 1933 年 3 月成立大亞細亞協會。¹⁶在創立趣旨中揭示，「作為亞洲諸民族的自強與團結之指導，改善偏重歐洲的現國際機構，在人種平等、資源衡平的原則上創建新世界秩序，才是恢弘我建國之理想，扶植皇道於四海之一路。」¹⁷明白地反映出大亞細亞主義以日本為中心，聯絡亞洲各國的理想。

除了松井石根本人利用擔任臺灣軍司令官及視察滿洲、中國的機會，在各地宣傳大亞細亞主義之外，松浦正孝研究指出，由大亞細亞協會本部及各地支部成員形成的「網絡」(ネットワーク)，也成為此思想的推手。在殖民地，臺灣、朝鮮先後於 1933 年、1934 年成立支部，分別有著連接華南、南洋及滿洲的性格。在中國各地，1933 年短暫存在的廣東大亞細亞協會，以及 1936 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國大亞細亞協會，則鼓吹反蔣、反歐美的思想。在南洋的菲律賓、緬甸、荷屬東印度等地，和當地日本人結合，從事親日宣傳，增進日本勢力。日本國內的成員則遍布官員、軍人、學者、輿論界、實業家等，尤其是在松井於 1935 年編入預備役後，開始積極地在國內各地遊說，支部也紛紛組建。靠著此一網絡，協會名義上雖是非政治的思想交流團體，卻宣揚並推動實踐大亞細亞主義，甚至中日戰爭爆發後，進而組織反英運動，將戰爭擴大成反歐美的「大東亞戰爭」。¹⁸

對大亞細亞主義潮流，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的，還有頭山滿、內田良平、大川周明等眾所皆知的亞細亞主義者。異於大亞細亞協會，這些人士將其原有的結社轉變為政治團體，與民間右翼勢力相結合，期望透過社會運動改變日本及亞洲的現狀。1924 年，大川周明與滿川龜太郎(1888-1936)、笠木良明等人組織「行地社」，提倡排除西洋物質文明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日本的影響，並研究如何以日本精神實施國家改造，但至 1931 年都未有檯面上的活動。¹⁹趁著九一八

¹⁶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514-567。

¹⁷ 〈大亞細亞協會創立趣意書〉，《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4 年），頁 1-4。

¹⁸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568-581、633-722。

¹⁹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研究資料》27（1933 年 4 月），頁 548-549；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

事變後的愛國熱潮，以及大蕭條後社會的不景氣，1932 年行地社改組為「神武會」，同年眾議院總選舉時派遣遊說團至全國各地，鼓吹日本主義、強硬外交、打倒財閥及既成政黨。其奉行之主義，乃是「宣揚神武建國的精神，向皇室宣誓忠誠，無窮護持神聖國體，堅確將天業恢弘四海之覺悟，並先自任解放及指導有色民族之責，更向世界道義的統一勇往邁進」。²⁰不過，當大川於同年因涉及五一五事件被捕後，神武會的行動逐漸沉寂，²¹最終於 1935 年宣告解散。²²

另一方面，頭山滿、內田良平於 1931 年 6 月，以黑龍會為基礎組成大日本生產黨，由內田擔任總裁、頭山擔任顧問。綱領集中在以「大日本主義」建立君民一體的國家，具體例如限制資本、提升民力、振興國民精神等。九一八事變後，綱領中則新增了「誘導開發支那」，以及驅逐白人勢力、建設亞洲等內容。²³對於九一八事變後的情勢，內田認為日本扶植滿洲國，是為了確立東洋和平的當然行動，並指責歐美各國過去向外灌輸西方思想，使亞洲國家人民思想分裂，紛紛叛離祖國，亞洲遂因此被蹂躪。內田呼籲，日本的對外政策應排除西方思想，代之以皇道精神，自主地向外宣布皇道，而唯有皇道精神才能調和物質和精神文明以救濟全人類。²⁴1934 年，生產黨成員出發參與全亞細亞會議前，內田署名發表的聲明書也提及亞洲民族的結合是「屬於日本人本來使命之大精神」，欲「對白人的亞洲侵略政策下最終的處斷」。²⁵其中強調日本之使命、精神，且明顯對西方具有敵意，同樣呈現出大亞細亞主義的特徵。根據警察方面的說法，大亞細亞主義與日本主義相同，都是以自國優越思想為本質，不過其特徵乃是特別主張對外活動，積極謀求以日本文化、民族性、國體同化融和他民族。²⁶是以，神武會或生產黨會在九一八事變後鼓吹大亞細亞主義，並不令人意外。

生產黨的活動，除了針對時局問題，在各地舉行遊行、演說，或出版相關刊物外，曾於 1932 年參與選舉，後於 1933 年因青年部成員參與神兵隊事件而一時沉寂，1934 年又在內田的主導下，重新整備陣容，並逐漸挽回黨勢。1934 年時共有 5542 名黨員，支部遍及北海道到宮崎。²⁷生產黨等右翼團體，雖然不像大亞細亞協會擁有政界上層人士的支持，但透過煽動普羅大眾，為激起大亞細亞主義輿論造成一定效果。例如 1933 年 2 月其在大阪舉辦鼓吹退出國際聯盟的大演說會，吸引約三千名的聽眾，並以緊急動議向首相及各當局提出「國際聯盟脫退決議」。²⁸當在臺日人右翼勢力出現後，也嘗試與其合作，將勢力擴大到臺灣。

運動》上（東京：文部省學生部，1934），頁 18-20。

²⁰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上，頁 68-70。

²¹ 喜入虎太郎，《國家主義運動の理論と現況》（新光閣，1934），頁 112-113。

²² 勞働經濟調查所，《愛國運動現勢 第 1 輯》（勞働經濟調查所，1935），頁 89。

²³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上，頁 57-64。

²⁴ 內田良平，《對外國是樹立の急務》（東京：鈴木一郎，1934），頁 1-17。

²⁵ 大日本生產黨編纂委員會，《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東京：大日本生產黨，1941），頁 165。

²⁶ 奈良縣警察部，《國家主義運動の意義》（奈良：奈良縣警察部，1933），頁 38-39。

²⁷ 內務省警保局，《昭和九年中に於ける社會運動の狀況》，頁 775-777，國立公文書館請求番号：平 9 警察 00373100。

²⁸ 大日本生產黨編纂委員會，《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頁 115。

三、國內日人眼中之大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統治

(一) 新聞人山田武吉(1871-ca.1939)之「民族融和」與「文明」、「野蠻」觀

在國內大亞細亞主義者的眼中，大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有著什麼樣的關係，日本又應如何面對其殖民地，新聞人山田武吉的看法，或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山田武吉，筆名芙峰，出身明治維新後家道中落的士族。早年曾在東京山林學校旁聽學習日本國學、漢學、德語等，雖有意繼續就學，但迫於家境不得不放棄，前往其父就職地水戶任職《茨城日報》。²⁹ 1896年，山田渡臺任臺北縣屬，³⁰隔年被命令非職，³¹1900年正式退官。³² 既然官場發展有限，山田遂重回新聞界，他於非職前早已在《臺灣新報》上投稿政論，之後先任職《臺日》，1900年進入在臺日人創辦的《臺灣民報》。³³ 1904年，《臺灣民報》被禁止後，該社理事曾試圖以山田為代表，以「臺灣時事日報」之名再興事業，未獲當局許可。³⁴ 然而他不改其志，1906年旅居福州，替《臺日》及《大阪新報》報導當地新聞，³⁵1907年前往朝鮮，在《平壤日報》擔任主筆。³⁶不久，於1912年前往滿洲，歷任《滿洲日日新聞》記者、³⁷《大陸》月刊編輯人，³⁸以及自行組織之「滿洲社會事業研究會」機關誌《社會研究》幹事長。³⁹ 1930年返回日本務農，⁴⁰不過仍活躍在《日本及日本人》、《大日》等雜誌上。自25歲即離開日本國內，分別在臺灣10年、朝鮮5年、滿洲18年，前後30餘年皆在殖民地從事言論工作的山田武吉，的確擁有豐富的殖民地經歷。

山田武吉早年並非一名亞細亞主義者，1900年義和團事變爆發時，曾積極支持向中國出兵，認為派出大軍將能在列強中贏得聲譽及發言權，而因其交戰對象係義和團等少數排外守舊派，無須擔憂受中國人的怨恨。⁴¹然而，他在滿洲的經歷，以及一戰後各國對日本移民的排斥，讓他逐漸產生了亞細亞主義思想，他

²⁹ 山田武吉，《草莽文叢》（東京：大日社，1936），頁520-528。秋永常次郎，《水戶繁昌記》（水戶：知新堂，1896年），頁101。

³⁰ 山田武吉，《草莽文叢》，頁321。

³¹ 由於他同時也獲得昇級，背後原因大概是出自總督府事務上的調整。「山田武吉昇級ノ上非職ノ件（元臺北縣）」（1897-07-0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元臺北縣進退永久保存第十四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269077。

³² 「非職屬山田武吉退官賜金ノ件（元臺北縣）」（1900-07-01），〈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元臺北縣進退永久保存第四十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301030。

³³ 〈入社の辭〉，《臺灣民報》，1900年11月3日，第3版。

³⁴ 〈臺灣時事日報發行願の却下〉，《臺日》，1904年4月5日，第2版。

³⁵ 〈軍隊の行動と外交〉，《臺日》，1900年8月19日，第3版。

³⁶ 日本電報通信社，《新聞總覽》（1911年版）（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11），頁396-397。

³⁷ 日本電報通信社，《新聞總覽》（1913年版）（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13），頁417-416。時任社長恰好是前《臺日》社長守屋善兵衛。

³⁸ 日本電報通信社，《新聞總覽》（1922年版）（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22），頁943。

³⁹ 滿洲公論社，《滿洲新聞雜誌總覽》（1927年版）（大連：滿洲公論社，1927年），頁46-47。

⁴⁰ 山田武吉，《草莽文叢》，自序頁1、頁530。

⁴¹ 〈軍隊の行動と外交〉，《臺日》，1900年8月19日，第3版。

於 1920 年時寫道「日本必須更向海外發展。此雖是因人口、食物的關係而必然發生，也因日本擁有使其他黃人國或黃人種的文化、產業、社會、風氣等，隨著自己的發達，一同進步向上的使命」。⁴²

不可否認的是，山田武吉思想的出發點，乃是日本的「生存權」，其於 1920 年代不斷呼籲更新滿蒙政策，即是將滿蒙切離中國，化為日本的「特殊地域」，如此才能解決日本的人口、糧食問題。不過，另一方面，他強調此是日本「為中國及東亞之大局計」，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⁴³其對日本殖民政策的認識是產生此看法的關鍵，他從日本歷史以及日本對臺灣、朝鮮的開發來看，指出日本對滿蒙應「以文化主義、經濟主義為根柢」，採「新殖民政策」或「文化政策」，使當地人感受到聖德，絕不可單走「機械的物質方面」之路。⁴⁴儘管缺乏直接證據，山田卻明顯受後藤新平《日本膨脹論》的影響。⁴⁵正是基於此理解，山田認為「我國之殖民政策，在提高亞細亞洲有色人種之文化與實力，為進行亞細亞主義途程中之一階段，其宗旨在共榮共存，並非侵略的、征服的、高壓的行為」。也就是說，取得滿蒙不只能保全日本的生存權，又將為中國民族帶來善政，看似矛盾的「滿洲與中國本部脫離實為中國之利益」的說法遂得以被合理化。⁴⁶

對於合併滿蒙，山田武吉提出四種可能方式，直接合併、委任統治、與張作霖合作，以及他評為「最妙，惟時機難得」的扶植溥儀，由日本掌握財、政、軍等一切實權。⁴⁷神奇的是，這竟然與歷史的走向若合符節，回國後的山田，除了與民間右翼有所往來，⁴⁸他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提倡，也隨著事變和滿洲國的建立而愈發積極。載於 1933 年 5 月的〈日本主義與亞細亞主義〉呈現出強烈的日本中心及反西方的看法，其中說明日本主義為日本建國精神、國體、皇道等之具體化，即「德治」理念。基於德治，應對內排除重權勢、功利、物質欲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白人思想。接著指出「亞細亞主義必定是日本主義向外的延長」，對外亦應以日本主義，打破白人帝國主義對亞洲的壓迫，解決國際間的不公平。⁴⁹

山田武吉的看法，可說是典型的日本主義、大亞細亞主義觀點。不過讓他突出於一般國內日人者，乃是在殖民地的經驗，不得不使他思考日本與歐美殖民政策的差異。1924 年，他論及英屬蘇丹的民族運動時，就早已指出歐美各國的殖民政策是基於白色人種與有色人種間的優劣關係，因此帶有強制、壓迫的性質，日本卻是以有色人種殖民有色人種，彼此同是亞洲民族，文化也未必劣等，因此

⁴² 山田武吉，《大日本帝業の古今》（大連：大陸社，1920），序頁 2。

⁴³ 山田武吉，《日本新滿蒙政策》（上海：民智書局，1927），引用的文字出自頁 72。

⁴⁴ 山田武吉，《大日本帝業の古今》，頁 58-60。

⁴⁵ 除了用詞的類似外，此篇文章原載於 1916 年 4 月，正好是同年 2 月後藤一書出版後不久。山田武吉，《大日本帝業の古今》，頁 53。

⁴⁶ 山田武吉，《日本新滿蒙政策》，引用的文字分別出自頁 17-18、71-72。

⁴⁷ 山田武吉，《日本新滿蒙政策》，頁 29-30。

⁴⁸ 山田曾在行地社的機關誌《日本》投稿，在其所著《草莽文叢》中也有頭山滿題字「破邪顯正」。

⁴⁹ 山田武吉，〈日本主義と亞細亞主義〉，原載《日本及日本人》272（1933 年 5 月 1 日），後收入《草莽文叢》，頁 143-150。

絕不可適用歐美各國的殖民政策，而須「增進東洋的文化與實力，更以其殖民地作為亞細亞民族聯盟之梯子」。呼應了他對「新殖民政策」或「文化政策」的看法。⁵⁰到了1930年代，他依舊批評西方殖民政策的不正義。當1935年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時，他雖然表示能諒解領土小國義大利向外發展的必要，但依舊批評此舉是「蠶食領土的利己行動」，「與其他白人國領土擴張式的殖民政策當然是大同小異」。最後，呼籲日本應以此為鑑「在革新內地政治的同時，大大地更新外地政策」。⁵¹

那麼，具體而言應如何更新呢？在〈大亞主義的真諦與順路〉一文中，屢次強調的「民族融和」，應該就是其回答。該文寫於1934年，大亞細亞協會在臺灣設立支部後不久。其中首先指出早期的治臺政策，雖然促成了物質的進步，但始終未建立民族融和的方針，仿效白人國家的殖民政策，鼓勵製糖等資本主義事業的發展，使得臺灣人不平，而有反日行動。山田指出，必須適宜取締欺弱怕強的漢人，否則將引起在臺日人的不安，破壞外地政策中最重要的民族融和。接著，話鋒一轉，指責外地日本人往往基於優越感壓迫當地人，激起反抗，係「背叛大亞細亞主義，阻礙民族融和」。「大亞細亞主義的真諦」就是依循著日本建國以來逐漸包容異民族擴大的精神，以破邪顯正的方式遏惡揚善，與其他民族盡可能地融和協調。「大亞細亞主義的順路」就是沿著外地、滿洲國，最後則讓中國覺醒的順序，一步一步推動民族融和。文末，山田再次說明「真實的大亞細亞主義」，乃是「平等之下的差別，差別之上的平等」，「若有獨立的可能性則使之獨立，不然則將之置於日本的指導啟發下，使之保持無大害的舊慣古俗」。結論指出日本的政策應寬猛適宜，若能公正、嚴明地實施，不只外地的民族，外地外的民族也將再再接受「皇化」，民族融和、大亞細亞主義，即是「皇國日本的天業」也將實現。⁵²

其後，山田分別對朝鮮、中國（廣東）大亞細亞協會的設立發表評論，主軸雖各有不同，⁵³最終仍是強調外地政策改革的重要，以及日本人應慎重誠摯地向外推展皇道，不可抱有夜郎自大的優越感。⁵⁴

一方面極度推崇皇道，相信皇道必能包容亞洲各民族，一方面又指責日本人的優越感，山田武吉為何會有此種奇特的態度？〈野蠻與文明及野蠻人與文明人〉一文中對文明、野蠻的討論，可以找到答案。文中先談到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並提出「野蠻與文明的問題」，即是「若定義野蠻是指文化無法進步、無法辨明

⁵⁰ 山田武吉，〈埃及事件と日本の植民策〉，《滿州日日新聞》，1924年12月9日，版次不明，出自「神戸大学新聞記事文庫」，網址：<https://da.lib.kobe-u.ac.jp/da/np/>，閱覽日期：2024年4月6日。

⁵¹ 山田武吉，〈伊・エ紛争と白人國の植民政策〉，《草莽文叢》，頁218-224。

⁵² 山田武吉，〈大亞主義の眞諦と順路〉，收入《草莽文叢》，頁150-156。

⁵³ 對於朝鮮，山田強調朝鮮併合的正義性，以及朝鮮在日滿結合上的重要性；對於中國，山田則指出中國覺醒的困難，不只國內仍有以夷制夷的思想，廣東大亞細亞協會的華商成員也是為了防共、保全自己利益而鼓吹，並沒有理解大亞細亞主義的真精神。

⁵⁴ 山田武吉，〈朝鮮と大亞主義との關係〉、〈大亞細亞主義と支那〉，收入《草莽文叢》，頁156-162、162-167。

事理道義，文明是指文化勝出而能解理義道」，為何「文明國」義大利對「野蠻國」衣索比亞展開無理、野蠻的侵略。又以泰雅族為例，指出其雖有「蠻性」，但本性單純正直，具撫育教化義務之日本，在道義上不可以優越感凌辱殘害。接著，山田就開始討論文明與野蠻的關係，認為能保有神賦的「天性」者才是真正的文明人，反倒是所謂的「文明人」實際上卻沉迷科學、物質文明而失去天性。

對山田而言，「文明」、「野蠻」並不具有絕對的優劣關係，甚至所謂的「文明人」，往往才是失去天性的墮落者。其文中的「文明人」、「野蠻人」，不只指義大利、衣索比亞或日本人、泰雅族，作為一名堅信日本建國神話的日本主義者，其更想討論的其實是現代日本人及遠古日本人。在他眼中，日本人在原始民族時代與其他「野蠻人」相同，尚能擁有神性。現代日本人卻因社會進步而失去了純真，成了捨本逐末、物質中心的「文明人」，否認天皇神性及日本國體。尤其是西方思想及物質文明，更讓天皇機關說、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紛紛出現，也就離神更遠。握有支配權、越「文明」的上層政治家、學者、富豪當然被物質迷惑更深。文末則指出真正的文明、野蠻的區別，不是在於物質、外觀，而是在於精神，有色人種亦不乏優秀人才。因此山田最後呼籲，從人種平等的角度來看，必須打破「文明人」白人將有色人種視為「野蠻」的偏見。⁵⁵

山田武吉雖然對日本有著強烈的自豪感，對於日本國體、民族的「神性」、「大業」也沒有一絲懷疑。然而，他重新解釋「文明」、「野蠻」的真實意義後，他想要恢復的所謂原始日本「神人合一」的「德治的聖業」，反而更與保留著天性的「野蠻人」，即是被西方殖民的有色人種，或是被日本殖民的泰雅族類似。

也就是說，當他理解到日本人如何被「文明」污染，被西方「文明國」歧視，又被上層階層支配時，他就能夠理解殖民地人民如何同樣地被「文明」及「文明人」支配，進而同情殖民地人民的處境。日本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其實不過就是一體的兩面，只是前者要打破日本國內的不公義，後者是要打破殖民地內、亞洲內的不公義，其中殖民地內的不公義，當然也包括了日本資本家及一般日人的優越意識。

山田武吉在殖民地的經歷，使他在大亞細亞主義逐漸具體化的 1930 年代，仍不斷回顧殖民地的現實狀況，一度被忘卻的亞細亞主義與殖民統治的問題，遂再次被提出。山田並沒有懷疑日本統治的正當性，以臺灣而言，他沒有否定日本治臺的物質成就，對於漢人的抗日行動，也毫不猶豫地呼籲總督府予以壓制。無庸置疑，其出發點始終以日本為中心，相對於伊藤政重等反對總督專制的早期亞細亞主義者，山田則不斷強調應以恩威並施、寬猛並濟的方式統治，其「民族融和」的理想也是指日本建國，向外吸收各民族擴張的過程。但山田對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等近代西方「文明」的仇視，則讓他面對大亞細亞主義理想與現實間的差異時，並非單純攻擊臺灣人的排日行為，而是站在被殖民者——同樣被「文明」的資本主義、優越意識影響，脫離純真狀態的人們——的角度，指出日本資本家的壓迫及日本人的優越意識是促使民族融和失敗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尊重了臺

⁵⁵ 山田武吉，〈野蠻と文明と野蠻人と文明人〉，收入《草莽文叢》，頁 481-486。

灣人的特殊性。

1935 年，臺灣地方自治制公布，同樣是大亞細亞主義者的竹井十郎（1881-1949）將之抨擊為不懂「皇謨」、未能讓臺灣人真正「皇化」的總督府所推行的「一大惡制」。⁵⁶一樣著眼於「皇化」的山田武吉卻不反對，認為從漢人本身具有的保甲、幫派來看，給予原有一定自治能力的漢人議決權限反而才是當然。他並非不清楚臺灣人受中國影響的抗日態度，只不過他相信只要改成武官總督制，就能防此弊害，而且還能阻絕日本國內政黨個人主義、資本主義之弊進入臺灣。當日本人的優越感、日本資本家的壓迫、當地人的反日都被抑止後，民族鬥爭也不會發生。為了實現大亞細亞主義，謀求東亞隆興發展，外地政策必須成功地調整日本人、當地人的質和量，阻止民族鬥爭。⁵⁷綜觀山田於 1930 年代所寫的文章，他始終使用「外地」而非「殖民地」，使用「民族融和」而非「アツシミレーション」(Assimilation，即指同化)，⁵⁸其實也是在強調有著融和亞洲民族大業的日本，其「外地政策」，必須本於日本獨特之建國理想，即是大亞細亞主義，而非西方殖民地政策。

（二）社會學者圓谷弘（1888-1949）與〈皇道主義下的臺灣〉

山田武吉的看法，雖然能作為「大亞細亞主義者」的一例，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山田早於 1920 年代已有亞細亞主義思想，其觀點對於全面地理解 1930 年代大亞細亞主義的影響仍有一定侷限。為臻完備，本文接著將考察社會學者圓谷弘（1888-1949）所寫的〈皇道主義下的臺灣〉。

圓谷弘畢業自京都帝國大學，1920 年任教日本大學，擔任新設的社會科主任，歷任預科長、學校長，1946 年任理事長。⁵⁹著有《我國資本家階級的發達與資本主義的精神》(1920)、《現代社會政策》(1926)、《集團社會學原理》(1934)、《支那社會的測量》(1936) 等書，另於 1927 年創刊《社會學徒》雜誌。圓谷就讀京都帝國大學時，受教於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受到內藤的影響，始終對中國問題有所關注，但到了 1930 年代，才有機會親自前往滿洲(1933 年 9 月)、臺灣(1935 年 1 月)、中國(1935 年 10 月)等地視察。⁶⁰

圓谷表示訪臺的原因，乃是自滿洲視察後，深感有必要前往已領有四十年的臺灣考察，具體目的有四：一是因日本將對東亞展開積極的大陸政策，需要考察日本人與其他民族接觸的狀況；二是在臺灣實地考察海軍觀點下的國防問題，以及以南洋為中心之日本的防禦線；三是為了推測臺灣工業化的未來發展；四是透過原住民的研究原始文化。圓谷於 1935 年 1 月元旦抵臺，在總督府的安排下，

⁵⁶ 竹井十郎，〈日蘭神戶海運會商其他〉，《大亞細亞主義》1935 年 4 月，頁 36。

⁵⁷ 山田武吉，〈外地臺灣の問題を論ず〉，收入《草莽文叢》，頁 173-179。

⁵⁸ 例如〈大亞主義的真諦與順路〉一文中就寫道，融和「並非西語『アツシミレーション』，我皇國應執的大乘法是去小異就大同的融和政策」，《草莽文叢》，頁 154。

⁵⁹ 「日本大学の歴史」，網址：<https://www.nihon-u.ac.jp/history/forerunner/tsumuraya/>，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⁶⁰ 圓谷弘，《支那社會の測量》（東京：有斐閣，1936），序頁 1。

3 日前往高雄，隨後北上參訪臺南、嘉義、臺中、臺北，14 日出發返回日本。⁶¹

刊登在《社會學徒》上的〈皇道主義下的臺灣〉，是圓谷訪臺後的感想，文中討論了民族接觸及工業化的情形，實則主軸是圍繞在民族問題上。圓谷指稱，殖民政策的原則應是有效搾取殖民地，臺灣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出發點」甲午戰爭的結果，但在「一視同仁的皇道政治」下，臺灣的現況，與「西歐式、侵略式、帝國主義」式的殖民完全相反，臺灣人的生活相當富裕，日本人卻難以臺灣人競爭。在教育上，同樣採行一視同仁的方式，移入日本的道德、宗教規範。至於工業化，他認為臺灣除糖業以外過去幾乎沒有近代工業，此時靠著日月潭的電力，以及華南、南洋的市場，若願意推動，未來必定有很好的發展。

整趟旅程既然是總督府所安排，他會有上述判斷實不足為奇。奇特的是，在見過實地之後，圓谷弘的看法竟然與山田武吉類似，認為日本應從東洋盟主的角度，重新思考治理臺灣的方式。雖然圓谷認為在「皇道主義」下，臺灣人生活相當富足，在結論中卻嚴厲批評總督府，指出強硬推行的一視同仁政策，無法改變擁有長期民族傳統的臺灣人。同時，擁有經濟優勢的臺灣人又承擔過少財政負擔，享有過多社會福利。相較於日本建國以來採放任主義，「保持原樣」地融和各民族，現在的統治方式則是性急地實施政治性、公式性的一視同仁，無怪乎有議論云「若臺灣的自治制一完成，就要請內地人都回國」。在經濟上，長期偏重農業生產也為工業化造成阻礙。最後，圓谷認為急躁地打破當地的風俗習慣，並非「東洋盟主」應行的殖民政策。日本人與當地人的互動，必須在科學性的分析研究下展開，且在考量民族意識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上，實行一視同仁主義。若理想的「皇道政治」能在臺灣實現，將向採行帝國主義的歐美國家及被壓迫的亞洲民族，證明日本民族的政治才能，以及「皇道政治」的高遠內涵。⁶²

如同後藤新平曾經強調過，科學式的舊慣調查是使人民接受日本國粹，使「日本膨脹」的關鍵，在此處，圓谷弘則認為應以科學性的分析研究實現「民族融和」。用詞不同，但意義相差不大。圓谷弘一例的重要性，在於顯示出在大亞細亞主義的影響下，社會學界對於西方殖民政策，如何從 1920 年代普遍的重視轉變成質疑。而在此過程中，圓谷對殖民地的見解會與後藤新平類似，並不意外。

也因此，相較於山田武吉，實地來臺考察過且身為學者的圓谷弘，對於總督府的政治雖然有更務實、具體的批評，但是其對殖民地臺灣的看法整體上則與曾受《日本膨脹論》影響的山田相似。兩人都基於大亞細亞主義，認為肩負推廣皇道、擔任亞洲盟主任務的日本，絕不可採行與西方相同的方式治理殖民地，臺灣統治也被賦予了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任務。既然大亞細亞主義的目的是要以日本的皇道領導、統合亞洲各民族，如何妥善處理臺灣的民族問題，便成了統治最重要的任務。

⁶¹ 圓谷弘，〈皇道主義下的臺灣〉，《社會學徒》9：3（1935 年 3 月），頁 1-4。

⁶² 圓谷弘，〈皇道主義下的臺灣〉，頁 1-18。

第二節 1930 年代臺灣報刊界之構成

當日本國內已掀起大亞細亞主義熱潮，在擁護日本傳統，反對西方文明、殖民主義的背景下，國內日人紛紛呼籲以大亞細亞主義為主軸決定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政策。那麼同一時期，實際上在殖民地臺灣的人們如何思考大亞細亞主義？國內日人不斷提及的，日本人與其他民族「融和」、「接觸」的情形對此又有何種影響？最直接的回答便是觀察當時輿論，不過在這之前必須先釐清言論界的組成情形。

一、日刊報紙

1930 年代臺灣的日刊報紙分別有全島性的《臺日》、《臺灣新民報》，以及地方性的《臺灣新聞》（臺中）、《臺南新報》（臺南）、《東臺灣新報》（花蓮）。上述報紙中，除了《臺灣新民報》外，通常被批評為「御用紙」。不只是因為其皆獲得總督府的契約，負責以附錄形式發送總督府及地方政府的官報，¹更因其本身的歷史。以《臺日》為例，最初是後藤新平為統一殖民地輿論，1898 年整合《臺灣日報》及《臺灣新報》而成，歷任社長幾乎都是總督府官員出身，主筆與總督府也有緊密的關係。² 1932 年，《臺灣新民報》（下稱《新民報》）獲准日刊，與《臺日》等報紙不同，繼承自《臺灣民報》的《新民報》，是由臺灣人知識分子主導，自非「御用紙」無疑。儘管如此，歷經社會運動左右分裂後的《新民報》，為避免左傾人士滲透奪權，而刻意過濾左傾人士入社，實際上也只能代表右派知識分子的聲音。³

二、《臺灣經世新報》、《南日本新報》及其他純日文的週、月刊

日治時期所有居住臺灣的人們，當然不能被簡單地二分為親總督府人士（《臺日》）與臺灣人右派知識分子（《新民報》）兩類而已。在第三章曾提及對總督府不滿的民間日人、前民眾黨成員等左派知識分子、親總督府但仍有自身看法的「御用紳士」，其想法應從何得知？答案就在各種週、月刊雜誌中。這些刊物雖然不

¹ 詳言之，《臺灣日日新報》為總督府的府報及臺北州報；《臺灣新聞》為臺中州報、《臺南新報》為臺南州報、《東臺灣新報》為花蓮港廳報。

² 第一代社長守屋善兵衛（1898-1910 在職）原為後藤新平（總督府衛生顧問）書記，退任《臺日》社長後隨後藤至滿洲就任《滿洲日日新聞》社長。第二代社長今井周三郎（1910-1912）原為總督府土木局官員。第三代社長赤石定藏（1912-1923），雖非總督府官員，但同樣為後藤系人物。第四代社長井村大吉（1923-1927），曾任臺北廳長、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長、大連取引所所長。第五代社長河村徹（1927-1944），則是井村大吉任臺北廳長時的庶務課長，1919 年轉任總督府主導的臺灣製腦任職，並於 1927 年進入《臺日》任副社長，井村於同年病逝後，遂接任社長一職，並長期擔任總督府評議會會員。在主筆的部分，1931 年以後的主筆大澤貞吉，則是長期擔任臺北市協議會員。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47-53；「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³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年），頁 255-256。

像日刊報紙即時報導最新消息，卻因此有更強的論議色彩，如《昭和新報》稱，其價值在「網羅其事實，或鑑別其是非，或剖析其隱微，或窮探其究竟，以其事無遺漏，言之周詳」。⁴此特色，正好提供了一個更深入理解當時社會輿論的管道。

日本領臺初期，以日人律師為中心，於 1900 年創辦《臺灣民報》，代表民間日人輿論批評總督府的統治，發行部數幾乎可與《臺日》比擬。然而，在後藤新平統一殖民地輿論的新聞政策下，《臺灣民報》於 1904 年被取消發行許可。⁵《臺灣民報》雖然停止發行，其理事蓑和藤治郎（號米南，1872-1941）⁶於 1916 年後擔任稻垣孫兵衛（號其外，ca.1868-1937）經營的《臺灣商事報》社長，該報於 1918 年改名為《臺灣經世新報》（下稱《經世》）。⁷自擔任社長後，蓑和幾乎每週都在報上發表評論，1920 年代時曾批評大正民主主義及臺灣人社會運動，呼籲回歸傳統日本精神，⁸可以說《經世》所代表的，乃是右傾在臺日人的聲音。⁹

同樣由在臺日人組織的民間雜誌，還有《南日本新報》（1928 年自月刊改為週刊），其前身為伊藤政重創刊之《實業之臺灣》。1920 年，臺灣子供世界社社長吉川精馬（?-1926）繼承《實業之臺灣》，¹⁰於 1925 年改名為《南日本新報》（下稱《南日本》）。1926 年，吉川精馬過世後，其父利一（1868-?）繼承事業。¹¹《南日本》主筆為柴田貞一（原《臺日》記者，1888-?），¹²1936 年柴田自行創刊《臺灣時代》旬刊後，改由吉川利一之子，曾任小學校訓導的省三（1905-?）擔任。¹³相較於《經世》，《南日本》的主導者與總督府關係較深，同樣由吉川家族主導的臺灣子供世界社，更經常替各級學校出版書籍。或許因為此緣故，《南日本》並不像《經世》明顯右傾，¹⁴不過其亦同樣強調「愛國」和「國民精神」。¹⁵

除了《經世》、《南日本》外，進入 1930 年代後，由日人新創的各種週、月刊，受時代背景影響，多數也帶有右傾特色。最顯著的，是田中一二（1885-1951）

⁴ 〈週刊紙之價值〉，《昭和》，1929 年 1 月 1 日，第 18 版。

⁵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76-77。

⁶ 原名蓑輪藤次郎，1912 年後漢字表記改為蓑和藤治郎。「辯護士蓑輪藤次郎氏名訂正方認可（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1912-03-01），〈明治四十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五十四卷司法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500009。

⁷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頁 36。

⁸ 例如在民眾黨結黨後，他不只認為在未有參政權的臺灣，組織政黨一事毫無意義，對於民眾黨的綱領政策，也幾乎都表示反對的態度。蓑和藤治郎，《米南文集》（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28），頁 749-755。

⁹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208-210。

¹⁰ 吉川精馬，〈本誌改造五週年を迎へて〉，《實業之臺灣》16：10（1924 年 10 月），頁 50。

¹¹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衆人事録 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臺灣頁 54。

¹² 〈人事〉，《臺日》，1926 年 2 月 18 日，夕刊第 1 版。

¹³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頁 34。

¹⁴ 筆者參照駒込武對各週刊攻擊臺南長老教中學、淡水中學運動相關報導的整理，除去《南瀛》不存的 1936 年 4 月以後的數據，《南日本》係各週刊中相關報導最少的。此統計雖可能因版次不全、伏字等因素而不見得絕對正確，但似可為《南日本》的立場做一旁證。駒込武著，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臺灣人的學校之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下冊，頁 853-877。

¹⁵ 例如〈讀書界に見る 愛國熱の勃興〉，《南日本》，1932 年 4 月 1 日，第 7 版；〈新總督の第一聲〉，《南日本》，1932 年 4 月 8 日，第 1 版。

主導的《南國青年》月刊，之後改名為《新臺灣》（1932年）、《臺灣》（1934年），並於1936年改為旬刊，¹⁶同年9月後又改名為《全臺新報》。¹⁷田中一二早年曾任職伊藤政重的《全臺日報》、《實業之臺灣》，1911年離臺，1917年再渡臺進入《臺日》任職，1919年因揭露總督府秘密而離開《臺日》。隨後於1927年自行創立臺灣通信社，繼續從事新聞事業。1920年代末期，田中開始投身青年運動，希望教化日本人青年為皇室中心主義的模範國民。1932年後，進而重視國防問題，1933年創立大日本國防青年會。《南國青年》與其後身的《新臺灣》、《臺灣》，因此具有重視國防的特色。¹⁸

與《新臺灣》相關的人士為岩本嗣泰（筆名秋心，1885-?），岩本歷任《臺灣パック》主筆、《經世》社會部長、《新高新報》主筆。¹⁹1932年末，為了籌辦「新日本國防青年團」，²⁰也因《新臺灣》經營不善，田中與岩本私下達成協議，以6000圓之代價交換其編輯、經營權，並協助將其改為週刊。當局於1934年得知後，認為此種買賣將成為惡例，表示不會予以許可，但若岩本另提出申請則有獲同意的可能。²¹於是《新臺灣》的經營編輯重回田中手中，並於1934年5月改名為《臺灣》，²²岩本則於同年另創立《臺灣時事新報》週刊，²³標榜徹底的日本主義，²⁴與《新臺灣》同樣呈現重視皇室、國防的右傾立場。²⁵

三、《新高新報》、《南瀛新報》、《昭和新報》與其漢文欄

自由派日人主導的週刊則有《新高新報》及《南瀛新報》。《新高新報》（下稱《新高》）自1928年後的主筆為唐澤信夫（1894-?），1931年後唐澤升任社長。其具有明確親民政黨色彩，自1920年即鼓吹自治，對臺灣人的社會運動抱有一定的同情，²⁶與臺灣人知識分子亦有來往，是日人中的自由主義者。在唐澤主導下，《新高》分別於1931年、1933年，邀請臺灣報界、社會運動界等各種民間人士舉行模擬議會。²⁷《南瀛新報》（下稱《南瀛》）的主筆為泉風浪（1893-?），泉曾於1919年2月參與日本普選運動示威，同年9月來臺後亦與左翼運動有關聯，

¹⁶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頁55。

¹⁷ 〈社告〉，《全臺新報》，1936年9月1日，第1版。

¹⁸ 宮崎聖子，〈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田中一二の青年言説と実践〉，《南島史学》83（2015年11月），頁1-16。

¹⁹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附錄頁1。

²⁰ 〈新日本國防青年團を創設〉，《臺日》，1932年11月28日，第2版。

²¹ 〈正しき者は遂に勝つ〉，《南瀛》，1934年5月12日，第4版。

²² 〈社告〉，《臺灣》5：5（1934年5月），頁19。

²³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頁48-49。

²⁴ 〈臺灣時事新報許可さる〉，《南瀛》，1934年5月5日，第9版。

²⁵ 例如1935年1月1日新年號，即用了第2、3版稱頌天皇、皇后的聖德，第4版說明倫敦海軍軍縮會議。《臺灣時事新報》，1935年1月1日，第2-4版。

²⁶ 例如對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他雖然一方面認為運動只是高唱口號，缺乏具體建議，一方面卻也批評在臺日人的「違憲」反對論。唐澤信夫，《明日の臺灣》（基隆：新高新報社，1928），頁42-58。

²⁷ 第一次舉辦在1931年2月14日，第二次舉辦在1933年2月17日。唐澤信夫編，《模擬議會速記錄》（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頁5。《新高》，1933年2月10日，第2版。

曾擔任農組顧問。1930年代，《南瀛》對右翼、軍部始終保持批評態度。²⁸

在《新民報》過濾左傾人士入社的情況下，左傾的前民眾黨成員，多數轉進《新高》、《南瀛》的漢文部中。1931年後長期任《新高》漢文部主筆者為楊珠德（生卒年不詳），²⁹後於1935年升任取締役。³⁰楊係彰化士紳楊炳煌（1875-ca.1930s）之子，他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不明，不過其兄弟楊珠浦（1896-1966）曾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³¹其本人行動亦受警察機關注意。³²楊珠浦主持下的漢文部，與倡導臺灣新文學的臺灣文藝聯盟（文聯）有很深的關係。1934年漢文總支社成員有支社長楊珠浦，編輯賴明弘（1915-1958）、許嘉裕（生卒年不詳），其中賴明弘即與張深切（1904-1965）等人一同倡建文聯，而楊、許亦是文聯的支持者。³³其他曾任《新高》記者的文聯成員，還有賴慶（ca.1902-?）、³⁴林越峰（1909-?）、廖漢臣（1912-1980）等。³⁵由於《新高》漢文欄記事一概由漢文支社長負責，³⁶其文藝內容明顯重視新文學，除了刊載新詩、小說、文學評論外，³⁷亦提倡以白話文建設新文化。³⁸在政治上也較左傾，自號「不避權貴，為弱勢民族之指針」。³⁹無怪乎張深切稱《新高》為「余平生最喜歡讀的報紙」，「深喜為貴報寄稿」。⁴⁰

《南瀛》漢文部，最初係由林述三（1887-1956）主導，林錫慶（生卒年不詳）任編輯員，⁴¹其後逐漸改由林錫慶主導，⁴²林述三為天籟吟社社長，林錫慶為其侄，⁴³兩人與傳統文學關係較深。不過其餘成員幾乎都是左傾的知識分子，尤以黃師樵（1900-1980）、紀金選（1902-1960）兩人最突出。黃師樵是前民眾黨幹部，立場左傾，蔣渭水去世後，與白成枝編纂《蔣渭水全集》，其漢學造詣佳，曾參

²⁸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213-217。

²⁹ 〈社告〉，《新高》，1931年9月10日，第14版。不過，楊在1932年10月至12月間，曾短暫退社，改由廖柏峰任編輯。〈編輯餘錄〉，《新高》，1932年10月7日，第13版；〈社告〉，《新高》，1932年12月9日，第17版。

³⁰ 〈楊氏襲任取締役〉，《新高》，1935年9月21日，第12版。

³¹ 王振勳、趙國光主持，國立中興大學編纂，《臺中市志：人物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2008），頁128-130。

³² 如《思想月報》即記載1937年1月26日「彰化市居住左傾本島人特要吳奇麟及楊珠德等，表面標榜公民知識的涵養及大彰化市建設，組織彰化革聲會」。司法省刑事局，《思想月報》38（1937年8月），頁125。

³³ 〈文藝同好者氏名住所一覽〉，《臺灣文藝》1：1（1934年11月），頁91；〈文藝同好者氏名住所一覽（續）〉，《臺灣文藝》2：3（1935年3月），頁136。

³⁴ 〈編輯餘錄〉，《新高》，1933年7月21日，第13版。

³⁵ 〈社告〉，《新高》，1933年12月1日，第14版。

³⁶ 〈編輯餘錄〉，《新高》，1933年10月6日，第14版。

³⁷ 例如《新高》，1933年9月21日，第15版。同版刊有楊守愚的小說〈彰化＝臺中〉，賴明弘的評論〈文藝春秋〉，以及吳慶堂的新詩〈川流〉。

³⁸ 〈就白話文與文化振興問題〉，《新高》，1934年9月7日，第13版。

³⁹ 〈社告〉，《新高》，1935年9月14日，第14版。

⁴⁰ 〈願貴報為民木鐸 舉直錯諸枉〉，《新高》，1935年1月1日，第35版。

⁴¹ 〈南瀛新報兼刊漢文〉，《臺日》，1929年10月31日，第4版。

⁴² 1930年時，編輯尚有兩人之名，1933年時已無林述三。〈編輯記錄〉，《南瀛》，1930年6月28日，第15版。〈謹賀新年〉，《南瀛》，1933年1月1日，第31版。

⁴³ 〈林倪聯婚〉，《臺日》，1924年12月16日，第4版

與聚奎吟社等詩社。⁴⁴1932年黃氏成為《南瀛》記者，1934年10月林錫慶轉職進新創刊的《南海時報》後，⁴⁵黃氏升為漢文主任。⁴⁶1935年3月黃氏退社，改由紀金選任主任，其同樣是民眾黨出身的「專業運動家」。⁴⁷在文藝層面上，《南瀛》不像《新高》與新文學運動有很強的關聯，但時事評論亦呈現左翼色彩，例如1932年勞動節前夕，紀金選曾在時事評論欄呼籲「被榨取階級」團結。⁴⁸1933年1月，紀氏所寫的〈迎年感懷〉亦攻擊「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擁護，⁴⁹該文後半因此被總督府要求抹消。⁵⁰

除了左傾知識分子進入的《南瀛》、《新高》外，曾經代表「御用紳士」的《昭和新報》（下稱《昭和》），自1929年後亦發生不少改變。如前所述，《昭和》早期經營並不順利，於是1929年4月後決定並刊日文，然經營卻未改善。1929年12月，《昭和》召開股東總會，握有實權的反鄭肇基派推動組織刷新架空鄭氏，另聘徐乃庚（1894-1956）為專務取締役負責實際經營。不過各股東仍不滿鄭氏，於是再次聚會問責，結果演變成辜顯榮、鄭肇基兩人互相咒罵，辜顯榮子斌甫（生卒年不詳）於隔日率人至鄭宅興師問罪。⁵¹隔年1月鄭氏辭職，⁵²5月徐乃庚就任社長（代表取締役），⁵³如此《昭和》的經營權便完全落入徐乃庚——《新民報》將其稱為許丙的「部下」（乾分）——手中。⁵⁴

在徐乃庚的改造下，《昭和》取締役更換為林木根（1893-1954）、邱木（1892-?），監察役則改為林文章（1894-1983），⁵⁵其中林木根為專務。⁵⁶1934年，監察役林文章換成前取締役徐杰夫，專務林木根改為林輝焜（1902-1959）擔任。⁵⁷其中可發現三點特徵，首先是重役大致仍是以實業家為主，惟已集中至與板橋林家、許丙、徐乃庚相關之人士。徐杰夫係徐乃庚兄，出身嘉義名門徐家，⁵⁸林木根、⁵⁹林文章為嘉義實業家，邱木則與許丙同樣出身板橋林家產業。⁶⁰其次，重役已不再與知識分子壁壘分明，其中徐乃庚、林文章、林木根皆為自治聯盟成員。⁶¹最後，

⁴⁴ 賴澤涵總纂，《新修桃園縣志：人物志》（桃園：桃園縣政府，2010），頁34。

⁴⁵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頁51。

⁴⁶ 〈編輯餘墨〉，《南瀛》，1934年10月13日，第14版。

⁴⁷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203-204。

⁴⁸ 〈筆鎗墨彈〉，《南瀛》，1932年4月29日，第24版。

⁴⁹ 〈迎年感言〉，《南瀛》，1933年1月1日，第31版。

⁵⁰ 〈編輯室〉，《南瀛》，1933年1月7日，第13版。

⁵¹ 〈昭和新報のお家騒動〉，《臺日》，1929年12月28日，第7版；〈御用紳士が大喧嘩〉，《臺灣民報》，1929年12月29日，第11版。

⁵² 〈昭和新報の新經營者〉，《臺日》，1930年1月19日，第2版。

⁵³ 大藏省印刷局，《官報》，1930年7月31日，頁9。

⁵⁴ 〈許鄭の仲直り〉，《臺灣民報》，1930年10月18日，第14版。

⁵⁵ 大藏省印刷局，《官報》，1932年8月10日，頁305。

⁵⁶ 〈謹賀新年〉，《昭和》，1933年1月1日，第10版。

⁵⁷ 大藏省印刷局，《官報》，1934年12月6日，頁183。〈社告〉，《昭和》，1935年2月2日，第2版。

⁵⁸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眾人事錄 外地・滿支・海外篇》，臺灣頁26。

⁵⁹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4），頁230。

⁶⁰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頁31、84。

⁶¹ 徐乃庚為自治聯盟嘉義支部顧問，林文章為支部幹事，林木根為成員，參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從專務取締役前後由林木根、林輝焜擔任來看，徐乃庚似乎有意要引入受過新式教育、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協助經營。林木根為國語學校畢業，任教數年後轉投實業界而有所成就。林輝焜更是自京大經濟學部畢業，回臺後任淡水信用組合專務理事等職，曾在《新民報》上發表日文小說〈命運難違〉（争へぬ運命）。⁶²就連曾在《新民報》投稿過的新知識分子都任用，顯示出徐氏極力促使《昭和》脫胎換骨成一具有商業競爭能力的週刊。

除了重役之外，編輯部亦有一番更新。1930年5月，主筆謝汝銓退社改任編輯部顧問，日文擔當宮崎健三(1880-?)退社改任囑託，原囑託柴山愛藏(1891-?)轉任主筆。⁶³主筆既然由日人擔任，其內容自然改以日文欄為主。⁶⁴此一舉動，或許代表著已非《新民報》敵手的《昭和》決定改與其他週刊對抗。柴山原為《やまと新聞》臺灣支局長、《讀賣新聞》記者，⁶⁵1927年起擔任警務局囑託，後由警務局指名進入《昭和》擔任主筆，顯示出總督府仍對《昭和》具有影響力。⁶⁶另一方面，和唐澤、泉相同，柴山在一定程度上贊成臺灣人的自治運動，對《昭和》的經營者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人物。在柴山主導下，《昭和》從「思想善導」轉成以營利為中心，更為了迎合大眾而「黃色新聞」化，刊載各種真偽不明的「暴露內情」或「色情」報導。時事評論亦以迎合大眾為主，並無明確立場，⁶⁷惟從經營者、主筆的背景觀之，整體上仍偏向總督府。

至於漢文欄的內容，1930年5月，曾在《民報》攻擊《昭和》的連橫之子連震東(1904-1986)入社擔任記者，亦呈現出《昭和》打算跳脫出「御用紳士」的色彩。⁶⁸除連震東外，1930年代初期，《昭和》亦曾短暫吸收紀金選等左傾人士，但都未久留。⁶⁹1932年後長期擔任漢文編輯者為林子惠。林子惠(1898-?)，蘆洲人，本名林恩翹，字恩應，號子惠，生於福建，5歲時隨家人來臺，曾隨其父習漢學，受新式教育後，亦自行開設書房，為瀛社、天籟吟社社員，並曾自行組織鷺洲吟社。⁷⁰他最初係在《新高》任職，1930年轉入《南瀛》，⁷¹1932年後便

本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要覽》（臺中：臺灣新聞社，1931），頁35-43。

⁶² 有關林輝焜的生平及此小說，參見柳書琴，〈滿洲內在化與島都書寫：林輝焜《命運難違》的滿洲匿影及其潛話語〉，《臺灣文學研究》1：2，（2012年6月），頁135-190。

⁶³ 〈昭和新聞編輯部員異動〉，《臺日》，1930年5月21日，第2版。

⁶⁴ 〈小言〉，《臺灣民報》，1930年5月24日，第2版。

⁶⁵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附錄頁20。

⁶⁶ 「煙草賣捌人匿名組合編成替ノ件」，〈自昭和十二年七月至十五年六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煙草賣捌人指定并匿名組合組織替八冊ノ七〉，《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885008。

⁶⁷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217、317-320。

⁶⁸ 鄭喜夫編，《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224。

⁶⁹ 〈闡明本報之主張並歡迎新支社長〉，《南瀛》，1935年2月16日，第13版。除紀金選外，又如負責日文的吳鴻燾。〈民眾黨支部將見成立〉，《新民報》，1930年7月12日，第6版。

⁷⁰ 鄭喜夫編，《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頁210。章子惠編，《臺灣時人誌》（臺北：國光，1947），頁229；林恩翹，〈我的過去〉，《臺灣省訓練團團刊》2：3（1946），頁238。〈祝鷺洲吟社成立〉，《昭和》，1934年11月17日，第14版。

⁷¹ 〈編輯記錄〉，《南瀛》，1930年6月28日，第15版。

長期在《昭和》任漢文編輯。⁷² 在林氏主導下，《昭和》漢文欄也從「御用紳士」擴大成代表傳統文人的立場。

在政治上，雖然未直接攻擊總督府，但仍然本於臺灣人的角度，呼籲改善差別待遇、實現自治制度等。⁷³ 常見作者如林震東、⁷⁴ 林靜菴、⁷⁵ 余慶鐘⁷⁶等。在文藝上，則反映出傳統文人的偏好，關注詩社事務，刊載文社、詩社的徵文及相關活動，其中包括彰化崇文社、鷺洲吟社等。版面上也一直設有刊登傳統詩文的記事欄，與《新高》、《南瀛》相較，占比也最多，⁷⁷ 常見的詩、詞作者有莊玉坡、⁷⁸ 謝雪漁、林子惠、卓周紐⁷⁹等人，文章則有各文社徵稿的人選文章等。

整體來看，1930 年代的各種雜誌概況，由表 4-1 所示，右傾日人的聲音，主要集中在《經世》、《南日本》等各種純日文的週刊紙，至於中立、偏向自由派的日人，則是在《新高》、《南瀛》、《昭和》三紙的日文欄中，而臺灣人亦集中在此三紙的漢文欄，其中前兩紙以左傾臺人為主，《昭和》則以傳統文人為主。

⁷² 他於 1932 年 5 月入社，此時《昭和》漢文編輯原為張鏡村，但同年 10 月後的〈編輯餘錄〉漸漸只有林子惠的署名，此後直到 1937 年漢文欄廢除為止都擔任編輯。〈社告〉，《昭和》，1932 年 5 月 14 日，第 15 版。《臺灣時人誌》，頁 229。

⁷³ 例如 1932 年始政紀念日時的論說〈始政紀念日之回顧並對為政者述希望〉，以及同日〈論不識時勢之反對自治實施決議者 喜辜林許三氏不同流合汙而言〉。《昭和》，1933 年 6 月 17 日，第 12 版。

⁷⁴ 新竹人，本名林榮初，新竹林占梅孫，《昭和》創刊時已在社內任職，詳見第三章第三節。

⁷⁵ 彰化人，生卒年不詳，天籟吟社社員。《昭和》，1933 年 11 月 4 日，第 13 版。

⁷⁶ 嘉義人，生卒年不詳。筆名蘭谿，玉峯吟社社員。「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s://db.nmml.gov.tw/site5/pclubinfo?id=000032>，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⁷⁷ 《昭和》約有半面至一面刊登傳統詩文（3 至 7 段）；《新高》以新文學為主，僅偶爾刊載傳統詩文；《南瀛》刊載次數雖較《新高》頻繁，但內容大多只在 1 段以內。

⁷⁸ 莊玉坡（1883-?），又名玉波，號櫻癡。臺南人，長期於神戶經商。其生平可見蘇淑芬，〈瀛社・南社・虞社・壽蘇吟社—莊玉坡的海外詩緣〉，《東吳中文學報》24（2012 年 11 月），189-222。

⁷⁹ 卓周紐（1893-1973），字夢庵。臺北人，總督府遞信部雇員、瀛社社員。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頁 17。

表 4-1 1930 年代臺灣主要綜合性週、月刊概況

週刊				
刊名 (許可年月)	社長	主幹或主筆	漢文欄負責人	整體立場
臺灣經世新報 (1916.7)	蓑和藤治郎 稻垣孫兵衛 (1936 後)	稻垣孫兵衛 緒方武歲 (1936 後)	無漢文欄	民間立場 右傾日人
南日本新報 (1916.7)	吉川利一	柴田貞一 吉川省三 (1936 後)	無漢文欄	偏向總督府 右傾日人
臺灣經濟タイムス (1932.5)	石川宙平	宮武兼三	無漢文欄	偏重經濟事情
臺灣時事新報 (1934.6)	古屋貞雄	岩本嗣泰	無漢文欄	民間立場 右傾日人
新高新報 (1916.1)	唐澤信夫	社長自任	楊珠德 (1931.9 後)	民間立場 自由派日人 左傾臺人
南瀛新報 (1928.3)	關善之助	泉風浪	林錫慶 (1934.10 前) 黃師樵 (1934.10 後) 紀雪峰 (1935.3 後)	民間立場 自由派日人 左傾臺人
昭和新報 (1928.11)	徐乃庚	柴山愛藏	林子惠 (1932.10 後)	偏向總督府 臺灣傳統文人
月、旬刊				
新臺灣 (1930.3)	田中一二	無	無漢文欄	民間立場 右傾日人
臺灣自治評論 (1936.3)	四宮義任	無	無漢文欄	右傾日人
臺灣公論 (1936.1)	田上忠之	社長自任	無漢文欄	右傾日人

資料來源：週刊部分主要參考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310。但立場部分有所調整，漢文編輯部份亦係新增。月、旬刊部分為筆者整理。

表 4-2 1930 年代臺灣主要週、月報刊發行量

週刊					
刊名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臺灣經世新報	4,363	4,324	3,891	4,191	4,837
南日本新報	4,055	3,958	3,864	3,380	3,175
臺灣經濟タイムス		3,648	3,943	3,848	3,967
臺灣時事新報				1,830	2,300
新高新報	5,677	5,905	5,673	4,806	4,838
南瀛新報	3,935	4,213	4,184	4,278	4,265
昭和新報	3,000	4,000	4,525	3,395	4,300
月、旬刊					
新臺灣	2,645	2,139	1,389	1,610	2,080
臺灣自治評論					1,502
臺灣公論					3,577
備註	《昭和》1932、1933 年的發行量應為總督府的推估數字。《新臺灣》1932-1935 年的發行量為月刊時的發行量，其中 1932-1934 年者為總年度發行量除以 12 計算而成，1936 年的發行量為旬刊化為《全臺新報》時的發行量。				

資料來源：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310；《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 38、39、40（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1937、1938）。

就各週刊發行量觀之，除了以經濟事務為主的《臺灣經濟タイムス》，以及創刊較晚的《臺灣時事新報》，由多至少依序大致為：《新高》、《南瀛》、《經世》、《昭和》、《南日本》。其中，《新高》、《南瀛》、《昭和》三紙，因擁有漢文欄而得以吸引不少臺灣人讀者，⁸⁰其中《新高》、《南瀛》日文欄既有強烈民間性格，漢文欄又是左翼知識分子所在，《新高》則兼有新文學的性格，而能獲得名列前茅。雖然報刊的讀者群不至於因漢文欄之有無而出現民族壁壘，不過純日文的報刊，其讀者亦以日人占多數，⁸¹而《經世》因其經營時間較長，又較《南日本》更受多數民間日人支持。

⁸⁰ 例如《昭和》曾於 1933 年舉辦嘉義女給人氣投票，其中臺灣人組的總投票數約占四分之三，日本人組的總投票數約占四分之一。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312-313。

⁸¹ 根據 1936 年《臺灣時事新報》舉辦的紙齡第一百號紀念文字埋課題抽籤活動，所有的 136 中籤者中有 88 名日人（或企業），48 名臺灣人（或企業）；若單算六等賞的中籤人，100 人中則有 64 名日人，36 名臺灣人，比例皆大致為三分之二日人，三分之一臺灣人。〈當籤者決定す〉，《臺灣時事新報》，1936 年 6 月 19 日，第 10 版。另外，同樣就此次抽籤活動，李承機則計算為 100 人中有 45 名臺灣人，不知是否是筆誤或計算方法不同。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312-323。

第三節 大亞細亞主義與在臺日人輿論

一、九一八事變後臺灣輿論的激昂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經世》的荻和藤治郎即表明對日本軍事行動的支持，「現在矢已離弦」，「唯斷然猛進之一途」。1931年9月以後發表一系列評論，對內呼籲掃除反戰的自由派，對外則批評國際聯盟的撤兵建議，認為日本已無退後餘地，日本國民必須為國家戰到最後一人。¹另一方面，處在「日本與中國兩團火之間」的臺灣人知識分子，卻無法採取與荻和相同的態度面對事變。《新民報》最初的呼籲是雙方應冷靜、顧慮大局，從速和平解決。²10月3日社論中，表達臺灣人的憂慮，認為中國基於主權，當然必須爭執滿蒙支配，但日本也因國家發展、民族生存而不得不爭執滿蒙的權益。在臺人眼中，缺乏抵抗實力的中國唯一擁有的對策似乎只有拋棄滿蒙「主權之實，作中日共享之地，自可安定於一時」，否則雙方將爭執到底，甚至可能激成滿蒙獨立，未來必難解決。³雖然《新民報》對未來局勢持悲觀態度，認為聯盟無力阻止雙方交戰，⁴但始終希望雙方冷靜，批評軍部行動干預外交，⁵以及誇飾日僑受害、煽動民眾憤慨的臺灣報紙。⁶

日人右翼的興奮、積極，對照臺人的冷靜，《新高》的唐澤信夫很快就意識到雙方反應的差異。10月1日，唐澤指出事變雖與臺灣沒有直接關係，卻使日、臺人對彼此產生「奇怪的感覺」，可說是「不愉快至極」之事。因此，唐澤的立場與知識分子相同，對事變抱自重論，雖然支持日本的軍事行動，但強調戰爭必須積極避免，相信日軍不會傷害中國良民。同樣地，臺灣的日、臺人也應自重，以免對好不容易開花結果的臺灣統治投下陰影。⁷呼應唐澤的看法，漢文欄亦表示兩國交兵「是東亞民族最大痛恨」，其起因雖然複雜，但希望雙方都不會違背非戰公約的精神。⁸持自重論的，還有《昭和》的日文評論，表示：「日支親善的軌道直接就是走向內臺融和的軌道，日支感情[的衝突]必然會破壞內臺人的融和」，為求雙方感情融洽，臺、日人對中國問題皆應自重。⁹

不過，日人民意的演變，則與《新高》、《昭和》的自重論相左。1932年2月，滿洲國成立。3月，在《新高》舉辦全島都市對抗雄辯大會中，¹⁰最終獲聽眾票

¹ 荻和藤治郎，《米南文集續篇》（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6），頁242-252。

² 〈小言〉，《新民報》，1931年9月26日，第2版。

³ 〈滿蒙爭奪戰 日華各執己見 東方終難和平〉，《新民報》，1931年10月3日，第2版。

⁴ 〈小言〉，《新民報》，1931年10月24日、11月21日、11月28日，第2版。

⁵ 〈小言〉，《新民報》，1931年10月17日，第2版。

⁶ 〈誇大記事に浮身を やつす臺灣の新聞紙〉，《新民報》，1931年10月10日，第15版。

⁷ 唐澤信夫，〈日支衝突事件の批判〉，《臺灣島民に訴ふ》（臺北：新高新報社，1935），頁276-280，原載《新高》，1931年10月1日，第2版。

⁸ 〈新高時評〉，《新高》，1931年10月1日，第15版。

⁹ 〈同文同種の日支人〉，《昭和》，1932年5月14日，第1版。

¹⁰ 舉辦規章見〈都市對抗雄辯大會〉，《新高》，1931年9月24日，第8-9版。全島大賽最初雖預定10月舉行，但因唐澤生病而延至隔年3月16日，《新高》，1932年3月17日，第11版。

選為一等的演講「向超近代國家過程前進的日本」，反映出日人輿論的走向。其一面說明英國如何將勢力擴張至本土之外，又在一戰後被德國、美國超越的過程；一面表示九一八事變不只遏止美國對亞洲的野心，滿洲國的建設更代表日本將進一步擴張，因此必須積極推動滿洲與日本的結合，在臺日人則須徹底意識到「日本」的存在。¹¹

在強硬輿論逐漸發酵的情況下，《新高》似乎只能避開輿論鋒芒，一面仍反對軍部介入政治，¹²一面批評英美對東洋事務的介入，¹³稱滿洲國為「共榮共存的新樂土」，¹⁴並報導滿洲國的建立對臺灣經濟的有利之處。¹⁵漢文欄也一連發表三篇社論，分別支持滿蒙獨立、¹⁶批評國際聯盟、¹⁷鼓勵臺灣人前往滿蒙活動。¹⁸奇特的是，同年7月刊登「中國時局雜駁」一文，卻以左翼觀點批評臺灣的「御用新聞」及「土豪劣紳經營的××〔新民〕報」對中國的負面報導，指出只有理解中國受帝國主義掠奪的現狀，才能把握中國政局。¹⁹其後，更站在中國民族立場談論九一八事變，指稱「東北因不抵抗而引××〔日本〕深入，淞滬幸有十九路軍的血戰，而略為民族留些生機」。²⁰如此看來，漢文欄最初的支持，似乎只是因應局勢而不得不為，而非出自真心。

《南瀛》亦有類似的言論，該報隨著強硬輿論，分別於天長節及始政紀念日的發行「滿洲軍慰問號」及「始政紀念日及駐支皇軍慰問號」，並發表慰問辭。²¹漢文部中，左翼知識分子則以諷刺方式，批評日本對外政策。論及日本在國際聯盟之困境時，認為反對日本的國家「意氣之軒昂真不可而侮」，日本則「已屬騎虎，焉敢遽下，如是脫退聯盟必矣」，而派遣出使聯盟的松岡洋右（1880-1946）「言何壯哉，真不愧國之代表，然其以為是替天行道，××××」。²²

顯然地，無論是呼籲自重還是批評、諷刺都無法阻止輿論激化。在此一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乃是大亞細亞主義。1932年11月，由臺灣軍司令部後援、《臺日》主辦，針對國聯李頓（Lytton）報告書的演講會上，臺北高商教授佐藤佐批評國聯調查團對東亞的認識不足，並指出「日本、民國放下過去的行為彼此提攜，糾合東洋民族，對抗歐洲民族之時越來越近」。²³

¹¹ 小出正美，〈超近代國家過程への日本〉，《新高》，1932年3月24日，第5版、3月31日，第2版。報紙中的作者名稱被誤記為小出正夫，實為新竹實業家、鄉軍分會成員小出正美（1902-）。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 改訂》（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頁91。

¹² 〈憲政の常態と兵政分離主義〉，《新高》，1932年5月27日，第3版。

¹³ 〈言論〉，《新高》，1932年2月4日，第2版。

¹⁴ 〈奉天通信〉，《新高》，1932年3月17日，第5版。

¹⁵ 〈新天地の滿蒙國〉，《新高》，1932年3月3日，第8版。

¹⁶ 〈滿蒙獨立〉，《新高》，1932年3月3日，第13版。

¹⁷ 〈日本與聯盟〉，《新高》，1932年3月10日，第13版。

¹⁸ 〈吾人須向滿蒙活動〉，《新高》，1932年3月17日，第13版。

¹⁹ 〈中國時局雜駁〉，《新高》，1932年7月22日，第16版。

²⁰ 〈備戰中の蘇聯一瞥〉，《新高》，1932年10月14日，第17版。

²¹ 〈滿洲軍慰問の辭〉，《南瀛》，1932年4月28日，第1版；〈駐支皇軍に捧ぐ〉，《南瀛》，1932年6月17日，第1版。

²² 〈鐵算盤〉，《南瀛》，1932年11月26日，第13版。

²³ 〈リットン報告書を中心の國際事情講演會〉，《臺日》，1932年11月16日，夕刊第2版；〈リ

1933年2月6日，在鄉軍人會後援，臺北市各團體在鐵道旅館舉辦臺北市市民大會。聽眾約有千人，會上一致決議致電感謝出使聯盟的代表，²⁴並舉辦演講，講者紛紛倡導「黃色民族的奮起」、「亞細亞門羅主義」，或指責歐美各國將中國殖民地化，強調日本國民作為「黃色人種的領導者及東洋問題的解決者」之重要性。最後，則由大會議長蓑和藤治郎演講「皇道一振正在此時」，闡述日本國體的本源。²⁵2月17日，《新高》舉辦臺灣非常時模擬議會，也瀰漫同樣的熱潮，議會一開始，曾在市民大會中批評歐美對事變的態度、代表「民權黨」的林治人（鄉軍成員，生卒不詳），突然提出緊急動議「國際聯盟脫退決議案」，指責「白色人種」的霸道，希望日本迅速、勇敢地退出國際聯盟，而在滿場一致下通過。²⁶2月20日，日本閣議正式確定退出聯盟的方針；24日，聯盟總會以42對1（1棄權，1缺席），通過勸告日本撤兵、尊重中國主權的決議案，日本代表遂退出議場；3月27日正式退出國聯。日本明確地與歐美國家的對立。

二、在臺日人輿論中之大亞細亞主義

由前述可知，在輿論強硬化的背後，臺灣軍部可說是最大的推手。1932年8月，臺灣軍預備役中佐橋本喜和人（生卒年不詳）編纂《滿蒙問題的再認識與國民的覺悟》一書，強調滿蒙政策之目標在於國家的存立與皇道文化的世界擴張，而國民必須正確地認識滿蒙問題的內涵，形成統一的輿論，改善國際對日本的想法。²⁷《新高》在描述日本退出聯盟前後，日本國內與臺灣各地舉行市民大會的情形時，以「民論、政府、軍部的三重奏」比擬日本國內，而以「自軍部中心湧出的輿論」指稱臺灣的情形，正顯示軍部利用國際時局，試圖引導臺灣輿論。²⁸

臺灣與日本國內不同的地理、民族構成，加上軍部的影響，使在臺日人的大亞細亞主義有著與國內不同的特徵，其一乃是強調臺灣面對歐美列強的南進、國防前線地位，其二則是對「內臺融和」一事有著較國內更強烈的日本中心色彩。茲分別利用蓑和米南在《經世》之文字、《南日本》社論，以及田中一二之言行，具體考察在臺日人的大亞細亞主義觀。

（一）蓑和米南的大亞細亞主義

如前所述，自1910年代以來，蓑和幾乎每週不懈地在《經世》上發表時評，擁護日本傳統精神，抨擊受西方影響的大正民主主義。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正好與其思想一拍即合，其撰文中早已顯示出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認同。1932年4月，撰〈日本興起的時機〉，表示從亞洲大陸渡來的日本人，將循著過

ツトン報告の功罪を論ず（一），《臺日》，1932年11月19日，第2版；〈リツトン報告の功罪を論ず（二）〉，《臺日》，1932年11月20日，第2版。

²⁴ 〈聯盟の空氣に奮起し臺北で市民大會〉，《臺日》，1933年2月10日，第7版。

²⁵ 〈市民大會盛況〉，《新高》，1933年2月10日，第8-9版。

²⁶ 〈聯盟脫退決議案〉、〈臺灣非常時議會〉，《新高》，1933年2月24日，第4、8-9版。

²⁷ 橋本喜和人，〈我が使命の遂行と輿論の力〉，《滿蒙問題の再認識と國民の覺悟》（臺北：橋本喜和人，1932），頁1-11。

²⁸ 〈聯盟時局問題〉，《新高》，1933年3月17日，第3版。

去神功皇后的三韓征討、豐臣秀吉的朝鮮征伐，以及甲午、日俄戰爭的歷史，重新向亞洲大陸發展，這也是「日本作為東洋文明現實上的把持者，其歷史性使命」。²⁹ 2個月後撰〈皇國的歷史性使命〉，再次強調此「使命」。文中指責國際聯盟是白人為了支配世界、榨取有色人種而設立的組織，日本使命則在於作為東洋的保護者，粉碎白人的暴虐，日本當務之急為對外促使中國人民理解此一使命，對內須脫離白人影響而勇敢承認滿洲國。³⁰

當日本承認滿洲國而在國聯中陷入困境時，自九一八事變後始終站在輿論界最右翼的蓑和，如前所述於1933年2月的市民大會上擔任議長，引領臺灣輿論的激化。3月，日本退出國聯後，蓑和更加積極提倡大亞細亞主義，聲稱日本退出國聯的理由，不只是對日中紛爭的解決方法不滿，國民必須認識到世界局勢已走向民族鬥爭，將來國策除了「亞洲人應回歸亞洲」之外無他。³¹ 在蓑和的文章中，大亞細亞主義敵對西方的特徵表露無遺，1930年代，蓑和不斷強調外交上不能迎合英美各國，³²反而應思考如何聯合亞洲的有色人種以對抗白人，奪回亞洲。³³ 在國防上，蓑和亦提倡立即廢棄軍縮條約，認為軍縮會議上一切與西方的交涉折衝，都只會增加日本國防的危險，³⁴應採「國防第一主義」，以自主的充實國防為優先，才有辦法確保和平、外交、經濟等其他事務。³⁵

除了應在外交、軍事上與西方對抗外，在精神上也是如此。大亞細亞主義以日本中心的特徵，明顯地呈現在蓑和的東洋文化觀上。在〈東西文化的特質〉一文中，他稱西方文化是物質性、分析性、個人主義，雖有文明成就，但也容易產生鬥爭；東方文化則是精神性、綜合性、家族性，因此能夠上下和睦、同化異族。³⁶緊接著〈東洋文化的大成〉一文，就是在強調日本文化既能長期維持傳統，又能吸收印度、中國、朝鮮等東洋國家的文化精隨，是以未來的東洋精神性新文化，就應以日本文化為主。³⁷ 我們也能夠理解，蓑和為何會認為「期待東亞盟主權的確立，將散布皇威的八紘光芒視為天賜的使命，作為此種民族，辜負此皇業恢弘的大機會，難道不是件很嚴重的事情嗎」，在他眼中，亞洲的命運只能完全賴日本的皇道予以拯救了。³⁸蓑和的例子，顯示出在殖民地臺灣的言論界裡，並不乏大亞細亞主義的宣揚者。

（二）南進的臺灣與殖民的問題：《南日本新報》社論

在日人眼中，大亞細亞主義與臺灣有何關係？對照西方國家對亞洲的壓迫，

²⁹ 蓑和藤治郎，〈日本興起の時機〉，《米南文集續篇》，頁294-295。

³⁰ 蓑和藤治郎，〈皇國の史的使命〉，《米南文集續篇》，頁312-313。

³¹ 蓑和藤治郎，〈民族闘争の首途〉，《米南文集續篇》，頁366-368。

³² 蓑和藤治郎，〈獨善の平和外交〉，《米南文集續篇》，頁506-508。

³³ 蓑和藤治郎，〈亞細亞を護れ〉，《米南文集續篇》，頁502-504。

³⁴ 蓑和藤治郎，〈廢棄即時通告のみ〉，《米南文集續篇》，頁532-534。

³⁵ 蓑和藤治郎，〈國防第一主義〉，《米南文集續篇》，頁575。

³⁶ 蓑和藤治郎，〈東西文化の特質〉，《米南文集續篇》，頁455-457。

³⁷ 蓑和藤治郎，〈東洋文化の大成〉，《米南文集續篇》，頁457-459。

³⁸ 蓑和藤治郎，〈東亞の自立〉，《米南文集續篇》，頁546-547。

又應如何認識日本對臺灣的統治？蓑和並未具體討論臺灣與大亞細亞主義的關係。《經世》雖然延續蓑和的觀點，建議南進國策的統一、擴大總督權限、增設師團、鎮守府等加強臺灣南進、國防地位，³⁹認為日本「天業的使命」完全向著南方，而臺灣握有其重責，⁴⁰但也未深入討論殖民問題。《南日本》雖然不像蓑和在《經世》的評論充斥宣揚日本精神的內容，卻對臺灣的地位有更具體的討論。

同樣處於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中，《南日本》對西方國家的批評也不少見，在連續四篇主標題為〈黃禍乎、白禍乎〉的社論中，第一篇是回應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黃禍論，指出日本產業文化的發展對世界的貢獻，打破了白人優越的狀態，於是才出現黃禍論；第二篇說明黃禍為白種人自視優越、對外壓迫的作為，反射到自身心理後的產物；第三篇開始攻擊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壓迫，以及移民、經濟等的限制，無怪乎有色人種會興起亞洲聯盟的運動；最後一篇則討論大亞細亞主義，強調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是以皇道精神為指導，全亞洲民族也以日本為核心響應此運動，不過由於皇道精神視仁愛、信義等道德為至上，因此此運動並不是要激起人種戰爭，而是採和平方式，使白人改變其優越感、排他性及對遠東的侵略政策，表示欲對抗西方經濟戰，「只要形成一大世界經濟集團協調融和足矣；在民族競爭的渦流中划槳只要以王道仁義精神足矣」。⁴¹

顯然地，立場傾向總督府的《南日本》的主張，不像《經世》具有攻擊性，而是偏重經濟面的意義，並期待日本形成一對抗歐洲的亞洲集團，甚至表示以亞洲盟主自任的日本有義務向南方發展、開發當地，以救濟被壓迫的當地民族。⁴²臺灣自然在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日本脫離國聯前不久，《南日本》已呼籲日本應南北併進，結合東半球組織東方聯盟，對抗國聯的經濟制裁，並希望日本政府注意臺灣在向南洋發展的地位。⁴³臺灣在南進、國防上的地位，其後不斷被《南日本》強調，不只是軍事上的「南方國防第一線」，也是「經濟上飛躍的踏腳處」，並希望在臺民間人士能積極向南活躍。⁴⁴1934年1月初刊登〈臺灣的新使命〉一文表示，「就算不以英、荷等先進國家殖民侵略事蹟為例，若不行經濟產業發展將對國家勢力消長有甚大的影響」，而其發展方向便是南方，

然而，此南方國防線的心臟、南進國策的大動脈之臺灣，先不論軍部當局的情形，卻完全地被遺誤，連母國人的末梢神經都未能觸及，受到如此對待，不得不謂遺憾至極。

尤其是在現地的官民有識者，應及早趁有機會時高唱作為大張圖南鵬翼之絕好根據地、策源地臺灣的重要性。雖然與母國遠隔，大聲不入俚耳，至此幾乎不見反響，也因此對我臺灣建設經綸墮於消極，薄資南方政策，南

³⁹ 〈天業の南礎〉，《經世》，1936年4月26日，第1版；〈其の前驅〉，《經世》，1936年6月14日，第1版。

⁴⁰ 〈八紘一字〉，《經世》，1937年2月7日，第1版。

⁴¹ 〈黃禍か、白禍か〉，《南日本》，1934年2月2日、9日、16日、23日，第1版。

⁴² 〈南進策の積極化〉，《南日本》，1936年9月4日，第2版。

⁴³ 〈南北併進すべし〉，《南日本》，1933年1月27日，第1版。

⁴⁴ 〈島民の自覺を促す〉，《南日本》，1933年12月8日，第1版。

進的速度極為遲緩，甚至有阻礙之的傾向。幸好，在海之國防線巍然聳立的臺灣之姿已強烈地映入國民的視線中，於此機會，吾等在臺民在感到更為重大的責任之時，也要面對應如何達成此一需深刻覺悟的問題。⁴⁵

文中「先不論軍部當局的情形」等說法，透露出此時軍部對臺灣南進地位的重視，以及軍部在鼓吹臺灣重要性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就算是立場略為傾向總督府的《南日本》，也不得不承認軍部乃是臺灣南進、國防前線的積極呼籲者，使國民逐漸認識臺灣的國防地位。由上顯示，九一八事變後軍部的重視，給予長期認為臺灣「被遺誤」的在臺日人多大的刺激，而社論的重點於是在鼓吹臺灣在住的人士必須趁臺灣南進、國防的使命被重視之時積極付諸實行。

在這種批評英、荷等西方國家殖民統治的南進觀下，在臺日人應如何看待日本對臺灣的統治？1933年11月，在慶祝國民精神作興詔書⁴⁶頒發十周年的〈島民與國民精神〉一文中，首先說明國民精神振興的重要，並讚美日本對臺灣民智開發的成就。接著，批評各國在其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大多採「低溫消極主義」，甚至可說是使其背離現代文化的「低能教育」，其原因正在於「黃白不相融，於根本上相對立，終究不能融和混合」。然而，日本則是基於「同樣是黃色人種、同樣是亞洲民族，其融和結合乃是當然，能夠使其大同歸一」的信念，遂採與歐美殖民地不同的教育方針，致力於國民教育。⁴⁷ 1934年10月，伏見宮博恭王（1875-1946）、梨本宮守正王（1874-1951）來臺期間，刊登的〈王道治下的臺灣〉一文，則是以「王道」理解臺灣統治，文中所謂王道精神的意義，乃是日本將建國以來的獨特的精神、國體，放射到世界。協助滿洲國成立，則是王道精神具體化之一端，未來更能夠建設全亞洲、全世界成為和平之樂土。由此可知，《南日本》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認識，與袁和並無不同，皆指日本精神的對外擴散。至於臺灣統治，文中表示：「以王道精神君臨的臺灣統治乃是，奉體對其新附之民一視同仁的感激萬分之聖旨，行百般之施政」，而「新附之民須謹直戒慎，期其無過」。⁴⁸綜合以上兩文，可看出其觀點與袁和相同，認為亞洲民族融和事屬必然，且必基於具有向外擴散能力的日本精神。是以，日本的臺灣統治，作為日本王道（或袁和使用的「皇道」）精神向亞洲擴散的一環，當然也只能採用與歐洲不同的一視同仁政策，臺灣人的責任便是理解、融和入此一精神中。

其實，無論是袁和、《南日本》，還是日本國內之日人，對於日本、西方殖民的問題，他們找到的解答都與後藤新平相同，亦即是日本因為有融和全亞洲民族的使命，對臺灣的統治自然須採行本於日本精神的一視同仁政策。從更廣的意義來說，此種自領臺初期以來就已存在，如學友會、伊藤政重的看法所示，基於亞細亞主義，必須先採同化主義，才能進一步向外實現的說法再次浮現，並成為在

⁴⁵ 〈臺灣の新使命〉，《南日本》，1934年1月12日，第1版。

⁴⁶ 國民精神作興詔書頒布於1923年11月，主要內容包括振興傳統純樸的精神等等，其目的是為了處理關東大震災後國內的混亂，並抑制社會主義等新思想流傳造成的影響。

⁴⁷ 〈島民と國民精神〉，《南日本》，1933年11月17日，第1版。

⁴⁸ 〈王道治下の臺灣〉，《南日本》，1934年10月5日，第1版。

臺日人的主流。誠然，這次浮現最大的特徵，就是其隨著軍部的提倡而更顯著地強調日本精神。

（三）軍部態度與田中一二的活動

欲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必須先強化臺灣內部的日本精神，其實也是臺灣軍的看法。1933年11月，國民精神作興詔書頒發十周年紀念日的演講中，臺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及當下時局已比十年前更為險峻，亞洲國家又被歐美各國影響而爭吵不休，在此世界黯淡的狀態下，作為臣民必須「宣揚我等獨得的皇道精神，以及古來優越之我等的東亞文化」，而為了「宣布皇道於四海，恢弘天業於八紘」，其「先決條件就是我等國民的自覺及國基的完成」。⁴⁹ 1934年始政紀念日上，松井也表示日本的臺灣統治雖然有著不凡的成就，但僅限於物質文明的範圍，而忽略精神方面的建設，當務之急就是在實行時局教化。⁵⁰ 1934年9月，臺灣軍少佐森田春次（1891-1961）受新竹市役所及在鄉軍人會之邀演講〈皇國的民族性使命與時局的重大性〉，談及日中提携問題時，更具體地表明臺灣在對外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地位：

現在支那尚旺盛地激起反日抗日，起因於背後受到某些國家的煽動，總之都會讓支那自己分裂，或者是使其歸於××××××。與支那特別有緣故的本島人諸氏，須認識日本精神，進而對支那宣傳日支提携的有利處。⁵¹

從軍部角度來看，無論是面對「非常時」的世界情勢，還是向外「宣布皇道」，其根本前提都必須先確立國家內部的穩定，強化國民對國家的信心。然而，作為國防、南進前線，又有「對支那宣傳日支提携」任務的臺灣，過去卻忽略精神方面的建設，當務之急在於實施時局教化、強化臺灣人的日本精神。在臺日人當中，並不乏與軍部擁有相同看法者，田中一二即是其中之一。

如前所述，1927年，田中自行創立臺灣通信社，從事報刊、出版業務。1928年後又投身於青年運動，創設大成青年團，並於1930年創刊《南國青年》。田中的青年運動，與總督府主要面對臺灣人的青年指導不同，係以日本人為主，強調敬神崇祖、忠君愛國，以及青年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背後也獲得蓑和藤治郎等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受到伊藤政重影響，田中也為下層民間日人發聲，經常批判資本主義，指責「特權階級」是阻止青年運動發展的元凶。於是，田中的活動漸漸從青年運動擴展到針對無產者的大眾運動。⁵²

田中強調提振青年精神，又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其實與大日本生產黨等右翼團體類似，其同樣於1930年代逐漸右傾。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田中對國防問題越來越重視。其最初於1931年12月受臺北市聯合青年團委託，前往新竹、

⁴⁹ 松井石根，〈現下時局の検討と國民精神の作興〉，《大亞細亞主義》1：8（1933年12月），頁23-26。

⁵⁰ 〈始政四十年所感〉，《南日本》，1934年6月17日，第3版。

⁵¹ 〈非常時講演〉，《經世》，1934年9月16日，第4版。

⁵² 宮崎聖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田中一二の青年言説と実践〉，頁5-12。

臺中、臺南、高雄，向各地青年團與相關當局募集國防捐獻。⁵³ 1932 年末，開始籌辦「新日本國防青年團」，宣言「國民對於時局，不能採取花火線香式的態度，必須使軍部無後顧之憂」，主張應充實青年的國防觀念及愛國精神。⁵⁴

當軍部基於總體戰思想，逐漸增加政治、經濟上的發言權，田中的活動也受其影響，而轉向擁護軍部的國防、愛國運動。1933 年，該組織正式創立，並定名為「大日本國防青年會」，綱領中稱「為圖國防的完璧，自任國民精神之指導確立，使皇道之純義為大眾覺知，努力於產業經濟之發展，以期國力的更張」。會本部設於東京，支部則設在日本各都市及外地、滿洲國等，不過實際上只有在臺灣設支部，其顧問、贊助員亦以臺灣關係者居多，如前總督川村竹治(1871-1955)，總務長官下村宏(1875-1957)、賀來佐賀太郎(1874-1949)，民間人士三好德三郎(1873-1939)、蓑和藤治郎等。⁵⁵

既然國防、愛國運動的範圍都以臺灣為中心，田中對臺灣的認識當然連帶有了改變。田中曾於 1928 年編纂臺灣介紹書《臺灣讀本》，1933 年該書修訂內容，新增「南方國防的第一線」一節，強調臺灣在經濟上向南支南洋發展，以及國防上控制著臺灣海峽的重要性，結尾認為臺灣必須「與福建彼此相提攜，為東洋和平盡力，努力展開東洋文化」，其中的「楔子」即是臺灣人。⁵⁶

既然田中相信臺灣人具有提攜福建的重大任務，其運動的對象自然也包括臺灣人。1932 年 1 月，其展開國防運動不久，針對臺灣青年而寫的文章中，一面從大亞細亞主義的角度解釋九一八事變，強調日本係基於「擴布義於四海的大精神」，才出手自「東亞一體民族共通的殖民地」之滿洲排除軍閥，一面呼籲臺灣人理解日本的大義名分，同時回顧自身現在的幸福，而「燃起愛國之赤誠，在國防獻金等事情上表現出國家精神的發揚」。⁵⁷

如此看來，其想法已與軍部相差無幾，那就是臺灣人必須認識到日本所為乃是義舉，而作為日本統治下擁有幸福生活的漢民族，此時必須更積極以行動回應，展現愛國心，支持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大業。臺灣人成為日中親善「楔子」的前提，乃是臺灣人須先愛國、發揚國家精神，與軍部強調「日本精神」的說法如出一轍。

《新臺灣》如何於 1934 年 5 月改名《臺灣》的歷程，已如前述。作為大日本國防青年會的姊妹事業，《臺灣》自號為「非常時對應的社會教化運動雜誌」，秉持著「國體闡明運動、內臺人融和運動、國民生活改善運動」三大信條。⁵⁸ 最初的社論中，則將「圖皇國精神之徹底，致力強化國民意識」置於指導指針之第一點，並和松井石根一樣，提及臺灣改隸以來精神面開拓的缺乏，接著，比松井

⁵³ 田中一二，〈全臺灣の青年諸君に語る滿蒙事變を正視せよ〉，《新臺灣》16（1932 年 1 月），頁 3-4。

⁵⁴ 田中一二，〈新日本の愛國大眾に訴へたい〉，《新臺灣》22（1932 年 10 月），頁 88-89。

⁵⁵ 宮崎聖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田中一二の青年言説と実践〉，頁 12-14。

⁵⁶ 田中一二，《臺灣讀本》（臺北：大日本國防青年會，1933），頁 8-15。

⁵⁷ 田中一二，〈全臺灣の青年諸君に語る滿蒙事變を正視せよ〉，《新臺灣》16（1932 年 1 月），頁 3-9。

⁵⁸ 〈我等の進むべき目標〉，《臺灣》37（1934 年 5 月），頁 1。

更具體地說明不足之處：「即五百萬島民中有八成無法理解國語的片鱗，雖理解國語，卻少能把握國民情緒、性格，其中也有已自高等學府畢業，卻不知愛國、感謝皇恩者」。⁵⁹可見《臺灣》認為非常時期教化最重要的內涵就是使臺灣人徹底理解日本精神，以促成「內臺融和」。至於實際活動，則體現在反對恢復公學校漢文科，以及攻擊臺語白話字運動。

如其社論所云，臺灣是帝國的生命線，也是對外發展的據點，加上面對國際危局的逼近，其責任更加重大，因此須實現「大和一體的結合」。提倡恢復公學校漢文科，不只「毀壞國民的名譽矜重」，還是「帝國發展的阻礙者」。⁶⁰至於白話字運動，雖然表面上宣稱有利於普及日語，實際上是「民族運動，背於推進內臺同化……〔原文如此〕向國民一元化精進的臺灣統治之根本，謀策種族自立的第一步」。⁶¹對田中而言，為了日本、臺灣，以及東洋各民族的未來，每一名島民都必須依據日本精神、日本魂，努力守護南方生命第一線，發揚日本之皇道。⁶²於是，無論公學校漢文科、還是白話字運動都須禁止，以免影響日、臺人在日本精神下的融和。

1935 年之後，《臺灣》與日人右翼結合，5 月對先長老教會經營的淡水中學展開攻擊，指責由歐洲人經營的學校，有國防上的間諜疑慮，甚至還曾有反對承認保護滿洲國國策的言行，而其教育方法「冒瀆教育敕語」、「違背皇道的擴充」、「阻止國語普及」，呼籲總督廢止設立許可。⁶³同年 6 月以後，則因珠諾號事件的發生，除了刊載民間人士擁護軍機、國防的看法外，更直接與臺灣軍部聯成一氣，刊登軍參謀長桑木崇明（1885- 1945）、海軍武官酒井武雄（ca.1889-1964）等軍人的意見。⁶⁴田中本人亦參與由民間人士組成，擁護軍部的臺灣國防強化聯盟、並偕同西川純（鄉軍成員，1880-1943）、林治人（鄉軍成員）、山下好太郎（皇政會主幹，1900-?）三名常任幹事，與酒井武官討論珠諾號問題的對策。⁶⁵

⁵⁹ 〈臺灣教化の大施燦として輝く〉，《臺灣》37（1934 年 5 月），頁 2-4。

⁶⁰ 〈大和一體の結合〉，《臺灣》38（1934 年 6 月），頁 4-7。

⁶¹ 〈白話字運動を排撃す〉，《臺灣》44（1935 年 11 月），頁 2-3。

⁶² 〈守れ南方生命第一線〉，《臺灣》48（1935 年 6 月），頁 1。

⁶³ 〈同志に訴ふ〉，《臺灣》47（1935 年 5 月），頁 16-17。

⁶⁴ 〈我臺灣を侮辱するも甚し〉、〈軍機擁護の爲めには全島民の協力を望む〉，《臺灣》48（1935 年 6 月），頁前 3、3。

⁶⁵ 〈臺灣國防強化聯盟崛起す〉，《臺灣》48（1935 年 6 月），頁前 2。

第四節 大亞細亞主義與臺灣人之反應

由蓑和藤治郎、《南日本》社論、田中一二之言論，反映出在臺日人對大亞細亞主義越來越深入的回應。九一八事變後，蓑和與鄉軍聯合，在集會上鼓吹恢復皇道、退出國際聯盟，之後也持續宣揚大亞細亞主義；在大亞細亞主義於臺灣流行時，《南日本》社論開始回頭思考臺灣統治，並得出結論——日本統治臺灣係基於能夠向外宣揚，並融和亞洲民族的皇道精神、同化政策，因此與西方殖民不同；田中一二則明確地顯示出親軍態度，其以宣揚皇道為己任，攻擊公學校漢文科、臺語白話字運動，並實際組織團體、採取活動。當在臺日人對「內臺融和」的看法更加激進時，作為其對象的臺灣人究竟有何種反應？

如前章所述，於 1920 年代末期，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就已脫離亞細亞主義，轉向國際主義、共產主義，蔣渭水即厭惡古老的「東方文化」，並推崇「唯物主義蘇俄」。進入 1930 年代，隨著總督府開始取締左翼勢力，臺灣民眾黨於 1931 年被解散，加上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情勢，左翼知識分子在公開場合已無多少發言空間。在《南瀛》報上一篇可能是批評過度擴軍的文章，其標題遭刪除成「國防上增加軍備費××、××××× ×××× ××××」，內文中攻擊軍國主義的文字，則成為「元來軍備之設，為守邊境，保持安寧。有×××義者，××××，變為××之具，以致戰爭頻生」，至於結尾約有 130 餘字完全刪去，使得整篇文章語焉不詳。¹ 該文發表兩週後，該刊時事短評欄「鐵算盤」，同樣批評日本惟武力、軍備至上的風潮，其內容當然也遭刪除：「日華夙年懸案，益宜及早解決，庶幾得互相物質融通。不然若徒誇逞軍備鞏固，而行××××××畢竟感情必臻惡化。東亞將來，砲火相攻，恐怕迴避不來」。² 1930 年代的左翼人士不得不在嚴格的審閱下噤聲，正如《南瀛》的饒舌子所言，「目下時局是極重大的，所以對××是漸時不敢啟口，因為法治國之下此種關係××的極端論是不容我們植民饒舌的」。³ 在嚴格審查下，左翼知識分子幾乎無法對時局表達真實看法，對於大亞細亞主義自然也是如此。

相較之下，未與總督府採取全面對抗姿態的《昭和》、《新民報》反而能延續 1920 年代的情形，保存了對時局表達意見的空間，其中，《昭和》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討論，又比《新民報》要來的多。⁴

一、傳統文人的情形：《昭和》上之論說

《昭和》上的傳統文人，如何面對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最初回應或許可以林震東為例。如前章所述，在《昭和》上活躍的林震東為新竹士紳、

¹ 〈為國防上增加軍備費〉，《南瀛》，1932 年 11 月 5 日，第 13 版。

² 〈鐵算盤〉，《南瀛》，1932 年 11 月 19 日，第 13 版。

³ 〈饒舌〉，《南瀛》，1933 年 12 月 16 日，第 14 版。

⁴ 此僅就現存史料而言，《昭和》保存較齊，就九一八事變後的部分，國內目前藏有 1932 年 3 月至 1938 年 5 月改題為《南邦新聞》為止；1932 年 4 月日刊化後的《新民報》現存並不完整，僅有 1932 年 4-5 月及 1933 年 5-7 月之部分，以及其他剪報留存。

林占梅長孫。對於事變後日本改變向來的協調方針，決心展開自主外交一事，《昭和》將之評為「代日本雪三十年奇恥，代亞洲爭應得主權」，⁵而曾經鼓吹日中親善、亞細亞主義的林氏同樣也頗具好感，支持日本採行「亞細亞們羅主義」，並「堅持到底，不為勢屈，不被術誘，使由理論而進為實行，則亞細亞霸主，舍日本又誰與歸」。⁶

林氏也稱許中日兩國能夠在淞滬事變後締結停戰協定，避免進一步的戰亂，是「臨崖勒馬，尚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⁷不過，當其討論到滿洲國的建國時，就表達了與日人不同的看法。1932年5月撰〈滿蒙政策似太急進論〉一文，認為日本欲確保滿蒙權益雖然是天經地義，但地方人士之所以願意配合日本建立滿洲國，仍是因溥儀（1906-1967）的協助，日本若要對滿洲「生吞活剝」，「全不顧及執政面子，以此欲求相安無事，是何異蒸砂求飯，卻行求前耶」。因此，他建議日本應在滿蒙創立緩衝國，由列強共同保護，同時允許滿洲國自組軍隊，僅派軍官提供訓練，並「極端以誠字待滿洲」，使溥儀宣言的王道能夠實現。林氏強調，若日本欲採急進政策，使滿洲國各部除總長外都採用日本人，施行禁止山東移民入境，縮減滿洲兵權等措施，則「雖五尺之童，亦知利用鄭孝胥以下作傀儡」，必然會引來滿洲人士的反對。⁸這種聚焦於「誠」的說法，實與1929年時其提倡以「誠」展開對中外交的建議相同，⁹可見，林氏相信若日本欲與亞洲國家親善，必須採取誠信公正的態度。對照在臺日人希望強化滿洲與日本的結合，過去曾參與公益會的林氏卻反其道而行，希望日本依誠信充分尊重滿洲主權，似乎顯示出「御用紳士」與日本人曾存在的合作關係已逐漸改變。

上文刊登後，林氏乘船前往日本國內，並轉至滿洲遊歷，他在《昭和》上的投稿遂越來越少。但《昭和》上的其他論說，仍經常與大亞細亞主義有關。1933年3月，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昭和》刊登論說，認為滿洲原為清朝故土，係日本自俄國手中奪回，此時再歸還給溥儀，而國際聯盟卻忽視之，僅暹羅棄權表達同情，「兔死狐悲，亞洲者亞洲之亞洲，白禍橫流，我帝國置身其間，任狂瀾之震撼而不驚。苟無帝國之保障，橫流之禍，將無底止矣」，希望中國能體認「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之意，與日本親善。¹⁰同年7月，中日兩國間戰事大致平息時，¹¹又再一次呼籲「日滿支相提攜」，希望「同文同種」「共依唇齒」的三國，「以亞細亞民族與〔興〕亞細亞之建設」，防範西方帝國主義入侵。¹²

不過，比起這些論說更引人眼目的，是《昭和》上刊登的各種徵文活動得獎文章，受到時代背景影響，徵文主題不時圍繞著大亞細亞主義。以下透過四篇徵

⁵ 〈促芳澤外相之決心〉，《昭和》，1932年4月2日，第13版。另外，據下引兩週後的〈時事譚薈〉，該評論作者似為林震東。

⁶ 〈時事譚薈〉，《昭和》，1932年4月16日，第10版。

⁷ 〈時事譚薈〉，《昭和》，1932年5月7日，第12版。

⁸ 〈滿蒙政策似太急進論〉，《昭和》，1932年5月14日，第10版。

⁹ 〈日華親善之難易 關於東亞大局奚若〉（續），《昭和》，1929年2月2日，第3版。

¹⁰ 〈滿洲原清朝舊物 帝國由俄奪回〉，《昭和》，1933年3月6日，第11版。

¹¹ 1933年5月31日，中日兩國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終結九一八事變後兩國的軍事衝突。

¹² 〈日滿支相提攜 乃屬目前急務〉，《昭和》，1933年7月8日，第11版。

文，深入探討傳統文人對大亞細亞主義的看法。

第一篇徵文是由出身臺南、長年旅居神戶的商人、心聲吟社社長莊玉波（1883-?）所徵，題目為「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評審謝汝銓（1871-1953），投稿期限至1933年4月底止，得獎作品自8月開始刊登在《昭和》上。第二篇徵文，則是同年7月底莊玉波又以「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行共榮共存論」為題徵募，¹³評審陳梅峰（1858-1937），得獎作品則是自12月開始刊登。

在第一篇徵文的啟事內，莊氏表示心聲吟社的設立目的，乃是與海外華僑呼應、維持漢學，並進而謀求「日華親善」，九一八事變之爆發「非特日華之不幸，實東亞和平之一大危機也」，因此欲以徵文方式，消除兩國之軍事對立。¹⁴其對日中對立感到不安，應是傳統文人共同的心聲。尤其是莊氏因長年在海外經商，結識不少中國文人，心聲吟社其實就是其與中國領事館官員及華僑共同組織。¹⁵除了與中國人士有著個人情誼外，在文化傳統上必然更放不下對中國的感情，面對兩國戰禍，遂以「日華親善」為己任。

綜觀這些文章，可發現這些文章的作者，面對更嚴峻的中日關係，往往冀望以亞細亞主義化解兩國紛爭，共同抵抗西方列強，其或云中日是同文同種的「兄弟之國」，「日支之隙不解，則彼歐美碧眼諸輩將作虎視眈眈，以窺伺我東亞二國」。¹⁶進一步或號召黃種各國團結，「今之時何時乎？非黃白暗鬪之時乎？」，「白禍頻頻之今日，同胞若仍為睡獅，永作散沙，難保無亡國滅種之患」，「我黃種可不早圖團結以拒外耶」。¹⁷其身處在日本統治下，現實命運與日本帝國休戚與共，自然大多從日本的角度認識當下的國際情勢，指出美、法、英、俄等國逐步擴張勢力於亞洲，對東亞包藏禍心，¹⁸而中國不應受歐美國家煽惑而誤解日本，呼籲中國改變排日態度，「我願中國之民，早自猛省，悟徹日本原是同文同種，且同是禮教之國、仁義之邦，絕無自相蹂躪之理」。¹⁹

不過，若細究文章內容，可知其並未一味指責中國抗日的不是，也希望日本改變其對外政策：「欲謀日華親善者，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權在上而不在下也」，認為兩國在上者應「改弦易轍，變其志慮，各守國土，各無野心，開誠布公為務，民胞物與為懷」，且「毋以大壓小，勿以強欺弱」；²⁰「苟中華萬非而有其一是，須速與之握手同行，破涕為歡，永以為好」，認為就算中國屢屢實行排日等不當之舉，日本為了東亞和平的理想，仍應致力與之親善。²¹延續1920年代以來的想法，這些文人始終嘗試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呼籲兩國都必須致力改善關係。

¹³ 〈隨筆錄〉，《昭和》，1933年7月29日，第14版。

¹⁴ 〈神戶心聲吟社徵文啓〉，《南瀛》，1933年2月11日，第11版。

¹⁵ 除了自組的心聲吟社，以及臺灣的瀛社外，他也曾加入中國的南社、虞社，並結識中國駐日留學生監督秘書郭東史等人。蘇淑芬，〈瀛社·南社·虞社·壽蘇吟社—莊玉波的海外詩緣〉，頁199-208。

¹⁶ 卓周紐，〈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年8月26日，第15版。

¹⁷ 蔡栢蔭，〈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施共存共榮論〉，《昭和》，1933年12月16日，第13版。

¹⁸ 古連炳，〈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施共存共榮論〉，《昭和》，1934年1月13日，第13版。

¹⁹ 卓周紐，〈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年8月26日，第15版。

²⁰ 彭祝堂，〈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年9月2日，第15版。

²¹ 彭鑑容，〈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年10月21日，第13版。

文章中具體提出各種親善策，並非如日人的大亞細亞主義觀點，直接將日本視為亞洲盟主，未具有強烈的日本中心看法。他們除了建議兩國應設置親善、交流機關，不再實行爾虞我詐的政策等一般性論述外，²²也有主張兩國應就不平等條約，重新談判，「當爭者爭，當讓者讓，各舒其積憤，而重締日〔日〕華平等條約，兩國復舊親善」。²³最令人意外的，竟然有論者建議以「友聯主義之基礎」，聯合全亞洲民族，形成共榮共存之經濟同盟。²⁴

雖然論者只從經濟上討論友聯主義，與 1920 年代陳逢源「尊重人格」的說法不盡相同，但是其希望各國間應互相尊重、平等相處的心情則類似。事實上，如後文所述，這裡的說法很可能是參照了同一時期《新民報》的社論。這也呈現出，九一八事變後從林震東以來的傳統文人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思考，與日人已根本上產生分歧，前者強調互信互惠，後者則以日本為中心，而從此分歧出發，雙方的立場也越行越遠。其一，便是當他們將亞洲團結的理念套用到殖民統治時，就不見得如日人一般對統治成果感到驕傲：

世界文明各國，對所領屬地，多有國植之分，不平等之待遇，而無共存共榮之政策，俾屬地之民，不得享共存共榮之幸福。即有時宣布共存共榮之主旨，亦徒托諸空言而無實行耳。如我臺屬帝國宇下，已近四十星霜矣，土匪經已掃清，教育亦已普及，而自治制至今尚未實施者，皆無共存共榮之政策也。上既不實施共存共榮之政策，則下不得同享共存共榮之幸福。此無他，失團結之精神也。我臺同為帝國子民，宜急起團結而促進之。此徵同國之民，宜有團結之精神也，即同種之民，亦宜有團結之精神。

〔中略〕

我黃種同胞，若不急起團結，恐亞洲大陸，幾何不為白種人無形之侵略也。願我黃種同胞，勿差別勿歧視，振團結之精神，因團結之能力，上下一心，實施共存共榮之政策，同享共存共榮之幸福。²⁵

日人眼中的臺灣統治，乃是立基於日本融和各民族的大精神，因此在各方面都是一視同仁，且應能達到「內臺融和」的境界。對此，文章作者討論「共榮共存」理想時，不但未曾提及日本精神的偉大，反而指出經過四十年的統治後，由於總督府「不實施共存共榮之政策」，臺灣人仍未「得同享共存共榮之幸福」，因而遂「失團結之精神」。對作者而言，唯有靠「勿差別勿歧視」，而非日本精神，才能實現島內的團結，更向外實現全黃種人的團結。眾所周知，文中提到的自治制，在不久後的 1935 年便獲實施，但即使實行，仍被傳統文人視為「形似耳」，

²² 盧三多，〈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 年 9 月 9 日，第 13 版；旁觀者，〈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 年 9 月 16 日，第 14 版；文淵生，〈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 年 10 月 28 日，第 13 版。

²³ 蔡哲人，〈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 年 10 月 14 日，第 13 版。

²⁴ 蔡栢蔭，〈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施共存共榮論〉，《昭和》，1933 年 12 月 16 日，第 13 版。

²⁵ 韓承烈，〈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施共存共榮論〉，《昭和》，1933 年 12 月 2 日，第 13 版。

精神則非也」，並表示若總督府肯「撤廢差別之六三號」²⁶與母國民同沾權利，以副我天皇一視同仁之心，猶勝於白種之待異種殖民也多歟」。²⁷顯然地，對於臺灣統治的看法，傳統文人與日人之間有著相當大的鴻溝。

其二，既然他們並不特別強調日本的中心地位，在這些文人眼中，日本精神也不是大亞細亞主義中最重要元素，漢學、漢文就成了兩國親善的核心。莊玉波創立神戶心聲吟社的宗旨，原就是為維持漢學，響應徵文者亦認為「夫欲謀親善，華以日貨為重，日以漢學為貴」，²⁸更將漢學提升為東亞的核心精神：「舉漢學之真意，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而已，此八字為我吏〔東〕亞之國魂」，若「漢學昌明，日華則親善」。²⁹由此看來，他們依舊延續了 1920 年代的看法，正如辜顯榮於 1919、1920 年的發言「若變孔教，則東亞文明，失其精神，而不得與歐美相拮抗。孔教所重者，在忠信孝悌，禮義廉恥」。³⁰

不過，雖然這些文人維繫漢學的態度堅定不移，外在的環境已不再友善。當在臺日人不斷呼籲臺灣人應發揮日本精神、普及日語，甚至採取行動時，如何面對大亞細亞主義中的日本主義思想，就是他們需要思考的課題。由彰化崇文社提出的兩篇徵文，將是解答的關鍵。

1917 年創立的彰化崇文社是由黃臥松（生卒年不詳）主導，最初只是祭祀文昌帝君的神明會，自 1918 年開始每月一次舉辦徵文活動，另外附屬的滑稽詩社也舉辦徵詩活動。³¹首先要討論的，是其 1935 年 3 月第 207 期課題：「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通商仕進論」。

如前所述，公學校漢文科的設置，曾受到田中一二等日人的攻擊，但《昭和》漢文欄則有不同的看法。其漢文編輯林子惠在 1932 年入社前，就曾撰文強調傳統漢學之可貴，認為漢文乃臺灣人學問之根本，絕不可視為舊學而棄之，對外則「欲為東洋人類永久的親善計，宜藉漢學為融和之機關」，於是建議改小公學校漢文為必修科，並開放漢文書房，以普及漢學，「即東洋之精華可以保存」。³²1933 年，《昭和》又特別以全版刊登臺北市公學校保護者聯合會提出的陳情書，建議公學校能以漢文為必須科，其理由根據公學校父兄提出的漢文科要存置論，漢文除了能使臺灣人前往華南、南洋、滿洲拓展生路外，更「宜與前記各地方連絡，謀維持東洋平和，將來對大亞細亞之團結，在宜以犧牲的精神猛進之立場」，並「贊翼我日本之國運進展，益宣揚國威於海外」。³³換句話說，聯合會認為臺灣人必須學習漢文，才能擔負與中國、滿洲來往，促進「維持東洋平和」、「大亞細亞

²⁶ 應指六三法之後身法三號。

²⁷ 淡薄子，〈寬猛相濟尤貴母植無分論〉，《昭和》，1936 年 2 月 1 日，第 14 版。

²⁸ 劉汶南，〈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 年 9 月 30 日，第 13 版。

²⁹ 曾永坤，〈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華親善論〉，《昭和》，1933 年 11 月 4 日，第 13 版。

³⁰ 見第三章第三節第三小節。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375-379。

³¹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37-46。

³² 林子惠，〈漢學重興感言〉，《昭和》，1932 年 4 月 30 日，第 15 版。

³³ 〈臺北市保護者聯合會提出陳情書 當局宜大英斷以副島人希望〉，《昭和》，1933 年 11 月 25 日，第 12 版。

之團結」，以及「宣揚國威」的責任。

崇文社的「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通商仕進論」徵文，也反映出文人此種普遍想法。雖然題目只提到「通商仕進」之個人成就，論者卻往往進一步發揚漢學、漢文的好處。例如獲選為第一名者寫道，「蓋漢文者，東洋之精華，文明之純粹」，若通達漢文，「遠則可以折服歐洲，競爭國脈；近則可以收功極東平和」；³⁴第二名稱「滿洲及中華漢學，自四千餘年，為純全之國粹」，若不通漢學，「何者能通款曲，何者能達衷情，使日華親善之良機，滿洲發展之門徑，安在不嗟茫洋」；³⁵第三名甚至表示「今日一至海外，非英語則難通，非漢文則不達」，並質疑日本國學在國外較漢學還要來得不實用；³⁶一直到第十名，亦認為只有靠普及彼此語言，才能疏通意思，達成中日提攜。³⁷ 整體來看，他們認為面對有長期漢學傳統的中國、滿洲，不能靠所謂「皇道精神」或「日本精神」的「恢弘」、「擴張」，而是唯有靠教育漢文、漢學，才有辦法在事實上理解疏通彼此意思，達成日滿華之間的團結。

1936年10月，當廢除報紙漢文欄的問題已沸沸揚揚之時，崇文社又以「漢文有輔助和文並國語普及之必要新聞雜誌不可廢止漢文論」為題徵文。前次徵文，僅就漢文漢學的實用性，以及其對東亞文化、東洋和平的重要性作討論，而此次徵文，論者就得直接回應漢文與日人汲汲營營追求的日本精神間的關係。於是，他們除了重申漢文係亞洲文化本源、日華親善、日滿提攜關鍵外，並表示漢文在日本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從「我國肇國而有」，歷經江戶時代、明治維新仍經常為日人使用，說明漢文與日文密不可分的關係。³⁸不只漢、日文在實用上能相輔相成，他們進一步強調，就連日本精神其實亦本於漢文，大化革新、建武中興，以及德川光圀著大日本史，皆「本漢文之精華，以養成大和魂之美德」³⁹

不只是江戶時代如此，更有認為自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培養的國民精神亦都是本於漢文，「取漢文之精華」，因此「漢文為和文之本源，而和文為漢文之支流，絕其本，則枝葉自枯，塞其源則潮流自涸，是漢文與和文有相輔相助之勢，並育並行而不悖也」。⁴⁰由上論述顯示，其強調漢、日文之間的關係，已非「漢文有輔助和文」或「相輔相成」，而是漢文方是日文、日本精神之本。他們之所以一反

³⁴ 古炳，〈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通商仕進論〉，《昭和》，1935年5月18日，第14版。

³⁵ 何際虞，〈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通商仕進論〉，《昭和》，1935年5月25日，第14版。

³⁶ 卓周紐，〈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通商仕進論〉，《昭和》，1935年6月1日，第14版。

³⁷ 宋世英，〈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通商仕進論〉，《昭和》，1935年7月20日，第14版。

³⁸ 鄭啓南，〈漢文有輔助和文並國語普及之必要新聞雜誌不可廢止漢文論〉，《昭和》，1936年12月12日，第14版。

³⁹ 白貞，〈漢文有輔助和文並國語普及之必要新聞雜誌不可廢止漢文論〉，《昭和》，1937年1月16日，第14版。

⁴⁰ 韓承澤，〈漢文有輔助和文並國語普及之必要新聞雜誌不可廢止漢文論〉，《昭和》，1937年1月23日，第14版。

日人將漢文視為妨礙日本精神的說法，主張只有透過漢文才能實現日本精神，目的在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繼續維護漢人文化傳統。正因如此，在臺日人的呼籲，非但沒有達成「內臺融和」，反而更加凸顯在臺日人與傳統文人之差異。

表 4-3 《昭和》上的相關徵文作品及其作者

徵文題目	刊登日期	入選作者
神戶心聲吟社 欲求東亞和平須謀日 華親善論	1933 年 8 月 26 日至 11 月 11 日	臺北卓周紐、蘇澳彭祝堂、澎湖盧三多、 澎湖旁觀者、澎湖西湖小吏、竹東劉汶清、 新竹吳敏敦、鹽水蔡哲人、高雄彭鑑容、 文山文淵生、竹山曾永坤、鹿港施雪濤 共刊登 12 篇
神戶心聲吟社 黃種同胞急起團結實 行共榮共存論	1933 年 12 月 2 日至 1934 年 3 月 17 日	臺南韓承烈、新竹楊星亭、東石蔡柏陰、 中壢古連炳、中壢古道興、關西陳濟昌、 臺南韓承澤、竹山黃文通、南投陳子安、 中壢彭祝堂、嘉義盧三多、臺北卓周紐 共刊登 12 篇
崇文社徵文 內地臺灣上級生徒宜 兼漢文以便中國滿洲 通商仕進論	1935 年 5 月 18 日至 7 月 20 日	中壢古炳、新巷何際虞、臺北卓周紐、 楊梅古道興、大屯王融融、臺南韓承澤、 文山文淵生、高雄宋義男、楊梅楊星亭、 高雄宋世英 共刊登 10 篇
崇文社徵文 漢文有輔助和文竝國 語普及之必要新聞雜 誌不可廢止漢文論	1936 年 12 月 12 日至 1937 年 1 月 30 日	竹南鄭啓南、彰化白貞、臺南韓承澤、社 頭蕭登壽 共刊登 4 篇
備註	文章作者僅列出《昭和》刊登者，按名次排列。	

如表 4-3 所示，四篇徵文雖然是不同社團於不同時期所徵，但作者之同質性甚高，數篇皆入選者甚多。由這些作者的背景可知，多數人並不是向來抵抗日本統治的社會運動人士，甚至亦有總督府的職員，例如前三篇徵文都曾入選的卓周紐（1893-1973）為瀛社成員，於 1927-1940 年間擔任總督府遞信部雇員。⁴¹ 顯示出傳統文人——包括詩社成員、總督府職員，以及《昭和》經營階層之「御用紳士」，皆普遍地嘗試在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下，繼續保存自身文化傳統。實則如前章所述，1920 年代，其之所以願意與日人同樣高唱亞細亞主義，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但當大亞細亞主義來勢洶洶，他們一方面雖然同意中、日、滿親善對抗歐美的重要，一方面則不願全盤接受日人重視日本精神的說法，更要轉化相關論述以保存漢學傳統。結果乃是傳統文人不再與日人對大亞細亞主義擁有同一認

⁴¹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識，彼此的合作關係因此瓦解。如果進一步比較知識分子的觀點，可知臺灣人無論是新、舊或是左、右，在面對大亞細亞主義時，實際上有著相當類似的反應。

二、新知識分子的情形：《新民報》社論

《新民報》的新知識分子，並不會為了避免揚起事變後激昂的國民情緒而刻意避談國際情勢。據吳三連(1899-1988)回憶，當時《新民報》本於「民族意識」，反而對此密切注視，盡可能詳盡報導。⁴²1932年8月，日俄戰爭期間，代表日本與美國從事親善活動的金子堅太郎(1853-1942)，於報上發表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向其勸告日本應在亞洲行「門羅主義」的談話。9月，筆名延陵子的吳三連，便在《新民報》的「評壇」欄對該事發表看法。其追溯美國歷史上門羅主義的意義，批評門羅主義不過是為了保全美國的安全而提出，而後美國也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現實上拋棄門羅主義，最後則表示國際關係應基於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機會主義的利益、偏狹的主張不會被允許」，日本不需高唱門羅主義，反而應門戶開放式地揭露一切，訴諸世界的輿論。⁴³

大亞細亞主義流行之初，《新民報》並不像《昭和》一樣表達讚賞。箇中原因，以吳三連的說法為例，可能是他們已隱約看出背後之「機會主義的利益、偏狹的主張」。也就是說，在他們眼中，日本不過是為了保障本國利益，才搬出「東洋門羅主義」之說，如此不但不會改善日本與國際社會對立的現狀，反而會使日本進一步被世界懷疑。

或許因為此種懷疑的態度，直到1933年7月，《新民報》社論才又出現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討論。在〈亞細亞聯盟之前提〉一文中，可看到他們如何延續1920年代以來的觀點。其問道，在此經濟恐慌之時，「如何始能收攬亞細亞民族之民心」，以形成一個由亞洲各民族組成、自給自足的經濟組織。其先勸告日人不可抱持著「代白人為亞細亞之支配者，此不外是以暴易暴之霸道」之想法，接著自答如下：

蓋真正之亞細亞聯盟，當以平等待亞細亞民族，一旦有事之秋，宜興仁義之師以助長期獨立自主，期脫離白人之羈絆為己任。果得如此，亞細亞諸邦方立腳於友聯主義之基礎，始得均享受經濟上之互利互惠，以形成合理的經濟領域。

除了批評「亞細亞聯盟之思想」不可是「以暴易暴」外，「友聯主義」的說法再次出現，並成為新知識分子強調的「亞細亞聯盟之前提」。既然「友聯主義」最初即與新知識分子的社會運動相輔相成，其同樣進而思考臺灣統治的問題，要求日本必須先給予朝鮮、臺灣民眾平等待遇，才能說服亞洲民眾團結，否則終將

⁴²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初稿》（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頁81。

⁴³ 〈東洋モンロー主義 何の効果ありや〉，《新民報》，1932年9月9日，版次不明，收入李承機主編，《六然居存日刊臺灣新民報社說輯錄 1932-3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9），頁5-55。以下所有《新民報》社論，亦皆出自同書，茲不再錄。

流於口號，蓋「所謂亞細亞聯盟之根本精神，若非排斥霸道，而基於王道之思想為結合之紐帶斷斷不行」。社論於是指出日本應再檢點對臺、鮮的統治政策，如地方制度問題，「事雖小，其精神上之所影響甚大，故吾人熱望臺灣當局宜棄小乘而就大乘，到此事不宜遲，唯有於最短期間斷行最進步的制度為急務」。⁴⁴

以「友聯主義」為基礎，再援用孫文的「王道」「霸道」觀，幾乎可以說是新知識分子定奪大亞細亞主義實現與否的標準。作用在現實上，就是對外要「平等待亞細亞民族」、「互利互惠」；對內則須改善對臺、鮮的統治，尤其是當時由新知識分子主導的自治聯盟所汲汲營營追求的地方自治制，更要急速施行。

1934 年後，隨著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會等大亞細亞主義之相關團體，接二連三地在臺灣創立、活動，《新民報》的討論也增多。首先，在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會創立前夕，〈大亞細亞主義可能實現乎〉一文，直接質疑日本對外政策的不當，其認為大亞細亞主義應以「仁義道德」的「王道」為之，若欲依照此理想，「則此兩三年來日本之外交政策，如無轉換方向，想難於實現」，再加上亞洲各國文化不盡相同，也不見得擁有以武力排擊歐美的實力。因此，社論最終質疑大亞細亞協會團結亞洲國家，對抗歐美的主張難以實現。⁴⁵

其後，《新民報》對外的主張，依舊是從各國平等的角度出發。〈白禍將到與黃人的覺醒〉一文，雖然搭上大亞細亞主義敵視西方的風潮，表示東方情勢緊張，黃種人應有重大自覺，團結抵禦白人入侵。文末，卻再次強調只有彼此平等、利害共通，才能達成亞洲團結，特別是自國內的問題，以及亞洲的懸案，必須優先解決。⁴⁶可見其所謂「自覺」，並不是單指各國應自覺與日本親善，而是指日本人應自覺，主動以平等方式解決各種與中國之懸案，以及臺灣、朝鮮等日本國內的問題，才能實現亞洲團結。

可想而知，新知識分子思考最多的乃是中日問題。而在〈日華問題將轉機〉、〈對岸領事會議注重日華親善〉、〈日華親善的根本問題〉等社論中提出的具體親善策，就是兩國國民必須互相理解，學習對方語言文字，以疏通彼此、交換文化；⁴⁷政府也必須以「誠意處理南華諸事業，須以大國態度對待鄰邦人民」，⁴⁸不可「徒以權謀數術、好弄小策為能事」。⁴⁹

與對外的親善策呼應者，就是日本對內的臺灣統治。恰如社論所云，臺灣不只與華南一葦帶水，居民又多出自華南，應以臺灣為仲介促進中日親善。詳言之，就是：

⁴⁴ 〈亞細亞聯盟之前提〉，《新民報》，1933 年 7 月 30 日，版次不明，頁 4-172。

⁴⁵ 〈大亞細亞主義可能實現乎〉，《新民報》，1933 年 12 月（推定），版次不明，頁 4-204。

⁴⁶ 〈白禍將到與黃人的覺醒〉，《新民報》，1934 年（推定），版次不明，頁 4-328。按編者雖未推定月份，文中提及「美俄復交告一段落」、大亞細亞協會「日前亦於臺北舉行該會臺灣支部發會式」，查美俄於 1933 年 11 月復交、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會於 1934 年 1 月創立，該社論應是在 1934 年 1 月左右發表。

⁴⁷ 〈日華問題將轉機〉，《新民報》，1934 年 6 月 1 日，版次不明，頁 4-266。

⁴⁸ 〈對岸領事會議注重日華親善〉，《新民報》，1934 年 7 月 18 日，版次不明，頁 4-292。

⁴⁹ 〈日華親善的根本問題〉，《新民報》，1934 年 7 月 20 日，版次不明，頁 4-292。

若夫臺灣統治能以一視同仁為標準，而無內臺差別之政策，日華關係亦以共榮共存為方針，而無互相侵略之野心，如由此根本的共存理想，以處置萬般實際的諸施設，則無民不服，無鄰不親，但回顧過去之實情，欲達到此理想，前途似乎尚屬遼遠。⁵⁰

在新知識分子的眼中，大亞細亞主義對外的「共榮共存」和對內的「一視同仁」，乃是一體兩面的存在，在此層次上，其理解與日本人不斷強調的「融和」——包括融和亞洲民族與「內臺融和」——並沒有不同。但在內容上，與日人對日本外交、治臺政策的肯定不同，社論指責日本不只對內沒有達成內臺平等的統治，對外亦不能與中國共享利害，全面否定了日本向來的作為，其最終結果就是「未至融和日華兩民族的感情」。

追根究底，新知識分子與傳統文人都未接納大亞細亞主義中的日本中心思想，也始終未予日本精神相當重視。由於缺乏對日本精神的信仰，他們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思考不再像日人般充滿自信，而是悲觀地點出日本須面對的日臺不融和、日華不親善之殘酷事實。更深一層來看，1920年代開始，傳統文人為了保存傳統文化而鼓吹亞細亞主義，此時新知識分子亦依循著改善自身的待遇、保全自身文化的理想，思考大亞細亞主義。因此自始未與日人同在一條船上的新知識分子，當然不可能接受讚賞日本精神，而是繼續從現實角度批評殖民統治，才有辦法達成其社會運動的目的。

從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神意義來看，《新民報》的社論，並未以日本精神的宣揚作為東洋文化復興的標準，反倒是介紹了中國的新生活運動。其認為臺灣人與中國國民相似，處在「××〔帝國？〕主義下的政治地位、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地位，以及其××〔殖民？〕主義下的政治地位」，文化也因此破敗不堪。既然中國正展開的新生活運動「不外為東洋文化的復興運動」，臺灣人也應提倡類似的運動。雖然其強調具體手段須依臺灣情形實施，不可直接援用，仍可發現在新知識分子眼中，相較於日本，他們更同情處境相似的中國，其新生活運動正好能給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借鏡，當作臺灣人發展自身文化的參考。當然，不以日本精神，而認為新生活運動是「東洋文化的復興運動」，其實也隱約暗示著臺灣人欲維護自身漢文化的希望。⁵¹

透過《新民報》社論提出的具體呼籲，也能理解新知識分子如何再一次將大亞細亞主義與其理想連接。其強調日華親善不能是用「浪人式的策略的方法」，而是要從經濟、產業、教育、文化上堅實地展開，「處在兩國間的特殊地位地臺灣人」，便有促進此親善的使命，而總督府應積極協助臺灣人前往中國發展。⁵²另外，社論也呼籲廢除護照等阻礙臺灣人向中國發展的規定。⁵³其目的表面上雖是要促進日中親善，其實也有具體改善臺灣人生活的作用。

⁵⁰ 〈對岸領事會議注重日華親善〉，《新民報》，1934年7月18日，版次不明，頁4-292。

⁵¹ 〈還我東洋文化 提倡新生運動〉，《新民報》，1934年8月12日，版次不明，頁4-300。

⁵² 〈日華親善與臺人的使命〉，《新民報》，1934年3-4月（推定），版次不明，頁4-252。

⁵³ 〈就臺人之渡華 促當局的留意〉，《新民報》，1934年4月20日，版次不明，頁4-242。

既然臺灣人必須促使日中親善，那麼漢文也有保存的必要。《新民報》社論指出，既然日本在國策上必須要實現日中提携，「在臺灣之亞細亞主義工作，尤為重要」，因為臺灣人不只是「站在非謀日華親善不可的運命之上」，更肩負使兩國互相理解的「亞細亞主義之任務」。於是，其一面順應日語普及政策，承認對臺灣人施行日語教育的重要，另一面則呼籲對臺灣人大施漢文教育，使其自由地在中日之間活躍，才能挽救亞細亞危局，絕不可固執「舊式的殖民統治主義」。⁵⁴

整體而言，《新民報》對日本人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遠比《昭和》有更直接的批評，自然與其 1920 年代以來就站在批判性的角度推行社會運動有關。到了 1930 年代，他們之所以較《昭和》敢於批評日本的外交政策、殖民政策，目的依舊是要以亞細亞主義的說法，爭取臺灣人的待遇、保全臺灣文化。不過《新民報》與《昭和》的差異，多少只是在表現方式的不同而已，就核心層面來看，由於兩者都未接納日本中心思想，其主張並沒有太大不同。

在對外關係上，《新民報》主張的是「友聯主義」、「互利互惠」等強調平等之說；《昭和》從林震東開始就呼籲尊重滿洲主權，緊接著各篇徵文的文章亦多強調平等關係，甚至連《新民報》的「友聯主義」也被傳統文人援用。在對內層面上，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但兩者都批評總督府未實踐「共榮共存」的統治策，要求改善其統治，無論是實施自治制，還是撤廢差別待遇，才能促使臺灣島內團結，也才能進一步達成亞洲團結。兩者對漢文教育的主張，更是沆瀣一氣，其中傳統文人的主張甚至比昭和還要積極。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以左翼新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南瀛》、《新高》漢文欄，雖然處在嚴格的審閱下，偶爾也透露出類似的主張。例如由前民眾黨成員為主的《南瀛》漢文欄，在對外層面上便毫不意外地呼籲日中以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王道為基礎，解決所有懸案；⁵⁵對內，也希望撤廢護照、鼓勵臺人前往中國，⁵⁶或是認為「當此東方民族盛唱團結之秋」，必須「打破優越感及撤廢內臺人之差別觀念」，開放島民參政，才能促進融和。⁵⁷至於保存漢文，幾乎成了各界臺灣人異口同聲要求的政策，《南瀛》稱「為疏通意志，聯絡感情，漢文之必要，較諸往昔，則更甚也」，⁵⁸甚至新文學重鎮的《新高》亦認為「日中滿三國，既成為鄰邦友誼，文化尤同，理宜復興漢學，在臺各學校，加設漢文為必須科，開放教育政策也焉可」。⁵⁹雖然他們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提倡不見得是出自真心，⁶⁰然就欲達成的目的而言，與傳統文人、右翼新知識分子並無太大不同。

總而言之，臺灣人的看法就是，大亞細亞主義必須在尊重亞洲各國的前提上

⁵⁴ 〈亞細亞主義與漢文教育〉，《新民報》，1934 年 9 月 1 日，版次不明，頁 4-310。

⁵⁵ 〈促進日華親善 以冀東亞和平〉，《南瀛》，1935 年 6 月 1 日，第 13 版。

⁵⁶ 〈要圖日華親善 須將旅券撤廢〉，《南瀛》，1935 年 4 月 6 日，第 13 版。

⁵⁷ 〈打破優越觀念 撤廢差別待遇〉，《南瀛》，1935 年 5 月 18 日，第 13 版。

⁵⁸ 〈觀目下東亞大局 暨島民生活現狀〉，《南瀛》，1934 年 4 月 7 日，第 13 版。

⁵⁹ 〈務宜復興漢學 暨圖日華親善〉，《新高》，1935 年 4 月 20 日，第 12 版。

⁶⁰ 例如《南瀛》上曾刊載一篇希望日本「為救友邦之興亡」，驅逐自中國逃亡至日本的逃兵，「以激成其志，而死守中華，俾得復整舊山河」，明顯只是在附會日華親善的言論而已，提出有助於中國抗日的建議而已。〈日華親善在此一舉〉，《南瀛》，1936 年 2 月 29 日，第 14 版。

才能達成。對外既然是要平等相待，對國內的其他亞洲民族，包括臺灣人，也必須改善其待遇，唯有達成此種各民族皆平等的「內臺融和」，才能夠向外達成真正的亞洲團結。尤其是漢文，更是使臺灣人能夠中介，實現日中親善、大亞細亞主義的關鍵。

第五節 小結

九一八事變後，打著日本中心、敵視西方的大亞細亞主義熱潮，席捲了日本國內，除了輿論、政府的高唱外，各種團體也紛紛組成並展開活動。在此潮流下，日本國內的日人很快地便回頭思考殖民地的問題。從言論界的山田武吉，到社會學者的圓谷弘，雖從不同角度、背景出發，但兩人都一致認為大亞細亞主義既然是以皇道之下的「民族融和」為目的，日本的臺灣統治也必須依此原則實現「內臺融和」。學友會、後藤曾強調日本具有發揚「皇道」，或者是「民族膨脹」的任務，為此須對臺灣實施亞細亞主義式的殖民政策，也就是以日本精神同化臺灣人。隨著大亞細亞主義流行，此思想再次復辟，而且更成了普遍的共識。不過，雖然山田、圓谷兩人都有著強烈的日本中心思想，卻都表示此融和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原有的文化。

至於臺灣的情形，1930年代立場不一的報刊，乃是非常好的觀察對象。無疑地，在臺軍部是大亞細亞主義在臺灣最重要的推手。軍部、在鄉軍人除了協助舉辦演講會外，《新高》的評論亦暗示軍部引領輿論激化，蓑和米南、《南日本》、田中一二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思考，也不斷呈現軍部的積極主張。其認為臺灣人為了實現對內的融和，也為了擔起向外促進亞洲民族與日本融和的任務，自身必須先徹底體視日本精神。雖然同樣希望以皇道下的融和，促成殖民、被殖民的關係解消，立場則明顯地比國內日人更為強硬。從在臺日人的角度來看，如《南日本》社論所云，臺灣明明是「南方國防線的心臟、南進國策的大動脈」，卻長期被母國「遺誤」，對懷抱不平感的在臺日人，軍部的重視有如一道光明，難怪他們會隨之起舞。同時，在不安定的國際情勢下，身處「前線」，又被多數臺灣人包圍的在臺日人也不得不產生強烈的危機意識。於是，大亞細亞主義的敵視西方、日本中心觀受到強化，並具體呈現在田中一二等人所採取，包括攻擊公學校漢文科及白話文運動等之右翼行動上。¹

¹ 外部武力危機促使民族主義認同強化的情形並不罕見，就晚近例子而言，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後，認同自身為臺灣民族主義者的大幅增加。吳乃德，〈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收入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主編，《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頁93-128；

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對臺灣人而言也是一種衝擊。儘管過去有關新舊文化、白話文、古典漢文之區隔仍存在於各報，但是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壓力促使臺灣人的對話對象逐漸轉為對日本人為主，因此在《昭和》、《新民報》，乃至於《南瀛》、《新高》上殘存的左翼聲音，皆呈現出類似的特色。他們都未接受日本中心思想，雖然與日人一樣，認為大亞細亞主義指的是對外應「共榮共存」，對內應「一視同仁」，但在缺乏對日本精神的信仰下，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其得出的結論，乃是只有對內、對外都本乎平等、尊重的方式來往，才能實現亞洲團結。具體而言，對外應採「友聯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應實現自治制、廢除差別待遇等。缺乏對日本精神的信仰，也使得臺灣人眼中，貫穿著大亞細亞主義的核心思想，改為了漢文、漢學，而只有知悉漢文、漢學的臺灣人為中介，才能事實上疏通日中感情。

這種情形，當然不只存在於報紙上的討論而已。1934年5月25、30日，臺灣社會運動的核心人物林獻堂，分別向竹下豐次（1887-1978）知事、平塚廣義（1875-1948）長官告知臺灣人若欲向南支南洋發展，非透過漢文不可；² 1934年8月，堪稱「御用紳士」代表之辜顯榮，在獲選為貴族院議員後，接受《昭和》記者訪問，表示臺灣統治必須注意臺灣的特殊事情，例如在此須向南支南洋滿洲發展之時，所謂漢文不必要之說乃是錯誤的。³ 林、辜兩人的發言，代表的不只是在危機下的臺灣人，無論原先立場為何，竟然共同產生了必須捍衛自身文化的自衛反應，更顯示出日本人與臺灣人思考上的差異，遠較過去鮮明。當「內臺融和」的理想面對「內臺不融和」的現實，影響所及便是大亞細亞實現的可能性。對此，1933年11月《昭和》日文欄所下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其篇幅雖然較長，惟其貼切指明大亞細亞主義運動在臺灣推行的問題，茲引用如下：

既然期以磐石之日本作為東洋的盟主，期世界的日本有進出的飛躍，無論如何九千萬全國民同胞須協力融和，還原成真正的日本人，徹底實現七生報國之犧牲的日本精神，以之為絕對的前提，必須全部都打成一團，此即吾人所確信。

從此見地來看現實的我臺灣時，果實在名實上皆融合歸一至完全的母國延長了嗎？真正的所謂日本魂，已得以在臺灣的天地躍動其生命了嗎？從武

另外，雖然本文無意在理論上深入適用「怨恨」（ressentiment）概念探討在臺日人的心理，但此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切入視角。如汪宏倫的解釋，怨恨源自「一是個體或群體之間在『理論（理想）上』的『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一是兩者在『實際上』的不平等，亦即理想與現實之間存有難以彌補的落差」，汪並以此理論分別討論了臺灣在被國際孤立的「怨恨」下之社會情狀，以及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者「怨恨」心態的產生原因與其造成價值扭曲的情形。就在臺日人的情形而言，似乎可以假設其應有的「南進」、「國防」重要性與實際的被「遺誤」狀態有所落差，另一個將與本文第六章的討論有關之「怨恨」心態，是來自於其身為理想上的統治者、殖民者，與現實的經濟競爭卻敗於臺灣人的差距，兩種「怨恨」，促使其他們欣然接受軍部的說詞，更採取各種鼓吹日本精神偉大性，迫使臺灣人更加愛國、同化的行動。汪宏倫，〈怨恨的共同體，臺灣〉，《思想》1（2006年3月），頁17-47；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臺灣社會學》19（2010年9月），頁147-202。

² 《灌園先生日記》，1934年5月25日、5月30日

³ 〈關係者と語る 辜顯榮翁の巻〉，《昭和》，1934年8月11日，第3版。

官總督的同化政策到初代〔文官〕田總督時代的內地延長政策，之後又出現內臺融和的說法，此本島人政策不過在字句上改變，其意義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然這裡的問題，是統治上究竟取得何種成績，若要吾人率直言之，就是牛步遲遲，甚至在近年更成了深刻的溝渠，陷入無計可施的狀態。

本該年年歲歲產生好結果的內臺融和，卻年年歲歲不能達到其目的，正在化成〔只剩下〕物質文明的臺灣，乃是本島統治上的重大問題，也是為政者須大大考慮之問題。是內地人輕視本島人嗎？還是本島人抱著民族角度看待內地人呢？又或是當局的指導鞭撻未得宜敷？有關此點的批判研究先待後日。但是除了一部分的有識者階級以外，大部分的本島人都未被融和，時而懷有反感之事，乃是事實上的問題。於斯時，欲將內治附於等閒而走外治，有心官民仍要一考之。

未得內治而欲行外政，有類緣木求魚，東亞聯盟也好，亞細亞主義也好，這些於一部分內臺有識者之間提倡研究之事，雖然不認為有刻意論難之必要，但在現下的本島民情，向多數大眾呼籲乃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此即吾人所痛感者。⁴

《昭和》日文欄雖由日人擔任主筆，同意大亞細亞主義必須依據「日本精神」，卻又處在御用紳士經營下，夾在日、臺人間，親身面對雙方「深刻的溝渠」，遂不禁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提倡，產生「未得內治而欲行外政，有類緣木求魚」之嘆。

不過，現實上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並沒有因《昭和》的建議而暫緩，就在此思考分裂的背景下，懷抱著各自立場的人們又會有何行動？詳言之，在對外層面上，軍部基於其強硬南進觀會有何種舉動？總督府又如何因應？在這南進過程中，根本上對大亞細亞主義認識不同的日、臺人，又各自有什麼行動？

在對內層面上，雙方思考的阻隔之深，就連御用紳士、傳統文人的立場都與日人相左，大亞細亞主義面對「內臺融和」的問題，在此對立上則更有總督府的存在，彼此又該如何實現其理想呢？從後見之明來看，最終為何會以漢文欄的廢除與皇民化的推行，也就是臺灣人的失敗告終呢？

巧妙的是，在對外層面上最好的案例，就是由辜顯榮任顧問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在對內層面上，則又與林獻堂任顧問的東亞共榮協會有關。

⁴ 〈亞細亞主義と我が臺灣〉，《昭和》，1933年11月4日，第1版。

第五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南進：以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

如前章所述，在臺灣的日、臺人間，對於應如何向外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並未擁有一致的看法，這些思考上的差異，如何呈現在行動上？另一方面，當臺灣軍口中不斷強調臺灣的南進、國防地位時，他們的手腕也未曾停歇。本章討論的主軸，就是透過 1934 年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而後獨立並改稱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前後的國際情勢，以及成立之後的活動，考察在南進的問題上，臺灣軍如何積極實現基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南進？總督府如何應對？以及協會中的臺灣人又有什麼行動？

第一節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之背景

一、邁向昭和南進：1932 年原口竹次郎（1882-1951）筆禍事件

日本取得臺灣以來，「南進」問題就一直與臺灣統治息息相關。所謂「南進」，是指從日本向南方地域發展，最直接的地區之一是沖繩、臺灣以東的中國華南各省，另一則是從臺灣南下，由西至東分別向中南半島上之大陸東南亞、菲律賓及印尼群島等組成之海洋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一帶，也就是當時通稱的「南支南洋」。當然，實際也可能因主事者的想法而擴大或縮小，例如 1920 年臺灣銀行調查課出版的《支那及南洋貿易要覽》，南支是指揚子江流域一帶及其以南、香港，南洋則包括法屬印度支那、英屬海峽殖民地、英屬印度、暹羅、荷屬東印度、菲律賓。¹1935 年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出版的《臺灣與南支南洋》一書，「南支」是指福建、廣東、廣西、香港、澳門等地，而無雲南，「南洋」則包括大陸東南亞、海洋東南亞，但無英屬印度的緬甸，亦無西南太平洋的諸島。²

總督府希望透過臺灣向南支南洋發展的想法，自領臺初期早已存在。第二代總督桂太郎（1896 年 6 月至 10 月在任）曾表示「臺灣的地勢不只是對南清，更居進一步向南方群島伸張羽翼之適宜地位」，「將來以臺灣為根據地向南洋伸張政事、商事之勢力，也當然不是難事」。³ 根據中村孝志的分期，總督府的「南方關

¹ 臺灣銀行調查課，《支那及南洋貿易要覽》（臺北：臺灣銀行調查課，1920）。

²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2004 年 12 月），頁 150-158。

³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 79-80。

與」⁴大致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為 1895 年至 1914 年的搖籃期，主要從事華南的文化工作與貿易擴張計劃；第二期為 1914 年至 1923 年的「大正南進」期，此時對內臺灣統治已漸上軌道，對外又有一戰爆發帶來的好景氣，於是積極展開對華南、南洋的研究調查；第三期則是 1924 年至 1936 年的沉滯期，因關東大震災、金融蕭條而使南進消極化；第四期則是 1937 年至 1945 年，與日本對外戰爭結合之南進。⁵

對照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施設費，同樣也是自 1914 年的 70,000 円，占歲出額比率約 0.14%，大幅增長至 1924 年的 900,000 円，占歲出額比率 1.04%。1925 年面臨第一次削減，1930 年第二次削減，至 1931 年最低為 567,669 円，占歲出額比率 0.57%，其後僅略為增加，至 1935 年為止都維持 582,862 円，比率大致維持在 0.4%至 0.6%間。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大正南進」期，總督府積極展開對南支南洋的政策。1915 年 1 月，民政長官內田嘉吉（1866-1933）糾合有志官僚、企業家，以調查研究南洋事情為目的，共同創設南洋協會，內田並擔任副會長，之後因田健治郎於 1919 年先後獲選為協會會長、臺灣總督，使得南洋協會長期與總督府保持緊密關係。其他具體措施則包括在事業上推動創立華南銀行，對企業及學校、醫院、報紙等文化事業進行補助等。在教育上，配合高等教育機關的增設，在醫學專門學校內增設熱帶醫學專攻科，在高等商業、農林學校內從事南進人才的培育。行政上，除了既有負責管轄南支南洋施設費的外事課外，1918 年新設調查課，從事南支南洋調查。1924 年後，雖然因關東大震災而使得經費削減，外事課也被降格為文書課外事科，但調查課主導的對南支南洋研究調查仍持續進行著。⁷

由總督府實行之「大正南進」，相較於華麗誇大的南進政策，呈現出偏重金融、產業等務實之經濟調查的特徵，可說是往後南進的基礎作業。⁸然而，進入昭和期，當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與西方對立的態勢逐漸形成，號召日本人應致力以日本精神領導、解放亞洲的大亞細亞主義喧囂塵上之時，「南進」自然面臨改變。正如矢野暢所言，「昭和的時代所需要的是驅使國民總體關心南方，擁有如此動員力的思想」，當然也須有「某種的浪漫性」。「大正南進」與「昭和南進」的差

⁴ 所謂「關與」（関与）一詞，有關聯、關係、參與等意，套用鍾淑敏的說明，「南方關與」約略等於與南方交涉之關係，由於此關係史包括和平經貿關係時期，也有軍事侵略時期，而難以中性辭彙概論之。本文遂循鍾淑敏的用法，繼續沿用該日文辭彙。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頁 151。

⁵ 中村孝志，〈台湾と「南支・南洋」〉，收入氏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頁 5-6。

⁶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71-72。

⁷ 關於臺灣與「大正南進」關係之歷來研究早已汗牛充棟。這裡主要參考中村孝志，〈台湾と「南支・南洋」〉，頁 1-32；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頁 149-194；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63-76；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頁 78-82；九末亮一，〈「華南銀行」の創設——台湾銀行の南進における「大華僑銀行」案の形成と結実：1912-1919〉，《アジア経済》51：7（2010 年 7 月），頁 25-45；王麒銘，〈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⁸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頁 82。

別，乃是「大正期的『南進論』不是具有魅力的、偉大的個人之思想，而是匿名集團的思想、機構的思想。在此點上，昭和期所必要的，難道不是為了大眾動員的一匹狼式的思想嗎？」⁹換句話說，比起務實的研究調查，豪情壯志的理想、言行反而更受青睞。

在此「大正南進」轉向「昭和南進」的過程中，具象徵性意義的是 1932 年原口竹次郎筆禍事件。原口竹次郎出身佐賀，早年生平幾乎圍繞在其青年時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上，1905 年自早稻田大學文學科宗教哲學專攻畢業後，前往美國哈特福神學校（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1913 年返國後任職早稻田大學哲學科，直到 1917 年因早稻田騷動而離職為止。恰好此時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有意推動南進，外語能力優秀的原口遂於 1919 年受邀來臺任職，負責主導成立不久的調查課，他因此從宗教哲學者搖身一變成南支南洋專門家。除了自行至南洋考察、發表論文外，原口用力最深的就是調查課的整備，在他的努力下，調查課採用了來自臺北高商等各界的專業人才，並出版《南支及南洋情報》、《南洋年鑑》等刊物。另外，1925 年出任總督府統計官，負責推動國勢調查。至 1935 年辭職回國為止，原口毫無疑問地是推動總督府大正南進政策之核心人物。¹⁰

1932 年 6 月，原口前往日本國內視察，7 月 26 日歸臺。28 日，《臺日》刊登其視察感想「滿洲如累贅，失去熱情的日本」（滿洲を持て餘し 熱を失つた日本）一文，文中引述《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拜亞斯（Hugh Byas，1875-1945）的說法，認為日本雖將滿洲視為解決人口、食糧、產業問題之生命線，實際上卻因集團移民的困難及滿洲煤礦的低劣，而欠缺重大的價值；接著，表示不只滿洲與日本國內的產業間存在衝突，為了討伐匪賊又必須支出龐大的金錢，與國內農村救濟問題對立；最後，批評日本大眾似乎已對滿洲問題失去了熱情，此時應更努力研究滿洲的真實，而不可單讓對外強硬的感情尖銳化。¹¹

此報導立刻引起臺灣軍司令官阿部信行（1875-1953）的不滿，翌（29）日，《臺日》刊登阿部看法，表示日本絕不能放棄滿洲，匪賊掃蕩就如臺灣的土匪掃蕩一樣，是不得不為的工作，當此舉國一致之際，絕不可直接同意拜亞斯之說，或自視為先覺者，發表一些小聰明的議論。¹² 8 月 2 日，原口發表談話，說明其引述拜亞斯的原意只是單純舉他人意見為例，希望國民能充分注意滿洲問題，在經濟、國防上慎重地研究調查滿洲而已，對於發言遭到誤解感到遺憾。¹³

不過，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地解決。7 月 29 日，鄉軍臺北聯合分會舉辦滿蒙問題演講會，席上鄉軍城西分會長林治人及臺灣軍囑託、預備役中佐橋本喜和

⁹ 矢野暢，〈大正期「南進論」の特質〉，《東南アジア研究》16：1（1978 年 6 月），頁 31。

¹⁰ 有關原口的生平，詳細可參考後藤乾一，《原口竹次郎の生涯》（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7）。

¹¹ 〈滿洲を持て餘し 熱を失つた日本〉，《臺日》，1932 年 7 月 28 日，夕刊第 1 版

¹² 〈舉國一致して滿洲のを導きたい 異説を唱へるのは禁物〉，《臺日》，1932 年 7 月 29 日，第 2 版。

¹³ 〈對滿洲の認識と 慎重調査を希望〉，《臺日》，1932 年 8 月 2 日，夕刊第 1 版。

人攻擊原口。據週刊紙載稱，會上將原口「當成xxx〔非國民？〕痛罵，很難不推想同氏〔原口〕的放言如何造成普遍性的激動」，¹⁴聽眾也連呼原口簡直是「非國民」、「支那人」、「xx〔中國？〕政府的官吏」。¹⁵ 8月1日，鄉軍臺北聯合分會召開評議員緊急總會，批評原口發表了官吏不應有的不謹慎言論，違犯服務規律，打算通過相當嚴厲的決議文；但在分會長、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長堀內次雄（1873-1955）慰撫下，只作成「表達遺憾之意」的決議。¹⁶ 顯然的，總督府已意識到公眾對原口的批評，可能會影響到總督府自身的威信；¹⁷遂透過堀內安撫鄉軍，企圖阻止事件擴大，至於原口本人則奔走軍部等各方面尋求諒解。¹⁸

總督府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伴隨著鄉軍的活動，在臺日人也紛紛展開攻擊。據傳「某若竹町邊的住人」，打算召開彈劾原口的政論演說會，已經做好寫著「原口統計官作為官吏的資格」之類語句的看板，但在警察的命令下未有活動。¹⁹不過，總督府雖然壓下實體活動，卻無法完全杜絕言論界的非難。《經世》認為原口之所以能長期擔任調查課長，大概是因其個人的研究能力，但觀察其實際表現卻非如此，總督府的處置值得大眾留意。²⁰《南瀛》的批評雖向著《臺日》，實際上也掃到總督府，認為不只報導標題本身已是「非國民」，內容亦直接引用排日之外國人的說法，錯誤地妄斷實情，應負相當的責任，而「xxx〔總督府〕若今後也要擁護如此草率的新聞，正該稱之為同罪」。²¹

非難原口最多者為《南日本》，其引述民間激進人士的看法，指責原口已中美國思想之毒，應予以開除，並認為在舉國一致排斥國際聯盟干涉，協助滿洲國建國，以保障東洋和平、維護權益之時，此種表面的悲觀之說毫無聆聽的必要，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的日本亦不可能有餘裕認為滿洲是「累贅」。²²接著，逐漸轉為對原口的人身攻擊，指責原口長年留學美國，使他無條件崇拜美國文明，強調原口不應發表阿諛美國的說法，而是應率先利用與美國的關係，促使美國反省，理解日本的立場與精神。²³雖然曾在美國親身遭遇排日運動的原口，不見得完全親美，²⁴原口也自認在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就是強硬論者，²⁵但是在輿論眼中，當下只有完全擁護日本建設滿洲國一途，任何同意西方國家的見解或對聯盟表示妥協之言論，皆不容存在。

¹⁴ 〈聞捨てならぬ○○の舌禍事件〉，《南日本》，1932年8月5日，第2版。

¹⁵ 〈原口統計官の一石 國民の血は躍る〉，《昭和》，1932年8月6日，第8版。

¹⁶ 〈原口問題〉，《經世》，1932年8月7日，第2版。

¹⁷ 如《經世》所稱，面對各方憤慨，督府內部有著「現在應該還有辦法才是」的想法。〈納まり如何 例の原口事件〉，《經世》，1932年8月14日，第3版。

¹⁸ 〈原口統計官の一石 國民の血は躍る〉，《昭和》，1932年8月6日，第8版。

¹⁹ 〈原口統計官の一石 國民の血は躍る〉，《昭和》，1932年8月6日，第8版。按此人可能是居住在若竹町一之二的右翼運動家山下好太郎。

²⁰ 〈原口統計官筆禍問題〉，《經世》，1932年8月7日，第8版。

²¹ 〈他意無しとするも 臺日紙も臺日紙だ〉，《南瀛》，1932年8月6日，第2版。

²² 〈聞捨てならぬ○○の舌禍事件〉，《南日本》，1932年8月5日，第2版。

²³ 〈舌禍事件の主人公〉，《南日本》，1932年8月12日，第9版。

²⁴ 其實，在原口早年有關國際關係著作中，經常透露出白、黃人種的對立觀。後藤乾一，《原口竹次郎の生涯》，頁61-66。

²⁵ 〈無絃琴〉，《臺日》，1932年8月2日，夕刊第1版。

在臺日人為何有如此激烈的反應，可以從《昭和》的指責看出端倪。其批評原口應清楚九一八事變後，臺灣人普遍對日本政策感到不滿，甚至將兵器捐獻視為侵略祖國的資金；原口引用西方對日宣傳之舉，「在動輒就會造成民族性騷動之臺灣，如此言動是有百害而無一利」。²⁶正如前章所示，在臺日人，尤其是《昭和》，相當清楚臺灣日、臺人的不合，而更要求原口應謹言慎行，絕不可對日本的作為表達批評，以免引起臺灣人起而效尤。

或許因軍部無意與總督府決裂，也或許是迫於總督府的壓力，此一事件沒有延燒很久，到了 9 月以後各週刊已不再刊登攻擊。9 月底，曾在演講中批評原口的軍司令部青年訓練囑託橋本喜和和中佐，²⁷被任命為總督府囑託以協助青年訓練。²⁸ 10 月，原口兼任總動員關係軍機文書處理主任官。²⁹似乎顯示總督府與軍部間已重歸於好，遂得以互相託付重任。然而，此一事件象徵著在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面前，冷靜、務實的調查也必須迎合大眾對外強硬的激情，以及大眾背後的軍部勢力。

二、松井石根之思想與大亞細亞協會之成立

如前章所述，原口筆禍事件後，橋本喜和人於 1932 年 8 月編纂《滿蒙問題的再認識與國民的覺悟》，強調輿論統一的重要。全書收錄五篇文章，分別是「滿洲事變為滿蒙問題解決之序曲」、「我等使命之遂行與輿論之力」、「事變的多發性與此次事變的重要性」、「支那對滿蒙的攪亂策」、「防備白禍」，內容主要在強調日本的軍事行動係為確保生存權、維護東洋和平而為，尤其是最後一篇，從人種衝突的角度出發，先描述歷史上俄、美及西歐諸國對亞洲的侵略，再說明中國、土耳其、暹羅、波斯等亞洲殘存的獨立國之現狀，結論認為亞洲國家中僅日本具獨立之實，因此各民族「宜捨小異而就大同，以亞洲盟主之帝國為中心團結以對抗白禍」，日本也要把握機會，助長日俄戰爭後各民族產生的民族意識。³⁰

該書可說是第一本由臺灣軍相關人士所編纂，向大眾宣傳大亞細亞主義之冊子。橋本的活動並不僅止於此，1932 年 6 月，橋本聯絡臺北市預備役的陸海軍將校，10 月正式成立「臺北在鄉將校會」，厚東禎造（1873-?）少將為會長，橋本為副會長，設立趣意書強調日本是「東洋永遠的和平與文化之指導者」，而鑑於臺灣作為「皇國西南之鎖鑰，國防國策第一線之特殊性」，臺灣的在鄉將校更要有一層之覺悟。³¹橋本於 1933 年返回日本後，³²將校會仍繼續運作，除兵器、

²⁶ 〈原口統計官の一石 國民の血は躍る〉，《昭和》，1932 年 8 月 6 日，第 8 版。

²⁷ 〈台灣軍將校同相当官高等文官職員表（昭和 7 年 8 月 10 日現在）〉，《台灣軍將校同相当官高等文官職員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13071017300。

²⁸ 〈橋本中佐督府囑託となる〉，《臺日》，1932 年 10 月 7 日，夕刊第 2 版。

²⁹ 〈督府辭令〉，《臺日》，1932 年 10 月 6 日，第 2 版。

³⁰ 橋本喜和人〈白禍を備へよ〉《滿蒙問題の再認識と國民の覺悟》（臺北：橋本喜和人，1932），頁 1-26。

³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 1355-1356。

³² 〈橋本喜和人中佐十五日離臺〉，《臺日》，1933 年 12 月 14 日，第 2 版。

兵營的觀摩教學等直接與軍事有關的活動外，³³並舉辦演講會，內容不僅關於軍事，更涉及國內政治情勢、外交情勢等。例如 1933 年 5 月的總會，由憲兵隊長沼川佐吉（1886-1972）演講「國家改造運動之趨勢」，述及國內右翼運動的思想、右翼團體與五一五事件的關係，以及在鄉軍人應有的覺悟；³⁴1934 年 11 月的軍事演講會，則分別有桑木崇明軍參謀長的「關於時局與國防」，以及海軍武官酒井武雄的「關於最近的支那事情」。³⁵

正如警務局編纂之《臺灣社會運動史》所云，將校會的目的不只限於軍事知識的涵養，對政治、經濟、社會等諸事情亦抱有深刻關心。³⁶透過各種演講會的舉辦，將校會成了現役的臺灣軍軍官向在鄉軍人傳遞其觀點的管道之一。不過，由於將校會的活動都是針對成員為主，影響相對侷限。等到松井石根上任後，乃進一步組織臺灣軍的看法，並將之付諸於更具普遍性的行動。

松井石根為陸軍內部的「支那通」，1931、1932 年間參與日內瓦裁軍會議時，受到席上中日兩國對立刺激，在回國後開始提倡亞細亞聯盟，1933 年 3 月成立「大亞細亞協會」。對於「亞細亞聯盟」的意義，松井在同年 4 月出版的《亞細亞聯盟論》一書中，認為從歐洲視角出發的國際聯盟不可能真正理解亞洲事務，因而亞洲國家有必要形成聯盟解決亞洲問題，甚至進而向外解決亞洲共通之有色人種差別待遇、移民限制等問題，促成真正的國際協調。而此亞細亞聯盟的核心就是日中兩國，如其所言，「除去日支兩國則亞細亞聯盟亦不存」，而「日支兩國應將過去一切的行為舉止，以盡可能快速地，且不交由他人的方式，促膝將之清算，以亞細亞的自主自強之大著眼提攜，自己成為核心促進亞細亞的團結」。³⁷

松井口中的日中親善，不單只是如此而已。1933 年 5 月，其在協會機關刊物《大亞細亞主義》創刊號發表〈拯救支那之途〉，將中國現在的「亡狀」，視為實現大亞細亞主義最大的障礙，而造成此狀態的，就是當下以蔣中正（1887-1975）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他攻擊國民政府引入英美勢力，又因無能而使共產勢力增強，犯了「誘引安格魯薩克遜勢力與東亞赤化的罪責」。不只如此，松井更指責國民黨在思想上也背棄了三民主義，以英美式的民主主義（デモクラシイ）取代民權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取代民生主義。松井強調，解救中國的方法，只有恢復中國民族精神最淵源之「王道」，本乎王道的大亞細亞主義推動日中提攜，結論表示：

要之，拯救支那的大業，在於國民黨現政權之清算、三民主義之純化、王道大亞細亞主義之復活，除了支那的志士仁人的有關努力外，還必須由我日本伸出溫暖的協力與支援之手開始。內政不干涉？王道滿洲的建國，難道不是以皇國日本的道義力、組織力、秩序力之協力，結果不就是道義的

³³ 〈在鄉將校會の本年度事業〉，《臺日》，1933 年 5 月 27 日，第 7 版。

³⁴ 〈臺北在鄉將校會の總會〉，《臺日》，1933 年 5 月 26 日，夕刊第 2 版。

³⁵ 〈二十三日偕行社で 軍事講演會〉，《臺日》，1934 年 11 月 22 日，夕刊第 2 版。

³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56。

³⁷ 松井石根，《亞細亞聯盟論》（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3 年），頁 9、14。

干涉嗎？皇道的世界宣布，其意乃是透過皇道精神的積極運作以重建世界。更何況協助處在混沌與亂離之極的善鄰之再建呢？關於王道支那再建之思想及政治工作，以及在皇道之同儕、王道國家之支那本土的新建設。與中國的志士仁人一同，日本的志士仁人應向中國施予者，實存在此。³⁸

也就是說，松井心目中的日中親善，就是依照皇道精神，推翻依附歐美、放任共產黨的蔣中正政權，才能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為了達成此理想，就算干涉內政也在所不惜。正如松浦正孝的研究所示，在此理想的背後還包含重整帝國經濟的構想。松井認為本應互相提攜的中日兩國因滿洲國問題而水火不容，解決之道乃是日本此時應將眼光從滿洲國、華北放大至華南、南洋，將滿洲及日本帝國的物資，透過臺灣籍民、華僑、印度商人的網絡，與更大的華南、南洋連結，促成全亞洲普遍的繁榮。如松井在東京裁判時所辯護：「日本民族所望者，是透過亞細亞諸民族的提攜，各民族將可自由移住東洋各地，且互通有無，與其先住民一同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在物質上有更豐富的生活，即是欲營更良好之生活。」³⁹

基於松井的理想，協會成立之同時，協會成員、駐廣東武官和知鷹二（1893-1978）以廣東的粵南國民黨、華僑、留日學生為主體，籌備大亞細亞協會。⁴⁰1933年6月，廣東大亞細亞協會開始活動，分別向日本、滿洲國發表聲明書，主張日中提攜、支持滿洲國獨立，期待日、滿等亞洲各國速起從事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打倒外國之赤白帝國主義」。⁴¹該協會口號中如「實現明治天皇大亞細亞同盟」、「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滿洲獨立國成功萬歲」等等，亦呈現出其親日滿、反蔣的性質。⁴²不過，由於廣東當局之嚴格取締，該協會只能秘密活動，日本出版的相關雜誌也無法輸入當地。⁴³

1933年8月，抱著皇道精神及反蔣觀的松井接任臺灣軍司令官。對他而言，在大亞細亞主義實現的過程中，臺灣具有何種地位？從神戶乘船出發前往臺灣前，他向記者表示臺灣軍、政皆有「退縮」（退嬰）之氣象，「忘記了〔自己是〕『向南方之第一線』這件事，什麼事情都光是看著背後而做。以滿洲事變為契機，問題已漸漸向南方移轉的今日，如此作法將行不通，美國的南支進出代表著什麼呢？我們也必須積極地，不是向後而是向前邁進」。⁴⁴顯然的，在松井眼中，臺灣軍、政都須一番改革，而向南方進出一事尤其重要。隨著他上任的時間越久，改革的

³⁸ 松井石根，〈支那を救ふの途〉，《大亞細亞主義》1：創刊號（1933年5月），頁6-10。

³⁹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563-567。

⁴⁰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286-287。

⁴¹ 〈廣東大亞細亞協會向日本寄聲明書〉，《大同報》，1933年6月29日，第2版；〈大亞細亞聯盟之結成 可遏歐美之東進〉，《大同報》，1933年7月10日，第3版。另按，此《大同報》為滿洲國政府之機關紙。

⁴² 十條口號如下：一、實施孫文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二、廢除國際間一切不平等條約；三、滿洲新民族努力奮鬥成功；四、華、日、滿三國共榮共存；五、大亞細亞諸國民族復興；六、亞洲民族一致聯合團結起來；七、打倒赤、白色帝國主義者；八、實現明治天皇大亞細亞同盟；九、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十、滿洲獨立國成功萬歲。〈廣東大亞細亞協會告新國民眾書〉，《大同報》，1933年7月12日，第2版。

⁴³ 〈廣東で彈壓される 大アジア主義運動〉，《臺日》，1933年7月1日，夕刊第2版。

⁴⁴ 〈臺灣は軍政ともに 退嬰的ではないか〉，《臺日》，1933年8月18日，第7版。

內涵也越明確。

如前章所述，1933 年 11 月，松井表示為了「宣布皇道於四海，恢弘天業於八紘」，日本國民必須自覺、理解皇道精神，並期待全島同胞和衷一致。⁴⁵1934 年的新年詞中，松井表示為了實現亞洲的幸福、世界和平，他相信國民只有堅持皇道，「在內舉天皇統治之實，向外講求皇道宣布之途」。他也提到正在中國發生的閩變，認為臺灣在住者會寄予關心係屬當然。此時須努力者，乃是日臺人一致團結、整頓陣容，迅速實行「國防義會」、「亞細亞文化運動」等活動。⁴⁶其中不只再次指出皇道對內、對外的意義，以及日臺人的團結，還具體提及了相關活動。

到了 1934 年 6 月始政紀念日時，上任已近一年的松井所發表的感言，明顯具有回顧性質。該文首先指出日本的臺灣統治雖然有不凡的成就，但都限於物質文明的範圍，忽略精神方面的建設，當務之急就是實行時局教化，幸好同年春天已舉行全島社會教化協議會，確立了教化的根本方針與時局教化的對策，準備開始有統制的教化總動員，他希望此一事業能永續進行。

接著，強調臺灣在南進上，尤其是聯絡西南亞洲的重要性：

在本島在住的人們，現在正宜注目於南方，回顧祖先雄飛的歷史，仔細鍊磨圖南的長計，對內大大地喚起國論，對外自行積極進出，以救濟解放西南亞細亞民族為志。進而言之，此正是助長本島經濟發展的同時，以南北呼應的物資交易，將使滿洲國設立的意義完善之理由。

最後，討論到臺灣的國防地位，以及臺灣人對國防事務的踴躍情形，指出臺灣南方接近西方國家之勢力範圍，又易受華南情勢影響，必須確保國防完備，1934 年 6 月舉辦的特種演習，必能使全島民眾理解國民國防。對於臺灣人自發捐獻的增加，松井亦感到欣慰，並希望能利用此情勢，廣泛養成臺灣人的愛國心，那麼「過去四十年的治績將在此畫上點睛之譽」。⁴⁷

綜合松井的各種發言，可知其欲達成的任務，首先是在臺灣促成皇道精神的發揚，具體而言，就是提升臺灣人的國防、愛國觀念，以及日臺人的團結。這不只是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臺灣乃是面對中國、歐美勢力之國防第一線，但仍存在許多缺乏「精神方面的建設」之異民族，因而有必要格外積極地灌輸愛國、國防觀念，更是因大亞細亞主義的向外擴張，亦即「皇道的向外宣布」，也必須「在內舉天皇統治之實」，形成日臺人一致向外才會成功。

依循著這個目的，上述發言中提及的一連串相關活動，第一個是 1933 年 11 月開始籌辦，隔年 2 月 21 日紀元節成立的「國防義會」。國防義會出現的過程，據報是總督親自提出，總務長官特地為此召開內務部長會議，會上異例地有軍參謀長大塚堅之助（1882-1962）列席。⁴⁸國防義會的目的，乃是國家觀念的涵養、

⁴⁵ 松井石根，〈現下時局の検討と國民精神の作興〉，《大亞細亞主義》1：8（1933 年 12 月），頁 23-26。

⁴⁶ 〈昭和九年を迎ふ〉，《南日本》，1934 年 1 月 1 日，第 4 版。

⁴⁷ 〈始政四十年所感〉，《南日本》，1934 年 6 月 17 日，第 3 版。

⁴⁸ 〈國防義會〉，《經世》，1933 年 11 月 26 日，第 2 版。

國防思想的普及、國防的研究，以及面對有事時的訓練。組織將在各州廳獨立設置，另在總督府設置聯盟本部，號稱要「網羅成人全部」。⁴⁹ 林獻堂在籌辦過程中，曾與總督中川健藏（1875-1944）、軍司令官松井見面詢問國防義會的組織，而直接地記下「其目的在涵養一般愛國之精神」。⁵⁰雖然表面的主導者是總督府，實則大塚參謀長亦為此與三好德三郎多次洽談。⁵¹

第二個，乃是 1934 年 3 月舉辦的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會上除了日本國內的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理事、總督府各級官員、社會教化關係者等出席外，亦有臺灣軍守備隊司令官外山豐造（1880-1937）、高級參謀土橋一次（1886-1954）、海軍武官井上保雄（1888-1981）出席。席上決定以「宣揚建國以來一貫之光輝的皇國之大精神，圖國民融合一致大力進展文化，以期建設皇道日本之一部的理想臺灣」為指導精神。⁵²

第三個，則是 1934 年 6 月在臺北、新竹舉辦的特種演習，此次演習不只軍方各部隊參與，總督府官公衙、壯丁團、青年團、學校，甚至民間企業等都派人參與防空演練，共有 59,838 人配屬至防空機關，演習出場人次多達 167,861 人，⁵³的確有助於全臺民眾理解國民國防。不過，雖然總督府大致配合軍部的作為，研究者仍指出，站在民政黨系總督的立場，想必都須提防在臺軍部直接干涉統治的傾向。⁵⁴ 1934 年 7 月松井離任前，突然向記者強調臺灣統治絕不可只對漢民族採取顧慮或取悅的政策，面對國際危局更不應實施自治制，足以證明軍部與總督府間的確存在一定隔閡。⁵⁵

與皇化臺灣人緊密相關的，就是松井在臺灣的第二個任務：鼓吹「亞細亞文化運動」。也就是以臺灣為基點，向外宣佈皇道及大亞細亞主義，當然也包括促成中國各地反對親英美的國民黨統治，此即有賴大亞細亞協會支部的組建。1933 年 9 月，大亞細亞協會的主張獲得大稻埕青年團長陳清波（1905-1944）、米穀組合理事林濟川（1893-?）等臺灣人的響應，10 月在松井軍司令官、沼川憲兵隊長的指導下，發布了「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趣意書。同時，松井也向府評議員郭廷俊（1882-1944）、華南銀行重役竹藤峰治（1882-?）說明協會趣旨，而後決定組織「大亞聯盟聯絡機關」，日人委員有《臺日》主筆大澤貞吉（1886-?）、高商教授佐藤佐等，臺人委員有陳清波等。11 月的第一次協商會，陳清波等決定合

⁴⁹ 〈成人全部を網羅して 臺灣を守る國防義會〉，《臺日》，1933 年 11 月 21 日，第 7 版

⁵⁰ 《灌園先生日記》，1933 年 11 月 22 日。

⁵¹ 謝國興等主編；陳進盛、曾齡儀、謝明如譯，《三好德三郎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5），卷 4/10，川岸侍從武官來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⁵² 〈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記事〉，《臺灣教育》381（1934 年 4 月），頁 91-103。

⁵³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昭和九年六月臺灣軍特種演習參加誌》（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5），目次後 3-5，頁 181-202，286-293。

⁵⁴ 駒込武著，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臺灣人的學校之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下冊，頁 597-598。

⁵⁵ 〈漢民族に對しては モット強氣に出よ〉，《大阪朝日新聞》，1934 年 7 月 21 日，臺灣版第 13 版。

流，於 1934 年 1 月正式成立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⁵⁶1935 年 1 月，其「名實與共獨立」改名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以下或以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稱之。⁵⁷

協會成立時的宣言，表示亞洲之復興繫於日本，贊同「以皇道精神之擴充徹底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之協會趣旨，並確信「皇道的大亞細亞主義之宣揚」，正所以能暢達新附皇民之民意，使內臺一和之實徹底，又接著是促進與西南亞細亞民族提攜之機緣」。⁵⁸

關於協會成立的目的，其中最活躍的成員佐藤佐做了一個恰當的說明：

「無法達成徹底的內臺融和，又算什麼大亞細亞主義？」的非難，是在鑑察本島的特殊性時，當然會出現的非難，吾人不吝以好感迎之。既如我等於大亞細亞協會的宣言中所述，「內臺一如」是我等的信條，雖然如此，徹底的內臺融和終究是比較的問題。對外宣布呼號大亞細亞主義，與追求內臺融和並無何等之矛盾。亦即此並非是相互先行之事，而是並行且相關者，故同樣參加在大亞細亞主義的標幟下，或將重點置於內臺融和，或將重點置於對外宣布，兩者都是有可能的，而我等的重點主要屬於後者，……〔下略〕。⁵⁹

也就是說，大亞細亞主義本身就可分為對內融和與對外宣布兩個層面，且兩者是「並行且相關」的，只不過協會將重點置於對外層面而已。這也連帶解釋了宣言中所謂以大亞細亞主義實現「內臺一和」及「與西南亞細亞民族提攜」之意義。無庸贅言，宣言前半部的「內臺一和」即是前述松井來臺的第一個任務，後半部的「與西南亞細亞民族提攜」就是第二個。有關前者的成功與否，留待下章再述，至於後者，亦即協會是否能實現宣言、松井屢屢提及之聯絡「西南亞細亞民族」，首先仍須觀察臺灣島內各界人士，在面臨協會成立前夕發生的閩變時究竟有何作為？

⁵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70。

⁵⁷ 〈大亞協會臺灣支部 獨立して一大飛躍〉，《臺日》，1935 年 1 月 8 日，第 7 版。

⁵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72-1373。

⁵⁹ 佐藤佐，〈內臺一如は我等の信條〉，《臺灣》39（1934 年 7 月），頁 37。

第二節 閩變前後臺灣軍、臺灣總督府、臺灣人之活動

一、對岸領事會議之籌備

1933 年 8 月 17 日，總督府向外務省提出請求，希望 9 月中旬左右邀集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廣東等華南各地領事，以及外務省相關官員，召開領事協商會議。¹ 領事協商會議，或稱為「對岸領事會議」、「南支領事會議」，最初係 1916 年，為了加強「大正南進」下總督府與華南領事間的事務交流而舉辦，討論事務包括警察、衛生、產業等。² 1917 年，總督府開始讓對岸領事兼任總督府事務官，10 月任命廈門領事與廣東總領事兼任總督府事務官，大致確立了該制度。其後 1920 年代，總督府於 1921 年後連續 4 年召開領事會議，³ 並透過兼職的領事處理中國排日及臺灣籍民保護等問題。當郭春秧為促進中日親善而建設孔聖大道會時，總督府也透過領事向郭氏交涉，說服郭氏向臺灣銀行捐出 30 萬圓充作資金。雖然此計畫最終並未成功，但可看出對岸領事在總督府南方政策中的重要性。⁴

1924 年之後，適逢關東大震災後的財政緊縮，南支南洋施設費遭到削減，總督府的「南方關與」陷入沉滯期，一直到 1933 年為止，領事會議皆未召開。此時再次召開之背景，就直接相關的中國局勢而言，乃是華南一帶的混亂。1932 年上海事變中與日本激烈交戰之中國第 19 路軍，於同年 5 月移駐福建剿共，中共亦隨之自漳州撤退。⁵ 然而 1933 年 7 月中共開始反擊，大舉入侵福建西部各縣，⁶ 如何因應曾與日本交戰而正駐紮福建的 19 路軍，以及謀求突破圍剿之中共，乃是總督府的當務之急。對於外務省而言，亦可藉此次會議疏通與各領事的聯絡，並趁機前往華南、長江一帶考察中國赤化的狀況。⁷ 不過，其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因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對外關係激化，向來高度關注華南問題的總督府有必要改善其對外設施以因應時勢，⁸ 也有必要整合領事等之意見，以面對積極對外的「昭和南進」。⁹

¹ 〈第 17 號〉，《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M-2-3-0-1_4，JACAR Ref.B15100143000。有關此次會議的詳細過程與背景，亦可見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79-92。

² 〈督府領事會議〉，《臺日》，1916 年 9 月 23 日，第 2 版。

³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79-92。

⁴ 王麒銘，〈越境をめぐる政治：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籍民政策の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7），頁 44-61。

⁵ 〈共產軍ノ廈門方面撤退ニ關スル件〉（1932 年 6 月 1 日），《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福建地方共匪關係（1932 年）》第 1 卷，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5-4_11_001，JACAR Ref.B02032013600。

⁶ 〈在廈門領事致外務大臣普通第 376 號〉（1933 年 8 月 21 日），《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福建地方共匪關係（1932 年）》第 3 卷，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5-4_11_003，JACAR Ref.B02032015500。

⁷ 〈高裁案〉（1933 年 8 月 24 日），《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4，JACAR Ref.B15100143000。

⁸ 〈督府の對外施設 面目を改めん〉，《臺日》，1933 年 9 月 20 日，第 2 版。

⁹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82。

領事會議最初敲定於 9 月 21 日舉行，¹⁰然而，8 月下旬由於中共攻下延平並進逼福州，¹¹直到 9 月中旬福州情勢才得以緩和，¹²於是總督府決定將領事會議延期至 1934 年 1、2 月。¹³同時，總督府也趁此機會事先統整島內各方意見，並在 12 月作成〈對岸領事打合會協議及依賴事項〉，整理如表 5-1：

表 5-1 對岸領事會議協議及依賴事項（1933 年 12 月）

提出單位	編號	事項
協議事項		
官房文書課	1	關於本府旅券規則第四條撤廢的可否，希望得知各方意見
	2	關於對岸各領事館本府及馬公要港部間暗號電信符號統一之件
	3	對於置籍本島之船舶頻遭中華民國官憲拿捕沒收的傾向，相關對策希望得知各方意見
	4	除了本府現在於對岸各地經營之事業外，從時局來看何種事業最為有效適切，希望得知各方意見
殖產局	5	本邦砂糖於中國的買賣狀況及將來預期如何，特別是有關嗜好、地盤及與對抗品之爪哇、香港糖的優劣，希望得知各地狀況
	6	關於中國茶商之渡臺取締之件
	7	臺灣米（蓬萊米及在來米）得向華南輸出之預期，以及其數量、將來需給關係如何
	8	關於本島籍民以對岸為根據之漁業之件
警務局	9	關於金條走私輸出之件
	10	關於偽造貨幣走私輸入之件
	11	關於博愛會醫院之件
	12	博愛會醫院醫師產婆養成部設置之件
專賣局	13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製造酒向華南擴張銷路之件
交通局	14	關於臺北放送局廣播之事項
高等法院	15	關於略符號之件
軍參謀部	16	關於政治經濟組織及其動向之事項
	17	關於華南各地臺灣人（分布）的景況及能否利用之價值判斷之事項
	18	關於航空的調查，以及釀成促進開設與臺灣的航空路之機運
	19	於其他有事時軍及領事應採處置及與軍的通信聯絡有關之事項
馬公要港部	20	關於南支警備

¹⁰ 〈第 18 號〉（1933 年 8 月 24 日），《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4，JACAR Ref.B15100143000。

¹¹ 〈ここ數日の間に 福州の運命決せん〉，《臺日》，1933 年 8 月 31 日，夕刊第 2 版。

¹² 〈第 281 號〉（1933 年 9 月 19 日），《支那各地共匪關係雜纂／福建地方共匪關係（1932 年）》第 3 卷，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5-4_11_003，JACAR Ref.B02032015700。

¹³ 〈臺灣總務長官致重光外務次官第 22 號〉（1933 年 9 月 2 日）、〈臺灣總務長官致外務省第 26 號〉（1933 年 10 月 14 日），《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4，JACAR Ref.B15100143000。

依賴事項		
交通局	21	航空相關情報依賴之件
高等法院	22	關於特高資料之件
	23	關於刑之執行囑託之件
	24	關於勾引狀形式之件
	25	關於事件移送之件
臺北州	26	關於所在搜查及犯人逮捕援助之件
軍參謀部	27	關於平時軍隊的編成配置、行動、教育、訓練及其能力判定的資料蒐集，以及其他給養補給衛生等之調查通報之事項
	28	關於社會組織及民間土匪的關係及其現狀調查通報之事項
	29	關於一般思想的動向，特別是共產主義思想的浸潤狀況調查之事項
	30	關於言論機關的調查，以及關於有事時利用其之調查之事項。
	31	關於有事時軍隊諜報適任者調查之事項
	32	關於各種兵要地誌資料蒐集之事項 (1) 關於各地重要資源的調查及資源的培養之件 (2) 貿易統計、倉庫業及物資儲藏之景況 (3) 農商工礦林水產等產業調查、工廠景況、生產及物資流動之調查 (4) 水陸交通通信之調查 (5) 關於地方衛生機關流行病風土病及其對策之事項 (6) 其他兵要地誌資料
	33	關於列國勢力的侵入及外人的暗躍調查之事項
大阪商船	34	廣東倉庫棧橋前河床疏通之件
華南銀行	35	關於廣東支店固定貸出金回收依賴之件
臺灣銀行	36	關於福建省、廣東省政府借款關係的交涉及其他之件

資料來源：〈昭和八年 對岸領事打合會協議及依賴事項〉，《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4. 昭和八年度」，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M-2-3-0-1_4，JACAR Ref.B15100143000。

單就數量來看，在 20 項協議事項中，由軍部提出者有 5 項，若加上第 2 項之電信符號統一則有 6 項，占比 30%；至於 16 項希望向各領事提出的依賴事項中，軍部則提出了 7 項，約占 44%，可見軍部對南進之積極態度，尤其是數量眾多且面向廣泛的依賴事項，顯示出軍部欲透過領事全面增加對華南的理解，以求拓展其觸角。

就內容來看，總督府所提出的協議事項有部分項目係延續自「大正南進」時期的事業，例如自 1918 年以降在廈門等地設立的博愛會醫院，原係當時事業補助中獲得最多補助金之機構，¹⁴此時警務局提出的第 11 項協議事項，乃是希望討論中國時局變遷下未來醫院的經營方針，以及病舍改建問題，第 12 項則是希

¹⁴ 中村孝志，〈台灣と「南支・南洋」〉，頁 19

望培養中國人醫師產婆以長期維持經營。除了延續者外，其中第 4 項亦能看出總督府正概括尋求建議以突破既有的事業，進一步向華南拓展影響力。至於由各單位提出，與南進關聯的具體內容，則有砂糖（5）、米穀（7）、酒（13）的輸出等，從此來看，總督府似乎偏重經濟發展。就連第 14 項有關廣播的內容，也是針對如何有效寬慰在留日本人，而不涉及中國人。其餘事項則大多關於如何有效施行管制，諸如第 8 項係討論如何取締臺灣籍民為規避總督府法規而以對岸為根據之漁業、第 9 及 10 項討論取締走私等。

總督府提出的依賴事項中，與拓展南進較有關係者，為交通局提出的第 21 項，蓋因歐美列強企圖獲得華南航空路與制空權，為了確立對策，希望領事能夠調查可能建設機場之地點，以及中國、歐美在華南的航空路經營、飛行員訓練等航空事業的狀況。而高等法院提出的事項，都是本於臺灣統治的目的；其他民間企業提出者主要是基於自身經營所需而提出，希望領事就現有的棧橋建設（34）、借款回收（35），以及借款交涉、擔保權確保、保管現金之保護、排日暴動時之保護等概括的經營相關事項（36），提供必要協助。

相較於總督府，軍部尋求的南進顯然不只是經濟往來，還要積極影響政治情勢。在軍部的協議事項中，特別提及政治經濟組織及其動向（16）；同樣是航空路的調查，軍部提出的事項比交通局更明確提及要主動釀成開設航路之機運（18）。至於在依賴事項中，軍部則希望領事協助調查關於社會組織及民間土匪（28）、一般思想（29），其欲蒐集的兵要地誌資料已不限於純軍事用途，而包括綜合性的資源、貿易、產業等資料（32）。與影響政治息息相關者，就是軍部在協議、依賴事項都提及應調查言論機關與臺灣籍民現狀以便有事時得以利用，甚至充作諜報人員協助（16、30、31）。

軍部對臺灣籍民用途的關注，並非始於此時。1932 年 1 月 2 日，福州因日本軍人、領事，在反日宣傳大會上撕去排日海報而引起大規模的反日暴動。1 月 3 日，又發生領事館宿舍及東瀛學校遭放火，以及日本訓導水戶三雄及妻子遭刺殺的情事，此即福州水戶事件。事件最初被認為是中國排日分子所為，然而事後調查，始得知暗殺主謀者為臺灣籍民李燼己（1894-1943），而在學校放火者為其子李銑源（1918-1996）。據李燼己的自白，其係奉臺灣軍淺井敏夫（1898-1937）大尉之命，試圖透過暗殺日本人引起日軍介入，進而謀求在福建設立親日新政府。李氏之後雖被逮捕，但遭返回臺受審後又於 10 月釋放，隨後就前往滿洲。¹⁵根據臺灣軍司令官真崎甚三郎（1876-1956）的回憶，水戶事件後閩報前館長鎌田正威曾請求真崎協助自獄中救出李氏，至於事件本身，乃是「淺井以自己的獨斷企圖陰謀從事我完全不知道之事」。¹⁶

軍部上層或許未參與主導，而事件亦未引起國際騷動，但臺灣籍民的利用能力似乎已引起了軍部的注目。1932 年 11 月，參謀本部的大城戶三治（1891-1962）

¹⁵ 中村孝志，〈福州水戶事件について〉，《南方文化》9（1981 年 11 月），頁 207-233。

¹⁶ 伊藤隆等編，《真崎甚三郎日記》5（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昭和 17 年 2 月 8 日，頁 244-245。

中佐¹⁷以私人信件向廈門領事三浦義秋(1890-1953)請求對其即將來廈之親友、臺灣籍民謝龍闊(1897-1940)給予保護。謝氏曾以謝安正之名，出入東京軍部方面，宣傳福建獨立計畫，而獲得軍部相當之信用，¹⁸而謝氏在途經上海時曾表示此行目的是「受某方面之意，在廈門乃至華北方面有著某種謀策」。¹⁹

上述例子，顯示出九一八事變後，軍部已懂得運用臺灣籍民從事謀略，松井上任臺灣軍司令官後，這些活動更具有大亞細亞主義的意義。也就是說，未來軍部所欲實行者，不只是單純從事謀略而已，而是要本於大亞細亞主義的理念，積極與中國各地勢力聯絡，以向中國宣布「皇道」、鼓吹親日，並策動其採取反蔣、反英美的措施，而臺灣人在此間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臺灣軍森田春次少佐所言，「與支那特別有緣故的本島人諸氏，須認識日本精神，進而對支那宣傳日支提攜的有利處」。²⁰在軍部提出的事項中，第 17 項關於華南地區臺灣籍民現狀及有事時能否利用之調查，以及第 31 項關於有事時軍隊諜報適任者之調查，就與此目的有關。

另外，在第 33 項，軍部也特別希望調查列國勢力的侵入及外國人的私下活動。與此相關之背景，乃是 1933 年春以來出現的美國在華南之策動說，相關傳聞有飛機輸出、機場建設、鐵路建設等，其中以美國出售武器及漳龍鐵道（福建漳州至龍巖之鐵路）建設計畫最受日方注意。²¹1933 年 6 月後，日方獲悉美國領事與第 19 路軍有所往來，隨之出現美國將向福建出售飛機、協助防空，以獲取海空軍根據地，以及將投資漳龍鐵道、礦山的傳聞。²²雖然美方否認，但相關謠言仍層出不窮，尤其是漳龍鐵道的出資者李清泉係馬尼拉華僑，更引起日方懷疑。²³關注此建設者不只外務省，海軍、臺灣軍也密切注意美國的介入，²⁴直到 1933 年 11 月閩變爆發迫使計畫中止後，謠言才稍稍減少。

在此過程中，臺灣人亦扮演一定角色，當時旅居福州的林熊祥，為了蒐集情報，與第 19 路軍參謀蔡鳳禧接觸，²⁵而李清泉則透過蔡向林氏表示，若林氏提供

¹⁷ 原文作大木戶，應是大城戶之誤，時任參謀本部部員兼陸軍大學校兵學教官，陸軍省，《陸軍現役將校同相當官実役停年名簿 昭和 7 年 9 月 1 日調》（東京：偕行社，1932），頁 25。

¹⁸ 〈第 446 號〉（1932 年 11 月 1 日），《滿洲事變／排日、排貨關係／排日暴行關係》第 1 卷，2/1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1-1-0-21_5_4_001，JACAR Ref.B02030350700。

¹⁹ 〈第 1292 號〉（1932 年 11 月 6 日），《滿洲事變／排日、排貨關係／排日暴行關係》第 1 卷，2/14，JACAR Ref.B02030350700。

²⁰ 〈非常時講演〉，《經世》，1934 年 9 月 16 日，第 4 版。

²¹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第 2 卷（昭和八年對中國關係）》（東京：外務省，1998），頁 858-886。

²²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第 2 卷（昭和八年對中國關係）》，頁 865-869。

²³ 〈米國ノ福建ニ於ケル策動〉，《外国ノ对中国借款及投資關係雜件／米國ノ部／福建ニ於ケル米國ノ投資海軍根據地建設ノ活動關係》，分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E-1-6-0-X1_U1_5_001，JACAR Ref.B08061051700。

²⁴ 〈米國ノ福建ニ於ケル策動〉，《外国ノ对中国借款及投資關係雜件／米國ノ部／福建ニ於ケル米國ノ投資海軍根據地建設ノ活動關係》，分割 2，JACAR Ref.B08061051700；〈臺電 599 號〉（1933 年 6 月 26 日），《漳龍鐵道關係一件》，第 1 卷，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F-1-9-2-89_001，JACAR Ref.B10074728300。

²⁵ 〈機密第 357 號〉（1933 年 6 月 15 日），《外国ノ对中国借款及投資關係雜件／米國ノ部／福建ニ於ケル米國ノ投資海軍根據地建設ノ活動關係》，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

2、3 百萬之投資，並從臺灣派遣技師，便不需外國投資。²⁶另外，林熊祥之侄林鼎禮（1895-1973）恰好為福建省建設廳科長，且是建設籌備委員之一。²⁷從此亦可看出利用臺灣人聯絡對岸，排除西方勢力的可行性，海軍軍令部便據此認為既然林氏也有投資意向，「其投資必須以我國為背景」。²⁸

不過，雖然軍部汲汲希望能有效利用臺灣籍民，總督府仍然需要考量如何控管不法臺灣籍民。由各局處提出的第 8、9、10 等項，就是針對如何有效取締臺灣籍民的不法行動。文書課提出的第 4 項，有關撤廢護照（旅券）規則第四條，亦即是廢除臺灣人渡中應申請護照之規定，最能呈現總督府面對的矛盾。其理由認為護照雖是以取締不法臺灣籍民為目的，實際上僅能約束守法民眾，不法者仍可偷渡，該規定更被臺灣人視為差別待遇。而在此時局下，也有必要獎勵臺人向中國發展，故似可刪除此規定，而改採簡單之取締方法。由此可知，總督府雖然認識到了臺灣籍民在中日關係上能夠扮演的角色，但多少仍得考慮如何取締不法者，遂希望其他單位能給予意見。

無論各方對臺灣籍民的態度有何差異，原先預計 1934 年 1、2 月間舉辦的領事會議，竟然再次因 1933 年 11 月底閩變的突然爆發而延期。在持續約兩個月的閩變中，將能看到軍部如何透過臺灣籍民落實大亞細亞主義理想。

二、閩變期間臺灣軍之活動

掀起閩變的主角是當時駐守福建的第 19 路軍。第 19 路軍出自粵軍第 1 師第 4 團，陳銘樞（1889-1965）為團長，歷經多次擴編後，於 1931 年 6 月第三次江西剿共時改編為第 19 路軍，蔣光鼐（1888-1967）為總指揮，蔡廷鍙（1892-1968）為軍長，歸剿匪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統轄。雖然廣東部隊通常擁有反蔣傳統，但第 19 路軍因陳擁蔣態度而受蔣重用，²⁹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陳調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第 19 路軍隨之前往駐守，1932 年上海事變時遂成為與日軍交戰之主力。³⁰然而，隨著陳銘樞勢力坐大，陳蔣關係也逐漸惡化，1932 年 3 月，中共大舉入侵福建，4 月攻陷漳州，福建危急，蔣遂於 6 月派第 19 路軍入閩剿共，此舉既可同時削弱中共及第 19 路軍力量，又可藉第 19 路軍打擊福建地方勢力，並牽制廣東陳濟棠。³¹第 19 路軍駐閩後，即行整頓地方勢力，先於 9 月扣押了省防軍領袖陳國輝（12 月遭處決），³²後於 12 月新建省政府，由蔣光鼐任省

E-1-6-0-X1_U1_5_001, JACAR Ref.B08061051600。

²⁶ 〈第 195 號〉（1933 年 6 月 29 日），《外国ノ对中国借款及投資關係雜件／米國ノ部／福建ニ於ケル米國ノ投資海軍根拠地建設ノ活動關係》，分割 1，JACAR Ref.B08061051600。

²⁷ 〈第 202 號〉（1933 年 7 月 11 日）、〈廈門領事致外務大臣第 157 號〉（1933 年 7 月 12 日），《外国ノ对中国借款及投資關係雜件／米國ノ部／福建ニ於ケル米國ノ投資海軍根拠地建設ノ活動關係》，分割 1，JACAR Ref.B08061051600。

²⁸ 〈米國ノ福建ニ於ケル策動〉，《外国ノ对中国借款及投資關係雜件／米國ノ部／福建ニ於ケル米國ノ投資海軍根拠地建設ノ活動關係》，分割 2，JACAR Ref.B08061051700

²⁹ 林知淵，《政壇浮生錄》（福建：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48。

³⁰ 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臺北：文海，1978），頁 3-22。

³¹ 林知淵，《政壇浮生錄》，頁 49-52。

³² 林知淵，《政壇浮生錄》，頁 54-56。

府主席，蔡廷鍇任綏靖公署主任，³³其他要職亦多由廣東人擔任。於是官廳幾成廣東人之天下，而地方軍亦在第 19 路軍的監控下受到縮編。³⁴

儘管第 19 路軍以抗日聞名，因福建長期與臺灣有著密切的經濟來往，且日中兩國間曾締結福建省不割讓條約，福州、廈門等地又充斥臺灣籍民，第 19 路軍主政下的福建仍不得不維持與日本的關係。1932 年 12 月，省政府委員林知淵（1890-1969）曾向日本駐福州總領事守屋和郎（1893-1977）表示，福建政府希望明年 1 月遣人渡臺考察農業建設。³⁵ 1933 年 2 月守屋也指出，透過有效維持治安、抑制中共行動，蔣光鼐贏得了外國人的信賴，認為蔣為避免失去地盤，其對日態度比預期穩健，不只抑止排日分子，在處理各種警察事故時也致力保全日方尊嚴。³⁶

第 19 路軍主閩的同時，其精神領袖陳銘樞因與蔣中正不合，於 1932 年 6 月辭去交通部長，同年 10 月出國留洋，1933 年 5 月返回香港。陳回國後，拒絕至國府中央任職，開始串連各方以實行倒蔣計畫，最終尋得前粵軍將領李濟琛（1885-1959）領導計畫，第 19 路軍的蔣、蔡亦表支持。陳銘樞另派陳公培（1901-1968）與中共接觸，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³⁷既然已準備革命，確保與日本的友好關係益加重要，而臺灣人便是重要的中介。

此時正逢松井於 8 月上任軍司令官，當臺灣軍確立以大亞細亞主義為目標後，便開始向福建活動。1933 年 9 月，福州總領事向外務大臣報告，「最近特別自陸軍方面前來當地之人士，一齊就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向本官尋求援助，又有自稱與之有關的中國人，也來訪本官數回」，並表示其尚未收到相關訓令，希望中央給予處理方針。³⁸同月，廈門領事亦向外務大臣報告，除 1932 年以來有一名與臺灣軍有聯繫之臺灣人，籠統地鼓吹大亞細亞主義外，最近有數名臺灣人自稱受上海陸海軍武官及居留民會長派遣，欲以實際行動酬謝國恩，與臺灣籍民及民軍謀策，但因缺乏資金而未有活動。另外，臺灣軍司令部亦將雜誌《大亞細亞主義》及松井所著《亞細亞聯盟論》等書籍寄至日人學校、全閩新日報社，報社隨後全文轉載松井的文章，引起中國官民相當之注意。³⁹

由上顯示，臺灣軍已經透過領事館及臺灣籍民，在福建展開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宣傳。在行動上，姑且不論報告中真偽不明的計畫，臺灣軍確實與陳炯明之

³³ 〈管警第 543 號〉（1932 年 12 月 20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4 卷，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3-1_1_004，JACAR Ref.B02031808200。

³⁴ 〈第 55 號之 1〉（1933 年 2 月 20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5 卷，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3-1_1_005，JACAR Ref.B02031808700。

³⁵ 〈臺機密第 217 號〉（1932 年 12 月 24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4 卷，9，JACAR Ref.B02031808200。

³⁶ 〈第 55 號之 2、3〉（1933 年 2 月 20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5 卷，2，JACAR Ref.B02031808700。

³⁷ 王宏松，〈蔣中正對「閩變」的態度與作為〉，《國史館館刊》28（2011 年 6 月），78-79。

³⁸ 〈第 283 號〉（1933 年 9 月 19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5 卷，1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3-1_1_005，JACAR Ref.B02031809700。

³⁹ 〈第 208 號〉（1933 年 9 月 27 日），《台灣人關係雜件》，1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5-3-0-3，JACAR Ref.B02031443900。

舊部、臺灣籍民蔡誠仁有所來往。蔡誠仁長期從事陳之再起運動，1932 年與天津軍接觸，1933 年 1 月再赴臺尋求臺灣軍支持，希望擁陳統一西南，呼應北洋派展開大規模反蔣運動。⁴⁰此計畫因陳病逝而告終後，蔡轉而協助陳銘樞，陳氏即於 1933 年 10 月遣蔡誠仁、張文理⁴¹致書辜顯榮尋求意見。⁴²對於此兩件反蔣運動，臺灣軍的介入程度雖不明瞭，惟據蔡自書之履歷書，兩者均是在松井等人的援助下展開，而蔡另自 1932 年 2 月後受臺灣軍囑託與福建民軍、海盜聯繫。⁴³由上可知，無論是對於陳炯明、陳銘樞，抑或是對於軍部，臺灣人都是重要的聯絡中介。

11 月 20 日，福州舉行「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22 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舉行成立典禮，李濟琛主持中央委員會會議，更定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閩變於是爆發。⁴⁴事變爆發前夕的 11 月中旬，李濟琛、陳銘樞曾就獨立運動向和知鷹二請求援助，和知一方面協助斡旋財政援助，配合臺灣軍、總督府將臺灣糖輸出至廣東的計畫，鼓動廣東隨之反蔣，一方面仍忠告兩人應先整理福建內部再行動。同一時期，李、陳亦派張文理向臺灣軍請求援助，臺灣軍則表示不願介入軍閥鬥爭，但「若鼓吹大亞細亞主義等堂堂正正地計畫，則可聲援」。對之，張表示 19 路軍將先致力收攬福建人心、從事財政改革等善政、實行日中提携停止排日、與西南及北方韓復榘（1890-1938）聯合發動全國反蔣等，請求臺灣軍諒解，臺灣軍則答應考慮。然而，在張尚未離臺前，閩變即突然爆發，使臺灣軍大感意外，並將此歸因於陳與共產分子的聯絡。⁴⁵確保新政府保持與共產黨的距離，並轉向大亞細亞主義，就成了臺灣軍的首要考量。⁴⁶

由於新政府的共產色彩及抗日口號，無論是外務省還是軍部中央，在閩變爆

⁴⁰ 〈第 60 號〉（1933 年 2 月 14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5 卷，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6-1-3-1_1_005，JACAR Ref.B02031808700。

⁴¹ 張文理（1903-1973），福建平和人，曾經就讀於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後至美國哈佛大學專攻政治學，後到蘇、英、法、比等國考察，並在蘇聯工作過一段時間，1935 年在國民政府主計處任職，1944 年任重慶市財政局局長，1945 年任臺灣省財政處處長，1947 年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張聖才口述，泓瑩整理，《張聖才口述實錄》（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114；賴永祥長老史料庫，「張延哲長老」，網址：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iun/Tiun,Itiat/Siang-lian/Tin.Lto.htm>，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另外，雖然真實性不高，據臺灣籍民線報，張文理實為臺灣新竹人，原名張鐵石，曾在丘念台下從事反殖民活動。〈機密第 651 號〉，《支那內亂關係一件／福建獨立運動關係》，第 2 卷，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號：A-6-1-5-1_17_002，JACAR Ref.B02031912000。

⁴²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317-318。

⁴³ 〈我社「囑託」名使用ニ係ル件〉（1939-12-13），《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臨時的囑託 秘書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202448013。另外，雖然確切時間點不明（僅可確定係九一八事變後），陳炯明亦曾受辜顯榮的金援。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285-287。

⁴⁴ 王宏松，〈蔣中正對「閩變」的態度與作為〉，頁 83。

⁴⁵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第 2 卷（昭和八年對中國關係）》，頁 605-606、623-625。

⁴⁶ 有關臺灣軍對福建事變的介入，過去研究有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282-283、568-572；橋本浩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の對外政策と日本政府の動向（上）〉，《中国研究月報》57：11（2003 年 11 月），頁 7-10。本文此小節即基於兩文之上，再略述軍部立場的推移，以及總督府、臺灣人的看法。

發之初皆採不干涉方針，認為只要新政府不採取實際行動破壞日本權益，將不介入事變，陸軍亦如此命令臺灣軍。⁴⁷不過，臺灣軍在事變爆發不久就數次派遣軍官渡閩。根據 12 月 12 日福州領事館的報告，事變後陸海軍及臺灣總督府相關人士前去福州者有：

一、和知中佐與滿洲國籍秘書一同在 11 月 24 日來福，土橋臺灣軍參謀於 25 日到達後與之進行種種討論，30 日向廈門出發。（同氏在廈門說服曾作為蔡廷鍇的代表赴臺北之中國要人前來福州，後赴臺北）

二、土橋參謀表示將繼續留在當地，直到參謀本部於年內派來繼任者後再離開。毋庸贅言，本官與土橋參謀間有著密接的聯絡。土橋參謀以書記一名、無線電通信手一名為同伴，而使用支那人張文理，臺灣人蔡三房〔按：蔡誠仁〕、謝龍閣等諜報者。

三、酒井海軍大佐應在十日左右已自上海到達，因尚未來訪前即赴廈門，由當地停泊中之帆風艦長通知。

〔按：中間有關軍艦來往部分省略〕

八、臺灣總督府因為本官寄出之電報未自本省轉發，對當地政情不明而感困惑，正接獲相關趣旨之電報時，因和知中佐當時赴臺北詳細報導狀況，而決定派野澤文書課長至當地，同氏經廈門前來，應於 15 日到達。

九、以臺灣軍囑託名義之緒方初雄（陸軍大佐）〔按：山縣初男〕十二日來福，應將駐在約十日，其任務乃是指導福建民軍，而井上健吉〔按：井上謙吉〕則決定不來當地。這是臺灣軍正抑制民軍策動之證據。

十、與土橋參謀一同來福的華南銀行取締役竹東〔按：竹藤峰治〕氏於 30 日前去廈門，滯在中就臺灣糖的銷售與先和李濟深來福的韓賓禮商談。（有關本件本官並未深入，僅供知悉）⁴⁸

閩變爆發之初，臺灣軍內部雖有意見希望積極支持以使蔣政權崩潰，⁴⁹但最初採取的作法，仍是延續販賣臺灣糖的計畫，預計將販賣收入作為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的軍費，並使李、白呼應新政府。⁵⁰除了報告中提及華南銀行取締役竹藤峰治外，一同前往福州的土橋一次也有類似目的。土橋抵達後，透過蔡誠仁希望與陳銘樞見面，然陳僅派陳公培接見，土橋向陳提議以提供臺灣米換取新政府不反日，卻遭拒絕。⁵¹按陳公培為中共創黨黨員，也是代表第 19 路軍與中共討論合作的要角，陳銘樞派陳公培與土橋見面，又拒絕其提議，似乎顯示出新政府逐漸左傾，不願轉向大亞細亞主義。

土橋的任務既未成功，臺灣軍遂改派山縣初男（1873-1971）前往福州。山縣為陸軍之中國通，曾為唐繼堯（1883-1927）顧問，其出現與前雲南軍師長趙懿岳

⁴⁷ 橋本浩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の對外政策と日本政府の動向（上）〉，頁 8-9。

⁴⁸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第 2 卷（昭和八年對中國關係）》，頁 652-654。

⁴⁹ 山縣初男，《中國》（東京：三原朝雄，1967），頁 157。

⁵⁰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第 2 卷（昭和八年對中國關係）》，頁 649。

⁵¹ 張聖才口述，泓瑩整理，《張聖才口述實錄》，頁 165-166。

有關。趙在表面上為中國籍，實際出身宜蘭頭圍，原名林樹，早年至中國發展，1926 年以中國留學生身分自日本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在唐麾下擔任中將。⁵²1931 年寧粵分裂時，趙響應擔任雲南反蔣軍第一師師長，展開反龍雲作戰。⁵³失敗後於 1932 年 9 月渡日，與山縣、井上謙吉等人來往，計畫糾合民軍推翻第 19 路軍，實現閩人治閩，然未能得到東京陸海軍部的支持。⁵⁴11 月山縣、趙於是渡臺與臺灣軍協商。

閩變爆發後，山縣力主援趙、不援第 19 路軍，12 月 11 日，他以臺灣軍囑託的身分前往福州，抵達後立即求見陳銘樞，19 日始獲見陳之代理梅龔彬（1901-1975），實則梅亦是中共黨員。會談時，山縣建議反共聯日，但梅表示「亞細亞主義的連帶，是以雙方在平等的立場上實行為條件，現在中國不是在平等的立場上，但新政府絕對不會與共產黨共同行動」。除此之外，山縣還建議實行減稅等善政、保留並聯絡民軍，梅亦未予正面回應，整場會談僅止於形式上的應答。其後，山縣則與民軍接觸，26 日歸臺向松井報告。⁵⁵

對於福州的情形，山縣認為 19 路軍治閩不得民心，而陳銘樞亦無誠意與日本來往。由於 19 路軍始終不願明確支持大亞細亞主義，轉向反共親日，再加上山縣的看法，臺灣軍決定開始與民軍聯繫，於隔年 1 月 6 日派趙懿岳渡廈，不過到了閩變結束時仍未予實際援助。⁵⁶另一方面，臺灣軍也未放棄對 19 路軍的期待。在 1934 年的新年賀詞上，松井仍表示福建獨立運動絕非軍閥政客間的權力鬥爭，反而認為其在政治上是「支那第三次的革命運動」，思想上是「亞細亞文化運動的發現」。⁵⁷確保 19 路軍與國府軍得以政治解決，而不至於兵戎相見，以在福建留存一支潛在的親日勢力，就成了臺灣軍的新目標。

1933 年 12 月 30 日，曾協助國民政府對日外交之李擇一來臺，其任務乃是確保日方不會援助福建，且不會在國府軍攻入福州時出兵介入。李氏滯臺時，幾乎每天與松井接觸，其於回國途中編寫的「渡臺回憶錄」，有助了解臺灣軍態度的轉變。30 日下午李氏抵臺，31 日正式就閩變與松井談話。會談時，松井告知李氏「閩事勿輕視」，不只陳、李與粵桂似有諒解，軍事上進攻亦不易，還表示國府軍的空襲使一般民眾產生反感，有漸與 19 路軍接近之趨勢，建議只在戰場

⁵² 〈本島出身支那陸軍中將の暗躍〉，《新高》，1936 年 8 月 29 日，第 8 版。報導中的「張懿學」其實就是「趙懿岳」，兩者發音相同。蘭陽博物館，「宜蘭縣古碑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7 年 10 月），頁 26。

⁵³ 〈滇將領通電討蔣〉，《廣州民國日報》，1931 年 5 月 29 日，第 5 版；〈滇省討蔣軍之勃起〉，《廣州民國日報》，1931 年 9 月 8 日，第 2 版。

⁵⁴ 〈外秘第 2783 號〉（1933 年 11 月 9 日），《支那地方政況關係雜纂／南支政況》，第 5 卷，12，JACAR Ref.B02031809700。

⁵⁵ 山縣初男，《中國》，頁 157-161。

⁵⁶ 山縣初男，《中國》，頁 161-163。另外，趙氏此後在酒井武雄等人的推舉下，擔任廈門公安局顧問，但並未放棄推動福建獨立運動，1941 年 4 月，他成為汪政權派任之廣東中山縣長，有意在西南組成獨立政府對抗重慶國民政府，然於 6 月即遭暗殺身亡，骨骸歸葬宜蘭。〈中華民國人趙懿岳氏に関する件〉，《永存書類乙集》，第 1 類，昭和 11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6748600；山縣初男，《中國》，頁 230-246；蘭陽博物館，「宜蘭縣古碑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7 年 10 月），頁 26。

⁵⁷ 〈昭和九年を迎ふ〉，《南日本》，1934 年 1 月 1 日，第 4 版。

上空襲。此後數日，李氏分別與松井、辜顯榮等人交際來往。1月7日，李氏準備回國，與松井作最終談話時，松井明確表示「閩事盼兼用懷柔，勿專重武力」。⁵⁸顯然的，臺灣軍此時的態度仍是希望抑制國府的軍事行動，以保全 19 路軍的勢力。

使臺灣軍改變態度的，是國府軍進軍的快速。1月5日國府軍攻下延平、7日攻下水口，兵臨福州，李擇一因此受命暫先留臺。10日，李濟琛、陳銘樞決定暫時放棄福州。⁵⁹至於第 19 路軍未能利用的閩南民軍，眼見國府軍屢戰屢捷，紛紛倒戈協助截斷 19 路軍的退路。⁶⁰10日，透過與民軍有淵源的杜起雲中介，國府海軍和平接收廈門。⁶¹眼見新政府外不敵國府，內又有民軍造反，日本駐福州海軍武官酒井武雄，遂開始斡旋和平接收福州，⁶²理解到新政府大勢已去的松井，亦於 11 日向李擇一表示「中央軍對福州逆軍，若必須加以爆擊，務要保護南臺居留民安全，免生問題，極盼能將 19 路軍全體澈底解決，免貽後患」，同意中方對福州用兵。⁶³13 日以後 19 路軍開始撤出福州，16 日國府海軍正式接收福州，21 日撤退至泉州之 19 路軍投降，而陳銘樞、李濟琛、蔡廷鍙、蔣光鼐等人則紛紛避走香港，閩變至此告終。此後主持福建省政者，則是新任省主席陳儀（1883 - 1950）。⁶⁴

閩變的突然爆發，雖出乎臺灣軍的意料，仍給予臺灣軍在對岸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機會。其最初欲以輸出臺灣物資之獲利，間接援助福建、西南，促其反蔣、反共、親日。計畫未果後，則一面聯絡民軍，一面繼續促成新政府與國府間的政治解決，試圖在福州溫存潛在之親日勢力。一直到新政府瀕臨崩潰時，才終於同意國府的武力討伐。之後，臺灣軍在福建的著眼也轉移到另一支潛在的合作勢力——民軍之上。

總督府在閩變中的態度並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總督府予以密切注視，甚至派遣官員前來視察，而土橋、竹藤參與的臺灣米、糖輸出計劃，背後至少也獲得總督府的配合，至於是否有更深的介入，就不得而知了。⁶⁵不過，新政府瓦解前夕，在調查課從事華南及華僑研究的井出季和太（1880-1959），曾表示閩變自始不可能成功，而「不清楚事情的人，雖然有著種種說法，但迄今成立過的支那中央政

⁵⁸ 「渡臺回憶錄」，〈各省政情（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48-003。

⁵⁹ 王宏松，〈蔣中正對「閩變」的態度與作為〉，頁 105。

⁶⁰ 〈福建の將僚續續寐返る 蔣介石の命で閩南の民軍集編〉，《臺日》，1934 年 1 月 10 日，夕刊第 1 版；〈福建南部土民軍 爭先與中央軍聯絡〉，《臺日》，1934 年 1 月 14 日，第 8 版。

⁶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福建事變概說》（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1935），頁 122-125。

⁶²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 II 第 1 部第 3 卷（昭和九年對中國關係）》（東京：外務省，2000），頁 894-895。

⁶³ 「渡臺回憶錄」，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48-003。

⁶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福建事變概說》，頁 125-128。

⁶⁵ 根據國府的情報，總督府囑託岩崎敬太郎曾在福建代表臺灣政府，聯絡民軍供給財政槍械，李擇一來臺時曾據此質問平塚長官，然平塚表示岩崎僅為一調查員，而非代表，且數日內可回臺。雖然岩崎確實是總督府囑託，但地位似乎不高，外務省將其稱為高等無賴（ゴロ），岩崎與軍部亦關係匪淺，李燼己渡滿時，他是陪同者之一。中村孝志，〈福州水戸事件について〉，頁 232。

府中，蔣介石的政府不管怎樣都最強大，而且是最清楚日本實力與實情的政府。至少須認識此事實，然後再建立對支觀」。⁶⁶由上可知，在新政府未能轉向反共親日，且又以失敗收場的情況下，總督府內從事南進的官僚，對於未來介入中國政治、試圖策動反蔣之舉，多少帶有排斥態度。

另外值得討論的，還有臺灣人的看法。雖然謝龍闊、蔡誠仁等諜報者的看法無法得知，但同樣涉入閩變的辜顯榮則留下一些紀錄。如前所述，陳銘樞曾在閩變爆發前派遣蔡誠仁、張文理致書辜顯榮詢問意見。辜在回覆中，強調福建「地僻民懦，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非藉外援，絕難成事」，依循臺灣軍的立場，建議陳應先整頓內政，加強與日本提攜，再思考革命，不可「徒負一隅，以抗天下」。閩變爆發後，辜又於 12 月致書陳，建議接受山縣初男的建議，「使用本省人士，以收編閩南各地土軍」，並強調軍部對新政府具有熱誠，期待積極與日本提攜，甚至成功倒蔣「實行大亞細亞大同聯盟之政策」。⁶⁷主旨亦與臺灣軍採取的行動相仿。如此看來，辜似乎只是軍部實行其政策的手段之一。

當李擇一來臺時，辜顯榮又有另一種態度，向李表示自己於事變前曾以「福建地僻民懦，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勸軍部務須持重，並告誡陳銘樞不可輕舉妄動，然不意事發，此時當竭力不使其擴大。一方面辜氏的確曾在事變前告誡陳銘樞，一方面辜氏未提及事變後他依然期待陳「實行大亞細亞大同聯盟」，他對兩方分別採取兩種不同的態度，或許只是一種表面應酬而已。不過，在他與李擇一的數次會見中，還發生一則軼事。在一場於辜宅舉行，僅有神田正雄、李擇一及其同伴在場的宴會上，辜詢問李對歌女表演的中國樂曲有何感想，李答覆云「臺民眷懷祖國，於此可見一斑。中國政府對臺民並不漠視，祇以頻年內亂，無暇顧及，弟此來實兼有慰問之意」，辜氏「聞之至於下淚」。⁶⁸究竟這只是辜顯榮隨波逐流的處世哲學之一，還是對中日關係仍抱有理想，則須再觀察他之後的行動。

三、對岸領事會議之舉行

歷經中共、閩變的影響，兩度受延宕的對岸領事會議，最終於 1934 年 7 月 18 日至 20 日舉行。與會者在外務部門有福州、廈門、香港、汕頭、廣東等地領事、外務省東亞局第二課長、在中公使館書記官等。臺灣總督府則有各部局長課長，軍部有臺灣軍參謀長、馬公要港部武官。民間則有大阪商船會社、華南銀行、臺灣銀行等。會議開始中川健藏總督致詞，揭示總督府的方針有三：（1）取締臺灣籍民的蠢動；（2）繼續學校、醫院、報紙等既有方針；（3）擴展臺灣產品的銷路。接著，平塚廣義長官任議長，提出外事課復活案，獲全場一致通過。⁶⁹

此次會議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首先關於不法臺灣籍民問題，於 1933 年會

⁶⁶ 〈官界噂話〉，《新高》，1934 年 1 月 14 日，第 9 版。

⁶⁷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317-319。

⁶⁸ 「渡臺回憶錄」，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48-003。

⁶⁹ 有關此次會議，先前已有近藤正己之研究，本小節亦主要參考該此研究。見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82-92。

議準備時已被總督府掛念。此時總督府眼見臺灣籍民涉入閩變，似乎使其更加重視取締，至於須與中國交涉臺灣籍民問題的領事，當然也希望能有效取締。就護照撤廢事項，會議結論雖認為廢除亦無影響，但有必要讓臺灣籍民持有取締上必要之證明書，而希望領事也有發給證明書的權限。總督府在會議上重視鼓勵臺灣籍民從事殖產，也具有促使臺灣籍民無賴漢從事正業的功用，在會議準備時，廈門領事館特別提及從事不正行業的無賴漢會造成治安問題，還會使中國方面懷疑日本有所圖謀，因此除取締外還要有效使之轉向正業。⁷⁰

接著，總督府明確表示「南進」要以經濟發展為重心。在會議準備時，總督府的提案有「除了本府現在於對岸各地經營之事業外，從時局來看何種事業最為有效適切」，到了正式舉辦時，改為「鑒於現下情勢，如何以本島為中心向南支謀求經濟發展之方策」，明確指出重點在經濟發展，具體內容則有經濟事情調查、日本商品介紹、臺中間交通改善、金融機關整備等。⁷¹至於臺灣物資的向外輸出，除了原先曾有的糖、米、酒外，又多提了鳳梨罐頭、煤炭之輸出，不過對此領事館預測在排日狀態下，未來情形並不樂觀。⁷²

最後，領事館明顯地對軍部的活動有所不滿，至於總督府似乎態度冷淡。福州領事館提出「關於宣傳以日支親善為綱領的主義之件」，其內容是要促使臺灣軍反省其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如前所述，福州、廈門領事都曾注意到松井上任後臺灣軍對當地宣傳大亞細亞主義，而顯然閩變後更加提防臺灣軍的活動。對於此案，報紙記載「關於具體化，需要相當的考量」，顯示多數與會者亦對軍部活動抱否定見解。7月20日晚，在松井宴請各領事的懇談會上，領事親自就此事向松井「要求自重」。在細部事項上，領事、總督府、軍部三者之間似乎也不太合作，官房文書課提出的「關於對岸各領事館、陸海軍及本府間電信符號統一之件」被否決，⁷³軍部提出之相關議案「共通暗號書制定」則被撤回，另軍部之「青年團設置」只記錄以修養為主，反應冷淡。⁷⁴由此觀之，似乎因閩變失敗的刺激，總督府的「南進」明確地表明以經濟交流為重，對於與臺灣軍合作，協助臺灣軍看重之向外宣傳大亞細亞主義，亦即促使中國西南政權反蔣、反英美、親日一事，並不熱烈。

⁷⁰ 〈領事會議ニ提出スベキ事項〉(1934年5月11日)、〈第三章 南支領事會議〉，《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5／分割 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M-2-3-0-1_4，JACAR Ref.B15100143100。

⁷¹ 〈第三章 南支領事會議〉，《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5／分割 1，JACAR Ref.B15100143100。

⁷²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88。

⁷³ 〈昭和九年對岸領事打合會協議及希望依賴事項〉，《領事會議關係雜件／南支領事會議》，5／分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M-2-3-0-1_4，JACAR Ref.B15100143200。

⁷⁴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89-91。

第三節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與其成員之活動

一、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之過程

1933 年 9 月，大稻埕的青年社交團體木曜會，在陳清波為首之下，開始有所活動，並在松井、沼川憲兵隊長的指導下，10 月 12 日發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之趣意書及規約，發起人計有：陳清波、林濟川、李延旭、姜鼎元、王錦東、余樹、張學東、陳發得、張暮年、黃銑、陳維貞、郭盈來、張歐波、張歐園。¹

此組織主要的推手是大稻埕茶商陳天來之子陳清波，他對大亞細亞主義的接近，早在 1928 年主導成立大稻埕青年團並擔任團長時即可見端倪，²該青年團雖以增進青少年修養、從事社會服務為目的，但宣言書亦強調臺灣青年有著「輝耀自治之舟，常揭內臺融合之帆，乘過東洋和平之浪，進而順應世界潮流」的使命。³九一八事變後，陳清波展開愛國運動，使大稻埕青年團積極配合軍隊慰問活動，⁴並領導大稻埕的舞廳消滅運動，聲言絕對要讓這些出入舞廳的有閒有產階級捐出一架飛機贖罪；⁵另一方面，數次渡滿視察，致力促進臺滿貿易。⁶

松井上任後，他迅即與松井的想法共鳴。1933 年 9 月撰文直言「時局正向著南方」，指出臺灣是日本的海、空前線，更是經濟的生命線，只有以臺灣為根據地向南支南洋擴張市場，才能實現日滿中經濟圈，甚至要「進一步向暹羅、安南、印度、波斯伸長巨足，宣揚我皇道，圖策國威的發展」。最後，表示西洋文明必將衰退，呼籲集合東西精華、兼具精神及物質文明而「持有東西無比的文化之日本民族」，以臺灣為基地展開活動，培育東洋諸民族。⁷可見無論是對內提升臺灣人的愛國心，還是對外促成臺灣與滿洲、南支南洋的經濟連接，甚至是在「宣揚皇道」、「發揚國威」之大亞細亞主義上，陳清波的思想都與松井一致，成立一個以臺灣人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組織，無疑是陳清波的希望。

不過，同一時期另一個大亞細亞主義組織也正在醞釀。10 月 9 日，松井向竹藤峰治、郭廷俊詳述大亞細亞協會的趣旨並協議成立支部，⁸ 12 日在鐵道旅館正式結成一個稱為「大亞聯盟聯絡機關」的組織。⁹出席者 39 名中臺灣人僅有 8

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69。有關此 10 月 12 日發布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趣意書及規約，與後述同日舉辦的集會上頒布之「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設立趣意書原案，兩者有何關係並不清楚，筆者猜測兩者實係相同。

² 〈大稻埕青年團 團則全部脫稿〉，《臺日》，1928 年 3 月 25 日，夕刊第 4 版；〈大稻埕青年團發團式及披露會〉，《臺日》，1928 年 11 月 19 日，第 8 版。

³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頁 261-262。

⁴ 〈慰問袋發送滿洲〉，《臺日》，1931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

⁵ 〈ダンス撲滅の排撃運動起す〉，《南日本》，1932 年 5 月 27 日，第 8 版。

⁶ 〈お茶の輸出の外に 果物、蔬菜も有望〉，《臺日》，1933 年 7 月 31 日，第 7 版。

⁷ 〈時局は南方！〉，《臺日》，1933 年 9 月 4 日，第 6 版。

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70。

⁹ 有關其名稱，《臺灣社會運動史》記為「大亞聯盟聯絡機關」，而《經世》則載為「大日本亞細亞協會臺灣聯絡部」，名稱雖不同，但實質應相同。至於日期《大亞細亞主義》記載 10 月 11 日下午四點曾舉行懇談會，《經世》則記為 12 日下午兩點，出席人數皆是 39 人，不知是連續兩日集會或是其一有誤。

名，包括郭廷俊、陳清波等，至於占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據《經世》的攻擊：「大部分若不是一種的特權階級，就是軍部的人或役人之類」，不過是土曜會、扶輪社等既有社交團體的變形，內容空虛。¹⁰事實上，部分出席者的確對大亞細亞主義缺乏認識，會上雖然頒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設立趣意書，但仍有出席者詢問「亞細亞聯盟到底是什麼意思？」¹¹另一方面，陳清波一派雖然主張立即組成協會，展現出比日本人更積極的態度，但似乎不願與日本人合作，有意組成以臺灣人為中心的協會向中國活動，主張「不會接近御用紳士或重役級之缺乏理解者，以一對一的實質本位，內地人有志者亦可，在臺華僑亦可，而以有實行力的本島人為中心」，¹²理由乃是「基於我們與對岸中華民國同族的關係，不如設立本島人獨自之亞細亞協會，希望與軍部聯絡後，自發組建另一個團體」。¹³無論陳清波是不滿日本人缺乏理解，還是基於其他考量而提出上述主張，在該集會前後，郭廷俊、陳清波、林濟川等十餘人又在大稻埕舉行僅臺灣人出席的集會，打算獨自組建臺灣人的團體。¹⁴

11月11日，「大亞聯盟聯絡機關」舉行第一次協商會，陳清波一派同意與日人合流，統一組建臺灣支部。¹⁵不過，之後又傳出陳仍打算自組聯盟，甚至決定12月20日搶先成立支部，預計發行機關紙，只剩會員年費尚未決定而已。經過雙方斡旋後，才取消20日的發會式，並決定1934年1月6日共同成立支部。¹⁶

1月6日下午2時半，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正式在鐵道旅館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有臺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總務長官平塚廣義（代理總督出席）、內務局長小濱淨鑛、殖產局長中瀨拙夫、警務局長石垣倉治、總督府秘書官枡山保一、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等，以及其他百餘名臺灣支持者，協會總部也派鹿子木員信、下中彌三郎、中谷武世三名幹部出席。席上竹藤峰治述開會之詞、佐藤佐報告支部設立經過後，推河村徹為座長，通過支部宣言及規約後，選出役員如表5-2。會後由鹿子木演講，至4時40分結束，5時以後在旅館食堂舉行紀念晚宴。

¹⁰ 〈亞細亞を護る〉，《經世》，1933年10月15日，第2版。

¹¹ 〈臺灣にも大亞細亞協會〉，《經世》，1933年10月15日，第8版。

¹² 〈亞細亞を護る〉，《經世》，1933年10月15日，第2版。

¹³ 〈臺灣亞細亞聯盟の行衛〉，《新高》，1933年10月20日，第2版。

¹⁴ 〈亞細亞主義の團體結成〉，《經世》，1933年10月22日，第8版。

¹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70。

¹⁶ 〈東亞聯盟〉，《經世》，1933年12月17日，第2版；〈東亞協會〉，《經世》，1933年12月24日，第2版。

表 5-2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役員（1934 年 1 月）

職稱	總督府官吏	民間日本人	臺灣人	軍部人士
名譽顧問	中川健藏			松井石根
顧問	平塚廣義	三好德三郎、松木幹一郎	辜顯榮	
評議員	須田一二三、白鳥勝義、姉齒松平、佐藤佐、青山公亮、王野代治郎、坂口主稅、能澤外茂吉、石井龍猪、本多保太郎、山岸金三郎、福元岩吉、樂滿金次	安保忠毅、小松吉久、松木幹一郎、畠山敏行、木村泰治、鼓包美、荒木正次郎、吉田勉、大場辰之允、中島道一、佐藤吉次郎、加藤駿、谷河梅人、小寺新一、田中勘次、三卷俊夫、中辻喜次郎、後宮信太郎、有田勉三郎、近藤有曾、古賀三千人、大澤貞吉、貝山好美、竹藤峰治、土居政次、蒲田丈夫、河村徹	林濟川、翁瑞春、陳振能、陳清波、張清港、郭邦光、許智貴、黃純青、林熊祥、林熊光、郭廷俊、蔡彬准、黃玉對、姜鼎元、楊漢龍、魏清德、羅萬俤	井上保雄、沼川佐吉、土橋一次、上野龜甫
共 61 人	共 13 人	共 27 人	共 17 人	共 4 人
常任評議員	能澤外茂吉、王野代治郎、佐藤佐、石井龍猪、坂口主稅、青山公亮、今村完道	安保忠毅、河村徹、大澤貞吉、貝山好美、土居政次、竹藤峰治	顏國年、郭廷俊、蔡彬准	土橋一次、上野龜甫、沼川佐吉
共 19 人	共 7 人	共 6 人	共 3 人	共 3 人
地方評議員	桑原政夫、内海忠司、郡茂德、西澤義徵、竹下豐次、小林長彦	近江時五郎、石坂莊作、和泉種次郎、河野俊雄、松本晃吉、坂本素魯哉、松岡富雄	顏國年、簡朗山	
共 15 人	共 6 人	共 7 人	共 2 人	
備註	除今村完道外，常任評議員皆為評議員或地方評議員，可能是記載失誤導致。			

資料來源：大亞細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4），頁 38-41。

鑑於不少民間人士實際上是總督府官吏轉任者，即所謂「空降部隊」（天下り），或是任職在總督府握有主導權的企業，表 5-3 特別統計評議員的民間人士中與總督府有關係者，至於評議員詳細的職稱與背景如附錄一。

表 5-3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背景統計（1934 年 1 月）

職稱	總數	官吏	民間日人部分			
			總數	前官吏	總督府主導企業	府評、州市協等
評議員	61	13	27	8	15	15
常任評議員	19	7	6	3	5	4
地方評議員	15	6	7	1	1	7
			臺灣人部分			
			總數	前官吏	總督府主導企業	府評、州市協等
評議員			17	6	1	12
常任評議員			3	1	0	3
地方評議員			2	0	0	2
備註	同時具有多項身分者分別計算於各欄中，例如地方評議員中僅松岡富雄同時具「前官吏」及「總督府主導企業」身分，故數量皆計算為 1。					

當支部成立並公布役員後，輿論有何反應？向來傾向自由派的《新高》，劈頭就批判具有重大使命的協會中竟有許多官僚、高官，而民間人士只有所謂有力者而已，諷刺道：「據松井司令官的祝詞中所言『透過青壯年的結成』，不知道是不是對青壯年的見解不同，但至少從年齡來看發會當時成員中的青壯年也太少了」，直言光靠官僚與民間有力者不可能形成一個劃時代的文化、思想運動。接著，《新高》指出協會在思想上帶有「我等正是亞細亞的盟主」之優越意識，認為唯有日本先放棄優越意識，與中國平等結合，才能達成大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另外還須留意臺灣人與中國人的協助。¹⁷右翼的《經世》在成立前夕，表示臺灣是「呼號大亞細亞聯盟最適合之地」而給予期待，¹⁸但成立以後轉而要求督府應積極促成「內臺融和」，如此臺灣才能真正擁有呼籲大亞細亞聯盟的資格。¹⁹如前章所述，向來重視皇道的《經世》應是主張必須以皇道融和日臺人。《經世》雖然與《新高》立場相左，但同樣攻擊成員多數不能體悟大亞細亞主義，會上也充斥逢迎奉承，質疑此種「愛國婦人會式的會合，究竟能達成多少本質性的工作」。²⁰

輿論的批評確實符合事實，據表 5-3，評議員 61 人中，雖然現職官吏只有 13 名，但民間日人 27 名中，前官吏有 8 名，任職在總督府主導企業 15 名，擔任府評、州市協 15 名，所謂「民間人士」其實多半是親總督府人士。常任評議員中，與總督府有關者占比更高，6 人中前官吏有 3 名、任職在總督府主導企業 5 名、擔任府評、州市協 4 名。至於軍部評議員 4 名中有 3 名獲選常任，顯示出軍部雖盡力確保影響力，但從數量上仍居少數。至於臺灣人，多數雖然具自身經濟基礎，

¹⁷ 〈時局を射る〉，《新高》，1934 年 1 月 14 日，第 3 版；〈時局を射る〉，《新高》，1934 年 1 月 21 日，第 3 版。

¹⁸ 〈臺灣の地位〉，《經世》，1934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

¹⁹ 〈臺灣の内容〉，《經世》，1934 年 1 月 14 日，第 2 版。

²⁰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 威容堂々生れはしたが〉，《經世》，1934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

但其中任府評、州市協者，實際上高於民間日人（日人約 55%；臺人約 70%），這些人士多半是不會公然對總督府唱反調的臺灣人。尤其是參與過程中表現最積極的陳清波未能任常任評議員，反而是由 3 名較資深且皆是府評、州市協的臺灣人擔任。陳清波本人對此決定可能不太滿意，在協會成立後不久，再次傳聞以大稻埕木曜會為首的中堅臺灣人有意另組「臺灣亞細亞協會」，會員將以臺、鮮、中民族為主體，並將在廈門、福州設立支部，並派出永裕茶行社長陳朝煌至對岸準備，最終在協會總部成員鹿子木員信的勸阻下才未成立。²¹

大量的官吏及親總督府人士，如何影響協會的具體活動？根據協會規約，總會應選出若干名評議員，評議員中選任 20 名以內為常任評議員，常任評議員中互選 10 名為幹事，其中 2 名為會計幹事。規約中明訂的職責有二：會員總會經常任評議員之議召集；會員的除名應依評議員會決議。至於幹事的職責雖然未明訂，但應是負責協會的實際運作。透過官吏及親總督府人士，總督府要決定協會人事並不困難，其中自然也包括幹事的人事，固然，個人思想不見得受自身背景影響，但仍可認為總督府對協會運作擁有相當大的主導權。1 月 10 日，恰好與本部派來演說的三人乘同一班火車的蔡培火，曾向其質疑：「君等既以政黨為利權中心之輩，極力排擊，何以臺北的貴會支部專以所謂御用紳士者流充為幹部耶？」，而三人回答自己「全然不知，但自到臺以來亦都見有可疑之處，歸本部後當為參就善後策云」。²²顯示出協會本部成員亦察覺總督府的控制。

其後，協會與總督府的關係未有減少。1935 年 1 月總會，協會決定改名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號稱在名實上自大亞細亞協會本部獨立，同時通過新規約，未來計畫改制為財團法人，並將會員分成甲種會員（年會費 10 円）及乙種會員（年會費 3 円）。依照規約，評議員與常任評議員選任完全由座長負責，而此人正是出身總督府官僚、長期擔任《臺日》社長的河村徹。²³1937 年 1 月，協會正式改為財團法人，新增理事長、理事、監事三職，規定：（1）理事長依評議員會的決議推舉就任；（2）理事、監事、常任評議員由評議員互選；（3）評議員於贊助會員（甲種會員）會上選任。雖然恢復關於互選的規定，但理事長擁有代表協會、總理會務，以及召集贊助員會、評議員會、理事會並任議長等大權。財團設立之初，理事長依然為河村徹，理事為竹藤峰治、貝山好美、佐藤佐、郭廷俊、池田又四郎等 5 人，新任總務長官森岡二郎（1886-1950）擔任顧問，²⁴可見協會的幹部仍多由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人擔任。

在總督府主導下，協會舉辦的活動主要為各種演講、座談會，演講者包括軍部成員或對岸領事等，以介紹中國時局政情為主，有時也舉辦來臺的華南、南洋人士的歡迎、交流活動。1934 年 6 月，協會創刊會刊《臺灣大亞細亞》，內容以

²¹ 〈大稻埕にも又別に別個の新團體〉，《經世》，1934 年 1 月 14 日，第 8 版；〈東亞の臺灣〉，《經世》，1934 年 2 月 11 日，第 2 版。

²²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283。

²³ 〈大亞協會臺灣支部 獨立して一大飛躍〉，《臺日》，1935 年 1 月 8 日，第 7 版。

²⁴ 〈財團法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寄附行為〉，《臺灣大アジア》35（1937 年 4 月），頁 8；〈臺灣大亞細亞協會 財團法人認可さる〉，《臺日》，1937 年 1 月 24 日，第 7 版。

介紹大亞細亞主義思想及華南、南洋現狀為主。

至於歷年具體的活動，根據報導 1934 年協會共「舉辦 9 次公開演講會、8 次座談會，致力於助成臺灣各地同主義的團體，為與南支的同志提攜而敢行青年學徒之南支訪問，刊行月刊《大亞細亞主義》」。²⁵1935 年的活動同樣多為演講、座談會，僅佐藤佐曾於 7、8 月前往滿、中旅行，²⁶1936 年的情形亦相差無幾，²⁷1934-1936 年之詳細活動內容，參見附錄二。這些活動的經費來源，分別是總督府的補助與糖業聯合會的捐款，據報導 1936 年度各捐助 1,500 円。²⁸至 1937 年 1 月協會已累積資金 19,340 円 80 錢。²⁹

整體觀之，至 1936 年為止，除了竹藤、佐藤前往南支南洋視察外，協會的活動為舉辦各種演講、座談、歡迎會。近藤正己認為協會是「議論『南進』的沙龍」、「南支南洋情報中心」，³⁰可以認為協會的特徵並不是具體實施南進政策，而是著重交流。一方面，不少集會都與軍部有關，顯示總督府並不反對軍部透過各種交流的機會向成員灌輸大亞細亞主義，協會本身也不缺乏資金。另一方面，除了少數成員曾親身到訪南方外，協會多數成員的活動侷限在討論交流，顯示總督府無意躁進對外行動。既然如此，協會理想的實踐只能仰賴少數成員的努力，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軍部人士與高商教授佐藤佐。

二、軍部成員之對華南經、政工作

松浦正孝研究指出，總督府與軍部在經濟南進上存在合作。在領事會議上，總督府毫不諱言希望出售臺灣多餘物資至華南，軍部亦希望以經濟援助的方式確保西南、福建親日反蔣，居間協調的是華南銀行常務理事、協會評議員竹藤峰治。福建在陳儀主政下，與總督府維持良好關係，並展開經濟交流。竹藤建議透過輸出臺灣砂糖改善福建財政，並投資礦山開發，福建方面則認為經濟上過度往來可能違反中央統一的意向，至 1935 年陷入停頓，其後陳儀亦對經濟提攜保持提防態度。至於西南方面，透過和知、竹藤中介計畫米穀借款，竹藤甚至一度建議設立「南支臺灣銀行」以達成援助工作，不過與西南的經濟提攜工作因外務省擔心引來國府敵意而於 1934 年底流產。³¹1937 年 6 月，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福州海軍武官只能報告「陳主席立場頗為辛苦，與日本的經濟提攜終究無法有重大成果，除了取零碎成果外無他」。³²

經濟工作進行的同時，臺灣軍始終沒有放棄更直接的工作，其中以臺灣軍高級參謀、協會常任評議員土橋一次最活躍。土橋為陸軍之中國通，早年曾任北京

²⁵ 〈大亞協會臺灣支部 獨立して一大飛躍〉，《臺日》，1935 年 1 月 8 日，第 7 版。

²⁶ 〈大亞細亞協會々報〉，《大亞細亞主義》2：8（1935 年 8 月），頁 105；〈佐藤教授が來閩〉，《臺日》，1935 年 8 月 29 日，夕刊第 2 版。

²⁷ 〈事業報告〉，《臺灣大アジア》35（1937 年 4 月），頁 8。

²⁸ 〈高雄舷影〉，《臺灣經濟タイムス》，1936 年 3 月 14 日，第 6 版。

²⁹ 〈財團法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寄附行為〉。

³⁰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21。

³¹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282-286。

³² 伊藤隆，照沼康孝編，《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頁 102。

政府的軍事顧問，1933年8月至1935年8月間任臺灣軍高級參謀。根據國府的情報，和知於1934年5月前後曾赴東京推動華南分化活動，土橋與之附和，臺灣軍因此派參謀長與和知一同赴東京尋求支持。³³然而，因為外務省希望與國府進行技術合作，計畫未得支持，和知憤然回粵，決意以個人行動繼續聯絡西南反抗國府。³⁴而土橋於1934年9月赴粵、1935年6月赴兩廣直接與西南協商，³⁵除了與西南來往，土橋延續閩變後期的活動，繼續與福建內部有意反抗陳儀的民軍聯絡，準備在國府軍進攻西南時與西南合力推翻陳儀政府，樹立自治政權，若民軍無力抵抗則動員臺灣籍民、日本浪人支援。³⁶和知、土橋對西南工作的實際成果，乃是廣西政府於1934年間透過臺灣軍取得滿洲國製的步槍、彈藥，³⁷臺灣軍則另提供空包彈、槍管，以及教官協助訓練。³⁸

除了土橋之外，海軍駐福州武官、協會東京本部幹事酒井武雄，也在華南積極活動。酒井是海軍的中國通，長年駐在中國，也是閩變時中介福州和平接收的要角。1934年5月，他一面在福州籌組「東亞大同盟」，擬以酒井、陸軍駐福州武官大本四郎、福州總領事宇佐美珍彦、林熊祥等人為常務理事，³⁹一面則協助民軍領袖赴臺、日尋求協助，據報臺灣軍已允諾提供槍枝，6月又至香港與胡漢民見面。⁴⁰1934年11月，酒井調任總督府海軍武官後，仍然傳出海軍將派酒井赴廈展開積極工作，並派臺灣籍民謝龍閣聯絡流民、土匪。⁴¹有關土橋、酒井的活動，國府的情報或許不全然正確，仍難否認臺灣軍在華南的確有所企圖。

在這些政治策動上，總督府與軍部有何關係？海盜高誠學的來臺經過似乎提

³³ 「唐有王電蔣中正」(1934年5月2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35-019；「蔣鼎文電蔣中正」(1934年5月1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35-099。

³⁴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4年5月14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35-153

³⁵ 「竺鳴濤電蔣中正」(1934年9月23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 (三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181-109；「吳鐵城電蔣中正」(1935年6月5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 (二十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27-098。

³⁶ 「賀國光電蔣中正」(1934年10月23日)，〈卯翼傀儡 (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20-040

³⁷ 〈滿洲国兵器廣西派に払下の件〉(1934年2月15日)，《密大日記》第2冊，昭和9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7473400。

³⁸ 〈廣西に派遣すべき將校下士官物色の件〉(1934年3月6日)，《密大日記》第1冊，昭和9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4019100；〈兵器払下に関する件〉(1934年9月10日)，《密大日記》第2冊，昭和9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7482800。

³⁹ 19340524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4年5月23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35-194；「蔣鼎文電蔣中正」(1934年5月25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35-217。

⁴⁰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4年5月2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35-174；「蔣鼎文電蔣中正」(1934年6月15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三年 (二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168-106。

⁴¹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5年8月22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三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57-019。

供一些線索。高誠學（1897-1948）是福建平潭人，燕京大學畢業，1932 年參加中國生產革命黨，有志從事農村改革運動，1933 年末與同黨人士一同參加閩變。閩變失敗後，高誠學等人繼續以反蔣抗日之名從事游擊，並從事海盜以籌措資金，尤以洗劫公平號（1934 年 6 月）及鷺江號（1935 年 5 月）聞名，其來臺的契機，與土橋一次有關。閩變發生時，土橋透過蔡誠仁，相識高誠學同黨張聖才，閩變結束後土橋曾向張氏表示願意提供金錢協助辦報，而以宣傳親日為條件，但遭張氏拒絕。1935 年 5 月，高誠學襲擊鷺江號後遭陳儀政府追捕，張氏聯繫蔡、土橋，希望暫時避難至臺灣，在土橋協助下，高氏等人於 10 月渡臺，之後轉赴日本。

不過，值得注意之處有二：第一，軍部並未完全讓總督府知悉高之經歷，土橋建議高以受臺灣軍部邀請之名，告知總督府管轄的水上警察，軍部之後再向總督府說明高是受陳銘樞介紹之閩變失敗成員，並未告知其真實身分；第二，高來臺後約 20 萬兩海盜所得又遭水上警察扣留，連「軍部方面，土橋也覺得很嚴重，很難說話」，直到高以 3 萬銀元供土橋交涉後才放行。儘管在經濟工作上總督府與軍部間有著合作關係，但在高誠學來臺一事，總督府、軍部間缺乏聯繫，參與其中的張聖才也提及「臺灣軍部與總督府是有矛盾的」，箇中緣由大概就是總督府對政治策動抱持的消極態度。⁴²

無疑的，松井的思想是臺灣軍部仍執意展開這些工作的主要因素。松井石根於 1934 年 8 月轉任軍事參議官，1935 年 8 月編入預備役，1935 年 10 至 11 月遊歷滿洲國、華北、華中，1936 年 2 月至 3 月遊歷華中、華南，向中國政、商界鼓吹大亞細亞主義，促使地方政權反蔣親日。之後，公開表示中國各地民情風土不同，不適合獨裁式的中央集權政府，只有在「連省自治、中央統制」的形式下統一才自然。⁴³

相似的看法也存在於臺灣軍。1935 年 2 月，大阪每日新聞網羅臺灣各界南方權威，舉辦一場「以國策角度看南支南洋」座談會。會上，協會成員酒井、土橋、沼川分別就南京政府的親日姿態發表意見，其中，酒井表示雖然難以判斷，若中國真誠希望與日本提攜，日本應以「大國民的襟度予以指導」，而土橋強調不應輕易相信國府，認為若蔣真正理解亞細亞主義，應立即廢止排日政策、承認滿洲國，以展現其誠意。

沼川的發言，尤其展現軍部的想法。他認為此時尚難認為中日將掃清懸案達成永久的提攜，日本仍應以慎重態度面對，更表示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透過援助蔣中正個人政權的工作往往失敗，最好的方式是逐漸承認國府代表中國，同時向各地政權積極實施工作達成提攜。接著，闡述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理想，認為日本有救濟白人壓迫下全亞洲民族之任務，根本方法乃是喚起亞洲民族的自覺，以結成泛亞洲聯盟。加上面對英國、美國等潛在軍事威脅，日本更須積極認識南支南洋，尤其是臺灣人應「自己充分地認識帝國的使命，清算內臺人間的爭執或民

⁴² 張聖才口述，泓瑩整理，《張聖才口述實錄》，頁 120-122、173-177。

⁴³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574-580。

族偏見，廣闊地轉眼至南支南洋方面，對種族與語言相同之南方，徹底實現帝國的重大使命，從漢民族開始，進一步對亞洲民族，致力宣布皇道」。⁴⁴

沼川之意見絕非要捍衛臺灣人的傳統，其後，他再次提到臺灣是大亞細亞主義的最尖端，有精神與經濟上的重大使命，臺灣的人們須大同團結，而對於臺灣人「不可無故討厭。要將其養育成堅強、明確、明朗的日本人，用心引導其在言語、風俗習慣、生活樣式都改為日本式」。⁴⁵換句話說，在沼川眼中，臺灣人欲與漢民族往來，協助大亞細亞主義實踐的先決條件，仍然是臺灣人要先完全認識皇道、日本精神，成為完全的日本人。

總而言之，臺灣軍部的意見就是，大亞細亞主義的實現，對於中國，由於國府的態度不能信任，須靠日本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對於南洋也不能單靠外交，而是要靠促使當地人自覺才能實現，充分認識日本精神的臺灣人在其中便扮演重要角色。足見松井雖然早已離臺，但其大亞細亞主義觀，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都已浸透至臺灣軍內部了。

三、佐藤佐之協會改革與華南、南洋活動

協會中，除了軍部人士外，臺北高商教授佐藤佐是最信服松井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最積極參與活動的成員。佐藤畢業自京都帝大法科大學，1921年起長期任教培養南進商業人才的學校臺北高商，教授法學相關科目及德語。他與亞細亞主義的關係，開始於1924至1925年以研究員身分留學歐洲時。留德時，佐藤曾參與京大教授鹿子木員信發起之「柏林文化學會」，在一次集會上，鹿子木演講「康德哲學的凋落與西洋文明的沒落」，引起與會者討論，共同結論是歐洲文明已走入死路而呈現沒落之兆。由於此次經歷，佐藤相信日本未來應盡力排除過去西洋式教育的遺毒，致力於研究整理並重新尊重東洋文化。⁴⁶回國後，佐藤開始發表關於當代中國政局、政治思想的研究。⁴⁷1931年後，因滿洲問題，他與軍部開始往來，1932年11月在臺灣軍後援、臺日主辦的演講會上，攻擊李頓報告書並呼籲東洋民族團結。⁴⁸1933年大亞細亞協會成立，鹿子木成為協會的重要成員，佐藤佐也於1934年加入協會臺灣支部，1936年8月起擔任協會本部幹事。⁴⁹

如前所述，佐藤佐充分理解到大亞細亞主義具有對外與對內的意義，1934年始政紀念日時，他強調日本應從解放、復興、再建亞洲民族的大業上思考同化政策，須有擁抱、援助全亞洲民族的大雅量，使臺灣人自然地同化、崇敬日本的皇

⁴⁴ 大阪毎日新聞社，《南支南洋を國策的に觀る》（大阪：大阪毎日新聞社，1935），頁79-91。

⁴⁵ 〈斷乎傷つけられた軍の威信を回復したい〉，《南瀛》，1935年6月8日，第5版。

⁴⁶ 佐藤佐，〈行詰れる西洋文明（上）〉，《臺日》，1926年3月14日，夕刊第3版；〈行詰れる西洋文明（下）〉，《臺日》，1926年3月15日，夕刊第3版。

⁴⁷ 有關佐藤的中國研究，以及他歷年發表的文章，可參照黑崎淳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與南支南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119-129。

⁴⁸ 〈リットン報告の功罪を論ず（一）〉，《臺日》，1932年11月19日，第2版；〈リットン報告の功罪を論ず（二）〉，《臺日》，1932年11月20日，第2版。

⁴⁹ 〈大亞細亞協會役員〉，《大亞細亞主義》4：8（1936年8月），版權頁。

道精神，絕不可抱著低劣的民族優越感與臺灣人爭小利。⁵⁰正如其指稱「對外宣布呼號大亞細亞主義，與追求內臺融和」是「並行且相關者」，只不過大亞細亞協會將活動重點放在對外而已。⁵¹佐藤對協會未來運動所抱的期待，可從 1934 年年頭感言中得知一端，其稱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乃是全亞洲民族之「文化的水準運動、倫理運動」，而以包容印度佛教、中國王道之日本皇道為依歸，因此必能施之中外而不謬。然而，「若欲暢達之，須去一切之觀念式的空想，將一切奠基在科學式的研究根據，而將之實踐化」。⁵²此欲將大亞細亞主義「實踐化」的理想也表現在行動上，首先便是他改革協會的嘗試。

協會本身並不缺資金，真正關係到協會能否使大亞細亞主義「實踐化」在於成員的組成。如前所述，協會一成立，不同立場的日、臺輿論紛紛指稱協會內充斥著上流日人，絕不可能形成一股有力的運動。之後，《經世》嘲諷協會是「臺灣貴紳連中的道樂」、「有錢人的亞細亞運動」，⁵³《新高》則指出會費太高，稱「亞細亞聯盟應該是付得出十円會費之一部智識階級專屬的存在嗎？還是應該要讓擠不出十円的一般大眾也認識呢？」⁵⁴這些批評無非表示一個成功的運動需要大眾、青年支持，恰如松井在成立大會的祝詞，須「依青壯年諸氏結成」。佐藤顯然也認識到了此點不足，於是協會成立不久，佐藤即籌設青年部，以青年學徒為運動的主力。不過總督府似乎不太贊成，據《經世》報導，文教局長安武直夫（1887 - 1959）認為佐藤過於埋首於運動，而透過高商校長切田太郎（1876 - 1937）對佐藤「表現出了幾分壓迫的態度」，而佐藤則以「不惜辭職離校，或被其他幹部拋棄」的決心面對。⁵⁵最後協會並未設置青年部，只於 1935 年總會決定新設年費 3 円之「乙種會員」，比較協會成立時光是幹部就有 61 名，至 1940 年全部會員卻僅有 94 名，顯示此制度終未促成運動的擴大。⁵⁶

另一方面，佐藤佐試圖將運動推展到臺灣青壯階層，1934 年 5 月，他協助創建以文協、民眾黨之左翼知識分子為主的「大亞洲黎明協會」，⁵⁷之後曾在黎明協會舉辦的演講會上發表「廣西省近情」，⁵⁸或參與黎明協會討論中國大亞細亞運動現狀的座談會。⁵⁹顯示佐藤佐似嘗試以臺人為主的黎明協會，協助偏重日人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更有效地推展在中國的運動。

⁵⁰ 佐藤佐，〈同化政策の再吟味〉，《臺灣》38（1934 年 6 月），頁 10-12。

⁵¹ 佐藤佐，〈內臺一如は我等の信條〉。

⁵² 佐藤佐，〈光は東方より〉，《新高》，1934 年 1 月 1 日，頁 12。

⁵³ 〈合財袋〉，《經世》，1934 年 3 月 25 日，第 8 版。

⁵⁴ 〈亞細亞聯盟〉，《新高》，1934 年 1 月 28 日，第 2 版。

⁵⁵ 〈松井大將離臺の日近づく 臺灣大亞協會は何處へ行く〉，《經世》，1934 年 7 月 29 日，第 9 版；另外，早在協會成立時的 1934 年 1 月，《昭和》也報導「府內某局長」，因為「部下某教授的積極運動」而「招來某校長給予注意」。〈大亞細亞協會支部〉，《昭和》，1934 年 1 月 13 日，第 2 版。

⁵⁶ 1940 年的成員見大亞細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40），頁 150-151。

⁵⁷ 〈臺灣本島人に依り大亞洲黎明會創立〉，《大亞細亞主義》2：7（1934 年 7 月），頁 91。

⁵⁸ 〈大亞細亞黎明 講演盛況〉，《臺日》，1934 年 9 月 18 日，第 8 版。

⁵⁹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月報》38（1937 年 8 月），頁 129。

除了對內試圖改革協會，佐藤也積極對外活動，協會成立後，他多次出訪中國（1934年7月至廣東及廣西、1935年7月至滿洲及中國各地）、南洋（1936年7月至暹羅、8月至菲律賓）。1934年7月15日，他帶領高商學生考察福建、廣東，21日學生離開廣東後，他則在廣東的和知鷹二公館準備，並私下與李宗仁會面；⁶⁰31日獨自一人前往廣西會見廣西大學校長、省主席等要人；8月13日經海防啟程回臺。⁶¹佐藤此行的目的在於加強日本與西南派的關係，他與李宗仁會談時，李氏表示希望日本的後援。對之，佐藤則認為「現在的日本對於有關東亞的事務，皆立於指導的立場」，無須猜疑、顧慮對方，只要依日本所信前進即可，於是當場回應「現在蔣介石所行的政治外交決非正道」，希望李宗仁能完成大廣西的建設，且承諾斡旋臺灣的產業技術支援。⁶²

回臺後，他開始提倡援助廣西，認為廣西雖然財力欠缺，但政治形態相當健全，且未曾受外國勢力影響，日本應立即在產業、貿易、技術、文化等各方面援助指導，而此正是皇道宣布、大亞細亞主義的實踐。佐藤認為日本若成功地指導誘掖廣西，將帶來三項好處：（一）日本的大陸政策將達成南北均衡，完善滿洲國建設的意義；（二）促使無誠意之南京政府反省；（三）未來取代中共控制地區的新勢力，將受過日本之培育。至於援助廣西的中介，當非臺灣莫屬。如其強調，當地政府「以極謙虛的態度期待先進臺灣的高度文化之指導」，目前尤希望學習植林、栽培、水利。⁶³

佐藤的建議與其對南京政權的認識有關，和軍部成員一樣，他並不信任蔣中正主政下的南京政府。在〈日支關係打開的捷徑〉一文中，他攻擊蔣中正政權未能理解滿洲建國是東洋民族命運轉換的契機，而選擇依賴英美帝國主義以確保自己的權位利益，不可能在精神上真心親日，因而打開中日關係的第一階段就是「蔣中正的引退」，而第二階段就是「樹立真正日中親善政權，其將承認滿洲國，而我將發誓獨立保全之」，兩國關係將以大亞細亞主義為指導原理，而任指導之責的日本為奉行此理念，有時甚至「必須有不辭鐵血的覺悟」。⁶⁴該文發表不久，1935年7月，佐藤再次前往滿洲、中國，在華北、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發表演講鼓吹大亞細亞主義。⁶⁵在福建時，他分別向陳儀、王固磐（廈門市長，1880-1956）宣傳大亞細亞主義，陳儀回應「若是松井大將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我們希望大力援助」，而王固磐也表示贊同。⁶⁶雖然陳儀的真意絕非佐藤期待的親日反蔣，但佐藤回臺後，向報紙表示國民必須支持軍部的華北分離工作，促使國民黨勢力消

⁶⁰ 佐藤佐，〈廣東政界秘話（上）〉，《臺灣》44（1935年1月），頁23。

⁶¹ 佐藤佐，〈西廣遊記〉，《大亞細亞主義》2：10（1934年10月），頁49-54。另外，佐藤另以「佐藤生」的名義，在《臺日》發表進入廣西後的部分，內容雖與前者略有不同，主旨大致相同。佐藤生，〈廣東廣西遊記〉，《臺日》，1934年8月14日，第4版；8月18日，第4版；8月20日，第6版；8月26日，第4版；8月30日，第6版；9月3日，第5版。

⁶² 佐藤佐，〈廣東政界秘話（下）〉，《臺灣》45（1935年2月），頁17。

⁶³ 佐藤佐，〈廣西省の近情と南方國策〉（臺北：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1934年）

⁶⁴ 佐藤佐，〈日支關係打開の捷徑〉，《大亞細亞主義》3：7（1935年7月），頁19-21。

⁶⁵ 〈佐藤教授が來閩〉，《臺日》，1935年8月29日，夕刊第2版。

⁶⁶ 〈福州記者團一行と合同座談會（上）〉，《昭和》，1937年3月27日，第5版。

退，並認為陳、王表現的善意，顯示中國全體已逐漸轉向親日。⁶⁷顯然佐藤對自己的行動充滿信心。

除了華南工作之外，透過臺灣向南洋發展，同樣是松井對協會的希望。1934年5月，菲律賓大亞細亞協會成立，之後松井建議當地日人向領事館取得協助，不過使館方面始終不贊成，認為支部成員並非實質有力者，而在美國控制下的地區進行此種運動並不妥當。⁶⁸無論如何，菲律賓大亞細亞協會成立後，開始與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往來，而臺灣人士尤其重視的議題就是菲律賓的獨立。1934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菲律賓獨立法，宣布將於1935年成立菲律賓自由邦，10年後允許其獨立。於是1936年1月，海軍武官酒井武雄前往菲律賓視察，回國後在座談會上表示菲律賓是美國的「奢侈線」，對於原先不缺熱帶物資的美國有如「累贅」(持て餘し物)，只是因海軍基地而不願其完全獨立。並認為美國並未成功開發菲律賓，而較當地人、中國人更適合開發南方的日本人有著發展南方的使命。⁶⁹參加該座談會的佐藤於同年7月帶領高商學生前往暹羅，8月獨自前往菲律賓，在馬尼拉各大學及日人團體舉行演講，並與菲律賓大亞細亞協會成員一同向領事請求支援，仍未獲支持。⁷⁰回臺後，佐藤表示菲律賓相當歡迎日本資本及技術，其中菲律賓大學校長波科保(Jorge Bocobo, 1886-1965)表示「日本作為亞洲盟主乃是自然且正當，菲律賓獨立後希望日菲提攜，期待日本的援助」，而副總統奧斯米納(Sergio Osmeña, 1878-1961)則託他向臺灣學生傳信，希望臺菲學生能多交流。⁷¹

佐藤佐的活動，從廣西提攜運動開始，隨著協會的視野向南洋擴大。1937年3月撰〈大亞細亞主義者與其信念〉一文，回顧自身思想。該文首先強調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是對亞洲諸民族之啟蒙運動、復興運動，當然須向著國外。接著，分別說明中國、暹羅、菲律賓的情勢，強調日中國交的改善不能只靠外交官，而必須靠擁有大亞細亞主義信念的國民從側面遊說，才能使彼此朝向拯救亞洲的目標。至於在暹羅、菲律賓及南洋，也要堂堂地以亞洲盟主的自覺，向亞洲諸民族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必能獲被西方壓迫的當地居民支持。同時，批評「大亞細亞主義」雖已成流行語，但缺乏實際實踐者，甚至對部分外交官妨害海外遊說、缺乏信念的態度感到遺憾。最後，佐藤回想松井對其之鼓勵，並強調奉行大亞細亞主義者須有「金剛堅固的信念」。⁷²的確靠著對大亞細亞主義的堅定信念，佐藤才能在協會內外有限的支持，熱情地持續對外鼓吹大亞細亞主義，試圖讓協會發揮應有的功能，使臺灣成為串聯華南、南洋與日本間之中介。

⁶⁷ 〈國民は軍部の方針を支持せねばならぬ〉，《臺日》，1935年8月30日，第7版。

⁶⁸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303-309。

⁶⁹ 日刊千代田通信社，《獨立問題を中心に比律賓を語る》(東京：日刊千代田通信社，1936)，頁2-7。

⁷⁰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304-305。

⁷¹ 〈資本と技術の投下を比島は歓迎している〉，《臺日》，1936年8月29日，第9版。

⁷² 佐藤佐，〈大亞細亞主義者と其の信念〉，《大亞細亞主義》5：4(1937年4月)，頁21-23。

四、積極南進勢力與總督府間之齟齬

雖然佐藤任教臺北高商時並未教授有關華南、南洋的科目，但臺北高商既然是一所培養南進商業人才的學校，佐藤當然責無旁貸。他於 1934 年的考察華南、1936 年考察暹羅，都帶著高商學生一同前往。這當然與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有關，據說他曾向學生談笑道：「諸君前去南洋吧，未來將能造出第三、第四個滿洲國。到時候諸君說不定能比預想的還要快成功」。⁷³ 不過，佐藤對總督府的態度並不滿意，1935 年 2 月「以國策角度看南支南洋」座談會上，他表示臺北高商雖負有南進使命，實際上約 800 名畢業生中僅有 30 至 40 人前往南支南洋發展，認為其背後除了南方經濟不振外，更大的原因是總督府對青年之南洋發展極為冷淡。他回憶 1934 年 8 月與外相廣田弘毅（1878-1948）見面時，廣田曾說：「臺灣總督府真不像話。對南方發展非常消極，這只要從南支南洋的設施費，漸漸減少一事就可看出。」佐藤也指出，學校對學生南洋旅行的補助越來越少，希望當局能重視南進。另一方面，相較於臺銀幹部在會上認為對中國大舉投資有一定困難，佐藤則闡述現在的大亞細亞主義，與過去抽象、觀念論的大亞細亞主義不同，極具實踐性，而其方法除了「送出具有學識技量的人士」外，「此際更要抱著會有一定犧牲的覺悟」，大規模進行投資或資源開發，「如此才能初次期待實現遠大之南方國策」。⁷⁴

當以大亞細亞主義理念謀求積極南進的勢力逐漸形成，總督府的立場開始受到挑戰。1935 年 4 月 7 日，荷蘭商船珠諾號（Juno）因遇颱風而駛入海軍管轄的馬公要港內，海軍認為該船係假借避難為由從事間諜活動，而向法院檢舉荷籍船長。一審雖予以重罰 2000 円及沒收船體，但二審法院以判決恐受民間言論影響為由，將案件由臺南移至臺北，最終因總督府顧慮影響對外關係，只輕罰 500 円，引起右翼、軍部、鄉軍不滿。對軍部而言，臺灣乃是直接面對南支南洋的國防第一線，因此始終主張應強硬處置。軍部中如馬公要港部參謀中堂觀惠、軍參謀長桑木崇明，以及協會成員沼川、土橋、酒井等人在審判過程中頻頻發表言論，在背後引領右翼團體展開群眾運動，其攻擊對象包括總督府、替荷蘭船長辯護之「內賊」及英國、荷蘭等「外敵」。⁷⁵如前章所述，酒井武官亦曾與右翼日人組成的「臺灣國防強化聯盟」，討論珠諾號事件的對策。

在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對抗總督府的局面下，珠諾號事件的餘波也震盪入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內部。判決確定後的 6 月 16 日，軍部發表聲明，說明移管問題上軍與法院已無隔閡，但對判決結果及辯護律師的言行仍感遺憾，據說佐藤在得

⁷³ 〈世界殖民地爭奪戰批判（四）〉，《昭和》，1936 年 4 月 18 日，第 7 版。

⁷⁴ 大阪毎日新聞社，《南支南洋を國策的に觀る》，頁 43-44，53-54，60-64。

⁷⁵ 有關珠諾號事件，先前已有梁華璜、駒込武、近藤正己等人相當深入的研究。見梁華璜，〈臺灣總督恢復武官制的背景〉、〈珠諾號事件與臺灣南進國防論〉，收入氏著，《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51-95、97-123；駒込武，〈在台軍部と「反英運動」〉，收入《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頁 259-285；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下冊，頁 638-648。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21-25。

知此事後，因擔心國民的國防強化運動被遺忘，「感到義憤」而撥電話給陸海軍、司法、鄉軍等部門。⁷⁶軍部的攻擊目標，之後轉移到珠諾號的辯護律師安保忠毅，主張在任何公私場合都不願與安保同席，由於安保同時也是協會的常任評議員，協會運作因此受到影響。1935年10月，山下好太郎之皇政會向協會提出勸告書，要求將安保除名。⁷⁷佐藤也主張須肅正協會內部，不過因貝山、大澤及多數成員都不贊成，最終似未成功。⁷⁸至於軍部與安保、總督府間的隔閡，直到12月總督府要求安保辭去府評，並向軍部謝罪後，才得以緩解。⁷⁹

珠諾號事件代表積極南進勢力的抬頭，與此並行的還有1935年10月總督府舉辦的熱帶產業調查會（熱產調會）。熱產調會是拓務省要求下，為了討論臺灣的工業化及對南支南洋發展而舉辦，其中討論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臺拓）的設立。無論是熱產調會還是臺拓，毫無疑問都是為了南進而誕生的產物，然而軍部卻在會上提出不同的意見。10月19日至21日間召開的第二特別委員會上，軍參謀長荻洲立兵首先對當局的試驗研究及經濟調查計畫提出建議，他指出計畫中只見南洋調查而無華南調查，認為總督府應將重點放在華南，才能平衡發展企業不重視的華南並順應國策。⁸⁰

荻洲尤其不滿意臺拓的計畫，他指責臺拓不應將重點放在經營島內資產，僅在島內基礎穩固後再將獲利用於島外，表示「關於會社設立一事表達同意，若是為開發臺灣島內的產業則不同意」，「如果是將基礎置於島內，小心謹慎發展的設施則不同意。像這種思想不能出現在此一躍進日本之時」。⁸¹並攻擊最初的流通資金太少，在臺拓3000萬圓的資本額中，1500萬圓由總督府以臺灣土地出資，剩下的1500萬圓中，最初的實收資本金不過四分之一，即375萬圓而已。他認為單靠這些資金企圖經營島內事業，獲利再用於「廣漠的南支南洋」，實在令人心寒；強調日本在北滿行動已告一段落，現在時機正適合向華南、南洋發展，務須促成實業家、總督府勇於犧牲的氛圍。最後，更表明「總督府的說明內容與我的思想相當不同」，會社的創立「要委由總督府實行的話本人不能贊成」。⁸²討論結束後，荻洲私下向外務省的官員表示今後不能再期待總督府，而正籌畫讓臺灣民間不計利潤地出資進行約1000萬圓的南支事業。⁸³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佐藤佐雖然未參與熱產調會，但1936年臺拓正式成立前，也在報上表示臺拓發展重點必須在南洋，島內事業的存在意義只不過是要彌補島外事業的損失而已。⁸⁴

促使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積極南進，自然也是軍部的期待。1936年2月松井在巡遊華南前先拜訪臺灣，協會召開以松井為中心之座談會，軍部也趁此機會就

⁷⁶ 〈時評〉，《臺灣》48（1935年6月），頁45。

⁷⁷ 〈除名勸告書〉，《昭和》，1935年10月5日，第5版。

⁷⁸ 〈臺灣大亞協會の分解作用 内部肅正か否か〉，《經世》，1935年10月27日，第8-9版。

⁷⁹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24-25。

⁸⁰ 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頁179。

⁸¹ 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錄》，頁201-202。

⁸² 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錄》，頁214-225。

⁸³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109。

⁸⁴ 〈臺灣拓殖を活し得る者〉，《南日本》，1936年6月19日，第3版。

對協會的擴大強化，提出種種具體的工作希望協會實施。⁸⁵協會的反應雖難以得知，不過週刊紙的評論稱「松井大將離任後的大亞協會確實變得不太有生氣。雖然在那場座談會的席上，現任軍部也提出了相當的苦言，卻還是有著揮舞著提燈但最重要的燈卻沒點著的感覺」，⁸⁶可以猜測協會方面大概沒有提出具體回應，事實上協會 1936 年度的活動也未見大幅改變。

1936 年 9 月，海軍出身的小林躋造（1877-1962）接任總督，由於小林係海軍中對英美較溫和、支持裁軍條約的將領，上任之初並不受歡迎。⁸⁷軍司令部認為「總督由文武官擔任都可以，甚至寧願是現在的總督、總務長官之類的人士還比較容易操縱」，海軍少壯派對小林也有異議。⁸⁸不過，1937 年 1 月，小林表示自己將視察南支南洋，⁸⁹計畫 9 月至菲律賓、暹羅、華南等地，時間共計 2 個月，顯示出小林實際上對南進並不消極。⁹⁰小林之上任也對協會內部產生一定變化。1937 年 1 月 20 日，協會獲許可改制為財團法人，23 日協會召開評議會，會上就歡迎日暹親善使節、積極募集會員、樹立事業計畫展開積極活動，以及招致菲律賓留學生等事項進行協議。⁹¹可見協會呼應小林的南進計畫，打算展開積極活動。

不過，就算總督本人有意南進，總督府官吏與積極南進派在思想上仍存在差距。1937 年 3 月，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召開福州記者訪問團及臺灣記者團的聯合座談會，會上總督府外事課長坂本龍起說明自身對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解，「因為亞細亞協會動不動就表現出日本式的色彩，使人覺得是日本主義的宣傳，但大亞細亞主義絕不是日本應占有的事物，而是東洋式的民主主義——**Oriental Democracy**」，主張彼此協助、融合東西思想。⁹²由上顯示，坂本似乎不太贊同協會積極派的思想，特別是日本中心的觀點。同年 8 月，協會會報則刊登〈「皇道精神」與大亞細亞主義〉一文，攻擊坂本「**Oriental Democracy**」之說，堅持大亞細亞主義是「真正確實的日本主義、皇道精神」，日本人應有「皇道一如宇內一心」的信念。⁹³顯示出協會積極派亦不滿總督府的看法，兩者差異依然存在。

五、地方性的大亞細亞主義：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會之活動

能夠與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南進沙龍」的特色互相比較的是高雄支會的活動。高雄支會成立於 1935 年 1 月，最初稱為「大亞細亞協會高雄聯盟」，⁹⁴其甫成立時的組織並不清楚，但同年 3 月曾更改規約及組織，⁹⁵6 月選出理事及 40 名評議

⁸⁵ 〈協會の強化に付き軍部から種種希望〉，《臺日》，1936 年 2 月 16 日，第 11 版。

⁸⁶ 〈哈・哈・哈〉，《經世》，1936 年 2 月 23 日，第 8 版。

⁸⁷ 梁華璜，〈臺灣總督恢復武官制的背景〉，頁 87-89。

⁸⁸ 伊藤隆，照沼康孝編，《畑俊六日誌》，頁 77。

⁸⁹ 〈臺灣の庶政刷新の高邁な抱負を語る〉，《臺日》，1937 年 1 月 21 日，第 2 版。

⁹⁰ 〈二ヶ月の豫定で南洋を視察〉，《臺日》，1937 年 5 月 13 日，第 2 版。

⁹¹ 臺灣軍參謀部，《臺灣島内情報》，昭和十二年第二號，頁 1、5-6，〈台灣島内情報一括〉，《密大日記》，第 16 冊，昭和 13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4555900。

⁹² 〈福州記者團一行と合同座談會（上）〉，《昭和》，1937 年 3 月 27 日，第 5 版。

⁹³ 〈「皇道精神」と大亞細亞主義〉，《臺灣大アジア》39（1937 年 8 月），頁 6。

⁹⁴ 〈大アジア協會結團式〉，《臺日》，1935 年 1 月 4 日，第 2 版。

⁹⁵ 〈大亞高雄支部役員制度改廢〉，《臺日》，1935 年 3 月 14 日，第 3 版。

員，其中理事為：安藤彥市（高雄市協議會員）、飯田耕一（臺灣鐵工所專務）、上坂良雄（淺野セメント高雄支店長）、小野久七（高雄市助役）、楠田卓哉（高雄信用組合監事）、黑川甚兵衛（雜貨批發業）、兒玉勘一（陸軍大尉、高雄中學校配屬將校）、玉村真（三井物產支店）、高橋英雄（高雄州勸業課產業書記）、中島文雄（《臺日》高雄支局長）。⁹⁶表面上看，成員構成與本部類似，包括實業家、官吏、軍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幹部中並無臺灣人，且人數幾乎與臺北本部匹敵。至於在財務狀況上，高雄支部則獨自仰賴會費及個人、企業的捐款，並未接受本部支援。⁹⁷

除了上述幾點特色外，高雄支會成立目的也與本部不盡相同，其成立不久後發表宣言，

現在我國在政界、經濟界、思想界都直面著一大難局，不只如此，連青年都有動輒陷入意氣軟弱之傾向，實乃遺憾至極，將之匡救即係國民共同所願望。

而〔我們〕自覺欲解決之，除了期皇道精神之擴充徹底，依大亞細亞協會之趣旨運動以外無他，特別是鑑於臺灣，非也，更應該說是高雄之地理上的特殊重要性，在此組織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以之圖一切的研究運動與相互親睦，養成具有宏大意氣之高雄青年，以擔當非常時局，致力打開新生面。⁹⁸

相較於協會本部宣言屢屢提到救濟亞洲民族、聯絡西南亞洲等理想，支部宣言並未著墨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外意義，僅稍微提及高雄的地理重要性而已。宣言強調的重點反而是在養成青年精神，也因此，高雄支會的活動呈現與本部不同的樣貌。

相較於協會本部著重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外意義，高雄支會則兼顧對外與對內意義。在對外意義上，高雄支會與本部相同，經常舉辦各種演講會、座談會，邀請南洋視察歸來的人士演說，尤其重視與菲律賓的交流，包括舉辦菲律賓大亞細亞協會成員的歡迎會、菲律賓學生觀光團歡迎會等。之所以重視與菲律賓的交流，除了地理因素外，與協會成員的事業拓展有關，例如協會幹部黑川甚兵衛於 1935

⁹⁶ 〈大亞協會の役員を決定〉，《臺日》，1935 年 6 月 4 日，第 3 版。

⁹⁷ 各年度財務狀況，以及後述之宣言、各年活動等，皆出自下列檔案：「高雄州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經費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九六號）」（1938-02-01），〈昭和十二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831013；「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經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二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863002；「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昭和十四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一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881001；「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昭和十五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六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894004。

⁹⁸ 「高雄州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經費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八九六號）」（1938-02-01）。

年設立東亞貿易合資會社，成功實行高雄至呂宋北方、卡加延河下游之阿帕里（Aparri）的首次輸出貿易，此後也致力與菲律賓政府交涉阿帕里正式開港。⁹⁹

在對內意義上，協會成立後每年皆舉行建國祭武道大會，並培育少年武道選手、舉辦吟詩、劍舞講習會等鍛鍊青年日本精神、體育的活動。由於成員多為日本人，且強調養成日本精神，支部亦涉入右翼活動，諸如支持珠諾號事件時擁護軍機運動，¹⁰⁰或是師團設置運動。¹⁰¹因此，從外界來看，高雄支會較臺北本部更積極從事實際運動，然本部幾乎未予協助，例如 1937 年武道大會，據說本部僅給予 15 圓的補助而已，輿論於是指稱應將資金撥給高雄支會，甚至認為若本部的活動不過是每月發行雜誌的話，不如將本部置於高雄，讓有心從事運動但缺乏資金的支部發展有意義的事業。¹⁰²

雖然高雄支部之後仍未受本部的支援，受到小林總督推動南進政策的影響，1937 年後支部每年獲得高雄州的補助（1937-1939 年每年 1000 圓、1940 年 800 圓、1941 年 1000 圓），此後州廳補助遂成為支部主要的收入來源。州廳出面補助的原因，似乎是希望運用高雄支部與菲律賓的關係。1936 年 12 月，呂宋北方卡加延河氾濫，支部即刻與菲律賓大亞細亞協會聯繫，得知災情嚴重後向高雄市、州協商慰問。12 月底州、市決定派出慰問船攜帶物資至阿帕里，而以支部成員青柳三郎、黑川甚兵衛為慰問使。¹⁰³可見高雄支部與菲律賓的往來確實能協助州廳向菲律賓推動南進。

總而言之，比較協會本部與高雄支部，顯示支部在財政獨立的情況下，其活動具有地方色彩，也超越本部「南進沙龍」的活動內容。無論是對外促進與菲律賓的交流，還是對內提振青年精神，都較直接地反映了高雄在地日本人的希望。其中與菲律賓的關係，更於 1937 年後被高雄州關注。

六、協會中之臺灣人：陳清波與包種茶業

在軍部、佐藤佐積極推動南進的同時，協會中的臺灣人有何活動？首先值得討論的對象乃是協會成立初期仍欲自立組織的陳清波。毫無疑問，陳清波個人的強烈愛國情操，是他積極贊同協會理念的主因，如前所述，他主導的大稻埕青年團在九一八事變後便積極參與各種愛國運動。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他的茶業背景。

茶葉自清末以來即是臺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輸出地域遍及東南亞及歐美國家。日治時代在殖民經濟發展下，日本資本來臺投資，臺灣產業逐漸轉變成日本

⁹⁹ 〈臺灣比島間の最短航路を開拓〉，《臺日》，1935 年 11 月 9 日，第 5 版。〈發動機船による臺灣、比島間貿易〉，《臺日》，1935 年 12 月 16 日，第 3 版。〈比島を視察して〉，《臺日》，1936 年 10 月 22 日，第 5 版。

¹⁰⁰ 駒込武，〈在台軍部と「反英運動」〉，頁 268-269。另外，據報鄉軍也曾計畫與高雄支部聯合召開軍機擁護問題大會。〈亞細亞協會支部と郷軍が聯合大會〉，《臺日》，1935 年 6 月 15 日，夕刊第 2 版。

¹⁰¹ 〈高雄市からも代表者が参加〉，《臺日》，1936 年 6 月 18 日，第 5 版。

¹⁰² 〈高雄眩影〉，《臺灣經濟タイムス》，1936 年 3 月 14 日，第 6 版。

¹⁰³ 〈高雄支部の活躍〉，《臺灣大アジア》32（1937 年 1 月），頁 2；〈高雄支部創立記念日〉，《臺灣大アジア》34（1937 年 3 月），頁 3。

導向。然而，除了新興的紅茶業有日本資本投入外，洋行主導烏龍茶業、臺灣茶行主導包種茶業的狀況並未改變。其中，包種茶的產業結構仍大致延續清末，其資本和經營掌握在臺灣人手中，產季所需的勞動力由福建引進茶工，輸出以南洋華僑為對象，銷售管道主要仰賴當地的臺灣籍民、華僑通商網絡。陳天來的錦記茶行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包種茶行，為了拓展南洋商路，其四名兒子中，除四子陳清汾為畫家外，長子陳清素、次子陳清秀、三子陳清波都曾派駐南洋經商。包種茶進出南洋最初係由郭春秧主導，但 1926 年後，郭春秧長期不在臺灣，陳天來取代郭氏擔任臺北茶商公會長，¹⁰⁴成為包種茶業的領導人。¹⁰⁵同年陳清波返臺擔任錦記茶行常務，¹⁰⁶由於陳天來不通日語，與日本人的來往均由陳清波負責，陳天來擔任的公職也多由陳清波繼承。¹⁰⁷

1920 年代後，以華僑為出口對象的包種茶，逐漸取代以歐美為出口對象的烏龍茶，成為臺灣最大的輸出茶種。然而，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惡化，1932 年荷屬爪哇政府為保護產業實施增稅政策，為包種茶業帶來危機，如茶商公會的陳情書所稱，「包種茶累災於南支南洋華僑的排日貨及關稅政策，幾乎都要陷入了全滅的悲運」。¹⁰⁸在此背景下，致力化危機為轉機，向新興滿洲國拓展銷路的就是陳清波。1932 年 5 月，陳氏受總督府囑託前往滿洲調查市場，¹⁰⁹回國後呼籲茶商團結一致，共同對抗既有的中國茶葉，開拓滿洲新市場。¹¹⁰之後，1933 年 2 月、7 月，又兩度渡滿與謝介石等人協議臺灣產品的輸出，¹¹¹不只自身的錦記製茶已決定在大連設置販賣店，積極前進滿洲，¹¹²也計畫成立臺滿貿易會社從事蔬菜、魚類、水果的輸出。¹¹³

當陳清波致力推廣臺滿貿易時，主張大亞細亞主義的松井石根來臺接任軍司令官。從茶業經營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滿洲國新市場的出現，還是在南洋對抗歐美殖民母國施加的限制，或是使中國放棄排日運動，都與日本勢力息息相關，都只有在以日本為盟主的大亞細亞主義下才能實現，正如林滿紅指稱，臺滿貿易的加強確實「使臺灣人與日本帝國休戚與共」。¹¹⁴另一方面，他所經營的包種茶業擁有相當的自主性，在資本、勞力、銷售上都與日本人無關。從這種期待日本強大的政治力，但不需要與在臺日人在具體事業上合作的雙面性來看，就能理解為

¹⁰⁴ 〈第十九回茶商總會 陳天來氏任公會長〉，《臺日》，1926 年 10 月 16 日，第 4 版。

¹⁰⁵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東京：世界思想社，2003），頁 54-97。

¹⁰⁶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 改訂》（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268。

¹⁰⁷ 陳柔縉，《總統的親戚》（臺北：時報文化，2011），頁 102。

¹⁰⁸ 陳天來編，《組合沿革史》（臺北：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1938），頁 72-74。

¹⁰⁹ 〈臺灣茶が狙ふ 新販路『滿洲國』〉，《臺日》，1932 年 5 月 15 日，第 5 版。

¹¹⁰ 〈新興の氣運—充滿の滿洲國を見て（九）〉，《臺日》，1932 年 8 月 13 日，第 6 版。

¹¹¹ 〈臺灣茶の滿洲國への進出 將來とても有望〉，《臺日》，1933 年 3 月 8 日，第 7 版；〈お茶の輸出の外に 果物、蔬菜も有望〉，《臺日》，1933 年 7 月 31 日，第 7 版。

¹¹² 〈臺灣茶の滿洲輸出〉，《臺日》，1933 年 4 月 12 日，第 5 版。

¹¹³ 〈資本金十萬圓で臺滿貿易會社〉，《臺日》，1933 年 9 月 10 日，第 5 版。

¹¹⁴ 林滿紅，〈中日關係之一糾結：1932 年至 1941 年間臺灣與東北貿易加強的社會意涵〉，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料研究所，1996），頁 525。

何他踴躍支持松井想法的同時，又欲自主建立以臺灣人為中心的組織。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後，傳聞他曾派永裕茶行社長陳朝煌前往廈門籌備臺灣專屬的組織，似乎也可作為旁證。

陳氏加入協會後，其活動多少仍與茶業經營有關。首先，推展臺滿貿易依然是陳清波的活動重點之一，他與滿洲關係的密切，從 1934 年 6 月傳聞滿洲國將任命陳天來為駐臺北名譽領事，¹¹⁵以及 1935 年 9、10 月間謝介石回臺北觀摩臺灣博覽會時，皆借住陳清波宅邸兩件事即可得知。¹¹⁶

其次，在協會成員紛紛至兩廣、福建推動工作時，陳清波隨之將發展目標擴大到中國，1934 年 9 月考察華南後認為「廣西對臺灣茶而言是將來非常有希望的市場」，而且希望送臺灣籍民至汕頭、廣東開拓。¹¹⁷1936 年 3 月考察福建後，認為福州茶業衰退而臺灣茶可取而代之，另外有意在該地興辦「某種事業」供流浪臺灣籍民更生，¹¹⁸可能也跟茶業發展有關。

最後，陳氏也在臺灣推廣南進及中日交流。1935 年 2 月，他與其他大稻埕的紳商一同向當局請求在大稻埕設置介紹華南、南洋的臺灣博覽會南方館。¹¹⁹同年 3 月他與臺灣中華總會館的林梧村一同舉辦日華人士懇談會，討論日中文化、經濟的提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今村完道、佐藤佐、竹藤峰治、貝山好美也出席。¹²⁰會後，陳、林兩人決定依貝山建議，組成「臺灣日華文化經濟協會」，¹²¹之後，似未有實際活動。儘管如此，仍能看到陳清波如何以臺灣人身分促成中日交流，¹²²至於他在滿洲、中國的活動，則更明顯地帶有自身的茶業目的。

七、協會中之臺灣人：辜顯榮的中日親善理想

1920 年代，辜顯榮已以臺灣人的身分中介中日關係。1933 年末閏變時，他再次發揮此本領，當時大致上都依循臺灣軍的方針。1934 年 1 月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時，辜也被推舉為顧問。不過，1934 年 7 月，辜顯榮獲勅選為貴族院議員，身分上已與中央政界直接來往，自非區區臺灣軍部所能控制，¹²³1934、1937 年兩次渡中前，他都先拜訪中央政界的「要人」。茲以這兩次渡中考察辜氏對中日關係的理想。

¹¹⁵ 〈新京あたりでは 噂があるらしい〉，《臺日》，1934 年 6 月 9 日，第 2 版。

¹¹⁶ 〈謝介石大使は暫く 陳清波氏邸に滞在〉，《臺日》，1935 年 10 月 9 日，第 5 版。

¹¹⁷ 〈汕頭、廣東にも籍民を送れ〉，《臺日》，1934 年 9 月 13 日，第 7 版。

¹¹⁸ 〈福州は茶が足りない “臺灣茶を大いに賣込む”〉，《臺日》，1936 年 3 月 23 日，第 7 版。

¹¹⁹ 〈記念博南方館 由大稻埕各商工團體 正式提出陳情書〉，《臺日》，1935 年 2 月 26 日，夕刊第 4 版。

¹²⁰ 〈日華の提携を天下に唱導す〉，《臺日》，1935 年 3 月 12 日，第 11 版。

¹²¹ 〈日華兩國國民提携の恒久的機關生る〉，《臺日》，1935 年 3 月 19 日，第 7 版。

¹²² 據說在懇談會上，因為華僑側多用當地方言，彼此語言不通，在缺乏通譯的狀況下，討論最終以臺灣話為中心。〈チンプンカン懇談會〉，《臺灣經濟タイムス》，1935 年 1 月 16 日，第 8-9 版。

¹²³ 例如 1937 年 2 月辜顯榮訪中後，直到 4 月時才向時任臺灣軍司令官畑俊六報告此事，而畑則猜測背後或許是總督府或海軍推動，顯然對辜氏訪中並不知情。伊藤隆，照沼康孝編，《畑俊六日誌》，頁 98-99。

面對軍部、右翼日人對日本精神的鼓吹，辜氏有何反應？1934年，辜氏獲選貴族院議員後，接受《昭和》記者訪問，對臺灣的政治方針表達如下的意見：

臺灣雖然同樣是日本的領土，卻是具特殊事情而重要之地，且是向南支南洋發展的立足點。我認為臺灣不能與內地同一視之，內地不必要的事情在臺灣可能會被視為是重要的，臺灣不必要的事情在內地卻可能是必要的，這種情況很多。例如，雖然有人認為漢文不必要，但在必須向南支南洋滿洲發展的今日，漢文不必要之說乃是錯誤的，而要去南洋的話就需要馬來語。這不過就是一例而已，總之須先認識臺灣的特殊事情然後再著手。¹²⁴

辜顯榮認為臺灣雖然屬於日本領土，但仍具有與日本國內不同的特殊性質，尤其須保存漢文，與前章所述《昭和》的傳統文人看法相似，對日本中心的說法有所保留。如同不甚相信日本精神的傳統士紳，往往呼籲中日兩國應平等相待，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辜顯榮的親善活動上。

1934年11月，辜顯榮致電李擇一，表示其欲訪問中國，希望與蔣介石見面，在蔣介石表達同意後，辜氏於12月啟程前往上海。¹²⁵此時正逢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有意改善對中關係，辜氏出發前也曾受廣田請託傳言給蔣中正、汪兆銘（1883-1944）等要人，內容為希望兩國關係未來能漸漸改善，建議可從福建、臺灣間的經濟合作開始，促成兩國全面的合作。¹²⁶由是觀之，辜氏此次訪問，毫無疑問是在廣田改善中日關係的計畫下所展開的民間外交。

他於12月11日抵達上海，14、15兩日先會見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1880-1936），辜氏首先告以四項日中必須親善之理由：第一，日本治臺政策相當成功，若中國願效法必能成為強國；第二，未來人種戰爭必會爆發，同為黃種的中日兩國必須提攜以保衛東亞安寧；第三，中國文化為日本文化之基，兩國同文，地理上則同兄弟，必須互相友愛；最後，經濟上日本為工業國，中國為農業國，兩國可互補所需。說明上述理由後，辜氏轉而攻擊西方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始作俑者，希望中國不要輕信歐美，改與日本合作。¹²⁷辜顯榮的發言，實際上呈現許多自身的思想，作為臺灣人，他的確親身體驗到殖民現代化的成就，而人種戰爭或中日同文等說法，早在《臺灣思想問題》一書即已出現，不只是場面話而已。

楊永泰聞之，雖大致同意辜氏的說法，卻強調中國排日之因不只在中國，也在日本，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政策愈加強硬，楊氏指出只有滿洲問題圓滿解決，中日才能親善。雙方談話之後都圍繞在滿洲問題上，楊氏批評日本得滿洲之後，又覬覦華北，強調日本應「放下屠刀」，而辜氏則堅持日本絕不會步

¹²⁴ 〈關係者と語る 辜顯榮翁の巻〉，《昭和》，1934年8月11日，第3版。

¹²⁵ 「李擇一電楊永泰」（1934年11月13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43-087。

¹²⁶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62-264。書中雖僅提及此係「某要路」之傳言，然據內容可推測為時任外相之廣田廣田弘毅。

¹²⁷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11-218。

步進逼，只要中國承認滿洲，日本將盡力扶助中國。¹²⁸雙方雖在滿洲問題上有歧見，但這次談話使楊永泰對辜氏留下不錯的印象，楊氏之後向蔣中正報告「辜顯榮人甚誠懇」，且「願為祖國效勞」，可利用辜之政商關係改善閩臺關係。¹²⁹

12月19日，辜氏再與汪兆銘會見，汪先表達歷經九一八事變、上海事變、熱河長城戰役等衝突後，中國國民對日激憤，因此政府對中日關係的改善必須慎重。辜氏的回應一樣圍繞在滿洲，強調滿洲係因日俄戰爭才得以保全，而「滿洲之失，事之至必也，唯有日俄之別，遲早之差」，希望中國洞見此事，迅速解決滿洲問題。

最後，1935年1月1日，辜氏與蔣中正會面，談話內容表面雖集中在「東洋固有道德」、「王道」上，實則與滿洲亦有關係。蔣氏先批評日本過去皆以霸道而非王道對待中國，尤其是滿洲問題便是霸道之成果，要求日本改變霸道之對中政策。辜氏雖然贊同蔣氏對王道的看法，但希望中國也能諒解日本因人口、資源問題，無法立刻行使王道。¹³⁰

1月12日辜氏返回東京，先受松井石根設宴洗塵，接著訪問陸、海相及各將領，又受參謀總長、軍令部長召見，20日與廣田會談，「時間較長，外相已允改變對華方針，積極援助鈞府」，且將於議會發表親善演說。¹³¹不過辜氏不單只是報告談話經過而已，他也承蔣、汪意旨，在探詢日方各要人意見後，向蔣報告日方態度：「（1）尊重中國禮義之邦，進行提攜，均滿意而無異詞；（2）少壯派行動過於出軌時，將以敕令制止之；（3）倘中國欲派人來日時，請勿再派日人無足重視之人」。¹³²

1月22日，廣田弘毅在眾議院發表演說，表示將以不威脅、不侵略原則進行外交，並強調日中關係的重要。¹³³25日，廣田接受議員質詢時，再次表示其「確信在任中絕不會發生戰爭」，日本將「基於萬邦協和的精神，徹底採行和平的外交方針」。¹³⁴另一方面，蔣中正於1月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同意中日雙方對關係惡化都有責任，並強調兩國提攜之重要性。以這些事件為契機，中日關係在1935年間開啟短暫的蜜月期。同年5月，中日雙方將駐外使節自公使升格為大使，6月國民政府通過邦交敦睦令，禁止排日運動，10月中日各派出經濟視察團，以促成經濟提攜。

不過，此後兩國關係發生改變。為了全面改善關係，自1935年1月以後中日雙方即就兩國國交之原則展開討論，日本方面於10月經外務、陸海三省協議

¹²⁸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18-228

¹²⁹ 「楊永泰電蔣中正」（1934年12月21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至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70100-00036-035。

¹³⁰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28-234。

¹³¹ 「辜顯榮函楊永泰」（1935年1月21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02-018；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301-302，中也收錄同一封信，內容大致相同，但日期似有誤。

¹³² 「外交部電蔣中正」（1935年1月26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02-108

¹³³ 〈広田外相の外交演説〉，《朝日新聞》（東京）1935年1月23日，夕刊第1版。

¹³⁴ 〈広田外相の平和宣言〉，《朝日新聞》（東京），1935年1月26日，第2版。

後，決定所謂「廣田三原則」，即（1）中國應徹底取締排日言行，脫離依存歐美之政策；（2）承認或至少默認滿洲國獨立；（3）協力排除赤化勢力，並向國府駐日大使蔣作賓提示，卻未能獲國府贊同。同年年底，國府在日本的反對下實施幣制改革，親日派的汪兆銘、唐有壬（1894-1935）相繼遇刺，而日本關東軍則在華北推動自治運動，兩國關係因此惡化。1936年9月之後，為了調整國交，日本駐中大使川越茂（1881-1969）與國府外交部長張群（1889-1990）展開數次會談，終因日軍部引起的綏遠事件而於12月破局。¹³⁵

在中日關係好轉期間，辜氏參與兩國間的經濟提攜，與軍部、外務、總督府及其他糖業人士交涉，以協助福建政府施行砂糖專賣及發展製糖業，¹³⁶1935年4月前往福州與陳儀會談，允諾將轉告總督府嚴加控管臺灣籍民。¹³⁷然如前所述，由於陳儀的提防，閩臺間的經濟提攜始終無明顯進展。

當兩國關係惡化後，1936年4、5月間，西南派曾遣使者至辜氏處，辜氏向松井告知此事，松井則建議他與西南接觸。¹³⁸1934年9月時，辜顯榮曾仲介臺大理農學部畢業生蔡雨澤（1906-1962）至廣西就職，協助軍部拉攏廣西的計畫。¹³⁹不過此時他卻與佐藤佐等人不同，對西南派不抱希望，在回信中，認為胡漢民去世後西南派必會被中央吸收，中國將達成統一。也不贊成以廣田三原則作為對中交涉的前提，如其所言，「滿洲國之承認，即使有其他的政府來代替蔣介石政府，依其國情也難以答應」，「要待滿洲國之承認後才進行親善固然是理想，然而顯榮認為這是不可能之事」，他強調漢民族向來稱頌仁政，因而日本應先以對蔣經濟合作拯救中國，施行德政，贏得人心，再以承認滿洲國為最終目的。¹⁴⁰

1936年12月初川越茂·張群會談破裂後，辜顯榮對決裂原因表達了其想法，大致呼應了上述回信中之內容。指出「日本認為，若先解決日本提出的原則性試探，則中國的提案自然成為枝葉問題」，而「中國認為，若能解決眼前的問題，則國民的情感得以緩和，以後才能針對原則性的提案來談判。由於雙方相持不讓，才能功虧一簣」。他強調自己致力「一邊緩和日方的態度，一邊壓抑中國方面抗日的浪潮」，在探查雙方態度後，「發現有互相禮讓的可能。這件事不管對東亞和平也好，對人類幸福也好，皆極為慶幸」。¹⁴¹

然而，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國府聯共抗日的姿態已逐漸成形。1937年2月，辜顯榮再次訪中，自稱日本新任首相林銑十郎（1876-1943）囑其以私人身分赴華，希望觀察國民黨三中全會之對日態度，出發前訪問海陸相、軍令部及貴

¹³⁵ 戶部良一，〈滿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收入《第1期「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東京：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2010年），頁10-18。

¹³⁶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305-306、313-314。

¹³⁷ 〈福州臺民最近之行動〉，《申報》，1935年4月26日，第8版。

¹³⁸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77。原信並無記載寄件者，但按內文判斷應是松井石根所寄。

¹³⁹ 〈蔡雨澤氏 廣西省政府に招聘さる〉，《臺日》，1934年9月3日，第2版。

¹⁴⁰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72-276。原信並無記載收件者，但對照內文及前封松井石根所寄之信，判斷應是致松井石根之回信。

¹⁴¹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330-332。

族院議長近衛文麿（1891-1945），均希望中日關係好轉。¹⁴²2月10日辜氏抵達上海，攜帶（1）修改關稅；（2）簽署日本優先於各國之飛行協定；（3）共同防共等三個要求，與中方討論。辜氏此行的任務，似在於試探西安事變後國府是否仍有意願與日本重啟談判。辜氏認為此三項要求對中國皆有益無害，不過，12日遭陳儀、李擇一激烈反對，僅答應願盡力溝通。22日與張群會面，席上張同樣激烈批評日本在華北的活動，經辜氏說明後，僅答應自主修訂關稅、考慮簽訂飛行協定、心理上共同防共等要求。其後數日，辜氏分別與汪兆銘、蔣作賓（1884-1942）等人來往，最後與孔祥熙（1880-1967）會面時，孔氏也強調日本應先停止在關內活動，中方才願回應。¹⁴³

其實，對照張群與川越茂會談時的提議，中方態度未有大幅改變，¹⁴⁴不過至少已讓辜顯榮感到中方仍願意交涉，尤其是他對蔣中正仍具有相當的好感。儘管辜氏此行並未見到蔣中正，在呈交貴族院的報告書中，就先強調「蔣介石乃東方道德之信奉者，在種種方面看起來都不容置疑」，結論中表示中國國民對「統一」具堅強的信念，「如同黃河決堤，任何東西都無法阻擋」，辜氏觀察到中國各界開始反對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針，追求自力更生，並復興舊道德和國粹，與日本明治維新相似。據此，辜氏建議日本率先協助中國統一、確保關內主權，並協助經濟建設，如此將能實現日、華、滿的經濟合作、攻守同盟，以重新建設東方文化。¹⁴⁵

雖然無法得知辜顯榮的建議是否對日本政界造成影響，但1937年3月佐藤尚武（1882-1971）出任外相後，決心更改對中政策，否定華北分治與造成中國內亂之工作，欲改採經濟提攜，壓制關東軍與天津軍的行動；同時派出兒玉謙次（1871-1954）率領之經濟訪中團。不過同年6月林內閣總辭，佐藤隨之退任，經濟提攜並未產生成果。眾所皆知，7月蘆溝橋事件爆發，中日兩國從此進入戰爭狀態。¹⁴⁶

綜觀辜顯榮數次訪中，顯示他的臺灣人身分使他成為中日溝通的管道之一，對日本而言，適當運用辜顯榮與中國政界的同族背景，向國府要人遊說，似乎更能使其打開心房；對國府而言，辜氏與日本政商關係良好，又「願為祖國效勞」，自然也希望利用其探聽消息或間接影響日方態度。那麼，穿梭於兩國之間的辜氏本人，又有著什麼想法呢？一方面，他在與中方來往時，從未損害日本利益，不斷告誡國府應放下滿洲問題，並積極以臺灣為樣本，向國府述說與日本親善的好處。另一方面，他對國府抱著明顯的好意，對西南派不抱希望，不認同廣田三原則，希望日本能先予以經濟協助，甚至協助中國實現關內統一。

辜顯榮的心理並不難理解，正如何彩滿指稱，對照中國同時期的混亂，享有

¹⁴² 「駐日大使館電外交部」（1937年2月6日）、「許世英電外交部」（1937年2月7日），〈關於改善中日關係〉，《外交部檔案》，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11-01-02-10-01-087。

¹⁴³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37-261。

¹⁴⁴ 有關該會談，詳見李君山，〈抗戰前中日「廣田三原則」談判（1935-1936）〉，《臺大歷史學報》37（2006年6月），頁217-265。

¹⁴⁵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235-237，261-262。

¹⁴⁶ 戶部良一，〈滿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頁20-22。

現代化成果的辜顯榮，在政治、國家認同上明顯效忠日本，但在文化、生活上卻堅持保持地方性，也就是臺灣的漢人傳統。對辜顯榮而言，兩者並不衝突。¹⁴⁷ 儘管他對自己身為日本國民一事毫無質疑，回頭觀察辜顯榮自 1920 年代以來的言論，早年受過漢學的辜氏，無論是在《臺灣思想問題》中提到的東洋文明，還是與中國要人屢次談及的東洋道德，在他眼裡都是指中國傳統，而非日本皇道精神，也因為這層關係，始終對中國抱有情感。在聽聞李擇一「慰問臺民」之語後「至於下淚」，或在致楊永泰信中所稱「痛故國之飄搖」，¹⁴⁸ 應該都是發露其真情，蔣中正等人的東洋道德、王道之說，顯然也讓他感到共鳴。如前所述，他在獲選貴族院議員後，強調臺灣具特殊性質，此不單指漢文傳統本身，更包括因重視傳統而對中國擁有的同情。恰如蔣渭水所言，臺灣人是「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日華親善之楔子」，此一背景呈現在辜顯榮的對中活動上，就是他採取了一種折衷的立場，希望協調兩國利害，用辜氏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致力「一邊緩和日方的態度，一邊壓抑中國方面抗日的浪潮」，促成雙方互相禮讓，如此不論是對「禮義之邦」的「故國」，還是對給臺灣帶來繁榮、封其為貴族院議員的日本，「皆極為慶幸」。

至於辜顯榮提出的折衷辦法，具體來說就是日本將以經濟合作、支持統一，換取中國放棄滿洲主權。然而，這種想法終究無法存在於中日兩國高漲的對立感情間。作為殖民地人民，辜顯榮或許感到實際的德政遠比名義上擁有滿洲來的重要，如其早年名言，「寧作太平犬，莫作亂世民」。不過，對中國人而言，滿洲主權絕不能放棄，辜氏兩次訪中也遭遇的反對也越來越強硬。西安事變發生後，困擾著國府多年的內戰問題大致解決，至此中國也無退讓的必要。另一方面，此辦法顯然也與激進的日本人士相左，1935 年辜氏訪中後，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佐藤佐向辜氏表示，「站在日本的立場，因為他〔蔣中正〕是負責人，所以只有打倒他，並將南京政權以及浙江財閥消滅，最後還必須將罪魁禍首的第三國勢力從中國驅逐出去」，辜顯榮聽聞此語，「眉間浮上一片愁雲」，不發一語。1937 年 7 月，蘆溝橋事件爆發，蔣中正發表廬山聲明誓言抗戰，日本軍部則希望趁機「對支一擊」，身處中國與日本兩團火之間的辜顯榮，於 12 月 9 日「在憂愁中與世長辭」。¹⁴⁹ 4 天後，南京陷落，中日間的戰火也越演越烈。

與辜顯榮站在政治對立面的新知識分子葉榮鐘，戰後回憶道「耀翁一生雖然受著日人深厚的庇護，但他的內心深處，仍然是沸騰著民族的熱血，他對於日人的態度與其說是敷衍，無寧說是一種交易較為洽切，這中間只有利害，並沒有情感」。¹⁵⁰ 或許因葉氏身處國民黨統治，又或許因葉氏基於對同鄉長輩的尊敬，其中「民族熱血」之評價或有幾分誇飾，然如上所示，辜顯榮自始自終都是忠於自身想法，以日本統治下具有「特殊事情」的臺灣人身分，思考著臺灣統治及中日關係。

¹⁴⁷ 何彩滿，〈辜顯榮的多重身分認同〉，《二十一世紀》112（2009 年 4 月），頁 102-112。

¹⁴⁸ 「辜顯榮函楊永泰」（1935 年 1 月 21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02-018。

¹⁴⁹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 576-578。

¹⁵⁰ 葉榮鐘，〈記辜耀翁〉，收入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頁 333-338。

第四節 小結

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外關係激化，總督府既有的南進政策勢必隨之改變。1932年，「大正南進」的重要推手原口竹次郎，因滿洲問題遭遇筆禍事件，象徵著軍部主導對外強硬的「昭和南進」即將到來。1933年松井石根來臺後，確立臺灣軍對臺灣統治的方針，將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為目標，亦即對內要促成皇道精神下的「內臺融和」，對外要追求與中國西南政權及南洋的提攜，用松井的話來說，就是「在內舉天皇統治之實，向外講求皇道宣布之途」。而擔負對外任務者，就是1934年成立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

協會成立前後，正逢閩變爆發及對岸領事會議舉行，考察各方在此期間的行動，就能理解臺灣軍如何具體落實此任務，以及總督府的反應。1933年對岸領事會議籌備時，臺灣軍的提案呈現其意圖向華南宣揚大亞細亞主義，並利用臺灣籍民對華南採取政治工作；閩變發生後，更實際展開行動，試圖使新成立的福建政府轉向親日、反共。另一方面，總督府在領事會議籌備時，對政治介入並不積極，歷經閩變後，也對策動反蔣工作不抱贊同，至於領事館則明顯對軍部行為感到不滿。各方意見的差異呈現於1934年對岸領事會議，總督府表明將以經濟南進，使館方面當面要求軍部反省，至於軍部提出的議案，各方都反應冷淡。

彼此立場的差異也反映在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運作上。協會幹部雖然包括臺灣民間之有力者，然而多數與總督府關係匪淺，甚至被認為是「御用紳士」，對大亞細亞主義也缺乏深刻認識。總督府透過官吏、「御用紳士」擔任協會幹部，事實上控制了協會的整體活動，將其限定在資訊交流的範圍。既然如此，真正向外實踐大亞細亞主義，就有賴協會成員各自的行動。協會中的軍部成員，依循松井的大亞細亞主義，閩變後仍未放棄提攜西南政權或福建內部的民軍勢力，推動其反蔣親日。高商教授佐藤佐同樣基於實踐大亞細亞主義的信念，推動協會內部改革，並親身前往中國、南洋推廣其理想。以軍部、佐藤佐為中心的積極南進勢力，雖然曾於1935年的珠諾號事件及熱帶產業調查會上與總督府爆發齟齬，終究未能讓總督府改變想法，1936年10月標榜南進的小林總督到任後，總督府官吏對大亞細亞主義的立場仍與積極南進派不盡相同，決定性的改變必須等到戰爭時才會發生。

相較於協會本部始終著重於交流，財政獨立於本部的高雄支會，其活動反而能直接反映在地日本人的想法，因而在對外活動上，與成員的事業擴張結合，特別重視與菲律賓的交流，在對內也舉行振興日本精神的活動。

臺灣人中最踴躍響應松井的大亞細亞主義者，是錦記茶行的陳清波，然而，從行動觀之，此一態度不只是單純基於愛國心而已，更與他自身的茶葉經營有關。至於辜顯榮，雖然身為協會顧問，但其中日親善的理想，與積極推動南進的人士不同。一方面辜氏從未損害日方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掩飾對蔣中正、國民政府的支持，蓋日本的皇恩雖然鴻大，但中國依然是「禮義之邦」、「故國」，因此辜氏始終採取一種折衷立場遊走在中日要人間，試圖促成雙方互相禮讓。當然，由於

中日間對立的情感，他的建議無法被輕易接受，兩國間的對立最終演變成戰爭。

陳清波、辜顯榮對大亞細亞主義表現出的自主立場，證實了《昭和》曾提出的質疑，那就是在日、臺人不協調的情形下，不宜對外從事大亞細亞主義活動。下章擬探討的主軸，將圍繞在如何實現臺灣內部日、臺人在皇道下的融和，亦即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意義上。

第六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內臺融和」：右翼團體與臺灣人之行動

自日本領臺以來，臺灣內部的民族關係一直是殖民政府深感棘手的問題。其中一個可行的解決之道，就是利用亞細亞主義，強調日、臺人同文同種的一體性，促進同化以化解民族對立。然而，從 1920 年代各種亞細亞主義議論中，只看到日、臺人民族對立的存續。1930 年代後，帶有強烈日本中心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成為熱潮，如何面對日本自身的殖民地統治，再次成為討論對象。理論上，作為日本「皇道宣布」的最初地點，臺灣人應該，也必須要能完全與日本人融和，否則即是否定了日本以皇道拯救全亞洲的可能性，但在實際上，歷經 30 餘年統治後，民族對立依然存在。本章即聚焦 1930 年代日、臺人展開的各種社會運動，觀察在臺日人如何修正這個失敗，臺灣人又如何因應。

第一節 民族問題與在臺日人右翼團體之興起

一、1930 年代臺灣社會的民族問題

儘管總督府長期以來致力於促進日臺融和，到了 1930 年代日臺不融和的現狀仍經常被輿論詬病。田中一二主導、右翼的《臺灣》以公學校漢文科復活運動一事，指責臺灣內部尚有「囚於人種偏見或偏於經濟利害，忘卻國民的自覺，傷害內臺人的親和之舉動」。¹中庸的《昭和》稱，「至今為止的內臺融和論多為桌上的空論」，希望日、臺人皆能排除鎖國、排他傾向。²立場偏自由派的《新高》也指出，臺灣內部民族意識的問題最為困擾，但眾人皆不願表明，認為日臺人應自由地表達對彼此的想法，否則永遠無法達成真正的融和。³儘管這些報紙的立場、重視焦點不一，但一致認為日臺人之間存在民族上的不協調。

軍部的情報可證實輿論的說法。1933 年 3 月，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後，總督府海軍武官井上保雄對臺灣的民情報告顯示，在臺日人一般認為退出國聯係屬當然，支持日本強硬對外的國策，然而臺灣人的情形則是：

現時本島人的一般想法，乃是對我施政無法充分感到滿足，反而因民族思想希望促成臺灣人的臺灣，僅是因不得已而滿足於現狀。

¹ 〈大和一體の結合〉，《臺灣》38（1934 年 6 月），頁 4-7。

² 〈お座なりの内臺融和〉，《昭和》，1933 年 10 月 21 日，第 1 版，

³ 〈民族意識と言論の自由〉，《新高》，1934 年 4 月 6 日，第 1 版。

對於現在時局，靠官憲嚴厲的取締與對內地人的顧慮一般都保持表面上的沉默，但絕非毫不關心，本島人同志間對時局仍感到緊張並有所論議。觀察其一般民情，資產家及所謂有力者希望維持現狀，與內地人略有同樣意志。又基層勞動者概對時局無關心，其他則有一般基於自己本位憂慮臺灣的將來而戰戰兢兢之人。其一部則顯示出對日本的成功反而不感歡喜的傾向。可以認為日本若處於國際上有利的立場，則滿足於維持現狀，一旦面對不利的情勢，或許會引起值得憂慮的情況亦難以預料。⁴

由上顯示，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面對外壓的局勢，未能有效促成日、臺人一致對外，反而凸顯出彼此抱有不同想法，只因取締才未呈現在表面上。日臺不融和的問題，不只殖民地統治或國防角度上務須解決，也與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息息相關。如第四章所述，1933年年底松井開始在臺組織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時，《昭和》即提出質疑，認為內部日臺不融和，又欲求對外的亞洲團結有如緣木求魚。⁵對於此種批評，佐藤佐也表示日臺融和同樣為大亞細亞主義之理想，蓋「對外宣布呼號大亞細亞主義，與追求內臺融和」，是「並行且相關者」。⁶

來臺推廣大亞細亞主義之松井石根自然也熟知此事，於是「在內舉天皇統治之實，向外講求皇道宣布之途」，乃是他期望達成的兩個任務。如前章所述，對於前者，松井籌組國防義會，促進社會教化協議會、舉行特種演習。至於後者，就圍繞在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活動上。然而，由於總督府對外採謹慎態度，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活動侷限在思想交流，欲真正對外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只能仰賴協會成員個人的努力。另一方面，1934年7月松井即將離任軍司令官前，對總督府的統治發表如下意見：

日本人向來有以己律人的習慣，但漢民族與日本人的國民性從根本上就不同。一概倡導同化政策等雖然看來十分了不起，但我看相當行不通。當然我清楚這本來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可能要花二世紀才能完成，不能現在馬上論斷成否，但當下連其曙光都很難說看得到。簡單來說，從南京政府的內心來看，滿洲或臺灣都要再次歸還到支那手中，所以日本對此需要有十分的準備。特別是臺灣的立場，不可徒然顧慮漢民族心情或以取悅為能事竟矣，此際必須要更以強氣對應（「此際」的意思，就是「瀕臨35、6年的危局前」的意思）。如近來頻頻受到論議的自治制問題，就我的見解來看，絕非此際應為之事。然而這也不是說全部都應壓制或採行搾取，而是希望從所謂皇道精神的大眼界出發實施統治。因此最近雖然有人提倡武官總督復活說，但未必是要武官，歸根究底，重要的是要有能宏觀此大局

⁴ 〈臺海秘第12号〉（1933年3月6日），《公文備考》，D卷7，外事，海軍大臣官房記錄，昭和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5022763500。

⁵ 〈亞細亞主義と我が臺灣〉，《昭和》，1933年11月4日，第1版。

⁶ 佐藤佐，〈內臺一如は我等の信條〉，《臺灣》39（1934年7月），頁37。

並處理事務的覺悟。⁷

松井談話的主旨，顯然是在攻擊總督府同化政策的失敗。失敗的原因，則是總督府誤認為以統治日本人的方式統治臺灣人，甚至採取顧慮或取悅臺灣人的政策，臺灣人就會同化。松井不否定同化政策，但認為只有基於皇道精神，強勢地對臺灣人實行統治，未來才有可能實現，尤其是面臨國際危局的當下更應如此。不久松井雖對來訪的楊肇嘉（1892-1976）辯解，所謂「漢民族」是指中國的漢民族，「本島人雖然原來是漢民族，但現在是日本國民。希望本島人能早日拋棄自己是漢民族的感覺」，⁸實則根本論旨不變，仍欲強勢地使臺灣人完全接受日本統治。同年8月松井離臺前，表示臺灣的物質、經濟成就大多是受到日本的恩澤，政治、經濟、對外設施皆受補助，且不負軍事費、兵役義務，對日本國內的貢獻很少，希望舉國一致對外時，臺灣住民能深切反省與覺悟。⁹此後，松井雖然回國擔任軍事參議官，仍未放棄介入臺灣政治，1934年8月，他回日本國內後不久，便向岡田啓介（1868-1952）首相建議臺灣自治制應暫緩施行。¹⁰12月又與平塚廣義總務長官在東京的總督府出張所面談，¹¹詳細內容雖不清楚，但輿論認為他在回日本後，成為反對臺灣地方自治制改正的急先鋒。¹²

松井的發言招致臺灣人的不滿，《新民報》認為東洋民族團結、大亞細亞主義的根本精神，應該是要平等聯絡漢民族、印度民族，「不宜出強氣以制壓的態度」。同樣的，「治臺灣的第一要諦，也不過如此」，指出實現日臺融和的唯一辦法，就是日臺平等待遇，希望松井未來能重新認識臺灣。¹³相反的，右翼的《臺灣》對松井的言論表示歡迎，評論道：「強力的統治不必然是壓制，強力而仁慈乃是政道之上乘、本質」，也是統治異民族、促進融和同化時最重要的一件事。¹⁴對臺灣人而言，無論是亞洲民族的團結，還是日臺人的融和，都只有靠平等待遇才能實現；但在臺日人則與松井抱有同樣想法，認為總督府過去對臺灣人過於寬容，以至於臺灣人始終不願主動同化成日本人，與日本人「融和」。如軍部的民情報告顯示，面對九一八事變後的國家危機，在臺日人一致表現出團結對外的愛國態度，然而臺灣人卻非如此。不滿於臺灣人此種態度的在臺日人，遂於1930年代紛紛組成右翼團體展開行動。

⁷ 〈漢民族に對しては モット強氣に出よ〉，《大阪朝日新聞》，1934年7月21日，臺灣版，第13版。

⁸ 〈自聯理事楊肇嘉氏 松井將軍を訪問〉，《新民報》，1934年8月4日，版次不明，收於〈新聞拔粹帳自治聯盟所關之件 其貳〉，《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4_10_0021902。

⁹ 〈國防の重要性を島民は認識せよ〉，《臺日》，1934年8月3日，夕刊第1版。

¹⁰ 〈臺灣地方自治制の擴充は時期尚早〉，《臺南新報》，1934年8月25日，版次不明，收於〈新聞拔粹帳自治聯盟所關之件 其貳〉，識別號：LJK_04_10_0021902。

¹¹ 〈反對運動を押切つて 自治制改正案登場〉，《南日本》，1934年12月21日，第8版。

¹² 〈本格的に乗出した 新自治案問題〉，《南日本》，1934年9月14日，第8版。

¹³ 〈松井前軍司令官本日離臺〉，《新民報》，1934年8月（推定），版次不明，收入李承機主編，《六然居存日刊臺灣新民報社說輯錄 1932-3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9），頁4-306。

¹⁴ 〈本島統治上の一考察〉，《臺灣》40（1934年8月），頁17。

二、在臺日人右翼的「皇道政治」理想與大亞細亞主義

在 1930 年代的國際危局下，基於對臺灣人的不滿而生的在臺日人右翼運動，根據警務局的說明，具有 4 個特徵：(1) 主要攻擊對象，乃是以民族自決為終極目的之臺灣人社會運動；(2) 文官總督制也是其批評對象，認為文官總督制往往受政黨政治影響，採取自由主義的統治政策，使臺灣人在經濟上壓迫日本人；(3) 基於九一八事變後國際情勢的演變，強調臺灣在國防及南進國策上的重要性；(4) 受到大亞細亞主義運動的影響。¹⁵

至於右翼運動的組織特徵，則是缺乏有力之指導者，活動甚至呈現暴力團體的色彩，支持者則是基於社會地位、環境，極為侷限的一部分。¹⁶也就是說，右翼團體的主要成員，並非在臺日人的上流階層，大多是自認為在經濟競爭上因總督府錯誤政策而不敵臺灣人的基層人士。作為在臺日人中的弱勢者，其最初的攻擊目標並非是臺灣人，而是總督府及資本家。以山下好太郎（《四國民報》臺灣支社記者）為主幹的「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社研，1935 年 1 月後改名為皇政宣揚會），正是其中最活躍的右翼團體。

社研的前身為 1930 年 8 月成立的「臺灣借家人組合」，其標榜增進臺北市內日本人小商工業者之福利，¹⁷目的在於以多數借家人（房屋承租人）的團結，確保居住安全，對抗少數家主（房東）的橫暴，以拒付房租、演講等活動推動調降房租。¹⁸ 1931 年 7 月，組合幹部山下好太郎等人遭在臺日人房東提告不法占有，要求歸還房屋。由此可見，其最初反對的目標係在臺日人之上流階層而非臺灣人。¹⁹ 基於這種對抗社會不公的改革理想，其最初合作對象除唐澤信夫等在臺日人外，還包括臺灣自治聯盟（自聯）。山下曾在自聯的集會上發表演講，主張現行的自治制度無視大眾輿論，呼籲臺灣島民一同團結，向總督府要求即時確立真正自治制。²⁰

1930 年 11 月，山下好太郎等人為了進一步廣泛探究社會問題，開始著手結成「社會問題研究會」，1931 年 3 月，舉行「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大會。²¹成立之初的活動，不過就是每月集會 1、2 次，批判研究社會問題而已，並未積極向大眾擴大運動。直到 1932 年夏之後，開始舉行時事演說會等外部活動，同年 11 月正式發表主義綱領、改正規約，逐步向大眾進出。²² 1933 年 4 月，社研獲總督府認可為政治結社，並於 7 月召開總會，推舉鎌田正威為理事長，並與日本國內右翼提攜。鎌田為前總督府官吏，1927 年退職後擔任總督府控制之福州

¹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頁 1336-1337。

¹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37。

¹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39。

¹⁸ 〈臺灣借家人組合本月中旬に發會式〉，《臺日》，1930 年 8 月 8 日，夕刊第 2 版。

¹⁹ 〈借家人組合幹部の公判〉，《臺日》，1931 年 7 月 14 日，第 7 版。

²⁰ 〈大眾の力〉《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館藏 識別號：LJK_04_05_0121094。確切演講時間不明，但應是 1932 年 8 月之臺北支部第二回大會，一同演講的還有隨後轉向右翼之土屋米吉。

²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39-1340。

²²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臺北：皇政宣揚會，1936 年），頁 85。

《閩報》館主，1931 年辭職回日本，專注神道修行。鎌田獲推舉後，於 1933 年自日本重返臺灣，設立「維新社」推廣神道信仰，²³其後，運用其廣泛人脈，協助臺灣日人右翼推展活動。²⁴

在 1933 年 7 月總會上，社研更新綱領如下：

- 一、我等作為陛下忠良之赤子，主張於帝國內行使平等生存權，以期國民生活之安定。
- 二、我等自恃為日本帝國之國民，欲促進作為帝國南方生命線之臺灣所有機構完全發達，以期皇道政治之徹底。
- 三、我等將檢討吟味與臺灣有關之諸問題，在公正之批判下促進解決之，以期社會正義之實現。²⁵

而其宣言則強調在此國難之際，臺灣未能「充分發揮作為帝國版圖之機能」，「儘管具有帝國南方生命線之最為重要的特質，卻在一切事物的根本要諦之國家觀念與國民精神上遲緩頹廢至甚」，因而其使命就是「一任日本國家主義之徹底樹立，助長促進臺灣全部機構之完全發達，以普遍化一視同仁的聖旨，期確立皇道政治」。如上述綱領宣言所示，受到九一八事變後國際情勢的刺激，社研的立場轉向右翼，除了原有的確保平等生存權外，開始主張徹底「皇道政治」，發揮臺灣「南方生命線」的意義，合作對象也從自由派日人、自聯改為國內右翼之大日本生產黨。²⁶

1935 年 1 月，社研改稱為皇政宣揚會（皇政會），其綱領如下：

綱領

- 一、期望確立南支之治安維持，永遠保證臺灣之和平。
- 二、期望移住大和民族貳百萬人至臺灣，達成皇道政治之完璧。
- 三、期望進行經濟機構之改組，並為保持均衡根本改革稅制。
- 四、期望改善教育方針，徹底日本精神。
- 五、期望充實陸海軍備，確保帝國南方生命線。²⁷

其宣言則認為臺灣歷經 40 餘年統治，但一般臺灣人之「國家觀念及國民精神」仍不徹底，而「皇國肇世之大業，炳乎如日月，就算異種異民族，一度浴其治下，亦立即受同化啟發而渾然成形為我大和民族」，因此希望將此種「皇政」反映在臺灣統治上，以達成「昭和維新」。²⁸

皇政會的綱領原為社研之「五大目標」，²⁹此時改成新綱領，不再提及「平等

²³ 有關維新社，詳見王麒銘，〈日治時期臺灣的神道信仰團體——以維新社為中心〉，《臺北文獻》168（2009 年 6 月），頁 89-130。

²⁴ 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下冊，頁 628-638。

²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41。

²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40-1344。

²⁷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封面後頁 6。

²⁸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封面後頁 5。

²⁹ 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破邪顯正》（臺北：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1934），封面後頁 3。

生存權」、「社會正義」，顯示皇政會已完全定調為右翼愛國團體，活動重心完全放在實際從事的右翼運動上，宣言亦集中在促成皇道政治及臺灣人的同化。

社研（皇政會）出現之背景，源自於在臺基層日人種種的苦悶，首先是經濟上發展的失敗，其雖以殖民者之姿來到臺灣，實際卻因總督府的冷落而陷入經濟困境，山下指稱：「在公園等地睡著的流浪漢，全都是日本人，而臺灣人一人也沒有。」³⁰這種不滿，隨著九一八事變後日、臺人愛國心的差異而更強烈。在其眼中，不愛國的臺灣人卻比愛國的在臺日人擁有更好的經濟地位，絕非「內臺融和」的狀態，因而主張翻轉此一現狀，以增強在臺日人的經濟地位，並促使臺灣人徹底同化。

第二種苦悶，則是大亞細亞主義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本於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臺灣人「皇化」與否，關係到日本是否能進一步成為亞洲盟主，而臺灣的地理地位也與日本南進、以「皇道」解放亞洲有關。然而在現實上，擁有日本精神、擔負南方國防重任的在臺日人卻被忽視而缺乏實力，於是臺灣人也不願接受日本精神。欲解決此問題，只有加強日人勢力，使臺灣人甘心仿效日本人，接受皇民化。³¹

如社研幹事森政禧希望「死守作為帝國南方生命線之臺灣，同時使真正的日本精神根植於新附同胞之五百萬島民，鞏固皇國日本之礎，進而策往南支、南洋之進展，更以特種民族為契機策東亞的大同團結，以確保東洋的和平」。³²皇政會幹事有末貞一也稱，皇民化的徹底將使「國防完備，內臺人俱得安住於樂土，而全東洋的有色人種將能謀求增進福祉」。³³也就是說，臺灣人接受皇道精神一事，將成為日本對外促進東亞團結的契機，也是日本舉國一致南進拯救亞洲，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之前提，正是呼應松井等人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之對內意義。

在思想上與松井類似，以促進「皇道政治」為理想的社研，其具體活動圍繞在松井離臺前提及的地方自治制與促進武官總督問題上。隨著自治制於 1934 年後漸漸具體化，社研於 8 月展開反對運動，在臺灣召開座談會、演講會，在中央則以「臺灣愛國聯盟」的名義向各大臣提出反對自治制之建言書，與日本國內右翼之生產黨、右翼議員小池四郎（1892-1946）、江藤源九郎（1879-1957）等人合作，反對自治制的成立。³⁴其理由乃是臺灣人缺乏政治能力，民族性上重視經濟個人主義，且尚未「體得皇國的大精神」，實施自治只會讓多數「愚眾」被少數人引導產生反國家、反日本人的思想，引起日、臺民族的對立。³⁵在反對自治制的背後亦有臺灣軍現職軍人，包括長勇（1895-1945）等「皇道派」中堅軍官的支持，³⁶其主張與右翼團體相同，認為國防之充分需要全島民的「皇民」（スメラミタ

³⁰ 〈臺灣に於ける社會運動の現状〉，《社會運動通信》，1934 年 3 月 28 日，第 2 版。

³¹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頁 2。

³² 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社會》（臺北：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1933），頁 22。

³³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頁 39。

³⁴ 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頁 632-638。

³⁵ 〈自治制反對の意見書手交〉，《社會運動通信》，1935 年 1 月 16 日，第 1 版。

³⁶ 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頁 632-664。

ミ)化，只有皇民化實行後才可實施自治制，且絕對禁止自由主義政治家進入。³⁷

反對自治制的目的，乃是消極避免皇道政治被民族對立或「自由主義」玷汙，而武官總督制的促進就是要積極促成皇道政治。1933年11月，社研向首相及陸、海、拓相提出建議書，攻擊文官總督下政黨政治的弊害及在臺日人的衰退，「立於國防尖端之本島統治，若依現狀推移，實是皇道政治之虐殺」，主張以強力之武官總督從根本改正。³⁸ 對於這些活動，總督府自然感到不滿，不只反對自治制的演說會屢遭禁止，³⁹山下好太郎則因違法散發主張武官總督制的印刷物，依臺灣出版規則遭到取締。⁴⁰ 除此之外，1935年4月皇政會欲舉辦演說會攻擊天皇機關說時，同樣遭總督府於事前要求中止。⁴¹

從根本心理上來看，社研對臺灣人抱有相當之敵視、輕蔑、不信感，要求以武官總督強力統治之。另一方面，對皇道的強烈信仰又讓他們不得不強調同化的可能性，這也連接到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例子是土屋米吉於1933年呈給拓相、陸相的請願書。土屋原為臺北帝大的學生，於1929年入學，1931年退學投入社會運動。與山下相同，土屋最初與臺灣人的社會運動有所往來，在自聯臺北支部擔任書記，1932年8月與山下一同在自聯臺北支部的演說會上演講；⁴²10月左右，土屋開始改變想法，傳聞他「對於自聯、新民報，頻頻操弄法西斯式的言詞」，甚至打算暗殺「某首領」、燒毀「某報社」，因而遭警方訊問。⁴³ 1933年，土屋開設普泉社以救濟在臺日人流浪漢，之後經常參與社研的活動。

請願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反對自治制及促進武官總督制。其開頭即強調日本殖民地統治的精神乃是「同化主義」，但並非指缺乏批判地移入本國的文化制度，而是要以「使殖民地土著人透過血液融合入本國人」為最終目標，也就是讓臺灣人願意透過通婚、改姓等方式積極成為大和民族的一部分，但目前則是臺灣人逐漸建立其民族意識。因而其主張只有透過武官總督施以強力的統治，禁止自治制及其他臺灣人要求的改革，臺灣人才能在壓力下自覺、自發地認識皇道精神，成為日本人的一部分。結論表示：「我確信日本擁有將符合日本之同化主義在現實上實行之使命。尚且若日本無法使臺灣人、朝鮮人、滿洲人真正成為日本人，則無法成為東洋盟主，也無法成為世界之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擁有能充分同化彼等的民力，認識到此事的我等，將贊成真正即於大和民族性之殖民地統治方策，

³⁷ 土屋米吉，《臺灣第一回選舉の考察》（臺北：土屋米吉，1936），頁69-70。

³⁸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頁12-13。同一份文件，也收錄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47-1348。

³⁹ 〈臺灣議會請願と自治制施行問題〉，《社會運動通信》，1934年10月6日，第1版。〈臺灣自治制反對 愛國聯盟猛運動〉，《社會運動通信》，1934年10月28日，第1版。

⁴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47。有關此案，山下於二審遭判罰金30円，三審於1935年5月確定，但最終判決不明。皇政宣揚會，《真の叫》，頁105-107。

⁴¹ 〈走馬燈〉，《昭和》，1935年4月20日，第9版。

⁴²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臺北支部二次大會〉，《臺日》，1932年8月3日，第8版。

⁴³ 〈臺灣の主都臺北にこの白色テロあり〉，《經世》，1933年1月15日，第8版；〈白色テロの真相〉，《新高》，1933年1月27日，第2版；〈白色テロの真相〉，《南瀛》，1933年1月28日，第2版。

但對不當之方策，如這次地方自治制改革，則絕對反對。」⁴⁴如上所示，在臺日人右翼相信，基於皇道精神、大亞細亞主義理想，臺灣統治必須基於同化政策，使漢民族自發嚮往成為日本人的一員，而在臺灣人民族意識漸漸凝聚的當下，唯有依賴強力的統治，真正的「內臺融和」，也就是指臺灣人與在臺日人皆樂於身為日本人的情況才能夠實現。

三、南下的國內右翼團體與南進的理想

山下原先從事的社會運動，乃是以上流階層日人及總督府為對抗日標，因九一八事變而右傾化後依然受總督府壓迫，未能獲得有力日人之支持。換句話說，雖然社研（皇政會）的皇道政治理想基於軍部所倡導之大亞細亞主義，卻不能獲得大亞細亞協會的支持，蓋協會以對外活動為首要目的，加上多數成員、主要活動皆由總督府掌握，自然不可能予以支持。即使協會中最積極的佐藤佐促進同化、推廣皇道精神的理想與右翼類似，對過去同化的成效也有怨言，但具體建議較溫和，認為促成臺灣人前往日本國內觀光，欣賞日本的傳統文化最為有效。對武官總督運動，佐藤亦不表贊成，更認為「與本島人爭區區眼前之利，誇耀低級之優越感，在個人競爭敗退後要求、希望當局的援助」，乃是「缺乏大國民之資格的弱少民族」所為。⁴⁵作為在學術界工作的知識分子，佐藤的說法多少表現出對右翼運動不齒的態度。

既然難以獲得在臺日人有力者支持，更不可能與自由派日人、自聯合作，在臺灣陷入四面楚歌的社研，只能與日本國內右翼聯絡尋求支援。1933年5月，社研主幹山下好太郎、理事小佐井益次等人前往東京與大日本生產黨（以下簡稱生產黨）、日本國家社會黨聯絡尋求支持。10月，生產黨派遣八幡博堂（生產黨常務理事）等人組成遊說隊至臺灣各地演講。1934年4月，山下再次招聘遊說隊來臺演講皇道精神，成員有高田豐樹（皇道會顧問、預備陸軍中將）、高鍋日統（生產黨員、日蓮宗僧侶）、山本昌彥（生產黨常任委員、生產黨機關紙《改造戰線》主筆）。這兩次的演說雖讓社研陷入財政困難，但成功確立與日本國內右翼的連結，同時促使日本國內右翼開始重視臺灣問題。1934年，皇道會發表「臺灣問題之概要」，認為臺灣統治必須清掃政黨政治的遺弊，提升日本人的發展，才能使臺灣人停止反母國的風潮，促成精神同化。⁴⁶

與山下接觸後，生產黨於是進一步來臺發展組織，1935年5月，生產黨在臺北設置臺灣事務局，由本部常務橫尾武雄常駐，⁴⁷橫尾同時是千代田通信社及拓南新聞社臺灣支社長，兩者皆由生產黨幹部主導。⁴⁸正值珠諾號事件，生產黨

⁴⁴ 高江洲昌哉，〈土屋米吉「嘆願書」（昭和8年）〉，《東アジア近代史》9（2006年3月），143-153。

⁴⁵ 佐藤佐，〈同化政策の再吟味〉，《臺灣》38（1934年6月），頁10-12。

⁴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44-1353。

⁴⁷ 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編纂委員會，《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東京：大日本生產黨，1941），頁198；〈生產黨事務局 千歲町に設置〉，《臺日》，1935年7月20日，夕刊第2版。

⁴⁸ 千代田通信社由生產黨幹部吉田益三任社長、八幡博堂任總務；拓南新聞則是由生產黨之八幡博堂、鈴木善一、小野義德等人所創。田辺三郎等編，《愛國運動闘士列傳》（東京：新光閣，

隨右翼團體一同展開攻擊辯護律師的運動。7月，對臺灣統治問題，生產黨黨務局作成聲明書發送至各方面，批評文官總督制的軟弱政策，期待強化南方生命線，希望實施武官總督制。⁴⁹ 10月，生產黨幹部八幡博堂來臺舉辦批評時事問題之巡迴演講會，10月22日臺北場講者除八幡外，還有橫尾武雄、佐川安一（生產黨）、緒方武歲（《經世》記者、皇政會）、清水紀與治（生產黨）、山下好太郎等人，眾人分別就天皇機關說事件、珠諾號事件，攻擊總督府、官僚、民勅的態度。最後，八幡以國際情勢急迫，批評總督府在珠諾號事件的行動，進而轉為攻擊文官總督，提倡武官總督制，演講會因而被終止。⁵⁰ 生產黨在來臺後，與皇政會密切聯繫，共同展開改革臺灣統治的運動，其後八幡也承認皇政會幹部與生產黨事務局幹部多所重疊，存在著二重組織的情況。⁵¹

不過，生產黨來臺擴張勢力的目的並非如此而已，更存在著南進的意義。如第四章所述，九一八事變後生產黨開始鼓吹驅逐白人勢力、復興中國及亞洲。1933年八幡受邀來臺演講，回日本後籌組「臺灣研究會」，成員之一的山本昌彥則於1934年來臺演講，並於1935年出版《躍進臺灣之現勢》，該書首章即強調當此日本將與白人列強對抗之時，國民都必須認識到臺灣在國防、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⁵² 1935年5月八幡來臺籌辦臺灣事務局時，亦表示「北方已由滿洲事變大致整頓好了，之後將漸漸關心南方，頭山〔滿〕總裁也有相當抱負，但必須先以臺灣作為起點，採行立足在大亞細亞主義之南方政策，致力於南方開發」。⁵³ 1936年2月，橫尾武雄以千代田通信社臺灣支社名義，邀請剛訪菲歸臺之酒井武雄（海軍武官）、上田宏堂（《臺日》記者），以及佐藤佐（高商教授）、原口竹次郎（督府調查課長）、坂本龍起（督府外事課長）、水越幸一（前臺中州知事）等熟知南洋事務的官民，舉辦「以獨立問題為中心談論菲律賓」座談會，期待使日本國民更認識南方實情，具體化日本的南進。⁵⁴

1936年4月，一個名為「拓南社」的組織，在生產黨臺灣事務局所在地成立，其趣旨強調為了實行南方國策，必須從事基礎的調查並養成人才，「拓南社」之目的為「以大日本主義為指導精神」，「訓練養成將成為此南方發展之人基的青年」。預計從事的事業，包括開設私塾、講習會、演講會以涵養國家觀念、普及南方事情，亦有開設農園、促進移民，以及進行華南、南洋之調查研究、人才派遣斡旋等。⁵⁵

1936），頁48、176-177、185-186。

⁴⁹ 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編纂委員會，《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頁202。

⁵⁰ 〈時局批評演說會〉，《臺日》，1935年10月23日，第11版。〈生產黨演說會を聴く〉，《臺灣時事新報》，1935年10月25日，第8-9版。

⁵¹ 〈大日本生產黨が臺灣に黨務局〉，《臺日》，1936年11月11日，第7版。

⁵² 山本昌彥編，《躍進臺灣の現勢》（東京：改造日本社，1935），序11-14、頁1-7。

⁵³ 〈八幡總務談〉，《臺日》，1935年5月17日，第7版。

⁵⁴ 日刊千代田通信社，《獨立問題を中心に比律賓を語る》（東京：日刊千代田通信社，1936），序。

⁵⁵ 日刊千代田通信社，《獨立問題を中心に比律賓を語る》，版權頁。其暫時事務所所在千歲町1之20，與生產黨臺灣事務局相同。〈生產黨事務局 千歲町に設置〉，《臺日》，1935年7月20日，夕刊第2版。

1936年6月，八幡在東京開設「開南俱樂部」，⁵⁶創立趣旨與「拓南社」相仿，強調日本之命運乃是「邁向大亞細亞民族間毫無隔閡地相互依存、共榮共存發展」，而南洋亦必須成為東洋經濟圈之一環。當務之急為調查研究、人才養成，以及資本、技術進出等基礎活動，而「開南俱樂部」之目的為「大幅振起輿論，協力促成南進國策之樹立遂行」。⁵⁷

顯然的，「拓南社」與「開南俱樂部」都是在生產黨的傘下，為了實現其南進理想而成立的組織。訓練南進人才，雖然是兩者共同的目的，但臺灣的「拓南社」在訓練人才上有相對具體的計劃，且與在臺日人右翼的希望結合，重視涵養國家觀念，並將促進移民事業；至於日本的「開南俱樂部」，則有大幅振起國內輿論的任務，兩者活動恰成互補關係，顯示生產黨是基於一定的計畫開展在臺灣的活動。

隨著日本國內右翼來到臺灣，臺灣右翼運動已非僅反對臺灣內部之臺灣人、總督府、日人上流階層的運動，而是與日本帝國整體的南進連接，臺灣作為南進基地、國防前線的意義受到矚目。如前所述，意識到此點後，在臺日人對於促使臺灣人日本化，以鞏固南進基地的想法也更為堅定。

第二節 東亞共榮協會與臺灣人之日臺融和理想

一、自治聯盟與大亞細亞主義

如第四章所述，異於日本人以日本精神為核心，無論是《昭和》的傳統文人，還是《新民報》的新知識分子，都認為亞洲的團結端賴平等、尊重亞洲各國的文化，尤其認為漢學、漢文才是亞洲傳統所在。如前述《新民報》對松井的批評，在臺灣人眼中欲對外促成亞洲團結，只能以平等的態度面對中、印民族實現，於是對內的日臺融和自然只能透過日、臺人的平等待遇達成。類似 1920 年代的情形，此一思想再次與知識分子從事之社會運動結合，首先是地方自治的改革運動。

1930年8月，以「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為單一目標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自聯）成立，當左翼運動逐一被鎮壓後，自聯成為知識分子主要的社會運動組織。為盡速達成目標，成員除了原先民族運動的同志外，亦接納中立派、御用紳士，以及在臺日人。¹在自聯的努力下，促進地方自治制度事實上成為多數臺灣人共同理想，連立場顯然親日而未參與自聯的臺灣人也多表示贊成，恰好

⁵⁶ 〈開南俱樂部創立さる〉，《臺日》，1936年6月21日，第2版。

⁵⁷ 日刊千代田通信社，《獨立問題を中心に比律賓を語る》，封面後。

¹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下）》（臺中：晨星，2000），頁504。

與在臺日人右翼的反對形成對比。辜顯榮獲選貴族院議員時，明確表示贊成自治制，認為自治制是對在臺日人、臺人民權的尊重，且實行後絕不會對統治造成危害。²陳清波則於 1935 年 2 月與許智貴（州議）、謝唐山（市議）、呂阿昌（醫師）等臺北中堅人士，結合大稻埕青年團、北區保甲協會、臺北商工會、大亞洲黎明會等 10 個民間團體，計 5000 人，組成「自治制改正促進會」，主張臺灣人正致力體悟日本的國體觀念，政府應賦予公民權。³

自聯成立一年後，九一八事變爆發，大亞細亞主義潮流興起，知識分子如何將之與自聯既有的目標結合。1932 年滿洲國成立後，自聯領袖楊肇嘉發表題為「臺灣問題與東亞之大局」之演講，內容要旨如下：

滿洲國在日章旗的掩護下，發出了其呱呱的第一聲。滿洲為日本之生命線，其經營之得失，與日本之盛衰甚有關係。

滿洲經營的要諦在於先得其民心，而日本的政治家果真有其雅量與手腕嗎？在此觀察臺灣的現狀，日本經營臺灣已歷三十有八年，至今連地方自治都尚未能完成，如此臺灣統治能稱作成功嗎？對於統治三十八年間至今的臺灣住民，連最基層政治權利之地方自治都不給予，這樣難道認為能經營滿洲國嗎？更何況日支親善，東亞盟主等，光是說出來就感到難為情。而滿洲國人民如何看待這個現狀呢，此為不言而共明瞭之事。

因此先從臺灣的問題開始解決吧，讓臺灣住民擁有其應擁有的事物吧。地方自治制的改革大概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然而此係所有政治權利之端緒。先完成地方自治吧。我相信當這件事在臺灣落實，其後必將發生的日支之提携及東亞之盟主，才開始成為可能。⁴

上文中，楊肇嘉指責日本在臺灣連地方自治都不願實施，顯示出臺灣統治相當失敗，指出日本必須先改革臺灣統治、實施自治制，才可能對外贏得滿洲、中國，甚至亞洲各國的民心。楊肇嘉所言呼應了《新民報》的看法，認為無論是日臺融和還是大亞細亞主義，只有靠以雅量善待，賦予其應有的平等待遇才能實現。1932 年底當國際聯盟問題告急時，楊肇嘉再以臺灣人屬於漢民族，且地理接近南華南洋，適合成為「日華融和的楔子」，而「臺灣的進步發達間接或直接地貢獻日華兩國的融和親善」，呼籲實施自治制。⁵

對於日本治臺的成果，知識分子與在臺日人實際上有著相同觀點，認為現狀為臺灣人不滿日本統治，而日臺人亦不融和。大亞細亞主義來臺後，雖然促使彼此意識到唯有日臺融和才能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卻突顯既有的差異。兩者對發生

² 〈關係者と語る 辜顯榮翁の巻〉，《昭和》，1934 年 8 月 11 日，第 3 版。

³ 〈自治制改正促進會を結成〉，《新高》，1935 年 2 月 8 日，第 3 版；〈自治促進大演說會〉，《昭和》，1935 年 2 月 9 日，第 8-9 版。

⁴ 〈臺灣問題ト東亞ノ大局〉，《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4_05_0191175。

⁵ 〈臺灣を見直せ〉，《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4_05_0321217。

原因與解決之道，其意見、行動正好相反，一方強調須以強勢迫使臺灣人主動融和，一方則認為只有施行善政、賦予權利才能達成。隨著 1933 年後在臺日人右翼運動逐漸成形，特別是松井石根上任後軍部開始基於大亞細亞主義活動，力圖以強硬手段促成「內臺融和」，反對改正地方自治制，日人右翼亦隨之展開促進武官總督、反對自治制運動。在此背景下，目標與日人右翼立場完全相左的自聯，顯然無法再以大亞細亞主義的說詞贏得在臺日人的支持。此時應運而生的新組織就是東亞共榮協會。

二、東亞共榮協會的誕生

有關東亞共榮協會，過去已有何義麟基於《灌園先生日記》及《臺日》之研究，該文論點對本文裨益良多，本文則另外再以清華大學之葉榮鐘典藏及各週刊的報導，補全東亞共榮協會之活動概況。⁶

東亞共榮協會是 1933 年 12 月陳炘（1893-1947）與宮原武熊（1874-?）兩人主導成立，背後則有臺中州知事竹下豐次的支持。陳炘早年留學美國，1925 年自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國後致力於臺灣本土金融業的發展，自 1927 年開始，長年在林獻堂等人創辦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擔任專務取締役，主導實際經營。此外，陳炘對文協、民眾黨、自聯等右派知識分子的活動亦無役不與，毫無疑問是日治時期臺灣人社會運動中的重要人物。⁷另一方面，宮原則是留德出身，在臺中開業之眼科醫生，性格強硬，民間有時以「莫那魯」（モーナル）⁸之綽號稱呼。⁹他對臺灣人的看法，張深切（1904-1965）形容是「視臺灣如希忒拉之視猶太人，最痛恨臺灣的社會運動家」，¹⁰

張深切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不過，1932 年 12 月臺中州協議會，宮原曾就公學校之漢文廢止與陳炘發生衝突。宮原主張廢止，認為「漢文是時代落伍之事物」，不便又跟不上時代，且有害於日語普及，當然應廢止。對此陳炘反駁稱，「漢文至今仍是本島人實際生活上不可欠缺之事物，書信、日用帳簿悉用漢文。若公學校畢業生不了解亦不學習漢文，將一無是處」，主張應增加預算獎勵漢文，看法完全與宮原相左。眼見雙方即將爭執，竹下知事出面圓場，表示州將依照既定的方針，維持漢文為隨意科目。¹¹

1933 年 10 月 29 日，郭東周醫院落成典禮上，陳炘與宮原偶然同席，兩人再次展開議論，不過話題轉為大亞細亞主義及日臺融和的問題，宮原主張立即邁

⁶ 何義麟，〈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文史臺灣學報》1（2009 年 11 月），頁 222-241。

⁷ 有關陳炘的生平，參見李筱峰，〈死於非命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收入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 3 卷（臺北：自立晚報，1987），頁 143-168。

⁸ 即指莫那魯道（Mona Rudo，モーナルダオ）。

⁹ 例如，〈宮原氏が日月潭を貶す〉，《臺日》，1934 年 12 月 14 日，第 3 版。

¹⁰ 張深切，《里程碑》（下）（臺北：文經，1998），頁 607。

¹¹ 〈漢文存廢問題で議場に小波瀾〉，《臺灣新聞》，1932 年 12 月 14 日，版次不明，收入〈雜類剪報〉，《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9_12_0241876。

向亞細亞聯盟，陳炯主張先以日臺融和作為基礎工作，¹²這次會談成了東亞共榮協會的發端。為了更徹底交換日、臺人意見，12月11日¹³在市民館召開座談會，邀請日本人宮原武雄、渡邊國弘、吉野秀公、日高茂（缺席），臺灣人陳炯、楊肇嘉、黃朝清、葉榮鐘等參加，不過議論未有結果。同月17日，再於市民館召開座談會，日本人有宮原、渡邊，以及長岡寬（代理缺席之吉野、日高），臺灣人則未更動，這次議論順利進行，彼此同意將「立腳於大亞細亞主義，以內臺融和為第一目標，內臺人協力以展開一大運動」。其後臺、日人分別於25日、26日召集有志者商談，27日召開發起人會，審議決定會名、規約、幹部、宣言等，最終於29日正式在臺中公會堂舉行成立大會。¹⁴

表面上，協會純粹為民間發起成立，實際上，竹下知事的支持是能夠成立的主因。協會成立時，事務所設在官方主導的臺中州自動車協會內，¹⁵據自動車協會職員表示係「因某方面的命令而不得不為」。¹⁶竹下在成立大會發表的祝詞中，表示對協會趣旨「應沒有人反對，若有反對之人，我認為都是體內無血的人，既然不反對想必都會進而參加」。¹⁷對於竹下之發言，楊肇嘉曾向林獻堂表示「自來官僚之講演未有若是之強調」。¹⁸竹下的支持並不只是同情臺灣人遭受的差別待遇而已。¹⁹從總督府的立場來看，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突顯日、臺人的對立，彼此皆指責對方態度是不融和的根源，接著批評總督府錯誤的統治政策是其起因。如何緩和對立，抑止雙方的民族運動愈演愈烈，連帶威脅自身統治，是總督府的急務。尤其是在臺灣人社會運動之中心——臺中，就更有促成和解的必要。

正如臺中州的報告所言：「島內各種思想活動皆在本州發其端緒」，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團體之本部皆在臺中，核心人物亦多為臺中人。州政府有必要對臺灣人知識分子「誘導堅實之思想」。接著，稱：「鑑於時局的重大性，州下在住內臺人有識階級有所自覺，受其影響捨棄民族偏見，以內臺人之融和及東亞民族之共榮共存為宗旨，組織東亞共榮協會等組織。」可見協會成立目的正在於引導知識分子放棄社會運動。²⁰

透過協會的成立，總督府進而希望取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完全斷絕社會運動從「臺灣規模的自治」，²¹發展到殖民地獨立的可能性。1934年1月，蔡

¹² 議論內容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74-1375。

¹³ 有關兩次座談會的日期，協會文書載為11月11日、17日，其餘日期之月份亦皆是11月，《臺灣社會運動史》則載為12月10日、17日。惟據《臺日》，似乎月份係以12月為正確，本文僅月份使用12月，其餘皆按協會文書日期為準。〈內臺合流して大亞細亞主義結成〉，《臺日》，1933年12月28日，第3版。

¹⁴ 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臺中：東亞共榮協會本部，1934），頁20-21。

¹⁵ 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頁21。

¹⁶ 〈中都片々〉，《經世》，1934年1月21日，第6版。

¹⁷ 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頁24。

¹⁸ 《灌園先生日記》，1933年12月30日。

¹⁹ 據他自述，他曾在中川總督秘密召集各州知事的會談上，表示「差別待遇的思想不只在民間，在官吏間也有，相當麻煩，所以不得不改善」，而獲得總督的同意。竹下豐次，《八十八翁の思い出》（東京：學苑社，1974），頁147。

²⁰ 臺中州，《昭和九年臺中州管内概況及事務概要》（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頁7。

²¹ 此概念參見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新北：遠足文化，2020），58-74。

培火、楊肇嘉、林獻堂訪問中川健藏總督，談大亞細亞協會及東亞共榮協會，總督明確表示「臺灣人必先自認為日本人方可言及東亞，不然捨本逐末實為不可」，告誡臺灣人應致力融和，認同日本統治，切勿以民族運動尋求獨立。²² 1934 年下半年，總督府加強壓力，7 月，中川總督明確向林獻堂建議取消請願運動，絕不可「先要求自治，繼謀獨立」，且免「被人借作口實，以反對將實現之地方自治制」，試圖以放棄請願運動交換地方自治制施行。竹下也屢次勸說林獻堂、陳炯放棄運動。最終於 1934 年 9 月請願運動正式終止。²³

另一方面，令總督府感到頭痛的，還有在臺日人的右翼運動。如前所述，他們不滿臺灣人在經濟上成功之餘仍反抗日本統治，主張採強硬手段對付臺灣人，更與在臺軍部、日本國內右翼結合，展開武官總督及反對自治制運動。總督府之所以希望林獻堂放棄請願運動，也是為了要避免右翼團體的攻擊。必要時，總督府甚至願意與臺灣人知識分子合作遏止其發展。²⁴ 右翼團體中最極端者同樣源自臺中。1933 年 7 月，臺中市律師常見秀夫（1885-?）因不滿總督府統治方針偏袒臺灣人，起草「從殖民政策上所見有關臺灣統治之建白」，呈交總督、總理及各大臣。在心理上，常見雖與山下好太郎等人類似，但其建議顯然更為露骨，強調漢民族的劣等性，缺乏「成為忠良之帝國臣民的素質」，就算表面上同化，內心仍抱持反抗態度，主張「一視同仁」須考慮民族的差異，應優待優良的大和民族，施行「殖民政策」，促使日本人移住，同時盡可能利用、壓制劣等的臺灣人。²⁵ 換句話說，常見完全以西方種族主義的殖民觀，看待臺灣統治。常見的運動受到田中政吉、山下季重等人支持，1933 年 9 月「臺灣改進黨」正式在臺中成立，其部分成員如表 6-1。

表 6-1 臺灣改進黨部分成員

姓名	職業
常見秀夫	律師
田中政吉	律師
山下季重	律師
園部透	律師
入佐藤次郎	臺中放送局長
長岡寬	開業齒科醫
山本宗三郎	臺中醫院小兒科醫長

²² 《灌園先生日記》，1934 年 1 月 12 日。

²³ 何義麟，〈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 236-237。

²⁴ 1934 年 4 月，社研新竹支部成立後，總督府警察勸黃旺成（前文協、民眾黨員，1888-1978）組織團體與社研對抗。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黃旺成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2023），1934 年 4 月 13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以下出版項省略），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²⁵ 《殖民地政策上ヨリ觀タル臺灣統治ニ關スル建白》（臺中：治臺五十年事蹟調查會，1945）。該建白書係在戰後由臺灣人出版，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之《六然居典藏史料》另存有兩份手抄本。JACAR 亦存有常見秀夫撰寫，田中政吉上呈各大臣的版本。

南尚一	開業外科醫
調進	臺中消防組長
平井順次郎	臺中實業協會理事
遠山景一	律師
水田胸二	臺中市實業家、酒類銷售人
渡邊國弘	《臺日》臺中支局長
勝本七三郎	《南瀛》臺中支局長

資料來源：常見秀夫、田中政吉、山下季重、園部透係依據《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56-1359；

其餘人士依據《植民地政策上ヨリ觀タル臺灣統治ニ關スル建白》，封面後 1 頁「刊行之辭」。

不過，改進黨的意見終究與主流想法不同。社研、生產黨的核心思想為皇道精神融和臺灣、亞洲的必然性，其相信「必須根據純乎之日本主義，粉碎民族差別的空氣，好好地指導本島人的運動」。²⁶確如土屋形容，在反對自治制的過程中，右翼團體「漸次自覺到，一味發揮戰勝國民之優越感，並非母國人之本色」。²⁷然而，改進黨期待對外「併吞亞洲全部」、「移植大和民族」，對內主張參酌「諸外國的高等殖民政政策」實施差別待遇。²⁸如《臺灣社會運動史》所稱，標榜著大亞細亞主義，以東亞民族的大同團結、共榮共存為目的之東亞共榮協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後，獲得許多日臺人支持，而改進黨的主張過於偏狹，不符合日本的大陸政策，輿論遂漸漸不支持。追隨著時代潮流，改進黨成員開始轉向，1933 年 12 月，常見等幹部參加東亞共榮協會創立協商會，會上曾表示反對。²⁹實際上如後所述，部分成員最終進入協會擔任幹部。至於改進黨本身則在總督府的壓力下，於 4 月決議解散。³⁰

如此一來，臺中州內對統治最棘手的臺灣人知識分子及極端日人右翼已被消除，總督府接下來的問題在於如何以大亞細亞主義調停兩者關係。東亞共榮協會的趣旨將大亞細亞主義解釋為「日本躬自挺身以任亞細亞之救濟與指導」，而日本精神為東方文化之集大成，「與大亞細亞主義，有不可分之關係，同時亦自決定日本對於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之指導的地位」。至於「內臺融和」的意義，則強調臺灣人具有使命促進日本與中國、華僑融和親善，為完成此使命，須以「內臺融和」為前提，也就是「顯揚光輝燦爛之日本精神，而使內臺人在其大旆下，精神上渾然融為一體，一面力謀完成其國民之資格，務欲使此臺灣，完全成為帝國之一部分也」。³¹完全基於日本精神，追求大亞細亞主義及「內臺融和」的實現，

²⁶ 山本昌彥編，《躍進臺灣の現勢》，頁 195。

²⁷ 土屋米吉，《臺灣第一回選舉の考察》，頁 74-75。

²⁸ 《植民地政策上ヨリ觀タル臺灣統治ニ關スル建白》，頁 4、48。

²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59。

³⁰ 〈臺灣に於ける社會運動の現状〉，《社會運動通信》，1934 年 3 月 28 日，第 2 版；〈臺中の臺灣改進黨解散を決議〉，《臺日》，1934 年 4 月 16 日，第 2 版。

³¹ 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頁 8-12。

與右翼團體的想法一致。

不過，協會細部事項卻包藏臺灣人的意志。綱領第二條關於協會之目的，最初在宮原等人主張下為「以日本精神為基礎而團結亞細亞諸民族」，但林獻堂得知後認為「『以日本精神為基礎』當削除，庶免使中國人反感」。蔡培火亦附和，經陳炯、楊肇嘉與宮原折衝後，改作「以共存共榮之精神為基礎」。³²這也影響成立大會上發表的宣言，其中雖然提及「振作皇道精神的重要」，目的卻是「立腳共榮共存之精神，以全亞細亞民族之結合為目標」，「互相尊重個性，以友愛接待，於人類自然之本性上，促進亞細亞之融和」，似乎減弱對日本精神的強調。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具體的指導綱領及運動方略上。

指導綱領

- 一、顯揚日本精神，鞏固國民結合，進而促進與亞細亞諸民族之融和提攜。
- 二、奉體一視同仁之聖旨，期完成國民資格，以使內臺人渾然一體。

運動方略

1. 奉皇室中心主義，涵養統一國民精神。
2. 則四民平等之精神，排除民族偏見，調整內臺人關係。
3. 個性尊重，並振作互助之精神，圖內臺人之生活向上。
4. 則內臺一元之大原則，官民協力，邁向融和新臺灣之建設。
5. 基於共榮共存之精神，講求亞細亞諸民族之融和，特別致力於日華親善。³³

其中，指導綱領顯然呈現出日人右翼的想法，運動方略中之「皇室中心主義」、「統一國民精神」也是如此，但「個性尊重」、「基於共榮共存之精神」的說法則延續自宣言。綜合觀察趣旨、宣言、指導綱領及運動方略的用語雖然都偏向右翼，不過有關中日關係，並不用「日支」，而日、漢文皆用「日華」，似乎也是因為「庶免使中國人反感」。為何會有如此情形，原因就在東亞共榮協會的成員構成上。

表 6-2 東亞共榮協會幹部（1934 年 8 月）

職稱	日本人姓名	身分	臺灣人姓名	身分
名譽顧問	竹下豐次	臺中州知事		
顧問	中田榮次郎	臺中州內務部長	林獻堂	霧峰林家自聯成員
	慶谷隆夫	臺中州警務部長 (1934.5 後)	林烈堂	霧峰林家
	二瓶源五	鄉軍臺中分會長		
	今田卓爾	臺中州警務部長 (1934.5 前)		
	大竹勇	臺中青果會社社長		

³² 《灌園先生日記》，1933 年 12 月 27-28 日。

³³ 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頁 17。

		前澎湖廳長		
理事	宮原武熊	開業醫	陳炘	自聯成員
委員	日高茂	臺灣新聞編輯長	楊肇嘉	自聯成員
	渡邊國弘	《臺日》臺中支局長 前改進黨成員	黃朝清	自聯成員
	長岡寬	開業醫 前改進黨成員	葉榮鐘	自聯成員
	今井昌治	臺中青果組合主事 前花蓮港廳長	張煥珪	自聯成員
	田原哲次郎	帝國製糖專務	張聘三	自聯成員
	關根重憲	前臺灣新聞主筆	洪元煌	自聯成員
	田中政吉	律師 前改進黨成員	林澄坡	自聯成員
監事	小林五郎	臺中青果組合副組合長	郭東周	自聯成員
相談役	入佐藤次郎	前改進黨成員 臺中郵便局長	林耀亭	
	山本毅一郎	臺中警察署長	蔡蓮舫	
	曾根原弘	臺中市尹	李崇禮	
	佐藤房吉	彰化市尹	張晏臣	
	手貝千代志	彰化警察署長	林階堂	自聯成員
	貞方平一郎	大屯郡守	張堪	內埔庄長
	宗藤大陸	豐原郡守	賴雲祥	
	原泰吉	東勢郡守	杜清	自聯成員
	宮野為長	大甲郡守	黃憲哲	
	拔井光三	臺中市助役 彰化郡守（1934.6 後）	林伯餘	自聯成員
	石井善次	員林郡守	李昌期	
	藤垣敬治	北斗郡守	石錫烈	
	藤田正義	南投郡守	林朝槐	竹山庄長
	都築孫藏	新高郡守		
	澤井益衛	能高郡守		
	朝倉哲雄	竹山郡守		
	加藤重喜	彰化郡守（1934.5 前）		
備註：原文名單為臺、日人混和排列。				

資料來源：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頁 26-27。



圖 6-1 東亞共榮協會主要成員合影

備註：後排站者左起張煥珪、張聘三、長岡寬、黃朝清、葉榮鐘、日高茂

前排座者左起楊肇嘉、宮原武熊、陳炘

資料來源：《葉榮鐘典藏》，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識別號：NTHU-LIB-001-100100100005。

從成員構成來看，協會可說是在竹下知事中介下，互相敵視的日本人及臺灣人知識分子暫時停戰形成的組織。顧問、相談役等不直接參與協會運作的職位幾乎由臺中州下的官吏擔任，其中顧問多為臺中州廳官員，相談役則網羅各地行政長官，竹下知事對協會的協助顯而易見。不過，礙於行政機關的立場，州廳並未直接涉入運作，只透過退官轉任企業的人士間接影響。至於理事、委員，雖然刻意任命日、臺人各 8 人，試圖呈現雙方對等融和的樣貌，然而 8 名日本人中有 3 名為改進黨成員，對臺灣人的社會運動採敵視態度，至於 8 名臺灣人則清一色為自聯成員，協會的趣旨、宣言、綱領等，就是為了調和意見而產生的結果。

在表面上，協會似乎完全遷就右翼的想法。協會欲達成的「內臺融和」，指的是臺灣人拋棄具民族性質的運動，接受日本精神，融和成日本民族的一員，再以此身分促進亞洲民族與日本的融和。此種說詞對右翼人士來說無可挑剔，這是他們願意暫先放棄敵對，與臺灣人一同參加組織的主因。同樣的，反對自治制、希望臺灣人「拋棄漢民族之精神」的軍部，似乎也相信協會的表面主張，協會成立時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守備隊司令官外山豐造曾給予祝賀，³⁴軍參謀長桑本崇明也參與協會舉行的懇親會。³⁵

然而，隱藏於其中的，尚有臺灣人的「內臺融和」，也就是期待「個性尊重」、改善統治的理想。只不過，此刻知識分子並不如自聯將目標向外宣示，而是用迂迴曲折的方式將目的隱藏在敵人的語言中。如陳炘所言，協會實際上是以「日本精神之顯揚及國民資格之完成」作指導原理，而欲「改造教育，排除經濟的、政治的不平等之待遇」。³⁶對此，警惕著右翼、軍部過度活躍的總督府，在一定程度上尚相信臺灣人若獲得待遇改善，將誠心接受日本統治。於是，對於臺灣人重視

³⁴ 〈東亞共榮協會發會式を舉行〉，《臺日》，1933 年 12 月 30 日，第 7 版。

³⁵ 〈臺中に於る内臺融和懇親會〉，《臺日》，1934 年 2 月 13 日，第 3 版。

³⁶ 《灌園先生日記》，1934 年 3 月 18 日。

的漢文，總督府暫時將之作為公學校的隨意科目保留；對於地方自治制，當議會請願運動放棄後，總督府也隨即強硬壓下了右翼及軍部的反對，推動了自治制的部分施行。

恰如張深切所形容，東亞共榮協會是「臺日兩民族智力鬥爭最精彩的一幕」，³⁷這場由總督府贊助，日人右翼及臺灣人主演的「內臺融和」大戲，能夠維持多久，將取決於日人右翼與軍部多久能看破臺灣人的想法。當對立恢復，「內臺融和」的好戲變成「內臺不融和」的歹戲後，總督府又願意贊助多久。

三、東亞共榮協會的發展與內部衝突

東亞共榮協會創立初期的發展，與州廳的援助息息相關。1934年2月，共榮協會對外展開座談會等活動，也在竹下的後援下，計畫與教化委員、部落振興會員提攜。³⁸3月，臺中警察署長山本毅一郎在市內的保甲聯合會議上宣傳亞洲民族團結的必要，鼓勵居民加入東亞共榮協會。³⁹或許是受到州廳的壓力，又或許因協會隱含臺灣人「內臺融和」理想，5月後，從南投郡、大屯郡等臺灣人居民較多的地區為始，協會支部相繼設立，過程相對順利。以員林郡支部的成立過程為例，6月初先召開座談會，獲各街庄主事者贊同成立支部。⁴⁰6月11日，員林郡守召集各街庄長、小公學校長，以及庶務、警察課長，舉行支部設立磋商會，⁴¹22日正式發會，幹部組成與本部類似，顧問、相談役以郡官吏、街庄長為主，理事、監事、委員則是日、臺民間人士。員林支部另外設置主事、書記兩職，前者任命郡視學擔任，後者則任命郡教育係員、員林街庶務主任，以及各街庄助役負責。⁴²由此可見，不只支部成立有賴州廳的推動，就連實際活動上，州廳也扮演從旁輔助的角色。

表 6-3 東亞共榮協會支部列表

支部	成立日期	會員數
南投郡支部	1934年5月6日	1,300
大屯郡支部	5月13日	800
北斗郡支部	6月17日	700
員林郡支部	6月22日	1,300
臺中市支部	8月4日	5,000
彰化郡支部	8月14日	600
大甲郡支部	8月30日	500
彰化市支部	9月17日	900

³⁷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608。

³⁸ 〈過般產聲を舉た“東亞共榮協會”〉，《臺日》，1934年2月2日，第3版。

³⁹ 〈臺中／署長訓示〉，《臺日》，1934年3月3日，夕刊第4版。

⁴⁰ 〈員林／準備發會〉，《臺日》，1934年6月6日，第8版。

⁴¹ 〈共榮員林支部設立磋商〉，《臺日》，1934年6月14日，第8版。

⁴² 〈東亞共榮協會員林支部發會成立〉，《臺日》，1934年6月24日，第12版。

新高郡支部	9 月 30 日	400
竹山郡支部	11 月 5 日	200
東勢郡支部	11 月 23 日	500
豐原郡支部	11 月 24 日	3,000
能高郡支部	12 月 9 日	600

資料來源：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264。

利用州廳的力量，共榮協會尚能在臺灣人居民較多之地區順利設立支部，然而，當擴張至日本人居民較多的臺中市時，就遭遇到阻力。協會甫成立時，部分日人並不表歡迎，據說《臺灣新聞》社長松岡富雄特別下指示不得刊登有關協會的報導。⁴³1934 年 3 月 3 日，竹下知事招待州、市內有力官民人士，在臺中市民館舉行懇談會。竹下極力宣揚協會理念，強調日本人在歷史上具有包容新附之民之寬容特性，應以誠意使臺灣人日本人化。對之，小室興（臺中律師）卻「說日本有三千年歷史請勿忘卻，其意謂日本人不可卑下與臺灣人同等」。⁴⁴黃朝清起而反對，強調臺灣人正致力理解國民精神，縮小三千年的差距，東亞共榮協會就是為此而生。宮原為緩和彼此氣氛則表示日本國內有九州男子、東北男子之說法，協會將以日臺結合創造出臺灣男子。⁴⁵雙方衝突雖未表面化，但其跡象已然浮現。

1934 年 5 月底，協會著手設立臺中市支部，分別於 5 月 26 日、6 月 2 日、6 月 10 日召開座談會，在這三次座談會上，民間日人出席者越來越多，而協會遭遇的反對也越來越強。5 月 26 日座談會出席者多為臺中州、市官員，州官員由慶谷隆夫（警務部長）、市官員則由曾根原弘（市尹）為首出席，民間僅半官半民的今井昌治（青果組合主事）而已。會上諸氏分別就如何實踐「內臺融和」，指導大眾理解日本精神、拋棄民族思想給予建議，主旨或許與臺灣人的想法不同，但秉承竹下對協會的支持，出席人士並未批評協會，僅隱約提及應改善市內日本人間及日、臺人間不團結的現狀而已。⁴⁶

6 月 2 日座談會出席者為校長、僧侶及民間人士。首先由宮原演講，以德語在英美各國流行作為漢文再興論的論據。顯然的，宮原已改變過去反對漢文的態度，轉為與臺灣人一同支持漢文復興，協會也開始顯露出保全臺灣人傳統之理想。對此，與會的田邊誠一郎（臺灣無盡會社臺中支店長）提出質疑，指出當局方針應是廢除漢文、徹底施行日語教育，以養成國民精神及「內臺融和」，林獻堂等人卻有反對之意，若協會也打算反對，未來將難以達成目的。宮原聞之只能表示協會將再研究，並取消先前發言，陳炯則回覆協會絕對不會違反總督府方針。⁴⁷

⁴³ 〈臺灣新聞良心ありや〉，《南瀛》，1934 年 2 月 20 日，第 1 版。

⁴⁴ 《灌園先生日記》，1934 年 3 月 3 日。

⁴⁵ 〈茶前茶後〉，《南瀛》，1934 年 3 月 10 日，第 8-9 版；〈和氣藹然たる内臺人の交驛〉，《南日本》，1934 年 3 月 9 日，第 4 版。

⁴⁶ 〈東亞共榮協會の座談會〉，《新高》，1934 年 6 月 1 日，第 3 版；〈東亞共榮會のイデオロギー〉，《南瀛》，1934 年 6 月 2 日，第 5 版。

⁴⁷ 〈内臺融和の意見を交ゆ〉，《南日本》，1934 年 6 月 17 日，第 21 版。

民間人士畢竟與官員不同，不用遵循上級意旨，敢於攻擊協會。6月10日座談會的參與者以律師、醫生等民間人士為主，包括山口義章、常見秀夫、渡部彌億等律師起身質疑，其中，以常見最為激烈。常見指出協會的精神應是：（1）普及徹底皇道精神；（2）發揚大和魂；（3）促進同化，所謂「內臺融和」是指臺灣人在精神上日本人化，而非日本人臺灣人化。協會的本質使命，應在促進臺灣人積極接近日本人，日本人僅有從旁協助的任務。協會不受市內日本人歡迎的主因，就是誤認了自身本質，將出生時即擁有日本精神的日本人，與臺灣人對等並列。座談會最後，拔井光三（臺中市助役）提議成立臺中市支部，但列席人士紛紛反對，認為協會理論不清楚，市民亦不理解，當下時期尚早，常見也表示只有意見被接納才願意入會。⁴⁸ 林獻堂聽聞座談會的經過後在日記寫道，常見等人「以輕滅〔蔑〕臺灣人之無理優越感而反對會之主旨，使人聞之無限憤慨」。⁴⁹ 此次座談會，不只反映出日、臺人對「內臺融和」完全相左的看法，也反映出雖然改進黨已瓦解，欲使市內日人支持協會，仍比州廳、臺灣人想像的還要困難，日人已察覺到協會實係掛羊頭賣狗肉，以「內臺融和」、日本精神等大旗，私下追求臺灣人的理想。

臺中市支部最終於8月4日成立，成立大會上除知事、市尹等官員外，臺灣軍參謀土橋一次也列席，顯示出軍部尚能容忍協會。⁵⁰ 不過，臺中市支部雖然號稱有5000名會員，實際上因通知不周，只有約300人列席，其中多為臺灣人，民間日人幾乎限於支部幹部而已，⁵¹ 如葉榮鐘在日記中記載，「內地人的出席者尤覺寥寥，這端的是反應臺中市內的內地人間的空氣」。⁵²

在知事支持下，1934年底協會已成功地在州下所有的13郡市設立支部，但日本人普遍的敵視態度仍然存在。1934年9月，臺中州舉行方面委員總會，會上臺中支部理事田邊誠一郎提案建議在精神上輔助協會的事業，卻遭多數方面委員否決。⁵³ 至於常見也未放棄重建勢力，1934年7月，他與山口義章、遠山景一等人籌組州市協議會員的社交團體，當共榮協會著手籌辦報紙時，常見亦標榜日本主義，向警務局申請報紙發行許可。⁵⁴

外部攻擊並不是共榮協會唯一需要擔憂的問題，在機關紙《臺中新報》的發行過程中，內訌隨之發生。根據協會的聲明書，協會機關紙的發行，最初是入佐藤次郎主唱，提議新聞應由少數人士出資約4萬圓，並置於協會外，與協會保持不即不離的關係，經營全權則一任入佐自己。為此，入佐曾與葉榮鐘商討，請其

⁴⁸ 〈東亞共榮協會民間座談會を聴く〉，《新高》，1934年6月17日，第3版；〈臺中市の内臺融和はお流れ〉，《南瀛》，1934年6月16日，第13版。

⁴⁹ 《灌園先生日記》，1934年6月12日。

⁵⁰ 〈臺中の東亞支部盛大に發會〉，《臺日》，1934年8月5日，第3版。

⁵¹ 〈臺中東亞共榮協會支部發會式の醜態〉，《新高》，1934年8月10日，第2版。

⁵²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臺中：晨星，2000），1934年8月4日，頁80。

⁵³ 〈中部臺灣の昨今〉，《南瀛》，1934年9月22日，第4版。

⁵⁴ 〈市民間の惡氣流排除機關〉、〈點景〉，《南瀛》，1934年7月14日，第2版。或許因總督府的警惕，常見的報紙似乎未成功發行。

負責漢文編輯，⁵⁵同時日高茂也離職《臺灣新聞》，準備進入《臺中新報》。不過，宮原、陳炘等認為既然是機關紙，便應由協會直營，且協會無財政餘地另外設置新聞，引起入佐的不滿。⁵⁶

實際上，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入佐之所以建議將新聞置於協會外，主要目的是使新聞脫離協會，讓日本人掌握主導權。當宮原轉向支持臺灣人，協會立場逐漸明朗後，協會中的日人委員對臺灣人更加提防，如葉榮鐘所稱，日本人向來在機關紙的計畫上與陳炘採敬而遠之的態度。10月1日，協會本部召開委員會，會上渡邊國弘對宮原、陳炘兩理事提出的經營案強烈反對，但因時間緊迫而約定明日再會。⁵⁷2日的臨時委員會上，渡邊、田中主張協會精神在於涵養日本精神，「內臺融和」應以日本人為主，臺灣人為從，於是機關紙的編輯營業應主要由日人幹部負責。另一方面，宮原、陳炘則宣稱基於臺灣人委員的一致意見，欲以宮原任新聞社長、陳炘任副社長，其餘職位以日臺對半為原則。日人幹部遂攻擊宮原專斷更改計畫。⁵⁸10月15日，協會再次召開委員會，會議一開始，入佐質疑為何未收到前次委員會的通知，宮原答覆因協會相談役眾多，今後都不再召集，而入佐此日亦無出席資格。長岡起身捍衛入佐，渡邊、田中從旁附和，宮原則稱要將長岡、渡邊兩人除名，結果演變成雙方互相謾罵，甚至欲以拳頭攻擊。⁵⁹

在15日的會議上，協會內部日、臺人不合已完全激化成肢體衝突，雙方分裂已屬必然。10月21日，長岡、田中、渡邊、日高聯名勸告宮原辭職，要求宮原辭去委員及理事之職，否則將不再出席委員會。同日夜，協會召開委員會，否決長岡等人的勸告。⁶⁰於是4名委員及入佐辭職離會。⁶¹如此一來，8名日人委員中竟有4名退會，且皆是立場最為強硬者，顯示出臺灣人已無法再以表面上的日本精神等說詞，緩和民間日人的敵視，協會標榜的「內臺融和」已然瓦解。離職委員的空缺，雖然由中津德治（彰化銀行取締役）、土屋達太郎（律師、自聯成員）、佐藤得太郎（彰化水利組合長）、石井善次（前員林郡守、臺中青果同業組合副組長）補上，然此4人若非原先已同情臺灣人，即是與總督府淵源深厚的人士，終究不能代表民間日人的反對立場。⁶²

另一方面，臺灣人內部也不一致，尤其以陳炘與楊肇嘉的對立最明顯。楊肇嘉作為自聯領袖，其活動重心放在推動自治制，對共榮協會的理想及具體會務態度消極，然陳炘卻基於與宮原的友誼，以及為爭取信託法實施以保障大東信託經營，而較願意投入會務。⁶³在機關紙問題上，彼此也都有考量，楊肇嘉不滿宮原、

⁵⁵ 《葉榮鐘日記》，1934年8月21日，頁82。

⁵⁶ 〈東亞共榮の聲明は世人を欺く〉，《南瀛》，1934年11月3日，第4版。

⁵⁷ 《葉榮鐘日記》，1934年8月25日、10月1日，頁83、88。

⁵⁸ 〈東亞共榮協會幹部間の軋轢表面化〉，《新高》，1934年11月2日，第10-11版；〈東亞共榮協會内部分裂の兆あり〉，《南日本》，1934年10月12日，第3版。

⁵⁹ 〈斷乎東亞共榮協會を解散せよ〉，《南瀛》，1934年10月20日，第9版；〈東亞協會の内紛擴大〉，《南日本》，1934年10月26日，第3版。

⁶⁰ 〈血迷ひ出した東亞共榮協會〉，《南瀛》，1934年11月3日，第2版。

⁶¹ 〈東亞共榮協會を繞る其後の狀勢は如何〉，《新高》，1934年11月9日，第7版。

⁶² 〈龜裂の入つた東亞共榮協會〉，《臺日》，1934年11月21日，第3版。

⁶³ 何義麟，〈1930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231。

陳炘事前未與各委員商量機關紙的經營。⁶⁴楊肇嘉似乎不歡迎報紙將由兩人主導，而於 10 月 1、2 日的委員會與陳炘衝突。⁶⁵除楊肇嘉外，根據葉榮鐘的觀察，張聘三對共榮協會「大有貓貓意」，⁶⁶對機關紙「食指大動」，而《新民報》的羅萬俔等人也未必會贊成。⁶⁷戰後，楊肇嘉在回憶錄中，批評林獻堂等人在選出其為自聯領導人後卻繼續進行議會請願運動，以致資金皆須由楊氏自行支出，⁶⁸自聯與議會請願運動的資金來源重疊，兩者已成「零和遊戲」。⁶⁹由上顯示，在既有的自聯或《新民報》眼中，東亞共榮協會及《臺中新報》的存在，無疑是分散臺灣人的力量，甚至是陳炘與宮原欲謀建立自身勢力之舉，當然也不能否認協會內部也不乏有意爭取主導權的臺灣人成員。

四、《臺中新報》與東亞共榮協會的殘局

當民間日人已不再支持，臺灣人內部亦有反對意見，協會唯一的靠山只剩下竹下知事。內鬥進行時，反對派之日本人委員請求與竹下會見，竹下卻以各種理由婉拒。⁷⁰內鬥結束後，竹下的支持成了協會抵抗民間日人攻擊的後盾。1934 年 12 月的州協議會上，日人議員詢問共榮協會究竟是思想團體或政治團體，質疑共榮協會的機關紙不應議論政治問題。對此，竹下則明確回覆協會是思想團體、教化團體，為了宣傳其趣旨、貫徹其目的，當然能討論政治、時事問題，總督府亦予以諒解。⁷¹同時，協會繼續設置支部，能高支部成立前夕，雖然當地人士要求先整理本部內部糾紛再成立，⁷²但終得於 12 月成立，至此，州下 13 郡市皆設有支部。

出乎意料的是，竹下知事竟然於 1935 年 1 月轉任關東州長官。新上任的知事日下辰太，雖然不直接反對協會，但也無意積極支持，對協會發展或民間日人的反對，皆採靜觀態度。如陳炘所言，「日下知事之為東亞共榮協會名譽顧問是被逼而來，非喜歡而來」，而日下也直接向林獻堂表示，東亞共榮協會宗旨雖好，但有力日人多不參加，無法積極幫助，且總督府亦不需依賴共榮會推行「內臺融和」，「此後東亞共榮協會若欲發達非改組不可，或從別方面而作融和之事」。⁷³

喪失知事的支持，不只使協會陷入孤軍奮戰的窘境，更直接造成金援中斷。協會的資金最初係透過臺灣有力人士捐助，包括林獻堂的 1000 円及林烈堂的 5000 円。⁷⁴不過，這些金額顯然不夠，因此協會也向各支部要求上繳捐獻，如能

⁶⁴ 《灌園先生日記》，1934 年 10 月 2 日。

⁶⁵ 《葉榮鐘日記》，10 月 1-2 日，頁 88-89。

⁶⁶ 可能源自臺語「貓貓相」（niau-niau-siòng）一詞，指專注地凝視、期待的樣子。

⁶⁷ 《葉榮鐘日記》，8 月 25-26 日，頁 83。

⁶⁸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頁 279-280。

⁶⁹ 詳見陳俐甫，〈日治時期政治運動與資金：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之政治資金〉，《臺北文獻》117（1996 年 9 月），頁 39-48。

⁷⁰ 〈東亞共榮協會の末路〉，《經世》，1934 年 10 月 21 日，第 9 版。

⁷¹ 臺中州，《昭和九年臺中州協議會通常會會議錄》（臺中：臺中州，1937），頁 107-110。

⁷² 〈支部發會延期〉，《臺日》，1934 年 11 月 14 日，第 3 版。

⁷³ 《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25 日。

⁷⁴ 《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5 月 17 日；〈五千圓寄附〉，《臺日》，1934 年 3 月 2 日，第 3 版。

高支部成立時被要求上繳 2500 円，引起地方人士的不滿。⁷⁵最好的辦法是透過總督府的壓力，向各會社請求捐獻。竹下曾以協會顧問名義，向製糖會社的各工廠要求捐獻 5000 円，⁷⁶甚至傳聞竹下約定以裏南投公車路線的經營權與帝國製糖交換捐獻 10000 円。⁷⁷無論是否屬實，竹下離任後，州政府也不可能再協助協會取得資金。

於是，進入 1935 年後，協會的對外活動減少，最重要的僅存機關報《臺中新報》（而後改稱《東亞新報》）的經營。《臺中新報》於 1934 年 12 月發刊，發刊時的陣容如表 6-4，顯示《臺中新報》依照宮原等人提案，維持日臺人對半的構成，至於印刷則委由市內的高須印刷所。《臺中新報》原件似已不存，僅餘下部分剪報。⁷⁸不過，仍可透過其他資料間接推測其立場，根據葉榮鐘留存的手稿，其社是如下所示。

表 6-4 《臺中新報》創立時的經營陣容

姓名	職位	姓名	職位
宮原武熊	社長	陳炘	副社長
關根重憲	主筆兼編輯長	張聘三	營業部長
葉榮鐘	編輯次長	近藤潔	營業部員
松原滿雄	編輯部員	黃再添	營業部員
張深切	編輯部員		

資料來源：〈東亞共榮協會を繞る其後の狀勢は如何〉，《新高》，1934 年 11 月 9 日，第 7 版。

社是

本報之言論遵奉本協會之指導綱領、運動方略，此外特別恪守左記各條。

一、於國際事務上，常以世界和平為念，於國內事務上，擁護立憲政治。

二、致力介紹支那事情，促進日支親善。

三、對島內之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之問題，徹底以光明嚴正之態度，報導批判之。

四、對於當面問題之地方自治制及義務教育，合理地促進其實現。

五、絕對避免如涉及人身攻擊等卑劣之記事。⁷⁹

至於創刊之辭，則認為過去臺灣的報紙皆有民族立場，日、臺人必須「無相積忌，無相抑壓，無相欺瞞，無相牽制」，才能創造出真正的公論。而依據大亞

⁷⁵ 〈發會式が流産〉，《經世》，1934 年 11 月 25 日，第 11 版。

⁷⁶ 〈街から拾ふ〉，《南瀛》，1935 年 1 月 26 日，第 9 版。

⁷⁷ 〈臺中見聞錄〉，《新高》，1935 年 3 月 1 日，第 7 版。雖然裏南投道路最終經營權由臺中輕鐵獲得，但此傳聞似乎有一定真實性，1935 年 12 月 18 日，日下知事欲與林獻堂討論此事時，拒絕以陳炘為通譯。《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12 月 18、27 日。

⁷⁸ 筆者能夠尋得的，僅有臺灣文學館所藏關於林氏好的剪報，以及在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所藏《六然居典藏史料》中，分散在各剪報冊之剪報。

⁷⁹ 〈《臺中新報》/《東亞新報》「社是」範疇〉，《葉榮鐘典藏》，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識別號：001-010200070003。

細亞主義之理想，務先促進日臺人之融和，因此將倡導「內臺人渾然一體之公論」。至於所謂「內臺融和」，即指「依博大公明之皇道精神，以互相扶植而擴大之，則大治一爐，無分彼我，花紅柳綠，各遂其生」。⁸⁰

隨著協會內部右翼日人離去，餘下的日人委員及關根主筆，態度皆較親近臺灣人，因而《臺中新報》的社是與發刊辭，相較共榮協會成立時對外發表的文書，顯然更直接地展現臺灣人知識分子的想法。社是中提到對外要報導中國消息，促進日中親善及世界和平，對內欲維護立憲政治，在臺灣內部則要促進自治、義務教育，改善臺灣人的待遇，無一不是知識分子所支持者。而創刊之辭提及欲以「內臺融和」協助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主旨雖與協會成立時的說法類似，但有關日本精神的敘述已淡化許多，如其所云「花紅柳綠，各遂其生」，也顯示欲維護臺灣人傳統的意思。

由此可見，報紙的整體立場應傾向臺灣人，根據現存的剪報，可以證實此事。對於自治制問題，《臺中新報》主張自治制能誘導日、臺接觸，促進融和，⁸¹引用《大阪朝日新聞》社論，指出日本貴眾兩院的反對議論，只會刺激民族意識，激化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對立。⁸²報導滿洲國官員來臺募集警察時，特別提及基於五族協和的主旨，應也會募集臺灣人警察。⁸³編輯部之張深切亦回憶其因新聞記事 and 社評的修改問題，每週約有 2、3 次被傳至高等警察課談話。⁸⁴面對民間日人的攻擊，《臺中新報》則是協會重要的反擊工具，日高茂自《臺灣新聞》離職後，轉任《高雄新報》編輯長，迅即對協會展開攻擊，從揭露內部弊端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協會亦不懼戰，以《臺中新報》予以回擊。⁸⁵

在文藝上，《臺中新報》著重資助林氏好等臺籍文藝人士，以發揮臺灣獨特的文化，如其評論道：「臺灣有臺灣的特色，使牠的特色能夠發揮，便是臺灣的進步。林氏好女士的獨唱是好是呆姑且勿論，這樣的藝術大有獎勵的必要」。⁸⁶尤其張深切身兼臺灣文藝聯盟幹部，《臺中新報》也呈現出明顯的新文學色彩，包括王詩琅、楊達、楊守愚、朱點人等新文學作家，皆在投稿作者之列，其他還有張聘三、周定山、施維堯、平山勳等人。⁸⁷透過張深切的關係，《臺中新報》與

⁸⁰ 〈《臺中新報》/《東亞新報》「創刊之辭」手稿〉，《葉榮鐘典藏》，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識別號：001-010200070001。另外，有關《臺中新報》創刊辭，《昭和》日文欄曾約略提及其中有「魂與魂的肉搏，被本能化的日本精神」等精神主義的內容，葉榮鐘所藏的手稿可能只是漢文欄的創刊辭，或者未獲採用。〈臺中州下に踊る三態三様の人々〉，《昭和》，1934 年 12 月 15 日，第 5 版。

⁸¹ 〈大絃小絃〉，《臺中新報》，1935 年 3 月 3 日，版次不明，收入〈臺灣地方自治制問題（四）〉，《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4_10_0101910。

⁸² 〈兩院露骨的言動是挑撥民族意識張本〉，《臺中新報》，1935 年 2 月 24 日，版次不明，收入〈臺灣地方自治制問題（四）〉，《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4_10_0101910。

⁸³ 〈滿洲國警官募集に佐藤事務官來臺〉，《臺中新報》，1935 年 2 月 3 日，版次不明，國立臺灣文學館藏，登錄號：NMTL20190160594。

⁸⁴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616。

⁸⁵ 〈東亞協會問題で二新聞論戰を開く〉，《南日本》，1935 年 3 月 8 日，第 3 版。

⁸⁶ 《臺中新報》，1935 年 2 月 10 日，版次不明，國立臺灣文學館藏，登錄號：NMTL20190160564。

⁸⁷ 〈1996 年 01 月施維堯補述之《東亞新報》、陳圻、《興南新聞》等相關資料〉，《葉榮鐘典藏》，

文藝聯盟在文藝之外亦有合作，1935 年新竹臺中大地震發生時，兩者即一同展開救援活動。⁸⁸

《臺中新報》經營上最大的困難，仍是竹下離任造成的資金問題，協會理事陳圻雖然主導大東信託的經營，但公私分明，能給予的支援有限。⁸⁹1935 年 5 月，發刊不過半年，已因財政困難而須大幅改革，主筆兼編輯長關根重憲、編輯部員松原滿雄、營業主任張聘三被裁撤。6 月，正式改題為《東亞新報》，宮原不再介入經營，轉由陳圻負責全權，而由葉榮鐘擔任編輯長，印刷及廣告、販賣等營業事務委由高須印刷所承包。⁹⁰然而，不久又因積欠印刷費與高須發生爭執，最終為節省開支，不得不於 8 月改由新民報社印刷。⁹¹後續經營似乎仍未見起色，12 月，葉氏等《東亞新報》社員一同提出自治經營案，決定編輯方針將增加全島性的記事，開拓臺北、新竹的地盤；營業方針由社員自行從事廣告、販賣之擴充並從中抽成，配送則與大東信託合作。人事上，由葉榮鐘任主筆兼臺北支社長、藤本滿記任編輯長、張深切任臺中本社編輯次長、中山馨任臺北支社編輯次長。⁹²一連串改革的結果，《東亞新報》的主導權已完全落入臺灣人手中，而葉榮鐘對於報社未來的發展也頗具信心。⁹³

另一方面，在協會本身的運作上，1935 年 6 月，陳圻雖有意引入彭華英擔任協會主事，對外作協會兩理事之代表，對內監督《東亞新報》經營，但「諸友人皆勸其不可擔任不能挽回之殘局，楊肇嘉甚至謂，其若出擔任即欲與之絕交」，林獻堂也婉轉表示「以公義言，則欲勸君出任其難，若以私情言，則欲勸君再考慮」。可見在眾多日人反對下，協會與《東亞新報》皆難維持，甚至在臺灣人眼中也早已是「不能挽回之殘局」。⁹⁴

面對此局面，陳圻等人並未放棄，反而著手改革以求生存。9 月 28 日，共榮協會在臺中公會堂舉行第一回大會兼青年部結團大會，除了協會幹部外，總督府文教局長深川繁治、臺中州知事日下辰太、醫專校長堀內次雄等亦出席，同時，通過募集新會員、擴張《東亞新報》的讀者群，以及將積極參與地方選舉等議案。此次大會雖係協會全體大會，出席者卻較 1934 年臺中支部發會時少，僅有約 200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識別號：001-010200070016；楊達，《楊達全集》第九卷（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1），頁 218-231；《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1936 年 4 月 12 日、8 月 11 日、10 月 4-5 日，頁 3、55、75-76。

⁸⁸ 楊達，《楊達全集》第九卷，頁 218-231。

⁸⁹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604；另外，施維堯也認為經費困難原因之一是因陳圻的吝嗇。〈1996 年 01 月施維堯補述之《東亞新報》、陳圻、《興南新聞》等相關資料〉，《葉榮鐘典藏》，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識別號：001-010200070016。

⁹⁰ 《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5 月 17 日-20 日；〈豫定のプログラム進行〉，《南瀛》，1935 年 6 月 17 日，第 15 版。

⁹¹ 〈東亞新報に警務當局ナメらる〉，《南瀛》，1935 年 8 月 10 日，第 8 版。《葉榮鐘日記》，頁 77。

⁹² 〈《東亞新報》社員自治經營案〉，《葉榮鐘典藏》，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識別號：001-010200070007。

⁹³ 《葉榮鐘日記》，1936 年 3 月 26 日，頁 99。

⁹⁴ 《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6 月 25 日、7 月 6 日。

人參加，其中約 30% 為日本人，顯示協會支持者之減少。⁹⁵ 儘管如此，協會之後依照大會決議繼續運作，10 月地方選舉時，成功擁立宮原為州協議會員。1936 年 3 月 28 日，協會青年部召開役員會，協議徽章制定及部員擴張之議案，本部幹事會則協議財政確立策、日語普及、生活改善等議案。⁹⁶ 就算協會面對日人反對、臺人不挺的困境，透過陳圻等人的努力仍得以維持殘局。最終使共榮協會不得不面臨解散的，是右翼勢力與在臺軍部結合下，對臺灣人展開的猛烈攻擊。

五、右翼勢力的攻擊與東亞共榮協會的消亡

如過去研究所示，1935 年 4 月發生的珠諾號（Juno）事件是促成右翼與軍部結合的關鍵，在過程中，軍部頻頻刺激輿論，有關其大要已如前章所述，茲不再贅述。1935 年 6 月 5 日珠諾號事件二審前夕，臺北在鄉軍人會、海友會、市民有志共同在臺北鐵道旅館召開島民大會，決議「喚起全島民的愛國意識，統一輿論，以期邁向輿論之統一及國防之確保」，隨後舉行「國防強化大演說會」，講者有右翼日人山下好太郎、橫尾武雄、自由派日人唐澤信夫，以及親日臺人陳清波、謝龍閣等人。演講內容不限於珠諾號事件，更及於呼籲國民大眾應一致團結，擁護國防及國家的向外發展，如《南瀛》報導，演說會「使非常時意識更加高揚」。⁹⁷ 總督府對此集會採取嚴加戒備的態度，派出 4、50 名警官監視、檢查攜帶物品，而陳清波的講題也被迫更換，改為敘述臺灣人的愛國熱誠與覺悟。然而總督府終究壓不下輿論的熱潮，當山下好太郎登臺演講，準備進入正題攻擊珠諾號事件的辯護人時，警官要求中止並欲拘捕山下，竟引起全場的混亂，最終只得讓其餘講者繼續演講。⁹⁸ 事實上，當自由派的唐澤信夫也開始呼籲「攻擊囿於法律、忘卻國家之珠諾號的辯護人」時，⁹⁹ 可以認為擁護軍部早已成了全臺日人一致的輿論。

演說會結束後出席人士協議組成「臺灣國防強化聯盟」，成員包含鄉軍有志、海友會、生產黨、皇政會、大日本國防青年會、記者團有志等廣泛分野之人士，¹⁰⁰ 趣旨為徹底完善國防以貢獻「民族的欲求、國策的遂行」。該組織成立後與軍部成員頻繁往來，如第四章所述，聯盟幹部西川純、林治人、山下好太郎、田中一二等人，曾與酒井武官協議珠諾號事件的對策，另外亦訪問桑木參謀長、沼川憲兵隊長、福田袈裟雄守備隊司令官，以及 1935 年 9 月新上任的荻洲立兵參謀長、大木繁憲兵隊長等人。¹⁰¹ 其具體活動，除了延續珠諾號事件，繼續攻擊珠諾

⁹⁵ 《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9 月 28 日；〈東亞共榮協會第一回大會雜觀〉，《新高》，1935 年 10 月 5 日，第 6 版；〈臺中の塵籠〉，《南瀛》，1935 年 10 月 5 日，第 10 版；〈人氣地に墜つ秋風寒し東亞協會總會〉，《南日本》，1935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

⁹⁶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月報》38（1937 年 8 月），頁 127-128。

⁹⁷ 〈滿堂の聴衆總立ち熱狂す三寸の舌に〉，《南瀛》，1935 年 6 月 8 日，第 9 版。

⁹⁸ 〈聴衆堂に満ち殺氣漲る〉，《昭和》，1935 年 6 月 8 日，第 9 版；〈愛國的熱誠の獅子吼〉，《新高》，1935 年 6 月 8 日，第 8 版。

⁹⁹ 田中一二，《蘭船ジユウノ號事件を語る》（臺北：大日本國防青年會臺灣總支部，1935），頁 35。

¹⁰⁰ 田中一二，《蘭船ジユウノ號事件を語る》，頁 7。

¹⁰¹ 〈臺灣國防聯盟創立以來活動要録〉，《社會運動通信》，1935 年 9 月 13 日，第 2 版；〈臺灣

號事件的辯護人，還主張設置海軍鎮守府以確保臺灣防備，並以臺灣為基地向南支南洋發展。¹⁰²

表 6-5 國防強化大演說會講題一覽

講者	講題	講者	講題
澤熊海三	開會之辭	澤熊海三	有關國防的擁護
松本光雄	作為花蓮港之住民	陳清波	帝國的南方躍進與臺灣
寺崎武藏	直面非常時局	南波三郎	無軌道
森方男	國防與海外發展	采女正義	國防與國力的充實
中本磯太郎	覺醒吧島民	中村小太郎	有關國防強化
橫尾武雄	非常時意識與臺灣	上瀧利雄	南方之南方
足立乙亥千	先衛防備	林治人	敢以平民身分致特權階級
清水紀與治	魔手在活動	田中一二	以身護軍機
山下好太郎	葬送賣國奴	唐澤信夫	從自由人的立場
西川純	偶感	米澤國粹	展現我海軍的威力
謝龍闊	臺灣人與國防問題	中村小太郎	閉會之辭
宮島龍華	向武勳者表示敬意		

資料來源：〈國防強化大演說會の演題並に辯士〉，《臺灣》48（1935年6月），頁6

軍部之所以欲與日人右翼結合，仍是因對文官總督統治現況的不滿。松井石根離任前，出面批評文官總督「徒然顧慮漢民族心情或以取悅為能事」，以致臺灣人心懷故國，不願接納日本統治。繼任松井的寺內壽一（1879-1946）顯然也感同身受，1935年12月離任前，特意強調從臺灣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來看，現在於精神、物質上，都有許多須再考量的餘地，而其「比起任何事情，對臺灣最希望的是精神動員。究竟具不具有國家意識呢？覺得日本精神已充分徹底了嗎？能夠達成其指導嗎？」¹⁰³不過，在不滿之餘，臺灣軍卻缺乏直接手段影響總督府，仰賴著日人輿論對總督府施壓，間接達成軍部的目的，是軍部與日人右翼聯合的主因。

1935年7月，沼川憲兵隊長離任前的訪談，露骨地呈現出軍部的想法。如前章所述，在大亞細亞主義上，沼川大多依循松井的想法，他曾強調要使臺灣人完全日本化才可實現臺灣的大亞細亞主義使命。此次訪談中，沼川首先感謝各報紙在珠諾號事件時積極反映國民感情，報導軍部意志。軍部在事件時曾向檢閱當局陳述希望，幸好各報皆一致擁護軍部，「若事態相反，則軍部也必須採取相當之手段」，並表示若經濟允許，也希望設立軍部的機關紙，蓋「在非常時，確立

國防強化聯盟辯護士協會へ再依頼〉，《社會運動通信》，1935年11月12日，第2版。

¹⁰² 梁華璜，〈臺灣總督恢復武官制的背景〉，頁81、83-85。

¹⁰³ 〈國家意識に基く精神動員が必要だ〉，《臺日》，1935年12月5日，第2版。

言論統一乃屬必要」。接著，對於武官總督說的流行，表示「××××〔武官總督〕的實現，在此時節上贊成」，不過認為得漸漸實現。最後，提到取締天皇機關說等自由思想一事，臺灣軍雖然不像日本國內積極，但也有一定方策，「為了鼓吹國防思想、確立國體明徵，開催演講會、座談會，頒布手冊，對於一般島民係屬當然，對於如司法官、行政官等官吏也會特別強調」。¹⁰⁴ 沼川的發言，證實了軍部積極掌握輿論，珠諾號事件便是以輿論為後盾所引發，此時更與日人右翼一同提倡武官總督制。這些皆依循著軍部的方針，目的即是為了增強力量，以向總督府的官吏施壓「鼓吹國防思想、確立國體明徵」。

珠諾號事件的相關人士，雖然至 1935 年年底已紛紛離任，但在臺軍部的方針依然延續。1935 年 12 月新上任的柳川平助（1879-1945）軍司令官，來臺前表示「到臺灣也將計畫要大大地致力於宣揚日本固有觀念之敬神思想」。¹⁰⁵ 1935 年 9 月上任的荻洲立兵軍參謀長在熱帶產業調查會上主張積極南進一事，已如前章所述，其對介入統治，促使臺灣人日本化也同樣積極。荻洲上任不久，在國防強化聯盟舉行的茶話會上，表示其巡視各地後，「對臺灣為政者的方針抱有疑問」，尤其是總督府雖然給予臺灣人相當的文化建設，臺灣人卻始終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如此臺灣人終究不能成為日本人。荻洲於是強調，日本人應真心「愛之、教育之」，在殖民政策上，必須重視精神文化的發展，灌輸真正的國體觀念，明徵國體，使其感受國家的可貴。¹⁰⁶

在此同時，共榮協會的存在也開始受到軍部注意。首先於 1935 年 6 月 6 日臺中市公會堂舉行飛行聯隊設置市民大會，某講者指稱陳炘身為機場設置運動委員之一，卻表示機場將增加臺中市民的危險，引來聽眾不滿。¹⁰⁷ 此傳聞雖非事實，陳炘卻為此「反軍」言辭，遭到憲兵隊調查。¹⁰⁸ 接著，6 月 29 日，宮原在鄉軍臺中分會總會上發言表示「若真的體得日本精神，則珠諾號事件不過是小問題而已」，引起鄉軍及現役軍官的憤慨。宮原雖然即刻表示歉意，之後卻又向鄉軍分會長要求道歉，甚至向憲兵分遣隊發出「此後將與軍部一戰」等強硬言論。¹⁰⁹ 陳炘、宮原的言行，逐漸讓兩人成為軍部的眼中釘，甚至開始與鄉軍、民間日人攜手展開攻勢。1936 年 5 月，陳炘特意造訪荻洲參謀長，試探性地提出除去民族偏見、設置漢文科普及漢文、尊重臺灣人的人格等三項希望，皆一一遭到反駁。¹¹⁰

另一方面，總督府對共榮協會的支持消失後，取而代之與臺中市內反對共榮協會的日人接觸。1936 年 5 月，入佐藤次郎、田中政吉、山下季重、園部透等前改進黨人士，獲得總督府文教局與臺中州的諒解，決定設置「臺灣國語協會」促

¹⁰⁴ 〈沼川憲兵隊長の氣焰〉，《昭和》，1935 年 7 月 27 日，第 4 版。

¹⁰⁵ 〈敬神思想の宣揚大いに務める心算〉，《臺日》，1935 年 12 月 12 日，第 2 版。

¹⁰⁶ 〈國防第一線臺灣への暗示〉，《南日本》，1935 年 10 月 4 日，第 8 版。

¹⁰⁷ 〈某臺中市市民代表が暴言〉，《臺灣經濟タイムス》，1935 年 6 月 17 日，第 11 版；〈陳氏協議員の失言〉，《新高》，1935 年 6 月 22 日，第 5 版。

¹⁰⁸ 《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6 月 15 日。

¹⁰⁹ 〈臺中の宮原博士陳謝の意を表す〉，《臺日》，1935 年 7 月 6 日，第 5 版；〈宮原氏の失言問題ふたたび逆轉す〉，《臺日》，1935 年 7 月 10 日，第 9 版。

¹¹⁰ 〈共榮協會幹部連の傲岸不遜なる陳情〉，《臺灣時事新報》，1936 年 5 月 8 日，第 8 版。

進臺灣人的日語普及、生活改善，其為半官性質的文化團體，所需費用由民間捐獻及府、州補助。臺灣國語協會的綱領為：一、宣布絕對尊皇之大義；二、期一君萬民一國一語之徹底；三、在皇風之下，期生活之一新。¹¹¹入佐等人成立國語協會的用意，顯然是要完成其在共榮協會未能達成的理想，也就是以臺灣人的語言、生活習慣之日本化，來達成「內臺融和」，而總督府也予以贊同。共榮協會雖然表明立場，決議不加入國語協會，¹¹²但不久之後即爆發「祖國事件」，不得不面臨停止活動的命運。

1936年，林獻堂參加新民報社主辦的華南考察團，途中經過上海時，據中國報紙刊載曾有「歸來祖國」等語，此事於5月以後開始被臺灣各報紙刊載，尤其以6月17日林獻堂遇襲為始，日人右翼迅速激化，對林獻堂展開全面攻擊，此即祖國事件的大要。¹¹³不過，祖國事件的起因，不單是日人右翼的攻擊，其最初發端實源自在臺軍部。林獻堂回臺不久後，臺灣軍接獲報告，提及林氏在上海曾以華僑身分發表不當言論。軍司令部得知後立即向總督府報告要求調查，但總督府態度曖昧未答應軍部要求，憲兵隊遂於5月自行展開調查。¹¹⁴或許因欠缺有力事證，憲兵隊並未繼續調查，不過此一傳聞已足夠成為日人右翼攻擊的理由。此一暗為軍部，明為日人右翼引發的事件，其攻擊對象不只限於林獻堂個人而已，其實更廣泛地針對所有心懷不同思想的臺灣人，無論其想法已浮現表面或尚屬潛在。頭號目標當然是臺灣人知識分子的代表林獻堂，還有自聯、共榮協會，這兩個知識分子碩果僅存的社會運動團體。

1936年6月17日，在始政紀念日的祝賀會上，「愛國政治同盟」成員賣間善兵衛，勸告林獻堂辭去公職、脫離自聯、公開謝罪，且今後不得參加任何政治活動，¹¹⁵因未得林氏當面答覆，遂出手毆打林獻堂。¹¹⁶愛國政治同盟是眾議院議員小池四郎主導的團體，小池曾與社研共同反對地方自治制，之後在東京設立「臺灣懇話會」持續關注南進國策。或許因為這層關係，賣間遂加入愛國政治同盟。此外，賣間同時也是生產黨黨員。由此可見，賣間此舉並非僅是個人行動，實際上代表在臺日人右翼整體的不滿。

攻擊事件爆發當夜，臺中市內日人首先發難，渡邊國弘（改進黨成員、《臺日》臺中支局長）、勝本七三郎（改進黨成員、《南瀛》臺中支局長），與正好來訪之城田陽夫（《東臺灣新報》臺東支局長），一同訪問州司法主任，要求應追溯調查林獻堂的言行。隔日常見秀夫、山下季重兩律師與其他人士拜訪警務部長，陳述相同意見。¹¹⁷生產黨、皇政會的攻擊也隨之而來，6月20日，皇政會舉辦「聽聞真相」座談會，出席者除前述3名記者外，還有山下好太郎、佐川安一（生

¹¹¹ 〈臺中市内の有志が國語協會を設置〉，《臺日》，1936年5月10日，第4版；〈臺灣國語協會成立〉，《臺日》，1936年5月24日，夕刊第4版。

¹¹²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月報》38（1937年8月），頁129。

¹¹³ 何義麟，〈1930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234-235。

¹¹⁴ 〈臺灣文化運動巨頭上海で排日宣傳〉，《社會運動通信》，1936年5月15日，第1版。

¹¹⁵ 〈林獻堂氏に對する勸告文〉，《臺日》，1936年6月19日，第11版。

¹¹⁶ 何義麟，〈1930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234。

¹¹⁷ 〈老獻堂毆打事件 問題は根本へ遡及か〉，《經世》，1936年6月21日，第11版。

產黨)、林治人(鄉軍),以及其他報社記者,席上意見大致圍繞在總督府未盡到培養臺灣人的日本精神之責,應徹底調查以完善臺灣統治。¹¹⁸對此,林獻堂率先宣布辭去公職,原先欲召開演說會攻擊的臺中市民,於是於 25 日聲明表示將停止追究林獻堂,仍呼籲革新「文治主義式的廢頹官僚主義統治」,實現「臺灣維新」。¹¹⁹

然而,事件繼續延燒至自聯、共榮協會等團體。6 月 29 日山下好太郎向平塚長官進言解散自治聯盟,¹²⁰7 月 1 日生產黨的《拓南新聞》亦主張解散「民族的左翼結社自治聯盟」。¹²¹9 月 12 日各團體繼而在臺中舉辦「不逞思想撲滅演說會」,出席者包括賣間善兵衛、山下好太郎、佐川安一、林治人等,紛紛要求解散自聯、共榮協會、一新會,而《新民報》及《東亞新報》亦應改善,最終以市民大會的名義決議「冠著內臺融和的假面,或在教化美名之下,化為思想匪賊的巢穴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東亞共榮協會,以及霧峰一新會,須認識時局的重大性,從思想國防的見地來看,應速速解散」。¹²²至於軍部則在側面煽風點火,表示「若〔臺灣人在〕一朝有事之際,可能顯露出反國家的態度」將十分危險,絕不可輕視此次林氏的言論,¹²³隨後更以非國民的言詞為由,調查蔡式穀、吳衡秋等無關人士。¹²⁴

日人右翼的第二目標是在表面上拋棄左翼運動,轉向大亞細亞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如前章所述,民眾黨、文協的左翼分子在佐藤佐的指導下,於 1934 年成立「大亞洲黎明協會」。表面上是大亞細亞協會的關聯團體,呼籲貫徹「皇道精神」,實現亞洲團結,¹²⁵但真正目的應是繼續以合法的方式討論中國事務,與共榮協會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可能也欲延續 1920 年代末期的活動,基於階級鬥爭打倒資產階級、《新民報》。¹²⁶大亞洲黎明協會雖號稱要糾合一般大眾,¹²⁷但行動並不活躍,僅於 1934、35 年間與佐藤佐、大同促進會展開幾次演講會、座談會,討論中國情勢及時局問題,¹²⁸1934 年年底曾發行會報《大亞洲公

¹¹⁸ 〈林獻堂氏毆打事件の島民大衆は是をどう見る〉,《南瀛》,1936 年 6 月 27 日,第 8 版。

¹¹⁹ 〈林獻堂事件有志聲明〉,《臺南新報》,1936 年 6 月 27 日,版次不明,收於〈林獻堂先生之活動〉,《六然居典藏史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識別號:LJK_09_12_0301894。

¹²⁰ 〈請解散臺灣自聯 皇政會提出進言〉,《臺南新報》,1936 年 7 月 1 日,版次不明,收於〈林獻堂先生之活動〉,識別號:LJK_09_12_0301894。

¹²¹ 〈白日下に暴露された林獻堂の上海事件〉,《拓南新聞》,1936 年 7 月 1 日,版次不明,收於〈林獻堂先生之活動〉,識別號:LJK_09_12_0301894。

¹²² 〈臺中市民大會の名て三團體に解散を勸告〉,《臺日》,1936 年 9 月 14 日,第 5 版;〈自聯・東協・一新は速かに解散を期せ〉,《南日本》,1936 年 9 月 25 日,第 7 版。

¹²³ 〈歡迎會の謝辭中に“祖國に歸る”と失言〉,《臺日》,1936 年 6 月 23 日,夕刊第 2 版。

¹²⁴ 〈蔡式穀氏憲兵隊で取調べ〉,《臺日》,1936 年 7 月 15 日,第 7 版。〈非國民的な言辭は斷乎として取締る〉,《臺日》,1936 年 7 月 27 日,第 5 版。

¹²⁵ 〈大亞洲黎明協會式〉,《臺日》,1934 年 5 月 28 日,第 9 版。

¹²⁶ 如其成員黃白成枝,至 1933 年時據說仍計劃打倒《新民報》。《黃旺成先生日記》,1933 年 3 月 24 日。

¹²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79。

¹²⁸ 例如〈大亞洲黎明協 本日在基講演〉,《臺日》,1934 年 9 月 16 日,第 12 版;〈非常時局座談會〉,《臺日》,1935 年 4 月 1 日,第 8 版。

論》，由瀛社的蔡敦輝主導，似乎也因財源問題而存續不久。¹²⁹1935年2月，黎明協會成員另組新民研究會，討論臺灣人冠婚喪祭陋習的改良，¹³⁰可推測其仍然依據左翼理念進行社會改良。

祖國事件爆發後，黎明協會最初隨右翼攻擊林獻堂，由黃朝生、曾德志、蔡敦輝、黃白成枝等人組成「非國民林獻堂一派排擊同盟」，要求林獻堂將官方讓與的土地500餘甲提供為國防獻金或社會事業。¹³¹然而，畢竟其非真心擁護日本右翼主張，因此9月就宣布解散。生產黨的佐川、賣間等人聽聞此事，遂質問黃白，並出手毆打。右翼報紙亦主張黃白等人必定是被林獻堂收買，呼籲不可被表面上的右翼言行欺騙，仍應時刻注意這些左翼分子的真正目的。¹³²

第三目標是以辜顯榮為代表的「御用紳士」。如前兩章所述，「御用紳士」雖然表面上支持日本統治，但實際心理仍希望維繫臺灣人的漢文、漢學傳統。同樣的，大亞細亞協會的陳清波、辜顯榮也基於獨立的臺灣人立場展開行動。這些潛藏的臺灣人意識使他們成為日人右翼攻擊的標的。尤其是辜顯榮長期支持原籍惠安縣人之親睦組織「螺陽公益會」及「三邑會」，皇政會便以上述組織「扶植祖國是中華民國的觀念」為由，向總督及辜顯榮要求解散。感覺到右翼攻勢的猛烈，陳清波則迅速表明愛國精神，設立「昭和俱樂部」，號稱遵循日本解放亞洲的使命及日本精神，將致力推廣皇道精神，排擊反對統治方針者。¹³³

總督府如何因應軍部及右翼日人對臺灣人的全面攻擊？在總督府官員看來，軍部是在「不同化臺灣人」的前提下對待臺灣人，但總督府認為此種「因痛恨而毆打繼子」的方式，不能讓臺灣人對日本統治產生好感，應以「覺得可愛所以才毆打」的態度面對。¹³⁴換句話說，軍部主張的就是松井所說「須出強氣」，迫使臺灣人完全服膺日本精神，而總督府則認為應適度改善臺灣人待遇才能贏得認同。祖國事件的爆發，逼迫總督府正面處理此問題，一面壓制過激行動，制止渡邊、勝本兩人於6月30日舉行批評林獻堂與總督府統治的演說會，¹³⁵一面卻也不得不接納軍部意志。1936年7月，總督府召開民風作興協議會，會上酒井武官對日語普及一事，主張新聞、雜誌應以日語，以強化國民意識、國防思想，尤其需要廢除漢文欄，荻洲參謀長亦表示全面贊成。¹³⁶總督府隨之開始調查相關事項。¹³⁷1936年10月，小林總督上任後，總督府與軍部立場更加接近，1937年1月

¹²⁹ 〈大亞洲協理事會 決議變更基礎組織〉，《臺日》，1935年3月7日，夕刊第4版。

¹³⁰ 〈新民研究發會〉，《臺日》，1935年2月18日，第8版；〈冠婚葬祭改善座談會開かる〉，《臺日》，1935年9月21日，第5版。

¹³¹ 〈林獻堂氏に勸告〉，《臺南新報》，1936年7月6日，版次不明，收於〈林獻堂先生之活動〉，識別號：LJK_09_12_0301894。

¹³² 〈右翼三君暴行事件後聞 不逞一派を解剖〉，《全臺新報》，1936年10月1日，第3版。

¹³³ 〈週間社會問題時評〉，《臺灣經濟タイムス》，1936年8月29日，第7版。

¹³⁴ 〈茶前茶後〉，《南瀛》，1936年6月27日，版次不明，收於〈林獻堂先生之活動〉，識別號：LJK_09_12_0301894。

¹³⁵ 〈臺中も戒嚴令下乎〉，《南瀛》，1936年7月4日，版次不明，收於〈林獻堂先生之活動〉，識別號：LJK_09_12_0301894。

¹³⁶ 〈民風作興の答申並に宣言〉，《臺日》，1936年7月26日，第11版。

¹³⁷ 〈漢文欄の廢止問題 漸く表面化する〉，《臺日》，1936年7月27日，第2版。

宣布新學期廢除公學校漢文科，¹³⁸接著，4月臺灣各報同時廢止漢文欄，僅《新民報》延至6月廢止。¹³⁹

在社會運動的方面，1936年10月，宮原在臺中市的民風作興協議會上，發言認為日本過去係透過吸取西洋文明才達成文明開化，因此絕對反對使用排外之皇紀紀年，引發會場上山下季重、勝本七三郎的抨擊，¹⁴⁰鄉軍臺中分會也出面攻擊。宮原不得不辭去鄉軍顧問一職，而共榮協會也決議移轉州政府，州政府則發表聲明將讓協會與民風作興協議會合流。同一時期，原為共榮協會幹部的長岡寬、二瓶源五等人則於6月成立大亞細亞協會臺中支部，10月獲本部認可後，立即延聘知事為顧問，臺中市內日、臺人的對抗終以臺灣人的落敗告終。¹⁴¹隨著1937年4月漢文科正式在新學期消失，漢文欄亦分別在4月、6月廢除，自聯也於8月宣布解散，至此，知識分子僅存的社會運動完全消失，臺灣人希望在大亞細亞主義下維持傳統的理想也全盤失敗。

正如《昭和》對漢文欄廢除之評論，中日「兩國報紙若能互載和漢文」，必能疏通彼此意志，「惜哉我臺報紙漢文欄將廢止矣」，¹⁴²而林獻堂也同樣感嘆「現在臺灣人大多數不能讀和文，欲涵養精神、灌輸文化非漢文不可，今一旦廢刊，置此輩而不顧，其倒行逆施之鹵莽如是也。聞此後將厲行禁止漢文教授，而南支、南洋謀衣食之具亦從此失去矣，豈不可哀哉」。¹⁴³在軍部、日人右翼，甚至包括總督府，所引來的壓制性浪潮下，除了哀嘆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方法了。

六、戰爭爆發前夕的日人右翼與臺灣人知識分子

武官總督的出現，在臺灣人眼中乃是輕視文官總督以來的治績，「係非統治發達之步調」，¹⁴⁴但在日人右翼眼中不啻是數年來宿願的實現。皇政會隨即於1936年11月，向小林總督提出建言，內容包括公學校職員全由日本人擔任、大幅引進日本移民、給予日本人經濟優勢、徹底實行皇民化、解散自治聯盟、取消新民報、排除財閥及派閥勢力、嚴禁警察壓迫人民、廢止文官制服等15項主張，其主旨不外乎全面確立以日本民間人為中心的統治，而臺灣人皆須以日本人為師，完全日本化。如其理由所言，「從本島統治之根源，島民的皇民化及本島防衛的見地來看，我等母國人必須是所有事務之中樞，不待言之」。¹⁴⁵至於皇政會之組織，1936年11月除臺北本部外，另有基隆、花蓮港支部，幹部包括前臺灣改進黨成員山下季重、田中政吉，以及《昭和》主筆柴山愛藏、《經世》記者緒方武歲等人，如表6-6。

¹³⁸ 〈本島公學校漢文科 新學期起決定全廢〉，《臺日》，1937年1月16日，第8版。

¹³⁹ 〈社告〉，《臺日》，1937年3月1日，第2版。

¹⁴⁰ 〈思想團體を誦らす 所謂臺中事件〉，《昭和》，1936年10月3日，第6版。

¹⁴¹ 何義麟，〈1930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頁235-236。

¹⁴² 〈週評〉，《昭和》，1937年3月27日，第13版。

¹⁴³ 《灌園先生日記》，1937年4月1日。

¹⁴⁴ 原文係《新民報》1936年5月29日之社論「外地長官將異動之風說」，轉引自宮川次郎，〈小林總督 何故に武官總督を要求したか〉（臺北：臺灣實業界社，1936），頁96-98。

¹⁴⁵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頁4-6。

表 6-6 皇政會幹部（1936 年 10 月）

職位	姓名
總裁	缺員
會長	缺員
理事	久我懋正、岡今吉、森平太郎、織田真實、柴山愛藏、松井猪兵衛、梶見良策、要千枝太郎、岩崎廣人（基隆）、中島克己（基隆）、山下季重（臺中）、田中政吉（臺中）、福地信夫（臺南）、中島和夫（高雄）、木村欽吾（花蓮港）
主幹	山下好太郎
會計	小佐井益次、片野友市、緒方武藏、永山章次郎、森方男、宮島龍華、馬場弘、南波三郎、淺田米豐、有末貞一、今井力男、中本磯太郎（基隆）、小松利三郎（基隆）、松本光雄（花蓮港）

資料來源：皇政宣揚會，《真の叫》，頁 87-88。

生產黨也於 1937 年 1 月將臺灣事務局升格為臺灣黨務局，準備在各地設置支部，擴大組織。¹⁴⁶其綱領為：一、依大日本主義革新政治經濟外交；二、奉載一視同仁之御聖旨，徹底同化政策；三、民族文化之融合，依循皇道精神之統一；四、與支那南洋諸民族提携，自白人種支配下解放。具體政策與皇政會的建議大同小異，著重皇民化及確保在臺民間日人的權益，另外還有強化國防、積極實施南進事業等。¹⁴⁷3 月以後，生產黨積極向總督府建言，希望強化臺灣總督之地位、權限，兼管南洋廳等，以實行南進國策。¹⁴⁸5 月 9 日，生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島代表者會議，出席者網羅各地的右翼人士，包括西川純、田中一二（臺北）、常見秀夫、遠山景一、長岡寬、勝本七三郎、賣間善兵衛（臺中）等。會上討論總督府官制改革、對日本人實施戶籍法、社會政策、永住政策、強化臺灣國防、撲滅《新民報》、開發東部、設立大調查局等議案。¹⁴⁹隔日依會上決議內容，向總督、高等法院院長、軍司令官等請願。¹⁵⁰

生產黨對臺灣人的攻擊亦有增無減。1937 年 1 月，生產黨以《新民報》發行之亞洲地圖誤將朝鮮與中國印為同色，對《新民報》展開攻擊。¹⁵¹私下甚至與警察結托，欲對霧峰林家滋生事端，連臺中州警務部長亦無法阻止。¹⁵²可以說，小林總督的上任鼓舞了在臺日人右翼進一步擴展勢力，展開更具組織性的活動，並

¹⁴⁶ 〈大日本生產黨臺灣黨務局結成式〉，《臺日》，1937 年 2 月 11 日，第 9 版。

¹⁴⁷ 〈大日本生產黨臺灣黨務局 綱領政策スローガンを發展〉，《新高》，1937 年 4 月 3 日，第 12 版。

¹⁴⁸ 〈生產黨の進言内容 政府要路へ手交〉，《臺日》，1937 年 4 月 3 日，夕刊第 2 版。

¹⁴⁹ 〈生產黨が全島大會〉，《臺日》，1937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生產黨の第一回 全島代表者會議〉，《臺日》，1937 年 5 月 10 日，第 2 版。

¹⁵⁰ 〈改革意見を齎し生産黨が請願〉，《臺日》，1937 年 5 月 11 日，第 2 版。

¹⁵¹ 《灌園先生日記》，1937 年 1 月 22 日。

¹⁵² 《灌園先生日記》，1937 年 3 月 13 日。

積極地向總督府提出建言，呼籲徹底推動皇民化及南進政策。

在這種處境下，臺灣人知識分子還能懷抱著什麼希望，蔡培火的《東亞之子如斯想》，可提供一些線索。蔡氏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解釋，基本上與其他知識分子類似，「我東洋民族間之大真理不在獨立亦不在同化，乃在尊重人格自由之德政與王道也」，¹⁵³此論調使人回想起陳逢源在〈亞細亞的復興運動與日本的殖民政策〉中，強調亞洲復興的基調乃是本於人格、政治自由之民族自覺，而非同化主義。蔡氏欲以亞細亞主義爭取權益的想法，亦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同，如其向大亞細亞協會成員所言，「日華親善之基礎，必置在內臺權益利害一致之上，是以力求政治教育之開放」。¹⁵⁴

不過，相較於其他知識分子，蔡培火最突出的特點或許是他作為一名基督徒對社會改革擁有強大的、宗教性的使命感。當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被迫終止，而眾人亦勸其放棄白話字普及運動時，他堅持「兩者乃臺灣進步之兩大要事，若不能兩者並行，余亦當死守一方始得俯仰無愧」，而繼續推行白話字運動。¹⁵⁵

1935 年之後，這種使命感逐漸從促進臺灣進步轉變為中日親善。4 月，蔡氏聽聞中國社會實情，而中日兩國關係惡化時，感到「爾民眾乎何其愚蠢乃爾耶」，「恨不得一刻早入民眾啟蒙之實際運動」。¹⁵⁶10 月，他質疑即將渡美的賀川豐彥（1888-1960），為何不在日本或中國鼓吹和平。¹⁵⁷11 月，「見日華關係日趨不好，痛感有鞭撻基督信徒蹶起之必要」，而向基督教名士提議教會應率先展開親善活動。¹⁵⁸最後，1936 年初他決定全力投身親善活動。其背景有二：第一是在臺灣進行社會運動，因時勢關係，已逐漸趨於困難；第二是其相信東亞戰亂遠比臺灣之問題還要來得重要，如其日記記載「東亞亂臺灣豈能獨安哉？欲臺灣之進步於斯，當先致力於日華平和」。¹⁵⁹也就是說，蔡培火意識到中日戰端將起，作為臺灣人——身處兩國之間的「東亞之子」，有必要暫且放棄內政改革挺身而出，為東亞和平努力，臺灣才可能進步，這就是他寫作《東亞之子如斯想》的主因。

《東亞之子如斯想》一書，大致可分成兩部分，前半部主要在說明東、西文化的差異。他首先批評科學文化的過度發展，使人類成了「感官滿足的奴隸」，¹⁶⁰過度的物質文明促成西洋各國之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歐洲大戰等暴力爭鬥，¹⁶¹至於東方不只被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蹂躪，¹⁶²就連精神也被西方文明侵蝕，¹⁶³如此，東方的中日兩國將陷入與西方相同的處境，即是「因為貪

¹⁵³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1934 年 4 月 6 日，頁 295。

¹⁵⁴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1934 年 1 月 14 日，頁 282-283。

¹⁵⁵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1934 年 8 月 16 日，頁 300-301。

¹⁵⁶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1935 年 4 月 20 日，331。

¹⁵⁷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1935 年 10 月 13 日，347-348。

¹⁵⁸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1935 年 11 月 6 日，348-349。

¹⁵⁹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1936 年 1 月 14 日，356-358。

¹⁶⁰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東京：岩波書店，1937），頁 22。

¹⁶¹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25。

¹⁶²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26。

¹⁶³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28-29。

欲而兄弟骨肉左右相對陣」。¹⁶⁴緊接著，他批評領土再分割論不過是「霸道」的帝國主義之算計，而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樣注重暴力。¹⁶⁵最後，他以中國的儒教、印度的佛教、中東的基督教三者，闡述東方有著高深的精神文化，從帝國主義的發展程度來看，東洋人的人心也較西方良善。雖然東洋人漸漸只重個人修養，精神文明的光芒遭到少數統治者利用、遮蔽，但仍呼籲「東洋的同胞們，勿自好居於死蔭中，須昂首進出，從光明中走出，光常自我東方發射」，「而後也向西方反映此光芒」。¹⁶⁶

書中，蔡培火提出未曾見於早年的論述，他曾鼓勵臺灣人學習科學，認為「西洋文明，則出我東洋文明之上者遠矣」，原因是「夫我東方文明，僅區區在精神範圍之內，物界之研究，寥然殆無可觀也。西方之文明則不然，精神之上，還有物質之穿鑿」。¹⁶⁷1928 年的《與日本本國民書》中，也未抨擊西方文明。然而，1930 年代西方國家間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橫行，以及西班牙內戰顯露出的暴力，似乎讓他不再青睞西方文明。如其所言，西方國家「比起被基督教純化，反而是受科學文化生活毒害更深」。¹⁶⁸對西方的悲觀態度，以及擔憂東方將如西方陷入戰火的恐懼，使他選擇將基督教自西方文明劃入東方文明，而主張東方文明的重要性。這種論述使他能作為「東亞之子」，依據東方思想提倡東洋（中日）和平，全書論旨遂在此點上貫徹。其一生致力於臺灣進步、民眾啟蒙，甚至是基督教的宣揚，也被賦予一種新的意義，其目標並非朝向科學物質的進步，而是精神的進步，即東方文明（儒教、佛教、基督教）的復興。這就為他戰時致力於中日親善活動，甚至戰後選擇加入中國國民黨——一個強調復興中華民族精神的政黨，並成為國民黨政府之政務委員一事，埋下了伏筆。¹⁶⁹

全書後半部的主旨，則在說明中日親善的重要，以及具體辦法。蔡培火認為，中日親善的理由是兩國在經濟上利害一致，又因同文同種而精神相通。若兩國能親善，則東方諸民族都將更生向上，如此「始能成立東西兩洋的均勢，西方民族、特別是世界之霸者大英帝國，才會從我東方被壓制諸民族之上，取消其帝國主義式的壓制」。¹⁷⁰蔡培火寫作該書的原因，就是認識到臺灣只有在東亞和平的狀態下才能繼續進步，其在臺灣進行的改革才有意義。蔡培火並沒有忘記漢文欄在臺灣被禁止的現狀，但認為只要中日真正親善，自然不會再繼續禁止。¹⁷¹社會改革

¹⁶⁴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38。

¹⁶⁵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64-65，99-101。

¹⁶⁶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150-152。

¹⁶⁷ 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臺灣青年》（1920 年 7 月），頁 46-53。

¹⁶⁸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26-27。

¹⁶⁹ 1966 年，當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時，蔡培火曾表示發揚中華文化，「不僅祇為防止共匪的作為，而且應將我們的文化儘速傳介到西方國家和西方人身上」，蓋「西方國家物質文明鼎盛，而影響到他們的精神生活，使其受害甚大」，而「東方文化（尤其是我中華文化）」，「實是促進世界和平的良方」。
〈發揚中華文化 有助世界和平〉，《徵信新報》，1966 年 11 月 16 日，第 5 版。

¹⁷⁰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184。

¹⁷¹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195。

已從親善的手段移到結果，¹⁷²不只反映出臺灣人不得已的選擇，更是蔡培火個人心境的轉變，他認為夾在中日之間的臺灣人，有義務、且有能力中介調停。如他自言，其父為純粹之中國人，自己又長期身為日本國民，「透過從我父親受到的心情而理解中國的人，透過我自身的經驗，同樣地也理解了日本的人。這是我的特權也說不定，我能真實地正確理解雙方」。¹⁷³

至於具體的方式，蔡培火提出了 3 點希望：中國停止排日，與日本經濟提攜；日本支持中國的統一與主權；滿洲國完全依住民自決未來。¹⁷⁴其中有關滿洲的辦法，讓人想起林震東建議的「極端以誠字」之滿蒙政策，¹⁷⁵至於對中日兩國的建議，更與辜顯榮數次訪中後提出的折衷辦法大同小異。¹⁷⁶兩者的類似性並不令人意外，正如辜顯榮對中國、日本同時具有感情，蔡培火也是同時愛著日本、愛著中國、愛著東亞同胞¹⁷⁷的「東亞之子」，兩人對臺灣改革的立場或許完全相左，情感卻相同。蔡培火所想像的與辜顯榮相同，¹⁷⁸仍然是處於中日間的臺灣人，有辦法能在雙方民族主義的對立下勸服雙方讓步。

然而，如同辜顯榮最終於中日戰火正酣時，在憂愁中過世，蔡培火也同樣不能料到，7 月 5 日全書定稿、準備出版，¹⁷⁹2 天後中日戰爭爆發。不只《東亞之子如斯想》被禁，蔡培火也因該書而被懷疑為國民黨宣傳，1938 年 1 月遭拘留 40 日。¹⁸⁰在此局面下，臺灣人又該如何在兩國之間生存呢？

¹⁷² 在〈中日親善の要諦〉，他認為改善鮮臺統治策，是促成親善的間接方法。蔡培火，〈中日親善の要諦〉，《臺灣青年》（1921 年 8 月），頁 54-55。

¹⁷³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192-193。

¹⁷⁴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225-226。

¹⁷⁵ 參見第四章第四節第一小節。

¹⁷⁶ 參見第五章第三節第七小節。

¹⁷⁷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216。

¹⁷⁸ 兩者的差別，或許只有遊走兩國高官間的辜顯榮，其建議較具調停現實利益的味道，而蔡培火作為從事民眾啟蒙，提倡「國民的眾善外交」、國民親善的社會運動者，其建議更具有理想性。有關蔡培火提倡國民親善的建議，見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173-179。

¹⁷⁹ 蔡培火，〈獻本の辭〉，《東亜の子かく思ふ》，頁 7-9。

¹⁸⁰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頁 21。

第三節 謝龍闊與大同促進會「灰色」之道

一、謝龍闊早年的經歷

1930 年代，標榜大亞細亞主義的各種團體中，謝龍闊（c.a.1895-1940）主導的大同促進會或許是其中最具異色的組織。謝龍闊及大同促進會明顯的親日態度向來受到惡評。¹然本文所擬論述者，乃是謝龍闊的行動，實際上代表著臺灣人在日本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下還有另一種雖非正途，但可行的生存方式。

謝龍闊為萬華人，1915 年就讀國語學校時，曾作俳句慶祝大正天皇即位，日語能力應相當優秀。²之後退學進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在學時參與大學之雄辯會，以雄辯家聞名，1919 年與學弟彭華英一同在民政長官招待的賞櫻會上發表謝辭。³謝氏在臺灣留學生中也有一定地位，曾任高砂青年會幹事，協助招聘名士在例會上演講。板橋林家之林松壽（1899-1938）聽聞後希望給予資助，但謝氏推辭建議改資助彭華英。⁴單從學經歷來看，謝龍闊似乎具充分資格進入知識分子之列。

然而，謝龍闊的人生觀異於與一般知識分子。據張深切之描述，謝氏在廈門擔任日本間諜，拒絕「走直線路」，認為「唯有橫路才是捷徑」，張深切因此鄙視謝龍闊。⁵不過，同為左翼新文學作家之劉捷（1911-2004）則稱讚謝龍闊的行事作風，指出謝「體大力大，志氣磅礴，言行處事，都有大哥之氣概」，又「懂得地道的日本封建精神，堪稱臺灣名士中的奇男子」。⁶那麼，謝龍闊本人又如何思考？1932 年，林獻堂、陳炘拜訪郭廷俊，正好黃純青、謝龍闊在場，5 人便一同雜談時事及人生觀，「炘謂當留名於青史，使精神事業永遠不滅」，而「龍闊贊成炘說」。⁷就學時除了現代知識外，還習得「日本封建精神」，欲「留名於青史」，又不願依循正規手段。這些差異，使得他最終走上與知識分子完全相左的一條道路。

1919 年謝龍闊自明治大學畢業，最初欲入林本源家族任職，因許丙反對而改任職總督府，先後擔任警官練習所臺語兼柔道教官、內務局市街庄課雇員，然皆因不受提拔而離職。⁸轉入民間後，「爾來慣與資產家之子弟結交，從中取利」，甚至因積欠房租而遭逮捕。⁹《臺日》貼切地評論道，謝氏學成歸臺後，「頗以國士自居，然而手腕及其行動，竟為一般人士所不解」，只能流轉任職官廳、報社。

¹ 例如趙勳達指稱其向殖民政權及軍權效忠，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頁 104-106。

² 〈謝龍闊〉，《臺日》，1915 年 11 月 14 日，第 5 版。

³ 〈臺灣學生招待觀櫻會〉，《東洋時報》247（1919 年 4 月），頁 41。

⁴ 〈快男兒謝龍闊君（下）〉，《臺政新報》，1924 年 5 月，第 15 版。

⁵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644。

⁶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九歌，1998），頁 86-87。

⁷ 《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8 月 31 日。

⁸ 〈快男兒謝龍闊君（下）〉；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644。

⁹ 〈謝某被其留置〉，《臺日》，1922 年 11 月 16 日，第 6 版。

1923 年，在臺灣出路有限的謝龍闊前往廈門活動，成為仰賴日本治外法權生存的臺灣籍民。¹⁰ 1923 年 9 月，臺灣籍民與廈門吳姓一族發生衝突，通稱「臺吳事件」，謝龍闊因指揮臺灣籍民自衛團而嶄露頭角。¹¹ 1925 至 1928 年間，謝龍闊擔任總督府主導之《全閩新日報》經理，私下則協助總督府從事情報工作，遏止反日活動。¹² 短短數年內，謝龍闊已在廈門擁有相當勢力，1927、28 年間任臺灣公會副會長。據廈門領事館的調查，謝氏為臺灣武力派，即臺灣籍民無賴漢集團中，「萬華派」的首領之一。¹³

不過，謝龍闊與其他籍民武力派關係不佳，1930 年 4 月 24 日，謝龍闊遭到同為萬華派之吳天賜一派刺殺，身受重傷。¹⁴ 緊接著於 5 月 27 日，又發生福建省要人、國民黨員許卓然遭暗殺身亡的事件，¹⁵ 由於兇手為謝之前部下，謝遂受通緝。¹⁶ 眼見臺灣籍民、當地政府都欲致自己於死地，而領事館也未予支持，謝龍闊決心離開廈門返臺，以完成「大同促進會」一事，作為自己未來的生路。¹⁷



圖 6-2 謝龍闊

資料來源：〈大同促進會總理謝龍闊君と一問一答〉，《臺灣實業界》7：9（1935 年 9 月），頁 14。

二、大同促進會的「無抵抗的抵抗」理想

1929 年 8 月謝氏歸臺時開始籌組大同促進會。當時正處臺灣人社會運動之旺盛期，謝龍闊認為臺灣民眾黨、文化協會的活動只會激起臺灣人的反抗心，耽誤青年未來，不能為臺灣人帶來幸福，於是欲組成一團體，排除民眾黨、文協影響，以謀求日臺人的融合，並使臺灣青年向南支南洋發展，以促進亞細亞全民族之大同團結。為此，他與同樣出身明治大學之彭華英（前民眾黨員）、楊承基（臺南新報記者）討論，10 月此團體定名為大同促進會，同時發布宣言書，謝龍闊並

¹⁰ 〈艀人謝某之消息〉，《臺日》，1923 年 12 月 12 日，第 6 版。

¹¹ 井出季和太，〈民族の動靜より見た臺灣と南支那〉，《東洋》38：9（1935 年 9 月），頁 105；〈機密第 465 號〉（1933 年 8 月 12 日），《台灣人關係雜件》，1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號：A-5-3-0-3，JACAR Ref. B02031443800。

¹²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頁 148。梁華瑣，《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2001），頁 199。

¹³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2002），頁 187-188，202。

¹⁴ 〈前全閩報經理謝龍闊被刺〉，《南洋商報》，1930 年 5 月 13 日，第 14 版。

¹⁵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頁 149。

¹⁶ 不過，謝龍闊對此強烈否定涉案，強調兇手實已成為吳天賜的部下，整起事件皆是吳所栽贓。

¹⁷ 〈機密第 469 號〉（1930 年 10 月 16 日），《台灣人關係雜件》，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號：A-5-3-0-3，JACAR Ref. B02031443300。

命令部下之無賴漢招募會員，其後即於 10 月渡廈。1930 年 7 月，謝龍閣被迫回臺，籌備活動得以復甦，9 月正式在大稻埕新舞臺舉辦成立大會。¹⁸

無疑的，大同促進會是為了打擊知識分子的社會運動而成立，據說幕後為警務局囑託岩崎敬太郎與謝龍閣等右翼臺灣人，欲仿效公益會之故志而推動。¹⁹成立大會上，出席者包括鎌田正威（閩報館長）、森新一（總督官房文書課翻譯官）、岡野才太郎（前總督府判官、律師）等與總督府相關的人士，²⁰顧問為鎌田、岡野、永山章次郎（前總督府判官、律師）。²¹資金來源則是岩田此一（臺北北警察署署長）、藤井慎二（臺灣軍憲兵隊長），加上鎌田、森、岩崎等人，與郭廷俊磋商，由總督府給予郭廷俊菸草專賣權，從獲利中援助。²²同樣出身板橋林家的士林實業家邱木也對大同促進會表示贊成，並特地邀請成員演講。²³另外，大同促進會經營之免費住宿機構「大同宿泊所」的建物，則是辜顯榮無償提供。²⁴

不過，大同促進會不僅是一反動團體而已，如第三章所述，在公益會的背後，實際上帶有辜顯榮等傳統紳士獨自的理念，欲以維護傳統道德為號召，對抗知識分子鼓吹之新文化。無獨有偶的，謝龍閣也是抱持一定理念而創立大同促進會。謝氏在創立前曾投稿〈我為何要發起大同促進會〉一文，其開頭正面回應知識分子之攻擊，認為現在上流社會只會向日人搖尾乞憐，而知識分子雖然在街頭演講展開社會運動，卻很快地被警察中止、解散，甚至被逮捕，結果仍無法實行。大同促進會的目的，便是希望成為具實行力的社會運動。上述言論表面上近乎詭辯，卻透露出當時臺灣社會的問題，也就是親日派的「御用紳士」缺乏意願爭取權利，而致力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終究難以實現改善臺灣人生活的理想。

在謝龍閣看來，臺灣人便處在這種不上不下的淒慘狀態。謝氏指出臺灣人過去隨鄭成功抵抗滿清，又建立臺灣民主國抵抗日本，是「漢民族中，革命精神最優秀的民族」，現在卻缺乏理想、目標，只能安享「日本天年」，消極接受命運。由上可知，謝龍閣與知識分子的看法有所相通，對臺灣人的過去感到驕傲，又對當下臺灣人缺乏進取心的狀態感到不滿。如許多知識分子曾面對過，其早年在臺灣求職無門、遭官廳歧視的經歷加強了他的苦悶。文中所謂「日本天年」一詞，正是形容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與消極態度。²⁵

不過，當知識分子為突破此一苦悶，呼籲「臺人應該復興鄭成功渡來當時祖先的意氣」，²⁶展開爭取權利的社會運動時，謝龍閣的看法卻有不同。他敘述日本人積極向外活動讓日本成為世界之一等國，但臺灣人只消極地對日本不滿。在海

¹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60-1361。

¹⁹ 〈大稻埕の大御所郭廷俊謝龍閣等が睨み合ふ〉，《新高》，1935 年 4 月 13 日，第 8-9 版。

²⁰ 〈大同促進會發會式〉，《臺日》，1930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²¹ 〈新臺灣レビュー〉，《實業時代》（1930 年 10 月），頁 34。

²² 〈郭、謝兩君の喧嘩に沼川隊長の民事調停〉，《昭和》，1935 年 5 月 25 日，第 5 版。

²³ 〈士林大同講演會況〉，《昭和》，1930 年 11 月 1 日，第 9 版。

²⁴ 〈大同宿泊所 瓦壞に瀕す〉，《南日本》，1934 年 12 月 7 日，第 2 版。

²⁵ 「日本天年」一詞，在呂赫若的〈牛車〉（1935 年）也不斷出現，該小說便貼切地以牛車運送業、牛車、水車等比喻臺灣傳統，描述臺灣人在面對「日本天年」帶來汽車運送業、碾米機等更進步的「殖民現代性」時，只能拋棄傳統生活方式，而產生的無力感。

²⁶ 〈東京留學生夏季回臺講演日記〉，《臺灣民報》，1924 年 9 月 11 日，頁 13-14。

外，「臺灣占有著南支南洋發展最適當的地位，三四十年來受到日本文化的洗禮，比中華民國的人還要有優秀的頭腦與技術」，但是臺灣籍民實際上多從事「賤業」，又面對中國民族運動的打擊而意氣消沉；在臺灣，知識分子則因不滿長年的壓迫而追求議會設置運動，或主張階級鬥爭、民主主義等無實行性的高遠理想，皆無法為臺灣人帶來真正的幸福。

對此狀況，謝龍閣提出一種折衷在「搖尾乞憐」的「御用紳士」，以及缺乏實行性之知識分子間的辦法，一種以妥協作為手段的「無抵抗的抵抗」。謝氏主張「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臺灣人必須考量自身立場，不應採取敵視態度，而應贊成同化政策，與日本人共榮共存。不過，謝龍閣特意將「日本皇室一視同仁之御精神」與儒教的「仁、義、禮、智、信」揉合，並主張「同化政策」帶有日本人的優越感，應改用「大同主義」一詞來描述，強調臺灣人應先順服日本的統治，再以此精神激起日本人的仁義心，最終將能達成日本、臺灣、中國人皆無差異的「大同」理想。²⁷

既不像「御用紳士」畏於從事社會運動，又不像知識分子欲否定現狀，謝龍閣的理想就是先與現狀妥協，之後再尋求社會改革。正如謝龍閣之說明，臺灣的「思想人〔按：知識分子〕不到 5、6 萬人，御用紳士連 5 萬人都不到，本島 440 萬人大部分都是灰色階層」，因此只能仰賴「不徹底、旗色不鮮明的大同主義」，時而行社會改良、人民教育或其他改革，才能真正為臺灣帶來幸福，才能「在不自然的臺灣社會中生存」。大同促進會的目的就是「在灰色社會中興起灰色社會運動」。²⁸

不能否認的是，上述言論似乎多在呼籲妥協的必要性，或用儒教思想正當化同化政策，除了提及日本人也應依循「仁」的精神對待臺灣人外，究竟其「抵抗」為何？換句話說，大同促進會在現實上應如何刺激臺灣人的精神，改善臺灣人的生活，達成臺灣人的幸福？這就須觀察大同促進會的具體活動。

大同促進會成立後，將內部組織分成體育、演講、職業紹介、免囚保護、互助、海外、消防、社會教育、平民病院、人事調停、授產、建議、組織、宣傳等部門。²⁹大同促進會的事業看似包山包海，大致可區分成兩類。首先，在臺事業重視更生人、失業者、貧民救濟，該會會員約 4、500 名，大多是無賴漢。³⁰除了施行救濟之外，謝龍閣認為臺灣人缺乏日本人具有之積極進取精神，大同促進會打算施行體育訓練、演講、社會教育等，養成臺灣人的精神修養。其次，關於島外事業之「海外部」，其說明為臺灣人向「南支南洋」發展，將促使東亞之大同團結，因此「海外部」將從事產業調查，以資臺灣人之事業發展及就業。³¹

大同促進會的在臺事業與鼓勵臺灣人向外發展實有密切關係。為何其在臺事業重視無賴漢的教化？按華南之臺灣黑幫籍民，起源自日本領臺後的整治使流氓

²⁷ 謝龍閣，〈私はなぜ大同促進會を起したか〉，《臺灣實業界》（1929 年 12 月），頁 17-19。

²⁸ 宮川次郎，《臺灣の政治運動》（臺北：臺灣實業界社，1931），頁 352-353。

²⁹ 〈大同促進會會員驟增〉，《臺日》，1930 年 10 月 15 日，夕刊第 4 版。

³⁰ 《灌園先生日記》，1930 年 9 月 4 日。

³¹ 〈大同促進會 發會式と其の事業〉，《昭和》，1930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紛紛避走混亂之中國社會，但隨著中國民族運動興起，黑幫籍民開始與日本勢力結合，以武力或謀略捍衛日本及籍民自身之利益，1930年代後更協助推展日本的大陸政策。³²從日本的角度來看，臺灣籍民或許是一個可利用的對象，但對謝龍闊而言，正由於日本在華南勢力的增長，才能為臺灣人帶來救濟。1929年，謝氏曾指出日本勢力的減弱，使臺灣籍民生計受到中國民族運動打擊，但若輸出臺灣的技術人力在廈門發展漁業，「救濟失業者 500、600 人極其容易」，主張總督府應積極向華南發展，如此就能讓臺灣人在當地依正業生存。³³

大同促進會成立目的也在於此，其成立前發表的宣言中即云，「老鰻」（無賴漢）常被為政者及良民視為麻煩，難以國法完全滅絕，必須「施之以恩威」才能讓其成為有價值的人民。大同促進會的計畫，乃是充分調查華南、南洋產業，讓無賴漢前往當地發展，改善生活狀態，以確保其思想不致惡化。³⁴

由上顯示，謝龍闊口口聲聲強調，所謂大同促進會是以妥協為手段之「無抵抗的抵抗」一語，也產生完整、連貫的意義。謝龍闊的理想乃是臺灣人雖然現實上必須「灰色」地妥協在日本勢力下，但若臺灣人積極養成進取精神，並與日本勢力合作向海外發展，就算是走投無路的無賴漢，也能擁有一線生機。誠然，不像知識分子欲追求的是民族人格的存續，謝龍闊的理想最終或許僅能讓狹隘的少數人實現「海外雄飛」的成就而已。但是從謝龍闊在臺灣四處碰壁，前往廈門才得到發展的經歷觀之，上述理想可能是最現實的生存之道。正如趙軍指出，利用日軍勢力實現「亞洲共同體」，使得人們能夠跨域移動、就職，甚至藉此獲得統治者的特權，這一種大亞細亞主義的邏輯，對於生存在差別待遇下的臺灣人極具吸引力。³⁵

大同促進會成立後，積極對外舉行演講會，鼓勵臺灣人向外進取。1930年9月20日至10月19日間，在臺北市內文山、海山、淡水3郡下9個場所，宣傳日臺融和、亞細亞民族之大同團結，每月皆舉行定期演說。³⁶10月20日，士林實業家邱木邀請大同促進會成員前來演講，由邱木發表開會辭後，由謝龍闊、蘇潭等人演講，宣傳大同促進會之精神及臺灣人的海外發展。³⁷1931年4月，謝之同志李爐己歸臺，共同召開政談演講會，提倡修正時局下島民的認識。³⁸按李爐己為蘆洲人，與謝龍闊同樣出身自國語學校，於1915年以師範部乙科首席畢業後擔任訓導，1918年因賭博遭免職，之後至中國活動，曾在鎌田正威主持下的《閩報》擔任記者，私下與中國反政府軍人接觸。³⁹可以說大同促進會欲達成的理想切實地呈現在謝龍闊、李爐己兩人的經歷上。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1月，李爐己在臺灣軍參謀指示下，

³² 詳參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頁81-161。

³³ 謝龍闊，〈南支那に對する發展策は斯うする〉，《臺灣實業界》（1929年11月），頁35-37。

³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63。

³⁵ 趙軍，《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頁288-294。

³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64。

³⁷ 〈士林大同講演會況〉，《昭和》，1930年11月1日，第9版。

³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64。

³⁹ 中村孝志，〈福州水戸事件について〉，《南方文化》9（1981年11月），頁216。

策動福州水戶事件，因此被迫於 10 月避走滿洲。在滿洲，大同促進會的相關人士紛紛尋得新的出路，日軍特務機關控制的滿洲國建國第二軍中，有李燾己（官階中將）、蘇潭（官階少將）、謝龍闊等許多透過臺灣軍渡滿的臺灣人，皆以將官待遇任職。⁴⁰建國第二軍表面上由滿洲人任軍長，實際任免皆操之在這些臺灣人手中，他們領滿洲國支給的經費，從事關東軍交辦的情報工作而積蓄不少財富。⁴¹就連謝龍闊在明治大學的學弟彭華英，也於 1933 年渡滿，成為滿洲電信電話會社社長之秘書。⁴²這些人在滿洲的經歷證明了謝龍闊的理想具有可行性，日本勢力的增強確實能使臺灣人擴大生路。於是當右翼、軍部勢力開始提倡大亞細亞主義，鼓吹日本應向中國、南洋增強勢力時，謝龍闊也自然依循其「灰色」的生存原則，與軍部勢力進一步合作。

三、1930 年代之大同促進會

1933 年 8 月，謝龍闊自滿洲回臺，⁴³10 月發表「大同促進會非常時宣言」，肯定軍部之大亞細亞主義，攻擊自治聯盟暗藏反內地延長主義的態度，主張實現「真正的內地延長」，使臺灣人的權利義務皆與日本人相同，包括以兵役捍衛亞細亞民族，如此才能達成日臺融和，並進一步實現亞洲團結。不久訪問松井軍司令官表明支持，而大同促進會「將愈加倍以強力之熱意，更加宣揚皇道精神於宇內，以期大亞細亞聯盟急速結成」。⁴⁴

之後，謝龍闊在臺灣公開與日人右翼合作擁護軍部，並呼籲臺灣人亦應協助日本捍衛國防。1935 年 6 月國防強化大演說會上，謝龍闊演講「臺灣人與國防問題」一文，攻擊中國國民黨政權缺乏能力反共，主張應立即向臺灣人實施徵兵制，協助日本達成大亞細亞主義理想，⁴⁵並在會後參加臺灣國防強化聯盟。10 月，臺灣國防強化聯盟舉辦座談會，謝龍闊再次表示應立即實施徵兵，同時賦予臺灣人參政權，認為唯有日本的武力才能拯救中國，握有東洋霸權，因此「本島人應好好地覺醒，成為第二之大和民族」。⁴⁶軍方也對大同促進會提供一定後援。同年 5 月，謝龍闊指控郭廷俊獲得菸草專賣權後未照約定給予金援，雙方相持不下。對此，沼川憲兵隊長出面調停，明定郭氏不再提供資金，但答應將確保郭氏提供「精神援助」。⁴⁷

在島外，當軍部欲在中國推展大亞細亞主義時，經常利用臺灣人身處中、日間的特殊身分，施展各種謀略工作。呼應此一需求，謝龍闊之行動也與軍部密切

⁴⁰ 花村一平，《中國革命的舞台裏》（東京：原書房，1973）頁 193-194。

⁴¹ 如黃竹堂便提及一名在李燾己公館遇見的臺灣人陳長初，原先相當貧困，但靠著在建國第二軍任職而積蓄了數千円。黃竹堂，《新興滿洲國見聞記》（臺北：黃竹堂，1933），頁 75-79。

⁴² 許雪姬，《離散と回帰：「満洲国」の台湾人の記録》（東京：東方書店，2021），頁 235。

⁴³ 〈機密第 465 號〉（1933 年 8 月 12 日），《台灣人關係雜件》1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號：A-5-3-0-3，JACAR Ref.B02031443800。

⁴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1365-1369。

⁴⁵ 〈聽衆堂に満ち殺氣漲る〉，《昭和》，1935 年 6 月 8 日，第 9 版

⁴⁶ 〈時局を衝く座談會〉，《昭和》，1935 年 8 月 10 日，第 8 版

⁴⁷ 〈郭、謝兩君の喧嘩に沼川隊長の民事調停〉，《昭和》，1935 年 5 月 25 日，第 5 版。

相關。1932年6月，謝龍閣前往東京，頻頻訪問軍部、政界人士，希望借用日本力量在福建建立新國家。⁴⁸如前章所述，謝龍閣之後獲得東京軍部的信任，1932年11月，參謀本部大城戶三治中佐致信廈門三浦義秋領事，請求為即將來廈的謝龍閣提供保護，謝則自稱受某方面之意，打算進行某種謀策。⁴⁹1933年底閩變爆發，謝即擔任軍部的諜報者，據說私下率領流氓4、50人，自稱是第19路軍的密偵、保境隊，向臺灣籍民收取保護費。⁵⁰1934年10月，謝龍閣、蘇潭與日本國內右翼聯合，試圖利用自稱為鄭成功第12世孫之「鄭旭」，顯揚鄭成功事蹟，鼓吹日中親善，不過中國輿論認為日方實欲利用鄭旭在華南建立傀儡政權。鄭旭最終則被證實為冒牌貨遭總督府逮捕。⁵¹中國方面的情報，也記載謝龍閣於1935年間與軍部關係密切，⁵²曾奉酒井武雄的命令，在廈門招募流民、土匪。⁵³

上述與謝龍閣來往的沼川、酒井等人，皆是大亞細亞協會之成員。另外，謠傳1935年時陸軍統制派欲推翻岡田啓介內閣，推舉南次郎(1874-1955)為首相、松井石根為陸相，為了確保活動資金，松井便利用大亞細亞協會的人脈，自財閥、臺灣實業家獲得，謝龍閣也曾為此奔走。⁵⁴謝龍閣在島外從事的陰謀活動，似乎皆為松井主導之大亞細亞協會活動的一環。

不過，在擁護軍部的背後，仍然存在著「無抵抗的抵抗」。1935年4月，謝龍閣代表大同促進會向陸軍大臣提出建議書，內容包括：(1)徵兵制度即時施行；(2)護照發給手續簡易化；(3)日華間國籍取捨簡易化。表面上的理由展現明顯的愛國精神，指出臺灣人希望盡國民義務，為日本而戰，並向中國人宣傳日本的真意，促進中日親善。至於日華國籍取捨簡易化，則是使兩國關係更緊密，讓生靈塗炭的中國人能「浴於皇恩」，同時不願接受日本國體、謳歌祖國的臺灣人

⁴⁸ 〈高秘第1310號〉(1932年6月23日)，《要視察人關係雜纂／本邦人／部／台灣人關係》，6／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I-4-5-2-2_2_2，JACAR Ref.B04013163500。

⁴⁹ 〈第446號〉(1932年11月1日)，《滿洲事變／排日、排貨關係／排日暴行關係》第1卷，2／1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1-1-0-21_5_4_001，JACAR Ref.B02030350700。

⁵⁰ 〈對岸籍民から搾取す〉，《南瀛》，1934年3月31日，第2版。

⁵¹ 鄭旭事件的相關報導，如〈鄭成功の第十二代の正嫡 鄭旭氏が來臺〉，《臺日》，1934年10月23日，第7版；〈鄭氏家族 揭發鄭旭之醜行〉，《申報》，1936年8月8日，第12版；有關謝龍閣的參與，見〈外秘第277號〉(1935年2月7日)，《要視察人關係雜纂／本邦人／部／台灣人關係》，6／分割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I-4-5-2-2_2_2，JACAR Ref.B04013163500。有關鄭旭事件的詳細經過與意義，另可參見 Cheng-Heng Lu (盧正恒)，"One Family, Four Worlds: Koxinga's descendants and nationalism across the modern East Asia,"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Berliner China-Hefte), No. 51 (2020), pp. 5-22.

⁵² 〈蔣鼎文電蔣中正等〉(1935年2月11日)〈迭肇事端 (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200-00015-380；〈蔣鼎文電蔣中正〉(1935年6月21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 (三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232-066。

⁵³ 〈蔣鼎文電蔣中正〉(1935年8月23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 (三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57-019。

⁵⁴ 據說當時負責奔走者有中國浪人岡田有舜、宮本某、謝龍閣，提供資金者包括大倉財閥相關人士，臺灣則有後宮信太郎、辜顯榮、林熊祥、臺灣糖業聯合會、貝山好美等。此謠傳出自憲兵隊收集的「探聞事項」，原件存在狀況不明，但可見於岩淵辰雄，《軍閥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48)，頁85-86。

能脫離國籍。⁵⁵ 實際上，對照「大同促進會非常時宣言」，鼓吹施行徵兵制度隱藏著賦予參政權，使臺灣人、日本人在權利義務上完全平等的意涵。臺灣人渡中護照制度，更是知識分子屢屢呼籲廢止的差別待遇，如《新民報》社論即以「臺灣人的南華進出，為東洋民族的共榮共存及圖日華兩國的親善，當有重大的使命與貢獻」為由，呼籲廢止。⁵⁶ 至於國籍取捨簡易化，從謝龍閣的活動可以推斷其真正目的是使臺灣人更輕易地利用漢民族背景遊走在中、日兩國間謀求自身發展。謝龍閣與軍部、右翼合作之舉，或許為知識分子所不齒，但正是這些言行才能讓他在不受右翼抨擊的狀況而推動臺灣人的海外發展。

作為唯一一個 1930 年代不受右翼攻擊的社會運動團體，大同促進會在臺灣尤其吸引不少左翼知識分子參與。趁謝氏歸臺的機會，大同促進會於 1935 年 4 月重整陣容，決議進出中南部及東部，⁵⁷ 並推舉幹部為總理謝龍閣，總務林啓清、謝廉清、高樹發，幹事長周合源。⁵⁸ 其中謝廉清（1903-1961）曾於 1924 年與許乃昌一同留學莫斯科，之後脫離共產運動並在北京活動，1932 年後長期任《新民報》記者。⁵⁹ 不只擔任大同促進會的幹部，謝廉清也參與了臺灣軍部的對中工作，1935 年 3 月廖氏貴（蔡蓮舫妾）受臺灣軍參謀土橋一次委託，赴中從事親善活動，謝廉清即作為翻譯同行。⁶⁰ 無獨有偶的，許乃昌（1907-1975）同樣於 1932 年進入《新民報》，⁶¹ 也同樣加入大同促進會，其參與程度不明，但曾致力推動嘉義支部的成立。⁶² 至於周合源（1903-1993）則長年協助施乾（1899-1944）主持愛愛寮，從事乞丐救濟事業，而後左傾，並於 1931 年總督府對共產黨的鎮壓中被捕，最終以無罪釋放。⁶³ 這些左翼知識分子加入的原因，或許就是感到唯有妥協才能續行抵抗，實施社會改革的現實情形。

大同促進會在臺灣進行的社會運動主要有二：首先是北京話教育。因應九一八事變後臺灣人前往中國發展的需要，1932 年 6 月召開首次北京語速成講習會，大同促進會幹部王祖屋擔任講師，每日夜 7 時半於大同講座召開 2 小時，為期 2 個月。⁶⁴ 1933 年 1 月，改由臺北高商囑託王德欽（滿洲人）、李國鈞（天津人），

⁵⁵ 〈台灣に徴兵制度即時施行外 2 件〉（1935 年 4 月 11 日），《昭和 10 年 請願建議等に関する書類》，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10073328700。

⁵⁶ 〈就臺人之渡華 促當局的留意〉，《新民報》，1934 年 4 月 20 日，版次不明，收入李承機主編，《六然居存日刊臺灣新民報社說輯錄 1932-3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9），頁 4-242。

⁵⁷ 〈大同促進會陣容一新〉，《昭和》，1935 年 4 月 29 日，第 17 版。

⁵⁸ 〈會事〉，《臺日》，1935 年 4 月 18 日，夕刊第 4 版。

⁵⁹ 《灌園先生日記》，1931 年 4 月 15 日。

⁶⁰ 〈領機密第 56 號〉（1935 年 4 月 6 日），《台灣人關係雜件》，1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A-5-3-0-3，JACAR Ref.B02031444100。

⁶¹ 黃秀政編纂，《續修臺北市志 卷 9 人物志 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頁 135-136。另外，有關許乃昌與謝廉清兩人的早年生平，朱真一曾作相當之整理，見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臺灣與歐美的交流（15）早期留俄的臺灣人（2）：許乃昌及謝廉清先生〉，《臺灣醫界》51：2（2008 年 2 月），頁 52-56。

⁶² 〈嘉義寄せ書〉，《臺灣時事新報》，1935 年 5 月 24 日，第 12 版。

⁶³ 陳儀深訪問，〈周合源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9 期（1999 年 6 月），頁 125-149。

⁶⁴ 〈會事〉，《臺日》，1932 年 6 月 10 日，夕刊第 4 版。

以及大同促進會陳龍等人負責教學。⁶⁵由於成果頗佳，1933年4月在原有的初等科上新增高等科。⁶⁶1935年5月講習會進一步擴大，總督府認可開設北京語、日語、漢文講習會，講師共9名，常任講師為王德欽、謝龍闊、謝廉清、李遂初（瀛社文人），名譽講師為謝汝銓（瀛社文人）、葉煉金（瀛社文人），助講師為林梧村（中華總會館總幹事）、謝瀛洲（萬華開業醫）、施乾。⁶⁷之後又設立滿洲語講習會，由王德欽負責，課程有漢文、滿語，至1936年2月已畢業數回，畢業生達300人。⁶⁸從講習會成員包括知識分子及傳統文人觀察，可以說大同促進會已非甫成立時以流氓為主的團體。如前所述，維繫漢文教育，使臺灣人有能力向海外發展，乃是1930年代臺灣人共同的心聲，他們選擇與大同促進會合作，無非因為在攻擊漢文的熱潮下，大同促進會仰賴著表面的親日態度，竟能夠蒸蒸日上地舉辦講習會。當林獻堂的一新會因戰爭爆發而被迫停止教授漢文時，⁶⁹大同促進會的講習會仍是少數獲許可的教育機構。⁷⁰

大同促進會從事的第二種活動是宗教陋習的改善，如同其他的活動，也採迂迴方法實行。1935年6月，大稻埕霞海城隍廟舉辦祭典，紙枷依例年慣例由崇神會以每枷30錢販售，收入頗豐。對此，大同促進會則以崇神會壟斷寺廟財產、特權，且收支不清為由，另立「顯正會」，以15錢販售紙枷。⁷¹隨後，大同促進會又召開2次「惡風陋習打破大講演會」，謝氏並在報紙撰文表示，其賣枷目的並非為了獲取暴利，而是為了廢除紙枷之迷信陋習，明年將以5錢販售，再一年即可使陋習完全消除。⁷²受此事件的刺激，1936年6月崇神會決議廢止紙枷、塗面習俗，⁷³大同促進會也將剩餘紙枷燒毀，並召開演說會公開報告。⁷⁴除了廢除紙枷，同年8月11日，大同促進會在萬華龍山寺舉辦中元普施改善座談會，⁷⁵18日再舉辦演講，講者陳龍、周合源、陳氏粉葺，以及民選市議李朝北等人，紛紛提倡「萬華更生」。⁷⁶眼見大同促進會的社會改良有所成果，施乾也於1936年6月宣布成立「國民社」，認為紙枷廢止僅是末端工作，欲以日本精神的養成徹底改正舊慣。⁷⁷

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夕，大同促進會的人士紛紛前往日軍控制的華北。李燼己早於1935年在板垣征四郎的援助下，以「李志堂」之名號，擔任日本特務機關

⁶⁵ 〈會事〉，《臺日》，1933年1月19日，夕刊第4版。

⁶⁶ 〈北京語夜學會舉修業式〉，《臺日》，1933年4月2日，第8版。

⁶⁷ 〈大同促進會講習會を開く〉，《臺日》，1935年5月23日，第11版。

⁶⁸ 〈大同夜學會 講滿洲語〉，《臺日》，1936年2月12日，第8版。

⁶⁹ 《灌園先生日記》，1937年10月12日。

⁷⁰ 《臺北市志：卷十 雜錄叢錄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2），頁33。

⁷¹ 〈顯正會謹告稻江各界人士書〉，《昭和》，1935年6月22日，第14版。

⁷² 〈賣枷は廢枷のためである〉，《臺日》，1935年7月24日，夕刊第3版。

⁷³ 〈城隍祭典恒便遶境 紙枷塗面決定廢止〉，《臺日》，1936年6月15日，第8版。

⁷⁴ 〈首枷廢止演說會〉，《臺日》，1936年6月24日，第7版。

⁷⁵ 〈會事〉，《臺日》，1936年8月11日，夕刊第4版。

⁷⁶ 〈人氣が悪い不忠僕〉，《經世》，1936年8月23日，第17版。

⁷⁷ 〈臺灣人大衆へ日本精神を呼かく〉，《社會運動通信》，1936年6月27日，第2版。

買收之天津《庸報》社長，⁷⁸並出版《國民政府的政績》一書，攻擊蔣中正政權的惡政。這當然只是表面上的行動，實際上李氏仍為特務機關從事情報工作，據傳為 1935 年 5 月天津親日報社社長被槍殺之「河北事件」的兇手。⁷⁹謝廉清在荻洲立兵參謀長的推薦下，1937 年 1 月赴北平活動，不過至 6 月仍未有職業。⁸⁰謝龍閣則於 1937 年 5 月以「閩民自治同盟會」執行委員身分駐天津，負責聯絡華北各親日自治團體。⁸¹

第四節 小結

如佐藤佐所引述，「無法達成徹底的內臺融和，又算什麼大亞細亞主義？」九一八事變後日、臺人民族差異的明顯化，似乎僅顯示出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論述根本站不住腳。於是，致力推動大亞細亞主義的松井石根來臺後，便抨擊「內臺不融和」的現況，指摘總督府對臺灣人過度包容，導致臺灣人繼續維持既有的漢民族精神，而不願接受「皇道」。1930 年代的臺灣右翼依循著松井的想法展開活動，山下好太郎主導的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以及受山下邀請來臺建立組織的生產黨，紛紛主張反對地方自治制，施行武官總督制，以「強氣」積極推動臺灣人的日本化，達成「內臺融和」，如此方能證明日本確實有能力作為亞洲盟主，也才能建立堅實的南進基礎。

同樣面對「內臺不融和」的現況，臺灣人知識分子提出相反的解法，指稱只有允許臺灣人擁有與日本人相同的權利，贏得臺灣人民心，才能實現真正的「內臺融和」，也才能進一步成為亞洲盟主。最初，知識分子試圖以此說法推動地方自治制，眼見日人右翼不斷攻擊自治制後，轉而以東亞共榮協會與日人右翼周旋。東亞共榮協會為三方勢力協調之下的產物，知識分子期待以表面上對日本精神的鼓吹，減緩日人壓力，爭取平等權利；以改進黨為主的右翼日人，拋棄既有的種族主義主張，改以大亞細亞主義促使臺灣人接受皇道；總督府則居間調停，期待大亞細亞主義能夠使雙方放棄激進的社會運動，減緩雙方對立，確保統治穩定。

共榮協會成立之初，尚能仰賴竹下知事的後援，在各地推展支部，然而隨著陳炯、宮原武熊兩理事的立場漸趨一致，共榮協會漸漸偏向臺灣人，引起日人委

⁷⁸ 本山文平，《夢の九十年》（東京：主婦の友出版，1978），頁 124-12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報海鉤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 127-129。

⁷⁹ 秦郁彥，〈盧溝橋事件余話〉，《UP》26：5（1997 年 5 月），頁 23-27。

⁸⁰ 《灌園先生日記》，1937 年 6 月 23 日。

⁸¹ 〈事略稿本〉（1937 年 5 月 5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60100-00123-064。

員的不滿，日、臺人間的正面衝突，遂以《臺中新報》的發刊為導火線爆發，並以 1934 年 10 月右翼日人委員的辭職告終。緊接著 1935 年 1 月，竹下知事離任，共榮協會失去一大後盾。此後的情形，幾乎恢復到協會成立前自治聯盟與右翼日人對立的狀態，一方為臺灣人控制的共榮協會與《臺中新報》，另一方則是民間右翼日人虎視眈眈地準備攻擊。1936 年 6 月，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發動「祖國事件」，對臺灣人發動全面攻勢，共榮協會也因此告終。

祖國事件發生後，總督府開始接受軍部意見，10 月武官總督小林躋造上任後，公學校漢文科、新聞漢文欄相繼遭到廢除。對此，日人右翼頗表歡迎，並提出各種激進的皇民化、南進建議。至於知識分子如蔡培火，面對社會運動不得不暫停的情形，雖然將希望寄託在對外的中日親善，終究也因戰爭爆發而破滅。

當軍部主張的大亞細亞主義正一步一步邁向實踐時，臺灣人的理想也一步一步遭到摧毀——東亞共榮協會的「內臺融和」因祖國事件瓦解，辜顯榮、蔡培火的中日親善工作亦因戰爭爆發而失敗。於此夜幕低垂之時，為臺灣人提供另一道灰色之光者，乃是謝龍闊的大同促進會。謝龍闊主張臺灣人與其抗拒大亞細亞主義終至落敗，不如順應大亞細亞主義，依附在日本勢力下，以臺灣人的身處中、日間的特殊身分協助日本的對中工作。此法雖非正軌，但確實使臺灣人得到了另一條出路，也能藉機在臺灣進行漢文教育、社會改革，養成臺灣人海外發展的實力。當戰爭爆發後，隨著日本勢力增大，臺灣人在中國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也將有更多人投身此途。

第七章

大亞細亞主義與戰爭時期之臺灣

1937 年 7 月 7 日深夜，北平近郊靠近宛平城的蘆溝橋一帶，實施夜間演習的日軍遭不明射擊且有一名士兵失蹤，中日兩軍以此為導火線爆發衝突。之後，衝突不斷擴大，演變成日本對中國、英美的全面戰爭，直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本章的焦點擬探討此一戰爭隱含著什麼樣的大亞細亞主義理想，總督府如何呼應、援用這種理想以實施戰爭動員，使臺灣成為「大東亞的中心」，而臺灣人如何回應？

第一節 中日戰爭爆發與總督府之因應

一、臺灣人的民心與大亞細亞主義宣傳的開始

松浦正孝的研究指出，蘆溝橋事件從地方性事件逐漸擴大，與大亞細亞協會的活動有著密切關係。蘆溝橋事件爆發後，大亞細亞協會成員、支那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積極促使陸軍中央採取強硬方針，7 月上旬松井石根時也數次向政府、陸軍中央進言。8 月，日本政府決定派兵上海，松井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表面上理由為保護上海日僑，但對松井而言，則有打倒蔣介石政權，實現「正義皇道的精神」、「大亞細亞主義」的意義。10 月日本增派軍隊向南京進軍，松井甚至在占領地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此一紛爭已成了推翻蔣介石政權，阻止英美在東亞謀策的「聖戰」。¹

對此「聖戰」的爆發，臺灣島內輿論最初可說是一面倒擁護日本。7 月 13 日，高雄市首先召開市民大會，會上中島文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高雄支部成員、《臺日》高雄支局長）、中村秀（鄉軍成員）發表意見，決議支持政府行動。²15 日，臺北市內各團體聯合舉辦「對支時局演說會」，三卷俊夫（臺北商工會代表）等 20 名講者紛紛呼籲「膺懲暴戾支那、對支強硬」，強調「南方生命線之臺灣島民不拔之決意」，決議此際應痛擊中國，「以圖安定東亞百年之安定」。同日，臺中州住民有志召開類似的演說會，會後亦以州民大會名義擁護政府。³27 日，總督府評議會員、全島各州市會議員、三廳有志住民、臺北商工會會員共同在臺北舉行「對時局島民大會」，參加者除了臺北市內各官廳團體成員及全臺各地代表外，

¹ 松浦正孝，《「大東亞戰爭」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582-632。

² 〈舉國一致して 國難に當れ〉，《臺日》，1937 年 7 月 14 日，夕刊第 2 版。

³ 〈暴戾あくなき支那を膺懲せよ〉，《臺日》，1937 年 7 月 16 日，第 11 版。

還有總督府內務局長、臺北州知事、臺北市市尹、軍參謀長等人，唐澤信夫（《新高》社長）主持，河村徹（《臺日》社長）任座長，通過宣言，決議表示「吾等五百萬島民於茲舉島一致支持帝國政府的方針」。⁴島民大會結束後召開演說會，講者及題目如表 7-1。個別內容雖不清楚，但據報載，大致皆強調日本係為了使中國徹底改變抗日態度，確保日中親善、東洋和平而開戰，均極力主張唯有武力方能解決及即時開戰。⁵

表 7-1 對時局島民大會演說會講題一覽

講者	講題	講者	講題
柴山愛藏	開會辭	菅野秀雄	唯斷之一字
中島文雄	我等將起	鈴木重嶽	北支事變與對支問題之根本解決
小室興	徹頭徹尾膺懲	松尾溫爾	尺蠖之屈係為伸
福井公	促全島之自覺	林治人	為了東亞黎明而等待大雷雨
中辻喜次郎	就梅津何應欽協定	中村秀	非常時到來
和田二三松	日支之舞臺正在旋轉	清水源太郎	迅速解決我們國民之義憤
宇田繁	舉起之拳	阿久澤胖	斷乎膺懲
岸達躬	東洋和平之確立與正義之戰	蘇泰山	我等於非常時之覺悟
唐澤信夫	斷乎開戰	古屋貞雄	代天誅之
吳蘅秋	為了極東永遠的和平	王開運	我等責任重大
宮川精九郎	檄島民	高木拾郎	當干戈相交時國民之覺悟
蔡式穀	我等前進之道	田上忠之	監視近衛內閣
津下豬太郎	不堪脾肉之嘆	安田勝次郎	閉會之辭

資料來源：〈即時開戦し 暴戾支那を膺懲せよ〉，《新高》，1937 年 7 月 31 日，第 8 版。

如表 7-1 所示，演說會講者中，言論界人士有柴山愛藏（《昭和》主筆）、唐澤信夫、古屋貞雄（律師、《臺灣時事新報》社長）、田上忠之（《臺灣公論》社長）、中島文雄等；實業界有中辻喜次郎（臺北）、福井公（花蓮）、宇田繁（基隆）、宮川精九郎（高雄）、阿久澤胖（屏東）、高木拾郎（高雄）等各地實業家；其他還有小室興（臺中）、和田二三松（臺南）、安田勝次郎（臺北）等律師，以及林治人（鄉軍城西分會長）、中村秀（高雄鄉軍成員）等鄉軍成員。至於臺灣人，有蔡式穀（臺北律師）、吳蘅秋（彰化實業家）等長期參與社會運動者，王開運（臺南實業家）為自聯成員，蘇泰山（高雄米穀商）曾與楊肇嘉一同反對米穀統制案。講者的身分確實顯示出不分臺灣人、日本人，全臺皆支持日本政府行動。

⁴ 〈“支那を膺懲せよ”と 五百萬の島民起つ〉，《臺日》，1937 年 7 月 28 日，第 7 版。

⁵ 〈即時開戦し 暴戾支那を膺懲せよ〉，《新高》，1937 年 7 月 31 日，第 8 版。

不過在表面輿論下，日臺融和的問題卻依舊存在。1937年9月，臺灣軍司令部統整了蘆溝橋事變後臺灣人對日本不利的言行，向中央提出報告，其云：

可以觀察到，除了一部分之外，〔一般臺灣人〕仍受明哲保身及順應大勢的觀念支配。亦即仍過度相信支那之實力，依然基於民族觀念將支那視為祖國、誹謗我國，希望支那之勝利乃至臺灣回歸支那者占過半，且無法杜絕對時局有害之惡質流言之狀況。

〔中略〕

要之，透過此次北支事變觀察，本島人皇民化程度之實情仍不堪寒心，更不容在防備上苟安。

此事實為四十年來對本島人施政方針之結果，現在正是痛悟其非變更其方針之時機。軍部鑑於戰時防衛態勢，須即時與總督府協力，果斷講求適當之處置。⁶

雖然小林總督上任後，為促進臺灣人的皇民化，逐步廢止漢文科、報紙漢文欄，並對臺灣人的社會運動施壓，顯然至事變發生時成效依舊有限。從防備的立場來看，軍部當然感到「不堪寒心」。從統治的角度來看，總督府也有同感，1937年7月，軍司令官畑俊六（1879-1962）在日記中提及：「特別鑑於臺灣特殊之事情，雖然軍部聊有過度之舉，但現在好不容易宣傳起來後，若不徹底地解決，軍部將陷於困難的立場。總督及州知事、局長等也希望，此際應為將來之統治，對支那加以一擊」。⁷可見事變爆發後總督府與軍部趨近一致，面對臺灣人「過度相信支那之實力」的情形，總督府對外積極擁護軍部，希望能使臺灣人徹底拋棄對中國的期待，鞏固未來統治。

對內，總督府除了展開皇民化運動外，亦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兩者實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如前章所述，臺灣人的「皇化」，本身即屬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面向，當日本試圖以戰爭實現對外的「皇道宣布」時，對內的「皇化」更不可忽視。1937年8月，新任軍司令官古莊幹郎（1882-1940）向記者表示皇民化為第一要務，「使本島人真正地皇民化，擴充皇化至對岸，才可能真正達成日支親善的目的」。⁸另一方面，大亞細亞主義宣傳也能說服夾在「新恩舊義」間的臺灣人，更願意接受日本的皇民化運動、戰爭動員，為日本實現「日支親善」、「拯救亞洲」的義戰付出。

7月24日，外事課長坂本龍起以廣播演講「關於北支事變與國民的覺悟」，強調滿洲國的建立是「以皇道精神為經，東洋道德為緯，開拓了東亞民族合作之安居樂業的新天地，為東亞將來帶來一大曙光」，然而國府卻不能理解此理想，於是日本國民必須「使其知悉抗日侮日為自掘墳墓，同時向帝國國運之恢弘及東

⁶ 〈北支事變を通して見たる本島人の皇民化の程度〉，《支受大日記（密）》，其4（昭和12年9月4日至9月2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4120039500。

⁷ 伊藤隆，照沼康孝編，《畑俊六日誌》，頁106。

⁸ 〈本島人の皇民化 第一にやらねばならぬ〉，《臺日》，1937年8月14日，第7版。

亞民族的繁榮邁進」，國民之覺悟即在於茲。⁹

為求宣傳徹底，總督府更將相關內容譯成漢文，供警察訓話時使用。7月23日，為謀徹底實行政府方針，達成官民一致，小林總督召開總督府評議員懇談會，會上總督先發言，接著軍參謀長、海軍武官、外事課長等人說明事變現況。¹⁰總督的發言會後譯成漢文，刊登至供警察學習臺語的雜誌《語苑》上。其中強調日本使命為確保東洋和平，與中國共榮共存，必須促使抗日之中國反省，才能達成東洋和平。此時日本國民應舉國一致支持政府，身處「帝國南門的鎖匙」、「南方國防的第一線，與一衣帶水的南支那相對面」的臺灣人，更要有所覺悟。¹¹不只是臺語宣傳而已，事變後刊載在《臺灣警察時報》，針對客家人的時局訓話中，也出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內容：「東洋愛東洋人管正着」，「日支兩國係和東洋就噲興，係唔和東洋就噲衰，東洋兩大國係衰個時節，噲被西洋人占去」，「寧果唔好戰，日滿支三國來提攜，保持東洋個平和正好」。¹²隨著戰局持續發展，戰爭動員的需求越來越高，總督府的宣傳也更為全面。

二、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南支綜合調查」

除了宣傳之外，具體的南進措施隨之展開。事變爆發後，總督府為求確保統治，拋棄對中溫和的態度，支持軍部對中國採強硬措施。1937年12月，小林總督向總理及各大臣提出「關於支那事變收拾方法之意見」，主張以武力進占華南，並指出「事變善後之策若不能廣泛涉及全支，不能永久收其實效」，其中華南更是「排日容共思想之根源地」，若未能妥善處理，總督府過去的「南支發展工作，當然將歸於水泡。如此一來，對岸之惡空氣若反映於將對岸視為祖先之地的臺灣本島人，大有產生統治上深忌事態之虞」。於是，在對華南方針上，「文事的工作不易產生魄力貫徹我要求，依然以武力背景為便，特別是有『既成之事實』時最有利」，又以臺灣人不滿政府對臺灣籍民保護不周為由，希望政府能「以常駐之兵力，膺懲支那惡政者」。¹³

無獨有偶，同一時期軍部也正籌畫華南作戰。1937年10月，日本海軍攻占廈門對岸的金門島，作為監視廈門港、封鎖中國船隻的基地。1938年5月，為徹底進行封鎖，更自金門島登陸占領廈門。¹⁴另一方面，1937年11月初，陸海軍共同決定廣東作戰的要領，預計12月登陸香港北方之平海半島，設立航空基地控制當地鐵路、珠江水道等交通要衝。臺灣軍司令官古莊幹郎兼任新設第5軍司令官負責指揮，相關部隊也各自集中至臺灣。然而12月12日，日軍在南京周遭誤擊美國帕乃號（USS Panay）、英國瓢蟲號（HMS Ladybird），海軍擔憂過度刺

⁹ 坂本龍起演講，《北支事變と國民の覺悟に就て》（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

¹⁰ 〈將兵の勞苦に感謝 全島一致を強調〉，《臺日》，1937年7月24日，夕刊第1版。

¹¹ 〈小林總督閣下の全島民への諭示〉，《語苑》1937年8月，頁25-33。

¹² 〈廣東語〉，《臺灣警察時報》1937年10月，頁196-204。

¹³ 〈台灣總督の支那事變收拾方に関する意見の件〉，《永存書類甲輯 第6類》（1937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1001549000。

¹⁴ 《戰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戰〈2〉》（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頁50。

激英美，作戰遂暫時中止，隔年2月第5軍解編。¹⁵ 1938年9月，日軍再次決定攻占廣東，排除英國勢力，中斷華南的援蔣路線，海軍則有意以此為海南島作戰的基礎。此次作戰，同樣由古莊擔任新成立之第21軍司令官，各部隊9月底集中至馬公，10月9日自馬公出發，登陸大亞灣（白耶士灣）一帶，經惠州向廣州進攻，至10月底廣州附近重要城鎮皆已由日軍控制。¹⁶

武力南進既然成為總督府、軍部一致的目標，向來只作為南進「沙龍」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也展開具體活動，訓練南進人才。1937年12月，協會在臺北中學校內舉辦第一回北京官話講習會，由林冬桂（新竹人，前文協成員）擔任講師，為期3個月。1938年3月舉辦第二回講習會，分成初等科及進階之普通科。¹⁷ 1940年3月，改為「興亞北京語講習會」，在臺灣商工學校舉行，科目及講師共有：一、北京語（文法、作文、會話），共190小時，鄭明祿（總督府北京官話廣播囑託）授課；二、南支方面一般事情，共12小時，佐藤佐授課；三、對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業的心理準備，共12小時，佐藤佐授課；四、科外演講，共10小時，由軍部、帝大或協會成員負責。¹⁸

因應軍部在華南展開的作戰，協會更直接的活動是「南支調查委員會」的設立。1937年11月，協會召開常任評議員會，針對華南新情勢，決定設置南支調查委員會。1938年2月，決定交委員會細分成庶務、政治社會、金融、指導、國際貿易、運輸交通、拓務、資源等8部門，其成員如表7-2。

表7-2 南支調查委員會成員

部門	成員
顧問	田端幸三郎、河村徹
庶務部	河村徹、大澤貞吉、貝山好美、竹藤峰治、大西一三、素木得一、白鳥勝義、佐藤佐、木原圓次、池田又四郎、井田憲次、牛尾竹之助
政治社會部	木村泰治、能澤外茂吉、野口敏治、玉置仁知、西村高兄、金子光太郎、渡部慶之進、林熊祥、郭廷俊、花香伯貢、陳長福
金融部	有田勉三郎、山中佐太郎、土居政次、宮澤源吉、柚花仁、藤田輝三、坂本信道、楊漢龍、牛尾竹之助、山岸金三郎
指導部	永井潛、大澤貞吉、深川繁治、今村完道、橋爪清人、白鳥勝義、佐藤佐、松永榮、谷河梅人、小田俊郎、青木文一郎、三宅捷
國際貿易部	松本雄吉、肥後誠一郎、岩田此一、與田四郎、陳清波、立木貞藏、貝山好美、許智貴、重田榮治、辻本正春、大西文一

¹⁵ 《戰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頁445-446。

¹⁶ 《戰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2〉》（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頁219-251。

¹⁷ 〈北京官話講習生募集〉，《臺灣大アジア》42（1937年11月），第3版；〈北京官話講習會〉，《臺日》，1939年3月4日，第7版。

¹⁸ 〈興亞北京語講習會〉，《臺灣大アジア》70（1940年3月），第2版

運輸交通部	松本虎太、三卷俊夫、松本晃吉、廣瀨辰之助、安座上真、杉本三郎、速水和彥、池田又四郎
拓務部	日下辰太、竹藤峰治、磯永吉、土井季太郎、林熊祥、關文彥、牛尾竹之助、山田拍採、増田虎藏、林將治、井出松太郎、小園江隆哉、八田與一、許智貴
資源部	素木得一、磯永吉、後藤章司、高山三平、關文彥、中島道一、後藤曠二、牛尾竹之助、郭廷俊、白鳥勝義、山本真平、井田憲次、陳清波、田中長三郎、林熊祥、市村毅、早坂一郎、濱口榮次郎、平坂恭介、山根甚信、山本亮
備註	框註者為成員互選出之主查。

資料來源：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南支綜合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大亞細亞協會，1938），頁106-108。

南支調查委員會規模浩大，除了協會自身的成員外，還動員臺灣島內相關專家、學者。1938年5月後，各委員會分別就調查事項及內部負責事項召開會議。調查過程中，指導部的永井、佐藤曾至中國考察宣撫的實情，委員會也在正式報告出版前，先發行《支日對譯鑛物岩石名彙》（早坂一郎編）、《有關南支之礦產資源》（南支の鑛產資源について，小林儀一郎演講）、《南支之植物資源》（南支の植物資源，田中長三郎編），供委員參考。

1938年5月，海軍攻下廈門後，總督府應軍部要求派遣通譯及專門人員至廈門進行調查，其後也派員參與廈門復興委員會，協助統治占領地。6月，文教局在臺北高商設立「南支方面進出者養成講習會」，招收小公學校畢業生，以3個月為一期，教授中國語（北京話、福州話、廈門話、汕頭話、廣東話）、修身公民科、華南事情等，由臺大、高商教授等擔任講師，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佐藤佐亦為講師之一。8月，總督府設立「臨時南支調查局」，根據駐廈門總領事的報告，可知總督府對華南的行動及設施皆須透過該調查局審議。¹⁹ 華南戰事的演變不只刺激總督府的對岸進出，南支調查委員會也加緊整理報告。10月6日，河村徹向各委員致信希望儘速完成調查，10月下旬開始審查各部門提出的報告，最終於11月下旬整理完成並出版《南支綜合調查報告書》。²⁰

報告書內容按照委員會的各部門區分，共有7個部分。首先是指導部的報告，開宗明義表明「調整日支關係，建設新東亞之指導原理，必須是東亞協同主義」，也就是東亞國家在保持主權的狀態下，政治、經濟、文化皆須彼此依賴，協同一體活動，此種「日支協同體的實現，只能仰賴施之中外而不悖的我皇道精神之實現，即是支那固有的王道仁義之實現」。文中雖然使用「東亞協同主義」一詞，但實質意義上，如其凡例所稱「充滿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神」。此一指導原理不只

¹⁹ 王麒銘，〈越境をめぐる政治：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籍民政政策の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7），頁89-92。

²⁰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南支綜合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大亞細亞協會，1938），頁113-115。

適用在日中關係，也運用在未來的華南新政權。報告書接著就該政權的內涵，提出 10 項指導要綱，包括新中國政權應採聯邦制、排除英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影響、倡導親日防共促成日滿中的一體化等。另外又提出 3 項方策，建議軍事上給予日本駐兵權、內政上採用日人顧問、外交上依日中協議進行。如此「中國將能對內保持治安及秩序」，「對外與日滿保持親交，持續密接的關係，三盟邦將渾然融合一體，將能夠建設東亞永遠的和平」。最後在細部事項如教育、宣傳、宣撫（醫療、救恤、授產）、華僑對策上也提出相對應的建議。

之後各部的報告，接續指導部提出的原則擬定。政治及社會部的調查報告，主要針對新政權應採行的政治體制，建議在華南四省（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樹立華南政府，另外福建省考量到與臺灣的關係，可樹立單獨政府，這些政權的地方自治、警政、教育、財政、司法、外交、軍事等皆應重視與日本的關係，總督府也須在主要都市派出駐員。

其餘各部的報告內容，簡要如下：運輸與交通部的報告建議增進臺灣與華南來往，以及確保日本在海運、航運、港灣之權利；國際貿易部建議強化臺灣與南支南洋貿易，包括增加華南銷路、振興島內輸出導向的工業等；金融部報告聚焦在通貨問題，建議設立中央銀行整理通貨，回收英資銀行發行的香港紙幣，由日資銀行負責管理貿易匯兌；拓務部著重在開發華南的各種產業，以及臺灣人的農業移民；資源部則綜述華南一帶較不具立即開發價值的各種天然資源。

總而言之，《南支綜合調查報告書》的內容，乃是從臺灣立場出發，全面性建議當局依據大亞細亞主義，在華南建立親日新政權。報告書完成後，上呈給日臺相關人士，包括南支派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1884-1946）也獲得一份。²¹12 月 15 日，協會舉行總會，會上通過聲明，其中再次希望政府當局重視華南，在廣東迅速設立新政權，以排除排日、依賴歐美之思想，培養日滿中一體之協同主義，同時也要重視華僑問題。²² 可以說事變爆發後總督府過去與軍部在南進事務上具有的冷熱溫差已大致調和，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也脫胎換骨成為具體協助總督府及軍部推行大亞細亞主義的組織。

²¹ 〈安藤指揮官が協會へ謝狀〉，《臺日》，1938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²² 〈大亞協會の聲明 要路へ夫夫打電〉，《臺日》，1938 年 12 月 16 日，第 1 版。

第二節 戰爭時期大亞細亞主義宣傳與動員

一、宣傳及動員機關的成立

如前所述，事變爆發後，總督府的當務之急是穩定臺灣人民心，同時確保臺灣人能為日本向外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聖戰」提供貢獻。1937年7月13日，臺灣軍司令部向全島民眾發布「警告」，要求官民不得聽信謠言，並各自為戰爭做好準備。¹ 14日，小林總督召集臺北各報界人士發表聲明，同樣強調島民應正確理解事變經過，不可輕舉妄動。²同日，總督府正式設立「臨時情報委員會」，警務局長擔任主任，負責與軍部、言論機關、地方官廳聯繫統籌情報及實行宣傳。³

8月24日，總督府發布臨時情報部規程，將臨時情報委員會改制為臨時情報部。根據規程，臨時情報部主掌與情報有關的重要事務之聯絡調整，總務長官任部長，調查課長任副部長，另外，任命各局局長、海軍武官、臺灣軍參謀為參與，諮問與情報有關之重要事項。其餘之部內人員（部附），則由總督自府內高等官、判任官中任命，實際上多由府內各課課長出任。⁴

臨時情報部的業務主要延續臨時情報委員會的方針，可分為情報事務及宣傳事務2類。前者包括情報的收集、彙整及通報，後者則包括廣播新聞、《部報》的發行、對外宣傳等，大致整理如表7-3。

表7-3 臨時情報部事務概況（1937年）

情報事務		
情報蒐集	臺灣情報	透過職員、各部局、地方廳收集。
	內外地情報	透過內閣情報部、各省、朝鮮總督府收集。
	海外情報	透過內閣情報部、府外事課及銀行、會社或個人收集。
情報報導	情報部情報	有關臺灣民情、華南、南洋之政治、社會、經濟等各種情報，經彙整後向內閣情報部、拓務省管理局長提出。
	事變情報	有關事變之機密或未公開的情報，經輯錄後提供府內各部局、臺灣各官衙、軍部最高幹部閱覽。
	海外新聞	透過各銀行、會社支店獲得之華南、南洋等外國動向，經編輯後供府內各高官與各銀行、會社、新聞社閱覽。

¹ 〈全島民に警告 臺灣軍司令部發表〉，《臺日》，1937年7月14日，夕刊第1版。

² 〈輕舉妄動するな 諭告の實ある總督の聲明〉，《臺日》，1937年7月15日，第2版。

³ 〈時局に即應すべき 督府の準備成る〉，《臺日》，1937年7月15日，第2版。

⁴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規程」（1937-08-24），〈昭和12年8月臺灣總督府報第3063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3063a001。〈督府臨時情報部 參與、部附任命さる〉，《臺日》，1937年8月26日，第2版。

調查事務		華南、南洋、臺灣之華僑調查，以及對華南南洋宣傳方法之調查。
宣傳事務		
臨時官廳新聞	以廣播方式向全島居民，特別重視對臺灣人、原住民報導戰況及各種時局資訊，以涵養堅忍不拔之精神，激起愛國心。	
福建語新聞 北京語新聞 英語新聞	為對抗中國的廣播宣傳，以廣播方式向對岸、南洋進行反宣傳，同時進行對我國有利之宣傳。福建語新聞對不解日語之臺灣人亦異常有效。	
部報	以宣傳冊子的方式，向全島居民提供正確的時局認識，涵養堅忍不拔之精神，激起愛國心。同時向內外地、南洋等各地之日本人宣傳臺灣的狀況。在官民發行的多數時局關係之宣傳冊子中，具有中心性且指導性之立場。	
對中宣傳用支那語傳單	主要針對華南，以簡潔的新聞記事文，向中國民眾揭發國民政府的政策，啟蒙中國民眾，使其喪失戰意。最初以宣傳戰果為主，而後順應大勢，向未占領之華南軍民宣明帝國的真意，攻擊蔣政權國共合作之罪，以及長期抗戰之不當，並慫恿華南之自力更生。	
演講	總務長官、副部長之演講，透過廣播放送。	
對思想戰展覽會之協力	向內閣情報部主辦之思想戰展覽會提供展覽品，同時派遣部員參加。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43 編（1937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42）頁 172-189。

當中，值得注意的業務有二：第一為《部報》的發行。《部報》創刊於 1937 年 9 月，每月發行 3 回（1940 年 6 月後改為 2 回），每回約 12,000 部，至 1942 年 10 月廢刊，為情報部唯一定期發行的宣傳刊物，且「在官民發行的多數時局關係之宣傳冊子中，具有中心性且指導性之立場」。其內容主要說明總督府各單位因應時局決定的制度、政策、島內事情、海外事情、戰況等等。《部報》、廣播，加上其他不定期的演講、冊子，是情報部對內宣傳的主要手段。

第二，隨著日本的南進，情報部也參與對外宣傳。1937 年 8 月，日本自華南各地撤僑，不少原先在華南各地小、公學校任職的日人訓導，回臺後進入情報部任職。⁵ 1939 年，情報部囑託黃南雄、Do Khai Hoan 等越南革命家進行越南語廣播。⁶具體的方法，除了廣播、傳單的製作外，亦直接協助占領地宣撫。1938 年

⁵ 「府臨時情報部職員任命ノ件」（1937-09-01），〈昭和十二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54068X001。

⁶ 「牟田ワサ等情報宣傳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1939-12-01），〈昭和十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63100X001。

日軍占領廈門後，在該地設置日中親善團體「共榮會」，從事文教、授產等宣撫事務，而後因南進戰果的擴大，將本部轉移至臺北，業務則遍及廣東、汕頭、海南島、法屬印度支那（下稱佛印）、泰國等地。⁷ 情報部對共榮會支給補助金，給予指導監督，透過該會實施對中國人、華僑的宣傳、宣撫事務，具體包括座談會及演講會、印刷物宣傳、電影、社會教化、授產、育英等。⁸簡單來說，情報部即是總督府所有對內對外宣傳之中樞機關。

事變後在日本全國展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精動）也與宣傳有關。1937 年 8 月 24 日，近衛內閣閣議決定「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要綱」，其趣旨希望「以舉國一致堅忍不拔之精神」，克服時局、「扶翼奉承皇運」，興起官民一體的國民運動。其目標則是「堅忍持久」地維持「舉國一致」、「盡忠報國」之精神，具體實踐事項包括發揚日本精神及舉國配合非常時之財政經濟。⁹可以說是近衛內閣為了因應中日戰爭的長期化而建立的戰爭動員體制。

呼應國內的情形，總督府於 9 月在臺灣展開精神總動員，在府內設置本部，以總務長官為部長，文教局長為副部長，計劃主務機關則是官房調查課、情報部、內務局地方課、文教局社會課。其下於各州、廳置支部，郡、市置支會，街庄設置分會，而以部落會、町會、工廠、銀行、會社及其他諸團體為基層實施單位。配合臺灣的特殊情形，總督府的精神總動員與日本國內不同，其實施要綱的主旨特意新增「關於今次事變，為使普遍島民會得立腳在東洋和平及人類永遠之福祉確保的大義之帝國的大方針，愈愈舉國一致，明徵對尊嚴之我國體的觀念。」¹⁰強調日本的大義及國體明徵，回應事變爆發後臺灣社會私下不支持日本的狀態。具體實施事項，也與日本國內略有不同，著重在臺灣人的皇民化，包括戰勝祈願祭的執行、大麻奉齋、正廳改善、日語普及、舊慣陋習改善等。當然，與日本國內相似，配合非常時期之財政經濟，擴充國策、軍需產業、農產品，同樣是臺灣精神總動員的一環。¹¹

精神總動員與情報部的對內宣傳有一定重疊，但相較情報部主要為資訊流通、宣傳的中樞機關，精動透過基層教化網的建置，更有將宣傳深入地方，針對大眾進行社會教化的意義，且與戰時動員有緊密的關係。在精動活動積極展開的「強調週間」時，情報部的《部報》會配合發行特輯介紹，同時精動基層組織協助發送《部報》。¹²除此之外，「為了普及今次事變之實像，使島民周知徹底，理解帝國之真意，同時安定民心，使其自覺於非常時期島民之責務」，精動本部亦自行刊行教化冊子「教化印刷物」，分別依照國語講習所及公學校中學年、青年團員、指導者階級三種程度製作刊行，另外亦有作為學校兒童訓育資料的「國民精神總

⁷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頁 115-118。

⁸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45 編（1939 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42）頁 194。

⁹ 內閣情報部，《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第一輯）》（東京：內閣情報部，1938），頁 23。

¹⁰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頁 14

¹¹ 內閣情報部，《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第一輯）》，頁 332。

¹²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頁 44、54。

動員光輝的國旗」(國民精神總動員輝く日の丸)。¹³

二、中日戰爭的意義與臺灣的任務

事變爆發後總督府在島內展開的宣傳大亞細亞主義，之後自然被情報部、精動的宣傳吸收。這些宣傳中，中日戰爭被視為是「聖戰」。1937年11月1日，總督府展開「國民精神作興週間」，精動本部便說明日本係「為了東亞百年的大計，進而為了正義人道，斷然發起膺懲之聖戰」。¹⁴1938年1月，近衛內閣發布聲明，表示日本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待與「新興支那政權」共同建設新中國，¹⁵同年11月，再次以聲明表示日本將以建設日、滿、中三國團結之「東亞新秩序」為目標，而此係「淵源自我肇國之精神，使之完成為現代日本國民被課予的光榮責務」¹⁶於是1939年1月，情報部說明日本「集合了東亞民族的血液與文化」，只有仰賴日本「東亞才能免於成為列強之殖民式的帝國主義之飼料」，至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是要進行「排日抗日支那的清算，聯蘇容共支那的清算，作為列國之殖民地之支那的清算」，使中國成為日、滿、中三國之緊密經濟圈之一環，東亞防共陣營之友邦。¹⁷

在此背景下，大亞細亞協會的成員紛紛受邀參與總督府的宣傳活動。1937年11月，精動臺南州支部邀請佐藤佐演講「我國與國際情勢」，其中強調東亞面臨蘇聯、歐美列強的壓力，日本人必須靠著日本精神為東洋和平犧牲。¹⁸協會東京本部成員鹿木子員信，也於1940年6月受總督府囑託來臺擔任精動研究會講師，進行為期約半個月的巡迴演講。¹⁹26、27日，鹿木子於臺北市教育會館演講「東亞新秩序之建設與肇國之精神」，表示中國三民主義的實質不過是共產主義、民主主義等歐美思想，中日戰爭的本質是日本要以「肇國之精神」，也就是天孫降臨以來日本獨特的國體，使中國發揮「王道」之傳統民族精神，至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第一要件乃是要宣明發揚肇國精神。²⁰

在這場以日本精神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聖戰」，臺灣具有何種任務？不難想像，「皇民化」的實現是臺灣人在島內最重要的任務。如總務長官森岡二朗於1939年9月1日第一回「興亞奉公日」時所言，「特別是更加強化尊重、愛用國語之精神，為紀念本日上最緊要之事。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畢竟即是發揮日本文化，以圖東洋文化更生再建，而日本文化的基礎即是我日本語」。²¹換句話說，當日本

¹³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頁29-31。

¹⁴ 〈國民精神作興週間に當りて〉，《部報》7（1937年11月11日），頁2。

¹⁵ 〈帝國政府聲明〉，《部報》14（1938年1月21日），頁4。

¹⁶ 〈帝國政府聲明〉，《部報》43（1938年11月11日），頁2-3。

¹⁷ 〈新東亞の建設〉，《部報》48（1939年1月1日），頁7-13。

¹⁸ 佐藤佐演講，《我が國と國際情勢》（臺南：臺南州，1938）。

¹⁹ 「鹿木子員信（事務囑託；月手當）」（1940-06-01），〈昭和十五年四月至六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65b22。

²⁰ 鹿木子員信，《東亞新秩序の建設と肇國の精神》（臺北：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1941）。

²¹ 〈興亞奉公日に際して〉，《部報》72（1939年9月1日），頁2-3。

正企圖向外以「皇道宣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時，島內的臺灣人也必須先充分體認日本精神。

至於島外的任務，毫不意外地便是協助日本對華南的占領。早在事變爆發後不久，森岡二郎總務長官已表示臺灣在日本領土中「占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南方開發的根據地」，也是「國防上、軍事上，帝國南方的守護者」。²² 1938年日本陸海軍展開華南作戰占領沿岸地區後，臺灣的任務更加明確。1938年10月，情報部便針對廈門，指出廈門與臺灣具有深厚關係，且是事變前華南一帶有著最多臺灣出身人士之地，因此「從臺灣進出廈門為自然之勢」，「對於今後的廈門，我們必須造出比事變前還要出色明朗的廈門，而且築起日支完全之提攜。此即臺灣之使命」。²³不久，日軍攻陷廣州後，外務部也指出日本的使命是「拯救支那民眾、建設新支那、確立東亞永遠的和平」，「現在對於南支那，臺灣須站在其第一線，為達成上述使命協力奮鬥」。²⁴

至於皇民化與南進的實際情形，向來研究甚多，²⁵在這裡僅簡單說明中日戰爭時的情形。首先關於皇民化運動，其內涵即是徹底的「日本化運動」，具體包括語言、姓名、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全方面的日本化。皇民化為小林總督 1936 年上任時標舉的治臺方針，因 1937 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而得以實現，並與國民精神總動員結合。²⁶ 1938 年 11 月，精動實施一周年後，其成果包括神宮大麻奉齋普及率達 60.26%、日語普及率達 37.8%、各種勤勞奉仕實行 5 萬餘回、800 餘萬人次、國防恤兵捐獻及慰問金近 500 萬圓、軍伋志願者約 4,000 人、農業義勇團志願者約 3,000 人，其他還有蔬菜、水果、馬秣、牛隻的提供及國債的銷售。²⁷

基於此結果，總督府認為臺灣已能「作為南進國策之據點，漸漸完遂其重任」，且「島民能清楚認識時局，保有作為忠良之帝國臣民之資質」。²⁸隨著精動運動持續進行，臺灣人皇民化的程度逐漸加強，單就日語普及來看，1938 年已達 41.9%，1939 年則是 45.6%。²⁹

至於南進的狀況，戰爭爆發不久，臺灣人即作為軍夫、農業義勇團，協助日本在中國進行作戰，當戰事擴大到華南時，總督府更直接參與占領地的統治。據近藤正己的研究，1938 年 8 月，總督府設置「臨時南支調查局」，並於 9 月擬定了對華南各地的處理方針，其大要為總督府派遣人員從事民政事務，福大公司、臺灣銀行等關聯企業從事公共設施、物資、金融等事務。小林總督甚至進一步希

²² 〈時局下の臺灣〉，《部報》4（1937 年 10 月 11 日），頁 1。

²³ 〈最近の廈門〉，《部報》40（1938 年 10 月 11 日），頁 11-18。

²⁴ 〈廣東攻略に際して〉，《部報》42（1938 年 11 月 1 日），頁 5-10。

²⁵ 經典研究如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03）；Chou, Wan-yao, *The Kō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1)。

²⁶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34-36。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162。

²⁷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頁 90-91。

²⁸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頁 11-12。

²⁹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時局下臺灣の現在と其將來》（臺北：臺灣總督府情報部，1940），頁 23。

望設立「南方總督府」，將總督權限擴大至南洋，使臺灣成為南方經營中樞，但在中央、軍部反對下，總督府主要仍扮演協力的角色。³⁰ 實際上的協力情形，除了前述參與廈門的占領，並由情報部指導監督「共榮會」從事宣傳宣撫工作外，根據總督府於 1939 年 7 月的回顧，大致整理如表 7-4。

表 7-4 總督府在華南之協力狀況（1939 年 7 月為止）

地區	事項
廈門	恢復交通通信設施、恢復銀行從事金融通貨業務、重建電力水道事業、供給機械及必需品、進行廣播、發行報紙、書籍等進行情報宣傳、恢復日人學校、從事授產、宣撫、文化交流事業、復設博愛醫院
廣東	應急恢復電力水道、調查鐵路受災、供給無線通信及郵政器材人員、調查恢復省營製糖工廠、派遣軍調查班臨時調查員、派遣中山大學農場調查團、派遣治安維持會顧問及警察職員、整備文化機關、保存研究資料、開設擴充廣東博愛會醫院、開設日語學校、發行報紙、開設廣播局進行情報宣傳、派遣事務聯絡職員
海南島	派遣無線通信器材人才、派遣防疫診療班、開設臺灣海南島間定期航路、設置金融機關、派遣事務聯絡職員

資料來源：〈聖戰二周年と本府の南支に於ける協力狀況〉，《部報》66（1939 年 7 月 1 日），頁 8-14。

如其綜述所言，總督府在華南的活動，係「以各種的調查為始，跨足治安維持、交通、通信、放送設施、防疫醫療、情報宣傳、教化宣撫等頗為廣泛之分野，對南支工作進行協力」。³¹ 同時在島內，如前所述，1938 年 7 月開始總督府舉辦「南支方面進出者養成講習會」，每 3 個月為一期，1939 年 12 月已實行 5 期。至第 4 期為止之 322 名畢業生中，有 126 名透過文教局學務課前往華中、華南活動，各自前往大陸活躍者亦有相當之數量，第 5 回畢業生亦收到許多來自「某方面」的邀請。³² 至於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亦呼應總督府的南進需求，舉辦北京話講習會，並從事南支綜合調查，建議當局在華南建立親日新政權。

事變爆發後不久，佐藤佐即指出日本的攻擊對象絕非中國民眾，而是南京政權，而在進行武力膺懲的同時，亦須進行文化工作，即「復興王道，以之取代三民主義，更透過普及流行皇道文化，將其從對西歐思想的陶醉中拯救，使其回歸亞細亞，並誘導至大亞細亞聯盟」，更呼籲此文化工作，除在華北進行外，也須延伸至華中、華南。³³ 由上可知，總督府不只在島內力圖發揚日本精神，進行大

³⁰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116-119。

³¹ 〈聖戰二周年と本府の南支に於ける協力狀況〉，《部報》66（1939 年 7 月 1 日），頁 8。

³² 〈目覺しい大陸進出 南支方面進出者養成講習會受講者の賣れ口〉，《臺日》，1939 年 12 月 13 日，夕刊第 2 版。

³³ 佐藤佐，〈武力膺懲に思想工作を伴はしめよ〉，《大亞細亞主義》（1937 年 9 月），頁 7-9。

亞細亞主義宣傳，在島外各地協助軍方建立親日地方政權，從事日語教育等宣傳、宣撫工作，亦係向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前進。

三、邁向「大東亞戰爭」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對西方國家的敵視態度，始終潛藏在各種宣傳中。1939年2月攻占海南島，可視為日本將中日戰爭南下轉向與西方國家對抗的開始。日本海軍向來重視海南島的戰略地位，不只希望在該地設立航空基地，封鎖經河內、緬甸援蔣的路線，也希望開發當地礦產資源，甚至作為未來南進的基地。1938年9月決定廣東攻略的御前會議上，海軍已提及未來攻占海南島的可能性，1938年12月後開始向陸軍請求同意，並於1939年1月決定攻略。2月10日，陸軍部隊（曾參與廣東作戰的臺灣混成旅團）在海軍第五艦隊掩護下登陸並攻占海南島北方海口。13日，海軍部隊獨自攻占南方的三亞，結束海南島作戰。³⁴

日本攻占海南島，引起英、法的緊張。蔣中正於12日向外國記者表示，此為「太平洋上的滿洲事變」，若各國不阻止日本占領，日本將會繼續南進，使戰事擴大到太平洋。13、14日，法、英駐日大使各自訪問外務大臣有田八郎（1884-1965），質問占領的目的與期間。3月30日，在海軍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更將海南島東方的南沙諸島劃入高雄市管轄，並於4月發表領有宣言，再次引來英、美、法、荷的抗議。³⁵對總督府而言，為了確保自身在南支南洋事務上的主導地位，亦不差於展現進一步南進的企圖。情報部針對西方國家的輿論回擊云：「若亞洲人占領歐洲的大半，彼等會如何行動呢？彼等若自己回顧思考此事，應寧願自己從亞洲退去」，而「吾等將斷然越過許多的風暴之試煉，向東亞新秩序的完成邁進」。³⁶小林總督於5月上京推動「南方總督」制時也表示，「南方固然重要，從海南島凝視著西方也相當重要」，³⁷「國防上應由臺灣注視著南方與西方（南支一帶），南洋則面向太平洋的東邊準備」³⁸

隨著中日戰爭長期化，以松井石根及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正推動著建立中國聯省自治政府，同時強硬排除英國在亞洲的勢力，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戰爭解決構想。1939年6月，日軍封鎖天津英國租界，要求英國合作取締抗日分子、禁止法幣、防止現銀移出，並支持華北傀儡政權發行的通貨。利用大亞細亞協會的網絡，一連串的反英運動從朝鮮開始，依序在臺灣、華北、滿洲國，最後在日本國內爆發。反英運動的結果，乃是大亞細亞主義廣泛滲透至政治場域，親英派失去勢力，促使日本未來與德、義結盟，最終發動「大東亞戰爭」。³⁹

臺灣的排英運動始自6月23日在臺北舉行的排英同志會結成大會及全島民

³⁴ 《戰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戰〈2〉》，頁90-97；《戰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2〉》，頁337-339。

³⁵ 《戰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戰〈2〉》，頁97-98。

³⁶ 〈海南島占領の反響〉，《部報》55（1939年3月11日），頁18-21。

³⁷ 〈海南島から西方を 睨むことも大切だ〉，《臺日》，1939年5月19日，第1版。

³⁸ 〈台湾工業化に全力 南支開発も計画〉，《朝日新聞》（東京），1939年5月20日，第2版。

³⁹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723-795。

大會，會上河村徹（《臺日》社長、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理事長）任議長，宣布同志會的結成，接著召開演說會。隨後數日，臺灣各地紛紛召開排英大會，並組織同志會。7月7日，在臺灣排英同志會的籌畫下，西部的基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東部的宜蘭、羅東、花蓮港、臺東，以及澎湖馬公等地同時召開排英大會。⁴⁰之後各地的排英運動仍持續進行，直到9月左右才大致結束。⁴¹

表 7-5 臺灣排英同志會幹部

職稱	姓名
會長	河村徹
副會長	木村泰治、安田勝次郎
庶務部長	安田勝次郎
副部長	池田又四郎、大澤貞吉
企劃部長	谷口巖
副部長	金子光太郎、貝山好美
聯絡部長	三卷俊夫
副部長	村崎長昶、陳振能
會計部長	邨松一造
副部長	郭廷俊、重田榮治
備註	框註者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員。

資料來源：〈來月七日臺北で排英の市民大會 きのふ初理事會で決定〉，《臺日》，1939年6月30日，第11版；大亞細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40），頁150-151。

一連串的排英運動，可以認為是總督府動員下的產物。觀察臺灣排英同志會的成員，多數為與總督府關係匪淺的「御用」人士，據報導創立委員會的出席者，有河村徹、安田勝次郎（律師、市議、前判官）、小松吉久（府評、前宜蘭廳長）、谷口巖（州議、退休醫師）、野口敏治（臺電理事、前臺北州知事）、日下辰太（臺拓理事，前臺中州知事），以及其他州市會議員、新聞關係者。⁴²不意外的是，其中不少人士同時是總督府實質控制下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員，臺灣排英同志會14名幹部中有10名為其成員。至於地方的排英同志會，以基隆為例，是由吉原多三郎（市議）、松浦新平（市議）兩人幹旋，以近江時五郎（府評）為始，包括府評、市議、參事會員等22人組織。⁴³另外，島內五大報紙（《臺日》、《臺灣新聞》、《臺灣日報》、《東臺灣新報》、《新民報》）及日本國內新聞的臺北支局等，

⁴⁰ 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756-759

⁴¹ 根據《臺日》的報導，最後一場對公眾展開的活動，為國民精神作興會在臺中公會堂舉辦的排英演講會，主持人為長岡寬。〈排英講演會〉，《臺日》，1939年9月13日，第5版。

⁴² 〈臺灣排英同志會 創立委員會で規約を決定〉，《臺日》，1939年6月27日，夕刊第2版。

⁴³ 〈基隆でも有力者が 排英同志會の打合せ〉，《臺日》，1939年6月27日，夕刊第2版。

亦集體表明支持排英同志會。⁴⁴

除了「御用」人士，右翼日人亦參與運動，6月23日的排英演講會，係由1935年珠諾號事件時成立的國防強化聯盟主辦，其中演講者有長岡寬、山下好太郎、田中一二等。⁴⁵臺灣人同樣捲入排英運動，在臺灣排英同志會的後援下，7月5日夜，臺灣人分別在大稻埕及萬華舉行演講。前者講者以曾德志、張晴川、黃師樵、陳春金、陳總、黃朝生等與大亞洲黎明協會有關的前左翼知識分子為主，另外還有排英同志會的安田勝次郎、右翼的山下好太郎等。為了對臺灣人大眾宣揚排英運動，會上臺灣人講者皆使用臺語演講。後者則是以呂阿昌（醫師）、李朝北（醫師、民選市議）、陳金萬（材木商）、周延壽（律師）、朱阿西（茶商）、楊海盛（林本源柏記支配人）等萬華中堅人士為中心，加上安田、山下及其他右翼日人。⁴⁶對照總督府在珠諾號事件中予以輕判，並嚴加戒備民間右翼舉辦的演講會，此時總督府顯然為了推展南進政策而集合全臺各階層人士，包括「御用」人士、右翼、臺灣人知識分子、言論機關等，配合松井及大亞細亞協會的構想進行反英運動。

反英運動進行時，總督府也加緊宣傳臺灣的南進地位。外務部長千葉棹一以廣播演講「東亞經濟集團與臺灣的將來」，攻擊西方對東亞的壓榨，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滿中經濟集團為了打破從屬的地位而成立。千葉並指出中日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令中國覺醒，脫離對英法的從屬，參與東亞經濟集團，而租界問題則是阻礙經濟集團成立的「癌」。最後，他指出臺灣不只供給熱帶產品，更有著發展南進，與南洋結成經濟上的依賴關係之命運，「臺灣將來與南洋諸島、海南島及廣東三角洲等地方成為一體，指導我東亞各地，以及現在切都切不斷、經濟上具有緊密關係的菲律賓、蘭印等的產業，使東亞集團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帶有如此的重大使命，其前途無量。所謂臺灣是南進的據點，實包藏著如斯深刻的含意。」⁴⁷

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1940年4月展開西方作戰，荷蘭、比利時、法國迅速淪陷。歐洲局勢的變化不只促使陸海軍開始討論武力南進，外務省為了避免南洋各國在歐洲戰事終結後遭德國等他國奪走，也開始主張要確保日本在南洋的指導權。⁴⁸1940年7月，新成立的近衛內閣制定「基本國策要綱」，決定國家根本方針將是建設「以皇國為核心，日滿支之強固結合為根幹之大東亞新秩序」。松岡洋右外相（兼拓務大臣）闡明「皇道的世界宣布是帝國的使命」，當下的外交方針是「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而此大東亞包括蘭印、佛印等南方各地。⁴⁹

當南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成為日本整體的國策後，總督府反歐洲各國的宣傳更強化。1940年7月，《部報》連載「直衝英、法、荷的殖民地政策」，攻擊三國之殖民政策榨取當地資源及人民，完全無法與臺灣人受到的幸福相比，而「源

⁴⁴ 〈言論機關も共鳴 排英同志會を支持〉，《臺日》，1939年6月27日，夕刊第2版。

⁴⁵ 〈今夕排英大會 出演者の顔觸れ決る〉，《臺日》，1939年6月24日，夕刊第2版。

⁴⁶ 〈“英國を打倒せよ” 大稻埕と萬華で昨夜大獅子吼〉，《臺日》，1939年7月6日，第7版。

⁴⁷ 〈東亞經濟ブロックと臺灣の將來〉，《部報》68（1937年7月21日），頁2-8。

⁴⁸ 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2），頁114-143。

⁴⁹ 〈基本國策の要綱發表〉，《朝日新聞》（東京），1940年8月2日，夕刊第1版。

自於『再次將東洋還回東洋人的手中』，這個帝國根本的東亞政策之南進政策，承其第一陣之我臺灣的使命實為重大」。⁵⁰呼籲南進的文章也陸續刊登。11月，先刊登臺灣南方協會理事菊池門也的「為我南進作準備之本島人的心理覺悟」，說明臺灣對於南進，有著地理、經濟、產業、民族等各種重要性，臺灣人也是唯一能與華僑匹敵南進的民族，鼓吹臺灣人以南進為志向。⁵¹緊接著，刊登佐藤佐的「新南方政策論」，提及臺灣是南方國策的據點。不過，佐藤文中更強調的乃是日本的南進，不單只是為了經濟發展而已，還有解放當地民族的意義，這也是「東亞新秩序建設之一環」的「新南方政策」，與過去只以經濟進出為目標的南進論不同之所在。他提及過去視察南洋時，曾有臺灣人學生因見到越南當地人生活的困苦，而一改過去對總督政治的不滿，緬甸、菲律賓的人士，也都期待日本前來領導。於是，日本應主動與南方各民族握手融和，援助其解放，這也能使頑固的中國接受日本，即「新南方政策的實踐正是日支事變解決的捷徑」。⁵²總結上述各種說法，其主旨就是日本必須南進解放南方各民族，而臺灣人則有作為先鋒的使命。

以反英事件為契機，總督府也開始強化南進相關的設施，其中最重要是「臺灣南方協會」的籌辦。1915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已在東京設立「南洋協會」，作為總督府推動南洋事務的外圍組織。1928年後，外務省開始補助南洋協會，並在1938年5月推動協會改組，使其成為外務省的外圍組織。⁵³於是1939年8月總督府開始籌辦「臺灣南方協會」，如創立趣旨書所稱，其欲「在軍官民之渾然的協力之下」，建設「關於帝國之南方經營的中心性的協力機關」。至於具體事業，則包括實施調查研究、養成人才、指導企業，以及進行文化事業等。其中有關調查研究，將在南方設置駐在員或委託在外機關，若與其他臺灣各調查機關實施中的研究重複，將「依需求統一至本會」。同樣地，有關博愛會、善鄰協會、共榮會也預計「伴隨著將來本會之擴充」而吸收合併。⁵⁴

1939年11月，「臺灣南方協會」正式成立，由小林躋造總督、兒玉秀雄（1876-1947）拓相等人任名譽顧問；森岡二郎總務長官任會長；大津和郎（臺灣軍參謀長）、福田良三（海軍武官）、河村徹（《臺日》社長）3人任副會長；今川淵（前專賣局局長）、菊池門也（退役陸軍中將）2人任常任理事；西澤基一（高雄商工獎勵館長）任主事。其他理事則網羅了千葉蓁一（外務部長）、山本真平（人事課長）、加藤恭平（臺拓社長）、許丙、後宮信太郎、藤山愛一郎等重要官商界人士。⁵⁵運作資金除了總督府補助金（1939年度為2萬5千円，1940年度為20萬），

⁵⁰ 〈英、佛、和の植民地政策を衝く（其二）〉，《部報》104（1940年8月15日），頁8。

⁵¹ 〈わが南進に備へる本島人の心構〉，《部報》110（1940年11月15日），頁2-8。

⁵² 〈新南方政策論〉，《部報》111（1940年12月1日），頁2-7。

⁵³ 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頁68-70。

⁵⁴ 〈南方協會〉，《本邦ニ於ケル協會及文化団体關係雜件》，第五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I-1-10-0-2_005，JACAR Ref.B04012404800。

⁵⁵ 〈南方發展の礎石 誕生を見た臺灣南方協會〉，《臺日》，1939年11月15日，第7版；〈陣容すつかり整ふ 臺灣南方協會の店開き〉，《臺日》，1940年1月18日，夕刊第2版。

⁵⁶ 主要為糖業聯合會捐助 200 萬円、鹽水港製糖單獨捐助 50 萬円、臺灣三社（臺銀、臺電、臺拓）共捐助 100 萬円，以及後宮信太郎捐助建設南方資料館的 100 萬円。⁵⁷

1940 年，南方協會展開活動。所謂「南方」雖然包括南支、南洋，但其業務重點實際上在南洋，⁵⁸ 具體任務則為進行科學調查、人才養成兩項。⁵⁹ 在科學調查上，1940 年 3 月著手整理自總督府借受之南方關係資料，自越南開始，接著整理英屬馬來亞、泰國、緬甸、菲律賓、印尼，並製作目錄、索引、影本等。4 月，自外事部接受《南支南洋》月刊的發行，同時自行刊行各種南方啟蒙書籍。除了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外，南洋協會另於中國南京、佛印、泰國、菲律賓、蘭印、緬甸、英屬北婆羅洲、東帝汶等地派遣或委囑當地日人，從事情報、資料的收集，並提供給相關機關、企業。⁶⁰

1940 年 7 月開始，協會組織「蘭領東印度事情調查委員會」及「南方事情調查委員會」。前者針對荷屬東印度，包括地質、民族、教育、言語、法制、政治組織、移殖民、財政、農業經濟、農產、糖業、動力資源、工業、勞動、貿易、港灣、畜產。後者針對南洋各地，設有氣象、氣象實測、宗教、衛生、金融、橡膠、水產、林業、地下資源、商業（華僑）、陸運、海運、航空、遞信、鹽業、特殊熱帶植物資源、列國投資、棉花、米穀、土木、衛生等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由總督府各局、試驗所或臺大、臺銀、臺拓、華南銀行等學術、研究機構的專門人士擔任委員長、委員。⁶¹ 總計 1940 年度協會的調查成果，共有 25 件翻譯文件、35 件調查報告發表於《南支南洋》，各委員會也提出 50 種報告書，總計由協會調查員、委員會提出的各種調查報告書，印刷後共有 64 冊。⁶²

在人才養成上，除了派遣職員至各地從事情報調查，兼有培養人才的意義外，協會進行的事業有：（1）主辦、後援安南語、法語、荷蘭語、馬來語的講習會，1940 年度共舉行 9 場；（2）協助《臺日》、高商等辦理電影放映會、演講會；（3）參與南方相關的展覽會，普及南方事情、知識；（4）資助南方研究活動，包括日本各大學的臺灣、南方視察，臺大學生團的海南島派遣，高商校內的日比青年文化協會臺灣支部之成立等；（5）助成高雄商工會議所等團體訓練南進人才；（6）斡旋總督府於 1941 年成立「拓土訓練道場」畢業生至南方就職；（7）補助海外日人的臺灣參訪團；（8）補助爪哇人的臺灣留學生；（9）招聘安南人從事安南語

⁵⁶ 〈臺灣南方協會收支決算書（1939 年）〉、〈收支豫算書（1940 年）〉，《臺灣南方協會關係資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0868_01_07244_0872。

⁵⁷ 「寄附金ノ件」（1940-07-09），〈昭和十五年自七至十二月決議事項秘書課法規條〉，《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200467003。

⁵⁸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書》（出版項不明），頁 1。原書出版時間不明，但根據內容應製作於 1941 年 4 月前後。

⁵⁹ 今川淵，〈臺灣南方協會の使命に就て〉，《臺灣時報》（1940 年 4 月），頁 25-29。

⁶⁰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書》（出版項不明），頁 3-13。

⁶¹ 〈南方事情並に蘭領東印度事情調查委員會經過〉，《臺灣南方協會關係資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0868_01_07244_0872。

⁶²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書》，頁 25-27。

教育，對安南人進行日語指導等。⁶³

協會為南進作的準備，隨著日軍進駐越南（1940年9月進駐北部，1941年7月進駐南部），很快地就派上用場。1941年2月，南方協會派出11名調查員，組成金谷調查班，於河內協助當地駐軍。此後於1941年度皆固定派駐10名左右的職員，協助日軍進行調查，同時也實施協會的調查研究計畫，並透過其他當地部隊的斡旋，派遣經濟調查團至越南各地。⁶⁴由於協會積極協助軍部，1941年3月，參謀本部研究未來的南方占領計畫時，特地提及南方協會是「國內南方研究之最有力機關」，應全面利用之，尤其中央更應積極指導，確保其能完全呼應國策進行研究。⁶⁵

儘管協會在軍部間獲得良好的評價，其事業卻非一帆風順。在國外，由於日本決定南進國策後，與西方各國關係急速惡化，使得協會的調查團難以親自到南方蒐集資料，只能改為依據文獻資料調查為主。⁶⁶在國內，協會也面臨疊床架屋的困境。中央的參謀本部，雖然經常委託協會從事調查，但拓務省、外務省卻打算自行調查，無意利用南方協會。在臺灣，1940年3月，因應南支南洋事務的增加，總督府外務部自官房獨立改稱為外事部。外事部的南洋調查，最初計畫係以南方協會為實質中心進行，之後卻自行組織南方調查機構。⁶⁷1940年下半年，外事部開始刊行調查報告書，並於10月前後發刊《南支南洋時報》，介紹南洋當下經、政概況。至1942年3月，外事部調查書已刊行40種，《南支南洋時報》亦刊行18回（每月2回，1941年4月後每月1回）。⁶⁸1941年5月，總督府設置「南方委員會」，⁶⁹負責調查審議關於南方諸地域的重要事項，9月正式任命委員，由總督任會長，長官任副會長，府內官員、臺大總長、各民間會社社長擔任委員。⁷⁰1941年10月，臺北帝大決定明年設置「南方文化研究所」，從事南支南洋各地域政治、經濟、民族等人文科學研究。⁷¹

隨著南進成為國家整體國策，總督府逐漸直接主導南進，臺北帝大的調查機構也開始強化，夾在中間的南進協會，其存在反而成了累贅。於是1941年7月，常務理事今川淵先被調任為總督府新設的臺灣石炭會社社長，⁷²10月正式進行

⁶³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書》，頁14-24。

⁶⁴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40-41。

⁶⁵ 〈南方に於ける占領地經營の為事前準備に關する意見〉，《南方作戰に於ける占領地統治要綱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14060704000。

⁶⁶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書》，頁2、25。

⁶⁷ 〈臺灣南方協會ノ件〉（1940年6月25日）、〈南方協會主催協會委員ト軍トノ懇談會〉，《臺灣南方協會關係資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0868_01_07244_0872。

⁶⁸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47編（1941）（臺北：臺灣總督府，1943），頁703-705。

⁶⁹ 「南方委員會規程」（1941-05-29），〈昭和16年5月臺灣總督府報第4200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4200a007。

⁷⁰ 〈督府に南方委員會 共榮圈確立を推進〉，《臺日》，1941年9月21日，夕刊第1版。

⁷¹ 〈南方文化研究所 南方圈の人文科學に探究のメス〉，《臺日》，1941年10月7日，第3版；不過，最終直到1943年始正式設立南方人文、資源科學研究所。〈南方人文、資源科學兩研究所を新設〉，《臺日》，1943年3月16日，第3版。

⁷² 〈臺灣石炭會社役員陣 社長は今川淵氏に内定〉，《臺日》，1941年7月12日，第2版。

改組，全役員辭職、南方事情調查會解散。⁷³改組結果，協會多數成員被遣散，其中部分改至南方資料館任職，⁷⁴大部分的事業減少或縮小，僅各種南方語言講習會仍繼續舉辦，完全成了以訓練人才為中心的組織。⁷⁵原先預期合併的博愛會、善鄰協會、共榮會依舊維持獨立，至於協會所屬的南方資料館則另外獨立，其下最初雖然仍設置調查部，但因外事部已自行進行調查，終於 1942 年 9 月解散。⁷⁶協會的弱化並不代表總督府對南進態度的冷卻，相反的，其意義乃是總督府對南進事務越來越直接、深入的介入。

另一方面，戰爭動員體制於同一時期逐漸確立。伴隨著 1940 年 7 月近衛內閣的成立，日本國內展開「新體制運動」成立「大政翼贊會」，島內也於 1941 年 4 月成立「皇民奉公會」。相較於精動，皇民奉公會有更完善的下層組織，以全島民為組織對象，不只有軍部的支持，也透過了懷柔措施取得林獻堂、蔡式穀、林呈祿、陳炘等與社會運動密切相關的有力人士支持，總督府、軍部、臺灣人三位一體的戰爭動員體制遂得以確立。⁷⁷前述提及的排英同志會，在新體制的建立過程中也順勢轉型、解散。1940 年 7 月近衛內閣成立前不久，排英同志會改稱時局同志會，目的轉為「排擊妨害完成聖戰目的的第三國之行動，進而建設東亞新秩序」。⁷⁸10 月，時局同志會向總督提出陳情書，希望民間人士能一同參與臺灣的贊翼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前往總督府陳情的 5 名成員中，除了安田、谷口 2 名幹部外，還有常任理事山下好太郎、林治人、緒方武歲 3 名右翼運動的健將。⁷⁹1941 年 7 月，皇民奉公會組織大致完善後，時局同志會也隨之決議解散。⁸⁰從此點來看，確實能夠認為全臺日、臺人的官、軍、民一致的動員體制已然確立。

動員體制的確立與南進有密切的關係，如《部報》所云，「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上，占有最重要的立場者，便是我臺灣。即我臺灣是大東亞共榮圈於南方的中心」，「無論有無戰爭，我臺灣必須扮演著向南方共榮圈，宣布八紘一宇之皇道的指導性的角色」。至於皇民奉公會，則欲「鞏固內部，揚起六百萬島民的大行進，堂堂地向南方廣域共榮圈前進，宣布皇道，達成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任務」。⁸¹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轟炸珍珠港，為了「宣布皇道」的「大東亞戰爭」隨之爆發。

四、成為「大東亞的中心」的臺灣

日軍的南方作戰開始後，進展極為順利，1941 年 12 月占領關島、香港，1942

⁷³ 〈南方協會再出發へ 設立後一年餘の輝しき使命〉，《臺日》，1941 年 10 月 9 日，第 1 版；〈南方事情調查委員會解消〉，《臺日》，1941 年 10 月 23 日，夕刊第 3 版。

⁷⁴ 〈南方協會弱化ず 整理委員、改組狀況發表〉，《臺日》，1941 年 11 月 1 日，第 1 版。

⁷⁵ 不過，例外於 1942 年獲得總督府給予約 2 萬 5 千円之佛印經濟調查員派遣補助，協助佛印派遣軍的調查。《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48 編（1942）（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頁 668-669。

⁷⁶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 40-45。

⁷⁷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360-371。

⁷⁸ 〈臺灣排英同志會を 時局同志會と改稱〉，《臺日》，1940 年 7 月 2 日，第 7 版。

⁷⁹ 〈臺灣の翼替運動に 民間人をも加へよ〉，《臺日》，1940 年 12 月 19 日，夕刊第 2 版。

⁸⁰ 〈臺灣時局同志會解散に決定〉，《臺日》，1941 年 7 月 15 日，第 1 版。

⁸¹ 〈皇民奉公運動早わかり〉，《部報》125（1941 年 7 月 1 日），頁 36-38。

年 1 月占領馬尼拉，2 月占領新加坡，3 月占領巴達維亞、荷屬東印度投降，5 月占領緬甸全境。至此，南方作戰告一段落，日軍的重心轉為實行軍政，確保、開發南方占領地，鞏固長期不敗的態勢。⁸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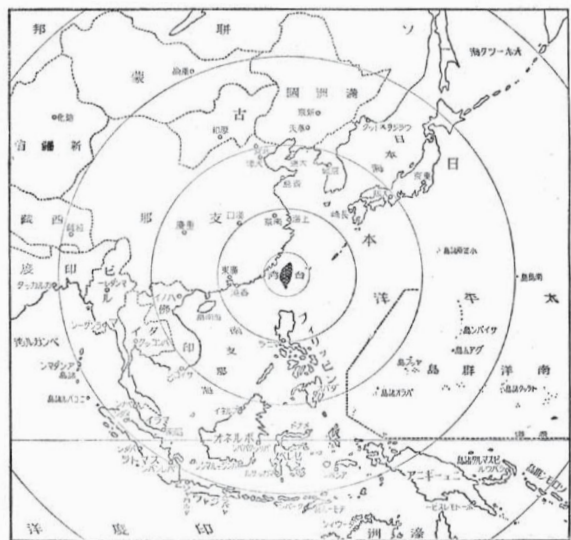


圖 7-1 「臺灣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資料來源：《南方の據點・臺灣 寫真報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44），封面後 4 頁。

廣大的南方占領地的獲得並未使臺灣在日本國內的地位相形失色。如外事部編寫的《臺灣於南方共榮圈建設上的地位》所述，臺灣的重要性並沒有被新的熱帶占領地取代，也沒有因南進成為國策後，臺灣過去施行的南進政策皆須奉還於中央而消失。相反的，臺灣長期的南進政策，使「臺灣與南支南洋的關係早已是不可分的情誼的結合」。至於臺灣統治與南方共榮圈建設間有何具體關係，首先是皇民化的實現，不只是「為了臺灣統治的完成」，臺灣人作為「皇民」的「幸福」將促使中國人、華僑、南洋民族親日，若臺灣人進一步前往南方，更能誘導當地人與華僑；第二，在產業經濟上，臺灣將成為南方圈之工業地帶，且作為具近代技術、組織的中繼補給站，交通、通信的接續點，協助南方開發；第三，在文化上，臺灣是「皇國與南方地域間的文化交流之地」，不只有許多南方研究機關，還能教育南方留學生，或在南方實施日語教育、醫療、情報宣傳、學術交流等文化事業，或在臺灣舉辦與南方人士的交流活動；最後，在人的層面上，臺灣依然是南方發展的據點，島內的日本人皆是「南方發展的實踐者或其子孫」，實踐皇民化的臺灣人，也是與華僑的中介者，不論日臺人皆須助成其向南方發展，其他像是對日本南進人士的訓練、南洋日本人的教育，也必須在臺灣進行。⁸³

實際上的情形也的確如此，1941 年 6 月，閣議通過〈關於南方政策中的臺

⁸² 《戰史叢書 ヒルマ攻略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頁 468-469。

⁸³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南方共榮圈建設上に於ける臺灣の地位に就て》（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

灣地位之件），確立臺灣是「南進基地之一」，應予以活用。同時通過諒解事項，確立中央對於總督府南方協力的主導權，總督府應予協助之事項，則有：1. 臺灣人相關事項；2. 可發揮臺灣地位、經驗之衛生及其他文化設施；3. 米、糖等臺灣相當發達的產業及同類產業；4. 臺灣產業所需資源的開發等 4 個項目。⁸⁴

戰爭爆發後，總督府的南方協力，遍及越南、菲律賓、馬來亞、東印度群島、泰國、緬甸等地。為了協助從事軍政，至 1942 年 10 月為止，總督府已派遣 259 名官員擔任司政長官，司政官、技師等軍政要員，編制外的派遣者共 72 名，合計 331 名，其他擔任指導員或調查員，以軍囑託身分一時停留在當地者有數千名，與總督府相關的公司、銀行同樣派遣許多人員。總督府的外圍團體中，博愛會在河內、西貢等地開設醫院，派遣醫療班至前線；善鄰協會在香港、泰國從事新聞工作；共榮會在香港、越南堤岸從事文化交流事業；放送協會派遣職員至菲律賓、馬來亞從事對敵宣傳廣播。民間事業也同樣參與南進，臺灣銀行、華南銀行恢復舊支店、出張所，從事軍需、金融工作，臺灣拓殖、臺灣電力、臺灣瓦斯、日本水產等企業，則參與當地基礎設施的恢復及產業開發。其他像是米、糖、煤炭、石油、鹽、海產、木材等軍需或當地日人、宣撫所需物資，也是由臺灣提供。⁸⁵ 如圖 7-2 所示，總督府及關係企業的協力狀況相當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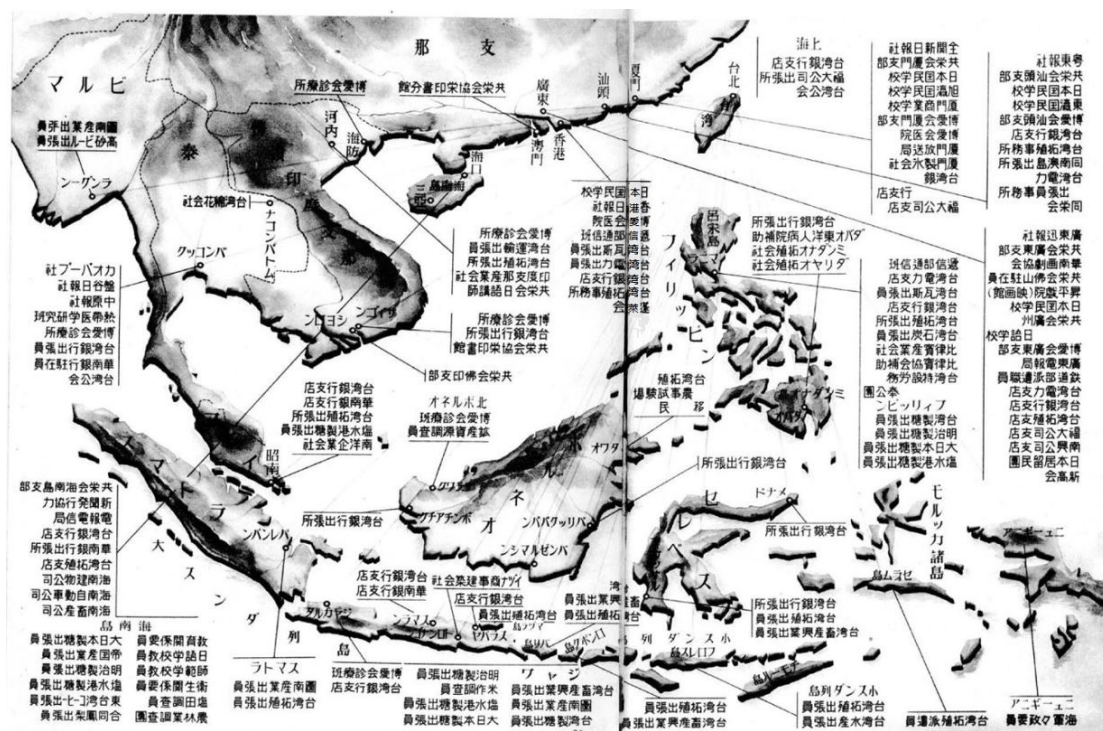


圖 7-2 「向南支南方伸展的臺灣」

資料來源：《南方の據點・臺灣 寫真報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44），頁 32-33。

⁸⁴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135-136。

⁸⁵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 301-303。

在臺灣，總督府麾下的各式組織，皆依循「南方共榮圈建設」的目的進行強化。1942年7月，南方委員會首次召開幹事會，決定設置資源、經濟、文化等各專門委員會實施南方調查，並決議使南方委員會成為臺灣南方調查的綜合推進機關。⁸⁶ 為了加強對南支南洋的情報宣傳事務，臨時情報部自1940年開始增員，1942年1月正式取消「臨時」狀態，成為總督官房情報課。另外，設置「情報委員部」，負責聯絡統一情報事務。⁸⁷ 外事部則於1942年12月更改內部組織，原先的一課（主管一般外事及南支南洋調查）、二課（主管南支南洋關係），改為管理課（主管南支南洋關係事項及一般外事）、調查課（主管南支南洋調查），主要處理項目雖未改變，但規程內一般外事的排序已經移至最後。⁸⁸ 1941年11月，臺北帝大受外務省委囑，決定實施南方調查。⁸⁹ 1943年3月，臺北帝大除了原有的熱帶醫學研究所，新設「南方人文研究所」及「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前者由移川子之藏（1884-1947）任所長，分成第一部從事政治、法制、經濟研究，第二部從事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等文化研究。後者由總長安藤正次（1878-1952）兼任所長，分成第一部從事農畜改良育成的研究，第二部從事農林資源的加工等農藝化學研究，以及實驗所從事當地研究。⁹⁰

總督府及各外圍團體，也紛紛進行南進人才的培育。1942年3月，外事部召開第一回「南方關係事務擔當者講習會」，對總督府內及事業團體的中堅幹部講習大東亞建設的理念、南方經濟、資源、文化，以及臺灣在南進政策上的地位。⁹¹ 1943年2月舉辦第二回講習會，同樣針對府內南方事務的判任官或預定派遣南方者進行講習。⁹² 臺灣南方協會召開南方語學講習會，對馬來語、泰語、安南語、廣東語、他加祿語、印度語、荷蘭語、西班牙語、法語等實施日間、夜間、日曜部講習，另外1942年接收高雄商工會議所經營的高雄貿易實務員養成所，改稱為高雄南方商士鍊成所，進行南支南洋貿易人才的訓練。⁹³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於1942年2月成立「大東亞講習所」，舉辦南方各地語言及皇民化、南方事情講座。⁹⁴ 皇民奉公會則成立「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1942年6月）對臺灣人實施土木、建築、機械訓練，「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1942年8月）實施農業開墾訓練，以及「海洋訓練所」（1942年3月），實施海事、海運、水產訓練。⁹⁵

如上述各種訓練團體所示，不只是日本人的軍、官、民為了共榮圈建設前往南方，臺灣人同樣捲入這場戰爭。1940年10月，總督府成立「臺灣鄉人八紘會」，

⁸⁶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312-313。

⁸⁷ 「臺灣總督府情報委員部規程」（1942-01-23），〈昭和17年1月臺灣總督府報第4398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4398a004。

⁸⁸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48編（1942），頁77、621-622。

⁸⁹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314。

⁹⁰ 〈南進文化の先驅 南方人文研究所、同資源科學研究所〉，《臺日》，1943年3月19日，第3版。

⁹¹ 〈南方關係事務擔當者講習會 引續開催計畫〉，《臺日》，1942年3月12日，第3版。

⁹²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48編（1942），頁652。

⁹³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48編（1942），頁642-643。

⁹⁴ 〈南方諸語學講座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主催〉，《臺日》，1942年1月27日，夕刊第2版。

⁹⁵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臺北：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1943），頁99-102。

以助成海外臺灣人發展及普及一般臺灣人的南進思想為目的，許丙為會長、陳炳為副會長、陳清波為常務理事、其他理事包括林熊祥、林柏壽等人。1941 年度，舉行的事業包括召開泰國派遣商業實習生訓練、軍通譯訓練講習會、幹旋海軍醫院員工、協助指導遣返回國的臺灣人、進行海外臺灣人調查等。⁹⁶

當然，更直接的就是人力資源的提供。1937 年 9 月，事變爆發後不久，臺灣軍部隊奉命增援上海，當時即徵用 850 人臺灣人為主的軍夫搬運行李。至 1939 年 5 月，已動員 9,500 名軍夫。1939 年底，軍夫、通譯、農業義勇團、船艇員等的總計動員人數，估計已有 2 萬以上。1942 年，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實行，總督府動員學校、警察、保甲等組織，推動「集團」志願，使戰爭的氛圍充分滲透至地方，促使戰爭動員活性化。地方也大規模組織青年團，以團體性的動員進行速成的日本人訓練，培養臺灣人的愛國意識。除了志願兵之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臺灣人被動員為勞務者、通譯、護士助手，原住民則被編成高砂義勇隊，以軍夫、軍屬身分參加戰爭。當戰局惡化時，日軍的人力需求不斷增加，最終於 1945 年實施徵兵制。根據戰後厚生省的統計，戰爭時期被動員從事軍務的臺灣人共 207,183 人（包括 30,304 人死亡者），其中有 92,748 人被派往南方地區。⁹⁷

如前所述，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外實現與對內「內臺融和」的實現，兩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曾與松井石根合作在華南推動大亞細亞主義活動、臺灣軍參謀長和知鷹二在皇民奉公會演講，其云：「當想到南方戰的結果時，我相信必定為本島人各位開拓了愉快的樂天地」。接著表示，臺灣人不能只活躍於中國，更能與華僑自由自在溝通，且還能融入當地人中。不過，臺灣人有一點與當地人不同，那就是當地人皆奉行「個人主義」，臺灣人卻「因皇室的御加護，抱有偉大的信念，而能作為出色的人才指導他們」。「所謂東亞共榮圈即是皇化共榮圈，即是體得日本精神」，換言之，就是要以日本國民的身分使當地人知悉「八紘一字究竟為何，以及皇室的恩惠」。⁹⁸這種看法也出現在前述外事部的《臺灣於南方共榮圈建設上的地位》一文中。

在大亞細亞主義者眼中，徹底的皇民化是一個不需懷疑、必然能夠達成的結果。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重要成員佐藤佐，1941 年 2 月自臺北高商離職後轉任南方協會、南方經濟調查會等，之後於 1942 年進入「大日本興亞同盟」任職。⁹⁹當「大日本興亞同盟」於 1943 年被吸收成為大政翼贊會興亞總本部後，佐藤則擔任興亞總本部調查部長，完全投身於大亞細亞主義。1943 年 5 月，佐藤針對臺灣在精神意義上的使命寫道，臺灣人只要「全心全意直接服侍八紘一字的肇國之大御心」，即可拋棄一切舊思想，成為完全的日本人，因為「八紘一字是亞細亞一家的皇謨，既然如此亞細亞諸民族間就不可能有民族對立」。至於日本人，他

⁹⁶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頁 50-52。

⁹⁷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上冊，頁 349-400；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下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666。

⁹⁸ 〈只勇往邁進せよ（二）〉，《興南新聞》，1941 年 12 月 14 日，夕刊第 2 版。

⁹⁹ 〈南方共榮圈を語る〉，《臺日》，1941 年 6 月 10 日，夕刊第 2 版；〈紙上南方講座〉，《臺日》，1942 年 1 月 25 日，第 4 版；〈佐藤佐氏〉，《臺日》，1942 年 9 月 9 日，夕刊第 1 版。

則認為必須有「大民族的氣宇，包擁亞細亞諸民族」，「在臺內地人若無力收攬本島同胞的民心，將之善導為日本人，又有何資格成為大東亞共榮圈諸民族的指導者呢」。¹⁰⁰

對「內臺融和」的實現，以及「內臺融和」下的臺灣在日本南進構築「大東亞共榮圈」中具有的地位，總督府究竟如何說明？戰爭末期，情報課企劃出版的《南方發展史》一書最後一章，有如下的描述：

回頭思考臺灣於大東亞的位置。在新高山山頂上放上圓規，劃出半徑 4000 公里的圓，大東亞各地皆包括在內。臺灣正是大東亞的中心。從我本土轉移視線至大南洋時，更有一個接近亞洲大陸、緊緊結合本土與大南洋的島嶼，這個島嶼正是臺灣。從而臺灣為對大南洋之扇釘。可以感覺到，天神是為了指示我們以此為踏腳地更向南方伸展，而創造出這樣子的島嶼。我等的父祖依照神的如此指示，迅速地在此鞏固了南進的地位。本來生活於此島的高砂族自屬當然，從北方移來的內地人、渡過臺灣海峽的本島人，同樣都是依照天神的意志渡來的。因此，我們都是共同於同一家庭，作為兄弟而和睦相助的同胞。

〔中略〕

大南洋的原住民為我高砂族之同輩，南方華僑 760 萬為我本島人之同輩。諸子之友正於南方到處展開雙手等待著。近世初期以來我等的前輩，與埋骨於大南洋各地的無數之英靈，以及於這次大東亞戰爭中化為花瓣散落的許多英靈，皆為諸子化成南進的照明燈。

〔中略〕

內臺高砂的青年諸子奮起，而向南洋出征吧！現在正是我等跨越父祖的屍體，開拓大南洋之時代。所謂「支配南洋者將支配世界」，非也，我等期使大南洋成為「我的家」，實現八紘一字肇國之精神。¹⁰¹

由上可知，瀕臨「大東亞共榮圈」實現之時，位於「大東亞的中心」的臺灣是為了結合南方與日本而存在，島上的日本人，以及與南方原住民、華僑同族之原住民、臺灣人，仿佛同樣基於神的意志，為了實現南進而前來臺灣。這些族群將在島內和睦相處，實現「內臺融和」，然後前往南洋，協助達成日本與亞洲各民族和睦相處之「八紘一字」的理想。

眾所皆知的是，日本統治下的現實狀態，與「內臺融和」或是「南方共榮」，皆有一定差距。當日本於 1945 年投降時，「大東亞共榮圈」即告瓦解，真正給予臺灣人平等待遇的「待遇改善」也未得實施，大亞細亞主義的夢想於是完全破滅。

¹⁰⁰ 佐藤佐，〈臺灣的使命への構想〉，《臺日》，1943 年 10 月 9 日，第 2 版。

¹⁰¹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南方發展史》（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頁 164-168。

第三節 戰爭下之眾生相

一、總督府控制下的在臺日人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事變爆發之初，雖然部分臺灣人表現出積極擁護政府的態度，一般人的心理仍有明哲保身、順應大勢的想法。另一方面，在臺日人的態度又如何？根據警務局於 1937 年 7 月 16 日的報告，當時在臺日人普遍對事變感到樂觀，或認為「頻發的日支問題之解決，除戰爭之外無其他手段」，絕不能再對中國妥協。¹ 在臺日人相較於臺灣人表現出更強烈的愛國主義，並不令人意外，作為天皇的臣民，他們有著接受召集，作為軍人出征的義務，亦較臺灣人積極參與事變公債或儲蓄運動等愛國運動。²

不過，在戰爭體制下，在臺日人的愛國心也不得不落入總督府的控制。1936 年，隨著新總督、長官一同上任的警務局保安課長橋爪清人一改總督府過去寬容的政策，展開對新聞的整頓，同時為了取締右翼運動，在事變後增員高等警察、特高警察。³ 在新聞整頓上，第一個受害者為右傾的《經世》。1936 年 4 月，蓑和藤治郎因病離職，由稻垣孫兵衛接任社長。隔年 3 月稻垣病歿後，《經世》內部分裂為擁立蓑和一派與稻垣的舊部屬一派，7 月 25 日，總督府便以此為由要求廢刊。⁴ 8 月，在陸海軍省的要求下，總督府開始嚴格取締關於軍事機密或未經當局同意的事項，於是《南瀛》、《全臺新報》、《南海時報》、《臺灣時事新報》皆遭禁止。根據總督府的說法，這些報紙在事變爆發之初多非難中國的不法，鼓舞島民的士氣，但「隨著事變的推移，反而基於情感，登載阻害內臺人間的融和，或者批評官僚獨善等，對統治上有惡影響之虞的記事」，又或者因發表後方美談、評論國土防衛，涉及軍機而屢遭禁止，遂被要求廢刊。之後，各報紙的論調急速軟化低調，未遭廢刊、得以存續的報紙皆在當局的指導下任免主筆或合併，以實現「言論報國」。⁵

餘下的報紙中，《新高》於 1938 年 2 月廢刊，如社長唐澤信夫所云，事變後政治經濟等各種機關皆呼應動員，落入國家統制，然而言論機關則故態依然，漸漸喪失活力，「與其徒然陶醉於舊時代遺物之言論自由，坐等陷入困難，不如潔身而退，靜靜洞察大勢，徐計後圖」。⁶ 當總督府開始協助華南占領地的宣傳活動時，唐澤前往廣東，擔任《南支日報》（1939 年 2 月創刊，漢文）及《廣東迅

¹ 〈北支事變に關する台灣一般狀況〉，《各種情報資料・北支事變關係情報綴》，国立公文書館藏，JACAR Ref.A03023873900。

² 〈一般の本島人は 公債に無關心〉，《臺日》，1939 年 7 月 2 日，第 5 版；〈貯蓄報國 臺灣郵貯激増 五千萬圓に迫る〉，《臺日》，1940 年 8 月 7 日，第 2 版。

³ 谷川舜，〈戰時下の植民地台灣における新聞と帝国日本の言論政策〉，《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95（2019 年 7 月），頁 167-168。

⁴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 212-213。

⁵ 〈第八十六帝國議會説明資料 下卷（2）〉，《帝國議會關係雜件／説明資料關係》，第 37 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5-2-0-1_3_037，JACAR Ref.B02031407400。

⁶ 唐澤信夫，〈ペンを捨るに當たりて〉，《新高》，1938 年 2 月 28 日，第 6-7 版。

報》(1939年2月創刊,日文)社長,成為南進協力者的一分子。⁷

1938年6月,《昭和》原主筆柴山愛藏退職擔任警務局高等課囑託,⁸新主筆為松永富士雄(前《臺灣新聞》記者),同時改名為《南邦新聞》。《南邦新聞》以協助皇民化運動為使命,⁹每期皆有以假名書寫,內容淺白的版面,供臺灣讀者學習日語。《南日本》則於1938年11月合併《臺灣時代》,並呼應南進時局改名為《鵬南時報》,¹⁰新加入的成員包括新主筆尾崎秀真、記者緒方武歲(前《經世》記者、皇政會成員)等人。¹¹於是向來最能代表民間日人立場的週刊皆落入總督府的控制,隨著戰爭的持續,戰爭體制不斷強化,兩報最終遂於1942年7月同時廢刊。至於日刊報紙中,《新民報》於1941年2月改題為《興南新聞》,立場與其他御用紙已無不同。1944年4月,臺灣六大報統合成《臺灣新報》,總督府完成對媒體的控制。¹²

右翼團體亦在戰爭體制下受到整頓。1938年5月,生產黨臺灣黨務局改稱為臺灣支部,勝本七三郎任支部長、鷺尾金治任常任書記、佐川安一任幹事、橫尾武雄任相談役。¹³之後或攻擊舞廳、麻將館等不合時局的娛樂,¹⁴或於反英運動盛行時勸告淡水英國領事館歸還永租地。¹⁵1940年8月,為了因應新體制,臺灣支部成員另外創設東亞協會臺灣支部,由鷺尾任支部長,佐川任書記長,秋山白巖(書道家)任顧問,清水紀與治任相談役。¹⁶1941年4月,東亞協會臺灣支部先將生產黨支部解散,同年6月向國防強化聯盟、皇政會要求共同解散組織,以配合皇民奉公會的成立,一同達成「一島一心」的總體戰體制。聲明發布後不久,便以身作則率先解散。¹⁷至於國防強化聯盟,則於7月隨之解散。¹⁸儘管生產黨本部同年10月再度派人來臺開設事務局,實際上右翼勢力已大不如前,¹⁹隔年6月生產黨也因應局勢宣布結黨。²⁰

由山下好太郎主導的皇政會,在事變爆發初期亦相當活躍,1938年5月舉行總會,決議向小林總督建議禁止中國戲劇、電影上映,²¹如前所述,山下本人

⁷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南支那綜覽》(臺北:南方資料館,1943),頁847

⁸ 「第三七區(田中)煙草賣捌人川上親善匿名組合ハ十二月三十一日限り解散シ新ニ組織替方指示賣捌人川上親善匿名組合員柴山愛藏(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附)」,〈自昭和十二年七月至十五年六月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煙草賣捌人指定并匿名組合組織替八冊ノ七〉,《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885008。

⁹ 〈南邦新聞の使命〉,《南邦新聞》,1938年6月11日,第1版。

¹⁰ 「鵬南」(ほうなん)與「南邦」(なんぼう)兩字日文讀音類似,可以推測皆係總督府定名。

¹¹ 佐藤佐,〈東洋の文藝復興は来たれり〉,《鵬南時報》,1938年11月13日,第4版。

¹²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326。

¹³ 〈生產黨臺灣黨務局を改稱〉,《臺日》,1938年5月27日,夕刊第2版。

¹⁴ 〈生產黨より進言書〉,《臺日》,1938年9月14日,夕刊第2版。

¹⁵ 〈英國領事館の移轉を勸告 生產黨代表が〉,《臺日》,1939年8月1日,夕刊第2版。

¹⁶ 〈臺北に東亞協會支部〉,《臺日》,1940年8月16日,夕刊第2版。

¹⁷ 〈總力體制へ一心 東亞協會臺灣支部解體聲明〉,《臺日》,1941年6月8日,夕刊第1版。

¹⁸ 〈國防強化聯盟解消〉,《臺日》,1941年7月9日,夕刊第2版。

¹⁹ 〈生產黨座談會 注目すべき動向〉,《鵬南時報》,1941年10月5日,第6-7版。

²⁰ 〈大日本生產黨解黨〉,《臺日》,1942年6月29日,第1版。

²¹ 〈支那興行の禁止方を建白〉,《臺日》,1938年5月27日,第11版。

於反英運動時曾參與不少演講會。不過，反英運動結束後情況發生變化。1939年9月山下遭警察逮捕，10月起訴，理由為山下屢次以愛國為名，逼迫他人購買書畫、刊物或獲得捐款，包括江山樓及辜顯榮的三邑會等，其他還有對大阪商船、杉原產業提出不實指控進行威脅等。²² 1940年3月，山下遭判刑8個月，²³6月二審確定。²⁴ 可見為了壓制程度過火的右翼運動，總督府不惜動用司法的力量進行制裁。1941年後，皇政會的活動再次活絡，然此時戰爭體制已逐漸確立，對於東亞協會的建議，皇政會最初似未呼應，1941年7月仍單獨至東京建議實施外地徵兵制。²⁵ 皇政會之後的活動並不清楚，最終似同樣迫於戰爭體制解散。據陳逸松（1907-2000）回憶，戰爭末期，皇政會邀請陳清波、陳逸松等臺灣有力人士及臺灣軍軍官²⁶舉行座談會，欲究明美軍登陸時臺灣人民心之向背。會上，皇政會幹部質疑臺灣人缺乏忠誠，要求臺灣人承認不夠愛國，反而引起在場軍官不滿，認為皇政會態度等同逼迫臺灣人反抗，於是下令解散。²⁷

此外，還有長岡寬及賣間善兵衛的行動。1940年1月，宮原武熊在臺中州會表示，使用「皇民化」一詞不尊重正致力成為皇民的臺灣人，且非難、攻擊，或以異端視臺灣人，並不能實現日臺融和。²⁸對此，長岡、賣間與樋口元之助（記者）一同散佈傳單，對宮原進行人身攻擊，宮原則向檢察局提出告訴。最後檢察當局認為「非常時局應避免國內摩擦，特別是母國人同志於殖民地的爭鬥更應避免」，在加賀龍夫（律師）、鳥飼虎雄（檢察官）中介下，雙方一同參拜臺中神社，達成和解。²⁹ 1942年6月，賣間再次計畫以林獻堂《環球遊記》中讚賞英國之語，對林獻堂展開攻擊，但總督府不願追究，只希望林氏盡力協助皇民奉公會即可。³⁰ 賣間則先遭高等課長注意「不可亂作無謀之事」，³¹之後又因其佃農侵割林獻堂所有之稻田，而在特務引導下親自向林氏謝罪。³²

在總督府控制下的在臺日人，如何看待戰爭體制的確立？不難想像的是，在臺日人公開發表的内容多數支持總督府，甚至希望實施更徹底的總體戰體制。1941年11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賣間發表文章，呼籲確立「臨戰國家的體制」，將國民全體（16歲以上至60歲的男女）依照軍隊式的方式組織，「一人一物都不能浪費」。³³

²² 〈山下の第一回公判〉，《臺日》，1939年12月7日，夕刊第2版

²³ 〈山下は懲役八ヶ月〉，《臺日》，1940年3月16日，夕刊第2版

²⁴ 〈山下の上告 棄却さる〉，《臺日》，1940年6月2日，夕刊第2版

²⁵ 〈外地徵兵令の實施を建白〉，《臺日》，1941年7月25日，第1版

²⁶ 陳逸松稱該軍官為「拐腳」的田中大佐，在軍中權力甚大。然而究為何人，係軍官或在鄉軍人，筆者皆難確認。

²⁷ 陳逸松，《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250-254。

²⁸ 〈義務教育の實施に 彼は言ふのは認識不足〉，《新民報》，1940年1月29日，第3版。

²⁹ 另外，根據《新民報》的報導，長岡還答應解散支部並辭去齒科醫師會長之職以示謝罪，不過遭長岡等人否認。〈宮原氏告訴取下げ〉，《新民報》，1940年7月12日，第7版。〈臺中宮原問題で又嘘報 新民報の曲筆如斯〉，《南邦新聞》，1940年7月20日，第5版。

³⁰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年6月），頁15-16。

³¹ 《灌園先生日記》，1942年6月19日。

³² 《灌園先生日記》，1942年7月14日。

³³ 賣間善兵衛，〈臨戰體制下島民の新編成を叫ぶ〉，《南邦新聞》，1941年11月1日，第8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也強調臺灣人的南進必須以皇民化為前提。1942年1月，《興南新聞》在宜蘭舉行時局演講會，鼓吹臺灣青年南進，講者皆為臺灣人知識分子，包括陳逸松、陳逢源、林雲龍等。不過，《南邦新聞》宜蘭支局長、前《經世》宜蘭支局長大津留次郎卻發表批評，其云「〔演講者〕認為與華僑同風俗、習慣的我們本島人，正是南洋的拓士，此點乃是根本性的謬誤。演講者所想的，看來似乎是經濟建設為大東亞戰爭唯一的建設體制」。但對大津而言，「南洋的建設體制比起經濟，最大的要義是先將日本魂植入」，也就是以日本精神「溫暖彼等馬來人之心」，而臺灣人卻尚未擁有此種資格，於是呼籲臺灣人積極應徵志願兵，「達成日本魂的鍊成」。³⁴

到了戰爭末期，在臺日人是否已能如佐藤佐所云，有著「大民族的氣宇，包擁亞細亞諸民族」？根據總督府的說法，徵兵制宣布實行時，部分臺灣人出現「蔑視內地人」的傾向，部分日本人亦因此出現「反動式的敵視」，但因待遇改善政策的決定及盟軍的激烈空襲，彼此皆自覺擁有共同命運。特別是對待遇改善政策，因為臺灣人皇民化的徹底，使得日人率直地感到有所必要，就算向來對臺灣人帶有偏見的日人也毫無反對的動向。不過，當談到盟軍潛在的登陸作戰時，卻又承認少數日、臺人仍互相不滿，「內地人側害怕本島人於有事時之動向，而私底下有敵視本島人之傾向，對之本島人側則對上述內地人側的敵視感到反感」，³⁵與前述皇政會的情形類似。對於「內臺融和」的實現與否，我們或許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答案，因為在待遇改善落實之前，以及在臺灣成為短兵相接的戰場之前，日本的殖民統治已告落幕。

二、在臺灣及日本國內的臺灣人

隨著戰爭的進展，臺灣人的民心有何改變？根據臺灣軍司令部的報告，1937年12月時，臺灣人的反日言行已經「顯著地減少」，「事變以來特別因官民熱心地提供對時局正確的認識，以及本島人皇民化運動的飛躍性的活動。其中更基於最近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效果，以及皇軍赫赫的武威發揚，可以觀察到不安動搖消散之結果」。³⁶對於1938年1月的近衛聲明，則普遍信賴「帝國的決意與皇軍的威武」，部分人士雖然內心感到憂慮，但表面仍認為是日本當然的主張，而不加以批評。同時，眼見南京陷落及中國新政府的成立，許多臺灣人認為「應與帝國一身同體，新政權成立將真正地有利於本島人在中南支的活躍」。³⁷至於陸軍省（第一復員局）在戰爭結束後不久的看法，則是「支那事變當時苦於解釋與支那戰爭一事，但大東亞戰爭後，因敵人為白色人種，而能充分理解戰爭目的，一般都積極地協力」。³⁸

³⁴ 〈周章てるな！もっと足下を見よ〉，《南邦新聞》，1942年1月24日，第7版。

³⁵ 〈第八十六帝國議會説明資料 下卷（1）〉，《帝國議會關係雜件／説明資料關係》，第37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請求番號：A-5-2-0-1_3_037，JACAR Ref.B02031407300。

³⁶ 〈支那事變と本島人（動向）（1938年1月1日）〉，《支受大日記（密）》其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4120150000。

³⁷ 〈支那事變と本島人（動向）（1938年2月1日）〉，《支受大日記（密）》其1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 Ref.C04120257000。

³⁸ 《第10方面軍作戰準備並に作戰記録（案）》（1946年8月），頁20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私底下的情形如何呢？陳翠蓮在考察林獻堂、吳新榮（1907-1967）、葉盛吉（1923-1950）三人的日記後，指出臺灣人面對戰爭時期的高壓，都有自己的因應之道，其政治認同並非固定，而是因時局呈現出游移、流動的現象，且都有在中國、日本、臺灣認同間猶豫掙扎的經驗。雖然三人因世代有別，各自對日本的認同程度皆不同，最終仍未完全同化於日本人。³⁹

詳言之，生於 1881 年，成長於乙未前後的林獻堂，雖然始終排斥皇民化運動，但隨著戰局進展，漸漸將臺灣的命運與日軍的勝敗結合。特別是 1941 年下半年，日美對立加劇後，林獻堂已認為日本係遭英美逼迫而不得不戰，時而在公開場合為日本宣傳。1942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一周年，記下「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臺灣遂免敵軍之攻擊，而得平安過日，真大幸也！」。不過到了戰爭末期，日軍逐漸居於下風後，林獻堂開始批評日軍的窮兵黷武，以至落敗。⁴⁰

生於 1906 年，成長於日治前期的吳新榮，處於如何接受皇民化的苦悶中。1938 年，吳開始以日文書寫日記，並以「便利與必要」等理由，自我說服接受被同化的命運。對於戰爭，最初雖然對中國的潰敗感到難過，卻也開始受國策電影中之「東洋人的人情味」感動，「明白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已完全變成日本人了」。⁴¹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亦相信日本是正義之師，認為「大東亞戰爭的最大意義」就是菲律賓、安南、緬甸、印度的獨立。且特意記下，「此次大東亞戰爭，道義的共榮圈在建設中」，乃是他打算改姓為「大道」的原因之一。⁴²不過當戰爭末期，他不只為戰局感到悲觀，更取出《中山全集》、《胡適文存》研讀，以備「東洋的未來」。⁴³

至於生於 1923 年，成長於日治中後期的葉盛吉，在臺灣時始終擁有明確的日本人認同，但當他前往日本讀書時，卻開始懷念故鄉的傳統文化。戰爭前期，葉盛吉積極支持戰爭動員，相信日本的戰爭理念，感到「必須把歸一於天皇的情感推廣到大東亞諸民族不可」。但到戰爭後期，葉盛吉一方面受到滿洲出身、擁有中國認同的臺籍同學楊威理影響，一方面則是在火藥工廠進行勞動服務時，廠內海軍上校塚本不時批評國策，於是葉盛吉對「共榮共存」、「八紘一宇」開始感到懷疑。⁴⁴

如葉氏所記「現在八紘一宇被極度窄化，過去也是如此。不知其內涵為何，只覺得一切都是日本人所為。且大家得意洋洋」。⁴⁵眼見他的日人同學經常翹班，

JACAR Ref.C11110383500。

³⁹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遠流出版，二版 2009），頁 276-279。

⁴⁰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 229-249。

⁴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2008），1939 年 5 月 12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以下出版項省略），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⁴² 《吳新榮日記》，1942 年 7 月 8 日。

⁴³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 249-264。

⁴⁴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 264-275。

⁴⁵ 葉盛吉著，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2019），1944 年 8 月 17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以下出版項省略），閱覽日期：2024 年 4 月 6 日。

他指責自誇是東亞領導人、世界主宰者的大和民族，必須擔起責任。⁴⁶最後，在他得知將實施鮮、臺人待遇改善之日，他指出日本人作為亞洲領導者之「客觀的理由根本不存在」，認為「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日本適用領導者原理的『八紘一宇』是不同的」。⁴⁷到了戰爭結束前不久，他已經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亞洲團結，那就是「東亞要實事求是，愛東亞，排除私利，以奮起為要」，首先就是要「對過去所有的錯誤道歉」。⁴⁸

或許對身處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而言，相信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理想並非易事。這種矛盾有時甚至會逃過總督府的法眼，出現在公開文章中。生於 1911 年，京大法學部畢業的基隆人范炳耀，⁴⁹1938 年與父、義兄一同受召集參與廣東攻略戰，回臺後撰文表示，攻占華南的意義乃是拯救被西方侵蝕的中國，具體方法就是以日中親善的本旨實施長期建設。不過除了響應日本國策的說法外，范炳耀在文末寫道「如果作為國內只有單一民族的國家，過度發揮日本人共通的潔癖個性，難免前途寒心。於此意義上，日本人必須深刻認識到，今日〔的日本〕已成了世界的日本，了解到展現出抱擁複數民族之大國民襟度的時機已然到來」。⁵⁰《新民報》社論則指稱滿、中、臺、鮮的官吏必須去除優越感，以德對待異民族，獲得東亞全民族之民心，⁵¹日本國民也必須清算「島國感情」，心懷「擁抱東亞民族的大國襟度」，才能成為「堅持新東亞建設之大理想的皇民」。⁵²作為未享有平等待遇，被視為「皇民化」程度不足的被殖民者，臺灣人不斷質問的便是日本人究竟有沒有包容亞洲諸民族，包括臺灣人的胸襟。

就算如此，大亞細亞主義仍對臺灣人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響。儘管戰爭結束後，林、吳、葉三人面對新政權都沒有明顯的認同障礙，相較於林獻堂在第一時間因精神興奮而難以入睡，⁵³以及吳新榮感到將「開新生命」，⁵⁴受日本戰爭理念影響最深的葉盛吉卻寫道「戰爭結束了。但東亞...我們...的問題並未解決」，期待與日本同學一起「朝著東亞和平邁進」。⁵⁵眼見戰後初期日本底層人民的困苦生活，希望為東亞的未來做出貢獻的葉盛吉，思想逐漸左傾，1945 年 12 月，他在日記中記下「東方不會失敗的。只要我們改變東方的生產模式，使國家富強的話，必定能接近比歐洲更優秀的文化」。⁵⁶1946 年葉盛吉回臺後，不滿國民黨的統治，最終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於 1950 年遭國民黨逮捕、槍決。⁵⁷

⁴⁶ 《葉盛吉日記》，1944 年 11 月 7 日。

⁴⁷ 《葉盛吉日記》，1944 年 12 月 25 日。

⁴⁸ 《葉盛吉日記》，1945 年 5 月 18 日。

⁴⁹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眾人事錄 外地・滿支・海外篇》，臺灣頁 41。

⁵⁰ 范炳耀，〈南支攻略の意義と新秩序建設の要諦〉，《臺灣時報》（1939 年 3 月），頁 154-159。

⁵¹ 〈東亞建設と官吏優越感〉，《新民報》，1939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

⁵² 〈皇民化の指導精神〉，《新民報》，1940 年 8 月 14 日，第 2 版。

⁵³ 《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8 月 16 日。

⁵⁴ 《吳新榮日記》，1945 年 8 月 16 日。

⁵⁵ 《葉盛吉日記》，1945 年 8 月 15 日。

⁵⁶ 《葉盛吉日記》，1945-12-03

⁵⁷ 有關葉盛吉的生平，可見楊威理，《ある台湾知識人の悲劇》（東京：岩波書店，1993），中文版由陳映真翻譯，《雙鄉記》（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

三、前往中國的臺灣人

（一）蔡培火的堅持

如果說在臺灣難以逃離殖民統治的歧視，前往島外發展不啻為一種解脫。關於戰時臺灣人在中國的活動，已有許雪姬對在北京、上海的臺灣人之實證研究。許雪姬對於相關史料、臺灣人前往當地的背景、個別人物的職業、活動、生活狀況，以及戰後面臨的戰犯問題、同鄉會的組織等皆有詳盡的敘述。對於他們前往中國的原因，許雪姬指出臺灣人前往中國不外乎是因臺灣就職困難，或不願受日本的差別待遇。當戰爭爆發後，日本占領下的北京、上海，不只提供了許多進入親日政權、日本相關機構服務的機會，臺灣人也能因日本籍而獲得與日本人相同的待遇。⁵⁸

本文擬以蔡培火、大同促進會成員為例，討論他們當戰時日本欲在中國實現大亞細亞主義時如何因應和行動。如前所述，蔡培火因為寫作《東亞之子如斯想》（下稱《東》書），遭到警察當局懷疑為國民政府宣傳，而於 1938 年 1 月遭到拘押 40 日。在東京的蔡培火，以經營中華料理店維生。儘管如此，他仍未放棄中日親善的理想，1939 年 9 月，他寫作〈新東亞建設之細道〉，但在友人的建議下未發表。1940 年夏，他又寫作〈在南方見到的我之幻影〉、〈關於教會合同問題〉，分別討論日德義三國同盟及日本各基督教會的合併，亦未發表。最終，他將各論文中多數有關政治部分刪去後合併成〈檄基督徒之友〉（下稱〈檄〉文）一文，附加在田川大吉郎於 1941 年出版的《皇天上帝の說》一書內。⁵⁹

雖然蔡氏自稱已刪去各論文中多數有關政治的內容，實則〈檄〉文仍充分展現其政治理想。〈檄〉文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基督徒啊，汝之身影薄弱」主要談論基督徒於中日戰爭下的使命。對蔡培火而言，戰爭不只是單純政治問題，更是信仰問題，其相信基督徒對國家效忠之外，真正的使命是依循自身「連敵人也愛」的信仰，不斷從事和平工作。因而，他攻擊日本國內基督徒一味擁護國策的議論，並反對遁入純精神的生活。

第二部分「東亞共榮圈建設的認識」，討論日本應如何實現東亞團結的理想。他先引述《東》書中有關中日親善的內容，接著對日滿中將形成的「東亞協同體」，呼籲日本必須完全尊重中國新政權的民意、主權，軍隊除防共之外宜全數撤出，經濟上廢除不平等條約，文化上重視衛生、醫療、教育，尤其不能使純樸的中國社會被歐美資本主義毒害，中日兩國也應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他也提及日本不能為了分裂中國而將汪兆銘視作三流人物利用，而應信賴汪兆銘，使其發揮手腕、

⁵⁸ 許雪姬，〈1937 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1（2008），頁 33-84；許雪姬，〈1937-1947 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13（2012 年 6 月），頁 1-32；許雪姬，〈戰後上海的臺灣人團體及楊肇嘉的角色：兼論其所涉入的「戰犯」案（1943-1947）〉，《興大歷史學報》30（2016 年 6 月），頁 81-116。

⁵⁹ 〈檄基督徒之友〉亦在戰後被收入《蔡培火全集》內，本文亦使用該版本，見〈基督者の友に檄す〉，收入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七）》（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182-276。

見識，贏得大眾民心。最後，再次提到宗教家不能逃避政治責任，並將視角轉到南方。蔡培火認為儘管日本宣稱尊重滿洲、中國的主權，但仍被各國，甚至是被英國壓迫的印度人懷疑是另一個帝國主義強權。因此，他建議日本必須揭起鮮明的旗幟，擊倒英國帝國主義，解放其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至於無關的美國、蘇聯，則盡可能維持良好關係。總而言之，他的建議有三：一、盡力挽救汪兆銘的名望；二、支持英國殖民地的反英勢力建立獨立國家；三、尊重美國、蘇聯及其他無關國家的利益。

此一部分，可說是《東》書的延伸。儘管其中支持汪兆銘，反對蔣政權的建議，顯然是呼應當時國策而寫，但其根本想法仍是延續著《東》書的尊重中國主權、統一，實行經濟提攜等建議，並隱約地批評日本係以正義之名行侵略之實。至於最終部分雖然提倡南進，表面似與其和平主義相左，實則亦源自《東》書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敵視，當然也是要求日本必須以行動證明自身並非帝國主義國家。

相對於第二部分幾乎全為政論，第三部分「基督徒啊，我等該做什麼？」重新以基督徒的使命為主軸。蔡培火指出，東亞協同體是「人類的社會、集團生活的進化」上的「真理顯現」，能夠為東亞民族帶來永久的幸福。因此，基督徒必須前往中國，從事最適合他們的宗教、教育、救濟等事業，協助實現東亞協同體。他呼籲日本的基督徒，除了依國家命令之外，絕不能以暴力對抗中國，也希望中國的基督徒相信日本的承諾，協助日本基督徒的和平行動。最後有關教會革新及教會合同的内容，主旨同樣呼籲各教會皆宜跳脫純神學的領域，重視現實社會，協助教徒前往中國。

整體來看，〈檄〉文顯示，戰火紛飛並未使蔡培火選擇遁隱、順應時局，反而使他繼續堅持《東》書的看法。若比較《東》與〈檄〉文的差異，或許就在於〈檄〉文中，宗教、政論夾雜的寫作方式，使其較《東》書呈現出更為強烈之宗教性使命感，個別的政治建議亦隨著戰局的發展而更為具體。

秉持著此種使命感，1943年1月，蔡培火從長崎至上海，與田川大吉郎會商日中和議之道。1945年6月，打算田川密赴重慶謀求停戰，不料途中戰爭即告結束。同年9月，田川、蔡與戴笠接觸，田川向戴笠表示希望前往重慶晉見蔣中正。對此，戴笠建議蔣中正派大員協助，以利用田川與尾崎行雄等政界名士的關係，推動對日工作。⁶⁰田川、蔡最終得到何應欽之協助，乘軍機前往重慶晉見蔣。1946年1月，蔡培火加入中國國民黨，此後便一直以國民黨政府支持者之姿現身公眾。⁶¹

（二）大同促進會的「灰色」之道

中日間的戰爭在「御用紳士」或知識分子眼中，都是值得感到憂慮的事態，不只是因外在期待「新恩舊義」互相禮讓達成兩全的理想破滅，更因內在對「新

⁶⁰ 「戴笠電蔣中正報告與田川大吉郎晤談經過」（1945年9月4日），〈戴公遺墨—政治類（第1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44-010101-0001-073。

⁶¹ 張炎憲，〈蔡培火的追求與失落〉，收入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1。

恩舊義」的情感，在戰爭的緊張下已完全不能並存。如荊子馨所稱：「殖民壓迫與中國民族主義反抗這兩種支配性論述——兩者在意識形態上相反，但在結構上卻有類似的強迫性——都堅決指定和凝聚一種排他性的認同，以做為各自的政治手段」。⁶²臺灣人餘下的道路，除了成為「帝國臣民」協助「暴支膺懲」，就是參加「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於是，林獻堂在聽聞日本拒絕仲裁，國府亦派遣中央軍北上後，寫道「如是，非戰爭不能解決矣。噫！」，⁶³而辜顯榮則在南京陷落前夕，「在憂愁中與世長辭」，⁶⁴至於堅持中日親善理想的蔡培火，也難逃警察機關的拘押，僅是靠著自身信仰始能堅決推行和平工作。

不過，對於大同促進會遊走在東亞的人們，戰爭卻提供一個莫大的機會。事變後，謝龍閣自天津致信友人岩本嗣泰（《臺灣時事新報》主筆），表示：「等待已久的機會已來，正是千載之一遇。『打倒蔣介石』（國民黨）『撲滅共產黨』始能達成，支那也將得救」，「始得為東亞招來完全的安固」。而對長期在中國、日本活動，「漂漂放浪而來的小生而言，此次事變正是男子漢崛起之絕好機會」。⁶⁵

在天津活動的謝龍閣改名為「謝龍閣」，在藤井慎二（前臺灣軍憲兵隊長，1936-1937年任支那駐屯軍憲兵隊長）支持下，建立龐大勢力，其公館經常有中國官員、大商人，乃至土匪、軍閥出入，有人稱為「謝機關」，⁶⁶一時甚至有比擬天津市長的勢力。利用臺灣人身分，謝龍閣率領許多臺、日人部下，與地方勢力、祕密結社建立關係，以協助日本當局掃蕩天津租界的抗日分子、援助被匪賊挾持的日本人等特殊任務，贏得相當信賴。除了地下工作外，謝龍閣也經營礦山、新聞業。⁶⁷至於李燼己，則於1937年6月離開《庸報》，⁶⁸但繼續從事情報工作，在事變爆發後與吳佩孚（1874-1939）接洽，試圖拉攏吳氏在華北建立親日政權。⁶⁹相較於親憲兵系統、以天津為據點勢力跨足北京的謝龍閣，李燼己則親特務機關，勢力範圍主要在北京。⁷⁰

李、謝兩人究竟處在何種心境下依附於日本勢力，又是如何思考中日戰爭下臺灣人的處境及中日關係？或許從下述兩篇文章中可得到解答，首先是李燼己於1937年8月21日，在臺北放送局廣播演講的「支那事變的哲學根據與島民的覺悟」。從背景來看，可推斷李氏係受總督府請託協助總督府的戰時宣傳。不過，其內容並非如此簡單。該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從兩國國情差異來看，說明中日兩國必須合作才能進步，因此當下的爭吵有如夫妻、兄弟之爭，最終必將和解，而臺灣人如小孩、小弟，應致力使兩國和好。第二部分說明臺灣人身為

⁶²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276-277。

⁶³ 《灌園先生日記》，1937年7月16日。

⁶⁴ 楊永良譯，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辜顯榮傳》，頁576-578。

⁶⁵ 〈動亂の巷より〉，《臺灣時事新報》，1937年7月30日，第5版。

⁶⁶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89-93。

⁶⁷ 竹內清，《事變と臺灣人》（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40），頁154-157。有關該報紙，劉捷記為《天津日報》，但其餘資料則稱為《天聲報》，可能是之後改名。劉捷，《我的懺悔錄》，頁9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報海鉤沉》，頁149。

⁶⁸ 〈津庸報社長李炳華辭職〉，《申報》，1937年6月18日，第4版。

⁶⁹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707-711。

⁷⁰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94-95；張深切，《里程碑》（下），頁707。

日本國民，應配合日本的統治，努力成為皇民回報皇恩。第一部分，大概是為了迎合普羅大眾，而用了淺白的概念比擬中日關係，第二部分則是露骨的皇民化運動宣傳。不過，相較於第一、二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分，其主要內容，就是欲以「哲學根據」，明確地回應臺灣人對「舊義」的感情：

假如這次反抗我日本的國家是第三國，我認為島民的熱烈程度應比現在還要強，但因對方是支那，而多少有所猶豫。這種心情雖大致值得同情，但若以北支事變的哲學根據追究的話，就能清楚知道此不過如婦人之仁。北支事變的哲學的根據為弔民伐罪，所以才不斷地提倡以皇道精神為經、孔孟仁義為緯之東洋道德的精華。⁷¹

李燼己指稱，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實際上是為了「弔民伐罪」，也就是打倒萬惡的國民黨政權，拯救四億中國人，使中國能覺醒於東洋道德，歸於孔孟道德，因此中國各地百姓，都歡迎日軍到來。既然日本乃是「義師」，那麼「島民的命運，就是先乘上此大船，拯救四億支那民眾於水火之中」。⁷²

依附在日本勢力下，固然能獲得個人的出路，但是對臺灣人而言，在支持日本對中戰爭前仍必須先化解自身「舊義」之間的衝突。此處的李燼己，並不單只是復頌大亞細亞主義的宣傳而已，更是試圖運用大亞細亞主義拯救中國、復興東洋的理想，突破這種掙扎，說服其他臺灣人，也說服自己，支持日本的戰爭是正當之舉。李氏曾私下批評軍部的作法，指著蘆溝橋的「暴支膺懲」碑質疑，「為何不寫『暴將蔣介石』，若寫暴支的話，就是指全部支那人，將來支那青年必定會把這個碑破壞掉吧」。⁷³此一例子便顯示出，縱然李燼己長期擔任日本軍部的間諜，但是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解讀、運用，依然具有自主性，當日軍行動背棄他自圓其說的正當性時，也不得不予以批評。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謝龍閣的《龍吟》中。與上篇文章不同，《龍吟》是謝龍閣以中國人的身分寫給中國人，攻擊國民黨政權，呼籲親日的論著。奇特的是，他對中日關係的說明實援用自大同促進會宣言中提到的臺日關係。他強調「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中日兩國基於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的地理，必須共榮共存。然而，兩國卻因民族性的不同而產生不少誤會，因此他呼籲中國新政府「欲維東亞大局，須本乎共榮共存之定理，此不待複言也。然欲達此目的，乃不惜犧牲一切，勇往向此目的邁進，據此理論的信仰心而親日，是為澈底的真正的親日，其所以親日者，即為真正之愛國，愛東亞也」。⁷⁴顯然地，謝龍閣乃是試圖將「無抵抗的抵抗」理論套用到中日關係，此說法雖然不見得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實情，但對謝龍閣而言，為了這種想像中的中日共存之道努力，也未嘗不是一個說服自身為日本服務的理由。

⁷¹ 李燼己，《支那事變の哲學的根據と島民の覺悟》（臺北：臺北鐵道ホテル，1937），頁9-10。

⁷² 李燼己，《支那事變の哲學的根據と島民の覺悟》，頁10-12。

⁷³ 本山文平，《夢の九十年》，頁125-126。

⁷⁴ 謝龍閣，《龍吟》（天津：天惠印務局，1938）。

更重要的是，謝、李透過日本獲得的不只是個人成就，更提供許多臺灣人至中國發展的機會。大同促進會的相關人士皆在華北獲得一官半職。彭華英於 1939 年前往華北電話公司任職，1941 年進入北平市警察局，先後擔任秘書、特務科長、經濟科長，1944 年任華北廣播協會廣播部長。⁷⁵謝廉清改名為謝子夷，蘆溝橋事變後擔任北京地方維持會顧問，1938 年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工商局科長，1945 年任北京市政府工務局長。⁷⁶周合源則是於 1938 年前往北京，從事煤炭生意，⁷⁷不過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調查則稱其為謝龍闊部下，為日軍服務。⁷⁸原先在《新民報》、《東亞新報》等報任職的左翼作家劉捷，透過許乃昌介紹成為謝龍闊下屬，從事翻譯與報業工作，不久至憲兵機關協助電影審查，最終前往徐州擔任警察局主管。⁷⁹其他與謝龍闊有關的人士，還有天津警務局秘書長張銀樂（謝氏義弟）、⁸⁰北京電信局職員王英石（謝氏明治大學同學）。⁸¹至於李燼己的情形雖不清楚，推測應與謝龍闊雷同。⁸²

如同李燼己所言：「我是個沒有國家的浪人，把全世界的人都殺光了也與我無關，但我絕對不害臺灣人。」⁸³李、謝的打算或許是，如果依賴大亞細亞主義，能夠使夾在中日戰火間的臺灣人得以生存、得以發展，那就算是「無抵抗的抵抗」。張深切批評李燼己為漢奸的同時，也指出李曾袒護臺灣人，因此是「殖民地臺灣自然產生的一個畸人」，⁸⁴劉捷則稱謝龍闊是「我的恩人亦是好友」。⁸⁵謝、李兩人固然是協助日本擴張的爪牙，但因他們私下保有一定的堅持，有著袒護、協助臺灣人發展的行動，使得他們死後仍得到臺灣人的同情。

然而，如李燼己的發言所暗示，臺灣人雖然到了中國，終究難以逃離國家之間的對立。不能否認的是，他們的成功終究是以日本勢力為背景。彭華英、謝廉清等臺灣人曾異口同聲地向來訪的日本記者表示，自己的地位並非靠自己的力量獲得，「從未忘記這是託國家的福」，因此始終擁有為國家犧牲的覺悟。⁸⁶於是，當日本以皇民化要求忠誠時，他們也不能推辭，1941 年，李燼己因母喪回臺時，

⁷⁵ 〈彭華英等戰犯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013.81/4212。

⁷⁶ 〈漢奸戰犯判決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50000C/0034/1583/3413/1/001。

⁷⁷ 陳儀深等，〈周合源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9（1999 年 6 月），頁 125-149。

⁷⁸ 〈關於臺共組織之周合源、林日高〉，《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0653_B_07_0003。據劉捷回憶，謝龍闊過世時，北京附近不少臺灣人前來弔喪，其中包括周合源。劉捷，《我的懺悔錄》，頁 100。

⁷⁹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 89-118。

⁸⁰ 竹內清，《事變と臺灣人》，頁 245。

⁸¹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 96。

⁸² 據張深切聽說，李燼己「陰袒臺灣人」，早年在福州時也曾協助營救林文騰、蔡惠如。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708。

⁸³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708。

⁸⁴ 張深切，《里程碑》（下），頁 708。

⁸⁵ 劉捷，《我的懺悔錄》，頁 100。

⁸⁶ 竹內清，《事變と臺灣人》，頁 245。

改名為「里見德」。⁸⁷另一方面，為日本帝國服務的他們，更被中國的民族主義深惡痛絕。1940年，謝龍闊病逝北京，⁸⁸而李燼己則於1943年逝於上海，據傳是被軍統局特務暗殺。⁸⁹存活下來的人們則在日本戰敗後面臨戰犯審判，彭華英幸運地因臺灣人身分獲得不起訴，⁹⁰但謝廉清則遭判刑，直到共產黨攻入北京後始獲釋，最終於1959年大躍進期間逝世。⁹¹「沒有國家的浪人」們，利用大亞細亞主義，為「沒有國家」的臺灣人提供的潛藏在國家間衝突之出路，終究不可能超越「沒有國家」的侷限。

四、成為日本人、成為亞洲人

根據前述佐藤佐的說法，「八紘一字是亞細亞一家的皇謨，既然如此亞細亞諸民族間就不可能有民族對立」。然而，上述討論只呈現出臺灣人私下仍維持一定的自我意識，並未全盤接受大亞細亞主義。究竟日本人所期待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下的「內臺融和」能否實現？臺灣既然屬於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同樣深受九一八事變後大亞細亞主義潮流的影響，必然也會有肯定的案例。

1933年10月，生產黨幹部受社研邀請來臺演講，臺下聽眾中有一名臺灣人警察。這名年僅28歲的青年警察，向記者表示「本島青年的大部分都知道生活在我國的統治下乃是莫大的幸福」，對於日本當下的國際困局，「大家都認為，萬一日本落敗，支那將被白人的野心蹂躪，臺灣等地也將被如野獸般的歐美人搾取」。⁹²儘管其說法在程度上或許有所誇張，不能否認的是大亞細亞主義確實激起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團結心，使臺灣人感到有必要支持日本的統治。

1937年11月，在大稻埕青年團長陳清波的奔走下，「大稻埕青年團魁隊」（魁挺身隊）成立。據陳清波的說法，事變爆發後許多團員希望共赴國難，而提出軍夫、從軍志願，或以血書希望當局斡旋，總計共有93名。魁挺身隊的目的，便是對「今後將於東亞的天地間活躍的有為之臺灣青年」，進行皇民化的基礎訓練，授課項目包括地理、歷史、語文、公民、教練等，講師有白鳥勝義（臺大教授）、佐藤佐（高商教授）、山本募（臺灣軍參謀）等。⁹³其後，魁挺身隊分別參與1938年10月廣東白耶士灣登陸，以及1940年2月的福建東山島攻略。1941年1月，魁挺身隊獲得臺灣軍司令官本間雅晴頒布隊旗，3月獲得最初的人營訓練許可。⁹⁴志願兵制實行後，魁挺身隊隊員積極響應，至1942年2月志願者已有約200名。⁹⁵身為魁挺身隊隊長，陳清波則於1942年6月響應皇民化運動，改名為「田川清波」。⁹⁶

⁸⁷ 〈李燼己所寄之信函〉（1937-1943），《楊雲萍文書》，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YP01_01_032。

⁸⁸ 〈本報社長謝天惠昨下午逝世京寓〉，《天聲報》，1940年7月7日，第2版。

⁸⁹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臺北：謝東漢、吳餘德，2016），頁515。

⁹⁰ 〈彭華英等戰犯案〉，檔號：B5018230601/0034/013.81/4212。

⁹¹ 陳毓鈞，《新世紀中美臺關係：困境與出路》（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頁210-224。

⁹² 〈時局問題に關して 本島青年と語る〉，《新高》，1933年11月3日，第3版。

⁹³ 〈佳節をトして 有為なる臺灣青年に皇民化の基礎的訓練〉，《臺日》，1937年11月4日，第07版。

⁹⁴ 陳清波，〈魁挺身隊の使命〉，《部報》121（1941年5月1日），頁24-26。

⁹⁵ 〈約二百名に達せん 臺灣魁挺身隊〉，《臺日》，1942年2月1日，夕刊第2版。

⁹⁶ 〈官選議員内示〉，《臺日》，1942年6月16日，第2版。

陳清波積極成為日本人的舉動，或許仍能以茶業經營來解釋。事變爆發後，他致力使臺灣茶的銷路，隨著日本勢力的擴張拓展至華北、華中。⁹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撰文指出臺灣人最適合作為日本「向南方諸地域的尖兵」，不只因臺灣人與中國、南方民族類似的風俗、生活，更因臺灣人「經過四十七年間的鍛鍊，有著日本精神之崇高精神力的偉大性質」。文中亦提及茶業的未來發展，認為隨著共榮圈的實現，優質的臺灣茶將再次進入東南亞市場，至於當地生產的劣質茶應予以加工成純茶葉以外的產品。⁹⁸

那麼，在陳清波之下，參與魁挺身隊志願從軍的青年究竟是以何種理由投身戰爭呢？正如周婉窈指出，日治末期的愛國教育有相當程度的成功，本著強烈愛國心參加日本戰爭者不少，但因戰後抗日史觀的影響，使許多臺灣人不敢承認自己係出於自願。⁹⁹以 1942 年作為陸軍志願兵從軍、在印尼帝汶島迎來終戰的鄭春河為例，戰後 40 餘年後，他仍相信「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而是為了將歐美殖民勢力自亞洲逐出的聖戰，雖然日本戰敗了，但當地人也獲得了民族自覺，而能在戰後達成獨立。¹⁰⁰

在此，本文擬討論的是那些不只熱烈從軍，甚至戰後仍以「殘留日本兵」之姿滯留印尼、協助印尼人對抗英、荷軍隊獲得獨立的臺灣人。整體來看，戰後初期在印尼之臺灣人人數約有一千餘人，其中多數為日本兵。1946 年 5 月，雅加達收容所內的原臺籍日本兵組成「明臺會」，意指「明理臺灣」，鼓舞臺灣人共同為臺灣未來努力。明臺會以團結會友、效忠祖國，履行三民主義及建設新臺灣為宗旨，可以說當時在印尼臺灣人普遍對新政權抱有期待，與在臺灣的人士相同。¹⁰¹不過，仍有極少數的臺灣人選擇滯留當地，甚至參與印尼獨立戰爭，根據印尼殘留日本兵的互助組織「福祉友之會」統計，戰後滯留參與獨立戰爭者中，共有 6 名臺灣出身者，其中有 4 名能夠確認為臺灣人。

表 7-6 臺灣出身之印尼獨立戰爭參與者

姓名	身分及出身
張順達	陸軍軍屬，臺灣高雄人
田中秀雄	陸軍雇員，臺灣嘉義人，漢名盧春生
宮原永治	陸軍軍屬，臺灣臺南人，漢名李柏青
金山春夫	陸軍軍屬，臺灣臺東人，漢名不明
巽時義	陸軍軍屬，原籍奈良
清水宏	陸軍軍屬，原籍不明

資料來源：《福祉友の會 200 号「月報」抜粹集》（東京：Y. W. P.福祉友の會，2005），頁 309，

⁹⁷ 〈北支の經濟開發は 臺灣茶躍進の好機〉，《臺日》，1937 年 12 月 27 日，第 2 版；〈中支向きの臺灣茶〉，《臺日》，1939 年 5 月 11 日，第 2 版。

⁹⁸ 陳清波，〈南方建設と臺灣〉，《南方資料》13（1942 年 6 月），頁 7-9。

⁹⁹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150。

¹⁰⁰ 鄭春河，〈台灣人元志願兵と大東亞戦争〉（東京：展転社，1998），頁 185-189。

¹⁰¹ 湯熙勇，〈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1（2007 年 3 月），頁 20-22。

382-397；《月報》189（1998年1月），頁13；長洋弘，《インドネシア残留元日本兵を訪ねて》（東京：社会評論社，2007），頁174-175，240-241，275；長洋弘，《インドネシア残留元日本兵》（東京：社会評論社，2015），頁188-189。

這些臺灣人的經歷分別如下。張順達（1922-2003）為高雄旗山人，1942年受徵召至岡山的海軍航空隊受訓，終戰時在蘇門答臘島武吉丁宜（Bukittinggi）第25軍司令部服務。¹⁰²戰後，當地臺灣人受軍司令部指示，成立臺灣旅蘇同鄉會，因缺乏指導，數月後即無法維持而解散。同鄉會解散後，張氏最初與其他臺灣人一同經營運送業，隨著獨立戰爭時印尼人、日本人、華僑間的對立，張氏決定結婚投身華僑社會，在各地避難的同時，從事零售、運送及土木建設業。印尼獨立後，張氏重回武吉丁宜，在市政府任職，繼續從事運送及土木業。¹⁰³

盧春生（1923-1998）為嘉義人，戰時原在廣東協助叔父之事業，聽聞臺灣可能實行徵兵制後，因不願成為二等兵被欺負，1943年2月志願成為軍屬。經6個月受訓後，盧氏因通日語、中文，被配屬至新加坡第7方面軍參謀部，1944年1月前往蘇門答臘島從事間諜工作。終戰時，聽聞英軍廣播「不問階級皆可能成為戰犯」，而決定持武器逃亡，最終因盤纏盡失而加入印尼獨立軍。戰後先從事行商，後從事土木承包業。¹⁰⁴

從張、盧兩人的經歷來看，很難說他們是受到「大東亞戰爭」感召而選擇參與戰爭、滯留印尼，反而更接近當時臺灣人欲逃離殖民壓迫而前往南洋，戰後則期待返鄉的普遍態度。不過，宮原永治（1922-2013）、金山春夫（1918-1985）兩人回憶自身經歷時，明確提及「大東亞戰爭」的理念。根據宮原自述，他就讀小學時正逢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為了防止蘇聯、歐美國家染指中國，日本才將戰爭擴大為中日戰爭。而「大東亞戰爭」同樣是日本為了其存亡，以及亞洲全體的黃色人種的未來，而發動的「有色人種的解放戰爭」。當時為學生的宮原受此理念感召，同時也因兄弟皆接受徵召，於1940年志願以通譯身分從軍，轉戰華南、菲律賓、爪哇，1942年除隊。1943年再次被派遣進入臺北帝大學習熱帶醫學，1944年前往緬甸各地從事防疫事務，1945年5月回到爪哇。戰後，眼見日本、臺灣皆遭戰時的敵人占領，宮原決定維持日本人的認同，留在當地為印尼獨立而戰，之後亦始終以日本人身分活動。¹⁰⁵

金山春夫則是於1938年受徵召為軍屬，擔任第14戰車聯隊福建語通譯，之後隨隊轉戰至東南亞。1943年除隊後，前往馬來半島，進入當地負責軍隊物資調配的日本企業服務。戰爭結束後，因為不明原因，自新加坡前往印尼棉蘭。在棉蘭時，金山與宮原類似，因感到臺灣已遭前敵人國民黨占領，又希望追求「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加上其華僑妻子的希望，決定滯留當地。將家族安置在棉蘭

¹⁰² 〈日據時代充當砲灰 戰後獨留異邦生根〉，《自立晚報》，1985年6月19日，第3版。

¹⁰³ 《福祉友の会 200号「月報」抜粋集》，225-227。

¹⁰⁴ 長洋弘，《帰らなかった日本兵》（東京：論創社，2021），頁280。

¹⁰⁵ 《福祉友の会 200号「月報」抜粋集》，頁284-285。該篇文章雖然描述的是「M氏」的經歷，實則能判斷為宮原本人的經歷。青沼陽一郎，《帰還せず》（東京：小学館，2014），頁81-82。

市後，金山獨自參加獨立戰爭。獨立戰爭結束後，金山依舊維持強烈的日本人認同，交遊人士皆以日裔人士為中心。¹⁰⁶

在大亞細亞主義的影響下，對宮原、金山兩人而言，他們的職責便是成為日本人，然後為亞洲而戰。戰爭結束後，他們也選擇繼續為此理想而戰，最終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事實上，面對戰後臺灣情勢的轉變，此一選擇的背後也帶有一些不得不的理由。1974年，宮原曾短暫回臺，然而根據其回憶，「親戚卻對我說，身為前日本兵的我，最好不要待在臺灣比較安全。臺灣是故鄉，令人懷念」。¹⁰⁷失去故鄉的他們，除了依循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成為日本人、成為亞洲人之外，還能有什麼選擇嗎？

第四節 小結

中日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對大亞細亞主義的認識，無論是對外的「皇道宣布」還是對內的「內臺融和」，已與軍部大致相同。為了對外南進，總督府動員過去僅是「沙龍」團體的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新建臺灣南方協會，最終決定一手包辦南進事務。對內，總督府則逐一強化宣傳、動員機關，對臺灣人宣傳大亞細亞主義理念，並動員臺灣人為其理念獻身。一但「大東亞戰爭」爆發，臺灣便得以成為「大東亞的中心」，在物質上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作貢獻，在精神上以「內臺融和」證明大亞細亞主義的必然性，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

在戰時體制下，當一切事物皆被總督府納入統制，以協助落實大亞細亞主義時，在臺日人、臺灣人如何因應？過去對臺灣統治頻頻發表意見的右翼日人已接受被統制的命運，與總督府一同相信大亞細亞主義的夢。夾在中國、日本、臺灣認同間的臺灣人則各自發展出因應之道：在臺灣的臺灣人，儘管表面上支持日本的戰爭理念，私底下仍不斷質疑「內臺融和」的真實性，最終可能如葉盛吉，在大亞細亞主義下發展出自身的東亞團結理想。不願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的人，有的選擇前往中國，或如蔡培火依舊堅持從事中日和平工作，或如大同促進會成員委身大亞細亞主義，換取臺灣人在中國的發展。至於那些真心相信大亞細亞主義的人們，前往南方作戰的人們，如果他們在心理上無法迅速轉投新的中國政權，或擔憂被前敵國視為戰犯，剩下的選擇就是留在東南亞，繼續以日本人的身分堅持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

¹⁰⁶ 《福祉友の会 200 号「月報」抜粹集》，頁 309。

¹⁰⁷ 長洋弘，《インドネシア残留元日本兵を訪ねて》，頁 336-337

第八章

結論

亞細亞主義雖浮現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但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下，始終不過是少數人提倡、實踐的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當西方國家陷入戰亂而無暇東顧，日本一躍成為東亞局勢最重要的捍衛者，亞細亞主義議論遂迅速湧現。戰後局勢仍然刺激亞細亞主義的流行，尤以 1924 年美國排日法案的通過最為重要，並導致全亞細亞協會的成立。該協會於 1926、1927 年舉辦兩次全亞細亞民族會議，邀請亞洲各地人士與會，希望藉之實現亞洲團結的理想。不過，出乎主辦者料想之外的，乃是來自亞洲各地的與會者，因所處的背景不同，對亞細亞主義有不同的認識，使得會議均無具體成果。亞細亞主義傳播至亞洲各國之後，開始呈現多元的樣貌，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臺灣。

儘管中日關係是亞細亞主義之核心問題，過去研究並不常論及身處「日本與中國兩團火之間」，不斷受兩國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影響的臺灣。然而，早在日本領臺之初，亞細亞主義已在臺灣出現。為了滿足對「新恩舊義」之情感，傳統士紳期盼日本推動亞細亞主義；作為「清國通」的學友會希望實行亞細亞主義式的同化政策，使臺灣人能夠協助日本振興亞洲。進入 1920 年代，隨著亞細亞主義的流行，在臺日人主張以中日合辦推動中日親善，臺灣人則利用夾在中、日間的身分參與。其後，亞細亞主義的思想進一步與臺灣人的政治期待結合。知識分子主張亞細亞主義代表亞洲各民族文化的復興，呼籲日本改善臺灣統治、保存臺灣人自主的人格；以辜顯榮為代表的「御用紳士」，配合總督府反對知識分子，以捍衛傳統東洋文化，並親身從事中日親善運動。由於在臺日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各自不同的背景及目的，1920 年代臺灣的亞細亞主義於是呈現多樣、複雜的樣貌。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與歐美國家為敵的國際局勢，促使敵視西方、強調日本中心之「大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國內流行，輿論、政府、民間團體紛紛展開運動。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可以分為對外與對內兩個層面。對外，試圖以「皇道宣布」實現日本與亞洲民族之「民族融和」；對內，面對既有的臺灣統治，則是試圖以「皇化」實現「內臺融和」，兩者實為一體兩面，缺一不可。此一大亞細亞主義的潮流很快進入臺灣社會。考察 1930 年代的島內言論界，在臺日人主導、全日文的週刊《臺灣經世新報》、《南日本新報》、月刊《新臺灣》、《臺灣》，與軍部相呼應，對外強硬呼籲南進，對內強硬鼓吹臺灣人接受日本精神；知識分子的《臺灣新民報》、「御用紳士」的《昭和新報》，為了保存自身文化，一致提出亞洲各民族平等互信，並實行漢文教育作為中、日疏通管道之看法。大亞細亞主義的到來，使得知識分子與「御用紳士」雙方的對立逐漸淡化，臺、日人思考的

裂痕則有增無減，「內臺融和」的理想，面對的卻是「內臺不融和」的現實。

除了日、臺人的分歧外，亦不能忽視總督府的影響。1930年代大亞細亞主義在臺灣的具體實踐，圍繞在臺灣軍部（與右翼在臺日人結合）、臺灣人、總督府三者的互動上。就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外層面而言，1933年底閩變以來，軍部開始透過臺灣，對華南展開積極的經、政工作，然總督府僅重視經濟交流，對政治工作缺乏熱誠。1934年，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1935年後改名為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成立，表面上呼應軍部，標榜對外宣揚皇道的大旗，實際上的活動卻受總督府嚴格管控，僅止於舉行演講、座談會。協會中以臺北高商教授佐藤佐、臺灣軍軍官為主的積極南進派，只得各自行動，與華南、南洋展開政治交流，聯絡親日勢力。雖然積極南進派曾於1935年4月珠諾號事件、10月熱帶產業調查會時攻擊總督府，臺灣大亞細亞協會的活動終究維持原樣。至於協會中的臺灣人如陳清波、辜顯榮，則抱持與日本人不同的大亞細亞主義。前者的行動與包種茶業的經營有關，雖然支持日本勢力的擴大，惟在具體實行上則打算以臺灣人為中心擴展臺、滿、中貿易；後者以貴族院議員的身分遊走在中、日政界高層間，試圖使兩國各退一步以弭平紛爭，對軍部聯絡華南反蔣勢力的計畫並不熱衷。

如佐藤佐所引述，「無法達成徹底的內臺融和，又算什麼大亞細亞主義啊？」日臺若不融和，亞洲民族豈有可能與日本融和？臺灣人豈有可能協助日本的「皇道宣布」？陳、辜與日人之差異，似乎佐證了上述非難。促成內部的「內臺融和」，於是成為右翼日人及在臺軍部的重要目標。皇政會、生產黨與在臺軍部結合，主張實行「皇道政治」，使臺灣人皇民化，並預備未來的南進。面對右翼日人的威脅，臺灣人知識分子在臺中州知事竹下豐次支持下，於1933年12月成立東亞共榮協會與之周旋。東亞共榮協會實際上是期待宣揚日本精神，根除臺灣人社會運動的右翼日人；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推動平等待遇的臺灣人；以及欲消弭兩者對立，穩定統治的總督府，三者各自盤算下的產物。1934年10月，臺、日人爆發衝突，不滿協會被臺灣人控制的右翼日人集體退會。接著，1935年1月，竹下知事轉任，新知事眼見協會無法達成消除對立的目的，不再願意協助協會抵抗右翼日人。最後，1936年6月，右翼日人與軍部結合發動「祖國事件」，攻擊臺灣人知識分子、東亞共榮協會，甚至辜顯榮等「御用紳士」。「祖國事件」後，總督府不得不接納右翼日人與軍部的意見，採行強硬方針實現「內臺融和」，協會也告解散。

1936年10月，小林躋造總督上任，其治臺方針標榜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與軍部立場更為接近。以蔡培火為例，知識分子雖然已無法再推動島內社會運動，卻仍期待中日兩國能互相妥協、確保和平，臺灣人也能間接得到平等待遇。然而，戰爭終究爆發，臺灣人是否還有其他出路？謝龍闊的大同促進會提供臺灣人作為大亞細亞主義的尖兵，為日本擴張服務之機會。此一出路固非正途，但吸引不少左翼知識分子加入。仰賴謝氏的親日態度，左翼知識分子才能夠繼續推動陋習改革、教育漢文，甚至前往中國發展。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總督府、軍部對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解已大致

一致。總督府動員大亞細亞協會等各種組織，全面協助南進，並以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協助皇民化運動及戰時動員。隨著戰爭持續進行，總督府對南進的介入越來越直接，動員越來越全面。在總督府眼中，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後，實現「內臺融和」之臺灣，將在物質及精神上成為「大東亞的中心」。臺灣社會的實情，自然不會如此單純，儘管右翼日人已被總督府控制，在臺灣的臺灣人仍懷疑「內臺融和」的真實性；在中國的臺灣人依舊保持中日親善或海外雄飛的理想；受大亞細亞主義感召而從軍的臺灣人也只有少數人因戰後局勢的變化，不得不繼續為大亞細亞主義付出。

從臺灣的情形觀之，亞細亞主義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存在著複雜的關係。當時的討論始終離不開殖民統治，應如何以臺灣向外推動亞細亞主義？又應如何在臺灣實行亞細亞主義？這些問題自日本統治開始時已經存在。其思考深受殖民統治下臺、日民族差異影響，其實行除了民族差異外，亦與殖民體制下總督府的態度有關，且受總督府、軍部之互動牽連。

詳言之，在思想意義上，臺灣具有民族、地理上介於中國、日本、南洋的特殊性質，只有對臺灣施行符合亞細亞主義的殖民統治，使臺灣的存在有裨益於日本實現亞細亞主義，方能真正發揮臺灣的價值。在具體發展上，殖民統治下的民族差異，使在臺日人、反總督府之知識分子、親總督府之「御用紳士」等群體，對於何謂亞細亞主義、何謂亞細亞主義式的殖民統治產生不同認識，各自展開行動時又受總督府態度限制。當軍部企圖實現大亞細亞主義時，亦缺乏直接影響統治的權限，只能透過右翼日人向總督府施壓，也僅至戰爭爆發始與總督府達成共識。到了統治末期，亞細亞主義式的殖民統治，已與皇民化的概念結合，與日本對外的擴張相輔相成。表面上，臺灣人完全成為日本人，似乎將使臺灣人喪失既有特質，阻礙日本帝國利用臺灣人的民族關係向外擴張；實際上，依照「皇道」中心之大亞細亞主義邏輯，日本人、臺灣人、亞洲人都須依「皇道」結合，當臺灣人體得「皇道」後，既有特質即能為宣揚「皇道」而存在。亦即是，只有當臺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時，才可能成為真正的亞洲人，以其特質協助日本達成亞洲在「皇道」下的結合。

當亞細亞主義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隨著日本戰敗、統治告終而消失，相關討論對日本人而言已不再具有任何意義。¹另一方面，對臺灣人而言，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關於亞細亞主義的討論及行動又具有何種意義？當臺灣人夾在中國、日本間思考亞細亞主義、展開行動的過程中，某種「臺灣人意識」也逐漸浮現。

如許多論者所述，吳濁流（1900-1976）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呈現出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具有的認同掙扎。小說主角胡太明，既無法被接受成完全的日本人，又被中國人視為間諜，回臺後不堪戰爭動員的殘酷而發瘋，謠傳發瘋後前往中國參加抗日戰爭。胡太明所遭遇的，乃是支配性的日本殖民現實、殘存的中國

¹ 即吳叡人所言，戰後出現的當代亞細亞主義以主權國家體系為基礎，使未取得主權國家地位的臺灣難以出現在相關討論中。吳叡人，〈賤民宣言—或者 臺灣悲劇的道德意義〉，頁 60-73。

文化想像，以及浮現中的臺灣意識三者間的緊張關係，最終當戰爭狀態升高內在矛盾的緊張時，主角也因此發瘋。² 不過，儘管胡太明最終以發瘋的方式突破內心的矛盾，吳濁流實際上卻生活在「濁流」之中，1920年至1940年在殖民政權下擔任教職，1941年前往南京，在日本軍部、政府共同設立之《大陸新報》擔任記者；1942年回臺，進入總督府的外圍機構「米穀納入協會」任職；1944年進入「御用報紙」《臺日》擔任記者。³

回到歷史現實上，吳濁流終究必須在濁流中生存，尋得在濁流中的妥協點，其餘的臺灣人又未嘗不如此？透過亞細亞主義，臺灣人在濁流之中找到了某種特殊的身分、意義，不再是中、日間尷尬、被動的存在。日治之初的傳統士紳，以亞細亞主義化解了臺灣人「新恩舊義」的衝突；1920年代以後的「御用紳士」及知識分子，雖然採取的手段不同，卻同樣呼應著亞細亞主義，認為臺灣是中日親善的楔子；大同促進會的人們則在大亞細亞主義之中看到臺灣人出頭的機會，在協助日本對外擴張的同時，又堅持「絕對不害臺灣人」。這些例子，似乎顯示一種「臺灣人意識」，逐漸出現在他們的心中。

這種「臺灣人意識」，並不代表對中國或日本的拒斥，卻又從未與其中一方完全相同。身處日本統治下，臺灣人在現實上與日本帝國休戚與共，無法輕易否定日本追求的「日支親善」或大亞細亞主義，亦難贊同中國的抗日民族主義。不過，儘管「御用紳士」不否認日本統治及日本國益，仍期待中、日能尋得某種互惠的平衡，同時在中日親善下保存傳統漢文化；知識分子從未正面反對亞細亞主義的理想或質疑日本的戰爭理念，但亦未放棄追求平等待遇，乃至於中日和平；謝龍闊、李爐己的言行雷同於日人右翼，私底下卻追求臺灣人的海外發展，甚至批評日人敵視中國人的態度；至於宮原永治（李柏青）等人，儘管接受日本的戰爭理念，以殘留日本兵的身分留在印尼，也依舊懷念故鄉臺灣。

透過對亞細亞主義的討論與行動，臺灣人終究尋得了某種「臺灣人意識」，使其能在各種認同交錯矛盾的濁流中，以流動的認同生存。⁴ 戰爭末期，臺灣人面對日本帝國的壓力，依舊保持著「臺灣人意識」；戰爭結束，面對新的中國統治者帶來的民族主義壓力時，又會發生什麼變化？⁵ 李爐己之子李銑源（1918-

²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頁233-277。

³ 詳細生平參見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吳濁流數位主題館」，網址：<https://wuzhuoliu.blogspot.com/#timeline>，閱覽日期：2024年4月6日。

⁴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此處所謂「臺灣人意識」並非指臺灣民族主義，僅指臺灣人在中日壓力下維持了介於兩者間的流動意識，套用荊子馨的說法，就是「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中維持一種凝聚感」。黃昭堂亦曾指出，日治時期形成的「臺灣人意識」仍是民族的下位意識。此意識最終究竟將繼續保持流動狀態，或被吸收入中國民族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成為其中的某種地域意識，或邁向完全獨立成為臺灣民族主義，將取決於戰後歷史的演變，已非本文所能關照。當然，就結果論而言，除了滯留海外的少數人士外，臺灣人完全同化為日本人的可能性已隨著日本戰敗完全消失。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277；黃昭堂，〈台灣的民族と国家：その歴史的考察〉，《國際政治》84（1987年2月），頁76-77。另外，有關以接納臺灣人意識中的多重認同作為化解衝突之道，可見黃信洋，〈多重認同與臺灣人意識：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一種解讀〉，《客家研究》3：3（2009年12月），頁137-164。

⁵ 如陳翠蓮所指出，戰後國民政府動輒以「奴化」指責臺灣人，否定臺灣人的自尊、文化，使臺灣人面臨如同皇民化的精神壓迫，最終反而使臺灣人重新評價日治時期的遺產，並主張吸取

1996) 戰後的經歷，或許能提供一點思考。

1949 年，國共內戰大勢已定，中共準備進一步消滅殘存在中國沿岸及臺灣的國民黨勢力。此時一名中國人自稱奉國民黨之命，前往日本迎接前日軍將領根本博(1891-1966)來臺。根本來臺後，協助國民黨在古寧頭戰役擊敗來襲的中共。這一名中國人實為臺灣人李銑源。究竟李銑源基於何種理念行動？據李銑源自稱，其父去世時，板垣征四郎(1885-1948)曾鼓勵「繼承父親的遺志，為中國的復興獻身」，於是他「之後也一直守護著板垣的遺志，為了中國，為了日華親善挺身奮鬥」。⁶但其女兒認為，其之所以協助根本來臺，並非為了拯救國民黨，而是為了拯救臺灣，據說他「把臺灣看得比自己的命還要重要」。之後，李銑源與其妻李連麗卿(?-1990)，一同投身黨外運動，⁷最終於 1986 年加入民主進步黨。⁸李銑源的經歷，似乎暗示著某種「臺灣人意識」尚能在中國民族主義描繪的「中日親善」中留存，甚至進一步產生變化。不過，有關戰後中(臺)日關係，實際上依循著什麼樣的論述開展？臺灣人在其中扮演著何種角色？臺灣人能不能在論述、行動中維持自身意識？這種意識的內涵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已非本文所能處理，有待後日解答。

正如竹內好所稱，亞細亞主義並非意識形態，而是能夠與各種思想結合，而在日本近代史中處處出現之「心情」。以臺灣的情形為例，可發現亞細亞主義不只涉及重要思想家、政治家，在臺日人、臺灣人也基於自身所處環境、心情，回應亞細亞主義，使亞細亞主義、亞洲團結的理想與自身需求結合。正因如此，亞細亞主義始終係一複雜而充滿發展性之研究課題。本文關注焦點固然僅限於臺灣，惟研究課題尚有許多發展的可能。若將研究範圍擴大至亞洲全域，同樣的大亞細亞主義，在與臺灣同屬殖民地之朝鮮、傀儡國之滿洲國、「同盟國」之汪精衛政權、軍事占領地之南洋等地，各自呈現了不同樣貌。若單以臺灣而言，除了前述時間之延續外，當然可再深入考察以各種形態呈現出之亞細亞主義。諸如既有研究所示，與文學、民俗學結合；或如辜顯榮、陳清波等之情形，與經濟活動結合；或如佐藤佐、臺北高商、臺大之南進研究調查，與學術研究結合，以上在在皆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課題。

日本殖民經驗及中國、世界的優點，使臺灣文化茁壯。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頁 355-386。

⁶ 板垣征四郎刊行會，《秘錄板垣征四郎》（東京：芙蓉書房，1972），頁 555。

⁷ 奇特的是，李、連兩人可能是受調查局指示參與黨外運動。1964 年臺北市長選舉時，調查局派遣李銑源參選以分化支持高玉樹（1913-2005）的黨外力量，然李銑源參選後僅對國民黨候選人周百鍊（1909-1991）進行人身攻擊，甚至舉行二二八事件犧牲者追悼會，引起國民黨政府注意，甚至為此調查協助李競選之調查局特務黃樹滋（1916-1988）。不過，1976 年前後國民黨已將李視為「分歧分子」監視。〈黃樹滋案〉，《法務部調查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A11010000F/0055/3/24843；〈尤昌專案-高定專案〉，《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64/C301087/1/0003/060。

⁸ 門田隆將，《為義捐命》（臺北：元神館出版社，2011），頁 261-272。

附錄一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身分簡表

表 1 - 1 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身分簡表（1934 年）

姓名	主要職位	其他公職 前官職（退職年）	身分
官僚			
須田一二三	殖產局商工課長		官
白鳥勝義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教授		官
姉齒松平	高等法院判官		官
佐藤佐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		官
青山公亮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助教授		官
王野代治郎	文教局社會課長		官
坂口主稅	警務局保安課長		官
能澤外茂吉	總督官房文書課長		官
石井龍猪	內務局地方課長		官
本多保太郎	專賣局庶務課長		官
山岸金三郎	財務局金融課長		官
福元岩吉	臺北州內務部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官
樂滿金次	臺北州臺北市役所助役		官
今村完道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		官
民間日人			
安保忠毅	臺北律師會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臺北地方法院判官 （1919）	民 前官
小松吉久	中壢軌道株式會社重役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宜蘭廳長（1919）	民 前官
松木幹一郎	臺灣電力會社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鐵道部分課未定囑託 （1911）	民（關係企業） 前官
畠山敏行	臺灣電力會社理事	遞信省電務局長 （1931）	民（關係企業） 前官
木村泰治	臺灣土地建物會社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鼓包美	律師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審議室事務官（1927）	民 前官
荒木正次郎	臺灣銀行理事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關係企業）
吉田勉	臺灣銀行理事		民（關係企業）

大場辰之允	開業醫	臺北醫院醫長（1931）	民 前官
中島道一	日華紡織臺北工場長		民
佐藤吉次郎	臺灣新聞臺北支局長		民（關係企業）
加藤駿	臺南新報臺北支局長		民（關係企業）
谷河梅人	臺灣煙草賣捌人組合長		民（關係企業）
小寺新一	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田中勘次	三菱商事臺北支店長		民
三卷俊夫	臺灣倉庫株式會社社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關係企業）
中辻喜次郎	臺北實業會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後宮信太郎	金爪石礦山株式會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有田勉三郎	華南銀行副總理		民（關係企業）
近藤有曾	勸銀臺北支店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關係企業）
古賀三千人	臺灣商工銀行頭取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大澤貞吉	臺灣日日新報主筆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民（關係企業）
貝山好美	臺灣正米市場組合常務理事	內務部勸業課產業主事 （1927）	民（關係企業） 前官
竹藤峰治	華南銀行專務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民（關係企業）
土居政次	臺灣銀行祕書課長		民（關係企業）
蒲田丈夫	大阪朝日新聞臺灣支局長		民
河村徹	臺灣日日新報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通信局監理課長 （1919）	民（關係企業） 前官
臺灣人			
林濟川	米穀移出商組合理事	臺中廳潭仔墘公學校 （1913）	民 前官
翁瑞春	開業醫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臺北醫院醫師（1913）	民 前官
陳振能	林本源家林熊光管家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臺北廳大稻埕第一公學校教諭（1918）	民 前官
陳清波	錦記茶行專務取締役		民
張清港	稻江信用組合專務理事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民
郭邦光	錦茂茶行支配人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許智貴	北署保甲協會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黃純青	樹林士紳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林熊祥	林本源製糖會社董事		民

附錄

林熊光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社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郭廷俊	稻江信用組合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基隆廳總務課雇員 (1907)	民 前官
蔡彬准	艋舺信用組合幹事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黃玉對	萬華信用利用組合長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民
姜鼎元	臺灣正米市場書記長		民
楊漢龍	稻江信用組合專務理事	臺北州臺北市協議會員 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 通譯兼內務部勸業課屬 (1921)	民 前官
魏清德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編輯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新竹廳新竹公學校訓導 (1909)	民（關係企業） 前官
羅萬俤	臺灣新民報專務		民
軍部			
井上保雄	總督府海軍武官		軍
沼川佐吉	臺灣憲兵隊長		軍
土橋一次	臺灣軍參謀		軍
上野龜甫	臺灣軍副官		軍
地方評議員			
近江時五郎	近江商事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顏國年	臺陽礦業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石坂莊作	石坂商店主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和泉種次郎	基隆冷藏株式會社社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河野俊雄	基隆炭礦重役	臺北州基隆市協議會員	民
桑原政夫	基隆市尹		官
松本晃吉	近海郵船基隆支店長	臺北州州協議會員	民
內海忠司	新竹州知事		官
郡茂德	新竹州內務部長		官
坂本素魯哉	彰化銀行專務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松岡富雄	臺灣新聞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臨時臺灣糖務局庶務課 囑託（1904）	前官 民（關係企業）
西澤義徵	高雄州知事		官
竹下豐次	臺中州知事		官

附錄

小林長彦	高雄州內務部長	高雄州州協議會員	官
簡朗山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社長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民
備註	身分之「軍」代表軍部；「官」代表總督府官吏；「前官」代表曾任總督府官吏；「民（關係企業）」代表任職於總督府控制之企業；「民」代表其他之民間人士。		

資料來源：大亞細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4），頁 38-41。

附錄二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之活動（1934-1936）

表 2 - 1 1934、1935 年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活動概況

日期	地點	內容
1934 年		
2 月 3 日	鐵道旅館	月次例會 貝山幹事的事務報告、大澤幹事的宣傳部報告、佐藤幹事的調查部報告、竹藤幹事的會計報告。 最近支那的情勢與支那的民族性 土橋一次報告
2 月 19 日	鐵道旅館	常任評議員會 以赴任途中來臺之福州總領事宇佐美珍彥的談話為中心之懇談會
2 月 24 日	鐵道旅館	幹事會 有關機關誌發行與新設事務所至大成火災大樓內
3 月 5 日	鐵道旅館	常任評議員會 守屋前福州領事報告福州的近情，而後種種懇談
3 月 10 日	鐵道旅館	月次例會 於南支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之動向 和知中佐報告 於南洋之諸民族的移動狀況 水越幸一報告 對滿洲帝國建制之感想 松井大將報告
4 月 7 日	鐵道旅館	支部主催春季公開演講會 放映「輝く日本」 大亞細亞主義之意義 佐藤佐 世界歷史之更新 今村完道
5 月 5 日	鐵道旅館	月次例會
5 月 26 日	鐵道旅館	月次例會 聽取球磨艦長堀內大佐的南洋視察談
7 月 12 日	松井軍司令官官邸	松井軍司令官招待晚餐會 出席者：中國駐臺領事郭彝民、副領事張振漢兩氏主賓，以及新敕選辜顯榮、支部常任評議員及幹事
7 月 14 日	鐵道旅館	東京拓殖大學學生來臺演講會 大亞細亞主義之必然性 小野博成 所感 片岡清 滿洲建國之意義與南方經綸 時任智三人
7 月 27 日	鐵道旅館	官民招待會 松井、平塚、辜、河村、安保等協會成員招待後宮信太郎為首之官民

8 月 1 日	草山巴旅館	常任評議員有志舉辦松井大將送別宴
9 月 15 日	臺灣日日新報社講堂	學生南支視察旅行團報告演講會 排日貨運動與日支貿易 高商生 大貫正夫 中國航界的特性 高校生 田中正 南支的金融事情 高商生 安室守 廣西省近情 高商教授 佐藤佐
10 月 29 日		推戴新任軍司令官寺內壽一為名譽顧問，松井依然為名譽顧問。
11 月 2 日	臺北州會館	秋季公開演講會 迴遊世界後知悉日本人的真價值而敢於促進國民之覺醒 今村忠助
1935 年		
1 月 7 日	鐵道旅館	總會 總會結束後舉辦創立一週年紀念演講會 有關廣西省之近情 森田豐秋大尉 軍縮精神與大亞細亞主義 酒井武雄
1 月 19 日	鐵道旅館	常任評議員會 貝山幹事報告會則，原以常任評議員之互選為議題，最終決定一任座長河村徹指名
1 月 24 日	鐵道旅館	常任評議員會 依王野督府社會課長動議，由座長河村徹選任幹事如下：坂口主稅、竹藤峰治、佐藤佐、郭廷俊、沼川佐吉、貝山好美、大澤貞吉、青山公亮、土橋一次（以上重任）；酒井武雄、池田又四郎（以上新任） 會後演講 廣東大亞細亞運動之經緯 澁谷剛
2 月 16 日	鐵道旅館	演講會 最近的支那西南事情 和知鷹二
4 月 8 日	鐵道旅館	常任評議員會 坂西利八郎與李擇一之座談會
4 月 11 日	鐵道旅館	以蔣作賓公使為中心之座談會
4 月 18 日	警察會館	比島學生團歡迎茶話會 會後晚餐會
5 月 17 日	鐵道旅館	春期公開演講會 最近的印度支那事情 橫山正脩
7 月 30 日		佐藤佐滿支旅行 上京歷訪協會關係者後於 7 月 30 日向滿洲出發

9 月 14 日	鐵道旅館	臨時總會 竹藤峰治代理河村徹任座長，討論協會之財團法人化，並選任評議員、互選常任評議員及理監事 會後演講 〔講題不明〕 內藤英雄 滿洲民國視察談 佐藤佐
10 月 12 日	臺北 醫專講堂	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歡迎會 介紹菊池男爵 酒井海軍大佐 國體明徵之根本義 菊池武夫

資料來源：《臺日》、《大亞細亞主義》

表 2 - 2 1936 年度臺灣大亞細亞協會事業概況

日期	內容
幹事會及評議員會	
2 月 1 日	常任評議員會（關於松井大將來臺開催歡迎會之件）
4 月 9 日	幹事會（菲律賓學生歡迎之件）
4 月 25 日	常任評議員會（關於日本精神作興之件）
5 月 30 日	幹事會（菲律賓杜蘭博士（Pio Duran）歡迎之件）
6 月 24 日	常任評議員會（關於臺中支部承認之件）
8 月 14 日	常任評議員會（菲律賓視察全國學生歡迎之件，以及關於財團法人手續進行之件）
8 月 31 日	常任評議員會（座談會開催之件）
9 月 19 日	常任評議員會（軍官民關於時局之意見交換會開催之件）
11 月 7 日	幹事會（佐藤幹事東京大亞細亞協會總會出席之件）
11 月 28 日	幹事會（佐藤幹事報告東京總會狀況之件）
演講會、座談會等	
2 月 15 日 （鐵道旅館）	松井大將為中心之座談會（午後 1 時） 平塚、三好兩顧問、荻洲參謀長、內海高雄知事為首等自新竹、臺中方面出席之會員，共有軍官民之會員 60 餘名出席之盛會，同夜 6 時舉行歡迎晚餐會。 演講會（午後 7 時半） 大亞細亞主義之立場（開會辭） 佐藤佐 菲律賓管見 酒井大佐 東亞之情事與國民之覺悟 松井大將 呈現滿堂無立錐餘地之盛況。
4 月 14 日 （鐵道旅館）	菲律賓學生歡迎晚餐會 招待菲律賓學生日本參訪團 80 餘名，於鐵道旅館餘興場開催

附錄

	舞蹈音樂之夕、臺菲交驛會。
6 月 3 日 (鐵道旅館)	以菲律賓杜蘭博士、望月兩氏為中心之座談會 (午後 2 時) 演講會 (午後 7 時) 菲律賓大亞細亞協會之現狀 望月氏 所感 皮歐・杜蘭博士
8 月 8 日 (鐵道旅館)	上村大佐、田村中佐兩氏之送別座談會
8 月 14 日 (鐵道旅館)	大阪每日新聞主催全國各大學生菲律賓視察團歡迎茶話會
8 月 31 日 (鐵道旅館)	以岸興中公司廣東支店長為中心之座談會
9 月 24 日 (巴會館)	以前廣東駐在武官臼田為中心之座談會
12 月 8 日 (鐵道旅館)	酒井大佐之送別茶話會
12 月 12 日 (鐵道旅館)	李廈門市長歡迎茶話會
視察旅行	
2 月 16 日	竹藤幹事與松井大將一同出差至華南的廣東、廣西、廈門、福州。
7 月 1 日	佐藤幹事為視察南洋暹羅方面而出差，本協會補助旅費 500 円。
11 月 11 日	佐藤幹事為列席東京大亞細亞協會總會而出差，本協會補助旅費 100 円。
12 月 11 日	佐藤幹事帶領高商南支南洋研究會的學生展開島內演講而出差，本協會補助 700 円。
其他	
2 月 4 日	貝山、大澤、竹藤、郭等 4 名幹事，訪問軍司令官，在荻洲參謀長介紹下與柳川軍司令官面會，懇望推載為名譽顧問，獲得欣然同意。
4 月 25 日	於本日常任評議員會，有總督府原口統計官發表關於對外事情之談話。
6 月 25 日	關於臺中支部設立之件，貝山幹事為準備而出差。
9 月 19 日	本日的常任評議員會上，有自臺中到來之遠山氏臨席，對支部承認之件相互交換意見。

資料來源：〈事業報告〉，《臺灣大アジア》35（1937 年 4 月），頁 8。

參考書目

中日文之部

一、檔案、文物

《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史料》，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六然居典藏史料》，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行政文書》，国立公文書館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檔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典藏文物》，國立臺灣文學館
《官報》，国立国会図書館
《法務部調査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後藤新平文書》，近現代史料データベー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楊雲萍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葉榮鐘典藏》，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銀行所藏日治時期文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
《戴笠史料》，國史館

二、一般史料

大日本生產黨編纂委員會，《大日本生產黨十年史》，東京：大日本生產黨，1941。
大亞細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4。
大亞細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年報》，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40。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
山本昌彥編，《躍進臺灣の現勢》，東京：改造日本社，1935。
山縣初男，《中國》，東京：三原朝雄，1967。
內閣情報部，《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第一輯）》，東京：內閣情報部，1938。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上，東京：文部省學生部，1934。
文部省思想局，《日本改造運動》下，東京：文部省學生部，1934。

- 日本武学研究所，《佐藤信淵武学集》上，東京：岩波書店，1942。
- 日本電報通信社，《新聞総覧》（1911年版），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11。
- 日本電報通信社，《新聞総覧》（1913年版），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13。
- 日本電報通信社，《新聞総覧》（1922年版），東京：日本電報通信社，1922。
- 片岡仁泉，《近代土佐人》，高知：土陽週報社，1914。
- 臺灣銀行調查課，《支那及南洋貿易要覧》，臺北：臺灣銀行調查課，1920。
- 司法省刑事局，《思想研究資料》27，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33年4月。
-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Ⅱ 第1部第2卷（昭和八年對中國關係）》，東京：外務省，1998。
-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Ⅱ 第1部第3卷（昭和九年對中國關係）》，東京：外務省，2000。
- 本山文平，《夢の九十年》，東京：主婦の友出版，1978。
- 田中一二，《臺灣の新人舊人》，臺北：臺灣通訊社，1928。
- 田中一二，《臺灣讀本》，臺北：大日本國防青年會，1933。
- 田辺三郎等編，《愛國運動闘士列傳》，東京：新光閣，1936。
- 田住豊四郎編，《兵庫県代議士候補者人物評》，神戸：県友社，1912。
- 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2009。
- 伊藤隆，照沼康孝編，《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
- 伊藤隆等編，《真崎甚三郎日記》5，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
- 伊藤滿雄，《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 竹下豊次，《八十八翁の思い出》，東京：學苑社，1974。
- 竹内好編集・解説，《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
- 西川如見，《增補華夷通商考》卷三，洛陽：甘節堂，1708。
- 吳三連口述，吳豊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初稿》，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
-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2008。
- 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志賀重昂全集》第1卷，東京：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1928。
- 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李承機主編，《六然居存日刊臺灣新民報社說輯錄 1932-3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9。
- 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編，《李春生著作集》第4冊，臺北：南天，2004。
- 奈良縣警察部，《國家主義運動の意義》，奈良：奈良縣警察部，1933。
- 東亞共榮協會，《東亞共榮協會之精神》，臺中：東亞共榮協會本部，1934。
- 林知淵，《政壇浮生錄》，福建：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
-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註，《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13。
- 波多野乾一編，《現代支那之紀錄》1927年7月，燕塵社，1924。

-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會，《近衛篤磨日記》第二卷，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
- 帝國秘密探偵社，《大衆人事録 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
- 後藤乾一、松浦正孝編集、解説，《大亞細亞主義》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2008。
- 皇政宣揚會，《真の叫》，臺北：皇政宣揚會，1936年。
-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冊，東京：福村，1981。
- 唐澤信夫編，《模擬議會速記錄》，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
- 翁佳音編譯，《臺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動、右派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94。
-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三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五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 國務院統計處，《滿洲國年報》，大連：滿洲文化協會，1932。
- 張深切，《里程碑》（下），臺北：文經，1998。
- 張聖才口述，泓瑩整理，《張聖才口述實錄》，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 章子惠編，《臺灣時人誌》，臺北：國光，1947。
- 陳天來編，《組合沿革史》，臺北：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1938。
- 陳逸松，《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 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
- 陸軍省，《陸軍現役將校同相当官実役停年名簿 昭和7年9月1日調》，東京：偕行社，1932。
- 勞働經濟調查所，《愛國運動現勢 第1輯》，勞働經濟調查所，1935。
- 喜入虎太郎，《國家主義運動の理論と現況》，新光閣，1934。
- 滿洲公論社，《滿洲新聞雜誌総覧》（1927年版），大連：滿洲公論社，1927年。
-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楊永良譯，《辜顯榮傳》，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7。
-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黃旺成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2023。
- 新高新報社，《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 楊守愚，《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
- 楊逵，《楊逵全集》第九卷，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1。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2004。
- 葉盛吉著，許雪姬、王麗蕉主編，《葉盛吉日記》，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2019。
-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臺中：晨星，2000。
- 臺中州，《昭和九年臺中州協議會通常會會議錄》，臺中：臺中州，1937。
- 臺中州，《昭和九年臺中州管内概況及事務概要》，臺中：臺灣新聞社，1935。
- 臺北市教育社會課，《市民講演集》第十四輯，臺北：新高堂書店，1928。
- 臺灣大亞細亞協會，《南支綜合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大亞細亞協會，1938。

-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本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要覽》，臺中：臺灣新聞社，1931。
- 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社會》，臺北：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1933。
- 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破邪顯正》，臺北：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1934。
- 臺灣南方協會，《臺灣南方協會事業實施狀況報告書》，出版項不明，ca. 1941。
-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 改訂》，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4。
-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臺灣》，臺北：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1943。
-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南方發展史》，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4。
-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昭和九年六月臺灣軍特種演習參加誌》，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5。
-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ニ伴フ對南方施策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
-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南方共榮圈建設上に於ける臺灣の地位に就て》，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
- 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南支那綜覽》，臺北：南方資料館，1943。
-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時局下臺灣の現在と其將來》，臺北：臺灣總督府情報部，1940。
-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
- 臺灣總督府，《臺灣揚文會策議》，臺北：臺灣總督府，1901。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45 編（1939），臺北：臺灣總督府，1942。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47 編（1941），臺北：臺灣總督府，1943。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48 編（1942），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
- 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6。
- 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自明治二十九年至昭和十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1936。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福建事變概說》，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1935。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
- 荻和藤治郎，《米南文集》，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28。
- 荻和藤治郎，《米南文集續篇》，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6。
-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九歌，1998。
-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三）》，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七）》，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臺北：謝東漢、吳餘德，2016。
- 謝國興等主編；陳進盛、曾齡儀、謝明如譯，《三好德三郎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5。
- 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三、報章雜誌

- 《大公報》（天津，大公報社，1920）
《大同報》（長春，大同報報館，1933）
《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社，1934）
《大亞細亞主義》（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3-1937）
《中華聖教總會樂天報》（香港，三教總學會，1922）
《天聲報》（天津，天聲報社，1940）
《太陽》（東京，博文館，1898）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日報館，1918-1921）
《申報》（上海，申報館，1915-1937）
《全臺新報》（臺北，全臺新報社，1936）
《自立晚報》（臺北，自立晚報社，1985）
《亞細亞時論》（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20）
《東亞協會月刊》（北平，東亞協會，1929）
《東洋》（東京，東洋協會，1922、1935）
《東洋時報》（東京，東洋協會，1919）
《社會運動通信》（東京，日本社会運動通信社，1934-1936）
《社會學徒》（東京，社會學徒社，1935）
《南洋商報》（新加坡，南洋報社，1930）
《南日本新報》（臺北，南日本新報社，1932-1936）
《南瀛新報》（臺北，南瀛新報社，1932-1936）
《南邦新聞》（臺北，南邦新聞社，1940-1942）
《南方資料》（東京，日泰學院調查局，1942）
《思想月報》（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37）
《昭和新報》（臺北，昭和新報社，1928-1937）
《時代日報》（上海，時代日報社，1934）
《國民日報》（新加坡，國民日報社，1917-1918）
《第一教育》（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9）
《部報》（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1937-1941）
《朝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社，1904-1935）
《新學叢誌》（臺北，新學研究會，1910）
《新高新報》（基隆，新高新報社，1931-1938）
《新臺灣》（臺北，臺灣通信社，1932）
《實業之臺灣》（臺北，實業之臺灣社，1914-1924）
《實業時代》（東京，實業時代社，1930）
《臺灣新報》（臺北，臺灣新報社，1896-1898）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1943）

- 《臺政新報》（臺北，臺政新報社，1924）
《臺灣詩薈》（臺北，臺灣詩薈發行所，1924）
《臺灣實業界》（臺北，臺灣實業界社，1929）
《臺灣時報》（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17-1940）
《臺灣青年》（東京，臺灣青年雜誌社，1920-1921）
《臺灣》（東京，臺灣雜誌社，1922-1923）
《臺灣民報》（東京、臺北，臺灣民報社，1923-1930）
《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1-1940）
《臺灣經世新報》（臺北，臺灣經世新報，1932-1937）
《臺灣》（臺北，臺灣通信社，1934-1935）
《臺灣文藝》（臺中，臺灣文藝聯盟，1934-1935）
《臺灣經濟タイムス》（臺北，臺灣經濟タイムス社，1935-1936）
《臺灣時事新報》（臺北，臺灣時事新報社，1935-1937）
《臺灣大アジア》（臺北，臺灣大亞細亞協會，1937-1940）
《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1934）
《臺灣警察時報》（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7）
《臺灣省訓練團團刊》（臺北，臺灣省訓練團，1946）
《語苑》（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37）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廣州民國日報社，1931）
《徵信新聞報》（臺北，徵信新聞社，1966）
《興南新聞》（臺北，興南新聞社，1941）
《鵬南時報》（臺北，鵬南時報社，1938）
《讀賣新聞》（東京，讀賣新聞社，1934）

四、時人著作

- 久保田與四郎，《東洋之危機 附對外國是》，東京：富山房，1898。
土屋米吉，《臺灣第一回選舉の考察》，臺北：土屋米吉，1936。
大阪毎日新聞社，《南支南洋を國策的に觀る》，大阪：大阪毎日新聞社，1935。
大津淳一郎，《世界変局と帝国の外交》，東京：大津淳一郎，1919。
大野伴睦，《伴睦放談》，東京：金融界社，1952。
小寺謙吉，《大亞細亞主義論》，東京：東京宝文館，1916。
小寺謙吉，《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東京：百城書舍，1918。
小寺謙吉，《歐洲大乱の真因と交戦列國》，東京：大正書院，1915。
山田武吉，《大日本帝業の古今》，大連：大陸社，1920。
山田武吉，《日本新滿蒙政策》，上海：民智書局，1927。
山田武吉，《草莽文叢》，東京：大日社，1936。
内田良平，《対外國是樹立の急務》，東京：鈴木一郎，1934。
日刊千代田通信社《獨立問題を中心に比律賓を語る》，東京：日刊千代田通信社，1936。

田中一二，《蘭船ジユウノ號事件を語る》，臺北：大日本國防青年會臺灣總支部，1935。

白面人，《働き盛りの男》，東京：やまと新聞出版部，1925。

竹内清，《事變と臺灣人》，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40。

佐藤佐，《廣西省の近情と南方國策》，臺北：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1934年。

佐藤佐演講，《我が國と國際情勢》，臺南：臺南州，1938。

坂本龍起演講，《北支事變と國民の覺悟に就て》，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

李燼己，《支那事變の哲學的根據と島民の覺悟》，臺北：臺北鐵道ホテル，1937。

松井石根，《亞細亞聯盟論》，東京：大亞細亞協會，1933年。

信夫淳平，《反古草紙》，東京：有斐閣，1929。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論》，東京：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21。

後藤新平，《日本膨脹論》，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4。

秋永常次郎，《水戸繁昌記》，水戸：知新堂，1896年。

唐澤信夫，《明日の臺灣》，基隆：新高新報社，1928。

唐澤信夫，《臺灣島民に訴ふ》，臺北：新高新報社，1935。

宮川次郎，《小林總督 何故に武官總督を要求したか》，臺北：臺灣實業界社，1936。

宮川次郎，《臺灣の政治運動》，臺北：臺灣實業界社，1931。

宿利重一，《児玉源太郎》，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2。

鹿子木員信，《皇國と亜細亞》，東京：大亜細亞協會，1933。

鹿子木員信述，《東亞新秩序の建設と肇國の精神》，臺北：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1941。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辜顯榮翁傳》，臺北：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1939。

黃竹堂，《新興滿洲國見聞記》，臺北：黃竹堂，1933。

黃攻素，《亞細亞民族第一次大會始末記》，上海：亞細亞民族大同盟本部，1926。

圓谷弘，《支那社會の測量》，東京：有斐閣，1936。

徳富猪一郎，《時務一家言》，東京：民友社，1913。

蜷川新，《亜細亞に生きるの途》，東京：日本書院出版部，1929。

編者不明（常見秀夫原撰），《植民地政策上ヨリ觀タル臺灣統治ニ關スル建白》，臺中：治臺五十年事蹟調查會，1945。

蔡培火，《東亜の子かく思ふ》，東京：岩波書店，1937。

橋本喜和人，《滿蒙問題の再認識と國民の覺悟》，臺北：橋本喜和人，1932。

謝龍閣，《龍吟》，天津：天惠印務局，1938。

蠟山政道，《日滿關係の研究》，東京：斯文書院，1933。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五、近人著作

《福祉友の會 200 号「月報」抜粹集》，東京：Y. W. P.福祉友の會，2005。

《第 1 期「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翻譯版）》，東京：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

- 會，2010。
- 《第1期「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東京：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2010。
- 《戦史叢書 ビルマ攻略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
- 《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
- 《戦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
- 《戦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
- 《新竹市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 《臺北市志：卷十 雜錄叢錄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2。
- 下中邦彦編集，《政治学事典》，東京：平凡社，1954。
-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 第三卷（1946-1948）》，東京：岩波書店，1995。
-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 第六卷（1953-1957）》，東京：岩波書店，1995。
- 大東文化大学創立七十周年記念事業記念出版推進委員会，《大東文化大学七十年史》，東京：大東文化学園，1993。
- 子安宣邦監修，《日本思想史辞典》，東京：ぺりかん社，2001。
- 小葉田淳等編，《日本史辞典》，東京：数研出版，1959。
-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
- 山本茂樹《近衛篤磨—その明治国家観とアジア観》，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1。
-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2006。
-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1。
-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2002。
-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
- 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 その先の近代へ》，東京：潮出版社，2014。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報海鉤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井上寿一，《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06。
-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臺北：樂學，2006。
-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 1895-1945》，臺北：巨流，2001。
- 日本政治学会，《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年報政治學 1998 年度），東京：岩波書店，1999。
- 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 王振勳、趙國光主持，國立中興大學編纂，《臺中市志：人物志》，臺中市：臺中市政府，2008。
- 王泰升，《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

- 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臺北：文海，1978。
-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 外交とヴィジョ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8。
- 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綠蔭書房，1996。
- 外務省監修、山田実編集，《日本外交百年小史》，東京都：山田書院，1963。
- 外務省編纂，《小村外交史（上）》（外務省藏版），東京：米田圓，1953。
- 吉田裕等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辞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15。
-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東京：青木書局，1986。
-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
-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 臺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出版社，2016。
-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新北：稻鄉，2010。
- 李健民，《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 李黃臚，《臺灣第一思想家－李春生》，桃園：聖環圖書，1996。
- 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日本近代史辞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58。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03。
- 岩淵辰雄，《軍閥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48。
- 松本健一，《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讀》，東京：岩波，2000。
-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 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
- 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
- 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秘録板垣征四郎》，東京：芙蓉書房，1972。
- 河西晃祐，《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2。
-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東京：世界思想社，2003。
- 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 花村一平，《中国革命の舞台裏》，東京：原書房，1973。
-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戦與臺灣：日本殖民地崩潰》，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長洋弘，《インドネシア残留元日本兵を訪ねて》，東京：社会評論社，2007。
- 長洋弘，《インドネシア残留元日本兵》，東京：社会評論社，2015。
- 長洋弘，《帰らなかった日本兵》，東京：論創社，2021。
- 門田隆將，《為義捐命》，臺北：元神館出版社，2011。
- 青沼陽一郎，《帰還せず》，東京：小学館，2014。
-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5。
- 後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1930年代「南進」の論理・「日本観」の系譜》，東京：勁草書房，1986。
- 後藤乾一，《原口竹次郎の生涯》，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7。

-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霧社事件・植民地統治政策の研究》，東京都：藤原書店，2008。
-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新北：遠足文化，2020。
-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2006。
- 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第3卷，臺北：自立晚報，1987。
- 張修慎，《近代臺灣知識份子的軌跡：1920—1945 年的思想》，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2001。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 章子惠編，《臺灣時人誌》，臺北：國光，1947。
- 許雪姬，《離散と回帰：満洲国」の台湾人の記録》，東京：東方書店，2021。
- 許雪姬，《離散與回歸：在滿洲的臺灣人》，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社，2023。
-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 陳柔縉，《總統的親戚》，臺北：時報文化，2011。
-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臺北：麥田出版，2006。
-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遠流出版，二版 2009。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 黃秀政編纂，《續修臺北市志 卷9 人物志 政治與經濟篇》，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 黃美娥編，《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上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3。
- 嵯峨隆，《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6。
- 新村出編，《廣辭苑》，東京：岩波書店，2008 年第六版。
- 楊威理，《ある台湾知識人の悲劇》，東京：岩波書店，1993。
-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
-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運動史》，臺中：晨星，2000。
-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
- 廖振富編著，《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 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東京：亞紀，1997。
- 趙軍，《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
- 廣部泉，《人種戦争という寓話：黄禍論とアジア主義》，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17。
- 鄭春河，《台湾人元志願兵と大東亜戦争》，東京：展転社，1998。
- 鄭喜夫編，《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 駒込武著，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盧修一，《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 賴澤涵總纂，《新修桃園縣志：人物志》，桃園：桃園縣政府，2010。
-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六、論文

- サーラ・スヴェン (Saaler Sven)、クリストファー・W・A・スピルマン (Christopher W.A. Szpilman)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主義とアジア主義に関する歴史研究の現在〉、《日本思想史学》45, 2013, 頁 199-202。
- シナン・レヴェント, 〈トゥーラン主義運動家としての今岡十一郎〉、《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49, 2014, 頁 102-82。
- 九末亮一, 〈「華南銀行」の創設——台湾銀行の南進における「大華僑銀行」案の形成と結実: 1912-1919〉、《アジア経済》51: 7, 2010 年 7 月, 頁 25-45
- 中村孝志, 〈福州水戸事件について〉、《南方文化》9, 1981 年 11 月, 頁 207-233。
- 中島岳志, 〈R・M・プラタープ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反植民地ネットワーク・世界連邦・日本帝国主義-〉、《国際政治》146, 2006, 頁 54-69。
- 戸部良一, 〈日中戦争をめぐる研究動向〉、《軍事史学》46: 1, 2010 年 6 月, 頁 6-22。
- 水野直樹, 〈1920 年代日本・朝鮮・中國におけるアジア認識の一断面—アジア民族会議をめぐる三国の論調—〉, 收入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 頁 509-548。
- 王宏松, 〈蔣中正對「閩變」的態度與作為〉、《國史館館刊》28, 2011 年 6 月, 73-114。
- 王麒銘, 〈日治時期臺灣的神道信仰團體——以維新社為中心〉、《臺北文獻》168, 2009 年 6 月, 頁 89-130。
- 王麒銘, 〈後藤新平與臺灣總督府顧問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4, 2020 年 12 月, 頁 83-127。
- 古屋哲夫, 〈アジア主義とその周辺〉, 收於同氏編, 《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 京都: 緑蔭書房, 1996, 頁 47-102。
- 矢野暢, 〈大正期「南進論」の特質〉、《東南アジア研究》16: 1, 1978 年 6 月, 頁 5-31。
- 吉永進一, 〈大川周明、ポール・リシャール、ミラ・リシャール--ある邂逅〉、《舞鶴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43, 2008 年 3 月, 頁 93-102。
- 朱真一, 〈從醫界看早期臺灣與歐美的交流 (15) 早期留俄的臺灣人 (2): 許乃昌及謝廉清先生〉、《臺灣醫界》51: 2, 2008 年 2 月, 頁 52-56。
- 池井優, 〈パリ平和会議と人種差別撤廃問題〉、《国際政治》23, 1963 年 10 月, 頁 44-58。
- 佐藤美奈子, 〈「アジア」を語るということ—1980 年代以降の竹内好論—〉、《社会科学研究》58: 1, 2006, 頁 47-68。
- 何彩滿, 〈辜顯榮的多重身分認同〉、《二十一世紀》112, 2009 年 4 月, 頁 102-112。
- 何義麟, 〈1930 年代臺灣人的國族認同—以臺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文史臺灣學報》1, 2009 年 11 月, 頁 222-241。
- 何義麟, 〈台湾知識人の苦悩——東亜共栄協会から大亜細亜協会台中支部へ〉 收

- 於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頁 286-310。
- 何鳳嬌，〈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臺灣史學報》10，2017 年 12 月，頁 77-121。
- 吳乃德，〈狂飆的年代？一般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收入張茂桂、羅文輝、徐火炎主編，《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頁 93-128。
- 吳文星，〈辜顯榮與鹿港辜家之崛起〉，《國史研究通訊》2，2012 年 6 月，頁 29-35。
- 吳密察，〈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5-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臺灣史學報》10，2017 年 12 月，頁 5-35。
-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收入，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43-110。
- 李君山，〈抗戰前中日「廣田三原則」談判（1935-1936）〉，《臺大歷史學報》37，2006 年 6 月，頁 217-265。
- 汪宏倫，〈怨恨的共同體，臺灣〉，《思想》1，2006 年 3 月，頁 17-47。
-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臺灣社會學》19，2010 年 9 月，頁 147-202。
- 谷川舜，〈戰時下の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新聞と帝国日本の言論政策〉，《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95，2019 年 7 月，頁 163-181。
- 周婉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臺灣史料研究》37，2010 年 9 月，頁 2-31。
- 周斌，〈亞細亞民族會議與中國的反對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128-159。
- 松浦正孝，〈汎アジア主義における『台湾要因』——兩岸關係をめぐる日・英中間抗争の政治経済史的背景〉，《北大法学論集》55：3，2004 年 9 月，頁 21-72。
- 林滿紅，〈中日關係之一糾結：1932 年至 1941 年間臺灣與東北貿易加強的社會意涵〉，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料研究所，1996，頁 485-526。
- 長崎暢子，〈「アジア主義」とインド——ガンディーは日本をどう見たか〉，收入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頁 384-408。
- 姜克實，〈『越境』のアジア主義観—方法論の再検討—〉，收於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国際日本学研究叢書》19 号，東京：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2014 年 3 月，頁 207-228。
- 後藤延子，〈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とその周辺（一）：一アジア主義者の選択〉，《人文科学論集 人間情報学科編》39，2005 年 3 月，頁 177-197。
- 後藤延子，〈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とその周辺（二）：一アジア主義者の選択〉，《人文科学論集 人間情報学科編》40，2006 年 3 月，頁 123-145。
- 柳書琴，〈滿洲內在化與島都書寫：林輝焜《命運難違》的滿洲匿影及其潛話語〉，

- 《臺灣文學研究》1：2，2012年6月，頁135-190。
-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亜》，分別刊載於410，2001年8月，頁68-77；411，2001年9月，頁88-98；412，2001年10月，頁70-79；413，2001年11月，頁78-87；414，2001年12月，頁56-75；415，2002年1月，頁67-73；416，2002年2月，頁64-70；417，2002年3月，頁51-66。
- 胡巨川，〈壯志雄才李漢如〉，《礎砧石》，分別刊載於75，2014年6月，頁100-116；76，2014年9月，頁93-113；77，2014年12月，頁105-119；78，2015年3月，頁114-132；79，2015年6月，頁97-113；80，2015年9月，頁85-104；81，2015年12月，頁111-127；82，2016年3月，頁119-141；83，2016年6月，頁123-141。
- 宮崎聖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田中一二の青年言説と実践〉，《南島史学》83，2015年11月，頁1-31。
- 秦郁彦，〈盧溝橋事件余話〉，《UP》26：5，1997年5月，頁23-27。
- 高江洲昌哉，〈土屋米吉「嘆願書」(昭和8年)〉，《東アジア近代史》9，2006年3月，頁143-153。
- 許俊雅，〈少潮、觀潮、儀、耐儂、拾遺是誰？--《臺日》作者考證〉，《臺灣文學學報》19，2011年12月，頁1-33。
- 許雪姬，〈1937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1，2008，頁33-84。
-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13，2012年6月，頁1-32。
-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年6月，頁1-33。
- 許雪姬，〈滿洲國政府中的臺籍公務人員(1932-1945)〉，收入許雪姬編，《來去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頁161-210。
- 許雪姬，〈臺灣總督府的「協力者」林熊徵——日據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二〉，《近代史研究集刊》23，1994年6月，頁53-88。
- 許雪姬，〈戰後上海的臺灣人團體及楊肇嘉的角色：兼論其所涉入的「戰犯」案(1943-1947)〉，《興大歷史學報》30，2016年6月，頁81-116。
- 野村浩一，〈橘樸：アジア主義の彷徨〉，《立教法学》19，1980，頁36-116。
- 陳俐甫，〈日治時期政治運動與資金：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之政治資金〉，《臺北文獻》117，1996年9月，頁39-48。
- 陳儀深訪問，〈周合源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9期，1999年6月，頁125-149。
- 鳥海靖，〈パリ講和会議における日本の立場：人種差別撤廃問題を中心に〉，《法政史学》46，1994年3月，頁1-18。
- 黒沢文貴，〈戦後日本の近代史認識〉，《法学研究》73：1，2000年1月，頁507-529。
- 富田哲，〈「通譯」作為統治的障礙—日治初期對臺灣總督府「通譯」的批判〉，《淡江日本論叢》23輯，2011年6月，頁205-229。
- 黃昭堂，〈台湾の民族と国家：その歴史的考察〉，《国際政治》84，1987年2月，

頁 62-79。

黃信洋，〈多重認同與臺灣人意識：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一種解讀〉，《客家研究》3：3，2009年12月，頁137-164。

黃美娥，〈帝國魅影—標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2003年7月，頁222-246。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1986年6月，頁371-402。

湯熙勇，〈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1，2007年3月，頁20-22。

黑木彬文，〈興亜会のアジア主義〉，《法政研究》71：4，2005年3月，頁247-287。

廖振富，〈從「富家公子」民族運動「啟蒙先驅」——蔡惠如生平與作品新論〉，《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7，2013年10月，頁143-183。

趙勳達，〈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在臺灣的興起與發展概況（1924~1937）〉，《國家發展研究》10：2，2011年6月，頁77-116。

趙勳達，〈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臺灣文學研究》4，2013年6月，頁129-165。

劉紹唐主編，〈民國歷史人物小傳（140）〉，《傳記文學》49：3，1986年9月，頁137-148。

劉維開，〈孫中山北上與講演「大亞洲主義」的考察〉，收入《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6，頁87-111。

蔡培火，〈日據時期臺灣民族運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十六次學術座談會〉，《臺灣文獻》16：2，1965年6月，頁171-186。

駒込武，〈在台軍部と「反英運動」——ジュノー号事件を中心に〉，收於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頁259-285。

橋本浩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の對外政策と日本政府の動向（上）〉，《中国研究月報》57：11，2003年11月，頁1-14。

鍾淑敏，〈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海南島事業之研究〉，《臺灣史研究》12：1，2005年6月，頁73-114。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2004年12月，頁149-194。

蘇淑芬，〈瀛社・南社・虞社・壽蘇吟社—莊玉波的海外詩緣〉，《東吳中文學報》24，2012年11月，189-222。

釋明瑛，〈被遺忘的豪商郭春秧：以日治時期活動為主題〉，《臺灣學研究》20，2016年12月，頁31-68。

王昭文，〈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灣》、《臺灣文學》、《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王麒銘，〈越境をめぐる政治：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籍民政策の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7。

- 王麒銘，〈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
-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 渡邊公太，〈石井菊次郎と日本の戦中外交 1914 年-1919 年〉，神戸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14。
- 黑崎淳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與南支南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謝欣純，〈郭國基與戰後臺灣地方自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蘭陽博物館，「宜蘭縣古碑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宜蘭：蘭陽博物館，2017。

七、網路資源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網址：
<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 日本大学，「日本大学の歴史」，網址：
<https://www.nihon-u.ac.jp/history/forerunner/tsumuraya/>。
- 神戸大学，「神戸大学新聞記事文庫」，網址：<https://da.lib.kobe-u.ac.jp/da/np/>。
- 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吳濁流數位主題館」，網址：
<https://wuzhuoliu.blogspot.com/#timeline>。
- 國立臺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5/index>。
-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辭典資料庫」，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2/index>。
- 德富蘇峰記念館，「德富蘇峰記念館」，網址：<http://soho-tokutomi.or.jp/>。
-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張延哲長老」，網址：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iun/Tiun,Itiat/Siang-lian/Tin.Lto.htm>。

西文之部

一、報章雜誌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1926.

二、近人著作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Hotta, Eri, *Pan-Asianism and Japan's War 1931-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Saaler, Sven and Koschmann, J. Victor eds., *Pan-Asianism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aaler, Sven and Szpilman, Christopher W. A. eds., *Pan-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Electronic Book),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1999, vol.4.

Weber, Torsten, *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三、論文

Duus, Peter,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Diplomacy & Statecraft*, 7:1, March 1996, pp.54-72.

Lu, Cheng-Heng (盧正恒), “One Family, Four Worlds: Koxinga's descendants and nationalism across the modern East Asia,”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Berliner China-Hefte, No. 51, 2020, pp. 5-22.

Saaler, Sv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ism in Modern Japan: Koderu Kenkichi and His "Treatise on Greater Asianism" (1916),” *Modern Asian Studies*, 41:6, November 2007, pp. 1261-1294.

Yoshida, Ryô, “Earnest A. Sturge,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Culture in California, 1885—1922”, *American Presbyterians*, Vol. 74, No. 1, Spring 1996, pp. 17-29.

Chou, Wan-yao (周婉琄), *The Kōmin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91.